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编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编
(1926—1927)

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5 8338 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五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26—1927) 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8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黄修荣主编)
ISBN 7-5013-1469-1

I. 共… II. 中… III. ① 共产国际-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②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 史料 IV.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8671 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五、六卷

书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26~1927)

著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涿州市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38.75

字数 950(千字)

版次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套)

书号 ISBN 7-5013-1469-1/K·261

定价 精装:76元(全二册) 平装:60元(全二册)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王德京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研
究员)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

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编者说明

一、本书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5卷。本卷汇集了除丛书第3、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以外散见在中文图书报刊中的部分有关文献资料,包括过去已经由外文译成中文的文献资料^①。其中有一些文件根据近年重新公布的俄文资料重译。

二、本卷所收文件主要是1926至1927年之间的文献和档案。有些专题由于缺乏原始资料,不得不选用少量重要的当事人回忆和资料性文章,作为附录列后。

三、本卷分为9个专题,各个专题以及每个专题内的文件大体上都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但为适当集中,有些文件也难免提前或移后。

四、本卷注释除标明为原编者或译者所加外,其余均为本卷编者所加;原稿中的音译人名按约定俗成的原则作了统一处理,明显的文字错误作了订正,有着重号的地方一律改为黑体字。

五、本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王德京负责选编,姚金果、李颖参与了资料的核校工作。

^① 译者稿酬由出版社根据有关规定支付,请译者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编者说明

- 一、鲍罗廷与国民党二大…………… (1)
- 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 汪精卫 (1)
- (1926年1月6日)
- 鲍罗廷在华工作经过 …… (20)
- (1926年1月6日)
- 在国民政府欢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宴会上的演说词…………… 鲍罗廷 (22)
- (1926年1月1日)
-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欢宴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席上之演
 说词…………… 鲍罗廷 (25)
- (1926年1月19日)
- 鲍顾问与白崇禧之谈话 …… (28)
- (1926年2月3日)
- 二、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和国民军 …… (32)
- 一个志愿兵的札记(摘录) …… 里根·阿连 (32)
- (1925年4月—7月)
- 关于骑兵的报告 …… (59)
- 与普里马科夫同志座谈的速记记录 …… (64)
- (1926年2月15日)

- 附：《冯玉祥与国民军》前言 …………… 米罗维茨科 (82)
 (1967年)
- 冯玉祥莫斯科之行日记 …………… (97)
 (1926年5月9日—8月16日)
- 刘伯坚同志自库伦报告…………… (126)
 (1926年9月8日)
- 冯玉祥回国宣言…………… (128)
 (1926年9月18日)
- 蔡和森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 (133)
 (1926年9月26日)
- 冯玉祥给仲甫同志信…………… (134)
- 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 (135)
- 三、布勃诺夫使团与中山舰事件…………… (141)
- 中山舰李之龙事件经过详情 …………… 蒋中正 (141)
 (1926年4月20日)
- 关于“三二〇”事件的报告 …………… 斯切潘诺夫 (148)
 (1926年)
- 关于“三二〇”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斯切潘诺夫 (153)
 (1926年4月)
- 蒋介石关于“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向国民党中央的
 建议…………… (163)
 (1926年4月3日)
- 蒋介石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167)
 (1926年5月14日—22日)
- 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整理党务案…………… (172)
- 附1：切列潘诺夫关于布勃诺夫使团的回忆 …………… (173)
 (1976年)
- 附2：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关于中山舰事变

的论述·····	(177)
附 3: 张国焘关于整理党务案的回忆·····	(180)
附 4: 关于国民革命的分歧——中山舰事件和布勃诺夫 使团····· (日) 毛里和子	(187)
(1977 年)	
四、加伦与北伐战争·····	(197)
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 1926 年国民党军事规划 ····· 加 伦	(197)
(1925 年 9 月 20 日)	
加伦对蒋介石计划的意见·····	(209)
(1925 年 9 月 20 日)	
北伐前夕	
——康奇茨日记 (节录)·····	(212)
(1926 年 3 月 20 日—4 月 18 日)	
加伦关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三期作战部署简述·····	(219)
(1926 年 12 月 16 日)	
附 1: 布勃诺夫听取关于北伐问题的汇报 ····· 切列潘诺夫	(225)
(1976 年)	
附 2: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节录)··· 切列潘诺夫	(232)
(1976 年)	
附 3: 炮兵顾问的回忆····· 鲍罗金	(256)
(1974 年)	
五、北伐期间的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共青团·····	(268)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致中国共青团的信 ·····	(268)
(1926 年 10 月 15 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	

央书·····	(273)
(1926年10月18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武装干涉中国的声明 ·····	(286)
(1927年2月6日)	
在中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 的报告·····	(287)
(1927年5月13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296)
(1927年5月26日)	
六、罗易来华与“四一二”政变·····	(302)
中国革命的意义····· 罗 易	(302)
(1927年2月22日)	
一个警告·····	(306)
(1927年2月27日)	
注意领导人····· 罗 易	(311)
(1927年3月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 全世界无产者和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	(314)
(1927年4月14日)	
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 罗 易	(318)
(1927年4月13日—15日)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	(333)
(1927年4月16日)	
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 宣言·····	(334)
(1927年4月22日)	
七、罗易与中共五大·····	(338)

-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 (338)
(1927年4月29日)
- 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 罗 易 (365)
(1927年4月30日)
- 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罗 易 (385)
(1927年5月3日)
- 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 罗 易 (392)
(1927年5月4日)
- 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 罗 易 (406)
(1927年5月4日)
- 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 民主专政和无产
阶级专政 罗 易 (408)
(1927年5月5日)
- 布尔什维克的党 罗 易 (417)
(1927年5月9日)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420)
(1927年5月12日)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之意义 罗 易 (431)
(1927年5月13日)
- 八、大革命紧急时期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435)**
-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
独立性 罗 易 (435)
(1927年5月24日)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 (446)
(1927年5月)
- 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 防御还是进攻? (448)
(1927年6月9日)

- 罗易给冯玉祥的公开信…………… (463)
 (1927年6月10日)
-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 (467)
 (1927年6月15日)
- 中国(国共两党)国民革命纲领草案…………… (469)
 (1927年6月15日)
- 国民革命纲领…………… 罗 易 (471)
 (1927年6月15日)
- 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罗 易 (477)
 (1927年6月20日)
- 书记处致上海区委的信…………… (480)
 (1927年6月23日)
- 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 罗 易 (484)
 (1927年6月28日)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摘录)…………… (487)
 (1927年7月8日)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
 ……………… (489)
 (1927年7月14日)
- 党的机会主义史…………… 蔡和森 (495)
 (1927年9月)
- 附：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关于中国革命
 问题的资料…………… (558)
 (1963年)
- 九、附 录**…………… (584)
- 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 (584)
- 大革命时期来华工作的苏联人员…………… (594)

一、鲍罗廷与国民党二大

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汪精卫

(1926年1月6日)

各位代表：兄弟今天要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所经过的政治状况，作一个总报告。这个时期当中差不多是两年，在这短少时期所能报告的，只是一些重要的事件，而且关于军事方面尚有蒋介石同志报告，财政方面有宋子文同志书面报告；不过说及政治，不能不连带到军事、财政方面，不说到便不能明了。所以兄弟今天所说，也要把关及军事、财政的说个大略。

这两年中政治状况，可以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第一次大会以后到总理北上奋斗，就是由13年3月至11月。

第二个时期是从总理北上奋斗到总理逝世，这个时期很短，但关系却甚大，就是由13年12月至14年3月。

第三个时期是从总理逝世一直到现在，就是由14年3月到15年1月。

先说第一个时期：自从第一次大会发出宣言，说明中国之现

状，解释三民主义之真谛，并决定了最低限度的政纲，大会闭会后，自应该遵照政纲去实行。但可惜那时种种障碍都还未除去，党的最高权力原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理当时要把军事上的同志都加入在内，所以如杨希闵、李烈钧、柏文蔚、谭延闿都任为中央执行委员，如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都任为中央监察委员。总理之意是想将军事上的同志合拢起来，实行大会的种种决议案，使大家能真实在主义之下共同奋斗。不料这个意思却绝对不能实现，杨希闵、刘震寰都在广州有最大的军事上的势力，却都不愿意真心实行总理的主义的。其时许崇智同志还在上海，至3月后才回广州，谭延闿同志孤军驻在北江，后来以出发东江受杨希闵军队之压迫，生存尚且不敢必，更何从说到发展。虽然由总理召集各将领开过几次军事会议，通过了许多重要提案，到底亦是阳奉阴违，绝无办法。一次总理见得湘军太痛苦，十分受不住了，他们当时有四句很伤心的话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药，死不得埋。”但刘杨部下却盘据要津，把全省财政通通拿在手上，简直不肯放松一点给湘军可以生存。记得有一天，总理在军事会议席上有过十分沉痛的话，他说：“滇桂军各军官，你们赶走了陈炯明，我是很感激你们的，当时我在上海没有一点实力，原本不想回到广州，正是想用心著书，把我的政见向广东父老兄弟宣传；后来你们都派人来到上海，要求我即时回到广东，自誓要实心拥护我，服从我的命令，实行我的主义，我更是感激你们，因此我才决意回来。谁知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我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是你们把我的家乡这样蹂躏，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块办事，我不得不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去了。”当时杨刘诸人听见了这话都说“大元帅今天何必生气，你要我们怎样，我们都服从你就是了”。总理因此才提出财政统一的办法。这个议案当时是一致通过了，但

后来一点没有实行，各军依然是就自己势力所能及的，就随意抢收分割了去，到底是毫无办法。到9月13日，总理决定北伐，委廖仲恺同志做财政部长兼军需总监，又兼广东财政厅长，把财政全权交廖同志一人负荷，总理就和谭延闿同志出发到韶关。当时廖同志有一个通电是很沉痛的，电中说及广东的财政情形，如果各军都肯捐除私见，则拿现在的收入借给各军是很够的；如果各军仍旧是任由这些骄兵悍将、贪官污吏随意剥削人民，则必至军队不能打战，官吏不能做事，人民也日益穷苦。这电的目的在劝各军交还财权，各军也跟着发出许多响应的电，但却止是一个空言，没有一个人肯交一个钱出来。廖先生因此亲到韶关，再见总理，说明在这个情形之下，叫他做财政当局也是无用的，不特不能实行什么财政计划，就想筹一点饷也是没法的；与其使他做财政当局，不过是空替大元帅多担一个恶名，不如准他辞职，还容易使人民知道不法军队把持的罪过。廖同志因此就不做财政当局，专在中央党部办理党务，并任陆军军官学校党代表，实心从事政治训练的工作。这时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是这样情形，简直是万事都无从办起，与第一次大会以前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但自从蒋介石同志受总理命令组织陆军军官学校以后，和廖同志及各同志用很大的精神替革命事业打好了一个稳固的基础，此事蒋介石同志另有报告，此时不必详说。此外还有两件大事也于革命事业的基础有极大的关系，而且和军事是联络在一起的，一是外交方针；一是农工运动。农工运动中央党部另有报告，如今把外交方针叙述一过。

要叙述外交方针，必要补说总理联俄一切的经过。本来总理致力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既要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便不能不取消不平等条约。既要取消不平等条约，便一定要问到这些不平等条约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由此推究，即知从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英法联军后的北京条约天津条约，一直到庚

子联军后的辛丑条约，以至民国4年的日本二十一条件，都分明是帝国主义者之作祟。故此反对帝国主义，实是总理的、亦即本党的向来目的。不过在辛亥革命未成以前，却未曾明白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一个口号，到民国元年1月1日，总理就职临时大总统宣言才说出：“吾人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同时要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这两句话，实在即是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真义。不平等条约的罪过，就是要中国单尽义务而绝无权利；所以那时虽没有明言取消不平等条约，但单这两句话说起来，已很惹起外人的注目了。民元2月，总理辞职来到上海，赴过一次租界外人的欢迎会，就已经直白说过，他所要求于各邦人士的，是要把租界交回我们中国；这可说是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第一声。但从这日起，外人的报纸便开始讪笑总理，决心帮助袁贼世凯去反对中国的革命党了。外国帝国主义者更答应袁贼的大借款，因此才有民二东南的战事；袁贼即利用大借款以扫平东南几省的革命党，因此有民五的洪宪帝制；因此才有民六日本再利用段祺瑞给以参战借款及各种借款3万万以维持日人之二十一条件。此时可说已是革命党与帝国主义者短兵相接的时期，无法而可以避免的了。民六俄国革命既起，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一致攻击苏俄，诋之为过激，诬之为地狱；但那时总理便说俄国革命必定成功，欧战中的同盟国、协商国都一定失败，民七总理在广州辞去大元帅职，复回上海，因为深恨帝国主义者之日日把苏俄造谣，曾打一个电与苏俄，庆祝他的成功，鼓励他们继续去奋斗。其时世界上的交通机关都在帝国主义者的掌握，电报是不易打去的，很曲折的才托美洲的华侨同志打给俄国。列宁此时正在帝国主义者四面的封锁，忽然接到总理这一封电，实在生出意外的感动，视为这是东方的光明来了；总理与俄国的同志虽然在欧洲亡命时也曾有会过面，彼此讨论过革命的事业，知道他们的旨趣，但打电致意，却以此为第一次。

到民九、民十间，苏俄已经打破了帝国主义者的封锁，能够

用其余力来帮助世界一切被压迫民众的解放，列宁更决定了两个计划：（一）对西方的被压迫阶级，助他们联合起来；（二）对东方的被压迫民族，也助他们联合起来。他派到东方的同志有一个叫做马林，马林在民十曾到广西，总理当时正在师次桂林，马林去见他，总理当时曾打一封电到广州给廖仲恺同志和兄弟两人，说他见过马林，心上非常高兴，深信他建国方略里的实业计划，一定能够实行；并说他从前听闻苏俄实行共产，很是诧异，以为俄国的经济状况，共产的条件还未具备，从何实行？马林来，才知道俄国之新经济政策，实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一样，所以非常高兴。这便是总理联俄的起点了。可是马林由桂林来到广州以后，他却表示非常失望，他以为除掉俄新经济政策与总理实业计划暗相符合这一点，觉得高兴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对陈炯明与本党的组织方法、宣传方法都表示失望，并且他断定香港帝国主义者必不容广东政府的发展，陈炯明与总理一定不能相容。这些话他对廖仲恺同志和兄弟都一样说法，对别人如何说则不得而知。是时中国共产党曾和吴佩孚有过来往，马林也曾去见吴，他说吴的才力比陈炯明高过十倍，但可惜他总不懂什么是政治。兄弟因此联想及以前曾有一部分同志批评李大钊同志不该和吴佩孚来往。须知道在那时候李还未加入本党，他拿共产党员资格与吴来往确是有的，他想用吴帮助共产党做国民革命事业，这也是革命党常有之事，有什么可以反对。一直到民国11年6月16日以后，总理蒙难广州，8月15以后亡命上海，其时中国共产党员很替总理抱不平，才陆续来加入本党。最先加入本党的就是李大钊，由张继介绍来的。李当时曾对总理说明他是第三国际党员，是不能脱去第三国际党籍的，不知总理能否许可接纳他。总理答他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便多起来了，后来苏俄又派越飞到中国，他到上海时曾见总理，并且曾联合发表一个宣言，大

家都承认中国现在最急切的是反抗帝国主义。不久越飞因为抱病，由上海到日本东京，总理命廖仲恺同志和越飞同行，彼此在热海同住了一月，此时东方人未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12年春间，廖同志由东京回广州帮助总理做联俄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怀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很坚决去干，其中实有原故的。因为有一个月之久，和越飞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由此总理与苏俄的关系更日深一日了。是年夏间，总理更派蒋介石同志赴俄，蒋同志到莫斯科时，列宁已经病重；但也见过托洛斯基诸人，经过一番切实的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和共产党森严的纪律，遂为后日回国改组本党和开建党军之一大动机。总理从此便决定与俄国携手了，共同奋斗程度又进一步；苏俄也决定想帮助东方民族革命，非帮助本党不可，非帮助总理不可，因此才派鲍罗廷先生来到广东。其时正当陈炯明、林虎的军队陷了石龙，攻到广州近郊，用尽了滇桂粤湘鄂豫诸军才把他打退，鲍先生到粤后，与总理商量许多，才决定改组本党，因此才有13年1月本党改组之事。可惜的在第一次大会时，恰正接了列宁逝世的凶耗，总理当时甚觉悲痛，曾停会两天志哀，并亲自出席追悼列宁大会，演说他哀悼列宁的感想。大家须知，这时各国还没有一国承认苏俄，虽然第二国际的首领麦唐纳正在初就英内阁总理之职，但和苏俄还未有恢复国际的关系，而我们广州的革命政府却已明白为列宁开追悼会了。其后俄国复派加拉罕到中国，商量中俄协定事情，苏俄当时本也知道如果和广州商量，这个协定很可以使中俄关系更加明了，但我们的政府尚在实力未充，即使订定也效率很小，所以不能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商量，只要确实的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便和什么人订定也都是于中国有益的，因此加拉罕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订定了中俄协定。其时兄弟刚奉总理命令到北京去，和同志商

量进行北方党务，曾和加拉罕谈过，他直说他也晓得曹锟不能代表中国的，不过利用曹锟现在的地位，商定了中俄关系，把从前俄皇时代订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通通取消，先把此事作一个结束而已。中俄协定成功后，更使本党与苏俄的感情又深一点。但因此同时更受帝国主义者的污蔑，他们见得本党联俄，无法破坏，就在上海、天津、香港各地的外国文报纸日日造谣，犹以为未足，更想到利用实力来破坏，因此遂有是年10月15日商团之变。此事原委：因为8月1日商团团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由粤汉路管理许崇灏介绍到军政部领到一张买枪的执照，此照发出之后不到4天，大批枪械便已由挪威船运载入口；总理当时非常震怒，因为各国卖给军火与中国人民，必须先得到中国政府之许可，才可以订立合同，如今领到执照止是4天，枪械便已入口，显然是老早交易妥当，且已经运到，不过等候骗到执照，才火速进来。所以总理便把枪械扣起，并且从严查究。但因此便引起商团之罢市，英国帝国主义者竟敢公然于8月27日致一件类似哀的美敦的通牒给我们的外交部，说是听闻我们已定开炮攻打商团，如果是事实，英国的海军司令官也就命令舰队开炮攻打我们的官吏。这般通牒，比之民四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条，实是同等的国耻；以总理之志气，此时更愤到不可言状了。可是因为当日的环境太恶，也不得不要对于商团委曲求全，这也并不是因为怕外人的势力，实在因为杨希闵、范石生、廖行超这班骄兵悍将已经和商团勾结，不肯奉总理的命令去解散商团，而商团因为恃在他们有两个后盾：（一）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二）是我们政府统治下的骄兵悍将。晓得我们一定不能打他，因此才有10月10日的惨案，商团挟持枪械，把双十节徒手巡行的学生、农民、工人肆行屠杀，连死及伤至有数十人之众，政府至是不能更忍了，只得把自己尚能调动的军队如许崇智的粤军、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军、樊钟秀的豫军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合拢起来，于是月15日才把商团打倒。因为打

倒得很迅速的缘故，到后来商团派人到港要求港督出兵，港督说：“已经完了，来不及了。”这便是商团勾结帝国主义来推倒革命政府的一段故事。商团之所以勾结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所以利用商团做工具，固然因为总理以联俄为外交方针，故不惜百端破坏；然农工运动之主张，早已于第一次大会宣言中解释明白，是年并曾开过实业讲演会，说明了总理的实业计划和本党的政纲，一面帮助农工，一面也保卫商民，不用说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两项政策，于地主和资本家没有什么不利，而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正是对于经济落后的现象为对症发药。无如那些土豪买办，却着实冥顽不灵，认为这就是过激，这就是大逆不道；其冥顽不灵的状态，恰如从前官僚绅士反对民主制度，认为犯上作乱一般，遂至不恤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来反噬革命政府。当时革命政府外则受帝国主义之欺侮，与北洋军阀之压迫，叛军之侵扰，内则受骄兵悍将之牵掣，土豪买办之毒螫，真真是重重迫胁，几乎窒息。在此时期，本党除了忍辱负重，准备一切革命的工作以外，实无何等表现。是为第一个时期。

现在要说到第二个时期了：这个时期是由总理北上起至逝世止。总理北上之目的，当时很多人以为总理是要和军阀合作，和段祺瑞、张作霖妥协去分政权，这是错的；但是总理也知道国人会有这种误会，故此到了上海之后，便邀上海全体新闻记者谈话，说道：“我这次北上是有两个目的：（一）召集国民会议，是对待军阀的；（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待帝国主义的。”由这一段话看来，就可知道总理北上之目的是早已决定的了。当时总理还说道：“我负着这个责任北上，是很危险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国民众能够了解就是。”随后总理并且曾到日本，要求日本民众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帮助我们中国革命，取消不平等条约，所有议论都载在《孙中山先生经过日本之言论》一书，不必详细报告。原本总理到上海时已受租界外人的压迫，后来由日本到天津，法

领事竟不许总理通过法租界，更不许在法租界住。北洋的军阀因此便说总理在外交上的感情不好，不知道总理的主张和帝国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当然会引起的反动。记得当时张作霖也曾和兄弟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是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要和孙先生要好的。”当时我答他说：“孙先生为什么联俄呢？因为俄国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国也都以平等待我，孙先生便都可以和他们要好的。”张作霖至此，见语不投机，便不再说了。因为他们这时正在和外交团商量，把尊重不平等条约做承认临时执政的条件。到12月14日，许世英、叶恭绰两人到天津见总理，总理这时的病略好一点，就问他：“听说临时执政已经接受外交团尊重不平等条约的通牒，是不是呢？”许、叶两人答：“是的。”总理当时便很生气，说话也比平常洪大而急促。我劝总理不必再多说话，总理才对我说：“你和他们说去罢。”总理在这时候，虽然是病，从未有发过热，自从听了段祺瑞接受外交通牒这一段话，着实生气，是晚便发热起来。固然总理所患的病是肝病，大家知道是不治之症，但当时病的加重，可以说是实在因这一气的。后来我和许世英、叶恭绰两人说：“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事，原不只是孙先生的主张，自巴黎和会就已经提出；后来因为巴黎和会会长克里满梭说，这事不是巴黎和会所能解决的，可以留待将来国际联盟去解决，所以和会才把这案保留；以后到华府会议，我国还是提出的。这是全国国民的运动，你们单是要弄稳一个执政的地位，并连这件大事也轻轻去掉，如何做得？”他两人问我怎样办？我说：“你们执政覆牒可以说，外交团的来牒暂时可以承认；但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事，是全国民众的要求，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现在执政正和广州革命政府的领袖孙先生合作，孙先生是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事为当务之急的，执政当然同意，并

且要帮助的。”如此可谓最低限度的让步了。许叶二人都说：“好，我们就这样告诉执政，这样办罢。”是晚我们把此事报告总理，总理说且看他们怎样再算。谁知他们后来对于此事竟没有办到。12月31日，总理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当时总理是打算病好再来奋斗的，不料段祺瑞此时却主张召集善后会议，以替代国民会议的预备会议。总理为委曲求全起见，于14年1月17日通电（就是令人注意的筱电），主张善后会议应加入职业团体代表，以为如果达到这个目的，即是有真正的民众主张在内，则我们的预备会议的主张，也可以退让；谁知段祺瑞对这一点也没有诚意，所以总理才吩咐党员不许加入善后会议。到1月26日，总理的病愈重了，其时就有一部分的不肖党员，不遵党的决议，加入善后会议；至于冯自由、江维藩等又组织什么同志俱乐部，不惜变节卖身，以达他升官发财的目的，这班人还说我们利用总理的病以破坏孙段合作呢。以上就是总理和段祺瑞绝交的原因。总理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虽然受制于帝国主义和军阀，不能实现，然一般民众却已为总理的人格精神所感化，一致拥护此两大主张。所以总理逝世之后，北京民众有空前的追悼。五卅以来，各处反抗帝国主义之高潮及最近北京倒段之大运动，都是总理所播下的种子；总理虽然资志以没，然其成功已不远了。

如今更说到第三个时期：自从总理北上以后，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又想作怪了。本来总理当出师北伐的时候，已经早把围困惠州、并驻扎石龙的军队撤退，希望陈炯明也捐除成见，向福建方面进展。但陈炯明却反因此天天造谣，说某日解惠州之围，某日克复博罗，某日克复石龙，到后来晓得总理病重，更加欢喜，一面联络滇桂军做内应，一面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勾结曾毓隽一班人，要求段祺瑞帮助他攻打广州，因此才有去年2月间陈军攻广州的事情。此时谭组庵、朱益之两同志担任保障北江，许汝为、蒋介石、廖仲恺几个同志出发东江，原约杨希闵、刘震寰

共同担任破敌的；无如杨刘袖手作壁上观，遂不能不单独作战，卒把陈军驱逐出潮汕以外。这事未始，蒋介石同志当有报告，故不多说。自从东江平定以后，就发现杨希闵、范石生等与林虎来往的函电，知道他们通敌的情形，这是陈铭枢旅长攻入兴宁以后，在林虎的司令部内找着的；此外更发觉了刘震寰亲到云南见唐继尧，叫他派遣云南军队攻打广西、直下广东的密谋，一路龙云带兵从百色入桂，一路由唐继尧带兵从桂林入桂；杨希闵却驻香港与帝国主义者勾结，更和广东的劣绅买办勾结，叫他们打电给北京政府，推戴他做广东督理。这般的阴谋毒计，已酝酿成熟，当时留在广州的谭组庵、朱益之两同志觉得非常痛心，便派人到汕头和许、蒋、廖诸同志商量，决定推倒杨刘的计划。关于军事的动作，也留待蒋介石同志报告，我们任事的只是政治上的设施。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单是打倒杨刘，而政治不能根本改造，也是无用，所以在广州政治委员会定了一个严重的决议案，大致说明我们整顿广东，必先整理广东入手；而整顿广东，又必先从整理军事入手。所以第一要军事统一，第二要民政统一，第三要财政统一，第四要各军都受本党政治的训练。这决议案定下以后，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胡汉民同志立即接受，谭组庵、朱益之两同志下了实行的决心，再由兄弟到汕头见许、蒋各同志报告一切，大家都以为这决议案无论如何要尽力使之完全实现，所以6月5日以后，便开始攻击杨刘。6月12日，杨刘打倒，我们便着手于国民政府之组织，大家有过极重要的商量，就是议决采用委员制。这个意思本来不自此时才有的，自去年1月26日总理入协和病院以后，在北京开过一次政治委员会会议，大家的意思都是主张在总理逝世以后要实行委员制的，和在广东政治委员的意思都是一样。因为总理在时，在本党有这个总理，同时在本国有这个元首；总理逝世以后，实在再无人可继，而且在本党总章第四章上面也清清楚楚说明是：“本

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并不是说本党设总理一人的。当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本党总章草案原没有第四章那一章的，因为总理决心改组本党的意思，实在要把党的责任交付给全体同志；但大会各代表都请求总理加入第四章，就是关于总理的那一章，因为总理是有很长久的历史的，中国的革命事业自开始以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的领导，故本党愿意始终以总理为唯一之领袖。总理逝世之后，本党不复有总理了，推之以党治国的理论，则国家亦不复有元首了，而且就现在世界来说，也推委员制为比较好些；总理若在，大家都愿意听他的独裁，总理不在之后，实无人能够承继他的，则委员制实为适应时势的要求。可是决议以后，为什么许久还不实行呢？就是因为其时杨刘还盘踞广东，如果即时实行，他们一定有份列入委员，岂不是又把我们彻底改造了的计划通盘弄坏？故此直到6月中旬杨刘走后，才提出实行委员制这个问题。我们正想趁这个时候从事种种建设，不幸于6月23日又有沙基的惨案发生，那天我们的民众止是一个巡行，是响应五卅上海惨案及汉口、九江各地惨案的巡行，实在毫无挑衅的意思；现在有些帝国主义者说我们首先开枪，但试想我们如果有挑衅的意思，断不至于将巡行群众都作密集队伍，凡是稍有军事常识的都不会有这样做法。故此我们挑衅之说，不待辩而自明了。但是帝国主义为何又向我们挑衅呢？我们敢断定：这是帝国主义者向中国民众的一种示威。我们打倒杨刘不过旬日，便遇着这样的帝国主义的示威，真是最危急的时候了；我们那时是准备着牺牲的，就是失败也不及计的，所以7月1日国民政府便宣告成立，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把国民政府的委员会组织妥当；二是把军事委员会组织妥当，把各种地方军的名目通通取消，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因为总理遗嘱上第一句便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以就拿国民革命四字做军队的名称。我们做统一军政的计划，做统一财政的计划。至于民众方面，我们努力帮助香

港罢工的工人，共同对待帝国主义作一个极大的反抗，这些都是7月1日以后我们所做的事。可是我们一面努力，敌人却也一面给我们很多的障碍，香港政府对于国民政府更出尽诸多方法去破坏，他们以为国民政府一倒，罢工便不能持久；同时骄兵悍将也在反对军事统一的进行，如魏邦平、梁鸿楷等就利用土军排斥客军的口号，以从事反动。本来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蒋介石同志已率兵由汕头、经海陆丰以赴平山、淡水，许汝为同志尚在汕头，魏邦平去见他，张国桢带杨坤如也去见他，商量两个条件：（一）由魏担任联络粤籍军官，一致拥戴许同志；（二）由张担任联络叶举、熊略、洪兆麟、林虎等一致拥戴许同志。当时许同志以为他们真正要拥护他，便受了他们的要求，叫魏回到广州帮助粤军攻打杨刘；杨刘既倒，又叫莫雄带领全旅送杨坤如回到惠州。当时守惠州的骆凤翔，本来派人到大本营输诚，许同志吩咐莫雄与杨坤如同守惠州，实是还不能相信杨坤如的，所以特叫莫雄监视着他；谁知莫自送杨到惠州后，便调他的全旅开回石龙，然后自己回到广州见许同志；许同志问他为什么不在惠州？他答既然总司令相信杨达波，便不要监视他；许同志也没奈他何，实则莫之与杨是早已约定的了。至于他们所以说排斥客军，因为其时蒋介石、谭组庵、朱益之几位最努力的革命同志，都不是广东人，故此仿出此等口号来排斥他。其实此等口号还是假的，他们实因为要保持往日割据地盘、霸收税项这种势力，如今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将要实行军事统一、财政统一，他们骄兵悍将的命运就要完了，所以他们就决定非推倒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不可；排斥客军便是一种推倒的方法，因为如此便好藉主客之见，实行拆台。此外和一般贪官污吏互相勾结来共同作祟，因为国民政府以廉洁做表率，以实行民政统一，此于贪官污吏又是大不利的。兄弟当时曾说过：“如果民政不能统一，固然是广东之祸；但如果仍容那些贪官污吏存在，则民政统一不过给他们一个发财的更好机会。”他们听了这

些消息，更不得不着急起来。我们一方面决心努力实行本党各种议决案，他们一方面骄兵悍将、贪官污吏便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来实行破坏。当8月初间我们已接有报告说：文华堂一班人已经决议要杀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但因为沒有凭据，只能加以防范；廖同志曾说：“我们天天同民众接近，如何防范得许多，止有听他来便了。”及至8月19晚上，政治委员会会议散后，廖先生对兄弟说：“你现在仍是照常一个人出入，未免太疏忽了，要找些卫士才好。”兄弟说：“我是一个党员，此次才以中央执行委员列席国民政府委员会，就带卫队出入，是不好看的；而且你也没有卫士。”他说：“我这两天已预备了三个人了。”他并且笑着说：“听闻人家要用手机关杀我们，用手枪炸弹是常听见的，若是用手机关枪却新鲜得很。”不料到第二天8月20日早上，廖同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果然就给六七个凶徒乱枪打死，凶徒陈顺给廖同志的卫士打伤，当场捉获，在他身上搜着手枪及证据多种，这件案才找出个头绪。查得这支手枪，实是朱卓文常用的，所用的子弹果然是手机关子弹，廖案的全部，将来结束时，当有更详细的报告，现在不过说个大略。在廖案发生的当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开过一个联席会议，指定许汝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对政治、军事、警察有全权办理。当日晚上，我们三人正在粤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办公室商量应付时局方法，梁鸿楷在室外直对吴铁城同志说：“现在政府派许、汪、蒋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是很妥当的，听说廖仲恺之死，完全因为主张共产，朱卓文果是为反对共产而打死廖仲恺的，怕什么不敢承认，承认出来看看，有没有人替他帮忙，请你告诉特别委员会三位，此案还是松一点好。”吴铁城当时听到这话十分惊讶，不久就来见我们，把这事照直报告我们。由此知道此案关涉甚大，不止是文华堂一班人了。而二十一二等日接得报告：文华堂一班人胡毅生等连日晚上去魏邦平家里会议，夜深方出。²³

日李福林军长特来见许同志说：“现有一事不能不来报告，因为胡毅生告诉我，现在党军已由粤汉铁路开向河南是要来打福军的，你们须准备才好。同时并有一个证人到来，他可以作证，说8月初间曾在文华堂亲眼看见，亲耳听见朱卓文和林直勉坐在一处，口口声声说非杀廖仲恺不可；当时以为他们是随口乱说的，不料他们真做出来。”我们得这几种报告，知道事已紧急，便即于24日晚上下令捕拿文华堂胡毅生、林直勉一班人。当拿到林直勉后，由检察委员会问他，他总不答。我们因他是一个老党员，11年6月16日曾救总理出险，所以从优看待他。有一日检察委员亲到他房里同他说话，一个人造事要敢作敢当，你既造了，何必不说？他才说：在检察委员会问我，我是不说的；如今既然到房中来问我，我便说出来。他遂写了十几张的供词，如今还存在廖案审判委员会。供词中直述：推倒廖同志是他向来的主张，但谋杀一事却没有知道，他绝不想到要推倒廖同志的结果就即是要杀廖同志，因为廖同志是肯负责人，愈有人攻击他，他愈是要干的。受人攻击就即行引退的，可以用空气来推倒他，如廖同志这种人，想用空气来推倒他是没用的，其结果非把他杀死不止。供词中还有一段话是说当他参预推倒廖同志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这事是一定成功的，香港方面可以有200万元的帮助；林直勉听见这话，很觉得不安，以后就托病不再管这事。这算是林直勉尚有良心。香港200万元这句话，实和当日拿着的杨锦龙的供词是一样的；杨曾供出他当初本不敢参与这事，后来胡毅生说香港有200万元的帮助，他才决心参与的。可见此事是很确实的了。至于胡毅生被党军到宅逮捕时，当他对兵士诡说：毅生现在胡汉民同志家中，兵士受骗，立即到胡汉民同志住宅，几乎累着胡汉民同志，而胡毅生却乘机跑了。胡汉民同志知道有此意外之变，非常痛心，因为林直勉、胡毅生都是向来听他的话的，不料如今却有此事。至于外间对于胡汉民同志种种谣言，如今已证明都是假的。以上所述是25

日捕拿文华堂一班人的事，所可惜的只拿着林直勉，其余胡毅生、林树巍、魏邦平诸人都拿不着，我们在25这日还又拿了张国桢、梁鸿楷、杨锦龙、梁士锋一班作恶的军官，并解散了他们在省的部队。梁鸿楷、杨锦龙的罪状，上头已经说过；梁士锋绰号梁土匪，和杨锦龙是一起的。这几个人拿了之后，张国桢便来见许同志，说他对于此事早已晓得，两星期前，魏邦平、梁鸿楷、杨锦龙、梁士锋曾在他家商议如何推倒国民政府，并连许同志也要推倒，当时他劝他们不可推倒许同志，以致失了主脑等语，许同志以为张国桢现这样说，总还不是与谋的。蒋介石同志则以为张国桢做建国粤军第五师师长，既然在两星期前知道此事，如果早来报告，便不至闹出如此大祸，于今才来报告，显是明知梁杨梁诸人被拿，故急来卸脱，而且既然在他家会议，如何不算与谋？这等人倘不拿，那里还有国法？于是便把张国桢拿了。兄弟对于此点，与蒋同志同意。以上所述，是捕拿一班作恶军官的事。梁鸿楷被拿之后，兄弟等随命李军长济深前赴江门将梁鸿楷所部妥为处置。兄弟等办理此事，颇受外间一班人的攻击，究竟办理得当与否？还要求大会的评判。不过也要要求大会明白，如果当时不这样认真办理，则国民政府必已为一班反革命分子勾结帝国主义所推倒。他们的督理省长都早已预备好的了，当时虽然因为这样办理镇压了去，然廖同志已死，不可复生，这实是本党极大的牺牲。各位代表如果赞成兄弟的提议，请起立致哀。（当时全体代表皆起立致哀，廖夫人何香凝同志痛哭，主席谭延闿同志及报告者汪精卫同志皆泣下。）

自从8月25日以后，广州的形势更严重了，陈炯明的军队在东江方面有卷土重来之势，重征东江已是刻不容缓；可是广九铁路沿路有郑润琦、莫雄、许济等屯驻共有三师之众。郑润琦原是魏邦平的旅长，在广宁勾结上豪，残杀农民，是一个反革命的粤军师长；莫雄和杨坤如有联络，上头已经说过。9月中旬，陈炯明

的军队已由海陆丰长驱直进，冯轶裴和余鹰扬都已陆续退至平山、淡水，在这种严重形势之下，如果蒋介石同志统率党军出发东江，必须经过广九路，郑润琦、莫雄已经约定：等他经过，立即截断他的归路，杨坤如坚守惠州以当其前，熊略、叶举、洪兆麟、林虎分路并进，党军虽然善战，究竟前后受敌，进退无路。各位想想：这条计策狠毒不狠毒？幸而在那时候，郑润琦、莫雄的叛迹已渐渐暴露，而许济部下之谭曙卿、陆瑞荣等同志都是深明大义的，他们说道：“如果政府不用他们，就此遣散好了；若是还用他们，他是不能和郑润琦、莫雄这些反革命派在一起的。”蒋介石同志因此便和兄弟商量，决定办法，并在政治委员会开秘密会议通过，下令把郑润琦、莫雄所部一律缴械。这是9月20日的事。许汝为同志见得所部军队这样不肖，气忿极了，便提出辞职，径赴上海。以上所述，都是事实，无论许同志在这里与不在这里，兄弟都是这样说的。9月20日以后，原本可以出兵东江了，但不幸又有熊克武的事件。本来去年春间，陈铭枢旅长攻破兴宁时候，在林虎司令部里发见了13年冬间但懋辛写给林虎的一封信，信里所说都是联合滇桂军反对先总理的话。但懋辛是熊克武的死党，又是奉熊克武的命令来广州的，原来却摆布出如此的阴谋，所以去年夏间熊克武有电来说要携带所部就食来粤，我们听见已经是不放心了；不过因他也是中央执行委员，又正受赵恒惕的压迫，不能不勉为收容，且以为他经了这番挫折，也许有些觉悟了，所以便指定连县、连山、阳山这几县给他驻扎。这几县原是朱益之同志部下的驻地，我们请朱同志让给他的，他以为三县还不够，又将乳源给他；朱同志部则退至四会、广宁，所有这几县的收入都给他造军需；另外兄弟又和宋子文同志商量拨款200万元给他。这是9月20日以后的事。如果他和我们诚意合作，当然不会发生别项问题的；谁知到10月1日就出了一件重大变故：陈炯明的代表张识万这天来见朱益之同志，直说现在的事体陈兢公早和熊锦公

有约定了；谭延闿呢？我前时见过他，他不理我，我们如今也不理他，现在只是等益公的同意。朱益之同志当时气极了，但还忍耐着盘问他，他见朱益之同志神色有点不同慌忙说道：我们已准备30万给你呢。朱益之同志忍耐不住了，就叫卫兵把他绑起。我们从此才知道注意。查检电报，竟又发现了但懋辛由香港致熊克武的电内说：各事都已接洽妥，当6日可以来省。我们知道事机危迫，就在3日把熊克武扣留，并在他住所搜出了许多通敌的函件，已经用写真版发表的。熊克武扣留了以后，我们把川军交汤子模代领，后来我们又截陈炯明打给汤子模一个电报，由赵恒惕方面转来的，内里说的是熊锦公已给汪蒋两人扣留，川军应即退回湘边，炯已商赵省长设法保护等语；于是不得不命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军去解决川军了。这件事关系国民政府的安危，人人知道熊克武扣留之后，党军才能出发东江；但其关系尤不止此，虽然当时北江方面还有第二三军，熊克武即使作反，也没有什么可怕，然而我们要晓得：如果川军还在北江，则第二三军便不能不看着他，当10月14日惠州克复之后，陈炯明的军队为要解他东江方面的危急，决定从南路发动，直捣广州，以牵制我们的东征军，于是阳江、罗定、云浮、新兴、恩平、开平、台山相继失守了，这些地方都是西江南路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重要的所在，当时所以失陷如此之易，因为苏廷有临时叛变，而梁鸿楷旧部之梁鸿林、洪敦曜两部亦同时叛变，徐汉臣等便乘势冲入，邓本殷等的声势便大振起来。综计贼众约2万余人，而南路各军指挥陈铭枢同志所部只有第十师，虽然广西李督办宗仁、黄会办绍竑已派兵援助，但也不过千多人在单水口一带和敌人相持，真真是贼众我寡，这时如果不调第二三军星夜赴援南路，军事便不堪问了。但如果熊部仍在，第二三军又如何能够离开北江？如果离开，熊部即可乘虚来捣广州了。幸而第二三军已于10月中旬进兵解决川军，又由广西李督办宗仁、黄会办绍竑令白崇禧由广州进兵兜截，

因为李黄早已知道熊克武的阴谋的，他们曾发现熊自湖南经广西来广东时，沿途和唐继尧往来许多密电，电文内容虽不能悉，但国民政府是和唐继尧反对的，他和唐继尧这样密切，一定是不怀好意，故决心要解决他。后川军果然走回湘边，给唐生智缴械，川军至此，才算结束。以此之故，10月26、27等日，第二三军才能抽调回来救援南路，使陈铭枢师长所部士气大振，单水口告捷之后，把恩平、开平、台山、新兴、云浮、罗定、阳江一律恢复，以后更势如破竹，把几年陷于敌手的高、廉、钦、雷诸州县都次第恢复。计自10月6日东征军事开始动作至12月26日，而广东全省除琼崖外，已是统一告成；大约不过一月，琼崖也可以攻下了。以上是说明捕拿熊克武的经过，至于熊克武应该如何处分，这应归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兄弟并想要求大会下一个公道的裁判。

以上所述，是第三时期。我们在这时期中，一方面因为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努力去反抗；一方面因为反革命之变乱，努力去扫除，尚算奋斗得有一点成绩。至于以后计划，谨概括陈述如下：

我们从此以后，对于军政统一、民政统一、财政统一、军需独立、军事训练这几个决议案可以着手去实行了。现在计划：第一步是赶快把广东巩固起来，所以要除盗安民，其根本方法：一面从人民经济方面着手，开发实业；一面从人民组织方面着手，把各种自卫团体做好，因为这种组织如果不好则或彼此发生冲突，而为匪徒凭藉作恶，非加以彻底整顿，不能收治安之效。我们因此已组织一个广东全省除盗安民大会，想根据这些方法，做根本救济。至于计划之第二步便是我们要把主义及政纲努力推行到全国。这是不能于此时即有报告的。

以上所述，都是第一次大会以来重要事实之经过；至于理论方面及未能见诸实行的，恕不多说。

（录自《革命文献》第二十辑，（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1978年10月影印再版）

鲍罗廷在华工作经过*

——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6年1月6日）

现在七十号同志说，要将鲍罗廷先生帮助我们的经过讲讲。鲍罗廷先生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候，赞助总理，贡献种种方法，改组本党。后到北方区三省去订立中俄协定，完后再到广州，仍然作本党政治委员会的顾问。政治委员会之设立，因为前年中央执行委员会，虽有海外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各部，但因没有政治指导机关，究未完备。因此总理提出应设立政治委员会，辅助总理计划政治的方针。就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伍朝枢、邵元冲做委员，总理自己做主席，共是7人。谭平山同志不肯就职，由瞿秋白补。就请鲍先生做高等顾问。鲍先生赞助总理，总理很采纳他的意见的。蒋中正同志有一演说词，曾在报纸上发表过，说及这一点，各位也可以看见，前年12月总理北上，约鲍先生同去，到天津北京。先生入医院几月，总理说应再在北京加委些政治委员，就派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李大钊，等为政治委员，都是鲍罗廷先生做顾问，一直到总理病死仍是这样。鲍罗廷先生对于我们，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至总理病死之后，及刘杨讨伐之前，即14年3月，鲍罗廷先生回广州。其时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政治委员会，照从前一样去做。因为总理没有在，请胡汉民同志主席。由此一直

* 这是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回答一些人对鲍罗廷的责难而作的答复。会议决定以大会名义赠给鲍罗廷银鼎一座（上刻“共同奋斗”字样）以示表彰。——原书编者

至去年9月。由9月到现在，是兄弟做主席。但当中政治委员会委员，也略有变更，戴季陶、邵元冲不在广州故加入蒋中正孙科同志，又因瞿秋白在上海，故仍请谭平山同志出席，另外请省政府派古应芬、陈公博，国民政府派林森，军事委员会派朱培德，监察院派甘乃光，大概广州重要机关，都有人列席。所以外面说政治委员会很秘密的，实在没有晓他内容的缘故。政治委员会，是总理决定的，鲍顾问先生在里面，真是尽职，总理在不在都是如此。鲍先生没有一次不为我们详细计划。不过表决时候，他必完全处顾问地位，没有表决权的。现在西山会议，攻击鲍罗廷先生，说鲍先生操纵政治委员会。但政治委员会是各机关都有入在内的，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在政治委员会内充分讨论，讨论之后，或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执行，或交国民政府省政府执行。政治委员会止是一建议机关，还不是执行机关，如果责备，实不必责备政治委员会，不如责备政府全体，鲍罗廷先生完全处一个顾问地位，更无理由攻击到他。他们攻击鲍先生，不是侮蔑鲍先生，实在侮蔑政治委员会全体。至于苏俄帮助中国，蒋中正同志有一次演说过：“苏俄帮助我们，不只是物质帮助，并且是知识的帮助。最大的帮助，是要我们纪律严重，使同志有纪律行动。这才是最大的帮助。他常常说，你们要组织团体，必要先有纪律，没有纪律，团体便没有用。各种帮助中，最好是这一种。”总之鲍罗廷先生帮助我们，不论总理在不在，都是一样热诚，真是能尽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职。这一层兄弟可以代表政治委员会向大会报告的。

（录自《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6年4月版）

在国民政府欢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宴会上的演说词*

（1926年1月1日）

鲍罗廷

今天我很欣喜看见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同志，也很高兴与各位同志们谈话，因为两次的代表大会中，没有和全体谈过话，我对于同志们所接谈的，只是广东一部分的同志，现在能与各地来的同志见面，交谈，觉得是更荣幸的！

我是在二年前来广东的，在未来之前，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将要做什么工作？所以我到这里来，并不是我本来的志愿，但我终于来了！终于来的缘故，第一个原因，是你们的领袖和我们的领袖间有一种谅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是我的一种义务，但是我二年前来南方时，并不是直接到中国南方广东来，我是先到上海，所以我们的订约就在上海，其时孙逸仙博士正为了反革命的势力扩张而避在上海，还没有回去，实在我的来广东，是我实行条约的第一步，但是没有做第二步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领袖死了，现在你们的领袖也死了，那末我们要不要互相实行你我的义务呢？要不要实行同样的义务呢？是的！我们要实行！在你们的义务方面，你们应该联合起来，团结成一体去继续总理向有的辛苦！负一部分应尽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在联合起来反抗你们的仇敌！自然我们呢！也愿意实行我们一部分的责任，实行我们同样反抗仇敌的责任！不过在我们实行我们一部分责任的时候，就是我初来广东的时候，一看见这里广州的情形，竟不堪设想，若是把他一切描写出来，或过于世界万恶集藪的地

* 标题为原书编者所加。

方，那是很不好的了！我们不能够把详细的情形说出来，不过简单的说一句话：就是国民与主义之间有很大的隔膜！差不多国民是国民，主义是主义，国民与主义二者，没有关系似的，而且假革命的人，其行为与主义不相融合，差不多主义是孙博士的好主义，而行为确不是孙博士的好行为，凡是看见过这种情形的人，在良心上是不是觉得行为与主义是可算相合的吗？老实说：是不可能的！是不会的！但是当时也有同志跟着孙博士去做，我呢也要做我的工作，可是不能够！因为在这不可能的空气里，环境太恶劣了！其时孙逸仙看见了这种情形，已经忧愁得很，因为主义与行为以二者是相离太远的了，这二方面相离太远的缘故，实能使他容易年老，至少也使他少活了几年！

我当时既经看见这种情形，那末我到底怎样办呢，主义是好的，但是行为是不对的，主义与人民完全没有关系！那末在这种事实的现状下怎么办呢，我走吗，我还是留下在工作，不是留下事实上不能做工作，要是去，我违背我的义务和责任，那末到底我怎么办呢，同志们我不是普通的一个新闻记者，走进总理的办事处里谈话时，满口恭维和赞成，走出了室外，就背后说他是一个理想家这一般人的样子，但是我们做的工作是同志替国家做工作，是不是对民众做工作的！对国家和对民众，是为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而做，决不是为一己而做，那末我就应该脱了我的衣服，丢了我一切而去工作。走好呢工作好呢，当然的是工作！

孙逸仙博士委任我做政治顾问，我于是非常欣喜，我很愿意和他合作，我二年的工作，都是他的主义和教训做材料，我只有这二种材料的工作，除了常常把主义和行为这二方面，想拉在一起外，没有其他的工作。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常常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我们就去请教总理的引导，我们依了他的引导去做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就不会十分错误的，然而他现在死了，我们失了一个指导师：犹如一个小孩子失了一个教育的母亲一样，在

他活的时候，差不多他们生命完全在革命上面，不但他发明革命的新途径，而且他能有权力来摧残这些阻碍革命的东西，他实在是个有权威的人，是一个利害的领袖如今他竟逝世了，他逝世后，我们遇到了种种的困难没有，我们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解决，这才是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位同志们所要讨论和决定的，实在我们也只有两条路，我们屈服了，这是猛进，是的，我们要一直前去，把一切的力量拿出来，我们不管他的障碍，我们应当去战胜 Oyercome 那些障碍才是！

同志们我们所有的问题只是内部的问题，现在我们都明瞭了解的了，我们只知团结起来是对的，我知道大家都承认是对的！我们如果都认为对的，那就好了，纵或有些小问题，我们也可以讨论，不过在帝国主义者知道我们内部有了冲突的时候，他使用种种话来骗我们，然而我们反抗帝国主义者是一致的，是共同努力的（鼓掌），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件事我们也不该有二种意见，使这个重要的工作在未成功前就先自己分裂而得不到实际的利益，我们决不可使他们因为我们自己内部有了冲突而高兴，如果我们分裂的现象，就是我们给帝国主义者的生命在中国多延长几年的寿期（鼓掌），现在大家应当明瞭，我们应该赶快使自己的国家能独立自由，明白了这一层，我们就应当去努力前进，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是继承总理的三民主义中的一部分，就是第一个民族主义，我们决不要看差了总理的工作，是民生主义，我们现在没有到民生主义的时期，固然，三民主义是整个的，不能分开的，但是三民主义，同时也有系统的，步骤的，我们不要误会，因为民族自由了，国家独立了，民权民生才能实现，所以凡是我们的革命分子，就不应该有二种政见，不但不应该，且亦不可有！我们决不要为了将来的信仰不同，而在第一步同一工作的时候就争斗，其实即使党中有聪敏的人，也说不出将来不同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就是我们总理也不料将来有不同的纠纷，他决定这种主

义和策略的时候，也不料有什么不同地方，我们当合在一起，为民众而牺牲，决不能现在下定第三时期的同异，若是我们不能把意见统一，那帝国主义者就不怕我们了！

所以我们从今后让我们大家决定一致的，联合起来革命，不妥洽，不畏惧，向帝国主义者冲锋，不要使他们可以干涉我们的成功（鼓掌），我希望在这一次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里在关于这一点上全体一致的决心，求民族解放与独立，奋斗，国民革命的成功当指日可待，就此祝国民党的成功万岁！

（选自《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欢宴第二次 代表大会代表席上之演说词*

（1926年1月19日）

鲍罗廷

同志们！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是已经闭会了，你们在这20天的大会中所经过的一切工作，在世界的革命史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纪念。你们此后所有的奋斗，在革命的战场上无论如何颠覆，其精神是永远不死的，犹如你们和我们的领袖不死一样。你们在这工作的历程中，犹如在一片沙漠之上，设计建筑一个坚固的基础，使中国和全世界的民族能得到有力的援助，今天的这一些不过是你们停工下来的一些甜味罢了。但是我们不单以为已成就了基础，还要想如何把这个基础高筑起来。我记得有一个寓言上说：“古时罗马城里有一雀，这雀能知这大城之危险与否？”

* 标题为编者所加。

因为他知道有危险时，就叫起来，所以大家视这雀为预言家，为了他有预兆，这不但是一句寓言，而且屡次的应验了，因此这个雀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后来这只雀的主人带他到市上去，卖给一间饭馆里去，闭在笼内等杀，但那时候这只雀不能忍耐了，于是向这佣人说：“你为什么这样的粗待我呢！我的祖上已救过了几次罗马城的危险了。”这个佣人回答他说：“你祖上确是救过罗马城的，但是你现在要享幸福了，所以请你到市馆里来闻市肆之香。”所以，我以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要想在世界努力一些革命，并在革命史上留一个很好的纪念，而也在继续往古的革命事业，绝不是来馆子里享幸福的（大鼓掌）。所以我们要知道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但有绝大的希望，而且是把一切的力量来战胜前途的困苦和种种障碍。虽然，有人说国民党是改变了面目，但我们知道决不向帝国主义方面走去，而且还要破坏帝国主义。当我们总理病的时候，敌人就有许多谣言说总理死了之后，国民党也就死了的，然而我们的精神和力量更团结起来向前努力，不但证明他们的猜度是差误而还证明他们的野心，现在事实上已确切由党军的胜利上知道革命的努力已扩张而将至于完成。不过党军之所以胜利全由于各种革命努力和空气所助，因之，党的胜利与否不单是一部分军队所能，而确在党的本身，所谓党军只是为党而努力的，一种强有力的表证。但我们在新闻纸上不论任何方面都可以看见帝国主义者之毁谤，而同时帝国主义者也在那里害怕，因为现在能救中国的只有国民党，扑灭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也只有国民党的革命军队才能够。我们何以知道国民党是唯一救中国的党呢？因为他们能够引导民众，且为民众利益而奋斗，所以他不但受民众的拥护，且受世界革命党人的同情，因有一个革命的党，而尤其是受他领袖中山先生主义的熏陶，则这个党的成功一定不远的，所以我们希望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之后一年内的工作能够猛进到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要在北京开的，

至少也须在南京或武昌开会，但是我们决不肯在帝国主义保护或压迫之下开会。因为我们只要努力实行总理的主义，和依照遗嘱的方针做去，则不但三次大会在南京开了会，而同时国民政府也迁到南京的，代表大会终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举行，因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不能分离的，所以我们所谓在南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不单是歌颂胜利，实在是要把他总理的方法和 spirit 扩大起来，实行我们的决议案，——实行建设中国的决议案。同志们！今天的会议实在是革命上一个很好的纪念团。留在这种军阀与帝国主义本身各自破裂的时候，我们能够满足一切的欲望，国内军阀为了本身利益的不闻而起了争权的血战，国外的帝国主义者也因有努力不匀而自己分裂起来，但谁使他们分裂的，是国民党的革命努力来使他们分裂的（大鼓掌），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分裂，而为他们造成一个恢复努力的机会，要知道自己分裂，不但是妨害了国民党的前途，实在是中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能一致团结，那一定能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唯一要努力奋斗，一方面使革命成功，一方而使总理在泉下安慰。同志们：俄国革命的成功，我们拿经验来看起来是全由于党的，——领袖之下——精神和纪律，因为俄国的革命党不是没有叛徒，但这些的叛徒陆续应去的去了，革命党掌握政权的事实于是乃不致失其所以。你们应如何奋斗，如何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要如此，就非执行革命的纪律不可，而尤其是革命的军队。因为一个革命的党，非有严密的纪律和有纪律的军队不可，——但是要有纪律的军队，就非有党的指挥和训练不可！革命党的军队之基础，在民众之上的，革命党的军队，是要做一切军队的模样的，那末革命的党才能得民众的相信与拥护，国民党是为人民所需要而奋斗的，人民所需的是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就要去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所以国民党是最高的机关，国民革命是他唯一的目的，所以希望今后的国民党能以纪律来支配工作，并引导其成功，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一定能够出些力量来统治了中国，愿同志藉杯酒以祝诸同志之健康！

（录自《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鲍顾问与白崇禧之谈话

（1926年2月3日）

原记者按：广西代表白总指挥崇禧，夏司令威，刘斐（白参谋长）等于2月3日上午11时往访鲍罗廷顾问，鲍氏与谈俄国革命之经验等事甚详，且甚精要，记者得鲍氏之允许，特录之以飨读者。鲍氏对于俄国革命之经验答复如下：

白问：“俄国革命之经验如何？”

鲍答：“俄国革命历史100年之久，其中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失败，直到1917年革命才算成功。以前屡次失败的原因第一就在没有忠实与好的领袖，没有能为民众利益奋斗的领袖。因为我们有好的领袖，我们这些少数的领袖终身从事于为人民利益的奋斗，他们把俄国人民的利益，甚至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放在他们自己与家族的利益之上。因为我们这少数领袖能这样对人民的努力，他们已成为万众所爱戴的领袖，他们已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权力。列宁的死，俄国民众都为之流泪，世界的民众亦莫不闻之悲哀。托洛茨基，他曾领导红军战胜俄国国内外一切反革命与帝国主义的军队，他每次演说的时候，非特演说场是挤满的，就是演说附近的街上亦是挤满的，都以能看托洛茨基的一面为快。但是单有了好的领袖是不够的，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失败亦都因为领袖四周围的人没有好的。当两年半前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以前，孙中山先生虽然是这样伟大，因为手下的人坏的多

好的少及对于他的命令阳奉阴违的多，亦是没有办法，只能使他灰心。在我们革命史上没有好的、有纪律的信仰主义与领袖的党是过去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这几个领袖决意要把他四周围的人训练好，就是决意造成一个有纪律的有信仰的与忠心的党。造党不是一天一日所可做得到的，造党不是一种机械式的程序，不是像机器一样可以拿多少钢铁与煤等就可以造得成党的。一个是党的造成要经过多少训练与奋斗，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党员要好宁可少；党员多而坏那就不如无党。我们的党曾经有一次肃清党内五分之一的党员，那时我们有50万党员开除了10万人。现在我们有70万党员以上，都是最服从纪律的，有信仰的遵守领袖的命令的党员，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党完全是可靠的，我们靠这党帮助与指导我们国内一切行政上，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事情。

有了好的领袖与有纪律的党，如果在他们脚下没有基础，那末他们不免是悬在半空临风飘荡。所以我们的领袖与党，把他们建筑在劳苦的工农身上。因为俄国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在一万万五千万人口中最大多数是农民；其次就是工人阶级。我们的火车头是放在工农这两根钢轨上面的。不过我们不要误会这挂车上只搭工人农民而不搭别种客的。决不是这样的。学生、商人、实业家、教员、工程师等车上都有，不论这位客人能乘一站或数站或到尽头。不过列宁相信工人阶级是能够领导革命到最后的成功的，并相信工人阶级没有农民的帮助是不能成就他的使命的。我们的工人在革命运动中确实总是站在前线的。

我们的领袖与党每决定一政策或决议时，必先考查这政策与议决对于人民大多数的影响如何，好呢？还是坏呢？如果对于人民大多数是好的，就决定这政策，否则决不提出。不过这一种政策的测量并不是很简单的：有时在目前这政策之行施虽然要使人民受一点苦，但是人民暂时受一点苦后其结果人民得到真正的或

更大的幸福。当我们革命受到四面包围奋斗最苦的时候，我们的兵士在前方打仗，我们后方不得不没收农民的粮食运到前方去接济军队，虽然当时农民不免受很大的苦痛，但是这是应当的，因为前方的兵士是为人民的利益，预备牺牲生命！后方的农民应当受苦帮助前方的兵士。前方的胜利才能使农民不再重新受地主的压迫而有今日的幸福。这一种暂时要使人民受苦以换得最近将来的真正幸福之政策不是人民骤然所能了解的，所以在人民中间把这种政策来宣传来解释是最重要的。所谓‘为人民’并不是专为当地的人民，为那一省的人民，应该是为全国的，甚至于全世界的人民。因为一省的问题是不能单独解决的，一定要全国的问题解决然后能解决的。譬如假使在我们的乌拉山、高加索、乌克兰地方仍然是被反革命军阀所占据的时候，试问我们革命是不是在永远的危险中？试问是不是允许我们在莫斯科能有所建设？所以我们的领袖的眼光一定注射到全国问题的解决。当然我们知道人民对于我们的估量，是以我们在当时取得的成绩，决不可以只看见远而不看见近的，所以我们是一定要注意当时人民利益的增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一省人民利益的改善不是单独可以解决的，是要与全国的、甚至与全世界的问题连带解决的。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领袖、纪律的党，建筑在工农两根钢轨上，根据专为全国及全世界人民利益的政策，我们才能将八路军对垒的敌人——英、日、美、法与反革命的白党——打败，俄国的革命才能成功。尚有一点要说的，就是俄国革命的方法。俄国及各国过去革命运动的失败都是失败在‘对敌人仁爱’与‘对朋友残忍’的错误方法上面。俄国革命领袖用果断的政策无怜惜地打倒敌人。列宁是我所知道的人们中最仁爱无比的一个人，但他知道要把1亿5千万的民众联合起来要与重重的敌人开战，决非玫瑰香露的政策所可做得到的，一定要有坚定强硬的政策才行。有了建筑在人民利益上的政纲，尚须有摧毁一切阻碍这政纲实现的障

碍之无顾惜的政策。”

白问：“苏俄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政策如何？”

鲍答：“俄国革命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表示愿意同我们携手，他们对我们政府讲：你们可以放弃你们世界革命的梦想，而来加入我们的团体，一方面为解放自己而奋斗的被压迫民族他们天然是我们俄国的同盟者。我们的政府完全拒绝了帝国主义者的要求，仍旧继续世界革命政策与东方被压迫民族携手。东方被压迫民族为自己的解放是反对帝国主义，我们俄国为巩固其革命起见，亦是反对帝国主义。东方被压迫民族与俄国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我们苏俄帮助东方被压迫民族，就是帮助我们自己的革命。”

白问：“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有何异同？”

鲍答：“这个问题很难答复，这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微细的研究。但是据我所知道的，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就是有一点差别，这是因为中俄两国的〔国〕情有所不同，不过两国情所差别的很少，因此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中间的差别亦是很少。列宁相信无产阶级能领导革命到底，达到人类的完全解放，这是因为列宁在俄国看得见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与其在革命中的地位。但是孙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没有能看见无产阶级的力量与能力，不过在他逝世前几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已逐渐表示其力量与革命性，因此中山先生的思想亦渐次与列宁的思想相接近。1922年中山先生与列宁先生的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议对于中国问题有共同的谅解，这就表示中山先生与列宁先生思想渐次接近的趋向，如果天假中山先生以年岁，他与列宁的思想根本哲理上可以得一谅解。”

（录自《人民周刊》第1期、第3期
1926年2月7日、24日）

二、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和国民军*

一个志愿兵的札记^①（摘录）

（1925年4月—7月）

里根·阿连^②

1925年4月26日

今天，当地警察局长来旅馆访问我们。他收到我们将去拜访他的名片，认为自己必须亲自来一趟，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到张家口来。通过随同警察局长一起来的翻译，我们说明我们是天津报社的记者，特来会见冯玉祥元帅。这个消息使警察局长大为震惊，他立即表现出十分恭敬的态度，亲自去给元帅的副官挂电话，通知我们的到来。过了一小时，副官唐悦良^③少将来到旅馆，立即向我们提出几个问题，以便弄清我们来的目的。唐悦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谈话的过程中，知道了这个身穿黑便服、瘦小枯

* 本专题含有1925年的部分资料，这是由于本丛书第二卷篇幅所限和为了使专题内容相对集中之故。

① 本资料的注释均为米罗维茨科所加。

② 普里马科夫的笔名。

③ 国民军外交处长。——译者

干、机警善变的人，出身于一个有钱的贵族家庭，毕业于纽约的一所专科学校，在美国住过5年。我们决定向他说出前来的目的，告诉他我们是军官，愿意为国民军服务。他细心听完我们的话以后说，他将把我们的愿望报告给元帅。他记下我们的姓名和军中工作的经历，并且问明我们当天时间上的安排。然后，匆忙地告辞了。

3小时后，唐悦良回到旅馆，邀我们一同去督办公署，元帅的司令部设在那里。冯玉祥的司令部在城外高山脚下。司令部所在地的四周围着3公尺高的滑秸泥墙，围墙中共有15到20座中西混合式瓦房，房屋都装有防蚊的细纱窗。在这个小城区的中心部位，有3座房子是元帅的住宅和司令部。他的卫队住在其余的房子里。

我们的小汽车停在小城区的门前。8名中国士兵守卫在门旁，他们身穿灰色制服，挎着手枪（毛瑟枪），背着两把大刀。警卫的士兵们向伴随我们的将军行了礼，随后，我们就进了大院，沿着栽满花草的甬道来到元帅的住宅。两位佩带短剑的侍卫军官，在台阶上迎接我们。他们向唐将军行了礼，引导我们进了会客室。唐将军去向元帅报告，几分钟后返回，坐在桌边和我们闲谈着。一个身穿白色小褂的士兵端上茶来。我们津津有味地喝着这黄绿色的、略带苦味的芬芳饮料，尤其在仆仆风尘之后，更觉得清新可口。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环顾了这间用白纸裱糊的、没有什么摆设的大屋子，屋内只有一张铺着白纸的长条桌子，桌上摆着笔墨纸砚。桌旁放着几条带有马掌形扶手的红漆方凳。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位军官，他对唐将军低声说了句什么，就以立正姿势站到元帅办公室门旁，用左手掀起麦秸编成的浅绿色门帘。这就是说，元帅要到我们这儿来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欣赏这位军官优美的队列姿势——稍微躬着身子开门的姿态，一位身材高大、体魄强壮、脸上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剪得短短的人走进

来了。他仔细地看了看我们，面带着微笑，用中国话低声说了些什么。

于是，恭恭敬敬站在那里的唐将军，也同样低声对我们说：“元帅欢迎你们。”

我们点了点头。冯玉祥走过来，坐在文具桌旁边的矮凳上。他做了邀请的手势，我们也在桌旁坐下了。冯玉祥仍旧低声地（我们想起中国的一句谚语——“锋芒不外露”）通过唐将军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我们是些什么人，有什么要求等等。

我回答说，我们原是军官，希望在国民军里工作。我们两人是机枪、火炮和装甲车方面的专家。由于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有深切的同情，我们才产生了这个愿望。

我这样回答以后，屋里沉寂了一会儿。冯玉祥仔细地打量着我们，露出一丝笑容，但他的眼神依旧保持着难以捉摸的严肃。然后，他对唐将军说：

“你们的建议，使我有点惊奇。我这里有几位日本军官、一位意大利军官和几位俄国军官在供职，但迄今没有一个英国人自荐愿为国民军效劳。我觉得，英国人民缺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尊重的感情。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埃凡斯回答说：

“元帅，主要的我们是革命者。在所有国家里，革命组织都在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斗争。我们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我们抱定这个目的愿为您效劳。”^①

倾听埃凡斯讲话的唐将军，把他的回答翻译给元帅。

又沉默了一会儿，元帅说：

“我们的天津朋友把你们的到来预先通知了我。虽然我不是社

^① 实际上，普里马科夫、库齐米切夫等人，都是以苏联军事专家身份介绍给冯玉祥的。

会主义者，但我是中国人民的普通公仆，我认为我是孙中山的朴实的追随者，^①我看出你们诚挚的心意，接受你们的建议。你们将担任国民军的军官。具体的工作，以后再说。”

元帅说完以后，就向我们告辞了。

唐将军陪我们一起出来。我们回到旅馆，拿了行李，唐将军就把我们带往拨给我们的住所。这是三大间房子，墙壁也是白纸裱糊的，窗户上糊着白纸，以代替玻璃。室内的隔断墙，是用木框糊上纸做成的。两边的房间里摆着床、小书桌、洗脸盆和凳子。中间的房间里放着一张铺着纸的大圆桌，四周摆几个凳子。每间房屋的墙角，都摆着一个高筒镀铬的痰盂。

唐将军向我们道别之后，我和埃凡斯交换了一下对元帅的印象。我们觉得，他显然是个杰出的人物。可见，国民军的命运是掌握在可信赖的人手里。但他不是社会主义者。而他将把国民军引到何处去？对这个难题，我们还做不出回答。

……

1925年5月1日

今天是我们的节日。全世界工人都在显示自己的团结力量。这里却是一片沉寂，西风卷着尘土从不远的荒原上吹来。风沙漫天飞扬，覆满街道，无孔不入。城市的居民都戴上风镜，眼前的世界是一片黄色，汽车的灯光也和尘土一样昏黄。我们给元帅送上一封贺节信，上面写着：“致我们尊敬的反帝斗争中的中国人民领袖。”我们收到回复的贺信和宴会请帖。晚8点，唐将军来接我们，我们一起来到督办公署。

冯玉祥和他的夫人（她戴着一副眼镜，个子不高，一张传教士的和蔼、亲切的面孔，她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站在他们的府邸门前，以传统的、彬彬有礼的寒暄迎接客人。副官立刻引导

^①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莫斯科返回之后，正式参加了反帝的民族阵线。

客人们入席。煤汽灯照得通明的大厅里，摆着几张漆亮的大圆桌，每桌坐十几个人。桌上依次整齐地摆着中国的餐具：每人面前有一对小碟、一个小碗和一双筷子。比我们早来的客人都已入席，低声谈着话。除了很多国民军军官和将军外，这里还有一个蒙古代表团和几个外国人——军事顾问。副官把我们介绍给客人们和几个外国军事顾问：两名俄国人、一名德国人和一名日本人。日本人（国民军里有名的松村^①少校）和德国人（前工程兵军官特莱涅先生），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是自愿在国民军中供职的。前红军军官、俄国顾问哈宁^②和多连^③，是为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而要求到国民军中服务的共产党员。让我们和他们坐在同桌，所以我们很快就熟识了。哈宁的面部清秀，带着一点幽默的表情，举止泰然大方，语言诙谐。多连有点腼腆，态度生硬、耿直。他们两人都穿着军便服，胸前挂着国民军司令部军官的证章。哈宁是中将军衔，多连是少将军衔。在随意的闲谈中，哈宁和多连告诉我们，他们已在国民军中工作几个月了，目前正忙于建造装甲列车和在一般战术学校里培训国民军军官。建立机枪学校已列入他们的计划。他们知道我们熟悉机枪和装甲坦克业务之后，乃邀请我们参加制造装甲列车和给国民军军官、军士建立机枪学校的工作。我们马上就同意了，并请他们尽快和元帅商谈一下，因为我们已经闲得不耐烦了。^④

我们在谈话时，军官们逐渐向我们的桌子围过来。主持建造

① 松村——日本总参谋部军官、情报员，苏联顾问到来之前他是冯玉祥的最亲密的顾问。

② 哈宁——德列伊采尔，于1925年4月至1926年4月期间任国民军顾问。他作过步兵总监，后来兼任教官团副主任。

③ 多连——佩特克维奇

④ 1925年10月1日，顾问们协助完成了装备和建造装甲列车的工作（安装了三门炮、八挺机枪）。（苏联国防部档案）

装甲列车的张上校，是和我们坐在一起的。这位中等身材、愉快而又亲切的上了岁数的人，有爱夸口的毛病。他兴奋地向我们描述了他在与张作霖作战中立下卓著战功的情形。他捻着胡子，满意地听着我们很有礼貌的恭维话。他是一个小商人的儿子，经历过不少次战争，冯玉祥很器重他。

晚上9点钟，元帅和他的夫人在屋子中间的圆桌旁就坐。除冯玉祥夫人外，没有其他妇女参加，因为中国妇女通常不参加招待宴会。身着白上衣的士兵们迅速地上头道菜肴：松花蛋、红烧海参、青菜炒肉，等等。高脚杯里斟满柠檬汽水（国民军里严禁饮酒）。宴会开始时，冯玉祥向客人们致以简短的祝词，并说了几句招待不周的客气话。客人们愉快地开始了晚宴。各桌的人们互相交谈着，开玩笑，说客气话，每上一道菜都互相热情地敬让。军官们的举止都很随便，但是很有分寸。

第一道菜之后，接着上了第二道菜——用各式各样调料油炸出来的美味肉食。然后，上了鱼翅、蘑菇、竹笋、拔丝山药，总共上了40多道菜。坐在我旁边的哈宁低声说，这的确是便宴，在大的宴会上要上100多道菜。

宴会快结束时，冯玉祥起立举杯为“五一”节致词。他谈到摆脱帝国主义的斗争问题，并向今天在世界各城市显示自己力量的工人阶级致敬。一位蒙古代表团团员致答词。他恰如其分地低声说着，常常引用一些古文和谚语。他的讲话的内容是：获得自由的蒙古向革命的中国致敬；由于蒙古处于觉醒的中国和苏维埃国家之间的位置而感到自豪；苏维埃国家的榜样是值得仿效的。他讲到这一点时，冯玉祥举起高脚杯，用手势向哈宁和多连——世界最自由国家的公民致敬。我看着他们，并且愉快地感染上他们脸上所显露出的自豪感，建立起社会主义祖国的无产阶级自豪感。

又有人发言，举了几次杯，宴会就结束了。冯玉祥让客人留下看一场电影。电影放映员进来了，迅速地安装好放映机。但是，

电影胶片不好，常常跳动和断片，电影没有看成。放映员看到元帅生气的眼神和手势，双手颤抖着拿走了放映机。也许，这个可怜的人要受处分。在一场不顺利的电影之后，我们告辞了。

1925年5月3日

今天，哈宁来找我们，邀请我们到建造装甲列车的车库去。装甲列车的制造和装备，是在车库的一个单独部门里进行，那里有国民军士兵守卫着。一些俄国人^①在那里为国民军制造和装备第一辆装甲列车。被任命将来担任装甲列车指挥官的张上校也在场。100来名中国五金工人，在俄国专家的领导下进行着工作。我对中国工人的工作观察了一小时，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在技术操作上，还是在聪明才智上，除了熟练程度之外，在哪一方面，中国工人都不逊于欧洲工人。张上校领我们来到车库的一角，那里的桌子上放着未来的装甲列车的图纸。预定在装甲列车旋转炮塔里安装两门75毫米炮和8挺机枪，一部分机枪要求安装在炮塔和半炮塔的顶部和侧帮上。按初步设计，列车将有两节装甲车厢。熟悉了图纸以后，我们认为图纸很完善，按照这个图纸制造出来的装甲列车，车厢会相当坚固，火力也相当猛烈。我向张上校祝贺了这一良好的开端，^②张上校邀请我们参加制造和装备装甲列车的工作。和俄国同志们商量以后，我和埃凡斯就决定立即着手工作，负责检查机枪的安装。多连这位学识渊博的炮兵专家，从事炮的安装工作。哈宁全面领导装甲列车的制造和装备工作。我们穿上蓝围裙以后，就着手工作了。进行铆接炮塔的工人们向我们伸出手来，帮助我们钻进钢壳里。埃凡斯在第一号车厢里工作，我

① 卡里诺夫斯基是装甲列车总顾问。他在红军中是这方面的著名专家，是《坦克》一书的作者。他向冯玉祥提出的关于装甲列车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的报告，使国民军指挥人员产生了强烈的印象，成为在中国北方建造装甲列车的基础。

② 在此以前，国民军里没有装甲列车。

在第二号车厢里工作。我钻进炮塔，把炮安装在炮架上以后，检查了半炮塔的效能和射角。结果，完全合乎要求。只剩下安装和固定机枪了。以后的时间就做这项工作。由于专心致志地工作，吃饭的时间都错过了。到晚上，我们竟完成了8挺机枪的安装工作。张上校和哈宁同志到我们这里来了好几次，看到我们专心地工作，他们赞许地微笑着，也钻进正在安装的炮塔里。傍晚时分，张上校带了一瓶白兰地酒和夹肉面包来到我们跟前。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大口吞下面包，就又着手干活了。直到工人们收拾工具时，我们才结束工作。

工作结束以后，我们查看了全部装置，检查了杠杆系统和滑轮的灵活性。一切都好。只剩下给装甲列车涂伪装色和进行试验性射击了。涂伪装色要占去好几天时间，然后，再开往射击场。

我们和俄国人的友谊更为加深了，我们和他们编成一个工作组。哈宁官衔最高，仍继续领导全盘工作。我们检查完装置以后，来到他的住所，他把工作计划讲给我们听了。当时决定，我们再亲自参加制造另一辆装甲列车的工作，以便在工作中训练国民军的军官。除了制造装甲列车的工作外，我和埃凡斯还要在新建的机枪学校里教授机枪业务。多连组织炮兵学校，而哈宁则组织国民军高级军官学校。唐将军答应给我们找翻译，翻译将时刻伴随我们，把我们的指示转告给中国军官。德国人（按职业来说，他是工程师）应当参加拟订装甲列车的建造计划，并应在机枪学校教授城防学。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准备离开军队，他们不是专家，也不打算参加我们的备战工作。他们未被列入我们的工作计划。

我们在哈宁同志的住宅里喝了一杯茶、吸了一支烟后，就回家了。唐、冯¹（卫队旅旅长）二位将军正在这里等候我们。冯将军转达了元帅向我们的问候，并转交了一个小木匣，里面装有给

¹ 冯治安。 译者

我和埃凡斯的证书——确认我们是国民军的军官，并授予我们少校军衔。小匣内还放着黄布做的三角形小徽章，作为我们军便服领口的领章，以便士兵们能识别我们的职位。小匣的底部放着我们一个月的薪水，约 200 美元。^①

唐将军告诉我们，元帅感谢我们在车库里的工作，并聘请我们在国民军军官、军士机枪学校里教授机枪业务。我们请他向元帅转达我们的谢意，并且欣然同意了在机枪学校里工作，因为这已列入我们的朋友和首长哈宁同志的计划。

1925 年 5 月 10 日

我们在建造装甲列车上忙了好几天，今天早晨没有什么事儿，看看报。华南举行了罢工。全国展开了抵制英货和日货的宣传。《京津泰晤士报》对此发表了不满的评论。

定于今天进行装甲列车的试验性射击，因此，我们来到哈宁同志那里。在哈宁处，我们碰上了多连和李大钊教授^②（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组织者之一），他身材高大，面孔恬静，有一双聚精会神的眼睛，戴着一副角制大镜框的眼镜。

李大钊忙于在军队里建立政治俱乐部。他使冯玉祥同意通过政治俱乐部在军队里宣传国民党纲领。为了与冯玉祥进行谈判，李大钊从上海来到北京，而当时，北京警察局局长已对他下了通缉令。他秘密地进入冯玉祥部队的辖区，在营房里躲藏了几天，然后在夜里离开北京，前往张家口。在这里，他与元帅会晤，对于组织俱乐部一事，得到了元帅的同意。

① 苏联顾问在中国的全部费用，均由苏联政府支付。

② 李大钊（1888—1927）——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第一个在中国论述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他热烈地宣传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和联盟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北方局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1927年4月，李大钊被张作霖的警察抓住，处以绞刑（李大钊生年应为1889。——译者）。

他知道我和埃凡斯在国民军里供职以后，给了我们一份关于中国局势的情报。总之，他告诉了我们下述情况：日、英两国实际上已在中国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势力范围没有确切的界线，但基本上，日本控制着中国的北部，而英国控制着长江流域。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它们的利益的保卫者，而张、吴的军队可以被认为是这两个大国的辅助军队。

张作霖占据着满洲、直隶和山东。他的军队约有 25 万人。军队主要是用日本武器装备的，日本教官主持着军队的训练。许多军官在日本学校里受过训练或正在受训。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毕业于日本军校，是日本在华影响的推行者。大量俄国白卫军在军队里，主要在空军里供职。他们编成 3000 人的独立支队，受白军将领涅恰耶夫指挥。

按政治信念来说，张作霖接近于亲日的“安福系”，中国执政段祺瑞就是安福系的成员。该系极端反动，许多成员显然是保皇派。该系与居住在天津日租界的帝位继承人保持着联系。张作霖是中国反动势力的化身。

吴佩孚占据着汉口地区。他拥有 5 万人的一支不大的军队，但他被认为是中国优秀的将领、军务革新家。他的部队是由英商提供的德国步枪装备的，还有一部分是汉阳兵工厂造的步枪装备的。他的军队的经费，由比安福系开明一些的直系拨给。当时，安福系反映着满洲封建主和直隶买办的利益。直系则代表着大工业家和批发商的利益。

广州革命军集中于华南，目前在人数上还是一支不大的军队，但在武器数量和战斗情绪上，是中国最好的军队。它能保卫住华南的共和政体，并在不久的将来要展开反对反动势力的坚决斗争，举行北伐，向长江地区推进。

被反动派毒害的胡景翼将军的继任人，孙中山的朋友岳维峻将军，他的军队驻扎在河南省黄河一线，共约 15 万人，装备和训

练都很差，但士兵的战斗精神很好。军队的纪律差，有掠夺行为，不大服从军官。军官当中有很多拥护吴佩孚的人。整个说来，这支军队并不是团结一致的。

孙岳将军所指挥的国民军第三军，驻扎在陕西省。这支不大的军队（约2万人）训练很差，孙岳本人就是一个二流子和大烟鬼。冯玉祥的嫡系部队，驻扎在察哈尔和绥远两省，共约5万人，训练有素，遵守纪律，盲目地相信自己的元帅。遗憾的是，虽然军队的领袖冯玉祥表明自己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但是没有实际作为，也没有参加国民党。^①不知道能不能把他吸引到运动中来，或许他会走上一般军阀的道路，从而辜负人民的信任。

张作霖害怕国民军日益增长的影响，看来，要在国民军壮大之前就进攻它。因此，国民军，特别是冯玉祥，必须积极准备斗争。

这份权威人士提供的情报，更加明确了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件所作的估计，因而我们决定不仅要进行军事工作，而且要在军队里进行革命的宣传。我们对李大钊教授提供情报表示谢意之后，就和哈宁同志一起到装甲列车那里去了。

我们在装甲列车旁遇到张之江将军（察哈尔都统）和他的随员。有人向他介绍了我们，他就请我们到挂在装甲列车后面的车厢里。

张之江将军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典型军人。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智力平凡，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是相当坚毅果断。尖瘦下巴上的胡须和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更增添了他毅然的神态。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也有人说，他的个人生活违反国民

^①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莫斯科（他是1926年初去莫斯科的）返回中国北方的旅途中，正式宣布加入国民党（冯玉祥在赴莫斯科的旅途中，由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译者）。

军的传统——生活奢侈，有两个漂亮的老婆和三个美妾，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是个热心的基督徒。

元帅的参谋长刘骥将军，坐在他的旁边。刘骥身材矮小，朝气蓬勃，机警善变，有点儿感情外露，他是个聪明而又精干的人，给人带来很好的印象。人们认为他是中国最有才能的将军之一，他出身于有钱人家，但个人生活很俭朴。在收拾得很整洁的车厢里，除了他们两人之外，还有几名随从军官倚着车厢静静地坐着。士兵们端上必备的茶水。刘骥将军迅速喝完他那一杯茶，转过身来问我们：

“装甲列车好不好？”

我懂得这个问话，回答说：

“好。”为了正确表达，我翘起了大姆指。

他用中国话讲得很快，翻译当即翻译了他的话。

“我听说世界大战时使用过装甲列车。这是中国工人按照你们这些老大哥的指示亲手制造出来的我国第一辆装甲列车。我很高兴即将看到它的效能，因为这使我联想到我们军队必将使用这辆装甲列车。也许，你们还要谈谈你们的意见，介绍一下你们的经验？”

哈宁同志简单地向他介绍了装甲列车的效能，以及它的作战特点。刘骥将军细心听完之后，思索了片刻，紧接着说道：

“好，很好。”

随后，刘骥将军把话题转到欧洲军队的战术上，我们只好向他详细地叙述了法国装甲列车的冲击和德国包围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并为此画出草图来说明这些原则。无论是刘骥，还是张之江，都细心地听取了我们的见解，并插入了他们的意见——刘骥显得很热情，而张之江则有点迟钝；这不知不觉使我们对这两位将军产生了对比。显然，张之江不属于发明火药的那些人之列。

就在这个时候，装甲列车开到了射击地点，停在一个高岗的

脚下。透过树枝看得见那边悬崖脚下 2 公里处布置好了靶子，而机枪的射击靶子摆得近一些。我们进入装甲列车的车厢。多连指挥炮兵，我指挥机枪。我们发出口令：“各就各位！”当炮手旋转炮塔的时候，我们已准备好射击，于是，我发出口令：“左侧射击！”8 挺机枪同时开了火。从我的观测塔里看到一块块靶板消失了，腾起子弹射击飞溅起来的沙土。然后，开炮了，悬崖脚下升起一团团黑烟。几炮之后，我们下令“停止射击”。观测兵向靶子跑去。和他们一齐跑去的，还有将军们及其随员。我们巡视了一下装甲列车，检查了各种装置。一切都正常，我们的设计是正确的。

中国军官从靶子那里慢慢走回来，老远就向我们呼喊：“好，很好！”同时兴奋地翘起大拇指。张上校（装甲列车指挥官）喜气洋洋。这是他的喜庆事儿。他和其他中国军官一样，没有跳起来，也没有吵嚷；他挺起胸部，皱着双眉走到刘、张二位将军跟前，他们立即向他表示祝贺。刘骥将军进入装甲车厢，装甲列车很快就开回去了。他细心观看了全部装置，检查了斜槽的可见度，钻进了指挥室。在他了解了每个螺丝钉的作用，观看了每个炮塔的旋转情况，查看了每挺机枪的射角之后，他感到很满意。我们返回张家口，张之江将军请我们去喝茶。喝茶时，我们听到许多恭维话，并接到在学校里开始工作的通知。

1925 年 5 月 25 日

我们在学校工作已经两个星期。我们的机枪学校有 200 名学员，组成两个班——军官班和军上班。学校设在山脚下架起的美式帐篷内。帐篷后边是打靶场。我们的学员早晨 5 点起床，做操，练习长跑（约 3 俄里）；6 点吃早点，然后开始上课，直到 12 点。12 点学员吃午饭——菜汤和某种青菜。然后又上课到晚 6 点。6 点吃晚饭，饭后是休息和体育活动时间。

我和闻^①在早晨6点前来到学校。6点开始上第一课。学员分成班，分别学习装卸机枪。学习初期，进展得很费力，军官们对机枪既重视，又有点害怕：他们大概把机枪看作是一种具有凶恶意志的神物了。机件发生故障时，他们就给机件加油，好像这是对蒙难者的一种慰藉。但现在一切都就绪了，我们开始讲授射击理论。各班都在学习弹道学，学员们能绘出子弹飞行线图，能算出风力和下雨情况下的修正数，等等。接着，是实弹射击。我们不得不加快学习的进度，因为经常到课堂来的冯玉祥，指示我们7月中旬以前必须结束学业。我们的教学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中国教官和学员的反对。军官多半是半文盲的农民，他们说，学习机枪的机械装置，是军上的事情。在地方军校受过教育的中国教育，大多数出身于富商和官僚家庭，他们都支持军官学员，坚决认为加油和装卸机件是普通士兵和军士的事情。但我们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机枪试验射击使我们彻底摆脱了困境：我们拿靶子给他们看，表明机枪火力很强，同时，我们迅速地排除了机枪的故障，并附带地简单讲了讲射击要领。这把他们吸引住了，引起他们的兴趣，更主要的是他们确认自己在机枪业务方面是外行。反对派立即削弱了，只有中国教官偶尔发发牢骚。对待他们的牢骚，我们采取严正、冷漠和克制的态度。现在这种摩擦已经消失了，学习在正常地进行着。必须考虑到，这200名受训的机枪手归队时，军队的火力立即就加强了。

训练初期，他们的射击毫无威力，这真令人吃惊。很多人不了解子弹飞行的弹道和标尺的用途。其中许多人认为，枪膛里射出的子弹是笔直地、平稳地飞行着，然后，照他们的话说，子弹没劲了，就落在地上。我们只得从头开始讲，教他们懂得欧洲军队的每个士兵所了解的东西。军官们是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力求

① 闻承烈任经理监，兼交通监，这是国民军在南口大战时的编制。——译者

保持队列和各连之间的横向联系。他们只是崇信散兵壕，整营分布在一条散兵线上。他们认为，不管地形如何，在散兵线上拉得最齐的连，进攻的能力就最强。由于他们力求保持队列和密集队形，忽视地形条件，他们会在战争中遭到严厉的惩罚。他们所固有的保守思想以及对外国人的不信任，是很难摧毁的，只是野外操练才帮助他们弄清了我们的意思，承认了我们所说的正确性。

.....

1925年5月28日

机枪学校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第二辆装甲列车也开始建造了。在张上校的领导下，中国人亲自动手干起来。我们只是偶尔检查一下工作，查看一下火炮和机枪安装班的情况。多连到平地泉去了，那里成立了一所炮兵军官进修学校。因为在秋季之前将开始军事行动，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培养新军官干部的打算。哈宁在元帅司令部内设立了高级指挥人员培训班，40来名校级军官、9名准将和高级参谋人员在其中学习。据说，在丰镇厅^①附近什么地方，还成立了一所大型的骑兵学校，由一些外国人主持。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么在秋季之前，这些学校将培养出上千名的军官，显然，这将使我们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占有质量上的优势。

1925年6月12日

今天，我在国民军司令部收到一份命令，其中写道：“我司令部顾问林^②上校，根据国民军总司令的指示，视察北京、南口、宣化、绥远和包头的驻防军，将视察的全部情况报告国民军总司令，并以总司令的名义向驻防军高级军官发布指示。代理军参谋长——熊斌将军。”

冯玉祥前一天视察了机枪学校，并要我到军属各部队去进行

① 即丰镇。——译者

② 即普里马科夫。——译者

一次视察。当晚，我和埃凡斯被授予上校军衔。今天早晨，我们接到去进行视察的命令。

我带着国民军总司令的命令，离开张家口来到北京。我的翻译何某伴随着我。我们在车站坐上人力车前往“新饭店”——王府大街上的中国饭店。从车站的西北端起，到饭店至少有4公里难行的道路。因此，我们的车夫找来助手：一个架着轱辘跑，一个在车后用手推。每跑一公里，他们就互换一次，半点钟后，我们才到达饭店。

……

1925年6月13日

早晨，我们前往驻防军长官鹿钟麟将军的司令部去。司令部座落在一个离莫里逊大街不远的胡同里。司令部占用一个巨大的广场，其中包括练兵场和运动场。广场被分成两个区：平房区和兵营区。司令部的大门口站着警卫军士兵的岗哨。他们查看了我们的通行证，一个军士发出了“立正”口令，于是我们进了大院。院内，许多身着白上衣的警卫军士兵在挥舞大刀，一共作出25个劈杀动作。场面非常壮观：约600名身体非常结实的青年士兵，飞速地舞动着闪闪发光的大刀，时而防卫，时而出击。练兵场上夯实的土地，由于600双脚的冲击和跳跃，发出低沉的声响。

舞刀结束以后，士兵们擦去脸上的汗水，跑步集合到一起，并按军官的口令排成横队。我们经过队列，走向司令部。鹿钟麟将军的秘书迎接我们，把我们引进空空荡荡的接待室。那里只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鹿钟麟将军从旁门进来，快步走到我们跟前，低声寒暄了一句，请我们在桌旁坐下。

鹿钟麟身材不高，削瘦而端正的面庞，举止庄重，彬彬有礼，具有法国旧学派军官的风度。他在冯玉祥的军队里已经供职10年。

喝过芬芳的绿茶之后，我向他传达了元帅的指示，递交了书

面命令，并补充说，我听候他的吩咐，准备执行他交给的任务。他微笑着很客气地说：“是的，好吧！”然后，他让我马上和他一起到驻扎在北京郊区南苑的步兵旅去，就从这个旅开始视察。将军到隔壁房间换上一套外出制服，戴上佩剑，我们就坐上汽车出城了。

汽车沿着平坦的公路行驶了半个小时，到了四周有围墙和壕沟的南苑。大门口的墙上写着标语：“不劳动者不得食！”“抽烟、酗酒、赌博者，是恶劣的士兵、恶劣的中国人！”在天蓝色的标语牌上，钉着白色木料制成的方块字——“平民要和平，贵族要战争”——这个俄国无产者高喊过的巴黎公社的不朽口号，出现在北京城，特别引人注目。我们的何翻译把这些口号和标语翻译给我们听了，我觉得我的眼睛也像这位大学生的眼睛一样，发出明亮而兴奋的光彩。

汽车沿着周围栽种树木和花草的林荫道疾驰过去，在花草树木中间插着的胶合板上写着：“士兵们，要爱护树木和花草”。汽车停在一座大营房的大门口。旅长葛将军^①出来迎接我们，他先陪我们到旅部，然后到练兵场，步兵团已经在那里列好队伍，呈展开的队形。团长看见鹿钟麟后，下达了“敬礼”的口令，上前报告，并拔出军刀致敬。然后，他就地而后转，跟在鹿钟麟的后面走。我们巡视了“举枪敬礼”和“注目礼”的士兵队列。中国军队里不实行高声致意和队伍高声回答的做法，一切都很平静地进行。队列巡视完以后，听到“立正”的口令，鹿钟麟下令举行检阅。阅兵式搞得很好：士兵的队列很雄壮，只是转弯的操法损害了队列的姿势，因为它基本上采用的是奥地利和日本修改过的移脚（共三个动作）转弯的德式操法。然后，分成小部队举行分列式——按德国抬脚的方式看齐和敬礼，这是无可非议的。鹿钟麟

① 葛运隆。——译者

认为检阅已完毕，这在中国军队中是一种通常的检阅。当我请求查看武器和检视技术操作的时候，鹿钟麟感到很惊奇。但他马上表示同意，并留下来观看进一步视察的情况。

我巡视了一下队伍，叫出几名士兵，检查了他们的武器。该旅是用德国步枪装备的。步枪保养得很好，但枪本身的技术性效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些枪是1901年出厂的，已为多次召募来的士兵所使用。世界大战后，枪筒已生锈、腐蚀，出现了较深的蜂窝面，因此这种枪不可能射得准确。我向士兵们提出一些枪的部件和射击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惊奇地了解到他们在射击方面是一无所知：士兵和被询问的军士中没有人能画出弹道的轨线，也没有人能解释部件相互关系的原理和标尺的用途。视察完毕，我把军官们——连排长叫到一边去，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士兵不知道射击后子弹是怎样飞行的。我发现他们也是一无所知，于是，我在一张纸上画出弹道的轨线，给他们简要地讲解了弹道学以及火炮、机枪和步枪的构造。由于许多军官还是不能理解，我们只好从队伍中拿过一支步枪，把它放在砂袋上，通过实际瞄准目标的方法来证明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尽管我们给军官们上了理论课，但总的说来，这个旅的破烂步枪的命中率也还是只有48%。

在小型的射击理论课之后，我们向这个团发出了向敌人（用小旗标志敌人）进攻的命令。

团迅速地展开了。由于平日的体育锻炼，士兵们相当迅速地开始了进攻。射手之间只有5步的间隔，采取密集散兵线向前进攻。各营的连队只保持横向联系，而且间距很小。支援部队在连队中部的后面50步远的距离跟进，机枪不是由一个阵地向另一个阵地前进，而是和散兵线一起向前推进，也就是跑步多于射击。军士们主要关注的是使士兵们在散兵线上拉齐，因而不注意利用地形。这基本上是一种典型的、非常落后的横队战术，这种战术在

战争中必遭重大损失，很难取得成效。

战术操练结束以后，我夸奖了士兵和下级军官。然后召集上级军官，进行操练奖评，指出操练中的缺点。我建议他们规定连队之间的间距至少二三百公尺，因为这样的间距才能使连队发挥火力，而各营之间的间距至少 500 公尺，除非起伏不平的地形会使敌人易于冲进接合部。然后，我建议他们命令机枪不要和步兵散兵线一起向前推进，而要由一个阵地向另一个阵地前进，这样，机枪的火力才能保证连队的推进。如果机枪在连队跃进时射击，敌人就不得不躲进防备火力的掩体，从而使进攻的连队不致遭受巨大的损失。如果机枪和连队一起向前跃进，敌人就能抬起头来安然地向进攻者开火。这些简单的论断，军官们都记录下来。

1925 年 6 月 14 日

今天早晨，和鹿钟麟司令部的军官们前往郊区西苑，国民军第三师就驻在颐和园地区。

师部设在颐和园旁边精美的宫庭建筑里。师长郑将军^①是个满脸黑胡子的魁梧的人，很像中国庙里的神像。他对我说，他的师和国民军其他师一样，由四个团组成，编为两个旅、一个炮兵营（12 门大炮）。师是由日本步枪和机枪装备的。除了大炮和机枪外，该师还有几门臼炮。

他说，选定视察哪个团都行。我请求把第一团第二营、第二团第三营、第三团第四营组成一个混成团，并把炮兵营也抽出来。

师部的房屋很好，师部的军官们都住得不远，或者在司令部中有住宅。身着灰布军服、肩挎武装带的参谋长对我说，师部由作战处和行政处组成。作战处下设有侦察科，行政处下设有通讯科和电报科，通讯科附有活动半径 75 公里的无线电台。据他说，

① 郑金声。——译者

无线电台一点毛病都没有，可是电报科的机器设备太少了。师部这样的组织机构，我感到很满意。我结识了一些穿着讲究、打扮得过分的参谋军官，他们好像从外国来的友好合作人士似的。我让他们搞图上作业，以解决防御中的一个不大的战术问题。

郑将军对此很感兴趣，他亲自注视着这个战术问题的解决。他们还是采用横队战术，部队之间采用横向联系，因而防线宽度十分狭小。我指出这样解决在战术上的弱点。随后举行的半小时座谈会上，我提出一些修正意见。军官们把这些意见记到他们的小本子上（座谈会一开始，他们就立即取出了小本子），参谋长坚决支持我的论断，和我一起反对横队战术。在座谈中，我才弄清楚，在保定军校任教的日本和德国教官，给中国军队灌输的就是横队战术。这可以有力地说明：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不想使中国军队有强大的战斗力，不愿教给中国人掌握致胜的技能。

各营都站好了队伍。对它们视察的结果，和头一天视察第一师的一个旅的结果差不多：这里也是采用横队战术，而且枪支也是破烂不堪的。

我们和军官们研究了这些问题以后，又特地视察了炮兵和机枪班。原来，炮兵没有电话联系，也不会从掩蔽阵地射击，而机枪班装卸机枪的平均速度竟达7分钟。

打发士兵离开以后，我对郑将军说，在机枪学校里，我们的学员能在55秒钟内装卸一挺机枪。他急忙把这一点记了下来，并说他将从军部把那些在多连领导的机枪学校和炮兵学校中学习过的军官调来。

视察结束以后，我和师参谋长去参观颐和园。这是中国最漂亮的建筑之一。颐和园离北京城15公里，在郊区西苑。它建筑得比较晚。为了建筑它，西太后竟动用了建立海军的拨款。在宫殿

前的湖面上建造了一个石头船式的华丽凉亭，^①仿佛是没有建造战舰的一种讽刺性象征。关于这个凉亭，社会上流传着各种淫秽的传说：西太后在这个凉亭里寻欢作乐，太监为西太后从北京城偷偷弄来一些年轻人，黎明时，就会发现这些人已被戮死，扔在城墙下面。传说，60岁的西太后耽于淫荡，因而300多名年轻人丧生在莲花盛开的湖中的石舫上。

宫殿建造在湖边的山丘脚下，整个宫殿由一些轻巧的单层建筑物组成，它们之间有贵重木料制成的精致走廊和能发出高亢的清脆回响的青铜色暗廊。宫殿内还有几座塔楼。其中两座是青铜铸成的，上面刻有美妙的阿拉伯式花纹和中国神话故事。从这些塔楼上可以看到湖光山色和北京城，可以看到北京城内的景山，即清军冲进北京城时，明朝末代皇帝杀死300名宫女之后自缢的那座山。

宫殿的正门已被封闭，由冯玉祥的士兵守卫着。宫殿里堆放着各种古画、许多贵重器具、上千年的瓷器、祭神用的铜鹿和铜鸟、皇帝的餐具以及其他珠宝。

在宫殿的高处建筑物中，开设了一个饭馆。我们和参谋长在那里吃了午饭，然后，乘着汽车沿着平坦公路去孙中山停灵的五百罗汉堂。^②

五百罗汉堂是一座大的正方形建筑物。其中装饰着体现佛教整个发展过程的五百罗汉像。这座寺院保管得比较好，因为游览者常到这儿来，他们给予了慷慨的施舍。只是大殿后檐的一角处，精巧的屋顶有点损坏，坐在这个角落的可怜的罗汉因雨淋而面色发青了。罗汉当中还有一个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人马可·波罗像。他双手捧着稿卷，黑胡子垂胸，双目炯炯有神，整个人物体现出

^① 即石舫。——译者

^② 即碧云寺。——译者

明确的意向和奔放的热情。马可·波罗的名字，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声誉，但他的名字，被他的后代人的行动给完全玷污了。

在五百罗汉堂后面，是一座陡峭的山丘，宽阔的阶梯通往孙中山墓。这是一座高陵墓形式的建筑，它是用美丽、平整的石块砌成的，陵墓的上空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冯玉祥的士兵守卫着孙中山的这个安息之处。^①我们在这个终生为中国解放事业而献身的伟大革命家的墓前脱帽致敬，然后绕墓一周。墓的侧面和后面摆着一些小佛像，这使我感到很惊奇。佛像在孙中山墓旁有什么用啊！

参观孙中山墓之后，我们从高岗上下来，返回北京城。

1925年6月20日

几天以来，我一直在视察北京的驻防军，然后，来到丰镇厅。昨天和今天，我视察了骑兵学校。学校由两个骑兵教导连（军官教导连和军士教导连）组成。学校附近，驻扎着两个骑兵旅——地方骑兵旅和察哈尔骑兵旅。

富有经验的苏联红军军官布林同志、波兰军官斯拉维克，以及参加过苏联国内战争的、姓王的朝鲜人，领导着这个学校。^②他们都是优秀的骑手，学校在他们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布林同志和王镇淮将军一起在车站上迎接我们。他邀请我们住在他的住所里，以便在那里给我们介绍其余的教官。布林中等身材，是个粗胖的结实人，他感情外露，爱开玩笑。斯拉维克的身材不高，干瘦但很健壮，是个典型的骠骑军官。王某是个上了年岁的朝鲜人，外表上很沉静。

我们在将军那里吃完早饭，就去视察骑兵部队。中国骑兵的

^① 1929年5月22日，香山碧云寺开始举行孙中山奉安公祭，5月26日，孙中山灵柩奉移南下，28日抵南京，6月1日安葬于紫金山。——译者

^② 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库兹米切夫等，都在这个学校里工作过。

质量很差。中国南方根本没有骑兵，在那里，就是让腿快的人跑步进行联络。中国北方有骑蒙古马的骑兵。骑兵的骑术不佳，只能叫做骑马的步兵，因为只有少数部队装备马刀和长矛，大多数只装备马枪。中国骑兵的骑马姿势是不合要求的：他们奇怪地惯于双脚向前蹬向马脖子，这样，骑手才能保持平衡。在一个 30 名骑手组成的骑兵小队快速前进中，有一个骑兵跌落下来，在纵马奔驰时，又有 3 个骑兵跌落下来，而在跳越小障碍物（一公尺半宽的沟）时，第一骑兵旅的 4 名军士中竟有 3 个人跌落马下。这样的骑兵是不能冲锋的，他们需要马，只是为了接近敌人，然后徒步冲锋。察哈尔旅中的骑兵多少有些不同。他们是从半游牧的居民中招募来的，他们在亚细亚式马鞍上的骑术很好（在其他部队里使用日本马鞍）。但是，察哈尔骑兵的战术训练很差，他们是用德国马枪装备的。他们的旅长葛将军表演了骑兵冲锋。1000 名骑兵排成两个横队，高喊“杀！”就疾驰起来，并在行进中射击。看样子，这是很吓人的，但在行进中射击未必能射准敌人。

学校里的情况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这里训练出来的是真正的骑兵，他们能勇敢地越过障碍物，正确地坐在马鞍上，熟练地挥舞着德国马刀砍杀敌人。本届毕业生预定在 8 月毕业，这必将改善国民军骑兵的训练。地方骑兵旅的军官们，现已在校中培训，他们在学校附设的、由斯拉维克负责的军官队中受训。

视察之后，教官们表演了对捕获来的野马的训练。这是很引人入胜的场面：优秀的骑手骑在烈马上表演跳越高障碍物，然后，他们挥动套马竿使那些未经训练的蒙古马服从人的意志。

应当指出，中国北方可以建立起优秀的骑兵队伍。内蒙古和热河省拥有取之不尽的马匹资源。

视察之后，我们在王镇淮将军那里吃了午饭。这是一顿普通的中国午饭。一共上了 12 道菜。将军的住宅有 3 间屋子，屋内地上铺着草席。和各处一样，屋里的家具很少，没有软椅和沙发。墙

上挂着几幅画，是用黑丝线在白缎子上绣的树木、飞鸟、竹子和山水。午饭后，我们来到院子里，布林同志拿来刚从北京给他捎来的照相机。将军对于有机会照相竟高兴得忘记了客人。他马上回到屋子里换上威武的军装，胸前挂着几枚闪闪发光的奖章。他拍了3张不同姿势的照片以后，把他的卫队叫出来，又和卫队一起拍了几张——卫队站在他的四周，叉开双腿，瞪着眼睛，威武地握着剑柄。然后牵出将军的一匹铁青马，随后又牵出将军的白马，拍了他骑在马上、手提缰绳的姿势。这时，将军很喜爱地抚摩着马的脖子。穿着军装的像照完以后，将军请布林同志把便服借给他穿，照了一张穿西服的像；接着又照了手扶自行车穿运动服的像。总共拍摄了18张照片。当布林对将军说底片已用完时，将军才算满足。一般说来，中国军官很爱照相，东方人喜欢在照相时摆出各种姿势。照完相之后，将军非常兴奋，他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去洗澡。

1925年6月21日

早7点，几匹马已牵到将军的住所。我们和布林同志以及其他教官决定到离我们住所15公里的立刀山去。将军主动陪我们去练兵场。我们和他骑着马并排走着，通过翻译和他讨论了骑兵的作业和骑兵驯马的原则。在这些问题上，将军有他自己的见解。他比较喜欢纵马急走，而认为奔驰是没有必要的，因而他认为骑兵不要骑跑马，而要骑走马。我和布林同志不得不商定以后用实践来证明他的见解是错误的。于是，我们把话题转到骑兵战术问题上。我问将军，他是否认为自己的骑兵有能力攻击敌人的步兵，他想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种攻击。王镇淮回答说，他的骑兵有能力攻击步兵，他让骑兵组成密集队形，一拥而上地冲击敌人的步兵。我试图警告他，用这种方法不能取得成效，因为步兵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机枪扫射骑兵，不让骑兵靠近。而且，我们还证明，步兵只要一挺顶用的机枪就行了。将军仍然坚持己见，他对我们提

议的梯队攻击战术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团长的声音就听不到了，根本不能取得任何效果。我们感到完全没有希望能够说服他，所以商妥以后由布林同志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论断是错误的。他的论断适用于18世纪，而完全不适合于20世纪的战斗原则，因为今天，步兵已装备有自动武器，已拥有发射榴霰弹的速射炮。

……

1925年6月22日

我们视察了军属炮兵和炮兵学校。军属炮兵营是由不同型号的火炮装备起来的几个炮兵连组成的。^①炮的主要型号是76毫米的克虏伯炮，此外还有75毫米的有坂炮，76毫米的俄国炮以及75毫米的日本山炮。有一个炮兵营是由1871年造的75毫米的火炮装备的，这种火炮上没有瞄准镜，炮身被钢索固定在没有缓冲装置的小车上，这种火炮在射击时要向上跳动，因而总是撞击一个部位。中国的弱点就是它没有制造火炮的工业，火炮都是从国外买来的。这必然会导致武器落后、型号不一，因而难以编组训练。因此，实弹射击的编组训练就很差了。大多数军官只会直接瞄准射击。很少的军官能懂得掩蔽阵地上的射击理论，他们对火炮的各种部件也不太了解。火炮出点小毛病，就得送到修理厂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多连为培养炮兵军官确实在进行一项重大的工作。^②多连当着我的面在野外讲解炮弹飞行的轨线。他采

^① 国民军各部队里有五种型号很老的火炮，因而弹药供应十分麻烦，编组训练也很困难。

^② 在军事档案里保存着佩特克维奇同志1925年5月1日至1926年4月15日在第一军炮兵部队中工作的报告，这份报告可完全证实这个看法：“在我们的工作开始之前，国民军的炮兵也和所有军队一样，靠卖命为生，这和俄日战争开始时我们的战术相类似……6月中旬，我们在平地泉组织了有120名学员的学校。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些军士，大部分是下级军官和几个连长。学程3个月……全部教学计划，由我们安排。我们还顺便在平地泉炮兵部队里进行工作，因为军属炮兵大部集中在那里。10月中旬，

用直观教学的方法：他下令炮兵连按同一标尺齐射，但炮弹安装的定时信管不同。榴霰弹在空中爆炸的朵朵轻烟，表明炮弹飞行的轨线，因而引起中国学员的一片掌声。学员们好像在观看什么炮兵魔术似的。

1925年6月30日

视察结束以后，我返回张家口，向元帅作了书面报告，说明我给军指挥人员作了哪些指示，并请他下达命令执行这些指示。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军队操练得很好。锻炼身体和每天长跑是配合操练的最好的方法，可借以培养出在战斗中能吃苦耐劳的步兵。但是，军队的战术训练太差，采用着一些落后的原则，如进攻时散兵线平行推进，不利用地形、地物，没有预备队去扩大战果。机枪业务掌握得不好。机枪班不太了解机枪部件的作用，几乎不懂得射击理论。炮兵不会从掩蔽阵地射击，没有通讯工具。甚至军官们也不了解炮兵的器材。考虑到对张作霖开始军事行动还有三四个月，我建议：

1. 10月1日以前，结束军校的工作，以便军官们至少能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去做战前的部队整训工作。

2. 颁布一些简要规范：步枪结构须知，机枪部件说明，战术简要规范，士兵射击须知，等等。

3. 向全军下达命令，重申我们视察期间所给予的那些指示。

第一期学员结业时，高级指挥人员都来了。大部分学员被任命为连长。第一期学员结业之后，立即招收了第二期学员。这一期来受训的，全都是连长。学校已有两个班：1. 连排长班；2. 军士班。此外，国民第二军也派出80名军官来学习，因而我们勉强地开了课。学校才开课一个月，就因为开始了军事行动而被解散……战争期间，中国指挥人员看到了学校的成果：部队能从掩蔽阵地进行射击，而且射击效果很好。在第一次天津战役期间，为了突破敌人防线，我们直接指挥了46门大炮的轰击。我们的炮兵技术专家修好了全部器材，培养了中国技术人员。”（苏联国防部档案）

这些指示附列于报告之后。^①

冯玉祥同意了报告中提出的各点，委托我们的上级哈宁同志督促执行我们的各项指示，抓紧训练学校的毕业生，拟定规范、指令和给全军的命令。

1925年7月1日

今天，我和埃凡斯被召到军部，唐将军邀我们去谈话。他问我们在天津有没有熟人，是否熟悉天津。他得知埃凡斯同志熟悉天津并在那里有熟人之后，对我们陈述了如下的情况。给国民军私运武器和弹药的一艘外国轮船就要驶抵天津。由于驻防军是张作霖的部队，军火有被他们截获的危险。必须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卸下武器，把它装到罐头箱或其他大木箱里运往北京。让我和埃凡斯仔细检查武器是否完整无损，并以北京商行代表的身份把武器运到北京，再转运到张家口，送到军队的手里。唐将军把国民军驻天津代表的住址告诉了我们，以便让他们协助我们完成任务。

唐将军说明这项任务以后，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我们，并补充说，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甚至和外国情报机关的侦探以及张作霖的特务发生武装冲突，都是可能发生的。我们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②他很高兴，并让我们稍等一下。他走出客厅，过了一会儿，就和冯玉祥元帅一起来了。

元帅一进屋，我们立即起立，向他敬礼。他让我们靠桌子坐下，问我们是否已决定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作了肯定的回答。元帅又低声问我们：

“你们决心完成你们老弟的委托吗？”

① 今后训练军队指挥人员的工作计划草案，也附于报告上。同时，打算在一个固定地点集中开办步兵、炮兵、机枪、工兵等军事学校。

② 在我们的档案文件中，没有证明运送武器这件事。

我们再一次重申：我们同意。元帅对我们作了一些补充指示，把写给驻天津代表的信交给了我们，要我们对任务和信件都严格保守秘密。

“你们知道，我们多么缺乏武器，我们多么迫切需要得到武器。我把国民军的命运托付给你们了，因为国民军很快就得开始军事行动。我知道你们怀有强烈的同情心，我想你们会尽力去办的。”

我们告辞了。

当天晚上，军部给我们送来了钱，以及“美孚石油公司”和“乐器仓库”驻北京代表身份的文件。我们乘晚车去天津。载运武器的轮船，大约过一星期就要到达天津。

（录自（苏）维·马·普里马科夫著 曾宪权译《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部分注释有所变动）

关于骑兵的报告*

——普里马科夫同志给冯玉祥的报告

（副本）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以后，在欧洲军队里对骑兵存在着两种观点：法国的观点是，在未来的战争中，骑兵将起着骑马步兵的作用，即起着指挥官所掌握的机动预备队的作用。因为指挥官可利用马匹作为迅速调动步兵的工具。

法国人所以持有这种观点，是由法德战场的实战体验中造成的：那里集结过多的兵力（平均一俄里有一个步兵师和几十门大

* 这个报告显然是一份重要的文献资料，它为国民军建立骑兵队伍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根本改善了国民军将领对苏联顾问的态度。

炮），整个战线上都挖了堑壕，敷设了几百公里长的铁丝网，双方使用了上万架飞机、几十万辆汽车和稠密的铁路网。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战术上的机动，只剩下指挥官战略上的机动了，而师的作战任务若只是占领马恩河上船工的一座房屋，使军队能向前推进 100 公尺，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用不上骑兵了。因此，法国人在战后力求使自己的骑兵变成骑马的步兵，并使其具有大量技术战斗装备（一个法国骑兵师有 70 辆轻型坦克）。

在英国和俄国帝国主义军队中，形成了另一种观点。英国人在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比起法国人，是多方面的，因为他们还须在殖民地（例如在巴勒斯坦）打仗，英国骑兵在远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俄国帝国主义骑兵，在战场上的人员集结方面，少于法德战场，因而体验也不同于法国骑兵。德国骑兵对斯文茨尼的侵袭（著名的斯文茨尼突破），以及西南战场上的一系列战役，使军队里更加确认了骑兵是个独立兵种的观点。

1917 年在欧洲和小亚细亚开始的一系列国内战争，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骑兵问题。

应当指出，在革命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上，庞大的骑兵队伍起了重要作用。

克伦威尔的骑兵，即他的著名“铁骑”，在英国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缪拉元帅的骑兵，在拿破仑战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 1861—1864 年^①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建立起来的骑兵袭击了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打败了南方精锐的骑兵，取得了胜利。在苏联，建立了强大的红色骑兵，使苏维埃共和国有了布琼尼的骑兵军和其他几个骑兵军团，保证了苏维埃政府的胜利，使敌人遭到一系列惨重的失败。凯末尔巴什的骑兵军团，使他得以在小亚细

① 美国南北战争应为 1861—1865 年。——译者

亚几乎全歼希腊人的军队。在苏联国内战争中，以及在共和政体的土耳其反对希腊人的战争中，骑兵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使欧洲不得不又恢复原先对骑兵的看法：庞大的骑兵军团是个独立的兵种，它可以执行最重要的作战任务，并且往往决定着战斗的命运。骑兵在国内战争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下列两种原因：第一，在国内战争中很难出现连续不断的牢固战线。国内战争的军队，通常都进行运动战，即在几个最重要的方向分别进行战斗。骑兵的主要特征是具有机动性，它善于突然出现在毫无防备的地区，能广泛运用运动战的特点袭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第二，根据所有作家的描述，国内战争中军队的战斗素质是比较差的。军队训练得不好，步兵和炮兵射击得不准，军队的战斗情绪不高，军队不大稳固（请看，司徒亚特对1861—1865年美国国内战争中北方步兵的评论，俄国报刊对1917—1920年战争的评论），布琼尼对波兰步兵的评论，英法报刊对希腊军和土耳其军的评论，即没有步兵和炮兵的准确火力，以及士兵丧魂落魄的情绪，都为骑兵的冲锋和袭击敌人后方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

国内战争的军队后方，通常是很薄弱的。国内没有巩固的政权。人心所向并不统一，他们各自同情战斗的一方，但大多数人希望双方能让他们安静地生活。因此，骑兵很容易在敌人的后方进行活动，在那里组织游击战，进行大规模的袭击来破坏敌人后方，独立活动的（战略性的）骑兵部队执行着下列主要任务。

掩护——在军队展开时，骑兵冲到自己军队正面之前，像一道掩蔽墙似地掩护军队展开，以防止敌人侦察，同时，骑兵本身则对敌人进行搜索。

侦察——主要由骑兵搜索连和军官斥候进行。有时派出比较强大的队伍进行侦察。只有通过威力搜索、抓俘虏和迫使敌人展开、暴露布署，才能得到准确的敌情。骑兵搜索连的侦察正面约10俄里，纵深为离开本队一两天的行程。骑兵侦察只限于进行威

力搜索、火力侦察和抓俘虏，然后就脱离战斗。在缺乏空军的情况下，骑兵侦察是特别重要的，骑兵是军队的耳目。

骑兵的突袭^①——其目的在于破坏敌人的后方，破坏铁路，占领敌人军事工业集中的城市，占领敌军司令部和供应基地，破坏联系和敌后方的其他工作。骑兵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尽可能在敌后组织游击队，然后返回本队参加作战，以协助本队取得胜利。骑兵团行动迅速、不在一地久停、意图难以判定，使敌人在后方难以捉摸它的动向；骑兵行动迅速，意图不明，这就使敌人无法采取预防性的措施；骑兵前来袭击时，却毫无防备，而集结兵力去追捕时，它却早已离去。在参加共同作战时，骑兵要向敌人侧翼和后方冲击，并以果敢的冲锋协助本军取得胜利，罗斯巴赫城下泽伊德利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冲锋，以及基辅会战期间布琼尼对波兰军队后方的冲击，就是实例。会战之后，骑兵要追击退却的敌人，予以彻底击溃，使其无法重整旗鼓，再进行战斗。追击的最好方式是，在追击的同时，占领敌人撤退的道路。古时亚历山大·马其顿骑兵在加弗加麦勒会战之后对波斯军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追击，就是采取这种方式的，当时希腊骑兵追击了100俄里，使波斯人损失了全部辎重，步兵几乎全军覆没。红色骑兵从罗斯托夫到黑海，也是这样追击邓尼金军队的。这种伟大的历史上的相同事件，足以证明英明的统帅总是按着同一的观点来解决追击这个重要问题。

在本军失败时，骑兵要掩护军队退却，把敌人阻止在天然的界线上，使本军在骑兵的掩护下能够重整旗鼓。

战略骑兵的骑手，除了具备优秀步兵所必需的一切特长外，还必须掌握骑兵的本领，即在马上和马下都能作战；此外，骑兵作

^① 报告的这一部分，在6月21日的笔记中有所反映，是借阿连和布林之口说出的。

战时，要求骑手在战斗中发挥主动精神。训练骑兵比训练步兵复杂得多，而且时间也长得多。因此，建立骑兵部队时，要把受过训练的优秀士兵选进骑兵队伍，以便只教给他们骑兵业务就行了。优秀的骑兵应善于迅速通过空旷地带，隐蔽而小心地接近敌人，勇猛冲锋和顽强追击。骑兵军官在战斗中必须极端冷静。莫里茨·萨克松斯基说过：“骑兵是掌握瞬息时间的军队。”一个骑兵军官必须能找到冲锋的时机，必须能发现敌人动摇或疏忽大意的刹那。战斗的热情不可间断，要一鼓作气，勇往直前。停止冲击，就必定要遭到失败。既然决定冲击就要冲击到底。

中国高度的古老文化，使中国得以在欧洲人之前发明火药，但是历史的进程却使欧洲人在使用火药上胜过中国人，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已使中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中国若不建立强大的军队，若不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就不可能获得自由。在中国北方争取国家统一和解放的国内战争中，谁建立起强大的、运用自如的骑兵队伍，谁就必将取得胜利。

革命的中国士兵纠正了本国的历史性错误，学会了按欧洲方式使用火药。中国人民当前的任务是，建立强大的欧式战略骑兵。

（苏联国防部档案）

（录自《冯玉祥与国民军》。文中注释均为米罗维茨科所加。）

与普里马科夫同志座谈的速记记录

（副 本）

1926年2月15日上午11时

主持座谈会：伊凡诺夫斯基^①同志。

出席座谈会：普里马科夫等同志。

普里马科夫：首先，应该谈谈国民军第一军对我国的看法，以及我们所工作的那个地区的群众对我国的看法。对我国的这种看法，颇为影响我们最初的工作进度。国民军第一军及其所在的地区，确切些说，该地区的社会人士，只是根据日本和英国报刊的资料来揣测我国的情况，并根据这种揣测来对待我们。例如，我们和一些将军在一起工作两个月之后，就有人问我们：真的，你们那儿的妇女都实行公有了吗？真的，你们那儿的婴儿都从母亲手中被夺走，送到保育院了吗？他们还会根据日本人和英国人的报导提出其他各式各样的问题。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很困难的。真的，你们的国家被一群强盗所占据，你们什么也没有了？还有各种类似的问题。一句话，我们碰到了比1919—1920年时更为恶毒的诽谤。在这个地区的上流社会里，这种污蔑的报导，是有外国人支持的。

首先，我们得争取信任，使中国人相信，我们只是军事工作人员，而不是宣传员，否则，人们就会对我们侧目而视。必须争取信任，我们以此为出发点。因此，我们从细小的工作着手，承担了交给我们的全部工作。起初，顾问小组的领导人打算马上参与军队的领导工作，提出组织元帅司令部的问题，但由于对我们

① 即布勃诺夫。

国家的看法，没有让我们去做领导工作。^①当时所以没有让我们参加司令部的工作，后来才弄清楚，原来元帅的司令部是按固定的编制建立的。顾问小组领导人提出的有36个科室的司令部组织方案，被元帅随便放进衣袋里，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一下。但是，通过我们逐渐和军官们的结识，通过向元帅所作的报告，他们了解到我们是优秀的射手和卓越的骑手。^②于是，他们开始向我们请教某些工作方法了。

5月以前的情况，大致如此。后来，元帅同意成立培养军官的学校。元帅本人总是极力争取我们能在他的军队里工作。很显然地，当时他得同军官、特别是中上级指挥官的看法作斗争，因为中上级指挥官担心我们会夺占他们的地位。5、6月间，终于在丰镇厅建立了骑兵学校，在平地泉建立了炮兵学校，随后在张家口，为军队的高级军官成立了高级军官学校，接着又在张家口建立了机枪学校，此外，还建立了反间谍工作学校、小型通讯学校和小型工兵学校。这些学校共容纳了700多名军官、军士和上等兵。在这些学校里，工作是按照如下的原则来安排的：在能够由中国教官讲课的地方，尽量让他们来讲课。但只是在骑兵学校里，做到了这一点，而在其余学校里，均由我们的教官讲课。我们在学校里进行的工作，是由几个阶段形成的。最初，只让我们了解一下

① 顾问们来到以后不久，以普特纳同志为首的顾问小组提出了军队实战训练的具体计划。它包括下列各点：“1. 马上加紧培养参谋军官，每个部队至少一名，以便每个部队里有一名能理解灵活机动意义的军官，并使他有权地对行动部队发生影响；2. 拟订战争计划，并制订作战方案、研究作战地区，编制地形测绘图，做出必要地区的路线测量。此外，还打算在改进战术和培训各兵种方面进行工作。”（苏联国防部档案）

② 5月初，司令部里举行了400公尺射击。顾问们的射击成绩优异。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冯玉祥，冯说：“既然俄国人是这样好的射手，那他们也一定是好的工作人员。”（苏联国防部档案）

学校里的工作情况，接着，把教学计划拿给我们看，后来，请我们修改教学计划，然后，由我们来掌握整个教学计划的实施。最后，在所有的学校里，基础教程课都由我们的教官讲授。实际操练也完全由我们的教官安排。在某些学校里，例如在高级军官学校和骑兵学校里，后来全部工作都交给我们教官了。中国人只帮助做一些文牍性工作——抄写之类的工作。在骑兵学校里，最初，我们不得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讲课上，这样一来，3个骑兵教官（后来是4个）要给250人讲课，工作太重，而且这些学员又根本不会骑马；因此，整个工作的人手就不够了，于是，我们采取了另一种工作方式。我们让俄国教官讲战术课，而中国军校毕业的中国教官讲其余的课。我们规定了如下制度：每星期六召开一次中国教官的教务会议，在这一天，俄国教官要制定出下一周的教学计划，而每个教官也要提出自己的教案。这些教案要经过我们仔细地讨论和确定。我们就这样来纠正他们的工作。中国教官们根据我们确定的教案来讲课。

当时，在各个学校里，以及在工作的安排上，都没有计划。缺乏计划性表现在哪里呢？例如，在骑兵学校里没有军士班和军官班。而在炮兵学校里，只有排级军官在学习，他们掌握了技术，离开学校，回到炮兵连里，而炮兵连连长却仍旧是门外汉，这样一来，下面充实了，而上层却依然如故。我们招收了36人（少校、中校、上校，甚至还有几位将军）进入高级军官学校。可见，我们抓了上层的工作，但是我们没有从下层招收学员，没能培训连级指挥人员，因为中国人不同意成立连级指挥人员的学校。在培养军队干部上，没有计划性。

应当指出，我们在学校工作中得出的结论是，只有通过培训军官的方法，才能整训整个军队，因为经过培训的军官可以在各自的部队里对部队进行整训。

由于我们只是根据某些将军的讲述来了解军队的情况，所以

难以断定实情。我们开始在学校里工作，在工作中逐渐了解到某些情况。8月间，我们得到元帅的允许，去视察和了解军队的情况。8月以及整个9月，我和我的参谋长戈尔顿^①走遍了国民军的所有部队，了解到如下的情况：国民军由第一、二、三、五、六、十一等步兵师和一个警备旅组成，每个步兵师有两个步兵旅，每个旅有两个步兵团。旅里的第三团是由一个工兵营、一个骑兵营（在俄国，从1912年起，也是这样奇特的编组）和一个技术通讯营混合组成。每个团有四个营，每个营有四个连。各师的战斗情绪都很旺盛，连队的人员编制齐全，每连约有100人至120人。我们了解了每个师，在每个师都呆了四五天，在那里观看了战术演习。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师里的战术，和俄军在日俄战争时期所采用的战术一样。步兵采用散兵线进攻，要求严格整齐地向前推进，不注意利用地形。例如，让机枪和步兵一起迅速向前推进，这样一来，机枪就很少有射击机会了。炮兵根本不会从掩蔽阵地射击。军队的整个水平，尤其是军官的水平，是不高的，总之，战术水平相当于日俄战争前的俄军水平。我们走遍了全军，了解了军队的装备情况。

原来，军队大都是用1898年和1901年出厂的老式德国步枪装备的，最新的步枪是1902年造的。步枪的质量很坏，全是用过的，而且磨损得很厉害，因为他们用铁通条来刷洗步枪。我们也弄清了火炮的数量。元帅总共只有129门炮，其中约30门是19世纪70年代的型号，用钢索代替缓冲装置，它们没有瞄准器，只能进行直接瞄准射击。40门炮是上海冶金厂造的，也没有瞄准器，其余的火炮是由克虏伯厂、伊克尔斯厂以及我国工厂制造的。

这是步兵和炮兵方面的情况。骑兵由两个旅组成，一个是正规骑兵旅，一个是非正规骑兵旅。正规骑兵旅有马匹，有武器，但

① 指的是戈列夫。

没有掌握好骑术，而非正规骑兵旅善于骑射，但却没有武器和足够的马匹。若是询问骑兵的情况，我就要说，它不具备骑兵的基本特性——首先是不会骑马。4个骑兵跳越1公尺宽的壕沟，就有3人落马，其中一人落马后直接被送进医院。我们了解了所有部队。

这时，我们已经结束了学校里的的工作，谁都知道，我们在学校里的工作做得很好，军官们对我国的看法也逐渐地有了转变。我来到师里的时候，他们用一些小旗子装饰了陈列室。^①我看到，陈列室里挂着一些三色旗。我对他们说，这是我们敌人的旗帜，是过去沙皇的旗帜，于是，他们立即撕下了这些旗帜。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到处都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他们在谈论我们，说我们训练工作搞得很好。学校即将毕业700名学员，这些学员告诉别人，我们怎样教学，都教了些什么。所以人们对我们的态度开始改变了。

后来，学员毕业的时候到了。毕业生表现出自己良好的学习成绩，这向中国人表明，我们的教学比其他教官好得多，因为我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平均每昼夜要工作12个小时。应当指出，我们顾问小组的成员都非常好，他们很辛劳，并且工作能力也很强。我来向各位援引一下中国报纸上刊载过的元帅的评语。一位日本记者问元帅：您那里有赤俄军官在工作，是吗？他说，现在，在我们学校里工作的有几名意大利、德国、日本的军官，而过去只有一名意大利军官、一名日本军官和一名德国军官。目前，赤俄军官最多，因为他们工作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这段话在中国所有报纸上刊载过。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将军们，也都发表过这种赞扬的话。后来，元帅还通令嘉奖了我们。

学员毕业了，随即显示出我们的成果。骑兵学校举行了隆重

①. 1925年3月间，第一次视察国民军各部队时的情况。

的毕业典礼。中国的骑兵从来也没有举行过赛马，我们这次却举行了跨越1公尺高障碍物的大赛马。

很多军官来观看这个赛马会。200人参加了赛马，其中11人得了奖。于是有20个没有在我们这里学习过的军官走过来说，他们也能跳过障碍物。这是在军队的将军和高级军官面前向我们挑战的行为。我们立即邀请他们参加跳越。于是，开始表演了。头一个就跌下马来，断了两根肋骨，被抬了出去。简短地说，20人当中出场了14人，都立刻跌下马来。这时，将军们说：你们给我滚开，真给中国军队丢丑。下列情况显然令人感到欢慰：元帅派人送来了奖品，发给参加赛马的每个人一枚奖章，另外发给11名优胜者每人一枚勇猛奖章，并且颁布了他从未颁布过的表扬令。第一名骑手获得一枚督办奖章、一枚都统奖章，并由元帅奖给价值400元的绸缎、由都统奖给价值250元的绸缎。其余的人也都得了各种各样的奖。随后，元帅亲自来观看骑兵表演，骑手们又显出了非常惊人的本领。250名骑手来到元帅跟前时，都平躺在马上隐藏起来。这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召来校长，发给了大量奖品。元帅立即着手建立骑兵部队。在3个月里，建立了5个骑兵旅，现在，他正在筹建骑兵第六旅。

接着，炮兵开始结业了。在炮兵学校结业的时候，我们举行了掩蔽阵地的实弹射击，应当指出，训练炮兵比其他任何工作都难，因为士兵们根本不懂得算术。炮兵训练首先要教认阿拉伯数字和运用这些数字，他们理解这一点以后，才能继续教下去。炮兵进行掩蔽阵地射击了，射击的效果很好。我们已拥有一些卓越的炮手，他们具有自己的特长，又能很好地训练炮兵。现在，我记不得确切的数字了，好像获得头等奖的弹着点距目标18公尺。总之，射击成绩相当于俄国卓越炮兵连的成绩，虽说这在学校里不能算作好成绩，但在军队里就是优秀的成绩了。这个成绩使人纷纷议论起来。在这里，元帅也颁发了各种奖品。值得注意的是，

元帅委派了炮兵学校的毕业生担任炮兵连连长，而让原炮兵连连长到学校里来学习。炮兵学校的名声传得很远，连岳维峻也从国民军第二军派来了 80 名学员。

接着，轮到高级军官学校结业了。毕业生的成绩也很好。初期，高级军官总是对我们持怀疑态度：你们在说谎话，难道你们就没有军事秘密，真的完全谈出自己的见解了吗？如果教官谈什么问题，由于时间不够不能充分发挥，说得简略了些，那他们会立即警觉起来，开始怀疑地提出问题，寻根问底，喋喋不休。于是，教官得向他们解释，这里没有任何秘密，就是时间太少了。逐渐地，他们放心了，快毕业时，他们已不再寻求什么秘密了。甚至元帅在讲演中也开始谈论我们的工作。他说，你看，日本人教给了我们什么，只教了“向左转、向右转，再没有什么了”，而俄国人对我们不保守任何秘密，他们把一切都教给我们了。

元帅像个很吝啬的人那样说：训练的费用极少，连教官的生活费都要由他们自己出。

高级军官学校，就其影响来说，是个最重要的学校。下级军官可使某些中、下级军官对我们产生良好的印象。而高级军官学校造就出的高级军官，甚至造就出的将领，他们可以使人们转变对我们的看法。他们到处传播对我们的友善，为我们举行各种宴会，等等。总之，他们非常热情友好地和我们分手了。他们毕业以后，常常到我们这里来作客。我们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通信，保持各种联系。

然后，机枪学校也结业了。我们招收了 180 人，但是，有 40 人在结业之前就被元帅调走了。最初，机枪学校里杂乱无章，中国人不会保养机件。他们射击得不坏，但是他们害怕这种机械装置。因此，如果机枪发生了故障，他们就给机件加油，如果还是有毛病，那他们就要惊慌失措起来，立即把机枪送到修械所去。按要求拆装机枪必须十分迅速。当时，拆装马克沁重机枪的枪机要

用3分半钟，而全师的平均速度是4分半钟。我说可以把速度缩减到1分钟。他们大为惊异，在所有营房里都写着这样的标语——“要牢记机枪的结构”。我们学校终于有些人开始做到拆装机枪枪机的速度不到1分钟，只用50秒。他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目前，他们已经十分注意保养机枪的机件了。而过去，当我让他们拆开机枪时，机枪上总是抹着一层黄油，油上落了灰尘，非常肮脏。一般说来，中国人不懂得机械，而且有点怕它，因此，训练他们维护机械，是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余的学校，规模都很小。在业务上他们完全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在诚心实意地教课，这是学校毕业生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军官们盼望学习的心情得到了满足。

现在谈谈大学生的情况。元帅在8月间成立了一所大学生学校。上海事件^①之后，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许多大学生来到国民军第一军，表示他们愿意学习军事业务，以便与帝国主义者作战。不过，元帅担心这个学校会发展成为威胁他的革命势力，而且学校就在他的旁边，规模又很大，有800名大学生，于是，他采用了如下的手段。他极力争取大学生对他的信任，宣布自己担任校长，使学生们从早到晚整天呆在学校里，他和学生们在学校里一起吃早饭，如果伙食不好，就责备伙食管理员。最后，他终于取得了大学生的信任。那时，他又前进了一步，允许在学校里建立国民党支部。这个支部约有40人。他允许他们在这

① 1925年5月30日，英国警察在上海枪杀反帝游行示威的群众，致使在全中国掀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巨大浪潮。6月1日，上海爆发了20万工人大罢工。1925年夏秋两季，在中国许多城市举行了声援上海劳动群众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其中最大的是延续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员领导了罢工斗争。

个黄埔军校^①里组织介绍俄国的讲座。课题是：“帝国主义、中国与苏联”，等等。为了避免元帅担心，讲课提纲是大家在一起极其慎重地制订的。因此，元帅没有感到不安——我们欺骗他。他批准了讲座，然而他自己并没有来听课，这样一来，在提纲的范围内，我们就可以自由发挥了。我们讲了40多次课。元帅对这个讲座表示满意，允许在中央俱乐部继续举办。结果，在全军都举办了这个讲座。

大学生学校结业之后，我们认为该考虑工作计划性问题了，于是，我们提出过去从未提出过的这个问题。

所以要谈论工作计划性，也是由于发生了下面这件事：军队训练总监郭将军来了，他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将军，是个专业工程师。他很固执，除了中国人之外，不相信任何人。我们认为目前缺乏工作制度。我和郭将军作过如下的谈话：您一直对我们不大信任，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您不了解我们，您看，我们已经工作半年了，我们创办了学校，造就了800人。现在，您该了解我们了，请坦率地说吧。我们好像商人似的，当面给您看货，请您挑选您喜爱的东西。我们有工作计划，即整训你们军队的计划。他同意我们提出工作计划性的问题。我们决定把培训军官干部作为基础，然后，通过他们再整训整个军队。我们认为，各师进行整训是一件长期的事情，要占用许多时间和精力，收效也不大。8月间，我们几位顾问在学校里没有什么事儿可干。^②我们决定到几个步兵旅去抓一下整训工作，看看效果如何。我们得到允许去整训第五和第七警卫旅。^③我们的教官开始在那里工作了。结果表

① 黄埔军校是为国民革命军培养军官干部的学校，它建立在靠近广州的黄埔港。教学工作是根据苏联顾问的计划进行的。顾问们也参加讲授一些基础课程。人们常常把北方的大学生学校叫做“北方黄埔军校”。

② 学校的课程已告结束，新的学员尚未来到。

③ 在第五和第七两个旅里，官兵一起进行训练。

明，在步兵旅里的工作没有取得效果。大家在一起听讲，课堂很大，可是来上课的军官人数却不稳定，今天他来了，而明天他因值勤就不来了，这是一；其次，我们实际上不能在部队里进行整训工作，因为两三个教官根本掌握不了全盘工作。因此，我们确认在旅里进行工作，收效很小，决定放弃这项工作。我们认为原先的决定，即把全部工作集中在学校里进行，是正确的，于是，提出了今后的工作计划。由于第一期毕业生中没有连长和营长，所以要为炮兵培训指挥人员（军属炮兵合并成为连队编制的炮兵营）。我们已为步兵培训了高级指挥人员，所以现在要对连级指挥人员进行培训。我们决定为连级指挥人员成立一所步兵联合学校，每营派一名连长来学习。我们还决定成立一所机枪学校（因为机枪业务还十分薄弱），然后，再成立一所高级军官学校。在骑兵学校里要设立军官班和战士班。还要成立工兵学校和通讯学校。我们曾建议军部，把所有这些学校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样，30名教官才能够掌握所有学校的工作。在巡视部队训练情况和视察工作的报告后面，我们附上了这份计划草案。这份计划草案，预先征得了郭将军的同意。我们把它呈交给元帅⁽¹⁾，过了几天，他把我召去说：我考虑到，你们分散在各地工作有困难，如果我把所有学校给你们集中在一个地方，不就好了吗。我回答说：这个主意太好了，正合乎我们的心意。

整个计划被批准了，但是这时，我们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工作阶段。要打仗的消息不断传来。学校的一部分人员被召回部队，骑兵被召去了，机枪手被召去了，这时，关于战争的谈论，更加频繁了。开始邀请我们到司令部去工作。司令部里成立了一个作战组。他们开始研究可能作战的地区，并请我们向他们介绍一下我们参谋部的工作方式。中国人对此一窍不通。我们向他们介绍

(1) 冯玉祥。

了侦察工作方式，他们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元帅的一位参谋，每天上午10点钟准时前来，把我们参谋部的工作方式，特别是绘制地图和统计敌军兵力的方法，译成中文。^①

后来战争爆发了。现在开始谈论的是，他们担心敌人不来打北京，因为这里有大量兵力，那我们军队该怎么办。当时，元帅已去包头，他把我们召到那里，^②问我们该怎么办。而我们早已商量好怎么办。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防守南口阵地。我们有些人已到南口去过，他们走遍了该地区，制订了防御计划，而且中国人已采纳这项计划。

当时，铁路一停顿，^③我们就向元帅建议，从北京撤出全部驻防军，以便着手加强南口的阵地，他立即同意照办了。加强南口阵地的的工作是一次很大的考验。这里立刻显示出我们教学的成果。一个团是由毕业于高级军官学校的学生来指挥，而另一个团是由一位未曾在学校学习的团长来指挥。前者妥善地加固了自己的阵地，而后者却没有。师长来到，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说，这是我们学生指挥的阵地，而那个阵地不是我们学生指挥的。这立即显示出学校培训所带来的好处。这项加固阵地的的工作，体现出学习具有重大的作用。我们拟订了南口作战方案，元帅完全采纳了，并付诸实施。

然后，我们建议把骑兵编成骑兵军团，调往热河。元帅也采纳了这项建议。总而言之，我们已经参加了司令部的工作，我们提出的一些重要的作战意见都被采纳和实行了。

（休会）

① 顾问小组在1925年10月6日给伏龙芝的工作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工作人员已获准参加司令部的工作，现在共同拟订作战计划。”

② 军事行动开始之前，在冯玉祥司令部中供职的顾问有：普里马科夫、德列伊采尔、科尔涅耶夫、佩特克维奇等同志。

③ 铁路员工罢工。

与普里马科夫同志继续座谈

1926年2月15日晚9时30分

我们研究了学校的收尾工作。学校结束之后，我们那些在学校里主持工作的同志，暂时没有事干了，这段时间大约有两个星期。在这期间，元帅开始筹建计划中拟定的那几所学校。^①

我曾说过，学校的工作快结束时，我到部队去视察了一次。我向元帅提交了视察工作报告和筹建学校的计划。元帅同意了这项计划，并开始准备招生。当时决定招收连长入炮兵学校，并指定了要到高级军官学校学习的军官。但是这时，开始传说要打仗了，而且这种传闻越来越厉害。北京驻防军的处境艰难，因为它位于平原上。在北京作战十分不利，铁路从两侧绕过北京。第三十三步兵旅，即比敌人大两三倍的兵力，已撤出北京。我们在这里有三个步兵师。因此决定，必须离开北京地区，于是，顾问们拟订了南口山道的防御计划。部队要撤到南口阵地，并从各方面加强防御工事。这项工作，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项紧急任务，然而，在军事方面对他们却是很有利的。在作出向南口进军、即调动整个冯玉祥军队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决定之后，我们每天都在元帅的司令部里进行紧张的工作。这时，还决定编组一个骑兵军团，把它调往热河。我好像说过这件事：当我们提出要给这个骑兵军团指派两个卓越的指挥官时，元帅说他将指派我们提名的人。于是，我们提出我们的一位炮兵同志，他被任命为第一师师长。元帅让我们再选出一名候选人，于是，我们又提名张树声将军，他被任命为第二师师长。

^① 指开办下列军校：1. 高级步兵军官学校；2. 连长学校；3. 骑兵学校；4. 机枪学校；5. 大学生学校。（苏联国防部档案）

郭松龄转到我方^①的消息，元帅在10天前就告诉我们了，这可以看出，我们在业务上多么受信任。我们在10天前得悉郭松龄将率5万军队转到冯元帅这边来，就可以在这方面作出相应的安排，而且北京在这个问题上也能及时掌握情况。从这样一些情况中可以看出，元帅完全及时地通知了我们，以便北京能随时了解实情。总之，关系处得十分协调。

必须指出一个有趣的细节。根据我们再三的要求，熊斌将军被派往俄国去了。他从莫斯科回来，会向元帅讲述莫斯科是怎么一回事。他很喜欢莫斯科。元帅故意派他前去（他曾经反对过我们），以便得到有关俄国的公正的报告。他去了一趟俄国，回来之后，就成了我们的朋友。顺便说说，元帅非常喜欢我国农民之家的组织，他从整个苏维埃制度中看中了这种农民之家。他邀我到他那儿，问道：您可以对我谈谈这个组织吗？我对他讲述以后，他说，他也要举办这样的组织，他喜欢这种做法，农民流落到城里，是需要帮助的。我告诉他这个组织里都有哪些部门，他立刻叫来一个工作人员，对他说，要他举办这样的农民之家。现在在张家口，已经有了农民之家。

这就表示出他对苏维埃共和国的看法了，他选取他所喜欢的事物，并且毫无顾忌地照样去做，他是一个富有好奇心的、坚决果敢的人。

我们的工作和司令部配合得很融洽。我们和元帅的谈话竟谈到如下的想法：他希望在他身边成立一个由5名俄国顾问组成的顾问组，其中有一名军事总顾问，有一名元帅私人政治顾问，理由是，他认为，国民党人根本不是好人，他只信任国民党中某些工作人员。第三个顾问必须是懂得土壤改良的农学家。元帅打算在鄂尔多斯荒漠上开展巨大的工作。元帅一向是一位杰出的行政

① 国民军方面。

官员，是一位中国高级的行政人员。他的官邸所在地张家口市，完全改变了面貌。我们在那里生活将近一年，眼看着它已变得难以识别了。他修筑了8条公路和一座清水河桥，现正在敷设几条汽车路，等等。第四个顾问必须是工程师，是建立工厂的专家。最后，第五个顾问，是帮助他改革财政制度的俄国财政学家。

由于我们工作的这个时期整天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下，所以元帅请求给他派一个骑兵旅来，作为他的骑兵警卫部队。我把他的这个请求转告了当时代理加拉罕同志的索洛维约夫同志，显然，这个请求被拒绝了。

在这之后，发生了天津战役。当时，元帅把我们召到他那里，让我们顾问在作战期间去协助四位将军。我们把顾问派出去了。^①不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搞军队训练工作，不过我们认为他们的工作并不能起到对部队进行整训的作用，操练没有正规地进行，工作也不像在学校里抓得那样紧。天津战役期间，我们留在张家口的后方，从元帅那里得到一些情报和消息，而这些定期得到的情报和消息，却是两天前的情况。我们到前线以后，联系就加强了。

现在谈谈天津战役的一个特殊阶段。我想扼要地指出一些工作情况。我们已经作了这次战役的详细书面汇报，现在只是作个一般的论述。张都统^②（总指挥）尽管有勇猛旅长的名声，但是他来指挥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军团，就难以胜任了。他简直手忙脚乱起来。此外，他想亲自指挥，显得谁也不如他。他怕自己会丧失荣誉，怕别人会说胜利是俄国顾问取得的。因此，他对我们的意见总是持审慎的态度，每次都力求按自己的想法干。这里应

^① 天津战役初期，谢罗夫斯基、扬·文捷尔、维赫列夫（在装甲列车上），在各部队里工作；阿尔根托夫、谢尔盖耶夫、科列伊沃、索洛维约夫，在大学生学校里工作。

^② 即张之江。 —译者

当指出，我在对他的态度上表现得有点不太机敏，在确定作战方案时，我的态度有些生硬。张都统极力想避开我们的意见，但是他又做不到，最终还是采纳了我们的某些计划。装甲列车袭击杨村的计划，完全被采纳了，甚至委派我们去执行这项任务。其余的计划，他只采纳了一半。我们把正面突破的计划草案交给了他。我们认为，必须正面突破，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彻底粉碎李景林。^①但是，他按自己的想法做了。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说，要用炮火突破4公里宽的地段。我们集中了46门大炮，开始了轰击。要知道，轰击4公里的地段，这在中国是空前没有的事情。所有敌人都躲避起来了。于是，我们问张都统：为什么你不进攻？要知道，进攻的条件都具备了。他回答说：我在等待他们逃跑呢。他们怎么能逃跑？他们都躲到地下去了。而他还是说，反正他们得逃跑。他不懂得，炮兵把敌人赶入地下，步兵可以毫无损失地接近敌人。后来，他才明白了这一点。此外，他没有按我们原来的意见，派精锐的第十一师去实行突破，而把该师派到其他地方支援右翼去了……因此，没有兵力去占领突破口。突破口有15俄里宽，却没有彻底粉碎敌人。第二天，敌人还是坚守着，一直到傍晚，天津才被我们攻下。敌人的兵力是很大的，我们一共缴获了两万多支步枪。据元帅说，我们还缴获了100多门炮和很多机枪、8架飞机和一些小型装甲车。

由此能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呢？一般说来，还是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没有决定权，但我们的意见往往是被采纳的，下面采纳得多，而上面则有时全部采纳，有时只采纳一部分。

在中国的军队里，我们从战争中学会了什么呢？中国士兵比我们的士兵强，他们有忍耐性、不爱发牢骚、勇敢、机动能力强。

^① 顾问们曾建议中国指挥部狠狠打击李景林军，以便消除来自山东的威胁。（苏联国防部档案）

中国士兵日行 70 公里，并不感到困难。一般说来，这是未来的精锐步兵。我国步兵和中国步兵相比，显得十分呆傻，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步兵是世界上的优秀步兵。或许这个评价过高了。

下级军官非常好。他们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很勇敢，而且从不惊慌失措。认为中国军官见到风筝都害怕，把它当作了飞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他们撤退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通常，拿着旗帜逃跑的指挥官好像已陷入惊慌失措的境地，士兵跟随着他乱跑。可是他一转过身来前进，士兵就又跟随他去进攻了。士兵们没有显现出惶恐的样子，他们从来都不会狼狈而逃。军官的弱点是，在工作中缩手缩脚。世界上想必难以找到像中国军官这样缺乏主动精神的军官。他自己对任何事情都不能作主。若是炮兵接到任务，向步兵所在地右前方半公里处某地射击，那即使出现新情况，他也不会改变射击方向，因为他说：我若是自行决定，就会被砍下脑袋。如果放开手脚让他干，那他必定是一个优秀的军官。一般的将官庸庸碌碌，而高级指挥官却是很有才能的。刘骥将军就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足以承受我国总参陆军学院的推崇。总而言之，军队是好的，我们的炮兵显然比敌人的炮兵强，我们的炮兵连，既能从掩蔽阵地射击，又能从暴露阵地射击。

天津战役之后，工作的情况如下。部队调回原驻地，元帅就可以迅速地减轻天津的负担了。每天都开走 20 列火车。部队的疏散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里，我们和张都统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摩擦。为什么会出现摩擦，究竟是怎么回事，很难说。大概是因为元帅派了孙岳而没有派他作督办。我们返回张家口，开始写工作报告。过了 5 天，元帅要我们去做山海关一带的地形勘察工作。我们把教官们派到那里去，他们作了阵地的标记，并认识了曾在郭松龄军队任职的魏益三将军，带

回一份关于郭松龄残余部队的详细报告。这是一项工作。

第二项工作是“黄埔”学校即大学生学校中的工作。过去，我们在那里工作过，现在又在那里工作了，不过现在那里的工作并不忙。现在，我们有可能把所有教官以顾问名义派到各师去，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样做。我们想使中国人相信，只有通过学校，才能整训他们的军队，因此，我们不把顾问派到各师去，虽然它们一再邀请。元帅的儿子到警卫旅去了。各骑兵师也在等待我们前去。我们接到骑兵军团两份电报，请求立即派俄国顾问前去，但我们拒绝了。我们想集中精力做好学校工作，使中国人相信，我们是专搞学校工作的。我想，他们已经深刻地理解了我们的想法，清晰地懂得了我们的见解。目前，他们的处境很不好。元帅到包头去了，他呆在那里，不想离开。张都统坐镇张家口，在那里处理一些事务。权力这样分散，影响解决问题。此外，战争的威胁不允许目前建立学校，他们都担心从军队中再撤走军官。但是，我们希望开办学校，并坚决要求开办学校，我们想使他们懂得，在战争期间不只是一要打仗，而且也要为未来培养人材。目前，我们还没能建立起学校来。

我再简单地谈谈政治部的工作。对待元帅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我们一向持非常审慎的态度。给我们提出的第一项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要整训冯军和建立对付张作霖的精锐部队。第二项任务是对军队进行政治教育。

在解决第一项任务方面，大家都知道，在军队里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培训了一些军官，如果不再爆发战争，在最近期间可能开始整训军队。

在政治工作方面，冯非常机警地注视着我们的全部政治措施。我们顾问小组很了解，冯担心我们不是军事工作者，而是政治工作者。我们的言行非常审慎。军事教官只从事军事教导，不进行政治议论。我们讲述了我们的国家，讲述了我们国家多么美好。后

来，才出现了一些工作条件。^①冯玉祥有一位顾问徐谦教授，是一位很有权威的国民党人。这个健壮的老头子对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通过他才得以在大本营里开办中央俱乐部。在俱乐部里组织了象棋，设立了图书室、阅报室，等等。徐谦介绍了12名国民党工作人员在俱乐部里开办讲座。俱乐部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我让弗林特顾问编写第一期讲座教材：“帝国主义、中国与苏俄”，大约分为30讲。元帅同意了这个教学提纲。我指示弗林特，在头几次讲课时，特别是在元帅在场的情况下，说话要非常谨慎。待疑虑消失以后，才可以比较尖锐地提出问题。元帅很喜欢这个讲座，因为在大学者的学校里也有过这种课程。元帅吸收了国民党工作人员参加大学者的学校。

中央俱乐部开展工作以后，在各部队建立这样的俱乐部的条件也出现了。元帅下令在各师设立俱乐部。两名宣传员派到地方上去，他们对居民说明了国民军的性质，以及它在反帝斗争中担负的任务。接受了这种宣传的居民给我们发来了电报，表示支持民族运动。我们把电报附在给元帅的报告后面。冯玉祥决定派宣传员到国民军所有部队中去，苏联顾问和11名国民党员都去了。

接着，我们建议冯玉祥组织宣传员学校，他将亲自挑选人校的军官，亲自指导这项工作。学校创办了，培养出36名宣传员。元帅亲自领导了学校，但是，学校里的主要工作，几乎全由共产党人来主持，而且给学员们讲的课程不只是“帝国主义、中国与苏联”，还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军阀统治”等等，同时，特别注意宣传反对奉系集团。随后，他们各自返回部队，进行宣传工作。他们得到了元帅的好评。

伊凡诺夫斯基：您的阐述相当全面，我所关注的许多问题，您都谈到了。

^① 顾问们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才在军队里开始了政治工作。

普里马科夫：我可以把口述的一切写成书面的材料。

（苏联国防部档案）

（录自《冯玉祥与国民军》。文中注释均为米罗维茨科所加，部分注释有所变动）

附

《冯玉祥与国民军》前言

（1967年）

米罗维茨科

1930年，在列宁格勒出版了根里·阿连的一本书：《一个志愿兵的札记（中国的国内战争）》。书中叙述了1925—1926年苏联军事专家在冯玉祥军队中工作的情况。阿连是张家口军事顾问组领导人——有才干的苏联军事首长普里马科夫的笔名，这对许多读者来说，即使在当时，也不是秘密。而他所选择的叙述他在华工作的方式，是由那个年代的情况决定的。

1964年，在军事档案库里发现了可证明《札记》真实性的文献资料，因此，当普里马科夫的朋友们建议筹划再版他的《札记》时，我欣然地应允了。

档案材料证实了一个参加中国国内战争的苏联人的回忆录的可靠性。用档案中的资料所补充的普里马科夫《札记》，具有更大的历史价值。所以，《札记》理应在探讨中国革命的著作中占据自己的地位。

该版本稍微不同于第一个版本的是，这里叙述了1925年4月至1926年2月普里马科夫在中国国民军中工作时期苏联援助中

国国民军的情况；其次，根据读者的意见，阿连《札记》的原稿几乎未做修改（只是在编辑加工上稍作删节和修正，并统一了译名，加了注释）。本书最后一部分公布了档案文件——普里马科夫的两份报告。第一份报告是关于骑兵问题的，是为冯玉祥拟定的，它给顾问们在军队中的教学工作奠定了基础，并使这位中国将军确信必须建立骑兵部队。而后来，这支骑兵部队在与反动军阀张作霖作战时，胜利地完成了突袭的任务。第二份报告——关于张家口顾问组1925年春至1926年2月的工作情况，是普里马科夫1926年2月15日在北京布勃诺夫顾问组的会议上所做的报告。这份报告有助于读者弄清实际情况，了解作者所描写的事件的参加者的真实性名。报告的速记原稿可以证实《一个志愿兵的札记》的叙述的真实性，而且有些地方可以对《札记》作出更加确切的说明。除了公布的文献资料外，该版本还增添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 * *

20世纪初，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社会在思想意识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中国人民开辟了通向“赤旗世界”的道路（李大钊语），从而使政治斗争的过程加快了。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反帝斗争高涨的年代里（1924—1927），革命运动的中心是广东省和它的主要城市广州。帝国主义列强企图把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葬送于血泊之中。革命的中国向苏联请求援助。那时，我们国家刚刚结束国内战争，刚刚赶走最后的武装干涉者，国民经济还处于破坏状态。但是，苏维埃国家不能拒绝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援助。

苏联是起来捍卫中国革命的唯一国家。根据伟大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的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了政治与军事顾问团。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苏联职工，给予了中国工人及其家属

——帝国主义劫掠的受害者以物质上的援助。在苏联掀起了得到世界一切大国的工人声援的“不准干涉中国”运动。

苏联政府极其负责地挑选了热望援助中国革命的人员。苏联政府鉴于：“要指导和整顿中国军队，只是身为优秀的军事专家，是不够的。为此，需要有充分的政治上的敏感性，还要非常机智和沉着。”^① 派往中国去的是国内战争中著名的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他们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而且是苏联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其中就有普里马科夫。

1897年12月18日（公历31日），普里马科夫生于契尔尼戈夫省舒曼村的一位乡村教师的家庭。从15岁起，他就参加了革命运动，1914年1月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他被捕，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他从那里逃出来，很快又参加了革命斗争；1917年10月，他参加了攻打冬宫的战斗，并参加过普尔科夫高地的战役。

1917年1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把普里马科夫派往乌克兰，在那里，他建立了赤色哥萨克骑兵第一团，后来这个团在他的指挥下扩编成为师和军。赤色哥萨克骑兵部队，参加过反对佩特留拉、邓尼金的战斗，在彼烈科普同弗兰格尔作过战，参加过反对波兰白军的战争和对佩特留拉、布拉克—布拉霍维奇、马赫诺联军的远征。由于普里马科夫的英勇果敢精神和军事才能，苏联政府授予他3枚红旗勋章。1924年5月，普里马科夫被任命为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校长兼政委。1925年初，他来到中国国民军第一军。

国民军第一军是一次军阀战争^②之后在中国北方成立的国民军三个军中的一个军。这些由军阀吴佩孚的部分部队改建起来的

^① 加拉罕1925年3月22日致伏龙芝的信——苏联国防部档案材料。

^② 指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译者

军队，没有革命传统，在将军们（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中间也没有人具有革命的经历。但是，在国内的解放运动普遍高涨、华南反帝斗争取得初步成就（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创立培养革命军干部的学校等等）的影响下，北方军队的指挥部宣布了反帝纲领。

在华北建立的国民军，发表了反帝宣言，这使国内革命力量的联合有了可能。李大钊教授（杰出的中国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被派往华北去谈判。为了同北方军队首领谈判，几个知名的国民党人也和他一起出发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讨论了北方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问题。1925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非常明确地指出：“近一年来，中国国民军的诞生，它们和国内解放运动建立起来的联系，以及它们内部的反帝情绪，都表明革命运动在促使某些军事力量去发挥新的作用。”^①

因此，必须直接联系当时中国人民群众为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来看待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全会正确地断定了国民军今后的前途，因而十分重视国内革命总形势和中国北方反帝、反军阀运动之间的联系。因为如果革命运动发展起来，国民军就会倾向于革命运动并跟着它走，如果反动势力暂时得势，国民军的作用就会有所改变。

1925年初，北方国民军指挥部根据李大钊等人的建议，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的请求。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国民军领导人更加明确地走上了反帝斗争的道路，他们参加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内的代表团去同加拉罕^②谈判。

^① 引文根据俄文译出，原文未查到。——译者

^② 当时苏联驻华大使。——译者

第二军司令胡景翼是国民军领导人中第一个向苏联请求援助的。

1924年12月底，这位将军邀请加拉罕到开封他的官邸。^①此后胡景翼又派了一个军官代表团同大使谈判。关于这件事，在苏联驻华武官格克尔同志给加拉罕的报告中有所陈述。格克尔写道：“今年1月29日，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将军的代表刘将军，及其驻北京代表于将军，以及北京大学李教授（共产党员）来到我这里。将军的代表宣称，来访的目的是谈判援助革命军的问题，他们希望苏联不会拒绝援助反帝的斗争。他们打算请求我们给部队提供教官。过一段时间，胡景翼没有等到苏联政府的答复，就向大使请求暂时给他派一些军事顾问，因为预料邻近的军阀即将向他的部队发动进攻。”^②

1925年初，北京军阀果真开始向胡景翼部队进攻了。张作霖的军队集结在津浦铁路线上的徐州地区。张作霖最忠实的同盟者憨玉崑，从河南西部山区对郑州发动了攻势。大批增援部队，其中包括拥有两个装甲列车的俄国白卫军，从上海火速调往徐州。

这一时期，胡景翼没有在他所控制的一些省份内阻止工农运动的发展。例如，在吴佩孚1923年2月对铁路工人实行野蛮的血腥镇压之后，1925年2月10日，铁路员工第一次在郑州能够公开举行中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

北京当局得悉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将在郑州举行，乃下令胡景翼解散代表大会，并逮捕大会的参加者。胡景翼拒绝执行这项命令，而且把大会领导人邀来，把电报拿给他们看，并宣称代表大会可以安然地继续进行工作。^③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也都在他的同意下，在城里建立工会组织，在农村建立了农民协会。

在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谈到，铁路工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

①②③ 苏联国防部档案。

立统一的阶级性的工会，这个工会将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①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决定满足胡景翼提出的向他的部队派遣顾问的请求。2月27日，苏联军事专家从北京去郑州，以便“帮助领导和运用他（胡）所拥有的军事力量”。^②顾问们帮助胡景翼司令部详细拟订了战略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胡景翼的全部主力集结于郑州地区，而在东面对抗张作霖部队、在南面对抗湖北督军萧耀南，只留下人数不多的掩护部队。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把主要锋芒指向西而，并占领洛阳。占领洛阳也就打开了通往陕西的道路，从而造成了第一、二两军汇合起来的可能性。

经过两周的顽强战斗，攻占了洛阳。胡景翼就此亲自拍电报给孙中山。^③

洛阳的胜利是中国军队在苏联军事专家的协助下，在华北取得的首次胜利。胡景翼及其他参加进攻的将领，兴高采烈地评价了苏联军事专家的工作。

在3月12日的会议上，根据中国指挥人员的提议，讨论了今后军事合作的计划。这个计划中列有建造装甲列车和改进地方兵工厂等援助问题。^④

遗憾的是，一个月以后，胡景翼突然死于美国陆军医院。这位将军的去世，对于中国北方的民主革命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他的继任者岳维峻，4月27日致函苏联政府，请求对他的军队继续实行以往的政策。他请求派遣顾问，并给予其他军事援助。^⑤

继胡景翼之后，冯玉祥也向苏联提出了援助的要求。冯玉祥

^① 《向导》1923年2月10日第4期。

^② ^③ ^④ ^⑤ 苏联国防部档案。

信件的内容是：请求在莫斯科接见国民军第一军代表团，并对张家口至库伦之间的公路纠纷协助予以调解。^①

苏联政府细心地研究和讨论了国民军首领们的来信。显然地，这些国民军的社会基础和北方其他集团的基础一样，虽然这些军队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但是意志并不坚决，各军的司令都没有革命的经历，而军队本身也没有革命的传统。

在决定满足冯玉祥和其他将军请求的问题时，苏联政府也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意见。上面已经指出李大钊对国民军指挥人员的外交路线的影响。这位有威望的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亲自参加了第一军代表团，这证明革命营垒对苏联援助中国国民军是极其关心的。

应当认识到，由于这些军队牵制了张作霖的兵力，从而促进了华南革命的发展。

苏联政府若是同意援助国民军，这对北方的政治局势可产生良好的影响，并且有助于中国反帝力量的联合。鉴于此，苏联政府于1925年3月21日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和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这也就表明了，重要的问题不只是给予某些将军以技术上的援助，而是按照广州的实例建立起对革命运动的实际支持。^②

于是两个军事顾问组（在冯玉祥军队里工作的张家口组〔主要组〕和配合张家口组工作的开封组）立即被派往北方的军队。后来，1926年9月，在华北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顾问组。1925年4月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1925年9月29日至10月20日，冯玉祥的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了谈判。谈判是非官方性质的。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秘书，通常参加与苏联代表的会晤。关于在莫斯科为国民军培训军官干部问题，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首批中国学员于1925年已来到苏联。

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

底，普里马科夫来到已经建立起来的张家口组，当时，普特纳^①是该组领导人。

开始，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同志们的处境十分艰难。这是因为国民军的指挥人员对苏联只有一点初步的了解，加之他们担心苏联人同中国老百姓和士兵直接接触会产生什么后果。普里马科夫在他的工作报告和报导中都曾指出他们的这种情绪。

中国军队的指挥人员很快就认识到了，苏联确实是把有真才实学的、熟悉本身业务的人派到中国来。对待顾问态度的转变，是在顾问们应冯玉祥的请求给他介绍装甲列车和骑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之后发生的。此后，冯玉祥委托顾问们立即着手对军官进行实际培训工作。在此之前，国民军的战斗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不如张作霖的部队。

在苏联顾问的领导下，冯玉祥的军队里建立了炮兵、机枪、步兵和骑兵等学校。顾问们编写了学校的教学大纲，从苏联订购或亲手准备教学所必需的一切材料——直观教具、武器，等等。苏联专家们也主持了整个教学进程。

他们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对待自己的工作。

9月底，学校的第一批学员毕业了。冯玉祥军队接收了250名骑兵、115名炮兵。70人毕业于工兵学校，38名高级和中级军官毕业于高等步兵学校，等等。

冯玉祥和军队的指挥人员高度评价了顾问们在培训军官方面的工作。

1926年2月，在同布勃诺夫会谈中，冯玉祥说：“教官们精力充沛地进行了工作，无论是在步兵中，还是在骑兵和炮兵部队里，都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我要求高级指挥人员训练班的毕业

^① 普特纳——苏联国内战争的参加者。1925年底从中国回国之后，他曾任驻日本、芬兰、德国、英国的武官。

生写出自己的学习收获和对教官工作的评语。除去那些公式化的评语外，其他人都指出，学员们没有预料到教官们对待工作是这样的态度……按他们的说法，不仅任何外国人、甚至连中国人都不能这样细心而认真地督促学员的工作。”^①

苏联顾问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帮助军队建立生产武器、弹药等等的工厂。过去，这些军队也和中国其他一切军队一样，使用国外的武器。帝国主义列强故意供应口径不同的、而且过时了的武器。1925年9月1日以前，第一军里就有7种型号的步枪、6种型号的机枪、4种型号的火炮，等等。军队大都使用1898年、1901年和1902年出厂的德国步枪，而且已经破烂不堪。武器口径不同，必然给部队造成弹药供应上的困难。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即运到的子弹和炮弹不适用于任何一种型号的武器。军队里一半武器是19世纪70年代的，只能直接瞄准射击。军队里几乎没有军械修理厂，能够在修理厂工作的技术人员也很少。冯玉祥的军队根本不知道装甲列车是什么东西。苏联专家们帮助重新装备了一些修理厂，在厂内安排了弹药的生产，培养了必要数量的技师。按照他们的图纸，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工人建造了第一批装甲列车。

苏联同意向国民军提供必要的武器、弹药、药品，从而使国民军摆脱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国民军得到了：步枪38828支，日本步枪17029支，^②德国子弹药12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药品等等。^③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

② 原文为：“日本子弹17029发”，显系错误。——译者

③ 苏联国防部档案。

到1926年10月底，国民军根据协议又从苏联得到了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10支火焰喷射器等等。^①

军队的政治训练，对于走向同南方革命军队的联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北方军队中农民出身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是不识字的。他们很难理解国内进行革命的目的和意义，何况军队里还禁止进行任何政治宣传鼓动。虽然冯玉祥也曾保证与孙中山友好、尊重国民党，但却不急于同革命的南方合作。

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力求准许在士兵和军官中进行政治工作。他们把巨大的希望寄托在当时受到冯玉祥及其将领们尊敬的苏联顾问身上。

李大钊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向顾问组的领导人提出建议，共同劝说指挥部，使他们确信在军队里进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结果，拟订了军队政治学习的共同计划。根据李大钊的建议，俱乐部应当成为政治工作的基础。要在俱乐部周围建立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组织，在俱乐部里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小组和研究孙文主义小组。并且预定成立10个俱乐部。

冯玉祥在有些犹豫之后批准了建议方案，但提出在初期只能成立两个俱乐部。当时，委托李大钊和徐谦负责领导政治工作。12名国民党工作人员和苏联顾问弗林特在俱乐部里讲课。以“帝国主义、中国和苏联”为题的第一单元讲课提纲，是经冯玉祥审查过的。在各部队里，宣传员召开了座谈会（这是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不久举行的），谈论了上海枪杀事件及其发生的原因，谈论了工人罢工斗争问题。讲演人向士兵和军官讲述了国民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员，尤其是李大钊，尽力使苏联顾问了解全中国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

的局势。李大钊向普里马科夫和其他顾问介绍了列强的对华政策，讲述了国内反帝力量的斗争情况。顾问们的工作对中国北方的局势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同时促进了冯玉祥与北伐时期的国民政府的实际合作。此外，还不能不指出这一点：从苏联人帮助培训的北方军的队伍中，涌现出许多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的军官。

苏联军事顾问竭尽全力地帮助中国军队成为能够对抗敌人的强大力量。但是，在他们来到中国之后，仅过半年，军事行动就开始了。半年，对于改组军队和准备打仗，显然是不够的。加之军队里的情况难以推行富有成效的教学工作。一部分将军和军官毫不关心中国的革命运动，他们只不过是利用民族解放的口号来谋取政权，因而也就必然千方百计地阻碍建立革命的军队。冯玉祥本人的动摇对部队的战斗力发生了不良影响，他只是把驱逐帝国主义者作为自己活动的纲领，他在当时不与国民党结盟，并认为工农运动妨碍国家的统一。

* * *

1925年11月，国民军为了使自己的行动配合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倒戈，开始向奉军阵地发动进攻。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粉碎奉系集团，在北京成立与革命南方融洽的国民政府。

1925年11月以前，国民军实际上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即对张作霖部队、吴佩孚军队、山东军阀作战。顾问们切合实际地估计了形势之后指出：虽然郭松龄倒戈了，但张作霖的处境仍比国民军的处境有利，因为张作霖的部队还戒备森严地控制着东北三省的南满铁路。他的同盟者——张宗昌和李景林，也拥有巩固的后方。

而国民军的后方是人烟稀少的蒙古草原和部分华中省份，它的巩固程度是值得严重怀疑的。

同时，敌人在数量上也超过了国民军。张作霖和他的同盟者至少也有175000名步兵，而国民军才拥有157000名步兵。张作

霖部队的组织、武器和装备都比较好。有这样的消息：张作霖打算全线展开进攻，以便消灭国民军，并与吴佩孚就合作问题进行初步谈判。

1925年11月27日，冯玉祥邀来普里马科夫，把自己与郭松龄的口头协议告诉了他，内容如下：

- 一、打击凶恶的军阀；
- 二、实行民权政治，关心工农疾苦；
- 三、实行普及义务教育；
- 四、摒弃军事独裁政治。

普里马科夫提出了国民军将如何对待郭松龄的问题，冯回答说：“我们现在不可能开始进攻，我们的部队现在集结在多伦多地区，目的是在热河省吸引敌军兵力离开郭松龄。”^①

普里马科夫的书里详细地叙述了郭松龄的倒戈以及冯玉祥对奉系战争的情况。

顾问们一得知郭松龄倒戈的消息，就坚决主张给这位起事的将军以较大的援助，但冯玉祥并不急着这样做，他说：“奉军将被郭松龄打垮。现在还不到展开大战的时候，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佯攻热河，掌握住北京，准备好援助郭松龄。”^②

冯玉祥请普里马科夫提出他对攻打天津的意见。在拟定的天津作战计划中，新建的骑兵军团和炮兵部队将要起主要的作用。^③

当时决定，骑兵军团越过热河省冲击张作霖部队的侧翼，并占领承德。同时，骑兵游击队必须扰乱敌人交通线，使东北各省行政机构的工作陷于瘫痪。

^{①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

^③ 冯玉祥还请顾问组拟定扩大后方、护送伤病员、设立军医院等计划。这一切都照办了。当时后勤顾问是罗戈夫（苏联国防部档案）。

计划通过了。郭松龄倒戈之后不久，顾问久克（在有些志愿兵的札记中是布林）当时所在的那个骑兵军团，用7天时间很快就从多伦赶到了承德，并且占领了承德。12月8日，第一军开始展开对天津的进攻。天津战役委派张之江负责指挥。

向铁路线上杨村站地区发起的进攻，是天津战役的开端。这个车站是在夜间被占领的。

预定12月12日发动全线总攻击。胜利冲昏头脑的中国将军们，开始忽视顾问的意见了。这很快地在随后的事件中表现出来，从而使日本人轻易地击溃了郭松龄。国民军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张之江违反冯玉祥的命令，拖延了对天津的进攻。他拒绝我们军事专家提出的战术上的建议，决定用老办法作战。普里马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这两种老办法。

帝国主义列强焦虑地注视着中国北方事件的发展。早在1925年1月，日本政府就指派其驻伦敦大使去和英国外交部商谈，对冯玉祥和张作霖的冲突采取一致的态度。

1925年和1926年头两个月，日、法、美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供给了奉系集团204000支步枪、15000支马枪、7000万发子弹、4架飞机以及其他武器。^①

当军事行动开始的时候，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递交一封信，信中提请华盛顿在中国建立列强的外交统一阵线。类似的信件也送往伦敦和巴黎了。英国和法国在原则上赞同列强在中国问题上的统一战线思想，但因担心重新掀起反帝运动的高潮，所以认为此刻（1925年11月中旬）不宜公开武装干涉中国事务。英国政府提议在此阶段组织思想上的牵制——通过出版物和其他可能的途径煽起国内的反共、反苏的歇斯底里。^②同时，英国根据它驻沈阳领

① 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

事的建议，秘密给予了张作霖 500 万英镑的军用贷款。^①

由于不能组织列强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日本军部乃决定单独行动。它让冯玉祥的前顾问和朋友——日本情报机关的军官松村少校返回中国。12 月 10 日，这个日本间谍会见了冯玉祥元帅。松村力劝冯玉祥放弃对张作霖的积极斗争，和日本达成协议，并保证将来维护日本在中国这一部分土地上的利益。但这次，谈判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

在这前不多的日子里，日本人已经同冯玉祥周围的军官们进行了谈判。曾率领过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的熊斌，于 11 月 22 日、26 日和 28 日会晤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人员。11 月 22 日，他把冯玉祥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和他的部队的部署告诉了日本人。在后来的两次会晤中，他透露了冯玉祥和郭松龄的谈判情况。他还宣称，冯玉祥打算既与苏联、又与日本保持友好的关系。

我们没有资料足以证明熊斌是作为冯玉祥本人的代表来进行这次活动的，但毫无疑问，他的这些行动帮助了在与国民军进行斗争中的日本人。

在日本人得知郭松龄准备反对张作霖以后，他们准备郭松龄一旦战胜张作霖就与他缔结协定。日本司令部两次派代表去找郭松龄，但郭松龄的条件使他们难以接受。根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声明，郭松龄过于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②

12 月 19 日，冯玉祥要总指挥^③说明，为什么至今拿不下天津。只是在收到这份电报以后，张之江才同意采用顾问所提出的进攻计划。按计划，46 门大炮应全部集中于张贵庄地段。突破敌人防线的任务摆在炮兵面前，步兵第四、五两旅应冲入突破口并扩大突破地段。紧跟第四、五两旅前进的第十一师应占领城市。

^{①②} 苏联国防部档案。

^③ 指张之江。——译者

12月22日，顾问们来到突破口前。攻击前的炮兵准备开始了。大炮的轰击给张之江造成了强烈的印象，他竟认为敌人必定都被打死了，因而没有给步兵下达进攻的命令。这就白白地浪费了一天时间。

就在这一天，苏联航空志愿兵斯捷潘诺夫、皮亚特尼茨基、舍斯塔科夫飞到了前线。派往中国的飞行小队的任务是，培训中国飞行员和技师。但是，在极其艰险的情况下，应中国指挥部的要求，我们的飞行员也直接参加了战斗——轰炸了天津附近的铁路，向居民散发了传单和布告。在这些日子里，完成了24次战斗飞行，投下了66普特重的炸弹和10枚燃烧弹。^①

12月23日，指挥部下达了再次炮击的命令，步兵冲进了突破口。第十一师控制了通向天津的道路。12月24日占领了城市。

普里马科夫在华的活动，是以天津战役告终的。1926年1月，冯玉祥把这位苏联军事顾问邀来，对他说，在这混乱的情势下，他不愿意与日本人妥协，但也不能继续进行斗争。他想“下野”去苏联学习。5月9日，冯玉祥在普里马科夫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9月初，冯玉祥就要返回中国。^②这时，开始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不断取得胜利，已进入了华中地区。冯玉祥下定决心要返回中国时，请求苏联政府把普里马科夫或普特纳派给他作军事总顾问。但是这两个人都已接受新的任命。因此，委派桑古尔斯基同志为冯玉祥的顾问。

冯玉祥以后的道路是矛盾重重而又历尽艰险的。他曾当过武汉政府军的总司令，^③偕同国民革命军打败了军阀部队。而后来，

① 苏联国防部档案。

② 冯玉祥8月17日离莫斯科回国，9月3日抵达库伦，9月16日抵达五原。——译者

③ 冯玉祥于1927年5月1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译者

在1927年7月，他背叛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但是，即使在此之后，他仍然保持着对苏联顾问的忠实态度。在他控制的地区，没有对工农运动进行过残酷的镇压，也没有凶狠地追捕过中国共产党员。

30年代初，在中国将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急关头，冯玉祥同中国的爱国者和共产党员在西北组织了志愿军，^①开展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46年在美国，冯玉祥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反动制度，因而被开除出国民党。1946年，^②冯玉祥在轮船上因失火而不幸丧命。

普里马科夫从中国返回后，曾任驻阿富汗和日本武官，并在德国工作过；后又任北高加索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是数届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普里马科夫是个蒙受不白之冤的受害者，牺牲于1937年。

（米罗维茨科）

（录自《冯玉祥与国民军》。文中注释为米罗维茨科所加）

冯玉祥莫斯科之行日记

（1926年5月9日—8月16日）

5月9日

早3点，太阳团团，已自东出。沿途村屋多木壁草顶，横斜错落。车蜿蜒迤邐，向西南行，车中人语曰：距莫斯科不远矣。

昨晚，闻我军在大同发生战事。第一，我方子弹困难。第二，

^① 即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于1932年5月26日通电就任总司令。——译者

^② 应为1948年。——译者

彼方守城，以逸待劳。悬念患难手足，余心殊为惴惴难安也。

11点，见各大森林中有单独房舍，点缀生姿，系俄人避暑用者。

12点，到莫斯科，俄政府代表及步、骑队伍并留俄中山、东方两大学男女学生三四百人，前来欢迎，高呼中国国民革命万岁。各报馆记者，争先照相。

午后1点，到欧洲旅馆下榻，房舍高大洁净。

3点，见俄外交委员长齐趣林，谈中国近况及回族情形。

5月10日

3点，天已大明，因精神疲乏，6点始起。昨日雨，今日又有雾。坐定，拟将一行分数处住，为习劳也。与季龙谈广东近况，及气候、物产各事。心中总觉有骄气、躁气，誓以“谦”、“柔”二字治之。

今将到莫斯科以后之感想，略述于下：

一、以俄国专制帝王之淫威，卒为俄民所铲除，足见民权潮流继长增高，大有非将全世界专制壁垒全行冲破不可之势。

二、中山先生虽死，而继中山之志者，在国外则有如是众多之学生。是中山先生所死者仅肉体耳，其精神固犹充塞于人世也。

三、人生一世，“互助”二字极为紧要，而吾军中尚有不知者，以致余毫无办法，是不得不归罪余自己学术之短浅也。

四、蒋鸿遇来电，有“苦海”二字，政治清明，国家强盛，何用吾辈，吾之生斯世也，为救国、救民、救世界也。今国民之陷于苦海也久矣，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民众之陷于苦海也多矣，愿洒赤血一腔，化作慈航万只，以普渡之，此余之天职也。

下午4点，参观列宁墓，规模狭小，铺设简单，共党人员可谓不失列宁平民化之精神矣。

本日决心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一党员，以努力致力于中国国民革命。

5月11日

早6点起，雾气弥漫。昨夜与廖先生谈及克鲁泡特金，始知所住之街，即为克鲁泡特金之故里，故又名克鲁泡特金街焉。

11点，到克鲁泡特金图书馆参观，午后1点半归，见极大之礼堂，旁有一空地，中有平台。询之，知为俄帝亚历山大铜像旧址。革命时，该铜像被推毁焉。

9点，到中山大学参观，夜1点始归。

5月12日

上午，托蒙古使馆二等秘书往库伦家中带信一件，并与林顾问约定礼拜五见俄军事委员长。

午后1点，送赵亦云等入学。

9点，勾先生接东儿等由列宁格勒来此，嗣又到中山大学参观，见有一电灯图，表示列宁一生所到地点，并听无线电唱歌，因知列宁注重电气事业也。

归来阅报，知邵飘萍被枪毙，至为惋惜。中国言论之不自由，于斯极矣。本日接电报，知慕成化及徐参谋长由飞机上摔毙，慕君随余数载，一旦为国捐躯，不禁为黯然神伤者久之。

5月13日

早6点起，思及克鲁泡特金、孙中山先生及列宁之为人，终生经万难，冒万险，其困苦颠连之状，殆为常人所难一日安者，然死后，人俱崇拜之、讴歌之，是艰辛困难，正所以玉成之也。从此当立定志愿，为国为民，不避艰险，期达目的。

11点，参观艺术博物馆，建筑极精，全体除二三尺见方之大青石外，多为人造石，红彩青光，闪耀夺目。第一室陈列各种古布、麻布，上绘花草、山水、人物等形。次入油画室，内藏画片无数，皆极精致，栩栩欲生，仅观一油画船，亦需2小时焉。再次转入一室，内陈列一大石物，长约2丈，宽约6丈。又有3000年前皇帝木棺四具，上刻埃及文字，又有古头骨二，均尚完整。统

观全馆之壮丽，实驾我北京建筑物之上也。

嗣参观国家戏园及新剧，俱带有美术兴趣及革命精神。

午后3点，请西藏代表及唐努乌梁海代表会食。

4点，参观革命博物馆，克拉夫所带之手铐脚镣，今尚存焉。囚犯室内塑有假人，须眉毕肖，恍如生者。并陈列有列宁历年革命之相片、宣言及报纸等。

7点半，归来，极觉疲乏，然所得亦良多矣。

5月14日

早6点起，自思多有浮躁处。

10点，见军事委员长，谈我军情形。徐季龙颇有见地，余弗如也。

5月15日

早起后，读书。

下午半点，到国家银行办理存款事，见其金库内贮藏黄、白金砖无数，知俄国富力渐恢复也。该行办事员约400人，女子占其半数，在职业上之男女平等，可以概见。

下午5点，到林顾问友人家。本日接余妻德全来信，言本月8日亥时生一子于库伦，全家平安云。

5月16日

本日为星期日。午后5点，应友人果落夫饭约，僦为其母及其妻所自做，佳甚。

饭后到革命戏园观剧，适演“五卅”惨案，见其所描写我国老人、妇女、小孩、瞎子并修脚者、磨刀者、肩挑者、负荷者之种种苦况，惟肖惟妙，尽情尽致，令我之革命精神，更加蓬勃横溢，不容少抑。

5月17日

早8点起，念及腐儒误国，专提倡孔子之所谓狃而不取其狂，驯致国人萎靡不振，至于此极，故吾人对于共济会事，必认真进

行，振精神，鼓志气，以刷清数千年来陈腐小儒所留之恶毒也。

午后4点，中国侨俄救国会筹备会会员兼《前进报》编辑刘君等5人来见。

5点，复库伦电报。

8点，第三国际委员会吴君廷康来谈。

5月18日

8点，同勾君谈俄文。饭后，同林君谈国民军与广东及东方革命之关系。

午后1点，见加里宁，一见而知为老练之革命家，渠所主张要点如下：一、革命家须仰仗本国，不可仰赖外国。二、革命军队，须与农民合作。三、军事外须侧重政治。四、人民全般，须依赖革命军队。

午后5点，晚餐。毕，出观莫斯科全景。

5月19日

早起后，参观陆军大学校，其校长系总司令阶级，本日所教战略为波兰对红军作战。辅以飞机、海军、假毒气各物品。

午后，送生儿等人中山大学。

9点，接张之江、李鸣钟电，为决定改变战略事。

本日，同勾先生谈俄文《列宁传》，知列宁之父创立学校400余处，学生达2万余人。其兄因刺亚历山大未成被杀云。

5月20日

本日，念我军对晋北事，极为悬悬，精神非常疲乏，早未起，午又睡眠。

午后，见袁君，谈救国会及黄埔军官学校情形。

5点，看17年落成之礼拜堂，工程浩大，气象森严。俄京到处树林中，均有木椅可坐，而花木又所在多是，洵佳地也。

5月21日

早起后，精神极疲乏。9点，肉跳〔原文如此〕。

10点，见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亚，谈教育事。

11点，见人民委员会长阿利克夫，年虽45岁，而状极焦灼如老人，自言因充军坐牢日久，故也。

午后3点，参观航空署及陆军大学附属之航空学校，回时已7点矣。

窃念政府本系为人民谋利益之机关，乃中国政府做事辄以敷衍因循出之，外交专为媚外卖国及吃大餐；内务专为办褒奖、卖公产；陆军专为卖护照，售营产；财政专为借外债、打回扣；农商专为卖矿产及矿业执照；交通专为押铁路、卖产业及购材料、得回扣；其余海军、司法、教育各部，亦无非视为支薪、植党营私之机关，能真正循分尽职，靖共乃位者有几人哉？余非好为灌夫骂坐也，特我国现在政府，实有如此之情形耳。谓予不信，请当局者，各扪心一质诸自己之良心。

5月22日

早饭后，想及国内情形，纷乱靡已，心为之忧，但乱极思治，否极泰来，为世运之常规，吾人在此时，宜竭力预备学术，以为异日效用之地，是亦救国之一道也。

11点，往访国际职工联合会会长。

午后2点半，中山大学校长那拉克来，谈中国情形，据云，世界工会之进步，俄为最，中国次之。

5月23日

昨接家报，知库伦情形。现因不能静坐沉思，以致应事接物，辄不免有丛脞处，是可忧也，当急在静字上用力。

10点，到红厂〔场〕，参观青年团学生军，见其组织严密，精神活泼，深为钦佩。

午后1点归，有多数人围余而观，汽车被阻，不得前行，遂到一饭店休息。

6点，到伍廷克处，会日本共产党片山潜及印度国民党要人，

同病相怜，同气相求，相谈快甚。当时拟计，开一亚洲弱小民族联合会，以谋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之解放，并编著书册，设立报馆，以资宣传，洵为紧要之事也。

5月24日

早8点，连山弟由英京费三日四夜到此。据云，英国极守旧，惟路政及公园均好。

10点，到医院查验身体，无病。归来会马克斯图书馆主任。

张之江来电，报告战况。余妻德全亦来电，请派人前往迎接。

自思余近日来，因不静故，难耐久坐，是为余之大缺点，定力改之。

5月25日

本日，桃、杏、海棠一并开放，直不啻我国花朝佳节也。莫京中有莫斯科河，内多浴者，河两岸及桥上，电车行人往来如梭，诚一幅天然画图也。

午后6点归来，与乌金斯克谈现在大局情形。

8点，到阿达克校长处晚餐，观其精神之活泼，书籍之繁多，平民之态度与其家庭之和睦，真令人欣喜不尽也。

5月26日

早起，林君来会。

午后6点，到野外林中散步，空气新鲜，心为之快。洎问李鸣钟各种军情，知势力之结合与主义之结合，迥不相同，此事殊可注意。

莫京公园中，有极多无父母之婴孩，因其身体不健康，辄有人引至野外散步。而自诩为古文明国之中国人，乃对此等事，政府社会均不措意，一任外国教会或私人收容之，是可耻也。

5月27日

早起，候林君介绍之人来谈。

11点，往银行参观。

午后3点，参观汽车工厂，内有翻砂厂、铁工厂、机器厂、木工厂、皮工厂、零件厂，除大滚车瓦外，余件均能自造。工人有1600余名，每月可造车40辆，资本共值六七百万元云。

归来，连山弟定10点赴库。

10点，袁君谈某白党谋乱被获审讯情形。又前财政总长因买金贪赃，致遭枪决。政府如是之严明，能不令人钦佩耶？

5月28日

早9点，到农民协会，见司提敖夫及蒙古、爪哇、乌梁海等处人员。

归寓，因徐君谈我军四面皆敌事，不禁怅触万端。我军不扰民、无嗜好，乃结果竟尔如此。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吾之所为，善耶？非耶？余之短处，在只顾目前，无远大眼光；在偏重军事，无政治办法，是亦当自负者也。

午后9点，到中山大学看革命电影，所演者为日俄战役情形。当俄国官兵在远东战场，苦战恶斗，鲜血成河，积尸成山之时，而在国内，则皇帝、贵族之骄奢淫佚如故；神父、牧师之放纵恣肆如故；贪官污吏之凶残暴虐如故。两两相形之下，直不啻一在天堂，一在地狱，真令人发指毗裂。又当某团长报告内战已平时，适皇帝与其小女作纸牌戏，遂漫然应之曰：知之矣。其形容大皇帝之颐指气使状态，真惟妙惟肖也。

本日终觉余之不静，实为一大缺点，当咬定牙关，痛切改之。

5月29日

早10点，参观飞机发动机厂。由铁块制成发动机，一切手续，均由该厂自办。内附设工人子弟学校，学生150人，中有女生16名。临行，该校赠余一小罐，以作纪念。

9点，同朱君谈“民族主义”。

是日，雨雹。

5月30日

午后5点，同齐趣林、翁是利合，谈办事要诀。

8点，请阙将军及康各拉力用饭。

9点半，赴东方大学“五卅”纪念大会，报告“五卅”后中国军事、政治状况。

余连日来，亟欲明白何为真理，何为救世之要道，如何方能改造少数人之心理，以同去救济大多数之穷苦同胞，而脑力不足，运思殊感困难，甚自愤恨。

5月31日

11点，见东方大学校长，谈片时去。

窃思专制时代之教育在愚民，民治时代之教育在智民。东方大学校，系灌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以革命思想之机关也，开办5年，现毕业者已达4000人，在校者尚有1500人，学生族别，计达73种。前印度有学生24人，毕业归国后，因鼓吹独立运动，均被禁锢。又该校校长曾只身往说回教巴斯克楼民族反抗白党，晓以自由平等之大义，大有汾阳单骑说回纥之气概。故该校声誉，满全球焉。

午后7点，参观航空化学会，余被邀为会员。

11点，《前进报》记者刘君来，报告现在英、法、德、比惨状，极为可怜，尤以法国为苦，国内孤儿寡妇，到处皆是，生活维持，殊感困难。其他各国工人率多困苦颠连已极，德人且有劫路者，是皆资本主义之害也。

6月1日

10点，同客谈红军情形。

午后6点，德报记者来，问我将用何法改造中国并游德否？余答以用三民主义改造中国，将来或到贵国一观光也。

德人去，自思徐季龙极好学、有毅力，良可佩也。余性偏急，每日不忘军事，如何，如何？

6月2日

起后诊目，归来已午后2点矣。

6点，参观动物园，内有动物400余种，年费达3万元。

余总觉得有傲性，书云：满招损，谦受益。吕新吾有云：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戒之哉，戒之哉！

6月3日

早起，同泥阔洛夫谈，一国之军事，应以邻邦之兵备为准。

午后，觉心中躁急，牙痛，心痛，稍坐，略愈。张允荣弟来，谈聪明为一事，学识为一事，极是。

6月4日

早8点半起，思及势力之不足恃，昔则有若秦皇汉武，近则有若袁世凯，以及目前之军阀、财阀，当其志得意扬之时，何尝不炙手可热？迨一旦事过境迁，云散雪消，所谓势力者，安在哉？孔孟以仁义立说，中山倡三民主义，其传愈远，其光愈著，乃知人之所以能屹然得立于千古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今之被压迫之民族及被压迫之人民，其困苦颠连之状，直令人目不忍睹，解放之，安乐之，是吾之责也。

9点，同任右民谈思想初步及民治精神。

10点，到耳鼻喉科诊鼻，到牙科诊牙，均与医生未遇，遂归。

11点半，往访托洛斯基，其为人圆眼浓眉，气概非常，而待人极谦和有礼，其扼要语为：一、治国非一党不可。二、治军在主义，不在武器。三、作战以骑兵为要，尤重在宣传。

归到百货店一游。

午后7点，同季诺维也夫谈世界革命。嗣登十层楼顶，楼为全城极高处，凭栏四眺，全城风景历历在目，胸襟为之一豁焉。

6月5日

黑夜过去，红日初涌，起视時計，始到4点，因与魏风楼谈10分钟，又就寝。

醒而忆及昨日所见大狗咬小狗之事，此中实含妙理，颇耐寻

味也。财阀、军阀骄奢淫佚，对于贫苦无告之人，漠不关心，又从而压迫之，是大狗咬小狗也。强国之军舰、飞机、唐克〔坦克〕车、机关枪，莫不制造精良，因而侵夺弱小者之土地，欺凌弱小者之人民，压榨弱小者之血汗，是大狗咬小狗也。男子主张强权压迫女子，颐指而气使之，缠其足而粉其面，使妖冶窈窕，以供其一人之玩弄，是大狗咬小狗也。吾其立志扫除世界上一切大狗，俾弱小者同登自由平等之天，岂非一大快事哉！

10点，泥阔拉夫来，与余谈红军编制，系每营步兵三连，每连三排，在混成团团部，则设有骑兵、侦探、交通等队。

11点，参观某团营幕毕，该团长约余到家饮茶，彼曾与林顾问同军，年30，极强健。其妇年28，曾为5年女缝工，现入大学已3年，愈年即毕业矣。

下午6点归，见途中多贫苦者，恻隐之心，不觉怦怦。

8点，接余妻德全电，系上月30号由库伦发者。

12点，同刘骥弟到花园散步，谈及时局，终觉本军，团体主义不明，组织不良，决难幸存于今日，每念及察绥坚苦撑持之弟兄，实有不能不致慨者。吾人既倡言革命，推倒贿选总统，铲除复辟祸根矣，乃顾虑牵就，不能彻底改革，致转瞬之间复归失败，真可惜也。又现在国界未除，各种民族均思甘其食，美其服，丽其居，本国生产力不足，便不得不侵略、剥削、压迫其他弱小民族，祸乱相寻，靡有纪极，实非人类社会所应如此，必联合一般觉悟分子，以共同奋斗，改造社会，使中国一人，天下一家之理想政治，得以实现于今日，始不负此身到世一场也，敢不勉乎哉。

6月6日

本日为礼拜日，11点始起，闻窗外有老人凿石声，何老人不知礼拜日为休息日也，抑恶安逸，喜操作，为老人之恒情耶。

午后6点，同徐季龙谈，此间领袖所注意者约有三事：一、真正之党。二、军队与民众合作。三、党之良好组织，尤重在宣传

主义。

8点，对中山大学中国学生演讲，以“解放”为题，大意谓我国人受政治之束缚，受经济之束缚，受礼教之束缚，受外人之束缚也久矣，蹈常守故，不求进步。现在物质文明，日趋新异，国家情势，日濒危殆，欲谋解放，则对于此种旧束缚之锁链，自不能不谋挣断。此挣断之责任，即放在我革命家之两肩上，望各努力研究革命理论，以便回国以后，共同担负此民族解放之重担子也。

8点，看“无产阶级专政篇”、“列宁主义之战术提纲”、“考茨基对于帝国主义之理论”等书，顿感觉政治经验及学识之重要。

英京有1600教堂，各教堂之钟声齐鸣，亦有足以表示英京之庄严者，俄京何不仿效之，以政治须循序渐进，不能求速也。

余前在常德、信阳时，力主拆毁偶像，毫不注意及民众知识与心理，致引起许多无谓反感，何也？无政治经验故也。我国关税不能自主，驯致舶来品充满市场，国内家庭工业，及小手工业濒于破产，造成国内年来贫困纷乱之现象，仅此一端，实足制中国人之死命而有余。而一般民众，仍复争购外货，屏斥国货者，何也？无政治常识故也。

6月7日

清晨，钟鸣四下，日已从东方出矣，坐起阅书片刻，又卧，至8点醒。9点，到医生处诊鼻。

10点，日人议员某来见，闻泥阔拉夫言，美国某城有化学工厂百余，战时均可移作军用，因思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攫殖民地，与镇压各被压迫民族之民族运动计，无时无刻不在备战，寓兵于各界民众，寓兵工厂于普通工厂，寓军舰于商船，寓军用铁道于商用铁道。放在平时则信使往来，似有无限升平气象，迨一旦战机爆发，便穷惨极酷，不易收拾，上次世界大战是也。似此穷凶极恶之帝国主义，不速打倒，人类将从此灭绝矣。

1点，参观城外唐克〔坦克〕车团，因途中出汗太多，6点归来，竟尔作呕，身体如此衰弱，将何以担负国家是也，良堪痛哭。

8点，接张振亚电，知眷属已由库伦动身，22日左右，当可抵莫京矣。

兹将连日观察莫京琐闻，附列于左，或可为将来采风问俗者之一助也。

一、丧礼，有柩车，车马与棺，均系白色，送葬者步行随后，成二行。

二、巡警持红棒，举棒车即停止。

三、泥瓦匠每日工价，4元乃至5元。

四、国货商场物价低廉，以布匹论，与我北京略同。

五、虾子罐头颇好，苍蝇太多。

6月8日

10点，会泥阔拉夫。

下午4点，参观植物园，系俄皇大彼得创设者，面积可中国400亩，内多奇卉，有含羞草与口袋草，俱具特别知觉。有紫丁香，味极浓郁。又有藉树根而生之植物多种。游毕，憩老柳下，见树荫中有一40余岁之妇人，携二小孩做工。又有老翁一，携一七八岁黑发黑目之儿童。漫游各地，均潇然自得，大有晋桃花源之风味，洵佳景也。忽而阴云密布，遂乘车归。

到店，与马、韩二君谈，余云：读书要有目的，目的既定，再行选书。不觉门外已雨声淙淙矣。

6月9日

早4点起，与魏凤楼谈，旋又睡，至8点起，看“世界最近之局势”。

下午1点，出外诊牙。

6月10日

早起天气极寒，呢衣不温。本日为莫京宗教节，商界皆闭门。

午后 5 点，请林顾问等来过节。

6 点，同尹心田谈“天子”二字之意义，又言今日之世界，强凌弱，众暴寡，大吞小，是真所谓弱肉强食，毫无公理正义之可言，循此以往，人类几何不灭绝也。

6 月 11 日

早起天冷，午后 2 点，到莫斯科省苏维埃，与其会正书记谈话，约 3 小时，临别并赠余书数本。

6 月 12 日

今日天忽极寒，多有穿呢衣者。

午后 9 点，同李鸣钟、刘骥二弟谈，现在外侮内乱，纷至沓来，国家不亡若缕，非铁血，非革命，不能得救国之真意义也。

6 月 13 日

近来悬念国事，忧心如捣，沉闷已极。

11 点，到艺术博物馆消遣，馆内藏有中国山水画及非战作品多幅，皆饶有意致。

午后 3 点半，移居乡间擦里岑傲，以便静养。此处新租房屋，月价 500 元。

6 月 14 日

天冷，仍穿呢夹衣。午后 3 点，绘茶壶 3 把，此余一生绘画之破题儿第一遭也。昨日支床伤手，因礼拜日未即诊治，今去就医，言已晚矣，恐有危险，甚矣，礼拜日之害人也。

今日研究兵、工、农、商、学团结办法。

6 月 15 日

早起，天气仍极冷。李鸣钟、韩安二弟，赠余白熊皮一张，价值 250 元。

画师来，教余绘韩、李像，极似。余思，绘画一道，极有益于己，因绘画为细事，须静心，正可药余浮躁懒惰之弊也。

6 月 16 日

早 9 点，学俄文。

9 点半，阅“党之组织一段”，内载党不可分派，议案经通过后不能移动。第二国际，系对议案决定后谋妥协，第三国际，则事事主张以革命手段，断然处置之。

6 月 17 日

早起，学俄文。饭后，看画〔化〕学家及电学家传记。

午后 1 点，李、刘、韩三位同来，各赠以表一、盘一、茶碗一。

今世之人，仅极少数有衣、食、住，而大多数则无之，余誓必助此一般贫苦无告之良友也。

6 月 18 日

夜眠极不安。早起，学俄文。

午后 5 点，见报载汉口“六·二”纪念日，有民众对□^①吴声言讨伐事，民言殊可畏也。

6 月 19 日

早晨，学英文。连日大雨，未得进城，因在寓看《经济学》及《世界之经济》二书，按单恃军事，良不能救民，苟欲救民，非政治、经济均入轨道不可，是待于学识者极多，吾当努力学问，勉求新知，以救国救民也。

6 月 20 日

本日为礼拜日，擦里岑傲男女皆出游，有作有息，西洋入生活颇有秩序也。

9 点半，学俄文。午后 7 点，到西边新租屋一观。

6 月 21 日

早 9 点，学俄文。

10 点，三顾回来，谈社会学。

① 指张作霖。

本日接张之江电报，心中极忧闷，殆成疯癫。

6月22日

早7点起，坐树荫中写日记。默想，余幼而失学，长不发愤，两鬓如丝，一学无成，愧恨愧恨。昔孔子云：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而遽伯玉，亦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幸余年尚未及五十，定必努力学问，以补前愆也。

11点后，余妻德全忽来，以里程计，应明日到，今乃早到一日，致余未得前往迎接，抱愧之至。德全云，伊到站候余良久，使余尤心中难安也。余做事往往疏忽，将来何以担承国家大事，自误，误人，良非浅鲜。

6月23日

余子小四病，终日啼哭，至晚始愈。

午后，三顾问来，谈中山先生之文章，余告以余实不学无术也。

6月24日

早6点起，整理室内及门帘、窗帘。

8点，学俄文。

午后2点，参观农民招待所，内有农民新、旧农具及关于农民之各种法律，并有指示各村农民程度之电图。其耕田发动机，价约2700元，能种中亩1200亩云。

4点，到社会保险所，关于经济、技术、住宅、卫生四事，研究极详，对各项救济残废办法，尤无不精当。又参观教育工厂、养老院、残废院，归来已7点余矣。

6月25日

9点半，登火车，往莫斯科。路旁农民遍野，灌水撒种，粪地耕田，牛马健壮，屋舍整洁。观其田中风味，真是太平景象也。

到省苏维埃略坐，遂参观自来水公司，该公司自1900年兴工，至1914年始告竣，费款约千万元，每日吸水量达1400万桶，足

供 200 万人之用，亦巨工也。

午后 9 点半，同张、李诸友人谈俄国主义及吾人应注意之件。

6 月 26 日

9 点，同三顾问谈，革命者应具之条件：一、曾受压迫者。二、有普通知识者。三、受特别训练者。

是日来一女助手，曾充女教员，现为共产党员，约定每日来寓工作 8 小时。

9 点，读《莫尔斯传记》，知其每晨 7 点半，入室做工，午后 5 点始出，数年如一日，未尝间断，此其所以为名画家，为电气发明家也。余年已老大，百事无成，顾及身世，悔恨莫名。由于无恒者半，由于浮躁者亦半，再不努力奋勉，恐将徒使此生悠悠荡荡，在世界白走一过，岂不悲哉？

6 月 27 日

午前，三顾问来，天极热，汗流浹背。未几，阴雨凉风至，顿觉爽快。

午后，画师来教画，余绘魏凤楼像，极不似，亦以数友闲谈不静，故也。

6 月 28 日

早 7 点，三顾问来。晚拟搬至西边新租屋。

6 月 29 日

早 7 点，移至新租屋。午后，付房东洋百元，以便整顿各处，并修理厨房之用。

晚，接张之江电，言经济困难万分，是真可为焦急也，奈何，奈何！

6 月 30 日

早 7 点起，默坐，神定，只听鸡鸣声、火车声如断如续，旋思马路修理也，房舍建筑也，汽车厂整理也，飞机厂创立也，自来水扩充也，举俄之所谓百废俱兴者，果何故也，是有发动之机

关在，发动之机关为何，党是也，党之功用大矣哉。

本日读书，未外出。

7月1日

早起，天凉，与女助手规定工作办法。本日仍在寓看书学画。

7月2日

本日规定研究语言办法，并拟请三顾问来讲政治。念及国事日焦，焦灼殊甚，无已。画像两张，终难耐烦也，又阅书一本。

7月3日

早10点，三顾问来，谈党之组织及军队与民众合作要义。午后，三顾问为讲“政治训练组织图”。

7月4日

早起，觉周身冷痛。

12点，军工联合会开会，余未到。大睡，稍愈，起坐树下，又受凉，夜间更发热矣。

7月5日

天极凉，余因病，未外出。午后6点，医生来，服药二剂。昨接刘郁芬电，言甘肃事，余心中异常念念也。

7月6日

早9点，腹动始泻，倍觉清爽。午后4点，徐季龙同其眷属来。

余思世界政治之腐败，未有如中国者，无共同之目标，无确实之主义，纯为权利是争。如13年天津之分炮，14年天津之争占物品。他如争天津之位置，争陕西之地盘，靡不其视眈眈，其欲逐逐，以和好团结始，以猜忌攫夺终，可胜叹喟。余在张垣时，适天津作战，饱受此种压迫，于是心灰意冷，决定从此不复再问国事，又恐日久忘之也，特志于此。

7月7日

天凉，有似北京之秋季。早起，念及国事蝸蟻，未起。

10点，三顾问来，因将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请余回国组织西北总制府事告之，三顾问以事关历史，余因将国民军之历史，为详细说明之。

7月8日

本日依医生言，休养终日，看“西洋画书”及“人类改进”二本。

7月9日

早10点起，读《清史纲要》。

早饭后，三顾问来。

午后6点，徐季龙来。

又接于右任电，均劝余归国也。

本日身体仍发热。

7月10日

早9点起，阅《日俄字典》。

10点，三顾问来，谈帝国主义之意义。

午后，何秘书其巩来，与谈民国以来，内乱迭起，皆北洋派为之祟也，如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王怀庆、曹锟之流，所以敢于反抗革命者，无一不恃北洋派为之后盾。然北洋派岂竟无一、二优秀者乎，是又不然，吴禄贞、张绍曾，均革命急先锋也，王金铭、施从云，均革命实行家也，又何莫非北洋派，乃以杀以逐，志不得遂。其非北洋派人物而努力革命者，则更屈指难数，如孙总理、黄兴、熊成基、秋瑾、吴稚、彭家珍等，均挺身以与满清及其走狗相搏击，演出轰轰烈烈之革命事迹，只因民众不为援助，卒致伟业难成。死者死矣，败者败矣，缅怀先烈，殊深哀悼。推原其故，是皆国民智识欠缺之过也。果国民之智识健全，则北洋派必不能长此作恶，先烈亦不致饮恨千古矣，国民，国民，可不速醒耶？

7月11日

早6点半起，见室内各处之整洁，实不能不钦佩女助手之勤劳，中国人弗如也。

午后1点，三顾问来，谈我军战况，余以守南口为大误，盖备前则后寡也。

7月12日

早起，作“养蜂老人记”。

午后3点，同德全等到莫斯科参观皇城。先到军械堂，内储自12世纪以来各种战器，大枪与来福枪，均做成花形。继入一室，陈列有手杖数十种，有象牙鹰，系日人做，每一毛为一象牙，极精致。有中国绣货，大绣“万寿大喜”四字。瓷器有中国、日本、意大利者。衣服有多种，全身串珠者，平金绣花者，主教所用也；腰细，下长一丈余者，王后所用也。

后到礼拜堂，历代俄皇陵寝在焉，壁上多13世纪、17世纪之绘画，革命时代，多有损坏，是可惜也。7点半归。

7月13日

早起，读《甘地传》。

8点，阅报，载长沙已为唐生智克复，叶开鑫败溃岳州，又载国民军与敌对抗南口情形，余终以无主义之军队，决难长久支持也。

7月14日

早起，读《甘地传》及艺术书。

午后1点，徐季龙来，谈明日归国事，余因送以川资。

7月15日

午前9点，同二顾问谈军事、政治。

午后3点，到国货店购物，并送徐季龙归国。嗣到照相馆，余摄影三，同德全摄影一，又同全家摄影一。归来，已7点矣。

7月16日

早起，看艺术书及“唯物论”。

12点，同德全见教育委员会长，谈俄国教育情形，知俄国旧日之教育，以贵族为主，今日之教育，以民众为主；昔日之教育经费，年仅3万万卢布，现已增至36万万；昔日读书者，仅占全国人民50%，现则增至60%。土耳其人不好读书，只由劝导入手，不施强迫。成年教育，对工人及红军帮助极多。男女教育，一律平等，对家庭妇女，则多利用夜间补习教育办法云。

7月17日

早起，因头被蜂螫，甚疼，施以碘酒，稍愈。

现在多以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东方文明极有价值，是大不然。美人以东方文明为数千年有皇帝也，而袁世凯之称帝，由之以起。又以西方文明为物质，非道德，亦为非是。夫物质有何害？同享乐利，是大同之盛规也。东方文明，固为道德矣，然对一己则骄奢淫逸，而对他人之贫苦则弗问也，对男子则许侍妾满前，而对女子则仅出门及放足，亦不许也，所谓东方文明之道德者，又果安在耶？

7月18日

午前11点，参观艺术博物馆，内有移民途中病死画，幼儿拉车画，皇帝杀子画，二子已死，妇人哭泣画，皆富有刺激性，足令人触目惊心也。

7月19日

午后7点，看电影。俄京设有电影审查委员会，各种影片审查以后方准演映，此关于人心风俗者甚大，洵为当急之务也。我国政府，无此组织，诲淫诲盗，置之弗问，伤哉！

7月20日

早起，告赵君等往接于右任先生。

午后9点半，往车站。

11点，开车往列宁格拉^①（圣彼得堡）。

自3月20日至于今日，恰为4个月，日记未有间断，虽每日记多记少不一，然于“恒”字上似无欠缺也，嗣后务以不骄、不傲、不惰，能静、能思、能细心用功为要。

7月21日

早7点半起，见车渐行渐高，路旁树木极密，小树尤多，间有房舍，点缀生姿，忽而青绿丛中瞥来一红衣童子，此诚一幅天然画图也。

10点余，自车远望，上有烟云缭绕，下则烟筒如林，电灯照耀，光彻空际。同行者指谓曰：列宁格拉〔勒〕不远矣。

11点，到车站，海、陆军将校皆来接，嗣同参观海军，街道宏阔，路极整洁，车辆杂沓，往来如织。至码头登舟，往一小岛，则掩护列宁格拉〔勒〕之要塞也。

旋同海军委员会参谋长用早餐。毕，参观潜水艇、鱼雷船、无敌舰。再前观炮台，则大彼得铜像在焉，手持军刀，巍然挺立。窃念彼得，一旧式之皇帝也，尚能潜出国外学习工艺，以图改造国家、社会，今何时乎，不学做工，其何以挽回吾国之颓风哉！炮台系旧式者，较之我大沽口者尚逊。

晚回列宁格拉。

7月22日

早起，凭窗外望，见公共花园，花草整洁，坐位遍列，一任游人或坐或行，随意赏玩。初不似我国私人花园，不准他人前进一步。一公一私，判若天壤，此事关系社会教育甚大，苟欲改造国家、社会者，对于此点，不可不注意也。

11点，同三顾问参观皇宫博物馆，有石器、铜器、瓷器、地毯及毛织、丝织各物，波斯古物，兵器、灰甲尤多。宫内有黄金

^① 即列宁格勒。

客厅、白银客厅，俄皇之穷奢极欲，可以见矣。后有金宝库，陈列数千年前之古金物，多系由乌克兰及西伯利亚掘来者。

午后3点，与报馆访员谈南口战事。

昨捷任斯克^①死，以电唁之。捷任斯克，俄国一伟大革命家也，两次入西伯利亚狱，一为5年，一为两年半，1905年，又为俄国警察所获，逃去。1907年，再被获，再逃。1908年，三被获，由友人以巨款赎出，1909年，四被获，越7日，又逃出。1912年，五被获，罚苦工3年，又逃莫斯科。1916年，六被获，遂送审判厅。1917年，革命告成，任特别委员会长，兼充政治部候补员，为人性情慷爽，艰苦卓绝，在交通工业，多有建树，而今无矣，缅怀英风，能无慨慕。

5点，到工人自修所，起居饮食，均颇优裕。

6点，到野外树林内，见有石狮二，余坐其一，而绘其一焉。

10点，到车站，是即前往波兰者也。行5里，到路加车站，又换小车，到营幕地。

本日，对妇女之高底鞋、红嘴唇有感，作白话歌一首，以讽彼所谓新式妇女者：

不堪往事溯前朝，
男儿强健女儿娇，
既裹足，又缠腰，
颈上腕上带金镣。
而今男女呼平等，
却为何口染胭脂鞋底翘。
我们改造文明国，
此种恶习应取消。

7月23日

^① 即捷尔任斯基。

早7点，会炮兵高级团团长及政治代表，并同到俱乐部用早茶。

余右足掌疼痛，延军医长诊之，即步行到车站，乘小火车，到炮兵射击场，观其射击指挥官，用电话或炮弹指挥之。又参观机器厂。

午后2点，归幕营地。7点，到路加车站。8点，回列宁格拉〔勒〕一号苏维埃房。

晚间不能成寝，因拟一封“本国政治改革计划大纲”列左：

一、人民太苦太贫，应由国家尽力辅助之，使每家至少有一万元之财产，以便改良其现在不合卫生之衣、食、住。

二、富家最易骄淫，亟应限制。凡有百万元以上之产业者，百万归其所有，其余则全移归国家或地方，办理教育事业。

三、富家如自愿将自己所多（100万元以上）之数，呈缴国家或地方者奖励之，其有逃匿国外或将款私存外国银行者，则取消其国籍，或处罚之。

四、各项外债，则审查其用途，归还之。

五、凡自愿取消不平等条约者，均视为友邦，其自愿取消不平等条约，并帮助取消他国对我国之不平等条约者，则以最惠国待遇。

六、铲除资本教育制度。

七、新中国之建设，须积极趋向科学化、机器化、电气化。

7月24日

8点起，见窗外有工人四五百名，在大礼拜堂前操练。而各地张有墙报，既能沟通上下情愫，且可增加平民智识，是法尤佳。

11点，参观本地苏维埃，是即苏俄第一苏维埃，亦即劳农革命发祥地也，继往铁工厂参观。

下午6点，刘汝珍等7人来，系由国民党送入东方大学者。

11点，看一司令打球，毫无官僚习气，良可钦也。

7月25日

昨夜连醒三次，梦寐为劳，精神颓丧已极，想系懒惰之故，自是立定志愿，一利他，二真诚，三忍耐，四宽大，五救济贫困无告者，六不背后议论人非。至一己衣、食、住之丰足，在所必戒，而他人之非笑辱骂，甚至危害生命，亦不之顾也。夫以耶稣之慈，而被钉死；武穆之忠，而被陷死；林肯之热心解放黑奴，而被击死；列宁之努力社会革命，而被刺死。自来君子少而小人多，吾人果欲为人类社会做一番伟大事业，未有不遭反动势力之忌刻与陷害者，然果为救世、救国、救同胞，以与一切恶魔宣战也，是为义耳，虽死复何惧哉？

8点，刘汝珍等来谈。

11点，同三顾问参观联合教导团，内有韩人、芬兰人、尔加人。闻英国工党代表，现充国会议员伦斯伯力到此，往见之，且见其二女焉。

晚8点，归旅舍。

7月26日

早7点半登车，向莫斯科行，经过极大之树林，与广阔之麦田。晚9点半，到莫斯科。

11点，到察里岑傲，接张之江、刘骥、唐悦良来电，报告国内情形。

7月27日

昨晚当夜雨静坐时，写“游列宁格拉记”一篇。

早7点起。11点，邓同志建中等来，谈往航空学校参观飞机事。

午后8点，三顾问来，谈托洛斯基对白军宣言一段，并略道其生平。余前以托洛斯基为一缝工出身，想无甚多见长之处，今闻三顾问言，始知其系一大文学家、大科学家、大演说家，且兼大军事家也。嗣托克拉夫来，购《托洛斯基演说集》一部赠余。

7月28日

早7点起，饭后，绘列宁画像。

午后6点，于右任先生来，谈总统制不如委员制。

7月29日

早7点半起，饭后，看书画，又看孟宪章著《世界最近之局势》一书，系黄膺白赠余者，叙述上次世界大战之因果及经过，条分缕析，确为军人应研究之书，惜余未早读也。

晚经车站，闻工人在公园作乐声，因思及我国劳工之牛马生活，不禁感慨系之，爰作诗一首以见志：

俄京公园军乐作，
车上闻知心甚乐，
羨他男女皆平等，
无论老少均有托。
我们亦是一个国，
重层压迫被束缚。
谁是人类真救星。
打倒强权扶小弱。

7月30日

早饭后，看《经济学》。

午后3点，参观砖窑。

7点，看《经济学》。

8点，三顾问来，谈美国已不承认北京政府代表中国事。

7月31日

早饭后，看《经济学》。12点，同三顾问进城。

归来，购小车玩物及书画、杂志等，共用洋148元。近来余用钱太多，殊为非是。夫俭为美德，前闻山弟言，伊在论〔伦〕敦时，遇一留英浪费之学生，剴切劝之，该生悔悟，卒以其女兄妻之，是可见俭德为人人所赞赏者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余以

后必力行节俭，以免近忧为要。

8月1日

本日天气极热，因适为礼拜日，故街市游人极多。

11点，三顾问来，谈“东方”、“中山”两大学同志回国事。未几，陈天秩同生儿、东儿来，余亲笔写四条，告东、生两儿。

8月2日

早7点起，写致毛以亨信一件。

8点半，三顾问来，谈苏联宪法。

午后1点，画海、天、二舟，又绘列宁像。

3点，德全同幼子等赴城购物，余出游，领略村外风光。

7点，三顾问来，言接加大使电，二、三军又有北投我军者。

8月3日

7点半起，思及回国以后，当以军事、政治、财政三者为急务，而社会改造，尤为根本要图。

11点，刘伯坚来，谈俄国革命成功后，多数党员，为工厂事，各有意见，终将列宁主张通过，一致拥护。

本日，余之救国、救民、救世界之志愿，甚迫切，当勇猛直前，以促其实现也。

8月4日

早7点起，阅“第三国际书”。

9点半，三顾问来，与谈我国内争事。默想我国数年以来，干戈不息，无非升官战争、发财战争、直皖之战，直奉之战，南北之战，莫非为争地盘，谋私利也。其为革命战争者，仅有国民革命军之北伐，及国民军之讨吴、□^①而已。

午后1点，德国电气学生王君来，谈德国人民，勤苦耐劳，遵守规律，极藐视中国人云。

① 指张作霖。

8点，三顾问来，谈余归国办法及日期。

8月5日

早9点半起，阴雨极凉。饭后，看“世界最近之局势”。

午后1点，绘军人像二，一为伤左腿者，一为缺左手者，亦富有警戒意也。

8点，三顾问来，谈临回国时秘密与否问题。

8月6日

早4点起，因眼疾，又休息，直至9点始起。

10点，于右任先生来，言对拒贿议员已有相当联络事。

余自思我国人物，多有英雄观念、忠臣观念、高士观念。英雄观念，失之骄傲；忠臣观念，失之愚直；高士观念，失之狂纵。是皆非福国利民者也。惟有努力革命，以解放民族，拯救同胞，是为国家第一等人物。

午后4点，李同志等来，谈中国与苏联之比较。

8月7日

早饭后，登汽车，往莫斯科。

11点，到苏联国家银行，接洽款项，詎料未带手章。粗心如此，其何能担承国家大事耶？

12点，参观图书馆，经理者尽为妇女。又到民族博物院，组织极好。中国民族部，尚有小脚、红鞋、烟枪等，真为我民族之奇耻也。

午后1点，到澡堂沐浴，闭门即洗，洗后始有送手巾来者。其他不适当处甚多，足见凡事贵有经验也。

2点半，由铁道南归寓，遇有支布棚而卧者，发黑面黄，前曾在列宁格拉一见之。彼辈专营跑马、唱戏、偷盗、跳舞诸事，资以谋生，是亦世界民族中之可怜者。

5点，因多伦战事胜利，加大使特来电致贺。

8月8日

早饭后，发信件。

下午3点，陈天秩携上海报来，附有沙基惨案图画，阅之殊令人怵目惊心也。

8月9日

早饭后，思索张垣战事紧急，不知究竟如何，不胜焦急之至。

11点，于右任先生来，言援陕事，当与国民革命军一致，但宜缓不宜急，须斟酌情形规定，此言深为有见。

下午6点，接张之江电，报告多伦已战胜矣。又接唐悦良电云，不日京汉方面将有对吴之大变化云。

8月11日

11点，德全往莫斯科，午后回，买一新皮夹来，极佳。余近来怠惰日甚，德全不劝余，余复辄自因循之，是真不足为也已。

是日，看戴东原人民死于法死于理之说，极佩卓见。

8月12日

今日天气极佳。南口战况，不知如何，甚悬悬也。

午后1点，参观造纸厂，由开始制造以迄完成，历历观之。毕，到车站旁小花园游憩。

4点余，回察里傲岑寓所。

8月13日

10点，同德全乘汽车到戈别乌医院，为小儿种痘。余到皮货店，购多合一，价极昂，未免近于奢侈也。

午后，接张允荣信，内多规劝之言，洵为良友。

余近来骄心渐盛，雅不欲闻己之过失，又多疑人，多猜忌人，是真余之短也。今后吾当真正觉悟，权位在所不争，名利在所不计，惟以解放国内被压迫同胞，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为职志，此外手不释卷，以讲求学问，准备知识，尤为至要。

本日拟办之事为：一、果木树照相。二、各花园照相。三、一女工照相。四、各车样照相。五、土豆照相。六、小学生照相。

8月14日

早饭后，静坐，研究戈别乌（内防处之义）之组织。

午后，画像三张，因太速，多不类。

本日余心太浮，仍是少学问、少修养之过，誓有以克治之。

8月15日

早起后，三顾问来谈。

午后1点，到城内见翁同志，均为回国事商办法也。

8月16日

午饭时，邓处长由列宁格拉来，谈飞机事。

午后7点齐集，同往车站。12点到合作社，给儿辈购点心及糖数匣，下午3点归来。

8点离家，往车站，自是与德全及儿辈暂别矣。10点，开车东行。溯计余到莫斯科以来，共三足月，所接见之人极多，如农人也，工人也，文人也，武士也，妇孺也，领袖也。总之，无一不实行工作者也。

（录自《冯玉祥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文中注释为原书所有）

刘伯坚同志自库伦报告

（1926年9月8日）

我与冯玉祥同行到库伦已三日，因为许多事都在积极进行，不能立即得到结果，故今天才做报告。我在库伦所进行的事件之最大者撮举如下：

一、促冯电催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速派孙、东两大中国学生40人（内派女同志10人）速到国民军中工作。此事冯完全同

意于我，但是俄顾问主张只来 20 余人，将就我在莫时所提出的名单，再加上几个女同志，这还是我同他力争的结果。他初先主张只来 20 人，他的理由：一因莫地中国同志们均未成熟，不能多派人；二因国民军退守包头、丰镇，政治工作的范围较前缩小，其实都不是有力的理由。

二、建议于冯请求职工、农民、妇女三个国际各派一同志到国民军中作工、农、妇女等运动指导人才，并向第三国际请求转派英、法、德三国共产党党员各一人到国民军中作指导研究国际问题的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他们本国的分析。前一项俄顾问完全同意已去电请求。后一项俄顾问只同意派一人指导国际问题的研究便够了，而我则以为一人研究国际问题，不如三人分门研究之较为深切。尤其要趁机会多参加外国同志到国民军中去，使国民军全部都渐次有世界革命的知识，进一步渐次国际化，同时是应付国民军政治工作之扩大。

三、建议于冯在国民军中办一政治画报，由苏联方面聘请美术家二人，由中国方面聘请我们的同志三人共同主持。又，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处就中选择二处出两个日报，作为国民军的机关报（冯在莫时曾向我提及过，我在此时促其实现。但不说明是国民军机关报，这是冯一再告诉我过的），其计划由冯电请独秀同志（另有信说明由苏联领事馆转）办理，以后一切均听其主持。关于前面所说由中国方面聘请我们的同志三人，必须把吴潮铭同志（去年由东大回国的）派来，余二人也要找比较高手且有政治头脑的。

四、聘请俄、德医生各三人，指明要共产党及财政顾问一人。

五、连日教冯及其重要官佐学习开会，共五次，都是我作主席。就中解决事件甚多，其最重要者为对外宣言。宣言共有七种：（1）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军共同对全国民众的宣言；（2）国民军对全国民众宣言；（3）国民军对全中国工农妇女的宣言；（4）国民

军对全中国革命团体的宣言；（5）国民军对全中国军人的宣言；（6）对本军的宣言；（7）冯玉祥个人对全国民众的宣言。此外，还有忠告吴、张、阎、孙的忠告书（这是冯的意思）。因此组织起草委员会及审查委员会，均有我参加其中。

六、与外蒙国民党中央接洽，讨论内蒙革命工作及国军对外蒙应采取之态度，并介绍他与中英^①兄发生关系，与内蒙国民党接洽（内中有一同志叫作佛鼎，是蒙藏学院的学生，曾在北京加入 C. Y.，很明了，有工作能力且极忠实，他不日即去内蒙工作，在国军区域以内，望钟英^②兄要加多力量注意内蒙工作），讨论在内蒙工作的方法及考察其现状。

（录自《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1926年11月3日）

冯玉祥回国宣言

（1926年9月18日）

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惟不自量，力图救国；无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的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的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

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有人开辟了道路，我们只是照着他的法子做，便有出路。中山先生说得好，行易知难，我既是知了，自然是刻不容缓的马上干起来，又因最近的中国的国民

①② “中英”与“钟英”意同。——编者注

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比前更利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已，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浩然鸣高，来的时候也不是什么东山再起，现当回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特掬诚以告国人。我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逢着庚子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结下辛丑条约，我受了极强烈的激刺，愤政府失政，改革的思想于是萌芽；后来受了革命影响，也形成了推倒满清的志愿。辛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渠诸同人同王金铭施从沅白亚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梁州之役，不幸为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及诸烈士即时遇害，我和张李张韩，均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民国以后，我又出来治兵，苦力经营以成陆军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凯叛国称帝，我在四川抗兵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民六张勋复辟，我正去职养病西山，力疾到廊坊，先马厂誓师而起兵，进攻北京击溃辫兵。民七南北军战于长岳，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牵制南下之师。民国13年，曹锟贿选窃位，吴佩孚骄纵暴横，用武力统一政策，以乱川扰粤，而直鲁鄂豫受其直辖，为祸更烈，并逞其凶残惨杀工人学生，尤为国人所共弃；后来又动全国之兵攻打奉天，穷兵黩武涂炭生灵，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的行动，遂率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这一次的意义，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人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用免兵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的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的局面；当时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标榜，我们看着他遭过失败，养晦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当临时执政，以便作解放民族的事业；不料他出来之后，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郎案，使国家受莫大的损失，国人至今痛心，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的压迫，弄到后

来演成三一八的毒杀案了，枪击学生，出了极暴烈的惨剧，政府成了杀人政府，岂有再拥护的余地，所以又有倒段之举。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的路线上作的，他人不知，乃斥我为几次倒戈，责我为惯于逼宫，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为述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真是有点革命的癖，无论是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做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不对，就得革命，无论他是亲戚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众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吴佩孚张嘴闭嘴抱守的纲常名教，尽可由学究们放在故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 20 世纪的民主国里害人。但是有一层，我虽然作过几点革命事实，我却没有鲜明的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点两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作法，我也赤裸裸地说出来。好是国人知道我所作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其原故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就是革命观点上说，过去的我，若说是一个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佩，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不意当时有人说我是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那里够得上赤化，不但骂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赤化，骂我的人，也不说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致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的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若对于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与之亲善，反去巴结以奴隶待我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的心理？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至于吴佩孚乱造谣言，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荒唐之语。我向来是痛恶卖国军阀与外人结密的，岂有躬身自踏之理？苏联把种种不平

等条约都自动的取消了，那里有再结不利于中国的条约之理？况且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屑作这种鬼祟的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能久于瞒人，什么密约，什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若说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有所怀疑，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的事都作不出来。吴佩孚肚子里比谁都明白，他明白冯玉祥不是一个结密约的人，无论如何作不出这种事来的，他又明白离赤化离得很远，够不上带赤帽子，而他偏要说什么密约，又是什么讨赤，完全是骗人来共同反对国民军以泄他自己的私愤。大家不知道，随声附和，实在是上了他的大当，吴佩孚先是号召所谓讨贼战争，后来忽又变而为反国民军的战争，国民军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让步，谁知你越让，他越攻。军阀何以如此的强呢？军阀本身实在无力量，乃是帝国主义在背后主持，因此我们知道要想战胜军阀，必须先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人及一切受苦难的人，为什么这样穷，这样苦？就是帝国主义者所给的，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于是中国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陆军的驻扎，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的海关，强制中国协定关税，压迫剥削，不一而足。例如关税，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国国库少收入，整理财政，从无着手，有最大的害处，是在阻碍中国工商业之发展，制中国经济之死命，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其价在三万万两银子之谱，赔款及外债本息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是 9800 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所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各地银行纸币，所吸去的大批现金，更是无算，又因关税不自主，不能保护国货发展，致使洋货遍中国，吸去的银钱又不可胜计，如此中国只得困穷，而且穷到现在的地步。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的侵略陷中国于危境；东

交民巷的使团是何等的强狠，稍微明白中国的政局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对于中国内政动辄加以干涉。如去年大沽事件，干涉国民军即是一例；其最利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又嗾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15年，年年都有战祸，已经被他们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及一切民众，穷的穷死的死，其原因都出于此。

苦痛的来源已经求出来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苦痛，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筑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深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的团体，共负革命之责任；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各阶级之利害，均极力顾全，意义是在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生命的危险，与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为解除。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员，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由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用集合的力量，履行就是了。谨此宣言。

冯玉祥，中华民国15年9月18日

（录自《向导》周报第177期）

蔡和森自莫斯科给守常^①同志信

(1926年9月26日)

马二先生^②此时谅已抵包，不知兄已晤见否？伊在此进步甚大，颇可乐观。与伊同行的有俄顾问桑古斯基及刘伯坚同志，刘系马二自己请求其回去者。于髯^③在此与马二接头结果颇佳，于先马二起程一星期，想已先见之矣。于与马二接头之主题为国党与国军之关系。此间要人意见：（一）此时国军工作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西北政府（季龙计划者）固不需要，即国军与国党之联委（于提者）亦不需要，二者关系之形式即为国民党一二受命之中央委员与冯个人之接头。（二）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职权。以上三个原则，系根据广东经验，望兄特别注意。初步工作，须处处应用此原则，至将来第二步工作之形式怎样，应看将来具体情形而定。冯要此间（孙、东两大^④）为之准备工作人员四五十名，此间要人及弟意见以为此间同志皆甚幼稚，不宜多去，待冯再来电请求时，只选派最少最好者前去。弟意国军工作人才应注意下列来源：（一）在国军本身中养成大批工作人才。（二）择一部分在粤工作过的最好分子。这样才不至踏粤覆辙。伯坚颇为冯信任；但伊政治能力不够，又少经验，弟颇担心，望兄特别注意。桑顾问为人颇小心而客观，望兄与伊

① 即李大钊同志，守常是李大钊同志的号。

② 马二先生即冯玉祥先生。

③ 即于右任。

④ 指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

（桑）保持一种密切的接头，伯坚常在桑指导下当可不至损事也。

（录自《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注释为原编者所加）

冯玉祥给仲甫同志信

自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声浪传到东方，先生就最先觉悟，站在前面领导工农，从事于阶级争斗，数年来身历艰险困苦，始终努力奋斗，实在令人敬慕。我在莫斯科看见你的革命理论及种种发言，都是非常正确，而且各种主张又是极其持平，我读了之后，越想越佩服。

我本是一个革命者，不过太无学识，所以从前所作，只有几件革命的事实，而无具体的进行。我到了苏联以后，才恍然大悟，所以我现在毅然归国，从事于革命工作。因为彼此是革命同志的关系，所以我通信于你，并且有以下的要求：

一、物色政治画报的人才三人，到国民军中办一政治画报：（一）请尽可能的迅速为之找得，（二）找得后请即启程北来，（三）来法：a，由上海搭轮船到海参崴，由海参崴搭火车到乌金斯克，在乌金斯克与国民军办事人戈定远、倪继昌二人接头，坐汽车到库伦。——在乌金斯克找戈、倪的法子，是到卢布蒙政府委员长义耳巴洛夫处转询。b，一路的盘费归国民军担任。c，从库伦到国民军有驻库国民军办事处招待，预备汽车通行。（四）此项人员到西北作工，国民军因经济困难万分，只可供给生活费，不能供给薪水，物质上的供应甚是缺乏，生活苦一点，所以你物色人的时候，要找最觉悟最热心的同志。（五）他们从上海起程北来时，请将政治上的出版物、社会科学及各种书报，尽可能的尽量带来，每种各带数十份，并请以后各种出版物均行订购，源源设法寄来，

以供应用，物价由国民军担任。

二、就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地方，任择两处，办两个报馆，作宣传的机关。（一）请你代为计划。（二）报馆组织要极简单，经费要极节省极少。（三）请你就北京、天津、上海各处物色当地人材，就地办理。（四）此种报纸主旨是在为我们宣传，但是表面上乃是一种普通日报，不要使人知道是机关报。（五）筹画妥当后，请你告知我，有了切实的办法，我就汇款去开办。

三、请你以后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时常不断的来信，指导我们的工作。

以上三个请求，恳你费心办理，盼望早点给我一个答复。

（录自《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

冯玉祥回国后之国民军*

自国民军退出南口后，一军损失非常之大，几于完全溃散，纪律毫无，烧杀掳掠亦所不免，幸下级军官尚能稍稍制止。但因无首领统一不起来，有一俄同志且被乱军杀死，只方振武之五军尚能整兵而退。冯回来后，幸把国民军之溃散难关免过了。冯偕徐季龙到莫后，刘同志曾代表华人协会前进报几个团体往见冯，逐渐与冯、徐亲近，谈话日洽，渐涉及 KMT 问题、CP 问题。冯徐要求他介绍 CP 与之谈话，他乃介绍和森同志去作了 3 天报告。冯召集部下将领共听报告之后，又让众人自由发问，结果颇好。冯实际观察俄国农民生活情形，知道俄国对于农村工业化是有办法的，对于俄国情形亦渐了解。冯很注意许多细小的事情，如见莫

* 据文后附录判断，此文为乔同志的报告。

斯科街上有乞丐，发生何以共产主义国家亦有乞丐的疑问。见莫斯科城中建筑工事不辍，而赞美为兴隆现象。自己又尝亲入工厂作工，因其虚心好问，故住莫日期虽浅，而所得颇多，且甚切实。从此与刘同志感情日愈融洽，因要求他同住。谈到左右派问题，冯以为如我军中有左右派冲突，岂不破坏了军队的统一。经刘同志解释，虽明白而不甚深切。冯以后遂坚决要求刘同回中国，沿途在火车中日谈话3次，每次1小时半。所谈为中国国民革命问题、世界革命问题、苏联状况等。冯在莫受俄共党影响甚深，所以对于中国CP也特别注意。冯到上乌金斯克时，在树林中与他谈话，得见中国CP五年来之主张，非常满意，对CP更深一层的认识。冯到库伦后，已闻国民军退出南口。消息到五原后，诸将来会，向冯痛哭。冯谓过去一切皆我之错，我现在是有办法而来，你们仍在我部下作工。

当时推冯为总司令，冯要于任副司令。但于谓我不知陕中将领是否革命，如我任职而归，恐将领向我要饷要械，我无办法，故暂不接受，冯因此亦不强。冯、于在五原分手时，关系均十分的好，过去猜疑完全消灭。

总司令部下设政治处，主任留给KMT派来的人。其下设三部，组织部为张允荣，宣传部为刘同志，总务部为任佑民。处长一职在KMT人未来前，以张允荣兼。KMT的组织，最初成立一最高党部，在五原加入者有千余人。

五原就职后，冯便至包头。到包头后，见该地哥老会势力极大，其将领假造哥老会会章示冯，其中颇有革命条款，愿奉冯为龙头，冯已允加入。刘同志劝其谨慎，加入已经很够，不可再作龙头，为人所利用。冯当时未允，退后深谈，冯已不坚持要做龙头，且把哥老会改名为革命协会。

我到五原后见冯，谈话一次。冯谈话中，第一，他说阎锡山、商震大上我当。因为他们以饷械收买我的军队，视作普通军阀军

队一样，可以购买。第二，我现有军十二三万人，实际精兵仍有7万人（南口之损失是骑兵、炮兵、甲车等）。现在械弹尚易得到补充，惟给养月需200万，实属无法。甘肃月可出80万，粤允出60—100万，现尚差40—80万，只有向包绥区取。惟最困难的是要现洋，因此我不能同阎、商翻脸，不能不向民间征取粮食，而征取粮食又须天天与匪打战。第三，问到军事情形，是否可到陕西。冯坚决地说，问题不在现在解西安之围，而在解西安围之后，我深知二军性质，今日解了他的围，明日可缴我的械。第四，说到苏联，冯极佩服，是一个国家，尤其是CP工作能干，我的学生亦如此说。我在莫时，无天不见在修马路，盖房子，足见兴旺气象。苏联党员，一听着解放被压迫民众工作，表示非常热烈，使我不能不急于回国革命。第五，我问他对CP及KMT意见，他说我看两党无差别，只是时间问题，到了时期，亦可成为一个。第六，冯现在深感自己部下之落后，而急于要人作工。

国民军南口败后，若无冯回，必溃散无疑。冯回后，兵士均自动的由山中带枪归队。一般兵士均极相信冯，谓现时我们无论如何苦，但冯有办法，一切问题都不难解决。兵士对张皆看得很轻，兵士不仅信任冯，且爱护冯，冯能拿得住他的军队，此为一切军人所不及。

军士经过冯的训练，未染土匪习气，是很好的。惟将领则十分坏，鹿钟麟虽能干而滑头，在国民军中属后起，无地位。张之江最反动，此次国民军失败，张、鹿冲突实大原因。张极崇信宗教，而反对国军与民众结合。此次国军退却时，因宗教关系颇受绥包一带天主教之武力侵袭（冯现在对于宗教已不积极的作工）。这般将领，现在都是因不能拿住军队，没有办法，不得不奉戴冯。冯也知道这般人没有办法，现在分批送他们去莫斯科学习。

冯欲立刻弄好国军，故凡他所知道莫京有的什么，就要照样建立，也要设立政治部。俄同志反对无效，只好设一内防处。冯

又设立一监察委员会，属于总司令部之下。

政治处现只一刘同志作工，本来自总司令部至各师团，均要设立政治部。老冯催得很急，于是一般投机分子、牧师、书记官等均来当宣传员，来任宣传部工作。此事无办法，只好规定这些人均是代理，有人立即撤换。

KMT 现在发展得很快，但工作人才极缺乏，因此我主张先发展宣传，不急于发展组织。

一军中政治工作，因其军士本质好，故成绩尚好，尤以冯之卫队旅（现改为第四师，师长冯治安）最好。鹿钟麟曾调各军齐集校场，试验他们背诵总理遗嘱。冯师最好，骑兵旅赵士钰部也很好。凡军官好者，其部下亦较易发展工作。赵士钰已将其子女送往中山大学，该旅政治工作较冯师更好。一军以外，二军、三军、六军（弓富魁部）多系土匪成军，不易训练。一军现时只能说，自冯回后，不会消灭，至于政治工作，现时尚差得很远。若对于现在投机之牧师及腐败分子不速谋取缔，则军士将不能分出过去牧师与现在之宣传员有何分别。

招土匪为军队，是最坏的，冯曾训令将士不可乱招土匪为兵，因土匪此时利我枪械给养而来，一遇开拔便即走散，决不能为我所用，徒然耗财扰民。

冯之言行有时表现太左，曾向群众演说，我们前在北京，应该助穷苦人，不当保护瑞蚨祥等大富豪。

于到陕后来电，谓陕军举邓宝珊为二军军长。冯回电仍要于为副司令，兼二军军长，另异邓别职。其后于二次来电，谓悔不予未入陕西时，就副司令职，故入陕难指挥。三次来电便自谓已以 KMT 中央委员名义，就副司令职。冯大不高兴，因其显有离一军而独立之倾向也。于又要入陕一军，均受其指挥，很明白的是不放心冯。六军弓富魁亦怀疑一军，而乱招土匪，扩充势力。三军亦然。冯虽严令各军，不许收土匪成军，但他们不听。真正能

战的国民军，只能算一军之 7 万及五军之 2000。余皆土匪，一开拔就溃散。入陕问题，从军事上说，由包入陕费时逾月，械弹之接济，军队之补充，十分不易。而奉军由京绥路、陇海路很易进攻。再者，冯既犹不能亲离包头五原，尚须在那边收拾整顿。冯拟改甘肃为中山省，五原为中山县。财政问题亦十分困难，在西北非用现洋不可，一时难得如许巨款，所以一军大部入陕极难。

冯对内蒙 KMT 召集他们说，我可以助你们打倒王公，但政策是危险的：（1）因过去国军与内蒙人感情不好；（2）王公与人民感情尚好；（3）冯去了王公之后，即用自己的入去接管，这种情形很易叫王公去勾结奉军来反冯，此事要使冯知道才好。

冯现又拟办一政治军事学校，名额 200 人，学习时间 9 个月，将计划交到北京政治委员会北区决定。学生尽由北方招，直隶 80，京 50—60，豫鲁山陕均有若干人。冯还希望要 15 教官，并一懂俄文的翻译。

冯入很简单，他之去俄，全是被许多难题所逼，不得不走。到俄后，自然有许多新的感觉。对苏联渐知不是侵略中国的，而是助中国的。冯首问党与国家的关系，认为国家是要一个国体来指导。

冯对 KMT 理论很少说，对 KMT 与国军关系事实不甚满意，表而是不反对 KMT，但不甚重视 KMT。冯只要有能力好的入为之作工，而不问其为 CP 或 KMT。

冯对 CP 主张认为很公平切实，他对付一切事情的态度也是节省切实，对部下自知他们落后靠不住，所以拿得很紧。将领有不听政治演讲者，则召来总司令室罚跪。冯每日均亲自向数万兵士讲演二三小时，上午 7 时起床，工作至晚间 2 时。

冯阎关系表而是互不相犯，互相亲善。冯曾派代表往见阎锡山，阎因放了孔庚，优待岳维峻，所以冯阎关系或者还好。阎现虽在大同修城筑濠，但不能决其是对奉对国。阎实力甚大，无论粮草军实均极丰富，新办之第二兵工厂较第一兵工厂规模尤大，山

西煤铁均有可供制造。

西北军闻北伐军胜利，均感觉自己不孤立。冯且谓我守住包头，可牵制 10 万奉军，不敢南下。包头一带，儿于无人不加入哥老会，小农不入会则不能生存，加入则哥老会只收其收获之一部分。哥老会之大部分仍是土匪。冯对哥老会政策，一不收编土匪为兵，二以革命协会名义羁縻之。

听了乔同志报告后的结论

冯之为人极谨细切实，虚心好问，勤俭廉洁，不似其他领袖之狂妄自大，纵容部下贪赃（如蒋的总司令部及黄埔军校），且较其他军事领袖更多懂得民众的痛苦，拥护民众的利益，所以这支军队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是极有作用的。在目前牵制奉军不敢南下，亦有很大功效。现时国民政府应尽力维持国民军能在北方存在。国民政府应知道维持国民军，以牵制奉军，即所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即所以为将来打倒奉军的预备，除充分的给以物质的援助外，并与国民军联合，拉住晋阎，抵制奉军进攻。

努力使冯于间之关系弄好，把二三五六各军均送入陕西。陕西交给于右任，以于为副司令。一军只助解西安之围，而不留陕，由 KMT 及 CP 助于整理陕西工作。

对于蒙回民族问题，须告冯有适当的解决，应尊重这些少数民族的权利。对哥老会不可纯用羁縻的方法，而当发起手工业工会、农民协会等组织，以渐次减少哥老会之作用。

目前政治工作人才既十分的少，不必各师旅团营均设政治部，只由总政治处集中所有宣传人员，分组宣传队，轮流在各营讲演，并且当选择最有希望之部分，集中力量去作工。

（录自《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1962年12月）

三、布勃诺夫使团与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李之龙事件经过详情

(1926年4月20日)

蒋中正

(上略) 凡做党代表及政治工作的同志学生，无论他是否共产党员，我看他们差不多平素是最亲爱的、最有希望的同志。这样亲爱的同志学生，现在使得他们完全退出来，这种情形，大家很容易明白，这内容当是种种复杂离奇的，我要讲也不能讲，为什么呢？这是差不多是和法国大革命经过的一段情形相同的。政治内容的情形复杂，是口舌所不能形容的。你们只看法国大革命史，就可以晓得这回事情。这事情中间，自然有许多人想离间我们，挑拨我们，造出各种谣言来，固然有许多间接的因果；但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我们团体不能稳固，所以弄出3月20日那天的事情。当时经过的情形，我今天约略同大家讲明一点。不过政治的内容，革命经过的事实，或是将来历史上拿我给各同志的信，及我和几个同志时常所说的话，可以证明这回事实；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会有这件事情。我是晓得各位在本校出身，这样亲爱的同志，一定想不到我校长受着这样子的苦痛，我只举

其中很轻微的一件事情来说。当3月20日事情未出之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这不革命的话，分明就是说反革命的话一样的。拿不革命的话来加我反革命的罪恶，你想可痛不可痛呢？从前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要推倒一个领袖，诬害一个领袖，没有事实可证，就拿一句不自由不平等的话，来加他领袖的罪恶，利用一般失却理性的群众，来推翻他的领袖。现在这回几乎也拿反革命不革命的话，来加我的罪名，使得我不能革命，简直不许我革命。这种情形，各位那里晓得，但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人的阴谋，我相信我的学生无论那一个，一定不会讲我是反革命的，一定不会讲我是不革命的，所以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事实。既然是少数人的阴谋，不是各位的事，为什么要各位都退出来呢？因为当时实实在在有人对各军官长说：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是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是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还有人在演讲之中，说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吗？”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怖与自卫心思，所以对于党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怀疑了，所以他们军官有要求共产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实；并且由他自卫心而起监视的举动。你们相信本校出身的学生，会不会杀共产党呢？我对于我的学生，别的话不敢说；但是一般学生都知道革命分子是要团结的；如果杀共产党，无异于他自杀。这一点理性，是统统都能了解的。为何要说这些话来引起恶感，激动风潮，使得大家不安呢？这样经过的情形，你们知道不知道呢？不过前20日的事情，如果不设法改正，我以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如何，一定有一天会发现的。如果当时我校长不在的时候，当天的情形，定是更加剧烈；但这是革命过程中一定不能免的，我们团体虽然因此留了一个裂痕，精神上固然是很大的损失，乃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不过我们今天还能够同在学校里相聚一堂，能够

讲明白当时大概情形，我以为这并不是祸，可以说因祸得福，将来可以更加团结，免除矛盾。我以为这是革命中一定经过的阶段，到这阶段经过了，才能真正的团结起来。现在我把一件事来证明外面的谣言，不是凭空而来的。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本军里或本校里，都造出一种不良空气，使得军队里的官长来反叛，并且拿利禄来引诱我们的官长。我只拿一件很小的事来证明，请大家判断这件事对不对。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有两军，广东是第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要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离叛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和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这是不可掩饰的事实。不然，为什么要留第七军在后面做什么呢？我当时看过这种情形，我就发生一种感想，是什么呢？我以为已经有人不愿意我了。如为我个人安乐计，那是我求之不得。因为这10年来，无论那一个同志，尤其是总理，总不许我离开他左右，不许我休息一个时期；而现在竟有人不满意我，并且要推倒我，那不是个求安乐很好的机会？但是我是来革命的，我是要担负革命责任的；如果有人为个人权利之见，想来推倒我，或不满意我，那我是可以退让的，决不肯恋栈一刻的。若是为此不许我革命，并且附加我罪名，使得我此生不能革命，而且要污蔑我一生革命的历史，这就不行了。又或推倒了我之后，就要摇动本党基础，使得三民主义不能实行，使得全军全校同志失去重心，没有人来领导，弄得我们总理辛苦艰难缔造的这个团体，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使得全部同志学生们因为我一个人放弃责任，而不能完成其革命的使命，使得我们学生失去了中心，无法团结，弄得军校出身的同志，任人污辱唾弃，支配一切，而本党革命光荣的历史竟为我一人灰心而来败坏，这是本校长所更不忍心的。如果这样，怎么对得起总理和各位同志？我

敢大胆的说一句话，如果我放弃责任，因灰心而去了之后，我以为不单是三民主义要受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是共产主义在广东还是不能立足。所以有人在军事委员会要留这第七军在后面不发表，使得我部下有携贰之心，并且拿我的部下来做攻击我的工具，这种威逼利诱，破坏革命纪律，丧失革命军精神，不由下面犯着，面反从上层做起，这种情形，凡是爱本校的学生同志那里会想得到呢？怎能使我不痛心？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诋毁本校不革命的言论，是公开的，大家知道，不必我说了。总之，他的用心，先暗示一般同志对我失了信仰；并且还有彰明较著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各位同志想一想，这些话是指那一个？如果我有军阀的行动，只要各位同志指摘出一点来，不要等待各位来打倒，而我必定可以自杀给你们看的。倘若他真正是一个同志，看见我有军阀行动，他应该先用同志资格来规戒责罚我的，等到我不听他的规戒，这时候他拿事实指摘出来，宣布我的罪状，也不晚啦。他若是没有旁的用意，何必胡说这些诋毁中伤的话。从前我的革命历史，各位或是没有目见；不过自前年开办本校到现在为止，这二年以来，大家都所目见的。我可以讲我自革命以来，对于本党，对于政府，对于同志，没有一件事情，是越出轨道以外的，没有一件事情，不守纪律的。不但是我自己勉励要做一个模范党员和模范军人，就是对于各位同志，亦时时以模范党员模范军人相勸勉的。难道愿意抛弃这种宝贵革命历史，面到现在反来背一个不革命的罪名么？还有北伐问题，我以为广东已经统一了，如果不去北伐，那不仅对不起总理，还对不起我们已死的同志。我们办这学校是为什么，不是统一广东就算的；乃是要北伐，就是要统一中国。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弄得军事政治，差不多都立在被动地位，没有自动的余地。这样革命，还算是革命吗？难道革命是保守广东就算了

吗？这种话在经过事实当中，虽说是不重要的话，但亦只可对于各位同志说，不能向外人明言的。因为经过情形太复杂，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这只有我个人知道，不过将来革命历史中间，一定能够了解明白我所受悲惨痛苦的情形。这三月以来，要是没有坚忍精神，没有一点忍耐心，那么，校长今天不仅是不能在本学校里同各位讲话，或者校长早已死了，也不晓得的。因为经过这些悲惨的情形，不是使人灰心，放弃他的责任，就可以使他愤激而自杀的。至于二年以来，我对于共产学生，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党代表制度，我不仅是赞成，并且是我自己所首倡的，为什么要拿我自己所首倡的制度，要由我自己手里来摧残，并且使得自己亲爱的同志学生、手创的军队，愿意拿来破裂呢？我想各位不待我说而能了解其中曲折的。还有一般人没有话可以诋毁，甚至说校长发了神经病了。这没有什么，做革命党的人，在常人看起来，以为这种革命暴动的举动，不是发神经病，就是一个傻子，所以从前遇着总理有激烈的主张，几乎没有一个不说总理不是发疯，就是发神经病的。所以这种革命的神经病和疯子，是应该要做的。以后我们要改正的事情，亦要同各位讲一讲：第一、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而且一定发生冲突的。这个冲突，无论大些小些，总是不能避免的，尤其是一个团体里有个两中心，有两个领袖，这个团体不但不能坚固，而且一定要分裂的。现在国民党里面几乎有两个主义，这种现象，一定是自相矛盾，会发生冲突的。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基础的。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认定现在中国革命的需要，是三民主义，这是无论那一个革命党员，皆能从客观而认识的，所以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而他的环境的需要，一定是三民主义，所以一定要做三民主义工作才行。第二、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两个领袖；如果信奉两个领袖，那一定是有一个信仰是假的，或是两个信仰都不真的了。不

要说我对于总理，跟随了许多年，受了许多教训，不能动摇信仰。凡是一个国民党党员看见总理照相，东歪西倒，毫不敬重，而且污蔑总理人格，抹煞总理历史，这样情形，使得一般党员见了，那有不起反感的道理？他将不能污蔑的，硬要去污蔑，不能抹煞的，硬要去抹煞，这样对于总理的人格历史，毫无损失，而且徒然引起一般党员对共产分子的恶感和怀恨，这无异他反对共产主义一样。我见到斯大林批评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实在不能不使我同抱悲愤。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做到的；不然，无论怎样讲法，只有一天分离一天，绝对不能团结起来的。今天所讲的话，不过讲些经过的大略，看见各位共聚一堂，拿我平时所不忍讲不愿讲的话，不知不觉的发泄出来了。总之，3月20日的事情，完全要由我一个人来负责的。如果说我欠缺手续，这是我承认的；但是我的本意是要纠正矛盾，整顿纪律，巩固本党革命基础，不得不如此的……（席间陈同志问李之龙看管情形究竟如何，还请校长说明）。李之龙的事情，你不问我，我忘掉说了，现在我就讲下去。当3月20日前两天，即3月18那一天夜晚，无缘无故，开两艘兵舰到黄埔来，一艘是中山舰，另外还有一艘是宝璧舰，这两舰是在广东最大的舰。当时我并不晓得他是已经开到黄埔来了。到了第二天即19日，有一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宣布——起初见面时，就问我：今天你黄埔去不去？我说今天我要回去的。后来离别了他之后，到了9点至10点钟模样，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我：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打了三次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去。当他打第二次的电话，我还不觉得什么，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的来问我去不去呢？如果没有缘故，他从来没有这样子来问的。我后来答复他说：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他晓得我是不去黄埔了，后来不到1点钟的时候，李之龙就打电话来问我说，他要调中山舰回省城，预备给参观团参观。我问他：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他答：昨晚

上开去的。我说：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因为19日10点钟，晓得我不回黄埔，所以当日下午就叫中山舰回省城，开到省城的时候，已是天黑了。因为李之龙上午的电话，我很奇怪：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因为从来开船，并没有来问我过的。后来问他：那个叫你开去的？他说：是校长的命令；又说：是教育长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说没有，是打电话来的。这事情模糊极了。等到中山舰回省城之后，应该没有事情，就要熄火。但他升火升了一夜晚，还不熄火，形同戒严。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一面派兵到中山舰去镇摄，一面要喊李之龙来讯问，因为他是代理海军局长，不得不负责任，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这事情现在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至于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但是如果真有这事情的话，我想李之龙本人亦是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他不过是执行他人命令而已。总之，李之龙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不能释放的。对于这件事情，我处置实在觉得困难，好像家里的子弟，不仅要谋陷他的父兄，而且要出卖他的父兄一样，有这么事情出来，做他家长的简直是惭愧极了，所以大家要明白我处境之苦，真是有口莫辩。要是革命性薄弱一点的人，看见这种现状，早已放弃责任走了；如果这样，还能算是革命党员么？还能继续总理的生命么？还能领导你们同志学生提起革命精神么？（民国15年4月20日在黄埔军校讲）

（录自《革命文献》第九辑，（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8年10月影印再版）

关于“三二〇”事件的报告^{*}

（1926年）

斯切潘诺夫

3月20日蒋介石反对俄国顾问及共产党之举动有如晴天霹雳使吾辈同志及军民人等为之一惊，国民革命军之工作亦将因之而受长期之停顿。欲将此事详确研究，必须综核全体，搜集材料，参考各种现象，而后能为有根据之判断。

本报告之目的，为使阅者明了此事原委起见，探索此事所以发生之各种原因，加以各种论断，并将我方行政指导人员及中国共产党因此事而采定之根本政策及因此事而得到之结果。

据蒋介石本人及他人之议论，兹事发生之近因，厥为中山炮舰由广东向黄埔之开驶。我方委员会原拟于3月19日检阅中山炮舰，但于18日至19日之夜间，海军部接到电话，将该舰开往黄埔。

代理海军部部务李成龙^①认为是蒋介石处所发之命令，未曾复查真伪，即命该舰驶向黄埔。我方顾问似已知悉此中底蕴者，立下命令，仍令该舰驶回。约于半夜之时，该舰回城。翌晨，李成龙及其他委员等，遂均以蒋介石之命令而被逮捕。

此事发生之前数日，蒋介石曾接恫吓之书信数件。18日，蒋闻中山舰始而开往黄埔、继而复还广东、停泊于军官学校之前升火待发，认为有人欲杀害自己，而此谋己者舍共产党员与俄人有

* 标题为编者所加。这是斯切潘诺夫出席广东苏联委员团共产党分部讨论“三二〇”事件会议上的报告。——原书编者

① 即李之龙。——原书编者

关系之李成龙外别无他人，故决定先将舰队之各委员逮捕。20日早9时许，复派军队将吾辈东山住所包围，解除卫兵武装，同时城内之工人机关、车站、中央银行等处，亦被包围，大萨岛亦有航空队监视。下午2时，有第五团团长来此，琪桑喀请其撤围，该团长回至城中，有顷，复来撤退包围之军队，发还军械。工人机关之围，旋亦撤去。惟其他各处之包围，22日始行撤退。20日军队撤去约一小时，宋君来此，言蒋介石此举殊属失当。李济深、邓将军二人，继至对蒋亦有责言。嗣后，琪桑喀派鄂利金赴蒋介石处，蒋百方道歉。鄂利金对蒋稍加责言，提起帕夫罗夫死亡之事。伊万诺夫斯基及鄂利金随复谒蒋，磋商以后问题，蒋允于次日至伊万诺夫斯基处商议一切。同时朱培德、谭延闿二人访琪桑喀，称蒋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此时汪精卫正在抱病昏卧，闻悉蒋之举动，亦称之为反革命。总之，全体皆对蒋表示反对。

21日蒋介石并未至伊万诺夫斯基处。由蒋处来此之各将领皆云：蒋仍旧要求驱逐俄人及共产党人。

因此，情势仍然严重。我委员会筹划解决此种情势之办法，决定将委员团之领袖更换，派索洛维也夫与蒋介石接洽，磋商此事及此事以外之各种问题。

22日，索洛维也夫与蒋介石在政治部接洽。有汪精卫在场。蒋于开会后即赴黄埔。各将领对此认为具有重大意味，以为蒋氏即非立时排俄，亦必作再次排俄之预备。彼等皆谓蒋介石对于此事业已预备一月有余也。

23日，汪精卫忽然隐匿，传闻系往医院，而各处均不能寻获。24日，政府为吾等行将离去各同志设饯予，遂得使蒋介石与伊万诺夫斯基相晤，见面后蒋仍往黄埔。26日由黄埔归来，寻觅汪精卫未获，再赴黄埔，转赴虎门。昨日由黄埔来至广东省城。

24日，吾等各同志启行离粤。

兹事梗概既已如上所述，兹再述其环境之关系暨其发生之原

因。

迩来大势之趋向如下：

- 一、自广东战事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即呈巩固之象；
- 二、一般人民确信国民政府之有实力；
- 三、一般人民确信党部政策之正当；
- 四、各个人及团体因反对而攻击国民党政治部政策者均归失败；
- 五、军队实行归国民政府统辖；
- 六、军事机关之中央军事委员会已得到统制之权力；
- 七、各机关皆从事积极工作，以巩固军权之集中；
- 八、关于建设及教育训练等事，已拟定种种之进行办法。

简言之，国民革命军现正预备成为一种强大势力，不仅可以铲除各军阀，且藉国民政府之指挥，不难进而统一中国。全国所应注意者：军队中之政治环境如能趋向良好方面，则余敢谓以上之评断决非过于乐观也。至吾辈之错误，厥为工作程序之不适当，及中国人因各人性质而造成之一种环境，遂至受人攻击。请言之如下：

- 一、集中陆军权力过速（如设立总司令部、警察厅、军需处各机关）；
- 二、监督国民军将领各机关之过甚的监视（俄顾问时常自居于首要之地位直接管理事务）；
- 三、关于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共产主义问题在军队中之激烈宣传，不尽适当。

以上各节自然难免引起各高级军官之不快，初时尚能隐忍，继则公然反对，盖彼辈尚未脱尽其军阀主义之积习也。

吾辈平时于中国之习惯风俗及礼节不知注意，虽属小失，亦足以引起中国人对于俄国顾问之反感。

中国共产党于党务之工作及军队中之宣传亦铸成许多错误，

彼等不知尽力于组织国民党默为转移，只知以显明的扩充共产党为工作之总方针，欲在各处完全把持一切指挥之权，致使国民党因嫉忌而解体。

惟中国共产党之错误，实由于吾辈指挥力之不足及欠缺联络，未能一致行动之故。此不应独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其过当双方负之也。

总而言之，3月20日之事，吾辈同志各人之个性及为此事罪魁蒋介石之个性，均有重要之关系。

关于蒋介石之个性，余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央委员会会长等观察略同，均认蒋介石为特著人物，具有特著个性，其主要之性格则为：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自谓彼不仅限于中国之国民革命，且为世界之革命云云。彼对于革命之了解加何系另为一事，但姑妄言之耳。

欲达此目的，权力金钱在所必需。然彼之金钱并不以之肥己，犒赏奖励不惜重费。又喜订购报纸，意在使人对己有所论著。维护其各种之设施，对于中国及世界上各种问题皆能分擘精详，了如指掌。其所举措并不依恃民众，完全保持个性，但为达其尊荣目的之故，有时亦欲利用民众，并利用吾辈及中国共产党。

蒋氏欲为中国英雄，而又欲利用国民革命运动，因此在右派及共产党之间摇摆不定。彼所谓之“赤祸”言论，意在迎合中国輿情，因“赤祸”二字在现时中国为大多数所注意也。

蒋氏富于决断，亦能容忍，其性情较中国通常人特为直爽，对于亲信部下所献之策常容纳之；然有时亦怀猜忌，无论何事不容与彼抗争，无论何人不容代其出头。余对于蒋氏个人之评断如此，但不能遂认为完全确实及正当耳。

吾人若将吾辈种种之错误与梦想英雄蒋氏之个人性格两相对照，可知吾辈之受人攻击为早晚必有之事。此后吾辈工作之主要问题，惟在能否排除前所列举之各种错误而已。现在，一部分之

错误已经矫正，一部分之错误将于工作之进程中设法除去之。中国共产党党员亦正在改正其根本政策上之误点。尼罗夫关于此事将续有详细陈述。

至其他主观上之要点，则在蒋介石个人。若蒋氏果有前述之非常个性，吾辈为全体事业起见，无论如何终当利用之，使为革命战斗，乃毫无疑意者也。

就喜权势而论，蒋氏将来或就总司令之职，足以满足其尊荣欲望。现时彼仅为军事委员会之主席，有时已有反对右派之举动。彼之此举，足予吾辈以联络其左右激烈分子之机会，颇有益于吾辈（按：此段原文如此，意谓蒋氏于其同志之右派中有时亦擅作威福也）。设蒋氏对于左派果欲加以打击，则于革命全局及其本身自然均为不幸。然蒋氏必不能灭绝左派也。左派既受各处欢迎，又有实力；蒋氏与此种实力相搏，适足以自取灭亡而已。蒋氏为喜尊荣及有智慧之人，必不出此，故彼自谓“因3月20日之事于学识上所得者良非浅鲜”云。彼之此举并非受左派方面之影响，实受右派方面反革命者之耸动。倘吾辈对彼灌注一小部分之革命主义，并以左派之勇敢势力包围之，则可使3月20日之事永远不再发生。吾辈于此时期造成一种不利于发生前事之情势，使蒋氏复与吾辈合作，满足其喜尊荣之欲望，并于吾人协助之中使彼得到比较现时更为伟大之权力及实力。余所拟定利用蒋氏性格以进行国民革命事业之大略情形如此，职是之故，虽对于蒋氏之政治要求为几种之让步，以为代价亦无不可。上海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此间之地方委员会皆同此见解。

吾辈政策既在利用蒋介石，则关于组织国民军一事根本上仍应采用原定方略，兹更略举如下：

- 一、巩固军事机关自上而下之集中；
- 二、继续改良军队之组织制度；
- 三、整顿军队内部生活，严定纪律，检阅军队勤务；

- 四、增高军官之程度；
- 五、改善兵士之性质；
- 六、集中军需，于各军中设立军需事务处；
- 七、各军中添设密探及联络通信之事务；
- 八、扩充各军中之政治宣传工作；
- 九、扩充航空及舰队。

以上各节为吾辈应遵守之任务，其实行步骤视环境之变化定之。

至关于实行各事，依照委员会之指令，余当拟定训令，发给各工作人员遵照办理。此后即作为吾辈工作及与中国人交接之临时章程。

（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关于“三二〇”事件后广东 情况的报告*

（1926年4月）

斯切潘诺夫

溯自上次报告以来，广东情势隐隐间似有些微之转机。蒋介石、汪精卫二人，仍旧为各方面之中坚分子。

蒋介石已发表《罪己书》。一面将各委员及共产党政治宣传人员一律免职，要求侦查俄人之居留，并规定俄人之界限。察其意态，似又略向左派演进。彼之逮捕欧阳岐，且请求军事委员会免

* 标题为原书编者所加。

其职务，尊处凉已知悉。蒋氏曾发激烈电报，攻击上海之右派集会。然此项右派会议，固赞成蒋氏对于共产及俄人为积极之攻击者也。

关于政治指导人员之问题，蒋氏未曾表示最后之意见，亦不复坚执自己之要求。地方委员会为表示出于自动起见，已由第一军团调回一切政治宣传人员及共产党员。

蒋介石本意，对于各共产党员，不仅欲监视彼等在军队中之工作，且有监视共产党本党之意向。惟对于一切俄人表面上均变为和蔼可亲，谈话之时每问计于俄人，有时且公开表示自己之意思及其所欲为之事。对于各将军亦尚持一致对外之态度，曾自吾辈从前之军械库内拨给各军机关枪及子弹。

以上所述，为广东已往之情势及蒋氏个人作为之事实。兹拟舍去事实而直述因此事实所得之结论。

综观上述各节，吾人可得两方面之结论如下：第一结论为，蒋氏诚意缓和 3 月 20 日之事，与左派联合，共同尽力于国民革命，如此则甚有益于吾辈；

第二结论为，蒋氏以上种种作用，乃欲蒙蔽反对派之耳目而预备再举。

吾人为采取第一结论，认为根本上蒋介石仍继续为国民革命之工作，则吾辈当处处迎合其意与以让步；如采取第二结论，则须预备与之奋斗。

兹无论采取何种结论，要之，吾辈之根本政策，厥为与蒋介石联络合作至最后之可能为止。吾辈纵采取第一结论，亦不可忘却第二结论也。

中国共产党亦同具此眼光，而完全赞成此种根本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谓彼离去上海之前，中央委员会亦有此种决议，以为无论如何必须利用蒋介石。

国民党左派，现时虽未完全表示态度，然事实上对于蒋介石

则与吾辈持同一之政策。

至右派方面，据此间新闻，彼等对于吾辈联蒋之政策视为不利于右派，必竭力破坏之。

兹再论汪精卫氏。汪氏至今尚未归来，日前其亲随秘书某君来此，云汪氏现在上海，病已痊，可不久将归来视事。然此言不能置信。汪曾以书信痛骂蒋氏（谭延闿所述）。谭氏又谓汪、蒋二氏虽不能免除一切误会而协调，终属可能双方之接近，正在继续进行中也。

为使广东局面得最后之安定起见，因蒋介石之提议，将于5月中旬，招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此会之前或开会期间，国共两党或可缔定一种条约。总之，各方面现在均在协调之中，期共谋国民革命之实现。

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之地位现正加以考察。

以上为广东内部政治之状况也。

军事方面，此间并无特别事件。各军队仍继续剿匪，第二军团在英塔克（译音）地方围攻某处险要（已忘其名）已经一月，未能占领，派员向列穆同志请求派拨飞机抛掷炸弹。南部亦有剿匪战事，军队之大多数皆从事于普通之技术训练，为出发之预备。

广东以外情形，尊处当已在报纸上得见。吾人4月3日之电，谓国民军将不抛弃北京，因联军内部互相仇视，张吴之间将发生冲突。国民军利用此种情形，竭力向两方面进行协议。按诸今日各报纸之所载，可断定与吴佩孚之协议较有进步，或虽非与其干部亦系与吴氏所属之一部分也。

北方之情形如此，似于北伐之进行有利。

兹论湖南、江西。据派往湖南之委员团来电，内称唐生智有与国民政府联合之倾向。国民政府（称为军事委员会较为正确）坚持唐须发表宣言，宣布正式联合，否则不与之缔结联盟。方本仁之代表已由江西来到广东省城，据云：方尤与国民政府联合。按

调查所得，方本仁尚有军队若干。今日报载方氏上海之行，纯系假托，因上海督办为方派将领一节纯系子虚，乃是政治上作用。吾辈各将领之意见，组织北伐队时，方本仁可为吾辈所利用也。

此外，广西军队约有3师，共9000人，亦可为北伐之用。

综观上述各情形加以审度，大概与吾辈有利。中国各将领，于谈论北伐时，甚至已有派遣某某军北上之具体表示。派往湖南之代表，曾向陈铭枢建议派遣第一、第四两军团北伐。此问题尚未有最后之解决。蒋介石与第四军军团长均未表示反对。

北伐军根本上之障碍，厥为经费支绌，现正设法筹款。在两三月之内，吾辈或可北发。惟希望广东内部之政治情形不发生恶化耳。

就广东及中国全部之一般军事政治情形言之，吾辈在国民革命军中之工作，均当仍旧分为政治方面的、军事方面的两种。

政治方面，应巩固国民党之统一，尤须特别巩固党中之左派而取消右派中之反革命分子。一面当从事于联合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工作。现时孙中山学会有分裂之可能。此会乃由消极派、反动派与和缓派三派组成。中国方面之议论，谓该会之一部分可使加入左翼或共产党，一部分可使中立，惟反动派则须削弱之或攻击之。

军事方面，仍抱定从前巩固吾辈工作及吾辈所建设之各军队、各机关之宗旨，具十分之力量，使军队与现政府及国民党左派坚固联络，与各军官及政治宣传人员接谈之时，应劝以永远忠于党及政府。

3月20日之事或足使吾辈灰心，但吾辈当忘却此事，仍旧尽力。凡事从远大着想，在中国人面前万万不可争长，注意礼节，谨守礼貌，是为目前最要之事。否则，3月20日之事，或恐再见也。尊处亦应特别注意于此。

前言三两月间，吾辈或须北进，因此，当于最近之时期中考

察与北伐有关之各种材料，如经济、军事等等。按照工作之区域，预备种种报告书，以期明了我方军队及邻省之情状，至将来可为反对派军队之情状，尤当特别审察。

关于斯切潘诺夫报告之问题及批评。

问：蒋介石对于俄国顾问之工作之要求若何？

答：蒋氏与吾人接谈时，并无一定表示及要求，蒋氏曾向伊万诺夫斯基指出俄国顾问许多错误。余问俄国顾问究当如何作事，蒋云：“彼等做事当如以前”云云。

问：国民政府与国民第一军有无若何关系？

答：国民第一军近有代表到此，曾为之设宴，实在结果现尚不知，或俟北伐时始表现之。

问：吾辈当如何对待云南？

答：关于云南前线，蒋介石责备琪桑克之帮助云南、广西。此事确曾保守秘密不令蒋知；然蒋业已知之，且疑琪桑克为反对北伐。惟刻下此事已不成问题，盖中国将领以均同意北伐，而同时又甚注意广东内部之政治情形。云南方面刻下之情形，不至危及北伐。

问：与孙传芳之关系如何？

答：现时并未确定，仅知当吴佩孚与国民第二军战争时，孙传芳与方本仁联盟；当国民二军倾向吴氏时，孙又取消与方联盟。窃谓此节为方氏逃往上海之原因。

问：地方委员会已否注意共产党党员及国民党党员之相互关系？

答：注意。

问：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学会之策略如何？

答：（尼罗夫之回答）现时共产党已知从前彼辈在国民党及军队中之工作均有极大之错误，不合策略矣。当初共产党人于工作时，只知利用国民党，在其覆翼之下扩大己党之力量，不知从事

于国民党之建设及注意于国民党之左翼，公然攫据国民党之最高管理机关及军队中之政治机关，包办工农运动，以此引起国民党大多数之不满。暨国民党内两极端派暨右派与共党之分裂。刻下招集全国农民会议，成立组织委员会，为顾全体面起见，拟加入若干之国民党。继知此节，不能做到，因在农民中工作人员并无国民党党员，不特右派如此，左派亦然，不特农人中如此，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各部分亦莫不然。至共产党中国同志之招揽权势，乃是一种习气，如中国之官吏将领既居要职，莫不援引其同党暨其好友（如李成龙之在舰队）。

前项情形在军队中为尤甚，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占据重要地位，遍布党羽，秘密从事于该部分长官所不知之工作，惹起各级军官及非共产党部分工作人等之嫉忌。非共产党人大部分为孙中山学会中之积极分子，多被排挤而失去优越地位。兹列举两种事实以证明之：黄埔军队各师部内 5 委员中有共产党员 4 人（军团政治部部长即系共产党）。而各团中之委员 16 人有 5 人为共产党，11 人为国民党，各连中国国民党更占多数。窃以为孙中山学会之多数积极分子，于其猛进之政治思想中，本可附合于左派，以备受倾轧之故，一变而反对共产党。至各部军官，按照其自己之官职，本应为中国共产党之管理机关，亦因不满意于委员制度之故，反对共产党。

共产党与国民党间相互关系之各问题，如无根本解决，在广东之工作殊不易继续进行。解决之法，将来应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于广东省城规定相互工作之程式，现时先开一预备会，以安慰蒋介石为最近之目的。

现时由中央委员会得到通令。该通令之内容，即共产党之主要任务为组织国民党左派，巩固左派之地位。惟刻下国民党左翼空无一人，既无首领，又无群众，应如何具体实行，中央委员会之任务尚难论及。

各项公共任务之中又有私的任务，即应与国民党左派接近，援引彼辈指导党务工作及农民运动，表面上当注意三民主义及孙文学说，勿为忽视之态度是也。共产党在广东省事实上已处于合法之地位，此后勿再为无益的秘密使国民党因疑生怖。

军队中暂时停止招募兵，由第一军团及第二、第二十各师中将共产党全体调回。此种办法，一方面系迎合蒋介石所表示之愿望，一方面则百余共产党员之有组织的及一时的去职，足以表明共产党势力之不薄弱。共产党将来仍可回归第一军团，原则上共产党在军队中当完全公开，因此拟将共产党全体名单送交各高级长官。此方法先由黄埔学校实行，以该校中共产党分子颇多也。在各下级军队工作之共产党员，应有若干演说队，演说共产党于公务上及社会服务上与国民党为同一之动作，万勿高唱共产主义使人生畏。少年军人同盟会将自行解散，其原因为军队中之政治宣传已臻完固，各军队业已秘密结合，此举足使孙中山学会取同一之步骤，亦将自行解散，乃在意料之中。

刻下孙中山学会与右派首领（吴体新及伍朝枢）（按：吴体新似即吴铁城）联盟为积极破坏之行动，由劳工改进会及学生会着手。广东学界原来皆背弃国民党者，现时因彼辈之破坏，学生运动团体业已分裂，不能达其欲在国民党青年部指导下，企图联合之计划。机械工人同盟会及广东劳工联合会改进派，亦有一部分解体。该学会等又谋破坏4月1日招集之广东劳工大会，该会出席代表人数在2000以上，破坏之举虽未告成，然竟有数百代表临时离会，竭力挽留，终归无效。此等事与迩来许多类似之事，均有吴体新之积极参加。

问：余时与机械工人同盟会相接晤，得悉该会从事于一切之劳工运动，如当小第三国际工人罢工时，曾与机械工人同盟会接洽，而大第三国际之工人，则必须使该同盟会脱离不合法的团体，是以尚无合作行为。机械工人同盟会现时仍为主要角色，窃谓若

对该同盟会取相当之手段时，则该会转瞬即可解体。

答：（尼罗夫之回答）君所知者较余为多。机械工人同盟会为广东各重要同盟会中之一，已加入该同盟会者有汽车夫、兵工厂工人、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之工人等。是以我辈共产党之任务，为加入该同盟会，与其会员联成同一战线，以反对该会之反动首领。（葛雷之回答）机械工人同盟会于各水手中亦为主要角色，余认为现时最要者为破坏该同盟会。冶匠、铁匠、小炉匠等技工，虽亦皆加入此会，然无论如何，将来总可使军舰之工人脱离该会也。

问：北伐之范围……

斯切潘诺夫之回答：关于北伐之范围，中国人之意，最高限度为到北京，最低限度为暂据湖北，因环境之关系而伸缩之。

问：吾辈工作人员数目增长，而在各处之工作似不合步骤，关于此节，有无何种障碍？

答：余未闻吾辈工作人员有何障碍，工作步骤亦不见薄弱。自3月22日以后，志气或稍衰落。中国各将领以为20日之事痕迹尚未尽泯，谭延闿曾云，若吾辈顾问回复与各长官之从前关系状况，则人民心意中仍将留前事之影响云云。此节吾辈当熟记之。

问：机械工人同盟会之如彼情形，是否由于无共产党劳工之故？

尼罗夫之回答：实因此故。共产党工人甚少，仅于香港罢工之群众中招募得约2000工人入党。

问：蒋介石与伍朝枢之相互关系有所知否？

斯切潘诺夫之回答：伍朝枢几每日在蒋介石处，蒋氏于此事亦不隐讳，谓彼对于伍及孙科二人之谈话仅听之而已，是否确实殊难言也。

贝兹斯察斯特诺夫之回答：余欲叙述南圻俱乐部中所发生之事：吾辈于赴海南之前，曾至餐馆，遇孙科、吴体新及伍朝枢等于该处。吾辈共四人。进餐馆时，彼辈均现极度不安之色，吴体

新勉强向吾辈道候，其中之一人趋至电话机，急握话筒，然亦竟未发言。此事在3月19日，盖当时彼辈以为俄人前来逮捕之也。

葛雷之回答：3月20日事件之尚未了结，可由昨日派彭将军为舰队队长一事证之。彭氏告余，谓现时不宜为大规模之举动，因20日之事件尚未完结云云。总之，不论何人何事，无不听命于蒋介石，例如海军处蒋氏有办事人员4人，彼等无蒋介石之许可，一事不办。

斯切潘诺夫之回答：葛雷之言过于恐怖，君等皆知，现时所有人员均常至蒋处，蒋氏对之颇为和蔼。

基列夫之回答：余欲言吾辈所负之任务。窃以为吾辈工作当先择其较为有效者行之。各军事政治工作人员不应仅以能履行自己任务为足，应就团体之全部着想，如共产党之在黄埔学校中者，于事实上实有莫大之补助。

关于孙中山学会：余于去年由共产党员之谈话暨在黄埔与王梅友（王柏龄）接谈时得知该会之首领。经三月之久，始得与彼谈话。彼导余至学校宣传员之工作室，示余一大幅之列宁肖像及一小幅之孙文肖像。余谓孙文肖像应当放大，因孙文、列宁二人同为伟人。彼又示余以政治文学，大架上为共产主义之文学，小架上为孙文学说之文学。彼告余学校中三分之一为左派，三分之二为右派。彼于3月20日之事似已知悉，告余当特别注意云云。孙中山学会中人，余曾与各学员、各共产党员、孙文派人员及无党籍人员于平常谈话中得悉，彼等多数倾向左派，彼等向余所提问题为共产党何故能团结吾辈一结团体，则不能解决一事。余竭力说明国民党中应无畛域，国民党乃唯一的，其任务为国民革命。然余因中国语言之程度不足，未能尽量解说，彼等似尚未能满意也。吾人当注意右派势力现正开始回复，如陈将军为已被打倒者，而刻下复管辖虎门及黄埔各处之险要，彼前此已曾为该处之首领也。

至关于左派，则彼等渐有右倾，甚且有加入右派之运动者。

卡拉赤夫之回答：各同志均预曾料及，王梅友欲造成政变。余曾与王氏谈话，询其对于鲍罗廷电报之态度。王氏曾函叙蒋介石之答复，蒋谓王为糊涂，彼遂加倍进行，且包围俄人。彼来黄埔时，曾言俄国共产党因何对彼不信任，当答以俄国共产党对彼颇信任。窃以为蒋介石实为无关紧要之政治家。蒋得总司令时，问余曰：“余可比俄国红军中何人？”余谓彼近似加麦聂夫，蒋大得意。故余以为对于蒋氏不妨让步。

贝兹斯察斯特诺夫之回答：蒋介石始终为吾辈所倚恃之人，彼甚爱俄国顾问；惟对于罗嘎乔夫则感情甚劣，因罗氏非为彼之顾问也。

黑兴之回答：3月20日之事实不得谓为蒋氏之失败。谓蒋氏不明事理者决不确实。蒋氏深明社会组织冲突之原因，乃一最精细之政治家。窃以为至招集全体会议之时，3月20日之事当可灭迹，可使蒋氏倾向左派也。

斯切潘诺夫之回答：关于蒋氏之人格，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代表谓蒋氏为个性之人，不依赖群众；然假使在广东如有若干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加以反对，则蒋氏必被离弃而成为孤立。惟在现在中国之环境中，蒋氏不致有被离弃之事，北方军阀及学生商人皆重视蒋氏。蒋氏亦知彼自己之身价，彼实非一普通军阀，而为具有革命意味之军阀。彼曾研究各军阀之得失，余亲闻蒋氏论述华盛顿、拿破仑及列宁等之事业，蒋氏具有革命思想远在其他军阀之上，窃以为蒋氏之各种细小行为，乃因其自尊自利之弊，不足介意。

3月20日之事之发生，或者不为无益。余赞成黑兴之言，兹事如痼疽，然将其开剖，殊为得策。惟此痼疽中尚有溃烂物质，无论如何吾辈当注意治愈之。现时自无人担保蒋氏始终为吾辈中人，然终当利用之于国民革命。蒋氏有不依赖群众之特性，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之言，对于蒋介石如崇拜英雄，在中国现时此种特性不应轻视。当初拿破仑亦系以个人为革命之主要角色，现时蒋介石尚无与拿破仑相同之恐惧吾辈，应竭尽全力使之离去右派，加入国民党左派之工作。余绝不惧蒋氏之特性，不过当及时设法医治其特性耳。

问：第二军团对于第一、第四军团加入北伐之观察如何？

答：蒋氏谓现无与谭延闿争据湖南政权之人，似属落后；然现时若第二军团开动，则彼辈之拟攻湖南也甚明，谭延闿及第二军团长皆作此想。

（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蒋介石关于“整军肃党、准期北伐” 向国民党中央的建议*

（1926年4月3日）

是日，公建议中央，请整军肃党，准期北伐。议曰：“国内形势与外交方针：北方自国民军退出京、津以后，中国形势之变化，其迅速与重大，必非昔日沉闷与轻易之状态可比，如奉军占领京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加稳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必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踞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美国近且有联孙以牵制日本之倾向，法国恐苏俄在华之势力复张，故急使与英、日联合战线，在滇助唐，以牵制广东之北伐。总之，此后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革命根据地无疑，且其期限，不出于三月至半年之内也。以

* 标题为编者所加。

吴得鄂、豫，挟有巩县、汉阳两大兵工厂，握京汉路之要冲，据全国中心之武汉，如英以经济助之，不至半年，必可恢复其旧日之势力。张作霖占领京、津，握有奉天、德州两大兵工厂，且控制京奉、津浦两大铁路，日本为巩固其势力计，其必助之以经济，一旦北京政府成立，必有数种借款，以补充张、吴之军费，当北方国民军未经完全消灭以前，英、日两国，必协定以奉军对西北之国民军，以吴佩孚对南方之广东革命军，而复益之以法，令滇唐出两广，以牵制我广东，而香港政府，必怂恿我两广内部之土匪散军，尽力捣乱，如此，则广东仍陷于四面包围之孤立地位，其势岌殆可以知矣。列强谋我既如此，敌方形势复如彼，如不亟谋所以解决之方，则稍纵即逝，挽救莫及也。今据以上之形势，而定本党应付之策略如左：（一）联络北方国民军，使其退守西北，保留固有之实力。（二）联络与国以增进革命之势力。（三）派员联络川、黔，以牵制滇、鄂两军。（四）联合湘、赣，作攻守同盟之势，约其共同出兵之期限，以牵制吴军之南下。（五）联合孙传芳，使之中立，不为敌用。（六）两广决于三个月内，（即本年6月底）实行出兵北伐，如能于此三个月内北伐准备完毕，则北方之国民军不至消灭，而吴佩孚之势力，亦不至十分充足之际，一举而占领武汉，则革命前途，尚有可为也。本党内部之整理：现在党内纠纷必须解决者，即为纪律问题与分子问题是也。中正提议，应即于一月内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整顿纪律，检查分子，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于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态度及行动，本党之内，不许组织其他小团体，须事事公开，不得有秘密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入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军制之意见：近日第一军因本党党员与共产党员之裂痕，日深一日，几如水火之不能相容，如不从速解决，则北伐必无胜算之理，又军中党代表

制。中正认为革命未成功以前，此制不能取消，惟党代表资格，应有相当限制，凡跨党党员，不宜任党代表之职，且须限入党在若干年月以上者，方有任党代表之资格，此党代表之资格，应加审慎也。又军中官长，信仰不一，精神必难团结，思想冲突，行动更易差误。我军即以三民主义为主义，惟有以信仰三民主义者为干部，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退出，以求各军精神之团结，而谋革命之成功。至共产分子退出各军以后，应由本党予其相当工作，或授其高等军事学，以备军中之用，不使内部纠纷。现在所订政治训练部条例，行之有日，形格势禁，益见其难行，非重新订定，对于各军，不惟无所补益，而且害之。中正以为政治训练部条例未修正以前，各军党代表，应一律调回，加以训练，而留政治部人员在军中，实习政治相当工作，宣传三民主义，则军队内部，既无思想冲突之虑，政治工作，又无中止之忧，其于军队之精神，不致如前日之涣散也。本党以后进行之方针：二年以来，本党联合苏俄容纳共产党对于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方法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对敌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鲜。然欲增进精神之团结，以二年来经验之所得，应加注意之点如下：（甲）共产党在本党内应注意之点：（一）不得诬蔑总理之人格。（二）尽忠于三民主义之工作。（三）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如犯此条者，轻则开除党籍，重则另予制裁。）（四）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之训令及其策略，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五）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六）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问题。（七）共产党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除指明委员为共产党员外，如有跨党不报之委员，应另定条例，处以严刑。（八）中央党部组织、宣传二部长，其入党年限，须在5年以上。（乙）苏俄顾问之权限：（一）使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之工作，不分界限，注重于精神上之团结。（二）不宜把持要职，与希图集中

权力于顾问之举。（三）使我中国革命有自动的能力，不限于被动的地位为宗旨。（四）辞去行政官职权，以顾问之资格，辅助中国革命。（五）对于国民党及革命军条例，如有供献，应以中国革命全体之利害为立足点。北伐之准备：以全国之局势，敌军之情况观之，北伐准备之期，应以3个月内为限，不能复缓，故应急速准备，条述如下：（一）目的敌：距今一月之前，如能出师北伐，则3万兵数，正可占领武汉。今吴佩孚既占有鄂、豫二省，虽其内部未能统一，尚待整理，但归其管辖者，现在确有兵额5万之数，3月之后，其势更厚，可以知矣。故本军出师北伐，至少须准备4万至5万之枪，方得与敌相敌也。（二）兵数：兵数既定以5万为标准，即宜确定部队，以备整顿与补充也。兹述北伐部队如下。1. 第一军四师，（留第十四师在潮汕）约13000枪。2. 第二军三师，（留一部在韶关）约9000枪。3. 第三军二师，约6000至8000枪。4. 第四军一师，约3000枪。5. 第五军二团，约2000枪。6. 第六军二师，约6000枪。7. 第七军三师，约9000枪。（三）军费：枪数既确定5万，全部动员，至少在8万人以上。今假定每员补充费为30元，则于此1个月内，必须筹足250万元，交军需部为准备与补充之费，出发时，应备足2个月军费，战时，每员每月以30元计算，如准备2个月，则须筹足500万元。至准备费，如于下个月内筹250万元，以4月10日、20日、30日，分三期支足，则准备不致空谈也。（四）兵工厂出数太少，应于此1个月内，赶装新机，总须每日能出子弹10万颗为最少限度。厂中所出之枪，应先补充出征部队，装机及加工之费，应在此准备费内抽用也。（五）训练：出师之期既定，训练万不可忽，急须派员负责训练，并由参谋部确定教育日程，限期检阅，务使此两个月内，各兵能在战线尽其战斗员之职守，并使其能确知其为主义为人民而战斗也。（六）政治训练部之改组：政治训练，为出征军首要之务，惟现在训练部条例，多不适用，应从速改正，且该部主任必须由军

官出身，而明了党务与政治者为要也。（七）北伐准备中各部之工作：1. 参谋部之工作，A、作战计划。B、调制各省地图。C、兵站计划。D、各军集中计划。E、各军训练计划。F、调制各军花名册。G、调查敌情兵力，及湘、赣、闽、浙、苏、皖诸省兵力。H、调制各军武器、弹药、马匹、服装各种表册。I、剿匪计划。J、解决民团、农团方案。K、整顿航空与海军局计划。2. 军需部之工作：A、出征军补充费之预算，及出征后军费之预算。B、各军之器材、马匹、弹药、军械等补充数量。C、召集输送队。D、购置交通材料及电话、无线电等。E、兵站之敷设。F、兵工厂之敷理。（八）改良兵工厂之意见：1. 工人之工作时间，及出量数之规定。2. 设立审计处，凡购置材料，如钢、铁、煤、机器等，及各种出品数量，均须经审计处审查核定。3. 汕尾运来之新式机器，限一月内装置完妥。（九）苏俄顾问之权限：1. 聘请苏俄顾问，订定任期。2. 规定每月薪水。3. 未得主任长官之许可，不能有越权之行动。

（录自毛思诚编纂《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卷三，（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10月重印）

蒋介石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1926年5月14日—22日）

14日，上午，广州各界代表集东山寓，请愿制止共党活动。公晓之。

与鲍顾问商国共协定，鲍多持异议，公为详释，并云：“大党

* 标题为编者所加。

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犹不愿违教分裂，忍痛至今也。”鲍始默然。下午，又欲变议，谭平山、张国焘亦来絮聒，公心甚难熬。因叹曰：“党国存亡生死之际，其痛苦盖有如此者。”

下午，出席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茶话会。（议定开大会程序）

15日，上午9时，开全体执委会，出席者共24人，推公主席，行礼如次。公与谭延闿、孙科、朱培德、宋子文、甘乃光、陈公博、林祖涵、伍朝枢提整理党事案。又提出国共协定事件。又与谭延闿、谭平山、伍朝枢、程潜、经亨颐、甘乃光、陈公博，提选举常务委员主席案。

提案：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与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及批评。（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三）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四）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党务会议。（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六）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七）国民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仍于每届开会时临时推举，于该案之执行，亦有窒碍，窃以为此次全体会议，应推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其任期至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召集时为止，并求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之追认，本党既仍以总理为永久之总理，对于主席之任期，

复有相当之规定，则决无比拟总理之嫌疑，而使革命之中心，益复确定，党务之责任，得以专一，其裨益于国民革命之前途，实至重大。选举方法，亦应扩大范围，以谋适应时局，宜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全体合并选举。……

公连日心神憧怔，痛苦倍常，至此犹未稍定。午后，游白云山，宿于能仁寺。

16日，晨起，出寺，访云岩双溪安期祠诸胜。9时后，回省垣。10时，莅会，审查整理党事各案，至午后1时始毕。

晚，在寓会议军事。

17日，上午9时，全体执委会通过整理党事各案。（略加修正）公临时动议，自请处分3月20日中山舰案。（金以全案既不能宣布，罪案即难成立，且信托此后党务，领导国民革命）

下午，在中央党部欢迎英国工党领袖孟郎姆。

18日，上午，全体执委会通过中执委员会选举主席案。

任命严重为中央军校教授部主任，吴思豫为训练部主任，蒋必为入伍生部炮兵营营长。

下午，在中央军校欢迎孟郎大佐。

回省垣，参加先烈陈英士逝世10周年纪念。

19日，任命赖汝雄为中央军校代理宪兵教练所第三队队长。

全体执委会选定张人杰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20日，上午，全体执委会通过公所提重行登记（期限定3个月）案，及统一各省党部案，并选定两党联席会议本党代表。（额5名，张人杰、谭延闿、蒋中正、吴敬恒、顾孟余。共产党3名）

21日，上午9时，赴全体执监会审查训令，提出宣言起草委员会案，通过。

本会发布对时局宣言，接受海内外请愿北伐。公历来北伐主张，至此始得贯彻，其关于本党革命成败之前途，实非浅鲜。

任命赵锦雯为中央军校管理处处长，胡公冕为政治大队队长。

杨树松为工兵大队长，陈诚为炮兵大队长，邢绳祖为经理大队长，陶春霖为经理第一队队长，张兆棠为经理第二队队长，胡宗陈为入伍生第一团参谋长。

公曰：“政权操之在我则存，一国政治之不能独立，患在不能自主耳。”

22日，上午，全体执监会通过宣言及各案后，举行闭幕式，公解释议案致词。

【节录】：

……我此次向政治委员会建议，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第二次全体会议。完全是以党员资格来建议的，决不是以军人的资格要来解决党内的纠纷，外面或许有人不明白，以为此次提出整理党务案的是一个有实力的军人，如果这样想，就完全错了。我此次的提议，完全站在党员的地位，鉴于现在时局的纠纷，和环境的险恶，实在有不能不整理之势，才提出整理党务的办法，现在全体会议已开完了，整理党务案亦已一致通过了，此次整理党务案，在局外人看来，有许多与先总理在日主张不同的地方，不过时代与事实逼到我们的头上，使我们不能不提出此案，我以为，总理如果尚在，到了今日，亦只有这个办法，好在各位同志，为党为国，也能谅解，得以一致通过，但愿大家实行此次决议案，对于各党员有很完满的解释，才可使先总理在天之灵无所不安。各位同志应知道，如果本党的纠纷，长此下去，我可以说我们党的大祸，即刻就要临头来了。我近来听许多同志谬斐说，黄埔军校已成为党的重心，然而黄埔和第一军里面，纠纷也是最多，到现在还是如此，例如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最近都已自动解散，但据各方面报告，学会仍旧用国民革命周刊社的名目，在那里活动，联合会也仍旧有分子拉拢人入会，像这样巧立名目，秘密进行，实在是很不对，很

危险的。最近在市上发现用国民革命周刊社名义发的传单，有什么打倒国民政府的话，我不信该社能有这种荒谬的传单，同时青年军人联合会，也有其他名目的传单来诋毁，这都是党的纠纷不解决引出来的。如果党没有办法来解决，我可以说黄埔要因此倾倒。现在有了整理党务案来解决纠纷，就全靠大家去实行了。此次整理党务案，绝不是什么妥协，我们国民党党员须拿起不妥协、不屈服的精神，集合一切革命分子，来共同奋斗。凡是态度不明的，和军阀帝国主义者有关系的，应一律驱逐在本党以外，务使真正的革命分子团结在一起，这样才可以救国，才可以使中华民国不致沦为殖民地。我们希望党内革命分子，从此不再有什么纠纷，联合一致，来对付一切不革命的、反革命的。我们党的缺点，本来不少，无用讳言，只要大家互相规正，开诚布公的讲明白，许多老党员，应该知道他自己是一暮气沉沉，差不多已成为古董，只能陈列着，不能有什么实用。现在最革命的，差不多都是青年分子，但他们也很多犯着幼稚病，其中更不好的现象，比如有一个党员，对于共产分子加以规劝或批评，便有人说他是反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等话，也不可轻易加在别人身上。比如我自信是革命的，今天有人说我不革命，那就无异于说我反革命，我不但不能承认，而且要起来反对他，因为革命就是我的生命，说我不革命，就无异乎要断绝我的生命一样。这是我万万不能忍受的，所以两方面不可互相攻讦，如果互相攻讦，势必同归于尽。我们只问革命不革命，于革命有益不有益，如果是为革命的，而且有益于革命，那就是应当办的。……我们致力国民革命，固然要统一指挥，并不是军事、政治的大权旁落。要他参预，不过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同一目标上、战略上，不能不有统一的计划。……总之，全体会议既已议决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现在惟有切实履行，使本党可

以稳固的发展。还有一件附带要说的事，就是汪精卫、胡汉民两同志，我们大家必要请他俩出来，尤其是汪先生。我们必须请他赶紧销假，主持党务，胡先生听说是到香港或上海去了，那些地方，现在不是革命党人住的，我们也必须赶快请他回来。

（录自（台）《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卷三）

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整理党务案

民国 15 年 5 月 15 日，本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第二次全体会议，17 日，根据整理党务案，通过以下九项办法，以限制共产党在党内的活动。原编者

（一）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会议。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有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 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

(八) 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九) 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录自 (台)《革命文献》第九辑)

附 1

切列潘诺夫关于布勃诺夫使团的回忆*

(1976 年)

可以说 1926 年 3 月 24 日布勃诺夫在广州顾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及时地对“三·二〇”事件作了初步的分析。布勃诺夫试图揭示这次事件的社会根源。报告中阐述的结论是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结果。委员会到过黄埔，见过各位军长。在 3 月 15 日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蒋介石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委员会听取了汪精卫的政治报告。主要的是，从莫斯科来的同志们亲眼目睹了这次事件，他们甚至实际上遭到暂时的拘禁。

布勃诺夫认为“三·二〇”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半暴动”。他认为，从事件中反映出国家集权与军阀制度之间的矛盾；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国民党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矛盾。在此布勃诺夫还认为，国民党

* 标题为编者所加。

左翼代表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很有条件地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而国民党右翼是反映买办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这些上层人物是香港的政治买办。布勃诺夫在国民党右翼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划了一个等号。

不消说，这一分析是在相当匆忙的情况下作出的，但主要的是，在政变的尝试发生几天以后，当政治激情尚未平静下来的时候，布勃诺夫立即指示我们军事工作人员要从深刻的阶级观点出发，以马列主义的态度对待事件。

布勃诺夫指出，“三·二〇”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首先，不善于预见国民政府内部的冲突，它在军队中也有反映。第二，过高地估计了广州领导的力量和团结一致。第三，未能及早揭露和消除军事工作中的重大的冒进做法，这在3月的事件中暴露得十分清楚。第四，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的集中管理进行得太快，没有考虑到中国将领们的心理和习惯。第五，将领们受到过分的监督。事实上，在部队指挥员那里的党代表是有权签署命令的，在军事院校里的党代表的权限更大一些。除此之外，我们的顾问还在起着作用，他们享有很大的威信，拥有很大的影响。如布勃诺夫形象地表达的那样，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这种情况与中国军队中历来的习惯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布勃诺夫还要求我们顾问特别注意到中国军阀们的过敏的民族主义，外国军事专家的任何一个压力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

布勃诺夫对广州复杂局势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对待问题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布勃诺夫号召我们同志用新方法继续工作，要耐心、深思。并没有丧失任何一个重大的革命成果，应当继续为发展革命进行准备，他对此是毫不怀疑的。

布勃诺夫把以后的全部工作同北伐联系起来。他强调指出，士

兵群众对北伐的必要性是深信不疑的，说：“国民革命不能呆在中国南方的战壕里。”同时，布勃诺夫警告同志们提防把这次北伐看成是纯军事措施的不正确的倾向，他说：“进行北伐而没有准确的、确定的口号，以为进行北伐可以不发动农民群众，那就必然要犯错误。”

布勃诺夫着重强调，我们的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拐棍^①在这方面的任何过火行为都将造成如下后果：第一，更加吓跑大资产阶级；第二，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第三，使尚未彻底消除的中国军阀主义的习惯重新复活；第四，增强和加剧国民党右翼和左翼之间的矛盾；第五，在“打倒红色恐怖”的口号下会掀起一股反共浪潮；第六，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结果，使破坏国民革命的危险更趋严重……。谁要是看不出这种危险性，谁就不能从3月事件的经验中得出任何实际的教训。”

布勃诺夫指出，现在国民党左翼还很软弱，它仍然是一个“军官组织”，内部团结得不好，同群众也缺少联系，因此他号召顾问们要对左翼加以注意。“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国民党左翼的工作，来直接增强国民党本身；应当说，这一工作自然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它要求有极大的坚忍性，要求中国共产党有一种灵活的、非常沉着和始终不渝的策略。”

布勃诺夫是一位毕业于知识最丰富的俄国革命运动学校的工作者，他掌握了在直接进行革命的情况下，以及在聚集力量、需要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时期各种策略的细微差别。他多年来积极参与了为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而进行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是这些情况使布勃诺夫完全有权向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提出同志式的批评和具体的建议。一个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

① 此处把顾问比作中国将军的拐棍。——译者

的职责驱使他这样做，况且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很年轻，人数不多。

布勃诺夫很满意地指出，在最近4至6个月内，中国共产党吸收工人入党从而极大地充实了自己的队伍，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他也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十分薄弱的方面：“党内教育工作无疑没有受到重视……我们十分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党有些全神贯注于军事工作了……我们在军队里把党的力量分配得极不平衡。”布勃诺夫建议中国共产党人要极大地注意帮助国民政府巩固国家机构。

布勃诺夫在谈到工会时指出，工会的主要缺点在于，它不了解群众的生活，不善于抓住群众的日常利益，几乎不从事经济斗争。布勃诺夫指出，工会组织极端分散（当时广州一共有130多个工会组织）；这些工会又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同反动的工会组织、其中包括机械工人的改良主义工会一同工作。他说，“为有利于同群众运动建立真正的联系，全国总工会应当走出广州到其他地方去。”这个建议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广州实际上没有大工业，工业无产阶级的干部是很弱的。

布勃诺夫还批评了工人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的行动，纠察队“把根本不是它固有的警察职能也担当起来了”。

概括这些意见可以断定，布勃诺夫对中国同志提出的善意批评首先是：他们同无产阶级缺少联系，有宗派主义倾向，过份注意军事工作。

（录自（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附 2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 关于中山舰事变的论述

民国 14 年 10 月 1 日，因陈炯明残部负隅东江，重起叛乱，我率师再度东征。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复海陆丰，再定潮梅。接着又削平南路与海南邓本殷叛部，重奠广东统一的局面。广东既告统一，国民政府的使命就是出师北伐了。

东江战事初告结束，我还在潮汕的时候，共党已在广州散布谣言，对我诬蔑中伤。15 年 1 月，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我从潮汕回到广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张。在会期中及会议后，汪兆铭对于北伐，均表示赞成，鲍罗廷亦未表示异议。惟开会后，鲍罗廷以奉召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鲍回俄后，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Kissarka）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谬论。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出来。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我个人为新军阀。最后季山嘉更是明目张胆，破坏本党的北伐计划。我知道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个的策略，而不仅是中共叛乱的开端，于是本党处境的陆危，已到了极点。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还是消极的引退以放弃革命的责任？还是积极的冲破难关，完成国父北伐的志事，以报党国？忧思不能自决。到了 2 月 8 日，我乃表示不能再就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9 日复呈辞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等职。汪兆铭对我的辞呈，既不批准，亦不挽留，如此留中不发者半月之久。我乃于 2 月 27 日访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俄。3 月 8 日，又访汪，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于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但是我们的秘密谈话，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

才知道汪共勾结已深，无法使其彻悟俄共阴谋之所在，于是共党与季山嘉更肆无忌惮，明指我为背叛革命的新军阀。到了3月14日，汪仍未批准我的辞呈，而间接的暗示我离粤。此时我方知道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但我既辞职而未获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真使我进退维谷。

3月18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命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后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埔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19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在19日的夜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党与革命的存亡绝续，是不许我再有犹豫的。我乃于20日清晨，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共党分子，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并派兵收回中山舰。

22日，苏俄驻广州的领事馆代表为了这一事件来见。他问我：“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我答以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速回之意。他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同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接受汪兆铭的意见，决议令俄顾问季山嘉等离粤回俄。但是会后，汪即称病，迁居就医，并致函中央监

察委员张人杰，表示他不再负政治责任。直至5月11日，汪竟秘密离粤，赴法养病。

4月29日，鲍罗廷自俄回粤，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订定整理党务办法，于5月15日，提出本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这办法一共八点：

一、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批评及怀疑；

二、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

三、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四、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党务会议；

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

六、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

七、国民党员未经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者，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

八、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并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同时我恪守国父的遗训，不因联俄而对共党姑息和迁就。所以我们的会商能够达到这八点的协定。

此时共党夺取广州基地的阴谋既已失败，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5月21日，本党中央全会发布对时局宣言，决定北伐。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

（录自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

附 3

张国焘关于整理党务案的回忆

果然，在5月15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举行的前夕（据说是5月9日），汪精卫与胡汉民都悄悄的离开了广州。最巧合的是他们两人竟不约而同的在一艘轮船上碰了头，^①这件事一时成为广东要人们的话题。有的就说：“冤家路窄，竟然同舟，不知他们在船上晤面，有何感想？”有的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两位大人物争着做主席，现在同时被人放逐，后起之秀，却能逐个击破，走上领导的宝座，真是活报应！”

鲍罗廷描述在广州的俄国人地位之时，也颇有洋洋自得之态。他直率的说：“中国是一个无人地带。”并说历来外国人到中国活动，虽受到折磨，但凭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应付能力，收获颇为可观，为什么俄国人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呢？这些话触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责鲍罗廷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瞧不起中国人，颇有殖民主义者的气味。他只是笑笑，不加答辩，言外之意似乎是他为了保全俄国的利益，顾不得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了。

苏俄一艘载运军火的轮船驶抵黄埔，立即轰动一时，苏俄的军火到了，蒋又将联共来压制反共派了，种种议论在各地流传着；甚至有人说，5月15日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将公布实行共产。此外，还有加仑将军再度来粤，重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的消息，真

^① 据汪精卫在1928年5月18日覆林柏生的一封信说：“鲍罗廷……胡汉民……于4月底始回到广州，那时我已离粤了。”（全文见《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308页至322页）这也许是他的记忆失实。汪与胡同船离粤的事，是曾经到船上送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东方杂志》（第23卷第12号）也记载汪胡同在5月9日秘密离粤。

是谣言满天飞。鲍罗廷当时之踌躇满志是不用说了，他口袋内的“草支票”似乎已经兑现了。

我深深觉得鲍罗廷当时的政策，将会陷中共于不利之境；因而我问他：“国共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他答道：“坦白说来，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我又问他：“是不是你愿充当管理这些苦力的工头？”他回答：“有人确实如此希望，但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不会担任这种不名誉职位。”鲍罗廷的“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这一句话，从此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

与当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员一样，我不甘心只充当中国革命中的苦力，我向鲍罗廷郑重提议，苏俄政府既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农？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解决运输上的困难。我还进而鼓动鲍罗廷，说以他目前的退让措施，既自诩其本质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有别，是暂时性的，同时也是进攻性的，是注重土地革命的；但如果不给农民以武装，则所谓暂时的、进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则，都成了废话。鲍罗廷考虑了一阵，拒绝了我的提议；认为目前决不可能，等时机成熟，再作计议。

一般说来，共产党人不作无目的的退却。即使事实上在执行退却政策，也要坚称以退为进的借口；因为赤裸裸的退却，会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鲍罗廷当时所做的，正是如此。这还不算，他竟将“不肯进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头上。后来斯大林之批评陈独秀先生的机会主义，就是受鲍罗廷的影响。鲍罗廷在紧要关头，拒绝了我的武装农民这一建议，也足以证明斯大林的批评无论如何是过分了。

在此时期内（即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以前的5月上旬），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张、鲍三巨头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廷遵守三巨

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他向我说的话，大多是闪烁其词的。我为此深感不满，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意。鲍罗廷总是要求我信任他，申言决不会把事情弄糟。

到了5月14日下午5时左右，鲍罗廷找着我和谭平山，要我们立即去访问蒋介石和张静江。他说明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明天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外间谣言甚多，主要是传说中共要发动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说甚表关切。鲍罗廷希望我们向蒋、张表示，对次日的会议内容并不知情，所以也说不上赞成或反对；并表陈中共始终维护国共合作，亦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如果翌日广州市内发现有反对该次会议的传单标语或其他行动，完全与中共无关。

鲍罗廷此一建议，使我和谭平山都感尴尬。谭平山是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一向是亲汪精卫等左派人物的。在3月20日以后，并未与蒋有所接触，一直保持缄默。他听了鲍罗廷的话，苦笑不语。我则表示广州市确有破坏国共关系的谣传，人们早已知道与中共无关。现在我们只知道有个党务整理方案将提出讨论，但详细内容并未与闻，而反要我们先去向人表示决不反对，以示忠诚，未免太过抹煞中共的地位了。后来，经过鲍罗廷的再三劝说，我们终于应允了。

当时8时左右，我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访问蒋介石将军，我们依照鲍罗廷的要求，向蒋表示中共对国民党这次会议所采的态度。蒋氏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当即陪同我们去看张静江。我们又把来意重述一遍，张静江也显得非常高兴，认为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

那次晤谈，在和谐气氛中结束，但谭平山的心情颇为沉重，在归途中一言不发，他似已预感到他将在翌日讨论党务整理方案会议被整肃掉；而这个面临被整肃的命运的人，竟要先去拜会他的政敌，笑脸相向，这滋味究竟不是好受的。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第二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在戒备森严中揭幕。会议所要达成的任务，是在准备北伐的名义下，通过党务整理方案，调整国共关系；确立国民党的领导权。蒋介石从此步上了权力的极峰，军权高于党权的作法也由是开始。

党务整理方案^①的主要内容规定：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对三民主义不得怀疑和批评；跨党党员不得任党中央部长，任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亦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设立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共产国际所给中共之指示和中共中央对在国民党内之中共党员所发的一切训令，均须交由联席会议通过；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名单应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以及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等等。在中共看来，国民党所采取的这些办法，绝非如人们所说的由“容共”到“联共”^②，其用意无宁是限制中共的发展，打击中共之独立存在。

会议上撤销了汪精卫的领导权，名义上是由张静江代替，实权则落在蒋氏的掌握中。在蒋介石将军的提议之下，原任监察委员的张静江获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谭延闿接替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蒋氏本人则接替谭平山任中央组织部长。这些改革都是蒋氏一手促成的，也许形式上经过蒋、张、鲍三巨头的密商。

中共党员之出席会议者，如谭平山、林祖涵等采取了保留的容忍态度。他们声称自己不能作主，须待中共中央处理。

可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也在那次会议上暴露了出来。5月19

^① 党务整理案共成立了四个决议案，目前坊间书籍，很少录载全文，即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编辑的《革命文献》，也只载了一部分，比较录载多一点的，要算《张溥泉先生全集》，札记栏第420页至第422页——民国40年台北文物供应社版。

^② 由于党务整理案中有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当时有些国民党人士就认为这是“容共”变为“联共”的政策；其实这只是表面的浮泛之谈。

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深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大字，就退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深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满浙江系^①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深之选胡汉民，可予证实。”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事件开始表面化了。

党务整理方案公布以后，广州的中共同志无不万分激愤。有的说：“鲍罗廷被绑票了，张国焘、谭平山做了投降代表。”有的说：“为何不主动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为何不退出国民党？为何要被动的受处罚、被整理？”

鲍罗廷当时也不愉快；但他故作镇静，作种种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说：“我们没有被驱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全错误的。”

他还透露5月15日会议那一天，居然有罢市的传言；中央银行曾发生挤兑事件；“实行共产”和“杀共产党”等类谣言，不脛而走。他认为这种情形反映出反革命派之蠢蠢欲动的迹象，军事当局（指蒋介石）似乎箭在弦上，说不定又会发生第二个“三二〇”事变。幸而我们有先见之明，一直静观其变。事先又与蒋、张获得谅解，在会议中也未发表反对言论，是以我们并没有坠入敌人的陷阱里云云。

他又指出右派并没有占到便宜，他自己没有被扣留，而主张扣留他的胡汉民倒再被放逐了；阴谋捣乱的吴铁城也被拘禁了；和香港勾结的伍朝枢更自动离粤了；西山会议派的人物也不能插足

① 蒋介石张静江均为浙江籍。

于广东。这一切都证明受到重大打击的不是我们。他又透露，据他所知右派人物都对那次会议表示失望。又称，会议宣言中既明白规定要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与反动派奋斗，我们大可据此发挥一番，鼓动国民党继续往革命方向推进。

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感到失望，国民党左派也是愤愤不平。但左派的观点与中共同志的看法究有若干距离；他们有人认为如果汪精卫能贯彻国共合作的精神，抢先提出完善的党务整理方案，也许不会闹到今天这个样子。他们多数人所注意的是党权问题，有的人说：“汪精卫被撵走了，党权也破产了，现在是军人天下。”鲍罗廷这个鲁仲连对于这些愤恨难平的左派，也是抚慰有加。

鲍罗廷不赞成多数中共同志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因有违共产国际之意旨。中共既然加入了国民党，现在决不能一无所得的撤退出来。他肯定地说：“国共是要分家的，不过分得愈迟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可能便要实行分家；现在应继续容忍合作。”

鲍罗廷认为中央不必重视此一党务整理方案，除了其中规定中共党员任国民党高级党部委员者，不得超过全数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得任中央部长等是中共所受的实际损失外；其他如交出名单和审查中共对党员的训令等，只是国民党的片面决定，中共中央可以在将来的联席会议中，提出异议。

鲍罗廷知道我快要回上海去，要我将他的建议转达中共中央。他主张用拖延手段来对付国民党所要求的联席会议，如果不能拖延，中共中央应派代表来广州参加。他还说：“广州的政情你多身历其境，不用说你将会是代表之一；如果是的话，不妨先来一步，先试探行情。如果国民党真要举行联席会议，其他的中共代表再行赶来不迟。”

谭平山当时愤慨的向我表示，他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深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公开与

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在谭平山的要求之下，我陪同他与鲍罗廷密商。鲍罗廷在谈话中，又无意中流露出他的另一意向。

鲍罗廷对于谭平山的意见，不特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他问谭平山：“你有什么办法联络李济深？”谭平山进而表示如果我们不反对他的主张，他可试探。鲍罗廷至此再也不掩饰他对蒋介石、张静江的反感；他指出国民党内部纠纷很多，尤其是顽固的张静江，的确使人厌恶；如果有人反对他，也是理所当然。

这表示鲍罗廷对于蒋、张，表面虽极尽忍让之能事，实际是企图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从反对张静江下手，来改变既成局面。从他此后一切行动来看，亦是如此。至于谭平山联络李济深的工作，似未收到显著成效，也许是李济深反蒋而不亲共之故。谭平山不久就离开广东，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在1926年11月举行的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斯大林倒很重视他，似有让他代替陈独秀领导之意，也许就是他这种“联甲倒乙”的主张为斯大林所欣赏的原故。

3月20日到5月15日这段期间广州的一切发展，是国民党削弱苏俄控制，打击中共气焰，强化资产阶级的领导的一种过程；中共似应改弦更张，另谋出路。

我向鲍罗廷表示，他的“中共命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不能空手退出国民党”、“团结一切革命势力”和“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等等想法，不免吃力不讨好。我建议中共党员应逐渐退出国民党，转而注重工农群众工作的独立发展，不介入国民党内部纠纷。鲍罗廷讥笑我这些想法为“退却步骤”，他认为如果在5月15日以后，即行退出国民党，是经不起打击的示弱表示。

我没有坚持我的意见，根本原因是我当时自信不够。我心目中仍相信鲍罗廷是比我见多识广的老手，有神通广大的共产国际做后盾，不好将他与马林等量齐观；只有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去，再作详细的研究。同时广州一般的中共同志们也催促我从速返回上

海，商讨今后发展的全盘政策；因而我于5月下旬又匆匆的告别了这个是非之地的广州。

（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12月）

附 4

关于国民革命的分歧——中山舰事件和布勃诺夫使团

（1977年）

（日）毛里和子

在讨论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时，特别有以下几点值得研究：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方式是不是统一战线的最好形式；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应不应该继续实行党内合作；在蒋介石发动上海“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在武汉时期是否应该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和自下而上地改造政权，等等。以上每一个问题归根到底都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应当采取怎样的路线，应当怎样进行领导才能避免国民革命的失败，或者至少也要开辟一个革命的新前途。对于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应作出回答。然而，本书对于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在中山舰事件以后的活动情况却很少提到，做了较多的保留。为了补充这个侧面，我们想在这里重新提出一个问题，即在中山舰事件后，苏联和共产国际是在什么背景下决定政策的。

关于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捏造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叛乱”，以及共产党“阴谋颠覆广东政府”，下令全市戒严，

同时，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团办事处，还逮捕了黄埔军官学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许多共产党员。“五卅”运动以来逐渐扩大的统一战线内部发生重大分化。由于蒋介石压制共产党，这种分化更趋表面化。这也是为1927年4月的大屠杀做准备的第一次反革命事变。蒋介石从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军中驱逐了共产党，两个月后，又从国民党的中央机关中挤走了共产党员。他独揽北伐的军政大权的野心，正一步一步地得到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解决中山舰事件，是决定国民革命今后发展的重大事件。显然，这个时刻是需要左派和共产党当机立断的时刻。实际上，这次事件以后，关于要不要继续实行党内合作问题，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各种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对事件本身和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方法，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如下所述，胡华在《中国革命史讲义》一书中提出，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压制革命的第一次重大的企图”，认为事件的原因，是国民革命内部和广东内部阶级对立尖锐化的结果。对于这个事件，当时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基本是正确的，认为当时蒋介石在广东的力量还不是那样强大，即使在国民革命军内也是孤立的，所以一方面继续实行党内合作，同时尽力击败蒋介石的阴谋是完全可能的；第二种态度认为，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所以要采取退却、让步的策略（陈独秀等）；第三种态度是，退出国民党，和蒋介石决战（托派和上海党中央的少数人）。胡华认为，实际上是采取了第二种态度，结果是酿成了一年以后的上海反革命事变。格鲁宁同这种观点相反，他认为，中山舰事件的起因，除广东内部阶级对立的尖锐化以外，还在于某些苏联顾问（指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左’倾错误”。因此，在事件后为了纠正以往的“‘左’倾错误”，为了避免蒋介石的下一步进攻，暂时的退却是绝对必要的。“在1925年底以后，特别是在‘三·二〇’事件后，中共中央采取了暂时退却的策略，得以防止

统一战线破裂于未然，得以在北伐的条件下积蓄下一步斗争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共产国际在5月份给中共中央的指示就是这个方针。如果根据格鲁宁的看法，胡华等人的观点，就是“反共产国际的观点”，就是“陈合托洛茨基对‘三·二〇’事件的起因和结果的提法”（见前书《论三·二〇事件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问题》）。因此，对中山舰事件的评价，是中苏两国研究人员之间在国民革命方面巨大分歧之所在。

布勃诺夫使团的作用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鲍罗廷由于段祺瑞一手制造的“北京惨案”而被迫离开北京，正在绕道张家口和乌兰巴托返回广州的途中。维经斯基当时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他作为东方委员会的书记在积极参与会议工作。也就是说，上海和广州两方面的负责人都处在远离他们任职所在的地方。那么又是谁在事件处理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他来自什么机构？这就发生一个疑问。于是，1926年2月到3月下旬，苏联共产党向中国派遣的一批高级军政要人——所谓布勃诺夫使团（也称为伊万诺夫斯基使团）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在这个时候来中国，是什么目的？他们在中国各地要干些什么？回国后又向莫斯科报告了什么情况？

但是，关于使团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只能从下面几种书中得到一些只鳞片爪的材料，这些书是：切列潘诺夫的两个回忆录（《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米罗维茨卡娅的论文（《最初的十年》），卡尔图诺娃写的《布留赫尔在中国》，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的《起义的中国两年记》等。布勃诺夫使团的行踪，以及他们对中国形势的认识大体如下。

使团的成员有十余人，团长是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共产党

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以斯大林的助手而出名的布勃诺夫；团员有库比雅克（苏联共产党远东局书记）、列普赛（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等。使团的书记是龙格夫。布勃诺夫在中国逗留期间一直化名为伊万诺夫斯基，说来华是私人旅行。然而，他们的任务很明确，是代表苏联共产党详细调查苏联顾问们的活动情况以及华北、华南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使团一行首先访问了北京。2月11日在大使馆听取了副武官叶戈洛夫关于现状的报告。据说，这时期加拉罕大使、索罗维约夫参赞、叶戈洛夫武官、维经斯基等人为了向使团汇报，聚会一堂，鲍罗廷也从广州被召到北京。在加拉罕大使主持下，使团、大使馆人员、维经斯基等代表和顾问们一起开了一个重要会议，遗憾的是这个会议的内容不得而知。2月14日，切列潘诺夫在大使馆见到了这一行人。据他透露，布勃诺夫最关心的是，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合流的可能性以及列强（特别是英国）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性问题。切列潘诺夫谈到目前广东、张家口和开封各个苏联顾问分团之间的联络不好，使团则指示他去开封向国民军的顾问们介绍华南团的经验。根据切列潘诺夫的回忆，当时布勃诺夫认为，运动已进入平稳发展时期，至于以后当革命出现高潮时，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将怎样表现出来；列强的干涉可能达到什么程度；对于这些，布勃诺夫的态度似乎很慎重。

2月下旬，在包头附近，使团与冯玉祥会面。1925年底郭松龄兵变失败，冯玉祥宣布下野。此后，苏联对冯一直抱有希望，但又举棋不定。苏联曾设想加强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方的国民军，并尽可能同它们并肩作战，但是，冯玉祥的下野给这个设想蒙上一层阴影。冯玉祥在和布勃诺夫见面的同时，还和加拉罕大使进行了交谈。布勃诺夫对冯玉祥的印象是“冯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国民革命运动的思想”，因此，他考虑扩大对国民军的援助，并派遣相当于鲍罗廷那样的人物当冯的顾问。后来尽管派遣政治顾问

的事未能实现，但布勃诺夫仍对国民军中顾问团以往的工作大为不满，指示要在作战方面和组织方面加强和冯玉祥的关系。

布勃诺夫在北京停留期间，非常关心北伐问题，针对加拉罕等人的“慎重论”，他认为，条件现已成熟，应在半年到一年后开始北伐。（以上参看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等书）

布勃诺夫和陈独秀的会谈是在3月2日，地点是上海。他们分析了当时国民党的内部状况和广东的形势，讨论了北伐的利弊和时间以及同国民军合作的可能性等问题。陈独秀的看法很悲观。对此，布勃诺夫说：“虽然现在处于革命低潮，但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并未退出民族运动，他们仍然想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布勃诺夫的这种立场很值得注意。（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3月13日使团到达广州，会见了广东石油联合会的代表。为解决当时封锁香港造成的广东石油不足的现象，约定继续供给煤油和石油等，并就改善苏联和广东之间的贸易问题进行了商谈（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广州的定期贸易已于前一年5月开始）。使团正好在这个时候碰上中山舰事件。据说，由于这个事件布勃诺夫未能出席原定的国民党政治会议而处于半软禁状态。蒋介石方面间接地提出撤换库依贝舍夫〈季山嘉〉团长和拉兹贡等顾问以及让加伦回任的要求。（阿基莫娃：《起义的中国两年记》）

3月24日苏联顾问团召集了研究“三·二〇”事件的会议。会上布勃诺夫说这个事件是“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小规模政变”，他为广东内部的错综复杂的分化情况感到忧虑。同时对招致这次事件的中共广东党组织进行了严厉的“同志式的批评”。布勃诺夫批评广东党组织一向偏重军事工作，有宗派主义，还批评他们和广东工人的合作较差。为改正这些缺点，他指出：（1）从基层开始加强国民党；（2）改进被改良主义者操纵的广东工会组织的工作；（3）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军事工作和农村工作转向党务

工作和政府工作方面，等等。（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卡尔图诺娃《布留赫尔在中国》）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布勃诺夫要求缩小省港罢工规模。关于从头年6月开始的省港大罢工，即对香港的抵制运动，布勃诺夫说：“省港罢工搞得太长了。……时间太长的罢工，或迟或早将会对共产党在香港和广州工人群众中的地位带来严重威胁。工人们已为国民党政府尽了责任。”（卡尔图诺娃）

经3月24日的顾问团会议决定，让季山嘉团长、罗加乔夫、拉兹贡等顾问离任，让布留赫尔返任。会议认为，无论时间迟早，北伐总是不可避免的。显然，这次会议是屈从了蒋介石的要求。

这次事件处理完毕后，林祖涵、甘乃光、陈公博为使团送行，携季山嘉等回国。4月初，苏联共产党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似乎就是以使节团的报告为基础做出了决定：继续进行留在国民党内的合作；对国民党右派或使其退党，或开除；继续援助国民军；停止省港罢工；等等。（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依尔·鲍罗廷》，斯大林：《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等）接着，在5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中央应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维持国共关系，并应对蒋介石（当时认为他是国民党的中间派）做有条件的妥协。（格鲁宁：《论三·二〇事件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问题》）苏联政府决定在北伐期间给予广东援助。与此同时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已开始向广州运送武器。至于冯玉祥的情况，他当时正在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在那里会见了从北京途经张家口，取道戈壁滩的鲍罗廷。嗣后，冯玉祥于4月27日从库伦起身赴莫斯科，在那里过了4个月，得到苏联提供大量援助的保证。

有的资料反映，苏联政府和党的中国问题委员会在8月4日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了解布勃诺夫中国之行以后的苏联对华政策，大有好处。与会者除布勃诺夫外，还有军事兼海军人民委

员文休里希托、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雅各达、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局长梅尔尼科夫等杰出人物。会上再次确定援助冯玉祥（4月间已作出决定），并制订了具体步骤。另外，会议认为由于广东的情况不明，关于北伐的援助方法问题应待下次会议决定。关于省港罢工问题。虽然“前已作出停止罢工的决定”，但罢工至今仍未停止，因此会议指示鲍罗廷尽速执行命令。（Soviet plots in China, The Metro Politan Police Headquarters, Peking, 1928.）

如上所述，布勃诺夫使团在中国进行了有力而广泛的活动，迅速地处理了中山舰事件，从以后苏联采取政策的情况来看，这一行人执行的任务之广泛，拥有的权力之大，对以后制订政策的影响之深，即令是一些零碎的材料也能略知一二。原来布勃诺夫使团到中国访问，一方面是要维持国共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另一方面就是要弄清广东的现状、国民军和国民革命军合作的可能性、英国等国会不会插手等问题。可以设想，他们当时认为形势的发展对左派不利，正巧又遇到了蒋介石策划的中山舰事件。就这样在国民革命的转折关头，他们从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择了蒋介石“暂时让步”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政府、党和共产国际三方面的极大权限的布勃诺夫使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山舰事件后，有人提出“退出国民党”，广东党组织也持有急进的观点，然而至8月排除了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抵制，“旷日持久的省港罢工”终于停止。由这些事实可以看出，是“布勃诺夫使中共党员就范并使他们平静下来。”（托洛茨基：《斯大林和中国》）

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情况

正当布勃诺夫使团周游活动的时候，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会上热烈地讨论了中国问题（2月17日—3月15日）。这是季诺维也夫主席最后一次主持的全会。会上通过了东方委员会（主席是罗易，书记是维经斯基和布朗）提出

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决议以中国的大工商资产阶级脱离了民族运动为前提，指出国民党正转变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民主派的革命同盟”，就是有名的“四个阶级同盟理论”。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尽管会议的决议已预计到中山舰事件以后的事态发展，但在事件发生后仍然采取了向民族资产阶级右翼——蒋介石妥协的政策，也就是在蒋介石控制之下继续实行留在国民党内合作的政策。半年后又召开了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依然在和运动一起前进，还应该利用他们的各阶层，因而提出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同盟”的理论，这就对六次全会的基本路线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

一方面统一战线内部正在不断分化，另一方面同盟却又在扩大。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所周知，从1925年以来，苏联国内围绕着能否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拉迪克的所谓“新反对派”之间产生了争论。“新反对派”批判斯大林1926年以后的中国政策，提出让共产党员立即退出国民党。斯大林和“新反对派”围绕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其结果是在7月间的政治局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被赶出政治局，继而在10月间召开的苏共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反对派集团的决议》，终于，这次苏联共产党内的斗争以斯大林派的胜利告终。

季诺维也夫在这期间以共产国际主席的身份提出：中国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由于英国工人罢工，苏联应退出“英俄委员会”。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会导致否定国际主义，对此他极表不安。斯大林在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1925年12月）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斯大林主张在帝国主义和苏联之间搞力量平衡，提出实行全国规模

工业化的路线。季诺维也夫则相反，在会上强调殖民地的危机和革命运动的高潮，竭力主张，中国革命是殖民地革命运动的中心。他又进一步说，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最大的危险在于不承认苏联今后的命运是和世界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说这是“俄国共产党内的民族主义狭隘性”（national narrowness）。他又告诫大家要忠实于国际主义义务（《关于俄国共产党代表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内行动的报告》）。但是这个意见在大会上无人理睬。因此，季诺维也夫想把这个意见拿到自己仅有的唯一的一个阵地——共产国际上通过，加以贯彻，于是出席了3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会上提出的“四个阶级同盟论”当然会促使中国革命更加激进。

由于布勃诺夫活动的结果，中国的事态实际上是沿着修改了共产国际六次全会路线的轨道发展的。而且季诺维也夫“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在苏共7月间的政治局会议上，被当作“取消中国的革命运动”的观点被否定。接着，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肯定了苏联一国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同时指出“可以认为民族主义狭隘性这种指责是对苏联共产党的诽谤”，也就是说，否决了季诺维也夫在前一年的申诉。第七次全会的结果，一方面通过了由布勃诺夫、罗易和布哈林起草的、经斯大林精心加工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另一方面，撤消了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国际一创立就担任的主席职务。

为了获得在一个国家里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当时苏共中央最关心的事情是，和列强建立哪怕是最起码的协调关系。如前面讲过的，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特别是日趋尖锐的省港大罢工，英国（香港当局）是否介入，这是布勃诺夫使团最为敏感的问题。强迫停止罢工，看来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早就考虑到，如果“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由于共产党的主动退出导致破裂，就有可能引起英、美的武装干涉。当时苏联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莫

斯科对英帝国主义在战略上的两个支柱——英俄委员会和中国的国共合作”。（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这样认为：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共产国际的正式的对政策和苏联共产党的方针之间有很大的分歧，而实际上，布勃诺夫使团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是体现了苏共的意志的，以后也仍是沿着这条路线向前发展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为了适应苏联新的对内对外方针，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开始收敛。这样，中山舰事件以后的留在国民党内合作的政策，和1922年刚提出这个问题时相比，其内容就很不相同了。作为新阶段的新政策是，无论如何也要联合资产阶级右派。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实行了有极浓厚防御色彩的政策。

（录自 M. C. 贾比才等著、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
（1920—193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四、加伦与北伐战争

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 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

(1925年9月20日)

加 伦

今年(1925年)6月,国民党左派同广州反革命派的斗争,得到所有革命阶层的广泛支持。国民党的这一胜利,应当归功于工人阶级和农民。国民党左派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多亏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左派同革命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在客观上将促使左派今后继续寻求革命群众的支持,反过来,革命群众也将敦促国民党推行更为革命的政策,进一步向左转,使南方国民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

但是,这样一来,各种反革命势力也必定加紧合流,进一步地脱离国民革命运动,脱离国民党,其结果,他们肯定无疑地要投靠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和农村封建地主势力,并通过他们进一步地勾结帝国主义即香港。在这种分化的过程中,除了右派与党决裂之外,中派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脱离左派。

这个分化的过程也必然要涉及军队,那些因民政和军事管理改组而不能再任意搜刮民财和独霸一方的军阀将投奔反革命阵营。粤军第三师十有八九将归附以魏邦平和李福林为中心的反

派，使反对派得以增强其势力。

只要反对派的势力还不够强大，许崇智将军就不会不同党和政府合作，因为他要乘机抬高自己在军事委员会和政府中的身价，在粤军中排除异己，以进一步控制粤东，从而进一步左右政府的大政方针，左右军事委员会的工作。^①

许崇智将军在军事委员会中的地位如果得到巩固，则军事委员会对梁鸿楷及其所部多半是不会持支持态度的，这样，梁鸿楷就必然要把持他向粤西南（金门地区）征收税金的权力，并设法保住他自己队伍的独立，进而同反对派合流。以往，珠江水域和西江是香港分别同广州和广西联系的主要渠道，如今这两个渠道因罢工^②和罢工委员会（在政府支持下）规定的经济封锁而中断了，香港就只得寻求经金门（梁鸿楷地盘）入广西的水路了。

其结果，英人便会利用梁鸿楷对付广州政府，并拉他同反对派建立密切的关系。

此外，随着形势的客观发展，梁鸿楷之流必然要投向反革命营垒。

反动势力逐步壮大之后，必然要在广东挑起新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为要挑起冲突，他们可动用的兵力有：李福林第三军（4000人）、粤军第三师（2000人〔大概不包括莫雄将军的第六旅〕）、梁鸿楷第一军（6000人），共计12000人。这些兵力过于分散，战斗力不强。

① 不应该认为，新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是一种能够真正实行军事完全集中和统一管理的最高军事机关的完美无缺的形式。起草人认为，成立军事委员会，这不过是为适应形势及力量对比而采取的一种临时的过渡形式而已。

国民党本身，内部既不统一，又矛盾重重，这样一个党又何尝能够以本党所搞出来的组织形式而克服这些矛盾呢。正因为如此，随着时局的演变，最高军事管理的形式也是可以改变的。——加伦

② 指省港大罢工。——原书编者

国民党和政府则有黄埔军、湘军、朱培德部、程潜部以及由粤军第一师扩编而成的第六军作坚强后盾，约计有4万人。

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许将军会一如既往继续同国民党合作，粤军其他队伍的态度将随许的变化而变化，他们要么将公开支持政府，要么将采取观望态度。极而言之，粤军第二军之一部也投靠反政府派（这是不大可能的），敌军兵力也不过才两万人，且分散于东部和西南部，仅黄埔军即足以将其打败。

商界的多数会积极支持反对派吗？未必。这不仅因为商人的经济利益同香港严重对立，而且因为他们期待政府实施改革（财政和军事管理的集中统一，政府行政机构的整顿）将能克服混乱局面，造成本省社会安定，使经济复苏。统一财政，彻底改革税务机构，甚至免除贫民百姓的种种沉重的纳税负担，征收财产税，这一切未必会加重商人的纳税负担，因为现在各派军阀向他们胡乱征收的税额已经相当可观了。估计，政府加强治理本省的各项措施，十有八九会得到商人的支持。

因此，担心内部反革命势力今后给国民党设置严重障碍，是没有根据的。有广州广大革命知识分子的支持，以及商界对国民党所实施的各项改革的同情态度，国民党打垮上述敌对势力乃是轻而易举的事。况且，反对派未必胆敢公开叛乱，他们多半会对上层领导人物施展恫吓和恐怖手段，其结果只能是早日自取灭亡。

在广东，国民党唯一要提防的势力是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对广州的武装干涉。

然而，华中和华北行将兴起的国民革命，以及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使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公开拔除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南方根据地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但这绝不是说香港就会善罢甘休，不再阴谋消灭广东国民党政权了，因为香港的利益今后会愈来愈受到广州的排挤。英国人既然不能以武力推翻广州政府，他们就要千方百计孤立广州政府，使之脱离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

近来已经有事件表明，正当广东国民革命运动处于危急时刻，英国切断了广州同华中的联系，使国民党的行动受到很大的牵制，而假如广州同华中和华北继续保持联系，则国民党能发挥大得多的影响。

鉴于目前国民党在广东的政治、军事地位并不令人担忧，解决邓本殷（即西南线）和陈炯明残部（即东线）的问题亦不至遇到多大困难，……因此，现在是该提出下列问题的时候了，那就是要及时向北扩展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让国民党登上华中政治舞台，也就是说，应当及时将政治工作中心从广东移到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我想，华中的政局对此是有利的。保卫广东和进军长江，国民党须 8 万兵力，其中广东留 3 万至 35000 人，而以 45000 至 5 万人的兵力出师北伐。这次北伐于 1926 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国民党能有这么多兵力吗？我看这是不难办到的，所以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广东可以提供必要的经费，难办的是武器问题。缺少步枪两万支，还需要有受过训练的军事、政治和行政干部，供成立北伐军和在国民党新占领区成立政权机关之用。

这 8 万兵力从何而来，财力如何，且看下面的分析。

广东的财力与军费开支

过去在清政府时期，广东每年进款约 5000 万元，近年来进款锐减，目前只有 3500 万元了。广州人断言，税务机构调整后，每年进款可达 4000 万元左右，当然，这指全省而言。

为有把握起见，暂且估计较为实际的数字是每年进款 3000 万元，即每月 250 万元。其中用于维持军队的费用和其他军事费用，每年为 2200 万元，再扣除临时用于难以预料的小规模作战的紧急开支 200 万元，每月尚余 1666000 元。以维持 5500 人的一个师每

月耗资 85000 元（根据黄埔军的经验）计算，维持 8 万军队每月耗资 1275000 元；可用于其他军事部门，即军校、空军和海军的费用每月尚有 391000 元。到 1926 年上半年底，每月仅须支出 1275000 元，在此以前，开支可以大大减少。用这笔差额可以购置航空器材，增加兵工厂的武器生产，招募新兵，培训干部。用于额外购置武器的费用未计算在内，因为这笔费用打算靠借款来解决，借款定于 1927 年归还。^①

出师北伐所需军费的问题，可用向商人借款的办法来解决。

军队扩编方案

全军改组和下一步各军扩编的办法如下：

湘军今年 7 月计有八个团（8000 人），他们正利用缴获的武器组建第九团（合计 9000 人）。九个团编成三个师，组成第五军，谭延闿任军长。到 1925 年底，可再补充几个团，总兵力可达 12000 人。1926 年即可满员，达到 15900 人。

滇军（朱培德将军）今年 7 月计有步枪 6500 支，编成两个师、两个独立旅和两个团。届时，将整编为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组成第七军，朱培德任军长。今后，只要他（朱培德——作者）继续效忠国民党，则该军在 1926 年即可扩编为两个满员师，达到 10600 人。

黄埔军除军校 2000 名学员外，今年 7 月计有一个师即三个团，新编第四团即将组编完毕，四个团共计 6000 人左右。第二师也已着手组编。库存步枪（包括苏俄最近提供的一批在内）有 5000 余支。建立第三师的组织工作，预计不久也要开始。1926 年初，黄埔军即可达 15900 人，将组成第四军，蒋介石任军长。

^① 鉴于上列预算是精打细算的，我想，如果政府的总收入增加，则军费预算亦可增加，因为全省的进款总额很可能突破 3000 万元。 加伦

粤军。梁鸿楷第一军计有 6000 人，编成三个独立旅和若干独立团。只要梁鸿楷本人及其所部效忠国民党，则今后将该军整编为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或保留现有三个独立旅。军队人数不予增加。如果将其缴械，则把武器移交第四或第六军，部分移交第五军。

李福林将军的第三军计有步枪 4000 支，编成若干独立旅。一有适当机会，就要对该部实行缴械，把武器移交第四、第五和第六军。

李济深的第一师今年 7 月计有 6000 人左右，编成两个旅即五个团。

该部将整编为第六军（辖两个师），到 1925 年底即可达 10600 人，李济深或陈铭枢（后者更为适当）任军长。

第三师、第四师、英雄旅以及许多独立旅及独立团计有 12000 人，将改编为两三个师，组成第二军，许崇智任军长。军队人数不予增加。

吴铁城将军的独立旅今年 7 月计有 2000 人，现已着手成立第三团。

该部将扩编为一个师，隶属蒋介石的第四军，或者作独立师使用，直属军事委员会。到 1926 年即可满员，达到 5300 人。

桂军第五师今年 7 月计有 1000 人左右。该部应予解散，其人员分别补充于第四、第五和第六军。

程潜部有 1500 人，另有统称为北伐军的外省籍小股部队 2000 人。该部将扩编为程潜将军的一个师，到 1926 年即可满员，达到 5300 人。该师或隶属于某一个军或作独立师使用。

惠州要塞守军（杨坤如将军任司令）今年 7 月计有 4000 人，编成四个旅。该部应予解散，其人员补充于效忠国民党的其他各军。

这样，1925 年 7 月，粤军兵力即有 59000 人。

1925年底应予解散（如有反抗，即行缴械）的部队计有李福林将军的第三军、桂军第五师、惠州要塞守军和第三师（莫雄旅除外）。梁鸿楷的第一军亦有可能解散。解散的部队共有17000人。这17000人将依照上列顺序分别补充于各个部队，这样，到1925年底，部队总人数仍然不变，即59000至6万人。

依照上述方案，1926年上半年，蒋介石、陈铭枢、谭延闿、朱培德军，以及程潜和吴铁城师都将分别达到满员，总兵力可达72600人，即整编为分别隶属各个军的12个师及两个独立师。

1926年上半年，还将新建一个师。这样，到1926年上半年底，总兵力可达到78000至8万人，分别组成五个军和三个独立师。三个独立师，依据作战需要，可随时编为第六军，亦可隶属第四或第六军。继续作独立师使用也未尝不可。

全军整编将仿照黄埔军进行。部队必须开展政治教育。军队要设政治机关，并实行党代表制。

必须指出，上述扩编方案的组织部分有可能随着广东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也许，第二军的一些部队也要缴械，朱培德的兵力也许不但不增加，反而要全部解散。但无论如何，政府军的总人数仍然不变，因为可以利用被解散的部队再建若干师。

基于同样的政治理由，也难保不出现如下情况，即不得不改变方案，一方面限制蒋介石或其他将领大力扩军，另一方面新建部队，以期保持力量平衡，并使新建部队能牢牢控制和掌握在党的手中。

当前，要扩编的部队，特别是黄埔军，可以吸收一部分罢工工人参军，从而使军队进一步革命化。

训练指挥员、军政干部和行政干部

训练指挥员和军政干部，提高军队现有军官的战术和政治水平，是当务之急。为此，在今后几个月内，应建立以下几种干部

训练学校：

（一）训练排、连指挥员的正规军官学校（在黄埔军校现有基础上扩充）；

（二）中级和高级指挥人员进修班；

（三）参谋学校；

（四）士官学校，招收文化程度高，智力发达的士兵为学员；

（五）军政干部学校；

（六）炮兵、机枪、通讯、工兵、卫生、军需和海军等诸军种、兵种学校和训练班。

战术专科学校和政治专科学校由军事委员会管辖。

正规军官学校和士官学校应多多招收湖南、江西本地人。因为这两个省是北伐军必经之地，他们了解本省，通晓地方语言，便于军队同百姓联系，既有政治意义，又有实际意义。

为在北伐军新占领区建立地方政权和农民组织，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培养行政干部、农会组织者和宣传员，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广东大学应成为培养地方干部的学校。现有的农民讲习所应尽量扩充，并成立许多新的宣传员训练班。这类学校和训练班务必大量招收湘、赣两省各地方的人，以培养通晓当地语言、熟悉本省风土人情、善于联系百姓、并能在政治上扎根于百姓之中的工作干部。

培训这些干部的时间尚属从容，这类学校和训练班12月即可开课，为期四、五、六个月不等，到1926年6、7月份，这批干部即可训练完毕。

对北伐前夕各邻省政局的估计

广州政府同邻省相互关系的现状，到1926年上半年未必会有大的变化。

福建方面虽然与广州政府对立，但囿于本省各将领彼此勾心

斗角，真要较量，怕是力不从心，即使决定阻挠我北上，他们也拿不出多少兵力来。我军留守潮州—汕头一带的两、三个师确保粤东边界的安全，当不成问题。

贵州方面也是因本省各派军事力量内部关系错综复杂，要阻挠我北上，是绝难办到的，恐怕只有听之任之。

四川方面迫于本省实业界的野心，对武昌地区早已垂涎三尺，并且已经同湖南督军赵恒惕多次交手。可以设想，随着我军北上，四川方面乘机进军武昌未尝不可能，这对北伐成功有百利而无一害。

广西方面一向同广州政府友好，表面上受广州政府管辖，但目前范（石生）唐（继尧）之争已引起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因此以往的关系可能起某种变化，但还不足以对广州构成严重威胁。^①

湘、赣的兵力

对赵恒惕和方本仁现有兵力的确切情况，我一无所知，但我以为我的估计是大致不差的。当初，方本仁同原督军争夺本省权力的时候，其兵力不过才15000人。估计现在兵力已增加一倍。但方本仁收编督军的残余部队之后，方军就未必个个都效忠于他了。我们出师北上，他至多能拿出2万至25000人的兵力对付粤军，而以其余兵力守卫湘北地区，因为该省原有驻军并未全歼，他们隐蔽起来，四处打家劫舍。至于湘军兵力的情况，我就了解得更少了，但估计赵恒惕现有兵力不下5万人，能够以35000至4万人的兵力阻止粤军。两省能够用来对付粤军的兵力共有55000至

^① 在这里，我有意回避了云南方面的作用问题，因为在我离华时，我很难预料范唐之争因范出兵云南而如何演变，但据我估计，云南方面未必有力量阻止我北上。——加伦

65000人。

吴佩孚和包括肖耀南在内的亲吴势力必定出来支持湘、赣军队，但他们在长江东北受张作霖部牵制，在北方又被国民军拖住，所以拿不出多少兵力，估计至多不超过2万至25000人。这样算来，敌军兵力可达75000人，极而言之，达到85000至9万人。但这种兵力优势仅是表面现象。亲吴派的援兵也可能迟到，也可能根本不来。

一切取决于张作霖的态度。其次，国民党的态度如何，也将直接影响亲吴派军队的举动。我们知道，在中国，即令是一个军阀指挥的军队，也往往因内部不和而不能步调一致，更何况方本仁和赵恒惕了。因此，要方、赵二人的军队相互步调一致就难上加难了。

可见，敌人虽然在数量上居优势，但不利因素很多。可以设想，一经真正交火，敌军在关键地区的兵力就毫无优势可言，其兵力要么与国民党军队旗鼓相当，要么还不及国民党军队。

总之，敌军兵力超过我军一半并不可怕，若超过一倍，则胜负就要看谁的战术更胜一筹了。估计，国民党军队的战术略胜一筹，因为作战的实际指挥者是我国的顾问。

国民党保卫广东的军事部署和北伐

国民党现有十五个师，决定以五或六个师的兵力，保卫广东，即东边三个师，西南一个师，西边一个师，广州一个师。总计33000人。

其余九个师（47000人）出兵北伐。如果广西太平无事，则出兵前夕，将西边一个师调回，编入作战部队，使作战兵力达到52000至53000人。作战部队包括朱培德的第七军、谭延闿军和粤军（如果那时粤军还存在的话）第二军。黄埔军也加入作战部队，这一来能为作战部队贴上政治标签，二来可提高作战部队的战斗

力。

陈铭枢的第六军和几个独立师留守广东，或者如前所述，将其中一个师编入作战部队。

作战部队要集中出发，集中突击。江西、湖南两省要择其一攻打之，攻克一个省，再迅速廓清另一个省。

集中作战，可以旗开得胜，这无疑有助于国民党的最后胜利。政府军初战告捷，可以灭敌军的威风，使敌军将领之间的内讧公开化，从而导致个别将领归附国民党军队。

无疑，这将为国民党军队增添生力军。

樊钟秀将军 1925 年 1 月自广东出发进军河南时只有 4000 人，到达河南时，其兵力已超过 2 万人。足见我的推断并非没有根据。

湘、赣两省被攻占之后，即以战时临建部队留守占领区，而以大部队不失时机地攻克汉口、武昌及汉阳。

湘、赣敌军一旦被击溃，肖耀南元帅集结于汉口的兵力就不难解决了。党军所到之处，农工团体和行业组织即有自由，行政机关即行改革，这无疑会使全体革命群众竭诚拥戴党军，再加上进到长江之后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和成立国民革命政府的口号，国民党就将在这一斗争中得到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最广泛的支持。

凡此种种，归根结底，使北伐成功变得无可争议。

国民党进抵长江并占领汉口，使国民党得以占据国内的一个工业中心，这将对国民革命运动的促进，并由此引起整个时局的突变，这样，北伐对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种种好处，在目前甚至是难以估量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可以变得大为光明，国民党的权力有可能向东扩展到上海。

北伐要取得成功，还必须争取国民军对北伐采取应有的态度。为了扎根于华中，变汉口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并逐渐使汉口

成为革命首府，万不得已时，牺牲广东也在所不惜。果真要如此，则留守广东的军队即可抽回，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经这样一变动，党在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根据地非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壮大，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之一——汉阳兵工厂一到手，扩充武装部队就有了保障。还有，黄埔军与国民军的关系密切化，有助于国民军进一步地革命化。

我把以上意见统称为国民党军事规划。1925年3月占领汕头之后，我曾首次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中共广东区委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国将领就这项规划作了局部的阐述。6月15日，我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再次就这一规划作了报告，6月下旬，我向湘军军官和将领们第三次报告了这项规划。现提交你们审议。^①

这项规划，我认为是切实可行的，同时我也认为，这项规划在实施以前，有必要加以补充，并在武器装备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加 伦

说明：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企图使国民党军事化，为避免这种指责，我认为有必要附带说明，这项规划的政治方面考虑得欠周详，因为政治方面理应由政治代表负责研究，至于军事规划，它不过是政治计划的补充而已。

此外，这份军事规划仅仅是初稿而已，还有待进一步修订和补充。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打字稿。副本。

载《亚非人民》杂志1967年第5期，第144—156页。

（录自（苏）A.И. 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① 加伦将这份规划送往莫斯科。——原书编者

加伦对蒋介石计划的意见

(1925年9月20日)

蒋介石的计划^①是我同他多次谈话的产物。他把历次谈话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了归纳和整理。中国人历来喜欢搞计划、方案之类，在南方尤其如此，蒋介石也不例外，他这次搞出一个建立一批新工厂和建造潜水艇的方案。现仅就计划的实质提出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业已转告蒋介石。

一、没有必要建立“国防委员会”一类的专门机构，因为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能够执行它的职能。

二、各要害部门必须派驻俄国顾问，否则难以保证这些部门的工作效能。^②

三、设立军区是一种冒险之举，一来会助长将领们闹独立，二来会扩大他们对地方当局的支配权力。

四、扩编许（崇智）将军的部队，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

五、关于北伐作战部队的人数问题。只要政局于我们有利，至多有45000至5万人就够了。

六、鉴于交通不便、联络困难、指挥人员战术素质差，根据前几次作战经验，师的基本编制宜采取三三制（一连三排，一营三连，一团三营。——作者）。

^① 指1925年6月26日蒋介石给加伦的一份文件，题为《计划与提出计划的政治上军事上的理由》。这份文件曾在美国出版（见：《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纽约1956年版，第176—180页）。——原书编者

^② 加伦大概是指国民党军阀怀有自私的目的。许多重要问题因触犯军阀的个人利益而无法解决。——原书编者

七、地方警备队是否必须建立，有待商榷。为了将全部财力物力用于野战部队，警备队可暂不建立，而由野战部队代行地方勤务。只要野战部队部署得当，此项任务是不难完成的。

八、说到修复要塞，应首先明确要塞的任务。假如启用要塞的目的是要守卫内河免遭帝国主义兵舰袭击的话，那末，鉴于新式敌舰的火力，单单修复要塞是无济于事的。

虎门要塞即使大型兵舰也照样能靠近，只要是黄埔港的水位保持16英尺左右，兵舰就可以停靠。帝国主义的这类兵舰都备有强大火力，要对付这种火力，除非前线的所有老炮一律以新炮替换，而且要建造钢筋混凝土炮座。这要耗资数千万元，我们是负担不起的。

要塞其实是军队的辅助力量。依我看来，无须为修造要塞而耗费巨额资金，只要将装备清查一次，将老式炮淘汰，保留那些弹药有充分保障的炮，其余的炮维持现有水平，也就足够了。为老式炮新建混凝土掩蔽体是划不来的。

将口径大、射程远的炮从虎门要塞调往黄埔港倒是可取的，这样更能发挥这些炮的作用。

九、水雷厂和造船厂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如要修复，无异于重新建造，而这是我们所负担不起的。故目前我们应把这一点从计划中抹掉。

十、潜艇不仅买不起，而且恐怕也买不到。

十一、兵工厂的设备理应改善，但新建炼钢厂和轧钢厂，是我们力所不及的。

十二、现有兵工厂实际只有火炮修理部，要造新炮，就要增设火炮制造部，虽然这也需要，但为财力所不容。应立足于以缴获敌炮来充实自己。攻克汉口之后，汉阳兵工厂即可为我们提供大炮。

十三、先谈空军的任务：

英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不仅仰仗它在中国沿海的海军力量，而且仗恃它在中国内河的兵舰。建造海岸炮和兵舰，以对付帝国主义的现代化舰队，不仅在政治上行不通，而且限于财力和设备，也是办不到的。所以，空军是对付帝国主义海上霸权的最实际、也是最廉价的现代化手段。这一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广东。因此，与其修复要塞和建造过时的内河炮艇，莫如用这笔经费建立若干空军中队。

不妨从国外购置 10 至 15 架现代化飞机机身，在广州兴建一座不大的飞机制造厂，飞机机身由该厂仿造，发动机和其他重要部件从国外进口。

飞行员还是以送苏联训练为好，广州现有一所规模不大的地方航校保留不变，因为经验表明，航空局所属这所航校培养飞行员是完全胜任的。

十四、建立补给机构和建造兵工厂的方案，以及成立枪炮修造所的问题，也应照此精神办理。

十五、关于部队训练，总司令部所属有关部门都一一做了规定。

十六、官兵薪饷务必增加，否则，他们不会拥护军队改组。

十七、其余各项，我表示赞成，并打算就这些问题向军事委员会提出报告，因为这些问题同原定提交军事委员会审议的计划草案大同小异。

1925 年 9 月 20 日于张家口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经加伦订正过的打字稿。

（录自《加伦在中国》（1924—1927））

北伐前夕

— 康奇茨* 日记（节录）

（1926年3月20日—4月18日）

3月20日

3月10日到达广州，我报告了第十师驻防区的形势和关于同路人的问题。谈了我自己的所有意见，就所有急待解决的问题作了说明。但结果是，我不回师里去了。北伐的准备工作就要开始了。派我到程潜将军（我已经和他共过事）任军长的第六军当首席顾问。第六军司令部设在惠州城里，那是我熟悉的地方。我的任所就在那里。

我已经不能回第十师，因此给他们写了信。

由于陈铭枢外出开会，我就写信给师参谋长，向他告辞。

3月29日

在广州住了快两个星期了。还在3月20日就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变：蒋介石下令包围苏联顾问的寓所，并且解除了警卫的武装。包围我们的是黄埔第二师第五团的第二、三营的士兵。这样，我们被关了几个钟头的禁闭。

蒋介石的镇压活动是从“中山舰”开始的，他下令逮捕舰上所有的共产党员。舰政委被击毙。

事变于3月20日解决，解除了封锁，把武器交还给了我们的警卫，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了结。

* 康奇茨1919年加入苏联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历任师长、副军长等职。1925年6月前来中国，先后在何应钦部第一师、程潜第三路军、李济深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程潜第六军担任军事顾问和首席顾问，并在军事总顾问布留赫尔（加伦）的总部担任要职。

25日，我与铁罗尼一同动身去惠州。我们接到通知说，两天前在离石龙车站15里的地方，有200多个匪徒带着四挺机枪袭击了在40个士兵的护送下去惠州的一群老百姓。我们的护送队有10人被打死，20个人负了伤。事后才知道，护送队的人还要多，而且土匪还缴了200名士兵的枪。

白天，我们到了樟木头火车站，程潜派第三团的一个营来接我们。我们在樟木头过夜并于26日早晨动身。程潜给我送来了一匹马。

27日14点到达了惠州。程潜非常亲切地迎接我们。我想，在这里工作一定会很顺利的。随我们一起到这里的还有4个共产党员和政治顾问铁罗尼的翻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

惠州地区的农会有近1600名会员。平山、淡水、古竹的农会工作开展得也很好。

工会有会员近2500人。在惠州开办了10个俱乐部。在淡水有25个共产党员，惠州有55个，在第六军里有17个，这已经不算少了！

程潜为人们所称道，他本人对共产党员很好。

3月30日

农会主席来到军部。他给人的印象很好，有分寸，很有修养，也讲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4月1日

为我们举行了宴会，宴会上大家都很高兴。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军里的代表都出席了宴会。程潜高度评价了苏联顾问的工作，强调了中苏联盟的重要性和苏联顾问的帮助。

4月2日

我给程潜讲了军司令部管理方法提要，这个提要我已向参谋长推荐过了。

4月4日

今天，与程潜的第六军军校毕业生一起到惠州城外逛了一趟。走到第四团曾经作战的城北门的时候，我给学员讲了夺取城堡战斗的细节，还泛泛地讲了现代化要塞和现代化的军事装备。

政治部代理主任是一个国民党右派分子，他对我们很不好，参谋长也是一个国民党右派。政治部里的气氛是不大好的。但是，共产党员都是极好的小伙子，尤其是党支部的领导人。

4月5日

今天与程潜谈了3月20日的事件。他对此事作了这样的解释：“蒋介石是‘孙文主义学会’^①的头目，这个学会的宗旨就是对付共产党的。”

程潜说，他劝过蒋介石，叫他不要建立这个学会，因为这会导致与共产党人的对立。程潜的学生想加入这个学会，但是他们不吸收，认为程潜的学生们是共产党。在汕头，程潜遇到了几个先前已加入了这个学会的学生，他因此而责备了他们。

程潜说，对他的政治部里有共产党员工作这件事，他感到欣慰。

在分析国民革命军的各个部队时，程潜指出，第二、三、四军都是反蒋的。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是个诡计多端的政客，是广东的头号滑头。他手下的大部分军官都想升官发财。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是个大烟鬼，他的大部分军官也都抽大烟。他贪财，大部分经费都中饱私囊，士兵的军饷微薄。他的军官每人都至少有两个老婆。

李济深指挥的第四军，除了第十师以外，其他各部都很弱，人员不足，枪支也没有充分保证。李济深是广西人，而他手下的军

^① “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为对付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革命派而建立的反革命团体。原书编者

官们都是广州人，这些广州人总是排斥外省军队，如果要他们出征，他们不去，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保卫自己的省界，仅仅如此。

程潜接着说，第一军得到了一批步枪，很快就要收到第二批。第二军、第三、四军也都想得到些枪支。

关于第十七师，这个师里有一个团长，曾经是护送孙中山去北京的卫队长，程潜同他很熟。

11点，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程潜详细讲了国民革命军的宗旨和国民党的纪律。

17点，铁罗尼作了关于红军的报告。程潜也讲了红军和目前广东的形势，把它同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时期的俄国革命形势作了对比。军部的全体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出席了大会。

晚上与程潜谈了师和团的组织问题。

4月7日

今天为我们来到惠州而举行了人数众多的欢迎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各界的代表。大会的口号是“中苏联盟！”程潜发言讲了俄国顾问的作用。我在讲话中谈了苏中联盟，并对于我们受到的盛大欢迎和得到的崇高荣誉表示感谢。

4月8日

早晨，政治部来了两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她们是被派来做妇女工作的，是两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国民党右派阻挠她们开展工作。

广州发来电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政府里的情况趋于好转，国民党右派有所收敛，蒋介石也不得不见机行事。

4月10日

从前的湘军第五师今天开来补充第六军，与湘军第五师一同前来的还有第六军的政委、共产党员林祖涵（林伯渠）。他到政治部来找我们，并且讲，在广州开始平静一些了，蒋介石作出了让步。

4月11日

今天在俱乐部里召开了政治部工作人员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林祖涵作了关于3月20日事件、关于北方形势以及关于军政治部任务的报告。在他之后，所有的与会者都发了言，进行了工作总结，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希望。

18点，苏联顾问举行宴会。邀请的人有程潜、林祖涵、惠州的国民党党部的书记、农会主席和工会代表。我在讲话中感谢中国同志对我们的关怀，详细讲了有关军里即将进行的改组问题和学习问题。

程潜和林祖涵讲了列宁和孙中山，讲了他们之间的通信往来，同时还讲了苏联顾问的工作情况。铁罗尼的讲演很成功。

4月12日

我与林祖涵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后来又与程潜进行了交谈。程潜说，今天他下达了禁止在他的部队里建立“孙文主义学会”的命令，但是，他却同意在部队里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

4月13日

今天发生了一件事。经牧师同意后才进驻意大利教堂的模范团里的一个军官，在教堂里挂了一张孙中山的像和他的遗嘱。牧师表示不满，把遗嘱给撕了下来。于是，那个军官就打碎了罩圣像的玻璃，双方吵了起来。牧师要给驻香港的意大利领事发电报，告诉他此地发生的暴力行为，并且要求他立即出面干涉。

政治部党部的一个负责人找我讲了这件事的经过，我建议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冲突。后来冲突解决了，意大利牧师撤回了他的电报。

他们报告，在惠州驻扎着黄埔学生师所属的一个学生营。这个营的任务是训练那些愿意到黄埔军校学习的学生，在黄埔军校通过6个月的训练，毕业后就成为军官。在这个营里，有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小组，它在进行着反对第六军和反对俄国援助

的宣传。

4月15日

今天举行了军部全体军官会议。程潜作了关于军队纪律和国民党的纪律的报告。

4月16日

今天一天没歇脚。早晨，我同林祖涵一起去了国民党党部。林祖涵作了关于广州和北方的政治形势、关于3月20日事件、关于在军队和老百姓中开展政治工作的报告。

铁罗尼的报告很好。他讲了苏联的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在军司令部党部直属的妇女部工作的两个青年女共产党员也讲了话。而后举行了代表会议。除了其他的问题之外，还讨论了战备的问题，但是参谋长对这个问题却采取了极其官僚主义的态度，所以这个问题很快地就算讨论完了。

4月17日

在今天早晨的政治部会议上提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决定在各团的宣传委员会里增加委员数额并筹办俱乐部。

林祖涵今天走了，留下了他的助手——一位姓唐的共产党员。临行之前，林祖涵曾来看望我们。我给他讲了我们同军里的一些领导人的相互关系，讲了代表会议是被参谋长搞乱的，因此，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未经充分讨论就草草决定了，同时，大会议程里又塞进了一些毫无必要在大会上进行讨论的问题。

林祖涵走了一两个钟头之后，先是程潜来找我，随后又来了参谋长胡新（Ху Син）以及一些新上任的团长和从广州来的程潜的秘书。林祖涵大概已经与程潜谈了，程潜详细讲了改组的过程，答应经常来看望我们以及在各方面都要同我们进行磋商。他说，再过一个星期要同我们一起去广州。胡新在我这里转悠了四五分钟就走了。

军政治部唐副主任告诉我，在林祖涵上任之前，军政治部国

民党的前任支部书记就曾公开反对苏联顾问参加政治部的会议，说“政治部里共产党太多”等等。总的来说，他的态度是不友好的，而参谋长就是这个人的兄弟，所以他对我们抱这种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4月18日

晚上程潜又来了。非常客气。他说，他收到了蒋介石和谭延闿的电报，催他尽快到广州，他打算在下个星期动身。

关于我是否应该去石龙第十七师的问题，他回答说，去是应该的，并且建议我同他一块去。

在从前的湘军第五师里，有一个苗族士兵连。程潜说，这些士兵很勇敢，很能吃苦，善于排除障碍，善于攻取很高的山头，等等。他们都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吃生肉。

* * *

至此，我的日记中断了。

第十七师我未能去成，因为程潜、铁罗尼和我很快就被召到了广州。在广州，总司令部的所有部门都在加紧进行北伐的准备。第六军的预备队也驻在广州。程潜几乎整天都呆在他的“后方司令部”里，研究在即将开始的北伐中如何保证全军的一切军需物资的供应问题。我给了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5月初，莫·莫·鲍罗廷回到了广州。我们得悉，弗·康·布留赫尔很快也就要到广州，同他一路来的还有休假归来的阿·依·切列潘诺夫以及我的家属。

5月底，我接来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但是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不长。6月中旬，我就和程潜一起回惠州了。全军都在加紧北伐的准备工作。

在中国我呆到1926年年底。我随程潜将军的部队参加了北伐，后于1926年10月被任命为弗·康·布留赫尔野战司令部的参谋长。布留赫尔是国民革命军的首席军事顾问，他在制定粉碎

军阀孙传芳和夺取南昌市的重大战役的计划和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起了杰出的作用。

遗憾的是，我的日记没有记下去，而我对发生在 35 年前的一些事件的回忆，不可能像那些年的日记有文字记载的那样准确。如果我的日记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那些对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历史感兴趣的人有所裨益，我就深感满意了。

今天，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自由，并且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感到无比高兴的是，我们苏联志愿者——过去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过的俄国军事顾问，曾对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而斗争的伟大事业和为加强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作出了自己一点微薄的贡献。

（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苏联顾问在中国》（1923—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加伦关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三期 作战部署简述

（1926 年 12 月 16 日）*

—

为便于领导和指挥进攻，决定成立各路军如下：

第一路军：赖士璜将军的第十四军（4 个团），第五军第四十六团；计 14 个团。（原文如此。数字有误。——译者）

第二路军：刘智平将军的第二军，第四师、第五师和第六师；

* 此处时间与文末不一致，确切日期待考。

计 9 个团。

第一、二路军由刘智平将军任指挥。

第三路军：朱培德将军的第三军第七师、第八师和第九师（8 个团），程潜将军的第六军第十七师和第十九师（6 个团）；计 14 个团。

由总司令亲自指挥。

第四路军：李宗仁将军的第七军（9 个团），贺耀祖师；计 15 个团。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任指挥。

第五路军：第八军一个师和第十五军一个旅；计 6 个团。唐生智任指挥。

总预备队：第一军第一师（两个团和两个营）、第二师（5 个营）；计两个团和 7 个营。第四军第十师和第十二师（5 个团），由陈江龙将军^①任指挥。共计 7 个团和 7 个营。

二

为向南昌—九江发动总攻击，规定集结地和攻击位置如下：

第一、二路军在南昌东南的进贤和南昌以南的丰城。

第三路军在距高安 60 里的潮汕地区。第三和第六军在安义一带。

第四路军在距武宁 60 里的花桥镇以东地区。

第五路军（湖北省）沿长江北岸，荆州和广济西北地区。

总预备队的第一军在奉新地区，第四军在箬溪地区。

三 集结日期

（一）传达命令和换防，估计需要两天时间，第四军第十师于

^① 原件如此。恐系陈铭枢之误。——原编者

10月19日凌晨出武昌市郊，23日抵大冶。会师后，出大冶，经孝感，绕新沟城，抄近路直奔箬溪地区，其先头部队应于10月30日抵达，全军应于10月31日到达。

(二) 贺耀祖师一个旅出修水，旋即与第七军会师。驻防平江的其余两个旅迅速向第七军靠拢，应于10月24日前在武宁集结。

(三) 第一师出箬溪地区，应于20日抵达安义。第六军抵达安义之后，第一师即移兵奉新一带，与第二师会合，加入总预备队。

(四) 第六军应于10月22日抵达安义地区。

四 当前任务

(一) 第一、二路军指挥刘智平将军，应立即猛攻福州一带，务求全歼守敌，随后在南昌一线三汊港（Шичига́й——译者）一带就地采取攻势防御。铁路沿线敌主力已被我第三和第四路军拖住，故坚守南昌一线有一师兵力即已足够。第二和第四军应以其余兵力一鼓作气歼灭福州守敌有生力量。

(二) 第三、第六和第七军进入攻击位置后，即应向东派出先头部队，与主力保持大约15至20里的距离。转入总攻击之前，各部队务必采取攻势防御，但又不能局限于攻势防御。作战经验一再表明，在开阔地作战，是国民革命军的一大长处。每当敌军试图向我进攻时，我军务必发扬这一长处。每次挫败敌人攻势之后，务必奋力反攻，穷追不舍，将敌人一直赶到铁路沿线，然后班师回防。

各部队应将所占攻击位置侦察周详，划分地段。在各要冲和薄弱地段周围挖掘战壕，要预先选定机枪阵地和炮兵阵地，以便以有效的侧翼火力封锁敌人向我攻击位置进攻的道路和其他可能的进攻路线。敌人发动进攻时，不应以全部兵力坚守阵地；要有后备力量，以便随时反攻和追歼敌人。

（三）各军要立即组织小分队，频繁地袭击铁路，捣毁路轨和通讯联络。要伏击小股敌军，突袭深入铁路沿线我方一侧的敌警戒部队。突袭要速战速决，果断有力，连续不断，尤其要经常抓获俘虏，以随时掌握敌情，使我军在转入攻击之前能对敌军部署了如指掌。其次，要切实搞好对敌谍报和军事侦察工作。

（四）以南昌—九江为目标的总攻击开始之前，我长江北岸部队即应到达抚州（Цзучмоу，疑为抚州。——译者）一线。总攻击一开始，就立刻攻占武溪。

五 转入总攻击的日期

第四军先头部队到达箬溪之日，即为我军转入总攻击准备就绪之日，也就是10月30日。无须等待第四军于箬溪集结完毕。第七军和贺耀祖师攻打德安一带和德安以北之敌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假如第四军头一天发动攻势在时间上与第七军及贺耀祖师发动攻击相隔一天半行程的话，那么，随着第七军及贺耀祖师进军铁路线并同敌人交火，这一间隔就将缩短到半天行程，换言之，可缩短到预备队与进攻部队应保持的正常间隔，这样，就可以视第七军及贺耀祖师作战的情况，选择于我方最有利的地区，随时派第四军参战。

不过，在有利于我军的下列两种情况下，亦可先于10月30日转入总攻击。这两种情况是：

（一）第二军迅速打败或打散福州之敌。这如能成为事实，则向福州以东方向追歼残敌的任务就要落在第四军身上，而以南昌为目标的南下任务就要由第二军第一师去完成了，其余两个师应配合第三路军进攻。这样，由第二军两个师加强了的第一、二、三路军以及由贺耀祖师加强了第四路军，就可以不等第四军到达而转入总攻击。

（二）敌人乘国民革命军按兵不动之机，主动发起攻击。这样，

我们于开阔地击溃敌人之后，即可奋起追击，向铁路沿线发动总攻击。

六 主攻方向

主攻方向将取决于当时敌军部署，这是国民革命军主力选择主攻方向的关键所在。以往几次战斗表明，敌人仗其南北两段有重兵把守，而将精兵和后备队集中于涂家埠一带。敌人既有这样的部署，我军攻占涂家埠一带并于该地消灭敌有生力量，就该是于战役非常有利的。因此，第四路军应首先向德安一带和德安以北出击，攻占铁路。然后，贺耀祖挥师北上，朝九江进军，这样，第四路军即分兵两路直捣九江。唯有占领涂家埠，方能以重兵攻打九江。第三路军进攻南昌—乐化车站一线，攻克该段铁路以后，除留下少量部队以阻截敌军外，应以全部主力自南向浦江（Пуцзян，音译。——译者）一带进击，国民革命军如能渡河（借助浮船），以重兵进驻南昌东北一带，摸清铁路南段后方的情况，则大破敌军自然就容易多了。总之，国民革命军这次作战，应力求避免以大部队正而攻击敌人的设防阵地，要设法以主力包抄敌军，实行两面夹击。

敌军十有八九会以重兵攻打高安，以阻截国民革命军的进攻。驻守该地的我第三军和第二师恐怕难以抵挡，而该地又是连接我军两翼部队的要地，于国民革命军至为重要。因此，当务之急是，第六军应迅速向安义运动，第一师应及早向第二师靠拢。

各路军务必协同一致，于同一时间合力攻打铁路线。这是保证战役成功的基本条件，这项基本条件如果得不到遵守，则战斗绝难奏效，徒招无谓牺牲。因而，不宜硬性规定进军（进攻）铁路的日期，而应于时机成熟之时下达攻击令。

如果敌军以重兵进攻我国民革命军某一路军，则其他各路军务必在各自战线向敌人举行反攻，加以回敬。否则，敌人就有可

能集中优势兵力于前线某一地段，先取得局部胜利，继而如法炮制，导致国民革命军全线受挫。

七

为保证部队于进攻过程中保持正常联络，应立即着手架设电话线和无线电台。

（一）无线电通讯。为了同驻守丰城一带的第一、二路军进行联络，应于高安总司令部设置一部无线电台；为了同第四路军联络，应于武宁再设置一部电台。海宁现有的无线电台应立即调往高安，留作备用。

（二）立即架设新电话线，认真修复原有高安至嘉义的电话线，认真修复总司令部用来同第三军保持联络的电话线。各军应立即将电话线与总司令部的干线接通。此外，架设从萍乡经漫江（Ваньцзай，疑为漫江。——译者）和铜鼓至修水和由修水至武宁的总司令部第二条电话线。

八 政治工作

各军各级政治部和党代表应当趁行将到来的前线休战时机，在军内广泛开展政治工作，阐明北伐的目的和任务，使全军懂得：为着国民革命，为着建立独立国家，必须早日打败孙传芳。还要在江西省我军占领区大力开展农民工作和其他阶层的工作。必须向民众说明，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使国家从国内外掠夺者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我们的斗争也就是为召开国民会议而进行的斗争。

九 补 给

（一）兵站总监须知，铁路南段和第四路军驻地大米和食盐不足。因此，在总攻击开始之前，应设立前方粮站，即第三路军粮站设于潮汕和奉新一带，第四路军粮站设于武宁一带。

(二) 鉴于最近连续作战,官兵疲惫不堪,自10月20日起增加士兵伙食,实行一日三餐。为此,补给部门应及时拨出经费或调拨食品。

(三) 鉴于最近几次战斗消耗弹药甚多,部队应立即补充子弹和炮弹,并在总攻击开始之前,于前方粮站所在地设前线弹药库。

(四) 加速为部队运送冬装。

十 卫 生

(一) 立即腾出各军医院,将现有住院伤病员撤往长沙。

(二) 进攻开始后,设前方医院:第三路军医院设在高安,第四路军医院先设在通城,后设在武宁。

另据10月17日情报,第四军全体官兵已登船从武昌开赴大冶。这样,第四军可提前于10月27日至28日到达箬溪一带,预计贺耀祖师将于10月22日至23日即与第七军会师。因此,总攻击的准备工作可以提前就绪,10月23日即可发动总攻击。

加 伦

1926年10月16日于高安

(录自《加伦在中国》(1924—1927))

附 1

布勃诺夫听取关于北伐问题的汇报*

(1926年)

切列潘诺夫

我们等候布勃诺夫委员会的召唤已经好几天了。后来我们得

* 标题为编者所加。

知，1926年2月11日叶戈罗夫武官向委员会作了一个报告。叶戈罗夫是未来的苏联元帅、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红军军事首长之一，所以他的意见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

叶戈罗夫认为，必须对中国的形势作一个全面的分析，制定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他说，有一次曾试图这样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加拉罕、叶戈罗夫、维经斯基、索洛维约夫和特里福诺夫。他们对维经斯基拟订的纲领进行了讨论。但是，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1926年2月14日，在大使馆的一间房间里我们见到了首长。我们正要按规矩向布勃诺夫行军礼，他用一个温和的手势制止了我们。他说：“请注意，我是作为个人到这里来的，我甚至不叫布勃诺夫，而叫伊凡诺夫斯基。”然后他向我们介绍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他们是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边区区委书记库比亚克，重要的工会工作者列普谢，以及工农红军的指挥员隆格瓦，他是委员会秘书。我在国内战争时期就认识了列普谢。他惊讶地拖长了声调说：“原来你在这儿呀！”友好地和我拥抱。我和隆格瓦也不是初次见面。

因委员会的到来而采取的预防措施看来是适宜的。因为在那些年代，中国到处都是帝国主义的特务和白俄分子，只有严格保密才能保障我国重要工作人员的安全。

我们怀着特别的兴趣仔细端详着布勃诺夫。我们知道，早在革命前他就是党的最优秀的组织者之一。他曾同伏龙芝一起为团结伊凡诺沃-沃兹涅信斯克的工人而进行了英勇无畏的地下斗争，不止一次遭到逮捕。1917年，他是领导十月武装起义和占领冬宫的5人小组的成员。在国内战争期间，他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领导了红军的许多次战役，其中包括解放乌克兰的战役，而且，仅在5年之前，他因参加镇压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有功而荣获红旗勋章。

我还记得，刚一见面，我们大家就都急急忙忙地向委员们讲述我们对中国的一般政治问题的看法，说得有些不大连贯。在这方面，讲得最棒的当然要算尼洛夫和捷列沙托夫，因为他俩曾在鲍罗廷的总顾问处工作，对这些问题了解得一清二楚。捷列沙托夫到广州后不久就从黄埔军校调到那里工作了，而尼洛夫在那儿工作是临时性的。

布勃诺夫起先耐心地听着这一切，后来很委婉地打断了一个顾问的讲话，问道，黄埔军校的教学工作进行得如何。原来，布勃诺夫虽然是部队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但他对纯军事问题、部队的日常生活都有深刻的了解。这个问题主要是我回答的。

这次谈话的主题很快就确定下来了。同志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的前途如何。应当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尼洛夫和捷列沙托夫的看法是不同的。尼洛夫斩钉截铁地断定，再过二三个月将能出动三四万国民革命军讨伐北洋军阀，他们甚至可以解放北京。捷列沙托夫则十分肯定地说：“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进行北伐。”他认为，北伐以前应进行长期准备，必须有近一年的时间在广东省及其邻省进行政治工作，储备足够的武器和粮食，创造物质条件。捷列沙托夫还认为，为了在北方稳固地立足，在那里应当有一个像黄埔军校那样的军事训练中心。应当创建这样的革命策源地。即使一二年内看不出明显效果（黄埔军校就有八九个月“无所成就”），但以后它是会起到作用的。

布勃诺夫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同志们的讲话，用那一对天蓝色的、非常漂亮的大眼睛凝视着发言的人。对布勃诺夫提出的北伐是否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这个问题，捷列沙托夫作了肯定的回答。

无论尼洛夫还是捷列沙托夫都就北伐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想法。尼洛夫注意到了坚实地巩固新征服地区的问题。他还指出了一种很特殊的、在当地条件下特有的危险——大量被打垮的军阀部队可能加入国民革命军。这些未经革命锻炼的部队无疑会在

后方造成威胁。

尼洛夫呼吁广泛利用广西革命政府面临的种种可能性。他认为，只要把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我们的顾问派到广西去，那么不出三四个月就能造成像广州那样的形势。

总的说来尼洛夫是极其乐观的。当然，我们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仅仅相隔一个月蒋介石就进行了反革命政变的第一次尝试，在广州策划了众所周知的1926年3月20日的事件。不过，一部分人对形势的估计较为谨慎，另一部分人就十分肯定。尼洛夫无疑是属于后者的。他宣称，在广州集中了中国唯一有纪律的军队。他说：“政府坚信，哪怕军长不完全可靠——现在这些军长是可以依靠的——他的部下也不会反对现政权。现在军队里不存在隐蔽的反对派，更没有公开的反对派。”现实生活推翻了这种估计。其实，当时估计错了的不止尼洛夫一人。

布勃诺夫在大体上了解了我们对北伐打算的态度后，就竭力让我们分析向北推进后可能产生的一系列最重要的情况。首先使他感兴趣的是，国民革命军在粉碎吴佩孚以后可能与冯玉祥部队相遇。布勃诺夫警告说，冯玉祥可能与南方政府为敌，因此，无论如何必须在国民军中进行认真的革命政治工作，就像苏联红军在国内战争年代在游击队中所做的那样。

捷列沙托夫说，他坚信冯玉祥部队在同国民革命军相遇两周后就会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敌人。布勃诺夫问道：“要是在这里、在北方对他们进行政治工作呢？”尼古拉回答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指出，在冯玉祥的部队里有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可以利用他们进行宣传。捷列沙托夫强调指出，即使可以避免同冯的矛盾，国民革命军仍然应在继续前进之前巩固已经占领的地区。布勃诺夫更明确地说：“假如南方政府在华中得以巩固，那么是否需要同张作霖签订停战协定呢？”尼古拉证实说：“必须这样。”

布勃诺夫想知道我们对帝国主义是否可能干涉中国内政、支

持反动派这一问题的看法。捷列沙托夫推测说，最近英国人将从香港对广州革命者采取某种举动。他指出，“最近一周内香港的调子完全变了”。2月4日，港英总督发表了一篇指责广州的讲话。一天后，来自新加坡的英国海军蛮横地在广州登陆，并举行了示威。日本报界挑衅性地叫嚣说，一旦发生冲突，日本将支持英国人。

布勃诺夫又提了一个问题：“会不会从香港对广州发动直接打击？”同志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尼洛夫的回答是否定的，而捷列沙托夫不同意他的看法。捷列沙托夫说，帝国主义者完全可能进行“近距离打击”（当时部队里都这样说）。就是他们在6月肆无忌惮地开枪扫射了举行和平游行的群众。尼古拉提请委员会注意一个事实：大罢工开始后一些军舰开到了香港，并飞来了30架飞机。英国人正致力于联合反动势力，使华中的两大军阀——吴佩孚与孙传芳结成联盟。

布勃诺夫直到听取了对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详细回答后，才回过头来分析总的问题。他说：“现在谈谈国民革命运动的前途问题。夏天我们有极其高涨的革命浪潮，现在是暂时的平静阶段。下一阶段会来到吗？如果出现新的高潮，商人、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将如何动作？运动是否会发生分化？”尼洛夫谈了他的意见，他说，由于国民革命军向北推进，革命运动会开展起来。但北伐本身不会引起高潮，必须准备在群众中，尤其是在农民中进行最广泛的宣传。

捷列沙托夫还把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同北伐联系起来。他说，根据报刊舆论判断，在上海对军阀的不满情绪在普遍增长着。甚至大商人也深受军阀们的专横不法之害。帝国主义的政策激起了同仇敌忾。

尼古拉向委员会讲述了这样一件很说明问题的事件。顾问们建议黄埔军校的中国教官拍照留念，并请他们到一家日本照像馆去。但遭到了友好的拒绝，因为谁都不愿去日本人那里拍照。

现在当我回想起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情况，我就感到了某种满足，因为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部分地证实了我的推测。我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从开始直到打到长江一带进展会比较顺利，但此后帝国主义国家将结成统一战线，反对革命力量。冯玉祥大概也会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敌人。在这一阶段需要在部队里进行重大的改组工作。可能有一部分过去的军阀脱离革命军。

我认为，南方政府在向北推进时，应当提出某种政治口号来发动农民。当时我已十分清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弱点在于缺乏一个明确的土地纲领。农民肩负着供应军队的全副重担，不能空手去向他们要。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鲍罗廷曾试图通过一个减租的口号，但没有为国民党人所接受，至于没收地主土地就更无从谈起了。我还指出“南方”和“北方”顾问之间缺少经常的联系。我们在广州很少知道冯玉祥那里在做些什么。有时候派那么十来名黄埔军校毕业生到张家口去，通过他们得到一点消息。根据冯玉祥那里的顾问讲述的情形来看，他们在工作中也犯了我们早期在广州犯过的错误。

布勃诺夫问道：“为什么广州不及时发出通报呢？”捷列沙托夫回答说：“广州的情况是：我们每个人都累得要命，每个人都得工作，抽不出人手来。”

在谈话结束时我们讨论了如何组织顾问工作，以及顾问在华的期限问题。捷列沙托夫主张经常更换顾问，使他们不致在军事知识方面落后于正在飞快进步的工农红军的指挥员。对这种观点我不能不表示反对。我认为，应当把第一批来华的顾问留一些在中国，哪怕几位也好。要知道，在这两年工作中我们熟悉了当地的条件，并同中国指挥员们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和他们一起打了三个战役。我们亲眼看到一些排长成长为团长。新来的顾问则不得不一切从头开始，他们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赢得我们已经享有的那种威信。为了使顾问不致落后，应当时而派他们回国参加

野营集训或短期训练班。

应当说，我所表示的想法是与委员会的意见相吻合的。不管怎样，布勃诺夫在临行前，对我们准备回国坦率地表示了疑惑不解，他说：“怎么能这样呢？你们为创造统一的革命军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赢得了广泛的承认。人家还在请我们派顾问来中国工作，可是在这时候你们却准备回家？”

布勃诺夫建议我到开封岳维峻的国民军第二军去，以便对那里的形势作出估计，并把在南方积累的斗争经验介绍给开封的顾问小组。在北京稍事休息以后，我应当返回广州去。我请求给点时间考虑这个建议。布勃诺夫感兴趣地问道：“是否有什么事使您特别急于回国？”我承认确有这样的原因：临出国时我被吸收入党，但没有来得及在区委会办理手续，这已经是第五年了，我还是个预备党员。布勃诺夫微笑着回答道：“这个问题由我来处理。当您回国时，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请，使您的党龄从我们这次谈话时算起。”

我们怀着满意的心情走出了这个举行会见的房间。布勃诺夫是有幸受过列宁教诲的党的老干部之一。他力图真正深入研究中国局势、了解我们在该国工作的优缺点，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委员会十分注意地听取了我们每个人的意见。我觉得，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想法，对实现以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庞大计划是有帮助的。

我这样详细地叙述我们同布勃诺夫委员会的会见，首先是想说明，我党是如何深切地关心中国解放的问题。的确，我们不同于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那类军事顾问，他们是雇佣者，供职是为了挣钱。而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唯其如此，我们在中国毫不停歇地工作，尽力深入了解当时中国人民所面临的复杂任务的实质。这一点在同委员会成员的谈话中也部分地得到了反映。

（录自（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附 2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节录）

（1976 年）

切列潘诺夫

（一）国民革命军插入湖北

前面我已经写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粉碎吴佩孚。这个艰巨的任务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容易完成是由于下述原因：在吴佩孚的军队里没有巩固的团结，吴军实际上，是由一些集团软弱无力地拼凑起来的。

占领直隶省省会的是田维勤的部队。在北京城里有六个团的卫戍部队，他们保卫帝国主义的走狗、卖身投靠的政客段祺瑞，镇压人民的愤怒反抗。这些部队大多数于去年编入了国民军第一军的一个师。

副总司令齐燮元指挥的在前线的四个军是吴佩孚本人的主要支柱。

在河南，军阀寇英杰指挥部队对冯绍闵作战，冯绍闵是起义反对吴佩孚的一位将军。现在，12000 名士兵，其中包括原国民军第一军的一个师，被紧急调往湖南打唐生智。

最后一个敌人叶开鑫将军到了岳州地区，因此在北伐主力向湘鄂边界出发前军阀们集结了八个师、两个旅的兵力。他们应是国民革命军首先遇到的敌人。在湖北，吴佩孚的小后方有六七个师。

如上所述，这些军队内部极不统一。北伐开始之前吴军仍然是四分五裂的。1926年7月24日加拉罕向莫斯科报告说，田维勤的一些旅、团已经转到了国民军方面，还有作为增援部队派出的一个旅也准备倒戈投向冯玉祥。

吴佩孚为南方出现的威胁感到不安，他力图在北方各省或多或少地补救他的事业。7月他通过齐燮元向国民军驻北京的代表提出了媾和的建议。

一位国民党人、原国民军的参谋长在向军阀作答复时，态度相当强硬。他要求吴佩孚公开声明同意调整与国民党的关系，只有在这一条件下他才同意向张家口报告所收到的建议。

同时吴佩孚试图把社会上拉到自己方面。全国商会联合会派代表团到张宗昌将军、满洲土皇帝的儿子张学良以及吴佩孚那里要求和平协调关系。看来这是吴佩孚怂恿的结果。与此同时，全国商会联合会还向各地方当局拍发了相应的电报。

资产阶级在这一问题上对吴佩孚的支持只是证明，资产阶级害怕爆发新的军事行动使其破产。吴佩孚在湖北向来用劫掠当地要人的财产作为巩固军队的经费。办法很简单，例如，为有名望的商人举行宴会，宴会上由吴佩孚的私人秘书把写有“十万”、“二十万”等等的非常简短的便条分发给各人。舍不得掏钱是不行的。这种宴席是卡在喉咙里吃不下去的，因此当地资本家便设法躲避，先跑到汉口的外国租界，再从那里到上海。

尽管采取了各种办法，吴佩孚军中开小差的现象仍然继续发生。恰好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之前，刘师长^①派代表找唐生智，答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倒戈，反对其上司陈嘉谟，甚至在革命军临近时占领吴佩孚最大的兵工基地——汉阳兵工厂。

至于控制着最强大的军事集团的孙传芳，他对国民革命军的

① 鄂军师长刘佐龙。——译者

意图感到极度不安。他首先试图出来保护唐生智将军所攻击的湖南省长赵恒惕。孙打电报给广州的蒋介石，建议把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力量从湖南撤走，并答应，在这种情况下北方人也从该省撤出，使该省由地方武装力量控制。这一举动使吴佩孚怒不可遏，他甚至在收到的报告此事的电报上写道：“谁为和平奔波，他就是布尔什维克！”

唐生智占领湖南省会长沙使孙传芳异常惊慌，他停止了对驻扎在赣北边界军队的视察，赶往南京。他向他所控制的五省^①下达了动员令，举行了军事首脑会议，会上决定鉴于国民革命军的威胁，向江西派遣两个旅。孙急忙从北京召回了他的前参谋长杨某，^②杨在北京的滑稽政府内担任农商总长。

但是孙的政治举动纯粹是由他的私利决定的。吴佩孚的命运很少使他不安，他只担心国民革命军攻入他自己的领地。当他确信革命力量不打算立即攻打江西时，他就撤销了他所拟订的措施。

第三股强大的军阀势力——奉系在1926年7月也试图媾和。张学良的代表向国民军中的国民党人提出了一定的条件。这种政治上的试探是与吴佩孚的类似行动同时进行的。

北伐开始前北方的政治形势大体上就是如此。

关于国民革命军总的战略意图上面已经说过。拟订了三个主要方向。唐生智指挥西路军（第四、六、七、八各军）。他的任务是占领长沙，然后占领武汉。中央军（第二、三军和第一军的一、二师）直属蒋介石指挥。他们应当保障西路军的右翼和后方，并掩护广东革命根据地，预防来自江西方面的可能的威胁，一旦开始与孙传芳的交战，就占领省会南昌。

东路军包括第一军的第三、第十四师和一个独立团，由何应

① 苏、浙、闽、皖、赣五省。——译者

② 杨文恺——译者

钦任指挥，该路军奉命掩护广东的东部边界，预防福建军阀可能的威胁。

国民革命军的部队由广东向湖南进军是这样进行的：第二、三、四军沿韶关——安仁——醴陵一线推进；第一、二两师沿韶关——郴州——衡州——株洲——长沙一线推进。

国民革命军的上述部队到湖南前，唐生智已同吴佩孚的拥护者开了战。上面我已经提到，他属于“保定帮”，他受过中等军事教育，当时已40多岁了。他也和蒋介石一样到过日本，精通日语。唐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曾几何时，他甚至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在同一个寺院里当过和尚。唐在他的士兵中也千方百计地提倡佛教，并且很有效果。他的总方针是：“佛教为本，孙文主义为用。”

唐生智部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这些部队的指挥人员都是“保定帮”。第二、第四教导师的师长是国民党右派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仇视我们顾问，对苏联援助中国革命持否定态度。

我有可能很好地了解唐生智，因为稍后的1927年，在汉口竟产生了任命我担任这位好用权势和性格刻毒的将军的顾问问题。按我当时的评价，他是一个自命不凡、只图升官的人。

早在北伐开始前三个月，唐生智就通过桂系将军们（也是“保定帮”）把其代表派往广州。国民党提出的把唐合并到国民革命军的条件如下：从他的方面帮助发展湖南的民众运动；允许在军队中进行国民党的宣传；执行国民革命政府的命令。但是谭延闿不愿意把湖南政权让给这个对手，由于谭的阻挠，谈判长时间处于僵局。

然而在1926年春，唐在居民的协助下把省长赵恒惕驱逐出了长沙。

最后与唐生智缔结了协定。他实际上接受了国民党纲领，在

自己的军队中正式建立了政治工作。接着，国民革命军用金钱和弹药来援助唐，但是这种援助不久就满足不了需要了。率领吴佩孚的拥护者对唐作战的叶开鑫得到吴佩孚好几个旅的支持。唐的处境极为困难，长沙失守了。

国民革命军是在非常艰难的开始北伐的：气候酷热，霍乱猖獗。加上道路——灌满水的稻田中的狭窄小路——非常泥泞难走。

北伐是7月9日正式开始的，可是早在5月20日第七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湘粤边界。第四军于6月11日接到出发指示，7月3日就已经通过了铁路的最后一站——韶关。

7月12日，加拉罕向莫斯科报告说：“如果最近一周内广州军和唐生智联合起来确实占领了长沙和长沙以北湖南全省，那么在这里、在北方将产生异常巨大的后果，这将对吴佩孚新的沉重打击，可能使吴佩孚全军覆没。”

7月9、10日，第四军的部队在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在醴陵、株洲地区粉碎了大批敌军。缴获步枪5000支、炮18门、机枪64挺、重机枪5挺，在当时这些战利品是很不少了。胜利后，第四军在醴陵集结。尽管取得了巨大胜利，第四军的顾问戈列夫仍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指出战役中的薄弱方面：对撤退的军阀部队没有组织追击；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力量，认为敌人在醴陵有可观的预备队。像往常一样，缺乏周密的侦察。

叶挺的那个共产党的团在战斗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个团在夜袭中拿下了株洲，然后又出其不意地从西边进攻，占领了醴陵。

国民革命军许多领导人担心，唐生智占领长沙后，将成为湖南的全权主人。因而起先进行了阻止其进攻长沙的尝试。但是该省的形势是有利的，因为决定投到国民革命军方面的、以后编成第九、十军的贵州部队有可能对湘西军阀进行打击。

7月11日，叶开鑫放弃长沙，两天后唐生智进入省会，他又无阻挡地向前推进了30公里……然后就派代表到汉口去告诉吴佩孚，他不准备进攻湖北。

唐在长沙立足已定，他觉得现在可以显出本性了。虽然他组织了类似广州政府那样的湖南省政府，但是他让自己的支持者占据了所有职务。只有教育厅长和运输管理局长他才派谭延闿的支持者周鳌山担任，而且立即又派他到湘西当“抚慰大员”去了。

唐生智尽力设法争取我们顾问的支持。为此，他通过一些国民党人提出建议，要求派遣共产党员去俄国学习领导工农运动，并且在同我们同志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暗示缔结供应武器的条约，甚至请求与陈独秀会晤。

占领长沙促进了各军阀部队的进一步瓦解。陈嘉谟将军突然打算与广州代表谈判，要国民革命军不入鄂境。他告知说，他的部下希望原来的督军（现任孙传芳的顾问）仍做该省的督军。在湘西，贺耀祖和另一个将军（他们是阻止农民运动发展的）被迫放弃了常德，他们的部分军队被广州军解除了武装。此外，在国民革命军向长沙出发之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军事首长之一的贺龙率部加入了国民革命军。

唐生智当时被看作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所以广州政府的政策总的说来是要巩固他的地位。

然而，唐生智却开始抬高身价，同时，他尽力设法损人利己，力求使自己的部队少受严重损失。8月22日或23日，他在所部军官会议上吹嘘说：“我们已经争得了湖南，我们争得它非但没有国民政府的帮助，相反，我们帮助国民政府将其军队开到湘鄂边界。现在我们不能再打了，我们应当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休整’，然后看情况再说。”

应当说，唐不是马上就采取这种态度的，而只是在当他看到国民革命军指挥部竭力不让他最先进入武汉时，他才采取了这种

态度。开始时为了尽快向武汉推进，他是全力以赴的。

他派副官到醴陵，要第四军军长和参谋长到长沙会商。在长沙，唐的第八军和第四军的代表在继续进军的速度问题上发生了争吵。

可以说，在占领长沙到武汉之战开始前的一个月內所做的事情只是第四军的代表接踵来长沙，以便拖延对武汉的进攻。

唐还采取了不能容许的手段（一般说来这是军阀们的政治阴谋的特点）。他致电第四军军部说，必须向北推进，因为师长们——其中也包括第四军的师长们——都要求这样做，与此同时，他把进攻平江的有关命令发给了各师长。他收到的回复是一封措词尖刻的电报，说他无权指挥“他”军各师。

第四军军长遵奉国民革命政府、总司令以及我们顾问的领导人的指示拖延进军的时间。在西路军的侧翼和后方没有保障时，是不能向北推进的。只有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各军开到才能保障西线部队的侧翼和后方。国民革命军主力开到之前的战斗胜利冲昏了唐生智的头脑，对他简直是无法控制了。

那时我们一些同志们也认为，向长江推进过快是不利于革命的，唐成了武汉的主人后，可能又重新变成通常的军阀。加拉罕也认为，占领岳州后必须停住，把全部军队都集结在长沙，补充部队，不进军湖北，而试图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占领湖北；为此必须对地方军阀实行分化瓦解，与孙传芳和杨森达成协议。

到8月19日，西路军各部队（第四军9000人、第七军1万人、第八军13000人）到了汨罗江南岸。第六军（8000人）向第四军南侧推进。蒋介石的第一和第二师留在长沙作为总司令预备队，第九和第十军驻扎在常德—澧州^①地区。

中央军集结地点如下：第二军集结在醴陵；第三军集结在泗

① 原文作Ланьчжэнь，恐系有误。——译者

汾^①。

在争夺长沙战斗中已经遭受损失的原叶开鑫部队以及湖北的两个旅（共25000至3万人）抵抗西路军。吴佩孚把河舰队中的14艘炮艇集中在岳州。

8月15日，蒋介石和总顾问加伦一起到长沙，次日举行了国民革命军高级指挥人员会议，8月18日下达了向武汉进军的命令。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对这个战役进行了详细研究。国民革命军在战役中的军事行动预定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必须组织右翼进攻，切断敌人向北的退路，把它逼到湖边缴械；第二阶段，在遭遇战中粉碎吴佩孚派来增援的预备队。

为此，命令第四军在击溃平江地区的军阀部队后，强行军在汀泗桥切断铁路。第七军应在西北方向发起进攻，切断敌人向北的退路，把它逼到湖边，会同第八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在战役开始时，第八军的任务是牵制敌人，帮助第七军绕到湖后面，在击溃敌人后向岳州推进。命令第六军作为第四军的梯列前进，以保障西路军的侧翼和后方，一旦孙传芳军队转入进攻，就准备加强第四军的攻势。

命令第九、十两军掩护湘西北。第二、三两军保障西路军的后方，并防止孙传芳部队侵犯粤北。通向武汉的要道从汀泗桥和咸宁以北是湖泊沼泽地带，十分难走。只有铁路沿线才便于通行。

加伦的总计划把军事艺术与对政治情况的非常清醒的考虑结合在一起。当时被认为是广州政府的主要支柱、与“保定帮”或蒋介石都没有密切联系的第四军应当开往关键阵地汀泗桥。毫不奇怪，在讨论计划时“保定帮”是不那么高兴的，他们曾打算自己首先上铁路到汀泗桥去，以便取得向武汉进军的最好方向——

① 原文作 Сибирь，恐系有误。——译者

在湖泊之间沿着铁路前进。为此，他们提出让第四军向东移，腾出地方给第七军。当司令部坚持原来意见时，他们表面上同意了，可是在战役过程中，他们仍企图按自己的一套去做，这一点我们下面就将看到。

在此以前，“保定帮”的主力大大增加了。第八军在争夺长沙的战斗过程中和在占领城市之后，吸收了大量俘虏，来扩充自己。该军现有 28 个团，即 10 个师。李宗仁的第七军（广西部队）也同样如此。

第四军的成分也是复杂的：陈铭枢的第十师是由“保定帮”领导的，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当时比较靠近国民党“左派”。至于第二、三、六各军，他们一般说来是有反唐情绪的，它们把他看作是最大的对手，可是他们对总司令也没有特别好感，因为他大大缩减了对他们的财政支援。

平江城是吴佩孚极为重要的据点，是汨罗江北的战略基地。守卫该城的敌军达 4000 至 6000 人。局势要求第四军迅速占领平江，并在吴佩孚部队到达之前越过湘鄂边界的山口。

第四军的顾问戈列夫对战役进行了详细研究。他的主张是，8 月 19 日以该军右翼攻打平江，由第十师担任主攻。叶挺独立团应把敌人牵制在汨罗江南的据点上。

第十师同防守汨罗江北岸的军阀部队两个营纠缠了三个多小时。与此同时叶挺准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有力地牵制住了敌人（为增援该团又调去了两个营）。此后，叶挺把一支小部队留下来对抗敌军据点，自己率主力在平江城东渡过河，从北面绕过城，进入了团山地区。独立团会同已到达的第十师各部队和从西面绕过平江的第三十六团，包围了敌军，俘虏敌军士兵 6000 多名。由于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和叶挺团长的指挥艺术和主动精神，汨罗江上的战斗取得了胜利。

第四军继续进攻时，遇到了拼死的抵抗。这时，第七军没有

在西北方发动进攻，反而缓慢地沿着泥泞不堪的道路向北穿过九岭山支脉，希望在第四军前头占领汀泗桥。孙传芳在江西突然开始令人怀疑地调动部队，这牵制了第六军的注意力，因而不可能加以支援。8月26日，第四军在汀泗桥孤军奋战。

多次的白刃冲锋造成了重大伤亡。例如，第十二师的一个营伤亡一半。但战绩也是辉煌的。在汀泗桥作战的敌军有9至11个团，计1万至11000人，其中仓皇撤退的敌军只有三分之一。有2000多士兵或跑散了，或溺死湖中。第四军缴获了步枪4000支和其他战利品。国民革命军的两个团（内有叶挺独立团）在追击吴军时，占领了咸宁城。

戈列夫在指挥战斗中无疑起了杰出的作用。他在自己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起先敌人有秩序地从一线撤退到另一线，但是当独立团的打击加强时，撤退就变成了溃退。独立团8点钟之前就到了铁路上，来不及逃走的都留归了我们。”戈列夫指出了战役的不足之处（附带提一句，这些弱点在当地条件下是常有的），指出由于根本没有通讯联络设备，因而不可能始终对部队进行指挥。

在各军之间为首先进入武汉进行了一场特殊的竞赛。其结果，第七、八两军的行动弊多于利。“保定帮”拼命努力，想比其他各军早在汀泗桥上铁路。因此第七军没有严格遵守预定的行军路线，而转到了第四军的进军地带。这是夜间的事，它们之间没有发生友邻部队自相残杀的战斗实在是一个奇迹。第八军本应牵制敌人，可它也想首先到达汀泗桥，因而提前转入了进攻。结果没有包围住敌人，而把敌人从为它设置的口袋里放跑了。

吴佩孚在汀泗桥与第四军发生激烈战斗。在附近的第八军的一个团没有执行第四军军部的命令，可是在胜利之后它却最先去收集缴获的步枪。第四军内曾通过一项决议：如果该团在占领的咸宁城内拒绝服从命令，就解除其武装。直到占领咸宁后，其余部队（第七军、第八军的部分部队和蒋介石的第二师）才与第四

军靠近了。

8月22日，第四军追击敌人的溃散部队，占领了湖北境内的通城。占领岳州后，第八军第二师在上面提到的吴佩孚的炮舰完全消灭的情况下在金口渡过了中国的大江，并继续推进，力求在汉口稍北切断京汉铁路。

与此同时，在北方张作霖非常出乎意外地使冯玉祥的国民军遭到了最严重的失败，占领了南口这个设防的山口。吴佩孚趁此时机，决定堵住国民革命军到武汉的道路，他来到了贺胜桥地区的前线。

从长沙到武昌对于防御者来说最有利的地段是咸宁以北（武汉三镇之一）这一段。这里的道路在湖泊之间，形同走廊，宽1至5公里不等，其中靠近武昌的地方道路最窄，加之湖水到处泛滥，因此吴佩孚的炮舰可以自由开到武昌。

由于国民革命军各军行动不协调，致使军阀们在失败之后仍能重整部队，构筑极好的工事。吴佩孚在这里集结了三个团和一个混成旅，并且仍然在等候预备队的到来。

这一切使敌人的士气大为振作。8月29日，国民革命军指挥部甚至获悉了前所未闻的情报，即吴佩孚的一个团已转入了反攻，这是军阀第一次主动发起进攻。

在咸宁的军官会议上制定了作战计划。会上决定：第四军沿铁路线突破；第七军从铁路线右边推进，其中该军一个师向武昌县迂回，从东边接近武昌要塞；第四军以蒋介石的第二师为增援部队，并得到了两门苏制炮。综上所述，包围被击溃的吴佩孚军队的任务落在了第七军身上，它将从侧翼打击敌人。第九、十两军奉命进攻沙市。

在我们一位顾问的领导下详细制定了从浅滩处向贺胜桥防御工事突破的计划。第四军三个师接踵投入战斗。先头部队追击敌人直到部队疲惫为止，然后后续部队通过先头部队的阵地再继续

战斗，等等。炮兵被编成以军参谋长为首的突击部队，配备给先头部队。

尽管敌人有极好的侧翼防御阵地，8月29日夜，第十二师的一个团（三十五团）还是在沼泽地对岸牢固地占领了阵地，从而保证了进攻的出发阵地。战斗进行了一整夜，该团遭到了重大损失。

8月30日晚5时，第十二师全师投入战斗。叶挺独立团以及强行军赶来支援的第十师的一个团沿铁路线实现了决定性的突破。上午10点钟前已经突破了宽3公里的整个防御地带的三道防线，而且每一道防线都有几条战壕。

肩负主要战斗任务，并已遭受重大伤亡（约500人）的第十二师挺进到了贺胜桥。第十师进行了追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顾问铁罗尼在该师任顾问。第十二师没有遇到意料中的抵抗，可是它行动迟缓。第七军到贺胜桥比第四军的主力晚了一昼夜，它没有完成包围敌人的任务。

根据戈列夫的看法，作战的主要弱点仍然是缺乏真正的侦察部队。第十二师的第三十五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突然陷入了极端不利的处境。至于吴佩孚的军队，他们一直在顽强抵抗，看来他们意识到，如果在这样有利的地带放过国民革命军，那他们必然丢失湖北省和武汉三镇。

敌人采取了新花样：他们利用铁路把机车直接开到战场，在机车上用机枪进行扫射。怒不可遏的吴佩孚元帅亲手砍下了他的几个下属军官的头，但仍不能挽救局势。他本人也只得在国民革命军开到前半小时乘自己的专列仓皇逃跑，被列车轧死的正在撤退的士兵不计其数。

从被占领的敌军司令部内发现的命令中可以看出，敌军打算在湖泊的走廊地带长期坚持，等待预备队。缴获的大量武器，特别是大批存粮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这些粮食可以算出准备给贺

胜桥守卫者派的援军的数量。

在贺胜桥的辉煌胜利之后，国民革命军各部队有可能马不停蹄地立即占领武昌，这一点后来是十分清楚的。8月31日夜，当第四军在纸坊^①的时候，下达了一道命令：第十师紧追惊慌失措的敌人突入武昌。第十二师当时由于黑夜和极恶劣的天气耽搁了。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他怕担风险，因而不顾顾问铁罗尼的坚决抗议而撤退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敌人当时深信武昌无疑会陷落，甚至夜间把部队撤到了城外，后来又让部队开进城里。

清晨，第十二师和第二师相继赶到，但为时已晚。第十师师长的张惶失措和优柔寡断使国民革命军花费了40天时间围攻武昌城，至少牺牲了1300至1500人。

其余部队刚集结起来，便决定攻打要塞。制定的计划如下：由第十师从东面担任主攻；第七军和第二师承担相对来说较次要的任务；为了吸引敌军兵力，他们应在主攻前半小时开始进攻。全部炮兵都归第十师，第十二师在南湖和湖间通道留作预备队。

最先爬上武昌城墙的应是携带毛瑟枪和手榴弹的奋勇队员，他们是从第十师、第十二师中招募的。指挥部答应给他们每人100元，此外，规定发给第一支冲入武昌的部队3万元。蒋介石曾建议枪毙后退的士兵，但这一建议遭到了断然否决。

第七军刚赶到，它的作战部长和顾问马马耶夫就前往左翼自己未来的地段进行侦察。第七军被指派为攻城部队的预备梯队。

从实质上说，第二次东征时国民革命军在围攻惠州时所犯的那些错误，在武昌城下又全部重犯了，而且错误犯得更大。奋勇队员们不得不在南湖听取蒋介石的歇斯底里的演说以提高士气，然后再步行五六公里到出发地去。命令规定云梯在18时送到，结

^① 今武昌县。——译者

果直到 24 时才送到。陈铭枢使攻城推迟了 1 小时，实际上他比指定时间晚了 2 小时才发动攻击。结果，使一些最优秀的勇敢的战士在接近城墙 15 至 20 步的地方转来转去，而军阀部队则从掩体向他们扫射。第七军没有展开冲锋，“因为无法过河”。国民革命军损失了 200 至 250 人。

清晨，唐生智、蒋介石、加伦来到了阵地上。9 月 3 日晚，加伦在军官会议上详细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攻城在技术上没有准备好，拂晓后才开始，在指挥员之间战役的每个阶段完成得有迟有早，增派预备队互不配合，没有炮兵火力。

蒋介石先提出 4 日白天开始新的攻击，但是认真地考虑一番之后，又改为 5 日。国民革命军应当在全线同时发起猛攻。李宗仁指挥左翼，而第四军副军长指挥右翼。唐担任总指挥。蒋在战斗前夕到了第十师和第十二师防地，这又是把自己装扮成拿破仑的一个机会。

左翼以两个团的兵力在 3 门炮掩护下发起冲锋，右翼以 6 个团的兵力在 8 门炮掩护下发起冲锋。威名远扬的叶挺独立团和第三十六团一起从东面城墙攻城。第八军直到战斗末尾才投入战斗，而且参战的是一个非主力师。

苏联人在武昌城下同往常一样忘我地战斗。在塔伊罗夫（铁罗尼）旁边的翻译诺维科夫中弹阵亡；敌人射死了塔伊罗夫骑的两匹马，但是塔伊罗夫仍旧往最危险的地方冲。飞行员们在城墙上空进行超低空盘旋飞行，使被包围的部队丧魂落魄。表现最突出的是萨沙·克拉弗佐夫（谢尔盖耶夫当时在准备江西省军事行动用的飞机场和飞行基地）。

然而 9 月 5 日和 9 日这两次规定的攻城实际上都准备不足，没有组织应有的联系来保障战斗的进行，因而受挫。马马耶夫这样解释失败的原因：“武昌是相当坚固的要塞，城墙高四俄丈，宽两三俄丈，城墙是用石头和砖垒成的。靠城墙外妨碍防守的房屋

在第一次攻城后都被烧掉了。没有攻城炮城墙是不可能摧毁的。国民革命军在武昌城下只拥有缴获来的 3 英寸口径的野炮。然而军阀部队却从炮舰上把大炮卸了下来，用来加强要塞的防御。”

国民革命军的突击被打退后，被迫转入了长期的有计划的包围。9 月 7 日，第二师和第八军中的鄂军师未遇抵抗而占领汉阳，数日后又占领汉口。汉口的刘将军向国民革命军倒戈，他的军队编为第十三军。至于武昌，在设置了封锁线，切断了各条补给道路，并挖了地道炸毁城墙以后，现在是可以拿下它了。

指挥部过低估计了吴佩孚在武昌的力量，认为被围困的是 6000 人，可是占领后查明，超过 12000 人，这清楚说明了侦察工作的缺陷。攻城的工兵准备工作有着严重的缺点。

为了节省力量，保证机动性，对围攻者作了一项规定：只在前线保持最低数量的部队。随着国民革命军作战范围的扩大，攻打武昌的部队数量减少了。9 月 11 日，第七军被调往江西。9 月 17 日，第二师也被调往江西。第八军的一个师拨给了第四军。

在武昌城下，指挥部与其说指望军事上的胜利不如说指望军阀的传统外交，这种外交是以反动军队中十分普遍的改换门庭为基础的。从 9 月 19 日起，与各守城部队逐个进行了关于移交条件的谈判。从武昌躲到汉口的外国人充当了调停者。

个别军官有几次同被包围的这个或那个团达成了协议。刚刚反正的第十三军军长与武昌守备军司令的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要塞内开始了骇人的饥荒，守城部队内部不时发生了自相对射。

在围困过程中有一个时候对包围要塞的部队产生了严重的威胁。第七军从武昌撤离时，途中没有消灭驻扎在大冶山区的军阀集团。孙传芳参加与国民革命军作战后，便利用了这些军阀，并往那里派遣增援部队。有四五千人前去武昌解围。他们甚至基本上可以在咸宁切断国民革命军与湖南之间的交通线。

唐生智竭力想利用暂时形成的局势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

希望把控制武汉的权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手中。他在向蒋介石的新参谋长白崇禧将军（属桂系，因而是“保定帮”的支持者）报告以后，命令第八军代替第四军，让第四军在排除来自大冶的威胁后，开赴江西。第四军的第十二师已经被换防，可是蒋介石希望在武汉能有一种对抗唐的力量，因而怒不可遏地谴责唐生智，并撤销了换防计划。唐试图坚持，但是没有成功，第十二师被召回原防地。

与此同时，在武昌城下，指挥部同湘军第三师的一个团长取得了“相互谅解”，并答应反正后给他旅长衔。敌人应当在10月10日打开南门，但是结果没有履行这个义务，看来是由于在门口构筑了坚固的街垒，这在中国是常有的事。然而，该段城墙的守卫者允许第四军一个团爬云梯进武昌城，其他分队便随他们之后冲进城去，有爬梯子翻过城墙的，有通过打开的要塞大门冲进去的。

第四军和第八军遇到了相当顽强的抵抗。第四军的行动十分坚决有力，比第八军主动得多，甚至完成了第八军的部分任务。

于是，华中最强大的要塞攻克了。国民革命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步枪1万至11000支、机枪30至40挺、炮10至20门。战利品的（75%~80%）归了第四军。那时要准确确定战利品的数量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军官出于可以理解的考虑，对缴获的武器弹药或者闭口不提，或者缩小数量。

在武昌城下，我们顾问起了重要的作用。关于他们亲身参加战斗的情况已经说过了，而且他们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对战役的领导。在第二次攻打武昌时，第十师的顾问是铁罗尼，第十二师的顾问是帕洛，第二师的顾问是西林（阿基莫夫）。

（二）孙传芳的覆灭

国民革命军在去长江流域的路上粉碎了吴佩孚之后，孙传芳

就成了革命武装力量在华中唯一严重的敌人。在此以前孙传芳已充分估计到了南方人所向无敌的力量对他的危险性。但是，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懂得，孙拥有比吴强大得多的军队，战胜他将不是很简单的事。加之在9月从侦察的情报中得知了在鄂西的四川将军杨森的敌对意图，虽说他被认为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军长。这一切都迫使人们必须审慎从事。

在9月曾试图与孙传芳达成临时性的协定。9月20日蒋介石从萍乡把与孙讲和条件的电报拍给正在进行谈判的邓演达将军，邓整夜劝说军阀代表们接受条件，但是那些代表们一口咬定说，这等于是投降。其实对孙的要求是很有节制的：让孙传芳部队退往安徽。稍后，邓演达和唐生智的信送到了孙驻九江的行营，他们要求，除了撤军之外，停止军事行动，在江、浙两省恢复国民党党部。必须指出，在孙的部队里也有一些将军试图让孙为了反对奉系的行动而与国民革命军讲和。但是很快弄清楚了，谈判是不现实的，他们仅仅是在为准备大规模进攻作掩护罢了。

还在月初，孙就决定首先发起进攻。他向南淝铁路沿线派遣了3个师和8个独立旅（6万人）。一个师和几个混成旅（2万至25000人）由皖省开往鄂东；两支先遣部队开往赣西。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巩固他在湖南已经动摇的地位，因此不让加伦得知就决定主动进攻孙传芳。他心血来潮，毫无准备就采取了行动。1926年9月2日，他下达了3天后发起进攻的命令：第六军应从通城（该军在涂家埠^①战斗之后驻于此地）向义宁^②运动；第三军向萍乡运动；第二军向吉安运动。全军的最终目的地是南昌。

第六军和蒋介石的第一师旗开得胜。9月16日攻占高安。于

① 即永修。——译者

② 即修水。——译者

是第六军军长程潜作出了非常轻率的决定。他打算在朱培德的第三军到达之前拿下南昌。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程潜受朱节制，为此他非常委屈。程潜的顾问康奇茨劝说这位由他关照的人放弃未经周密考虑的行动，但徒劳无益。康奇茨坚决要求：“您不要着急，与朱协调行动。”康奇茨同时把报告送给了加伦，最后，康奇茨亲自找加伦去了，但已经来不及了：第六军发起了进攻，并于9月19日占领了南昌。关于事件往后的进展康奇茨报告如下：“敌军从突然的打击中清醒过来后，沿铁路线迅速调来一批一批的新部队，并用歼灭性的炮火、机枪火力击败了第六军疲劳的部队（该军没有炮）。第六军守不住城池，被迫退却，伤亡惨重。不执行命令使第一师受到极大损失，第一师没有去占领南昌车站，而是爬山越岭向纵深迂回到乐化¹车站，结果伤亡过半。

“这时第三军离南昌只有一天路程，但它没有给以任何援助：朱正在所谓作壁上观，看着敌人打败程潜，而他那时是完全有可能援助第六军的。程潜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下面将看到，他也会以牙还牙，对朱培德进行报复的。”实际上朱是在高安东北离高安颇远的地方，而在第六军失败之后，他撤退了，在离该城15公里的地方扎了营。

旧日军阀们的激烈纷争又一次（不知已经多少次了）成了比整个国民革命军的共同利益强大得多的因素。

第六军于9月23日退却了。第十七师（捷斯连科任顾问）、第十九师和第一师成批地被消灭了。程潜将其残部集中到了丰城以西的上富，决定在两星期内重整旗鼓。

加伦赶往东部前线，并于9月30日抵高安。他用他特有的精确性立刻对局势作出了估计，并从严重的失败中引出了教训。他

¹ 原文件，Лапа。 译者

写道：“由于程潜对南昌的袭击，我们损失了在主攻江西方面七个作战师中的三个师的大部分兵力，这有可能导致我们在江西前线的彻底失败。我军这第一次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是在程潜和朱培德之间缺乏协调一致。”加伦也指出了失败的一些次要原因。程潜率第十九师进城后，没有采取措施向铁路南段进攻。王柏龄迅速调遣自己的部队，并进了城。第一师对南昌车站的袭击没有马上得到第十七师的支援，十七师直到撤退前才参加战斗。加伦还设想，假如程潜在湖西岸，就可以守住南昌等待第三军的救援了。根据“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格言，加伦指出，这次作战的唯一好处是解救了两名在南昌监狱里受苦的苏联飞行员，以及蒋介石的走狗、反动分子王柏龄的灭亡。^①

加伦到高安时正值孙传芳进攻高安。敌军四个混成旅向第一师推进。于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开始了积极行动。10月1、2日在万寿宫^②地区发生了激战，结果军阀部队被打死千人，损失6门炮、2000支步枪、一些掷弹炮和机枪。抓获俘虏多人。

但是朱培德不敢组织追击敌人，因为敌人可以沿铁路线调派预备队。此外，第六军为了报复第三军在南昌城下见死不救的行为，没有给他援助。

9月30日，第七军在武宁附近也取得了胜利，彻底歼灭了敌军一个师，缴获步枪数千支，炮8门。

加伦在着手制订夺取江西的作战计划时，冷静地估计了国民革命军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他确认，国民革命军的武器装备远不如军阀部队。在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里那时只有一两门炮，而在孙传芳的一个师里就有不下4门炮，加之在孙传芳的一些旅里（人数大约相当于国民革命军的师）有加农炮。孙军在机枪方面同

^① 王柏龄在这次战斗中只身逃脱，并未阵亡。——译者

^② 原文作 Саньшоугун。——译者

样拥有优势。敌人的炮火是很准确的。孙传芳把其他一些省的部队都集中到了江西省，以致加伦有权得出结论：争夺江西的斗争发展成了彻底粉碎孙传芳全部力量的斗争。

加伦总结9、10月间的战斗经验时，满意地指出：“第二、第三、第六各军及各师的联合行动已经实现，但由于与第七军联系很差，因而它的行动带有独立性。”国民革命军“在战斗中的表现超过各种对他们的夸奖”。只有第十七师经不住火力。“我们完全是以顽强精神、刺刀和夜攻取得胜利的。”

这样自然会带来很大的牺牲。如第三军在争夺高安的战役中伤亡近2000人。加伦报告说：“我们没有组织好歼灭退敌。原因是：我们人少，不能在战斗中包围敌人，敌军在夜间大批撤走（在陌生的地方夜间沿着无数曲折的田埂进行追击是非常困难的），此外，还有师长们的胆怯。”

加伦做了关于向南浔铁路发动进攻的总的指示，然而他又着重指出，必须认真地改编国民革命军的各部队。但是蒋介石又一次以自己的干涉把事情搞糟了。10月4日，他背着加伦到驻在奉新的第一师，并下达了第二天发动进攻的命令。第七军应占领德安；第六军占领建昌和涂家埠（敌人已经把这里变成了极好的防御线）；第三军前往铁路南段。

加伦对蒋介石的意图进行了有充分根据的批评：第三军在10月7日以前是不可能向前推进的；第二军还得晚一天才能从南边接近南昌。假如第七军在这种情况下攻打德安，那么敌军就可能把国民革命军各个击破。敌人拥有迅速调动兵力的极好手段——后方的铁路。加伦说：“如果敌人很好地利用铁路，总司令这一次愚蠢的决定可能变成我们的全面失败。第六军的处境特别危险。我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使我们各部队的进攻能及时互相配合，但是由于通讯联系很糟，对此不能抱多大希望。我使进攻延期了一天，这使各部队向铁路线靠近能稍微拉平一点。我正为使这次战役获

胜而竭尽一切努力。”

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的担心不幸而言中。第七军冲入了德安，但是在那里遭到了机枪和指挥得当的炮队的致命火力，两天后被迫离开该城，撤到武宁地区。第六军不知道友邻部队受挫，发起进攻，结果被打退。10月10日，第三军在乐化地区发起进攻，没有得手。铁路和极好的有线通讯使敌人有可能迅速调动部队。国民革命军离开了铁路线，伤亡重大，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完全被破坏。孙传芳甚至试图包围第七军。10月6日他在瑞昌让5个团渡过长江，想让他们绕到国民革命军的后方，但10月12、13日第七军打退了这些部队。

由于国民革命军作战失利，不得不考虑调集新的力量。前面已经谈到，第四军应在大冶、阳新一带消灭军阀集团。10月18日，该军接到蒋介石命令：在月底前把该军调到武宁，作李宗仁指挥的北路军的预备队。既然不能把武汉完完全全托付给唐生智，所以在第四军副军长和各师长的会议上决定了把某些部队留下来对抗“保定帮”：几个预备团，军官中有重大伤亡的叶挺的英雄铁团、还有两个营。

军长陈可钰生病了。陈铭枢担任了武汉卫戍司令，因此向江西开拔的有第十二师和第十师中的4个团和一个营，张发奎任总指挥，顾问是帕洛。他们是10月21日出发的，敌人在此之前已经从大冶撤退了。因而根据第七军的请求张发奎加快了行动。

这是不奇怪的，国民革命军急需增援部队。在10月的那些战斗中，有些部队伤亡的连排长达（70%~80%），营长达50%。雨季开始了，天冷起来了，粮食和弹药的贮备均已告罄。

在此期间加伦为加强国民革命军组织上的团结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借助于电话线和那些乐于帮助革命军的农民，在各军之间、以及每个军与设在奉新的行营之间建立了联系。关于10月10日攻陷武昌和吴佩孚的残余力量（3个师）丢弃宜昌的消息使国民革

命军大大振作起来了。

在最详尽地研究全部细节之后，加伦于1926年10月28日下达了进攻江西的命令。命令包括了关于孙传芳各部队的最详细的情报，这些情报是以侦察得来的材料为基础的。

孙传芳的力量在此之前分成了几个集团。在南昌南边驻扎着一些战斗力差的部队，计11500名士兵。在牛行—乐化地区驻有13500名士兵，但其中两个团是倾向于投到国民革命军方面来的。在建昌—涂家埠—德安地区集结了13000人，这是孙传芳的中央军，在这里一个团已准备背叛军阀。此外，在九江有5500名士兵，其中一个旅与国民革命军保持着联系。因此，孙传芳军的总人数可以确定为45000人。其中有7000人是准备与国民革命军合作的。

国民革命军与周凤歧的浙江军队——他们担心奉军进攻江苏省这种十分现实的威胁——进行了谈判。加伦因此认为。攻击敌军右翼是不利的，这可能引起与浙江军队不必要的摩擦，姑且不说克服自然障碍的困难。加伦在命令中指出了敌军阵地的普遍弱点：敌军的后方都依河傍湖，而敌军几乎完全没有渡河的工具。

总攻定于11月2日举行。现在蒋介石不作声了，他让加伦全权领导作战部队。

国民革命军的主力、参加南昌会战的各部队的驻地如下：第七军、贺耀祖的第二独立师和第四军的第十二师驻在乌石；第六军驻在安义；第一军的第一和第二师驻奉新；第三军驻在南昌以西30公里处。

作战示意图看起来是这样的：第七军、第二独立师和第十二师应当攻击德安——马回岭地区；然后第二独立师转向九江，第七军由北边攻打涂家埠。这是突击的主力部队，计2万人。第六军从南边进攻乐化车站和涂家埠。第三军攻打南昌车站。第一军的一、二两师作为预备队，驻于第六军和第三军之间。另外，第

二军和第十四军由南边进攻南昌，两军的总人数为75000人。加伦着重指出：“坚决、迅速地执行命令将保障这次战役取得全胜，在战役进行过程中不仅不应当白白浪费日子，甚至不应当丧失钟点。”

加伦认为控制南昌防御区的主要据点涂家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我们占领涂家埠将从敌人手中夺走其中心据点，摧毁其全部防线，使之陷入由我们各部队与河围成的这个口袋之中，只要我军坚决果断地行动，就将使敌军主力陷入重围，并被彻底歼灭，从而消除孙传芳的军事威胁，在此之后占领九江将会毫无困难。”加伦还指出了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各军无论如何应力求沿铁路线同时发起进攻。”

如今与“轻率”的10月行动不同，为了保证对战役进行全面的准备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部队发给了冬衣，建立了兵站、野战医院，与各军建立了经常的电话联系（与第七军用无线电联系）。加伦的命令译成了中文并由蒋介石签署。命令的俄文文本同时分送给了我们所有顾问。

尽管加伦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但在执行命令时自然立即就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加伦认为必须把第四军各部队作为北路军的预备队，而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北路军的总指挥）却另有想法。战役的胜利对于他是第二位的问题。对他来说，首要的任务是保存自己部队的实力。所以他把攻打德安的主要任务交给了第四军。而第七军与贺耀祖的独立师只是集结起来进行掩护和“进行示威”而已。如果抛开那些漂亮话，事情就是第四军为第七军扫清道路，而第七军则应在攻打马回岭中起决定性作用。不妨提一句，这也符合第四军的心意。第四军的指挥人员吸取了湖南的经验教训，几乎深信不疑，友邻部队将陷入困境，同时向各个方面密派了许多探子。果然，第七军来迟了，而第二独立师在战斗的第一天就“没有表现出任何生气勃勃的样子”。

在南昌战役期间，加伦和蒋介石把顾问科尔涅夫留在总司令部，他们自己则随第三军和第六军出发了。加伦绝对相信战役将取得最终胜利。还在高安时，他就对康奇茨说：“江西问题将在11月5日得到解决。”但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加伦在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正因为如此，他在战役开始前就要求团长们全都了解作战计划。

在南昌战役中，第二、第三和第六各军在80公里长的战线上昼夜浴血奋战。11月1日，第六军切断了铁路，截断了敌军由南昌向涂家埠的退路，第三军不止一次地攻打河对岸的南昌车站，11月4日在空军的协助下占领了该车站，与此同时第二军从南边和东边开到了南昌。

德安和马回岭的战斗于11月2日、3日展开。第三十五和三十六团在战斗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国民革命军一共伤亡600人，缴获了军阀部队的大量战利品：步枪1000多支、炮12门、重机枪5挺；无线电台1部。第二独立师为了逃避激战，立即向九江开拔了。

11月5日，第七军和第六军分别从南北两面猛攻涂家埠。蒋介石的第一师截断了敌人通往湖泊的退路，敌人在湖上集中了船只。当天就开始消灭敌军，被围敌军全部被俘，计有3000人。此后在九江地区有一个整师投到了国民革命军方面。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的预见完全应验了：恰好在他所规定的日期内孙传芳的问题已不复存在了。

11月5日，在南昌四周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蒋介石马上着手和被包围的敌人进行谈判。向南昌增派了第七军中广西军阀、蒋介石的参谋长白崇禧的一个师和第六军第十七师（顾问捷斯连科）。11月8日，南昌投降。

蒋对被打倒的敌人进行了欺骗。他答应被包围的部队加入国民革命军，结果他们被解除了武装，而3位将军被绑在督办公署。

即蒋介石府邸的柱子上两昼夜供大家作践。这种毫无意义的残暴行径引起了我们顾问的反对。

加伦在其会战总结中写道：“11月5日孙传芳的军队和江西本地的军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从铁路上被打败退到湖边和从南、北两面被围的敌军残部于11月9日解除了武装。我军缴获近4万支步枪，数十门炮和许多机枪。敌人把大量的武器投入了河中。”

孙传芳曾经为数甚众的军队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残兵败将得以撤离江西。国民革命军在九江、南昌地区抓获了4万多俘虏。诚然，这个就其实质而言保证了国民革命军对中国大部分领土的统治的胜利是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的。在江西伤亡的士兵约15000人，而在整个北伐期间伤亡的人数也才25000多人。在江西的战斗中，由于国民革命军所用的枪枝是各式各样的，因此子弹极感缺乏。这样就必须依靠拼刺刀和夜战，当然就增加了伤亡。

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对战胜敌人的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也远不相同。加伦认为，广东的一些主力军肩负了最后一些战斗的全部重担。第七军和贺耀祖师在战斗中随机应变，只在追击被打败的敌人时非常积极，大部分战利品都落到了他们手中。

（录自《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附 3

炮兵顾问的回忆

（1974年）

T.C. 鲍罗金

我于1925年7月到中国后，被派到河南开封工作，在当时由岳维峻将军指挥的国民军第二军担任首席炮兵顾问。岳维峻将军表面上不反对苏联顾问的帮助，可是事实上对我们在部队和军校

的工作处处作梗。1926年2-3月间，国民军第二军被吴佩孚将军的部队击溃，从此也就不再存在。我在开封的时间不长。当时在开封的苏联顾问组组长是Г.В. 斯卡洛夫（西纳尼），顾问组参谋长是А.Я. 拉品（谢伊福林）。

1926年3月，我被派到广州国民革命军工作。1926年3月18日我抵达广州，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炮兵教官。刚开始工作就赶上了“3月20日事件”，黄埔军校的顾问工作变得十分困难。那些倾向蒋介石的学校领导人，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的工作。但是，布留赫尔（即加伦——译者）仍指示我们不要离开黄埔军校，应该寻找各种途径更有效地进行工作，不要断绝同学员的联系。我所在的炮兵科的情况还过得去。尽管有困难，但我还是几乎每天都能够上炮兵课。这首先是因为黄埔军校没有中国炮兵教官，其次是因为我的翻译康燮武（音——译者）（他是朝鲜人，中共党员，但他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同黄埔军校领导人的关系很好，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可是，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日期日益迫近，所有部队，其中包括蒋介石直接指挥的部队，都急需军官。这时候，蒋介石已明白，他的政变搞得太匆忙了。不久，我们就又大干起来。

炮兵科总共约150名学员，成分复杂，其中有炮兵军官，也有直接从普通学校招来的学生（即受过高等教育、不完全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的人），还有其他兵种的军官。这就造成了各种困难。此外，我的翻译从未在军队工作过，有些炮兵术语他经常翻译不出来。所以我只好采用这种工作方法，就是在讲课前两三天写出提纲，然后把提纲译成中文发给学员。这样，学员们就能事先了解问题的要点，能更好地理解讲课的内容。

教学大纲的课程定为8个月，包括下列科目：炮兵引论、炮兵射击理论、炮兵与步兵的协同动作、测地学、炮兵侦察与炮兵射击观察、炮兵兵器、通讯联系。这些科目提供的知识范围，相

当于我国排长和炮兵连长应掌握的知识。

大约在北伐前一个月，广州运到了 12 门 1909 年式的 76.2 毫米山炮，8 门罗森贝格式的 37 毫米加农炮和 8 门 90 毫米迫击炮。

每门炮拆卸成 6 件，重量为 5—7 普特，用有专门装具的马运载。我对这种山炮非常熟悉，因为我在沙皇军队里正好是在装备这种火炮的山炮连当过兵。1913 年我从炮兵训练班毕业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土耳其战场就是使用这种火炮。由于非常熟悉这种火炮的兵器部分，瞄准装置和带有测角器的周视瞄准镜等，我的教学工作顺手得多。

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作出决定，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火炮，并培训约 40 名炮兵军官（炮兵连、营长），要求他们学会从遮蔽阵地进行射击。

1926 年以前，所有中国军队的炮兵军官都不会从遮蔽阵地进行射击。中国所有的军队过去装备的不是德国造的克虏伯加农炮，就是日本造的有坂野炮，而这些火炮只能从暴露阵地上进行射击。射击时，是用方向表尺和准星进行瞄准的。

由于培训军官进行遮蔽阵地射击的任务紧急，这就给我提出了一系列复杂问题。首先是培训期实在太短，最多只有 1 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需要和学员一起研究火炮的兵器部分，反后座装置、瞄准装置以及测角器方向盘和蔡司炮队镜。不懂这些就根本无法进行遮蔽阵地射击。此外，还必须教会学员在战斗过程中排除火炮的各种故障。糟糕的是，我那位翻译还不会准确翻译瞄准装置的术语。

幸好，这时候从苏联来了一位刚刚在莫斯科某炮兵学校毕业的新翻译。

从头几堂课起，我就非常满意，因为我的学员对数学公式、几何图形和三角图形理解得并不费力。这就使我相信学员们能够顺利地掌握全部知识，尤其是遮蔽阵地射击的知识。这些学员终于

及时毕业了，而且成绩还不错。当然，这可费了我不少劲。我经常一天工作14至16小时，但是我非常满意，因为我的劳动没有付诸东流。

在学员正式毕业后，B. K. 布留赫尔把我找去，问我能不能当着广州政府委员和国民革命军领导的面进行表演，说明这一批毕业军官已确实训练合格并学会了进行遮蔽阵地射击的本领。第二天，他们建议我带几个学员到广州郊区选一个适合于进行炮兵观摩表演的射击场。

我们在广州东北20至25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冈峦起伏的地方。根据我的指示设置了表示敌人步兵、炮兵和骑兵的靶子，而炮兵阵地和观察所，则由我指定担任这次射击任务的炮兵连、营长自己选定。

在预定的那天，由3个连组成炮兵营开到了事先准备好的阵地。炮兵连长和炮兵营长的观察所之间架设了野战电话线，用来下达口令和指挥射击。在3个炮兵连长的观察所还安装了指示目标和转移火力用的蔡司炮队镜和方向盘。

中午，政府委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人员前来观看炮兵示范射击。布留赫尔、国民革命军的其他顾问和广州政府的委员们被安排在一个高地上，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炮兵连长的观察所和标示敌人的目标，但是看不到炮兵连的阵地。我当时在炮兵营长的观察所内，从那里用电话给各炮兵连下达指示。我的翻译在进行射击的炮兵连观察所，翻译我发出的口令，并在射击方面给连长一些帮助。

从遮蔽阵地进行试射和击中目标以后，火炮就巧妙地从一个目标向另一个目标转移火力。观众中一片喝采声。在示范射击的过程中，每个炮兵连各射两个目标，并示范火力转移。在集团射击时，炮兵营也打了两个目标。无论是首长，还是观众，对这次示范射击都很满意，而我也得到了国民革命军通报嘉奖。

* * *

1926年7月，北伐开始了。我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的首席炮兵顾问。炮兵司令是位姓蔡〔音〕的上校，他是蒋介石的追随者，是个酒鬼，而且是个优柔寡断、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的人。几乎所有国民革命军的炮兵命令都由我起草，或至少由我签署。我和蔡上校相处得不错，这就为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提供了方便。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建立了一个炮兵预备队，配备的干部都是学过遮蔽阵地射击的军官，他们掌握12门火炮。实际上，这个炮兵预备队是我的属下，因为蔡上校不懂炮兵，其余的火炮和迫击炮都分给了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军。

从广州到湖南长沙几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国民革命军翻山越岭，沿着崎岖小道蜿蜒前进，又正值酷暑时节，一个个都疲惫不堪。中国士兵，特别是脚伕，一天行军六七十里（30到35公里），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真是令人惊讶。大炮上，每个拆开的部件由8个脚伕分两班换着抬，根据道路状况，他们每隔1至2小时换一次班。不难算出，搬运一门大炮需要48个人，12门大炮就需要576人。此外，还要给每门大炮携带500发炮弹和其他军用物资，一句话，仅仅一个总司令部的炮兵预备队，它的行军纵队就有几十公里长。按当时的条令计算，一个战士要3个后勤人员服务，那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有3万名战士，就有一支大约9万人的后勤支援队伍。

我们这些顾问在这次行军中也是够受的，太阳帽挡不住炎热，更消除不掉疲劳。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影响了健康，从中国回去的顾问，没病的人不多……

当行军纵队越过山垭口，开始从山区向湖南省挺进的时候，部分辎重和人员搭乘平底木船沿山间激川顺流而下。这些小河在陡崖峭壁之间奔流，有时急转直下，滩险流急，航船非常危险。在流速每小时达60公里的蜿蜒曲折的山间河川里操舟前进需要有

极大的胆略。我有两天就是沿着这样的河川航行的，有时船好像马上要撞上峭壁，简直是吓得魂不附体，可是中国船工的技术高超，舵手在激流中操舟自如，化险为夷。我回忆起我青年时代在巴库当海员的情景。我在里海过了4年海员生活，曾见过不少有才干的海员，在使船颠簸无度的大风暴中，他们在大海上时而张帆时而落帆，乘风破浪前进。而中国船工在驾驶技巧方面比起他们来也毫无逊色。

当时在粤北湘南约150公里的地带，霍乱猖獗，又无法绕过这个“霍乱区”。国民革命军横穿这一地带，死掉了很多士兵。在我们继续北上时，沿途见到公路两边躺着没有掩埋掉的死于霍乱的士兵尸体。

在“霍乱区”中心的一个县城里，我的翻译告诉我说：城里有一个得了霍乱的苏联顾问。我立刻设法打听，终于找到了这个病号。原来他是国民革命军的军需顾问洛德津斯基，当时由于没有采取任何急救措施，他已不省人事。

过去我曾学过一点必要的医学知识，其中包括霍乱病人的急救。我和翻译轮流照看病号。抢救了3天，我们终于胜利了：洛德津斯基得救了。这时，由我们的医生奥尔洛夫担任顾问的国民革命军卫生处也到了县城。我们把病号交给他们，自己就前去追赶国民革命军的炮兵司令部。

* * *

1926年8月中旬，国民革命军进入湖南省会长沙。长沙到武汉通铁路。总司令部设在几节车厢里，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的北进而沿着铁路线向前转移。当然，军事总顾问布留赫尔以及包括我在内的国民革命军各部门的首席顾问，也随总司令部一起前进。

1926年8月27日，第四军部队抵达咸宁时遇到了敌军的顽强抵抗。四军实施了巧妙的机动战术，并第一次把3个炮兵连投

入战斗，从遮蔽阵地进行了射击，这起了决定性作用。结果，咸宁之敌全部被歼，我俘虏敌军近 5000 名，缴获大量火炮、迫击炮、步枪及其他军用物资。

咸宁一仗以后，国民革命军部队向长江右岸的要塞岳州加速推进。从咸宁溃退下来的敌军已无力抵抗，经短暂的战斗之后，革命军攻克岳州要塞。

第四军没有在岳州耽搁，而是派十二师（顾问是波罗）担任先锋队，加速向武昌挺进。快到武昌时，第四军为攻占坚固设防的两湖（梁子湖和黄塘湖——译者）间的狭窄地带（构筑有三道战壕并设置有铁丝网等障碍物），曾经历了一场艰巨战斗。根据两湖间狭窄地带的设防特点和工事体系来看，可以肯定，这是按日本教官或英国教官的建议搞的。

中国内战中，实际上从来没有在夜间和下雨天打过仗。布留赫尔决定在夜间攻击敌人在两湖间的筑垒阵地，否则白天攻击会给国民革命军带来重大伤亡。他建议各师的顾问先给部队和分队指挥员讲一讲夜间战斗的性质和特点。在我的指导下，把炮兵分配到适于夜间射击的阵地，白天从遮蔽阵地对敌军各道防线进行了试射。

第十二师奉命于晚上 12 点整发起进攻。敌军官兵由于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夜间发起攻击，正在睡大觉。结果第一道防线几乎未经战斗就被攻克。敌军在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开始顽抗，并不时进行反冲击。国民革命军的炮兵与前面的部队保持着电话通讯联络，并根据观察员的指示行动，逐次摧毁了敌军的各道防线，使步兵得以顺利前进。攻占两湖间狭窄地带的战斗打了近 8 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进攻的部队击退了敌军 4 次刺刀冲锋。

8 月 31 日，第四军的部队兵临武昌城下。

对武昌城的总攻预定在 9 月 2 日。可是由于四军各部配合不好，炮兵又缺乏必要的组织，再加上没有得到七军、八军的支援，

总攻没有成功。四军各部只好仍退回出发地区。第二次对武昌城的总攻预定在9月4日，由于同样原因，这次攻击也被敌军击退。

当时我在岳州组织炮兵防御敌人登陆的工作，9月3日，我应召从岳州赶到武昌为炮兵参加攻城做准备。

由于交通困难，我于9月4日傍晚前，离总攻只剩4小时，才到达武昌城下。当时部分步兵和全部炮兵已经进入出发阵地。天黑之前没有对敌军防线进行试射，又没有电话通讯联络。要在4个小时内（何况还是夜间）把炮兵转移到新的阵地上以及排除所有缺点，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炮兵在这次总攻中的作用也就实际上等于零。总攻的全部重担都落在步兵肩上。当时决定，如果拂晓前总攻不能成功，黎明时分部队将从城下撤回出发阵地。

总攻在凌晨3点开始。四军和一军的第二师仍和以前一样奋力强攻。但是冲击受挫，到拂晓时，国民革命军的部队甚至还未来得及从城墙下撤离，因而遭到了敌军机枪和步枪的直接扫射和手榴弹的杀伤。

夜间总攻时，四军第十二师的部队曾5次登上城头，但都被敌军火力击退。

一军第二师得以打开第一道城门，可是在第二道城门前卡住了。这样，一整天就被夹在当中，遭到很大伤亡。天黑之后，部队才撤回出发阵地。这次总攻的损失是：一军第二师损失约300人，四军损失约500人，七军损失约100人。这就看得很清楚，总攻时谁积极，谁只是走走过场。此外，9月5日在我们缴获的仓库里和鄂军第十八师和第二十五师的兵营里，发现了12门完全作好战备的有坂野炮和大量炮弹。原来，八军早在9月3日就发现了这些大炮，但没有告诉任何人。

9月6日晚（在第二次总攻失利后）召开师、军长会议。会上八军军长唐生智建议，武昌不宜以强攻夺取，最好先由四军包围之，与此同时，唐生智率所部渡到左岸攻占汉阳、汉口。这一计

划在会上通过了。实际上，八军的一个师已经在几天前就渡过长江，并于9月6日晨占领了汉阳，只是总司令部不知道这个消息，唐生智在会上没有提及罢了。估计唐生智曾背着总司令部同军阀刘佐龙将军进行过谈判。刘佐龙于9月7日倒向了广州政府，而唐生智只是到了9月7日晚上才报告说，“经激战后”他已占领汉阳和汉口。

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都暴露出第七军和第八军之间有勾结。它们力图保存自己的部队，削弱直接来自广州的各个军，目的是为了今后控制广州政府。毫无疑问，总司令部也看到了这种情况，所以它一直在设法破坏这种勾结。在攻占汉阳和汉口以后，总司令部终于取得第七军军长的同意，让七军开赴江西战场，而八军则负责肃清湖北省内的残敌。

包围武昌的任务由四军的第十和第十二师担任。当时给四军配属了两架飞机，飞行员是谢尔盖耶夫和克拉夫佐夫。除了各师的炮兵外，由6门山炮和12门有坂野炮编成的总司令部炮兵预备队也都进入了阵地。这些大炮由我统一指挥，它们的任务是压制敌军的炮兵和迫击炮。山炮都配置在遮蔽阵地上，而有坂野炮则照例配置在暴露阵地上，并加以伪装。

敌军的大炮配置在城墙上，也都进行了伪装，但要找到这些大炮，对我们来说并不困难。国民革命军的每个炮兵排都有自己的射击地境，对所有目标都及时进行了试射。所以我们能够随时集中火力打击敌军的任何地方。我们的飞机每天早晨和傍晚轰炸武昌，使敌人整天提心吊胆。在飞机起飞以前的15到20分钟时间里，炮兵对敌军阵地进行短促的猛烈射击，使敌军难以对付国民革命军的飞机。

武昌被围困了35天。在这段时间里，共打了4000多发炮弹，飞机投掷了200多普特炸药。

1926年10月10日，攻克武昌。

我想提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炮击武昌城的时候，我正好在一个炮兵排的阵地上。突然敌军一发炮弹落下，在我们阵地附近爆炸，掀起的土块打在炮手们身上，一个战士的腿被弹片打伤。炮兵排的士兵们害怕了，丢下大炮跑走了。我们炮兵有一条守则：如果敌人用火力找到了你的阵地，那么你就不应该停止射击，而应该加强自己的炮火，以此来迷惑敌人。我看到我炮兵停止射击，再也忍耐不住，就跑到大炮跟前进行瞄准和装填炮弹，并亲自打起炮来。这样干了约5分钟。在这个时间里，我摧毁了敌军一门大炮。不久，全班炮手重新各就各位。

这个情况不知怎么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他对布留赫尔说，他不满意我的做法。后来，布留赫尔把我叫去，批评我说，我的勇敢和俄国炮兵的守则，在这里是不适合的。

在攻克武昌后不久，我得了一场重病，住在我国驻汉口的领事馆治病，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对炮兵在北伐中的作用问题进行分析 and 总结。

* * *

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的大炮总共只有70门，当时已经是老式的克虏伯式和有坂式75毫米山炮，每门炮有10到15发炮弹。要想在战斗中指望这几门炮发挥出真正的巨大威力，是困难的。

诚然，除了这几门炮以外，8月4日有一个配备有黄埔军校学员的炮兵团从广州开出。这个炮兵团共装备有苏联运来的38门火炮和迫击炮。炮团开到前线后，罗森贝格式加农炮和迫击炮转给了各军，并直接配属给了步兵，炮团只留下12门76.2毫米山炮。可是火炮的备件和各种工具没有随火炮同时到达，从而致命地影响炮的使用。如一些火炮由于反后座装置缺少液体或空气这样的小事，就失去了战斗力，而只要有工具和备件，这些故障不用两小时就可以排除。此外，由于新火炮只是在北伐开始前一个月才

运到，所以问题就更复杂了。这是现代化的、专门用来进行遮蔽阵地射击的火炮，中国炮手从未见过。当然，一个月的时间，最多只能使军官和黄埔军校的学员了解这种火炮的性能，而要想学会灵活地指挥这种火炮和在战斗中根据战术要求来使用这种火炮，在一个月內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不过有这 12 门火炮本来是可以完成不少任务的，问题是有一个纯粹的政治因素在起阻碍作用。各军军长一直把炮兵看成是来自广州的部队的财产，他们认为，既然来自广州的部队有精良的炮兵，那么就让它们在前面开路。此外，各军军长在战斗中使用部队的问题上一直在勾心斗角，这就需要对总司令和各军长间的关系作某些调整，也就是给各军分一些炮兵。结果，给四军、三军和八军各分两门炮。根据八军军长的请求，留两门炮防守岳州（毫无疑问，没有这两门炮岳州也是守得住的），还有四门炮随一军和四军行动。

分散使用炮兵，射击效果就差了。在行军时，炮兵经常落后于步兵，赶不上战斗，而在参加战斗时，又往往使用不当或者无所作为。

我根本无法照顾到分散在各军的所有火炮和帮助各军正确使用这些火炮。我最多只到过我们附近两三门火炮所在的地段，而且当时又完全没有电话等联络工具。所有这些因素降低了使用炮兵的效果，不过炮兵在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还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我们在中国的日子已经到最后几天了。1927 年 7 月，在蒋介石政变以后不久，包括我在内的顾问团就回祖国了。我国驻汉口的领事租了一条日本船，我们就乘这条船沿长江到上海，然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上海港，苏联领事科兹洛夫斯基乘汽艇驶近我们的船，他警告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要上岸，因为蒋介石已下令逮捕我们。海关警察要求船长送我们上岸，可是船长拒绝了。我们在上海港停了 3 天。最后，这条日本船终于进入了辽阔的海面，向符拉迪沃

斯托克驶去。

附 注

作者简介：

T.C. 鲍罗金 (1891-1970) 出身于农民家庭，1912 年应征到沙皇军队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 年 11 月参加赤卫队，1918 年入党，曾参加第六届苏维埃特别代表大会的工作。国内战争期间，鲍罗金当过炮兵连长、营长，参加过反对邓尼金、弗兰格尔和马蒙托夫匪帮的战斗。1921 年，他参加了消灭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匪徒的战斗。1925 年到中国工作，曾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还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原编者

(录自何智涛、李元吟等译《在中国土地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五、北伐期间的青年共产 国际与中国共青团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部 致中国共青团的信

(1926年10月15日)

亲爱的同志们：

少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与东方委员会一起，共同讨论了你们的团的宣传问题。你们的工作报告尤其宣传工作报告，做了我们的主要材料。这里附带说一句，在这一报告里，你们是第一次多少谈了些你们的宣传工作。这而且是唯一的报告，能够给我们以可能讨论你们的宣传工作。所以，我们所得报告既这样不充分，也许我们不能够正确规定你们整个工作的方针。然而，我们仍以为必须告诉你们以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想，这虽然是我们给你们的第一封信，却能够帮助你们的工作。当我们研究你们宣传工作的性质时，我们须得提一个总的问题并答复此问题——即是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所以异于其他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一般的环境的问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所以异于其他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这些特殊的作用和任务，也表现在你们的宣传工作上。

根本上，你们过去的境况大致可以说明如下：（一）国内民族

解放运动高涨，而共产党的数量还并不多。党内和国内的客观状况，使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指导者。在若干情形之下，有些地方共产主义青年团代替了党做指导斗争的工作。在一切情况之下，共产主义青年团所有的或主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般的政治斗争上面。这种情况不允许共产主义青年团分出适应的注意力以执行自己主要的和根本的任务——青年工作。这一情况也反映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切口号上面。这些口号都带一般的政治性，而不适宜于青年的日常需要。这个是不能适宜于你们一切部分的工作的——经济的和组织的。这个无疑也反映在你们的宣传工作上。

上面所说恰正可以解释，你们的宣传工作，为甚么主要的集中在“团外”的宣传，尤其在一般政治的宣传。以此恰正可以解释，你们对内的教育和对外的宣传中间为甚么发现轻重不均的现象，即注意力偏重于对外宣传的现象。

我们以为，这个不均及团内教育工作的缺乏，恰正由于你们从事于对外宣传，致不能注意对内教育问题。

我们不否认你们的对外宣传工作□大的成绩。整个的报告，证明你们在这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出版物（报纸、传单、宣言）的散布，学生中的工作，反基督教运动，各种运动集会以及书籍的散布等等——所有这些，我们都认定是你们的业绩，我们并以为无论如何，这种工作绝不应减轻。然而，这种工作应该比前更加要适应于青年，尤其要适应于工作。

从你们的煽动和宣传报告中，我们看出你们很少注意于内部教育工作。

从报告中，我们看出所举各区各地方的工作，关于内部教育的，实在太少了和太抽象了。

报告中关于这方面并不举出事实，只有抽象地说：“内部教育工作缺少”或“还正在开始”或“正在发展。”

不错，从你们的报告中，我们也看出有几个地方也有一些内部教育工作的具体形式。譬如：北京开训练班，新同志的“月班”（北方区），新同志训练班等。

我们根据这个，很难看出这些内部工作形式的具体情况。以下，我们可以努力供给你们以苏联和西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方面所得经验。

这里，我们愿意指出一要点——我们以为现在已到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加重注意内部教育工作的的时候了。你们自己既然注意于组织上的青年化和内部工作的加紧等，则尤必须注意内部教育工作。你们给我们的材料中，也说到加紧并改善内部教育工作之必要。内部工作是甚么？我们以为在你们的条件之下，内部教育工作绝不是说不要引导青年做一般的政治斗争，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内部教育工作之加紧，更能引导青年做一般的政治斗争。所谓内部教育之意乃是：（一）团员之政治训练，（二）团内之一般的文化工作（中间包含：俱乐部、演讲等）。

说到政治训练工作之经验，则在苏联和西欧诸国，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做这工作，系出之以连贯的政治训练系统（不错，在西方才开始采用此系统）。这个系统的根本原则在于政治训练包含团中的三个等第：广大的团员群众、低级活动分子（支部书记等）和区的指导者等。

若准备有相当的训练人材，这系统是可以施行的。

我们以为你们于最近期间将要创设的两个中央学校，可以做此工作的出发点。这个允许你们随后得用组织学校训练班、区地方自修班等方法去做低级活动分子的政治训练，以后你们又才能够准备训练的人材，展开政治训练于团员群众。

我们请你们不要误解为在中央的和区的学校来举办之先不应该先从群众的政治工作开始。我们想，你们能够在最近期间开始群众的政治训练，尤其因为中国有许多学生，你们尽可以利用

(自然须经过精密的选择)为团内宣传的工作。革命的学生——就便是你们的便宜处，而为西方青年团员在政治训练工作中所没有的。为得使你们更详细了解我们对于政治训练系统的观点起见，我们在这封信外附上少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关于这问题现有的主要材料。

我们在这一年内已经编好了做群众政治教育用的教科书。但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去利用你们的定期出版物(杂志和报纸)以指导此工作(根据我们所拟定的团员群众政治训练大纲，做论文，以为指导者作参考)。

自然，这工作绝不应妨害你们的刊物做当前的政治宣传。

说到团内文化工作，则我们以为这在你们的宣传工作中也应该占个确定的地位，尤其因为在中国有很大部分的青年团员(工人)是不识字的和文化落后的。

我们在莫斯科很难指示你们以这工作的任何具体形式。但我们想，我们〔你们〕之中有一些同志能够阅读俄国和西方青年团关于这问题印行的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我们连这封信一齐寄上给你们。

从报告中，我们看出在中国有流行甚好的定期出版物属于党和团，或可以相当利用的。

我们想，如果你们能够团结我们的或接近我们的报纸之读者(青年工人、学生、农民等)，当不是不好的事。

我们不久之后将批评你们的《中国青年》和《劳动青年》。现在我们附寄给你以我们对于一德国报(指导的)和一俄国报(群众的)的批评；我们想，你们从这当中能够得着一些益处。

从你们的报告，我们知道，你们总共只有六个墙报(在上海)。我们以为，组织结构的条件既然建立在支部原则上，尤其在中国，支部墙报之作用应该是特别大的。我们也寄给你们以这一问题之若干材料和样式。

我们以为，你们必须向一切支部提出举办墙报争“传观报”（手写一份或油印很少的份数互相传阅）的任务，因为这将使支部易于团结一部分青年于此事业之周围，这些青年，看环境如何，是能够引来与我们合作的。工厂中的报尤为重要，可以做我们的斗争和宣传武器之一。

但这些要能够做成，必须分出特别力量于宣传工作。

可是从我们所有的材料看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对于宣传工作并未曾分出为特别的部门，并且似乎没有人来专门负这一部门的责任。

我们以为这种情况是非常态的。在中央和区委之下必须设立宣传部。

在中央必须有同志完全担负团内宣传工作的组织责任。

同样，为加紧团内工作起见，必须分出专门的同志，在区委、地委等内指导这一工作。

说到宣传工作指导机关为组织（这在你们工作开始时，尤其是必要的），则我们以为这里必须告诉你们以我们的一些经验。

我们以为你们开始时的主要任务，应该在于向全团解释加紧内部教育工作之重要和必需。

其次的任务，在我们的意见，应该是活动同志和团员的政治训练，是设立这训练的组织形式（训练班等）。

同样重要的或更重要的任务，是挑选做宣传工作的人材，并加以训练。

实际告诉我们，宣传工作各部分分开举行特殊的实际教育的会议，如：墙报编辑者会议、低级活动分子及一般团员的政治训练班的指导者会议等——并不是不好的事。

以上所说，便是我们根据你们的报告，以为开始可以告诉你们和必须告诉你们的事。

我们愿意你们寄送特别□报告以及关于内部教育工作状况的

材料给我们。

我们也愿意得到你们所办各种学校的课程（训练新同志和宣传人材的），以及你们给各地方关于宣传工作的通告。那时我们就能够与你们建立更密切的联络。

再谈。

共产主义的敬礼！

少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部

（录自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
《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年版）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

（1926 年 10 月 18 日）

亲爱的同志们！

看了关于你们团的材料之后，共产主义少年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觉得有请你们注意下列几个对于你们颇为重要的问题之必要。

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目前的任务

你们前一次的会议特别注重青年化和把你们全体的工作移向组织青年的方面。上次大会最重要的问题是产生一个青年群众的团体。从这些材料上看来，足见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是有许多重要同志们的误解在内的。

所以我们愿你们注意到几个西方共产主义青年团关于这个问题的经验。

有几个西方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成立在党的组织很弱或者没有的时候。这些团是常常要负政党的责任，去做组织党和为共产国际的政策而奋斗的工作。这个情形是当时的客观的环境之结果，而因为这样，这些团能够担任了革命的工人运动之重要历史使命。直到党形成而健全，党的政治工作和在工人运动之影响成为事实时，团才渐渐地化为真的青年组织。

少国第二次大会从那时候的新环境得到必须的结论，而指导团的运动向另一条路。大会决定团的政治活动要在党的领导之下。

团以组织许多青年的团体去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为问题。团的问题就变成团结青工，群起奋斗，为他们的经济要求和在实际参加政治经济争斗中，在党的领导之下，使团员受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

我们相信中国 C. Y. 近来也遇到相似的情形，虽然环境和情形不一定同。国内民族革命的形势需要党和团在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有实际领导地位。这个情形（必要得到运动的指导地位的情形）要求中国共产主义者力量之集中。但是，直到现在，有许多地方还没有党的组织，因此，团必需要单独负起执行党的作用和解决党的问题是显然的了。这样，团要负历史上重要的工作使命。

但是，现在中国 C. P. 已经健全，有组织形式，人数日增，在国内重要的部分都很强固；而党的威权，在工运和革命之中，已为人承认，团应当开始去建筑他的工作的基础在青年的组织上。假若团不努力去照青年化的原则改组，是阻碍共产主义运动，而是有极大危险性的，在一切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和整个的中国民族运动。在这一点上，你们前次大会的议决案关于目前任务是极合时宜而且在政治上非常重要的。

对于你们关于这问题的讨论有几句话：

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你们讨论的大概。接到你们的材料之后，就

想很详细地对你们说我们对于你们大会议决案的意思。你们对于“什么是C. Y.?”的问题的讨论，显出你们同志们说到一句许多团都说过的话。但是在内容里，你们肯定地说了这样的三句：（一）C. Y. 是青年的共产党。（二）C. Y. 是共产党的后备队和候补者的学校。（三）C. Y. 要是教育工农青年的组织。

我们至少要把这三句分析一下：

第一句“C. Y. 是青年的共产党”。这句话是完全不对的，这句话说是由于团的以前的客观情形，即上述的那时团不能不和党一同担任政治工作。

但是，青年运动，是共产党工作的一部分，没有政治问题异于共产党的。

这样的观察是以前团的政治环境与几个同志的不足够的考虑所形成的结果。然而因为中国团从过去直至现在的工作环境的异常，这个观察仍可以为C. Y. 的活动领袖们所相信。

为了这个缘故，这个倾向，无论取什么形式，都应绝对防止的。

第二句“C. Y. 是党的候补者的学校和后备队”。我们不懂写这句子的人指什么说。如果说C. Y. 是一个“独立的革命团体，把团员养成阶级斗争的精神等等，在党的指导之下”从这方法造就大群民众加入党；倘使他们的学校与候补者是这种的意思时，那末他是对的。但是，倘若这句的意思包含着减少青年运动组织的独立的倾向，兴起一种似乎党的青年部、学校、青年团，使团成为一种狭义的附属的组织，——那末这句话就完全错误，因为团的组织是从考虑了青年运动（经济要求、青年的特殊心理等）而得来的。

末了再说到第三句话“C. Y. 必须是教育工农青年的组织”。这观念或是由于简单的不曾成功和不足够底想出的解释。但如此而订定团的问题是绝对错误的。注重教育而不注意政治问题和青

年运动的责任乃是社会民主党的定则。许多年来，少年国际的革命分子，与机会主义分子的第二国际争斗，而为了给与青年群众以阶级斗争的精神的教育。这些同志拥护这个意见的，很明显地是不知道这问题的内容，退步而为机会主义者的观察。

我们团要做而且必须要在群众的基础上做文化工作。但这并不是团的唯一目的，而是主要的政治问题。这不过是深入工农群众的工作方法之一。

我们很满意，因为这些错误观点都不为扩大会^①所容纳。从你们的初次的通知里，我们看见 C. Y. 的问题是都在扩大会上准确地解决了。

二 组织问题

（一）党与团之关系

照上面所说，你们与党的组织上的关系要有准确的解决，是很重要的。党与团的接触和党领导团的工作是必定要万分得力。党在团的代表，从中央、区委、地委至支部，要十分健全，要择最好的同志以任相互关联的职务。同时，党对于团的领导要加紧，团的书记要在党的会按时做报告，报告工作并提出问题。

加紧党对于团的影响，这件事要特别郑重的注意。指定青年 C. P. 分子去领导团的工作。同时，强固党在组织之核心的问题更要郑重考虑。为了这个缘故，团中工作最好最活动的同志要转入党。特别注意这转入党的问题，因为这些老团员，假使你不把他转入党去，他也自然要离开团的。

从你们的报告中，要看出你们的转学运动，把 C. Y. 的人转到 C. P. 去，尤其是把 23 岁以上的人完全转入党，勿使做 C. Y. 的工作，在大半的地方一定要大大的削弱 C. Y. 的工作的。我们

^① 指 1926 年 7 月中国共青团中央的第三次扩大全会。——原编者

相信这种非常的议决案的末一点不适用于你们团的活动分子，是不实际的。C. Y. 必须坚持，23 岁以上的团员的转学，是要与党做每个个人的分别决定的，如此团的工作领袖人才不会全盘完结。

少国中央执委会以为指出下列各点是必要的：

1. 团必定要有系统的强固党，给党吸收最好的同志。这是很明显的，团的领袖机关并不曾看清这问题的意义。这个可注意的差误是要坚决地纠正的。整个的团要勉力去给党以最好的分子。

转学到党不必要用动员的形式，也不必有原理的性质。团员的转学要有一种组织，有系统秩序的。

2. 同时也要与党合作，按期会议，依着需要，而调动团的活动分子去做党的工作。

当然，把团员调动做党的工作，一定要在不妨碍或者甚至停顿（在你们那边，这事件是常有的）团的工作范围以内。

这亦是需要的，就是团的新的工作者一定要抓到老的团的工作者的经验，只有预备好新的工作人员之后，才能调动旧的。

（二）团的发展和它的社会成分

在你们的报告里，你们疑惑少国中央指定你们要发展到 3 万人是否可能。这个数目是少国上次扩大会^①决定的，那时还看不出这反动的局面会延长得如此久，占据着中国的大部分的，而且发生这样一个不利于你们的发展的环境的。但是，国民革命军几个星期来的胜利，又在你们面前开展团结广大的被剥削的群众之局面，第一就是无产青年。C. Y. 必要知道怎样去利用这个组织的可能性，增加后备力量，扩大而强固其组织，赶快预备领袖人才去开展团的工作，在新的地方。团要特别注意武汉的工作，那边，用努力的工作，一定要取得在青工中的威权和影响，以成功一个团的广大组织而成为团的无产阶级的大堆积，不让于上海。如此，

^① 指 1926 年 2 月 22 日——3 月 24 日青年共产国际的扩大全会。——原编者

你们就会证明在以后的问题里、“今年年底到 3 万人”的口号并不和你们能力所及的距离得远。

对于团的社会成分之分配也有两句话说。你们的团，大概已有如下的社会成分：被剥削的青年^① 42%，知识分子、学生 43%，农人 4%至 6%，雇佣者和小商业 4%至 5%。少国中央注意到你们社会成分之进步。在你们团里，工人的核心大有进步了（以前不过 20%）。

这亦是需要的，团在将来的工作上，要特别注意青工数目，指出加强工人核心的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在社会成分里，要提高到你们全国的 55%至 60%。

几年以来，你们的团并没有在金属工业和铁路工业的青工中发展组织而得到结果，虽然在你们扩大会、大会等会上都特别讨论到这个问题。在你们的报告里，说在郑州开了一个夜校，许多纱厂工人都进去；我们知道郑州是铁路工人的中心，而你们在报告里却从没说起你们在铁路青工运动里的成功或缺点。一切铁路工人的组织都在党的手下，你们竟毫无工作，这也是你们的缺点。

为了团的将来的发展，在吸收青工的基础上，团必须注意金属工业和铁路工业青年工人的工作。与这有连带的，是团要注意手工工业的青工。

为团的将来的发展，必须要注意扩大其影响于大工业和大工厂、大作坊。

青农的核心是非常的弱。团在将来，亦要注意把农人的核心拉进团里。今年年底把团中的青农核心增加两倍。

在学生以及其他分子里，不要使他太弱，而求发展。要拉最好、最活动、最热心能干的人入团，他们在群众组织的工作中（学生会、职工会等）证明他们的价值。

^① 据上下文看，这里当明确指“被剥削的青年工人”。——原编者

(三) 工厂支部与区域组合

我们相信，对于中国的 C. Y.，只须指出最少的关于团的组织的使命和其重要之理论。你们的团是 C. Y. 中最先实行少国中央扩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议决案的。

摆在中国 C. Y. 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把重心和工作的注意力移到支部。这团的支部要变成一切团的群众中工作（政治、教育、经济等等）的中心。只有团的最重要的一个键节（支部）能够活动而生存时，全国的强固与有生气才有可能，特别是团的能够达到群众工作之振兴，因而把团的活动普遍在群众之中，也大部分要靠整顿支部工作。支部是要接触大群的工农学生。因此团要注意到支部，尤其是工厂支部。

把支部工作振兴而强固之后，分配团员工作的问题就易于解决。此地还要提出另一口号：“没有没有团体工作的团员！”（“There is no League member without League work”）^①，同这问题有关系的是要把大工厂支部分成小组。按已有的原则，依照团的环境，公开或秘密。把支部分为小组之外，支部对于□群群众的影响是要计及并重视的。所以就有工场支部问题。换句话说，大工厂支部要依团员的工场或工作面划分。经过工场小组，则大规模的护助青工和增强团的影响都可比较容易。团的支部须这样同青年群众接触，乃能振兴工厂支部的工作特别是群众工作。

几句话关于区域组合的。我们相信你们似乎小看了区域小组的重要。假使你们不能把他们团结在区域支部的周围时，你们在青年手工业店员中的工作将不能建设起来。

这是很可能的，你们对区域支部之不注意，和你们在手工业和店员青年中工作的薄弱一同存在。

团必要大大地注意团结手工业和店员青年业在区域支部与小

① 确切地说应是：“没有一个团员不担任团的工作。”——译者

组周围的问题，使他们在生活上和组织工作上，与工业或学生支部发生关系。

研究以店（如金属工匠、鞋匠等）为基础而产生区域支部的可能性的问题。特别注意手工业和巧匠青工，强健团的区域支部的工作。

关于秘密支部：你们的议决，使支部书记由大会举出而经上级机关承认，在理论上是对的。团的上级机关要尽量注意秘密的和半公开的组织。所提出的支部书记候补人的名单，上级机关一定要知道，而且区委或地委要讨论他，直到上级机关对于那候补人的情形很熟悉地知道了之后，才可以加以承认。

但是，团必须记得秘密和半公开的情形是不允许自选支部书记。阴谋^①工作时常需要指定支部书记和其他上级机关的。为此故，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同意在团内应用广义的德谟克拉西，但在秘密工作的需要之下，却一定不要而且不能反对指定支部书记。

（四）关于团的上级机关及其对地方组织的领导

关于你们上级机关的结构，社会成分和实际工作的问题，因为缺少材料之故，不允许我们观察其缺点和目前的问题。

但无论如何，团的人数是在愈多地增加，地方机关的领导也要随工作而加紧。此地中国 C. Y. 中央要注意健全和加紧区委或省委的工作。尤其要致力和致意的，是健全地委的工作。地方组织之与中央隔离，更其迫得团去健全他们。但却不可以因此而削弱中央和普遍的集中的领导。

我们所以绝对赞成你们以区委、地委负整个团的组织员责任的政策。上面所说的问题不能由一个组织员做好的。

连接上面，我们代中央和区委设想，地方的指导一定要加紧了。若是要我们在这样远的地方来很清楚的指出健全指导的方法

① 原文如此。——原编者

是很难的；或者可多发通告教以方法，或者各种工作多开会讨论。无论如何，这是很明显的，倘使地方工作的指导不加紧，中央和区委的指导一定会很感缺乏的。

（五）委员会的结构

见到你们还没有把你们上次大会所议决的上级机关的结构（组织、宣传、经斗、学生）弄得有力量，少国中央要你们注意下列几点：

1. 需要每步随时注意把适宜的同志举做部长，他是委员会的委员，而能够进行指导那一种团的工作的。

2. 因为儿童工作的扩大和儿童运动指导加紧的需要，中央及地方要附设儿童局或童运委会，各地要指定适当委员负责指导这项工作。

3. 为适应青农运动增加工作的需要，和研究青农运动问题等，我们以为在此时可以在中央及几个地方暂时办个农民委员会以为试验。

倘使团的工作情形公开或半公开的允许，产生上面所述的几个委员会是可能的。

如此可以拉地方的活动分子参加这工作，或者由各种社会团体的委员暂时兼任。这种委员会将使执行委员会更好地解决这些某一种工作的问题。

（六）关于秘密工作

团无论何地不要忘记健全秘密机关的需要，训练并准备秘密工作的人才以备“地底”工作时代之到临。

虽在团的工作全公开的可能的地方，团亦必要：1. 即在可以公开之处亦要把领导机关秘密起来；2. 在政局将有转变之时，快快预备可以毫无损害地转变到秘密的办法（秘密名单、文件、集会、暗号等）。

我们觉得中国的团对于这件工作，在几处地方还是弱而且有

缺憾。

我们特别不能了解为什么广东 C. Y. 到现在还是秘密的做工，那边的情形至少可以半公开。所以很明显的在这一头（利用团的公开的可能性在某几处地方，而在另外的地方用秘密方法。）中国 C. Y. 有许多弱点。

在革命军影响的范围扩大之时，中国 C. Y. 中央要尽力把那边的团体公开起来。团要利用每个公开的机会在青工群众中工作和使团的口号得到最广大的普遍。

团的上级机关应特别注意这些团的组织工作的现象。

三 青农中的工作

我们想不必要再对你们说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之重要的理论，和拉他们到工人阶级及国民革命的一边之类的话了。

但是在我们是无疑地觉到一件事，就是党与团都没有在这方面做多少工作。

你们的议决案说：看了各地的农运的生长，现在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去团结农人群众和引导他们去奋斗。我们 C. Y. 也要去促进这运动。

同时我们要注意去发生许多青农组织，尤其在广东等。

我们为引起你们的注意去做国内的广大的宣传，说明中国农民问题之意义及其重要。青农中的工作马上就干，勿再迟延。现在的政局迫得党与团去做这项工作。

我们要在组织的形式上说两句话。此地我们极其感觉得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材料之缺乏。我们想你们会知道为何我们在这问题上不能给你们以明确的组织上的指导（但你们自己却不能以此语推托）。Charlie 所送来的关于农民问题的材料只说到“农民协会要附青年部的必要。” Charlie 说道：“青年在农民协会中有很大作用。从报告上看到，青农是农会中最活动的部分。举个例，在 Ki

—Koud 农协 30%的会员是在 25 岁以下的青年。许多报告中指出这些青农的勇敢等。一个报告说那边有 100 个青年在农协里，多是从前的学生。在某某等乡里种田的大部是青年等等。”

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是革命的左翼是青年。倘使我们从农民组织里拿去了青年，那末就是拿光他们的革命分子……。但是我们想这样的严重的问题是要经过详细思索，慎重讨论而彻底明了解决的。请你们快寄你们对于这问题的意见的材料来。

同时，开始做这工作。□某几区域里立刻介绍革命而倾向我们的青农加入 C. Y.。和乡村教师接触，研究乡村教师在我们农运关系的问题，把他们中间好的分子拉进 C. Y.。

少国中央要把你们的注意拉到这群众运动的第二部分工作（第一部分是工人）。你们必定要在团里解释农民问题的意义与重要。使农运问题成为一个你们各种会议中经常讨论的问题。

中央要指定最好和最活动的同志去研究和组织这项工作。

四 经济斗争

第三次大会以后，你们在这问题上有些成就。但是，在表现上，团不过刚才走到这问题和这工作。团应该不懈怠的注意去发展经斗工作。团的主要工作是：

（一）把青年工人也组织在工会里，要求里面要包含青工的利益。一定要竭力防范在罢工中青工的单独行动。

在罢工中，青工的要求要放在工人的普通要求里。团必定要知道（经过党的机关）当团行动的时候，工会给以帮助，而不只是让日子尽延下去。

中国 C. Y. 要特别注意领导青工为他们利益而做经斗的工作。团要领导这斗争，为经斗提出切当口号，引导全般运动上准确的路。

（二）特别注意去宣传 C. Y. 所定的青工要求，在青工和成

工中。

（三）发展工会中的童工委员会的活动。

（四）强健青工“部分要求”之争斗的工作。

（五）极端注意青工的意见，及其日常需要和利益，时设法加以拥护。

这工作的缺点之一例，就是你们报告里所说到的广东 C. Y. 在兵工厂里的组织的不好。

（六）以后需要增加团的支部的群众经济工作，好好的把这问题彻底想些可能的方式，青工大会，代表大会等。

少国中央要中国 C. Y. 中央注意研究利用旧式工人组织（拜兄弟等）的方法，我们在其中工作的方式，和手工业青工的经济斗争等等问题。你必定要想想工会中青年部的问题，而关于以上的问题的给材料于少国中央。

五 教育工作

直到现今，你们只注意对外政治宣传。内部教育工作不是没有，便是很弱（你们等已这样写）。

同时青年群众却要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训练。再则，敌人的理论的增加，加紧青年在争斗中的危险。

尤其是现在，当团对青年工作有了转变的时候，注意的中心要移到团的内部训练的教育工作。

内部教育的中心是支部。经过支部的课程和政治教育班，全团的群众要受到教育。没有一个团员站在这教育工作的系统外面（教育工作可分政治班、高级班、自习组等），这是中国 C. Y. 的主要工作。

根据西方的团对于这个工作之经验，以及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的教育工作（中央宣传部已寄给你们有信和材料）中央要贯彻

地^①从教育方面及组织方面的情形决定给中国 C. Y. 以如何程度的政治知识。

连带上面的，预备工作的最要部分，是预备群众的宣传者。

C. Y. 的学生分子可用为宣传员去做群众教育的文化工作。“没有一个 C. Y. 团员没有责任”^②的口号尤其要应用到团的学生身上。不能有一个学生（或教育过的团员），不负宣传者的责任而不做文化工作。

团要注意这几点：

- （一）组织有系统的政治教育工作。
- （二）组织群众的文化工作初步是肃清“无知识”。
- （三）训练宣传人才。
- （四）组织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班或组。
- （五）办理普遍的书报宣传。

这些是我们对于你们送来的报告所要说的重要的几点。

这信里没有提到“反基”^③运动，但我们对于那个问题有许多要说，而且看到你们的错误，我们立刻就会写给你们。同样，我们请国际儿童局特别写封关于儿童运动的信给你们。

你们要少国中央多指导任何方面的工作，少国中央对此非常同意。主席团已叫中央各部都研究而切实的计划中国 C. Y. 的工作问题。

请你们给我们详细的报告，关于组织、教育、经斗，以及其他团的工作。此外你们的出版物，无论定期或不定期的（传单、新闻纸、杂志等）都请送些来。

共产主义的敬礼！

① 应理解为“经常地”或“系统地”。——原编者

② 即本文前已提到的“没有一个团员不担任团的工作。”——原编者

③ 即反基督教青年运动。——原编者

书记签字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反对武装干涉中国的声明

（1927年2月6日）

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政府正在向上海调集军舰和陆海军，备战活动特别紧张，整个东方的战火一触即发。战端一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就将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丧命。

广州国民革命军的胜利推进迫使帝国主义者采取武装干涉的行径。目前，帝国主义者一面声称同中国解放运动谈判并向其让步，同时又一面准备将其淹没在血泊中。

然而帝国主义者的炮口对着中国的自由，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企图掩盖现存的战争危险，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帝国主义者调兵遣将和备战。他们又和1914年一样，散布迷雾，以使无产阶级对正在准备中的战争猝不及防。

青年工人们，不要上当受骗！中国已处在直接的战争威胁之下。反对中国革命的战争也将是反苏战争的第一步，因为苏维埃俄国给所有被压迫人民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争取解放的道路。

青年工人们，你们应当毫不迟疑地开展斗争，反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快唤起大批工人组织！建立不许干涉中国协会！要求立即承认广州国民政府和消灭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士兵们和水兵们！你们也同青年工农一样，在军国主义者的

蹂躏下受苦受难。中国的工人和革命士兵是你们的弟兄。

反对在中国的战争！

反对反苏的备战活动！

全世界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万岁！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在中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①的报告

（1927年5月13日）

同志们！我今天所要报告的可分两点：一是国际政治状况，二是少年共产国际的情形。现在第一便要报告国际的政治状况。我们的同志都知道，现在国际的情形和大战刚了以后是不相同的。在大战以后不久，革命潮流高涨，有苏俄革命，有德国革命，有匈牙利革命，革命潮流涌遍欧洲。然而现在，苏联是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当中，十分艰难地在为保存无产阶级的祖国而奋斗。同时资本主义已达到一种稳定状态。

现在便有一个问题，究竟现在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是同大战前一样呢？这我们可以坚决的答复：资本主义的稳定远不及战前的情况。

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像战前一样的稳定呢？这有几个理由：第一是苏联的存在。苏联存在的意义，就是把世界分成两个营垒，在人类社会上，在世界上，他占有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与资

① 指赫达罗夫（Хидапов）。——原编者

本主义争“你死我活”。

其次，我们再看资本主义的本身，在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相互有很巩固的经济组织，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很完备。他们的安全是全部安全，恐慌是全部恐慌。但是他们现在的稳定，不过是部分的稳定。美洲的经济向上发展，欧洲的经济便往下低降，德国生产有向上发展的情势，法国便往下低降，这是与大战以前完全不同的。

再在大战以前，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是很好的，殖民地照例供给宗主国的原料，宗主国照例卖货给殖民地；但是大战期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业得了个发展的机会，形成了民族资产阶级，战后便与宗主国的资产阶级作对头了。

此外，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冲突，在大战以后也非常厉害。大战以后有战胜国战败国的冲突，战败的同盟国和战胜的协约国的中间互相冲突，是一天天的加紧。英美的冲突，也是很显明的。在大战以后，美国代替了战前大英帝国主义的地位。在墨西哥等地，美国的势力战胜了英国的势力。他们的冲突表现在中国也很明白，我们从英租界被我国收回，美国并不帮忙的事实中，就可以看见。英美的冲突，是大战以后一件很可注意的事。

我们现在再进一步看看资本主义国内的冲突情形。我们知道，在大战以后阶级斗争是一天凶猛一天。英国、德国、法国的工人都起来了。但同时法西斯蒂的势力亦渐兴起，在波罗的海一带，法西斯蒂的凶焰非常之大。这就是表示资产阶级看工人革命潮流日益高涨，不能再用“德谟克拉西”的假面具，而实行他们资产阶级的凶恶的独裁。

此外关于殖民地的情形，现在也与战前不同，我们看中国吧。近年以来，革命势力日益高涨，已经摇动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其他各殖民地的民族运动，莫不如此。

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是战前所没有的，就是世界革命的联盟，

世界革命的指导者——第三国际的成立。大战以前，只有卖阶级的^①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成立，使帝国主义感觉得非常恐惧。当摩洛哥战争时，法帝国主义说摩洛哥是受了第三国际的煽动，其实那个地方并没有一个布尔希维克人。

在这样一个国际政局之中，我们可以得这一个结论：**第一**，就是在现在，无产阶级虽然是处于艰难的地位，资本主义得到相当的稳定基础，然而这一种稳定，是暂时的。**第二**，资产阶级为巩固他们的经济，遂不得不加紧在本国工人身上剥削，减少工资，增加工作时间。**第三**，因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结果，使工人的反抗也猛烈起来，遂形成激烈的阶级争斗。

我们现在不能立刻领导工人马上拿起枪来举行参战，然而我们的责任是要领导工人作日常的斗争，在不断的经济斗争中，锻炼无产阶级战斗的力量，准备作最后的战争。但是，同志们！不要误会，我们准备作最后的战争，并不就是作一些日常的经济斗争就了事，我们还是要时时刻刻准备着做夺取政权的争斗。

* * *

第二再报告少年共产国际的情形：

今天时间很短，不能做很详细的报告，只能报告两个重要点，即：（一）少年国际所统率之各支部状况；（二）目前任务（即最近少年国际扩大会^②所决定的今后工作方针）。

少年国际是1919年在柏林成立的，起因于欧洲大战。在大战中——即1917年，已有了这个运动，但无组织与政策。自正式成立之后才有组织与将来的政策，到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上最有力最健全的青年国际组织。

^① 原文如此。——原编者注

^② 指1926年11月12日—12月12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第六次扩大会。——原编者注

少年国际本身的力量如何？现在它有 40 个支部，即有 40 个国家中有青年团的组织。它已有 220 万团员。就苏联说有 205 万团员，这个数目，还不算多；但我们不要因数量少而生恐惧之心。中国团员数量仅约 5 万人，可说不很多，但它的质量却好，在革命运动中已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成为一极大的力量。少年国际的工作对象是要吸收广大的无产阶级青年群众，在欧洲青年无产阶级（产业的）有 3000 万人；而在我们领导之下的有 1000 万（农村青年还不算在内），40 个有组织的国家中，有 20 个可以半公开组织，20 个是很秘密的。

资产阶级无论在西方，在东方，他们亦做青年运动，在欧洲所谓社会主义青年团（资产阶级的）有 10 万团员，10 个支部，还有少数是在宗教影响之下的。故我们除了自己的青年工作外，还应在他们影响或组织下的青年群众中做工作。

少年国际的重要支部有**俄国列宁主义青年团**。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C. Y. 的任务当然亦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这好像中国 C. Y. 目前的责任在于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得革命前途之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

现在有许多人，不承认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他们的言论是站于不同的阶级上说的。最奇怪的是俄国党内亦有此种言论，故我们现在应回答几个问题：

A. 苏联是不是建设社会主义？

B.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现在苏联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这是谁都会答复的——是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组织是社会主义呢，还是资本主义？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苏联全国 95% 的大生产在国家手中，土地和交通机关均归国有，对外商业由国家垄断，大商业在国家手里，银行等亦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第二，用何方法

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要：（一）建设大工业，使全国工业化；（二）使广大农民经过合作社而发展乡村的大规模经济；（三）苏联脱离外国经济的束缚。俄国在战前虽是帝国主义，但是很落后的，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仰靠外国事业而生活，此种外国的经济是妨碍苏联的经济的，故必须脱离去。现在苏联经济的发展逐渐到了很高的程度，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不是理论上的问题，而是实行上的问题了。

苏联 C. Y. 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如一、帮助党防止一切反动派，助党竞争选举；二、帮助合作社工作；三、帮助一切社会主义组织的建设，因此可说苏联 C. Y. 任务是助党去建设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C. Y. 要：（一）提高工人生产力；（二）改进农民生产率；（三）改良海陆军生活；（四）工会工作要参加 C. Y.。此外俱乐部工作即文化运动是使不识字的人也得识字，并且做统一语言文字运动，故苏联的 C. Y. 的工作已有好的成绩，C. Y. 内部要有大的文化教育工作，苏联的 C. Y. 书报杂志在各书店中推销得很广。此外他还负有教育训练领导童子团的工作，他要使童子团皆受很好的共产主义的教育。此外，C. Y. 还有一种重要工作即用种种方法保障青工利益。在苏联法律上，14 岁以下不做工，14 岁至 16 岁做四时工作，16 岁至 18 岁做六时工作，18 岁以上做工 8 小时。此外，各童工不做夜工，星期及例假休息，工厂卫生之设备，疾病之调养等等，国家皆有法律规定。各工厂须绝对服从此法律，否则即受处罚。

在各种社会团体中，如工会等，皆有 C. Y. 之组织，C. Y. 负有指导该团体之责任。尤其在小学中，在工人学校中，提倡学生须学技术的同政治的知识，学习共产主义。俄国成千成万的青年在 C. Y. 领导之下，受有很好的教育。并且 C. Y. 对于各种青年皆有种种物质的帮助。如美国 C. Y. 便努力学习苏联 C. Y. 工作经验，学习怎样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怎样做其他种种工作。

少年国际重要支部，除苏联外，还有德国 C. Y. 支部，他是一个最老的支部，是在大战中李卜克内西指导之下组织的，中间经过革命失败的打击。初组织时有 1 万余人，现在共有 22000 人。此外，另有一军事青年团，是受 C. Y. 指导的，共有团员 25000 人，大半都是 C. Y. 同志。另有童子团 15000 人，也是在 C. Y. 领导下的。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共有 5 万，C. Y. 正在其中做工作，使之起分化。德国 C. Y. 最大缺点，是找不着工作之方向，在前一年余全国大会上曾规定拥护青工的议案，可谓得到一大进步。此外，C. Y. 另有一工作，是武装团员（固然不能真都有武装），使团员皆受军事训练，将来一有机会，即可作战。此事在中国 C. Y. 甚为重要；我们将要在中国 C. Y. 任务中述及。

法国 C. Y. 是加入少年国际最早的一个。他的团员共有 12000 人。当时法国共产党对于加入共产国际还很犹豫，而法国 C. Y. 则毅然决然推动法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法国 C. Y. 最大工作是反对军国主义，在法军舰封锁苏联时，在占领鲁尔时，在摩洛哥战争时，在法国派大兵至中国时，他们都做了很大的工作，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反军国主义的工作上，法国 C. Y. 是最有力量有成绩的一个。法国在欧战后，经济很发展，失业者很少，但在近一两年中就不同了，失业者因经济恐慌而急剧的增加，法国 C. Y. 现在则正在乘此机会做广大的煽动的工作。

英国 C. Y. 是一个很幼稚的很小的组织，人数现在只 1500 人，数目虽小，可是很有力量。曾宣传英国水兵不要干涉中国，在青年工人运动中已有很明确的政纲。英国本是最富于改良主义的，在青年亦然；但是现在此种青年中已有我们的影响。在麦克唐纳工党下的青年，已有一部分倾向于我们，愿诚恳与我们合作。在英国大罢工时，我们 C. Y. 同志曾大活动，团员增加到 2000。但后因罢工失败，有一部分动摇而退出，故只剩 1500 人。在青年工

人中，现在已因我们 C. Y. 的活动而提出其本身具体的要求，从事争斗。

捷克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很好的支部，其原因有三：(A) 国内是多民族的；(B) 多军队；(C) 有强健的 C. P. 组织，党员共有 13 万。捷克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 C. Y. 实际上等于 C. P. 的一个青年部的组织。现在团员人数共有 14000。此支部将来可望有很好的发展。此外，挪威有团员 3000，瑞典有团员 11000。此二国改良派影响较深，又因其他关系，较难活动。

还有许多国家，因压迫而不能公开者，有下列数国：

(一) **意大利**在法西斯蒂高压之下，不能开 5 人以上的会议；然 C. Y. 组织仍秘密存在，团员约有 1 万人，能召集种种秘密会议。

(二) **波兰**亦在法西斯蒂压迫下，人数共有 5000，但有 1500 在牢狱中。

(三) **保加利亚**在 1923 年时，曾有 22000 团员，但经过高压后，组织大损失，现在人数约在 2000 至 3000 之中。国内压迫很严重，凡 C. Y. 分子皆处死刑。

(四) **立陶宛**团员大约有 7000，无精密统计，亦在法西斯蒂压迫下。

(五) **希腊**因从法西斯蒂进到德谟克拉西的政治，现在较易活动。

以上各国 C. Y. 所处环境不同，有公开的，有极受压迫的，但均能公开的或秘密的活动，这就是布尔塞维克特有的精神，此种精神，我们必须保存在各个国家的 C. Y. 中。

在**美洲**方面，**北美合众国**有团员 2000，但有四分之三兼党员，其全部的力量亦因参加党内小组织的争斗，而忘掉了本身的工作，此其缺点，少年国际正努力纠正此种缺点，在不久以前，美国 C. Y. 曾参加一切的青年工人争斗，较有进步。

墨西哥现正进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有我们的同志约800人；**阿根廷**——1500人；智利约5600人；**墨加拉**尚未有组织。少国对于整个的美洲的C. Y. 很少指导，此是大缺点。

亚洲方面，**蒙古**并无C. P.、C. Y.，因无纯粹无产阶级，仅有同情于我们的组织，如国民革命青年团。蒙古政权在国民党之手，因此国民革命青年团团员亦有参加政权者。在日本无整个的C. Y. 组织，仅有许多小团体的组织，再还有无产阶级青年联合会，或者将来可以发展成为我们的组织。在**朝鲜**，组织虽有，但派别很多，惟高丽青年联合会中有团员4万，可以活动。在**爪哇**，从前有团员数千，后因压迫而断绝音信，现在不知情形。在**非洲**还未形成我们的组织。

结论：

1. 少国已是世界的组织，因为在组织形式上、在纲领上、在斗争策略上都有一贯的形式。团员90%是工人，但不完全是产业工人。

2. 目前任务：A. 纠正从前小团体的错误观念，发展为群众的组织；B. 用各种方法参加到各种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之中；C. 各支部皆应按照以生产为单位的原则组织，不应以地域为单位来组织。

在数月前少国扩大会上讨论问题重要者：

1. 第三国际发生反对派，此派反对苏联目前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有些观念错误的同志参加此派；少年国际内亦有2人参加他们的活动，在此次大会上解除了他们两人的工作。各国C. P.、C. Y.，皆同情于真正布尔塞维克派，反对派仅有数首领活动，力量不甚大，且受多数群众的反对。

2. 关于青年运动本身：第一即在欧洲生产经济化，加紧对工人的剥削，改善生产技术，减低工人生活，利用青工代替成年工人，使青工与成工发生冲突，并利用廉价儿童劳动力抵制成年工

人。我们的责任就是领导青工不受此剥削，破坏敌人对于工人阶级的进攻，使他们这种方法在整个工人阶级中不发生大的影响。此外，C. Y. 还有一重要的责任，即加紧反对大战，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此工作在美国曾发生错误，就是以和平主义和平方法反对战争，此后应极力避免此种错误。

少年国际现已备有许多团员读的书籍，将来或可译数种成中文。此外，各国 C. Y. 应切实学习列宁主义的工作，如武装同志一事，现在各国都很需要。

在此次扩大会中，有美德各国的报告，现仅说关于中国的。

中国 C. Y. 已由一小组织进到一群众的组织了，今后仍应特别发展。重大的缺点是对青农未注意，其他兵士、武装、童子团、国民党等工作亦多未做或做的不大好。今后应：

坚固内部的组织，极力培植青年工人为团的中心，使每个团员都明了他的任务。关于青年团的定义，在中国没有一致，此次大会已规定，可参看“少年共产国际决议案”。

中国 C. Y. 与少共国际及其各国 C. Y. 的相互关系：在扩大会上曾组织特别委员会讨论中国 C. Y. 问题，认为中国 C. Y. 是少年国际的一个有力的支部。今后中国的 C. Y. 应多与少共国际发生关系，少共亦应尽力指导中国 C. Y.。中国 C. Y. 应给工农以国际的教育，使他们明了中国革命与世界之关系。此外，中国 C. Y. 以后应与各国 C. Y. 发生关系，给与并得到各国之 C. Y. 帮助，也是很重要的。

（选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 代表大会宣言

（1927年5月26日）

1927年5月，正值革命转入一极严重局面的时期，中国共产青年团在武汉举行了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中国革命之前途与劳苦青年群众本身的诸问题，以及本团过去与今后的工作，均有周详的讨论。为谋革命青年群众与本团同志之了解及共同努力，大会特发布下列宣言。

* * *

从“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喊出之后，经过“五卅”流血斗争和15个月省港罢工的怒吼，再由北伐军而湘而鄂而赣而江浙的传唤，反帝国主义运动便这样掩盖了东南部帝国主义的凶焰。欧战以来，帝国主义者全靠剥削殖民地而苟延残喘，中国革命运动之突飞猛进，实给帝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是以在惊惶万状之下，炮舰云集在沪滨汉上了，经济封锁开始了！野蛮地向苏联挑战，集重兵于太平洋东岸，准备造成凶恶的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

其次，在英日帝国主义者卵翼操纵之下的奉鲁军阀，虽属日薄西山，却更厉行白色恐怖，奋其困兽之最后死斗。

而严重中之尤严重者，则为蒋介石所代表之大资产阶级的叛变！资产阶级之欲背叛革命，酝酿原在“五卅”以前。“五卅”运动开始，无产阶级获得了革命的领导权，上海的资产阶级已试其端；戴季陶高唱其“仁爱性能”的骗局而后，蒋介石再试于广州3月20日的事变；终乃袭北伐之美名而谋资产阶级势力之扩张，到了江浙甫下，千百数革命同志以头颅热血争得之城池，乃不顷

刻而化作了蒋介石等残杀工农以及一般革命分子的屠宰场！蒋介石完成了资产阶级所赋予的背叛革命的使命；蒋介石之断然处置，诚不愧为资产阶级的，亦即帝国主义的功狗；革命的局势因是而更严重了。

* * *

不用说，在反动势力统治之下的民众，终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即在国民革命军足迹所蹈之地，因革命运动未能深入下层，旧封建势力仍潜伏蠢动，故亦并不能解除千百年久积之痛苦！然而，革命军势力之扩张终给了民众发展组织的机会，1000 万的农民，280 万的工人，都在革命的旗帜之下组织起来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因此而更确定，资产阶级的叛变，形式上虽似给革命势力以打击，实际上资产阶级离去以后，革命战线中的工农与小资产阶级乃得更坚固的团结起来，减少了内顾之忧，实无异于加强了此一战线中的力量。

至若全国青年的生活，实每况愈下！天灾横布，战争频仍，金融紊乱，物价腾贵；青年工人方面工作时间长至十二时乃至十四五时，工资不能维持最低生活；童工无法律保护，甚至有六七岁之幼儿，亦终日勤劳于机器之旁，鸠形骨立，俨同乞丐。厂主工头之压迫，更等于役使牛马，而失业游荡，无家可归者，更不知几何数！至若店员与手工业学徒则更不堪言，整日无报酬的劳动，无限期的剥削，因工商业之衰颓，待遇因之更形酷虐，鞭笞叱骂，无所不至；农村青年方面，因农村经济破产，致最低限度生活，亦不易得，遂群散而为兵，为匪，直接间接死于反动军阀的刀枪之下。更加以封建宗法社会势力的肆虐，愚民政策的结果，“无知识”乃统治了全乡村市镇；一般小资产阶级家庭经济破产、生活艰难，在反动军阀统治之下，教育经费，全部移作军用，校舍改作兵房，“教育”二字已不常见于新闻纸；致一般学生陷于进无可攻（所谓“刻苦攻读”）退无可守（所谓“退守家园”）之势！在这

样万难的苦境之中，青年革命的情绪，乃如火之燎原，实无可御。证诸年来革命运动中如上海“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北伐战争、湘鄂农村革命，乃至数次上海武装暴动等等，青年是立在最前线！迫切的要求革命，不顾一切的参加斗争，在全国革命大队之中，是没有比青年更甚的！

在这样严重的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大会在第三国际指导之下，完成了他的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第一，他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依据的理由是，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已近穷途末日，中国不能单独地继续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在国外，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存在，在国内，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日臻巩固，资产阶级已断然脱离革命战线与帝国主义妥协了。

第二，党第五次大会指示土地问题之严重，毅然决定农民应有军事上及政治上的力量，以取得大地主所占据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从根本上破坏反动势力的政治经济基础，保障反帝国主义的胜利，使全国的经济得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

第三，党第五次大会认为，在革命的前途中，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的政权，方能保障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工业收归国有，农村土地革命实现，发展工商业，使工农与小资产阶级之经济生活均得改善。因此，为建立此政权而奋斗，是今后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最后，党第五次大会明白指出，目前革命运动实继续高涨，决非一般人所幻想的，因资产阶级的脱离，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干涉封锁而使革命消沉！革命诚然到了一非常严重的时期，但靠了正确的策略之指导与英勇之革命民众的奋斗，革命运动即刻将有一新的发展。

* * *

在少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中国共产青年团第

四次全国大会亦完成了他当前之重大使命。

第四次大会深致赞誉于全体团员及其所领导的青年工农学生在过去参加革命工作之艰苦奋斗的精神，十分珍重两年来工作的成绩与经验，尤致无限的哀悼与敬意于多数为劳苦青年之利益而死难及入狱的同志之英勇无畏的伟大牺牲！劳苦的青年群众，在过去参加工会运动、农协工作及工农之武装斗争中，已遗留多量不朽的血迹，在最近广州李济深屠杀工农群众及共产党人的事变中，竟有数名年不满 13 岁的劳动童子团员，于高呼“共产主义胜利万岁！”“打倒蒋介石李济深！”声中，饮弹而牺牲于敌人之手！

从两年来的奋斗中，大会坚决地认定“本团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组织，他应当在党的指导之下，吸引广大的劳动青年群众，参加革命的斗争，同时在这些斗争中去养成他们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半殖民地的环境，促使青年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学生都归入了革命队伍，因而加重了本团所负的历史使命；那是：本团应结合农工与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之下，为全部被压迫青年之解放而奋斗。

大会一致以诚挚坚决的态度，接受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决议，大会训令全体团员偕同一切被压迫的青年农工学生群众在党的指导之下，一致动员，在农村中努力推翻封建地主的政治经济的统治，实施土地革命，以求革命的深入，踊跃参加肃清封建余孽的北伐战争，以求革命的扩展；尤应彻底反对中道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力谋改进工人生活，为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而奋斗！

大会深悉因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中国革命，阴谋破坏苏联社会主义之建设，而酿造的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依据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之历史的使命及经验，大会训令全体团员动员，扩大反对武装干涉中国并保障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号召青年群众加入军队，投效于工农武装的组织，勇

敢地立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最前线。在少年共产国际领导之下，与国际无产阶级青年携手并进，捍卫中国与苏联革命之胜利！

大会审查目前青年生活情状，深知劳苦青年的本身利益，必须获得普遍的拥护与多量的改进！生活的痛苦促起劳苦青年投身于革命，生活的改进实更能加强其参加革命的勇气与决心！大会告诫全体团员，今后应努力唤起全社会对于青年利益的重视，同时积极参加工会农会工作，在所有的机会中经过工会农会，领导劳苦青年群众，为其自身的经济与政治的利益而奋斗。摧毁一切戕害青年生理与心理的旧制度习惯，扑灭一切直接或间接危害革命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思想！

对于学生群众过去之革命的活动，大会深致钦佩！大会认为学生群众，因工农运动之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叛变，虽不免要影响一部分学生对革命发生动摇，但是在目前严重的革命局面之下，大多数学生在客观上仍有迫切的革命要求，他们在革命中仍负有重大的使命。大会深信，在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权独裁政权的奋斗中，学生群众仍然是必要的力量。大会指明今后学生活动的主要方针应是“到群众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

大会深致嘉许于自己的小兄弟——15万有组织的革命儿童的活动，在农村中，在工会与一切运动中，他们是先锋，是后卫，因为童子团的工作是发端伊始，他们的行动常有被非难的地方——这不应是他自己的责任，这亦不是制止他们活动的理由，大会认为整顿童子团的组织，加紧其政治训练，使其在工会、农会与学生会的有系统的指导之下活动，准备着成为革命的后备军。这是小兄弟们的正当前途！

最后，大会表示十分满意于少年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青年运动之正确的指导，大会特唤起全体团员及全国被压迫青年群众之注意，中国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青年应亲密地与西方无产阶级青年及各殖民地被压迫之青年群众联合起来，在少

年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共同奋斗，方能完成其所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

全国被压迫的青年们！同志们！我们过去的革命战斗已把敌人扫射得流水落花，一切革命的敌人已在我们群众的铁拳之下战栗发抖了！目前革命运动已转入一极严重的时期，我们需要与敌人决最后之死战了！大会号召一切革命的青年为自己并为人类而积极投入革命的战线，加入工会、农会、学生会，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与共产青年团，加入国民革命军。大会祈求一切被压迫青年的信任与督促，大会特严重地训令全体团员勇敢地偕同全国被压迫的青年群众，在工会、农会与学生会的旗帜之下，进行更系统的、更勇猛的战斗！我们高擎列宁主义的红旗，为中国革命而踏着死者的血路前进！

被压迫的青年们！我们高呼：

打倒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蒋介石与封建的奉鲁军阀！

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世界大战！

武装保卫革命！

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

争得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前途！

拥护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

被压迫的青年团结起来为本身的利益而奋斗、而革命！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少年共产国际万岁！

中国共产青年团万岁！

中国共产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六、罗易来华与“四一二”政变

中国革命的意义*

(1927年2月22日)

罗 易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资本主义没落的时代。乍看起来，似乎资本主义在采取了一系列降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措施之后，已经克服了战后危机。某些国家甚至有了资本主义繁荣的明显迹象，这种迹象在德国尤为显著。但实际上，除了美国（某种程度上包括日本）以外，资本主义的稳定只是暂时现象。即使在美国，资本主义繁荣也已达到顶点，其衰退的最初征兆已清晰可见。

中国革命发生于资本主义衰退时代，这个事实本身，基本上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意义。

任何社会制度如果同进步趋势背道而驰是注定要灭亡的。资本主义早已不是什么进步的东西，它已经成为完全反动的力量，是文明的障碍，人类的灾祸。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已发展为掠夺殖民地，奴役千百万人民，以最残酷的方式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奴役。它已经在地球上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一系列国家中阻碍社会的进展。帝国主义导致征服世界的战争，从事掠夺和

* 这是罗易于1927年2月22日在广州写的一篇文章。——原书编者注

高压统治，结果引起了1914年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破坏力量。必须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它，使人类的进步得以延续下去。在全世界，一场伟大的革命方兴未艾，这个革命将使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压迫控制下解放出来，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就是这样一种力量。中国革命是这种力量最先进、最强烈的表现。它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将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结束民族压迫和阶级特权的现象，这就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所在。

中国革命对资本主义的稳定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它已经给英国的对外贸易以严重的打击。中国革命的胜利，正在摧毁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计划。

现在，资本主义正在经受空前未有的危机，这是一种既是生产过剩又是供不应求的危机。近年来，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有很大的增长，这是由于竭力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的结果。但同时，实际产量大大低于生产能力。世界市场已大大缩小，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破坏降低了许多国家的消费水平。许多国家的信用系统为战后的通货膨胀所破坏，偿还战争债务和支付战后军国主义的巨大费用，造成了工资下降和税收的加重，这在相当大程度上降低了大多数工业国家人民的购买力。结果，生产的商品在销售时不能得到较高的利润，尽管世界工业的总生产力有很大增长，但人民却不能得到他们最需要的商品。这种情况是资本主义生产恶性循环的最明显的特征。

看来资本主义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只有两个方法：在宗主国降低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在殖民地国家加强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帝国主义竭力通过这两个途径寻求拯救自己的出路，但是它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从一方面或另一方面使它的地位更加恶化，只能引起又一次的恶性循环。降低工资破坏了国内市场，加剧了工业危机，增加失业，并把无产阶级进一步推向革命。增加对殖

民地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利用，只有在使殖民地工业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通过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能够实现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这将标志着向稳定世界资本主义的方向前进一大步。但是，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战时工业主要部门的军事化和战后贸易的长期缩减，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除美国以外，都急剧下降。而且，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还取代了宗主国在殖民地的商品市场。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矛盾的加剧，引起了各种激烈的冲突，这就削弱了那些议会政府的基础。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策，就是由这种纠缠在一起的相互矛盾的经济利益（以国际政治斗争为基础）决定的。同中国开展贸易是稳定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那些有资本输出的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能取得最大利润的投资场所。美国政府虚伪的自由主义政策可以归结为两种情况：1. 美国的工厂主要求与中国进行贸易；2. 美国的金融资本家想在中国投资。只要中国还没有恢复和平，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愿望就不可能实现。由于这个原因，美帝正在推行和平渗透政策。如果中国有一个巩固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对美帝是有利的。事实上，它只能为加强美帝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效劳。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开明的明智的帝国主义”政策，能得到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中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支持的原因。甚至是企图以显示武力来恐吓民族解放运动的英国，也追随这个政策。英帝国主义在挥舞大棒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宣布它要同“真正的合法的”民族政府签订协议的愿望。换句话说，英帝是在宣布：“只要健康的民族运动在中国创造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我就放下武器”。美国自由主义政府的阴谋诡计和英帝国主义的机巧权术，洞若观火。他们的目的是要分裂国民革命阵线，拉拢国民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诱使他们背叛和破坏革命。

中国的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只有在承认外国资本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意和承认。随

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方式也必将改变。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租界，在某种情况下，在某种剥削形式下都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没有这些强制的特权也能保持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统治。甚至英国政府也多次宣称这些方法已经过时，要以更新、更巧妙的统治方式来代替它们。

中国资产阶级既年轻又软弱。它在经济上是落后的，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如果民族解放运动引导国家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国家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沦于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因为，民族独立如果是由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推行一项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政策来实现的，那么，这种独立就仅仅是字面上的。帝国主义将仍然保留其统治力量。不平等条约可能取消，治外法权可能废除，甚至租界也可能取消，但这时的所谓国民政府将仍然只是国际资本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

但是，革命的解放运动不会蒙此不幸，它不会走这条路，这个运动所处的国际形势保证它不会走这样的道路。

集中全部精力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地位的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都处在不能解脱的经济危机之中。所有这些国家用于输出的剩余资本（殖民地剥削的手段）正在迅速下降，只有美国能继续推行自由开放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因此破坏中国革命。美国有资本输出，但至今在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各国不容许美国把他们排挤出去。帝国主义国家不同集团之间的竞争对中国革命都是有利的。以英国为首的集团，准备使出最后一招，采用武力入侵的政策，出动军队镇压民族革命运动，以保持旧的反动政权和军阀统治。但是，这样的政策只能加速革命的发展，正如去年已经发生的那样。

因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或者是继续向前发展成为胜利的工农革命，或者是根本不能成功。全世界的资本主义都已成为反动力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斗争，中国的革命民主运动是一场

伟大的社会革命。

（录自（美）罗伯特·诺思等编著、王淇等译
《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1981年版）

一个警告*

（1927年2月27日）

北伐的胜利使国民革命军同敌人的主力处于互相对峙的局面。这些敌人是：一、国际帝国主义集中在上海的海陆军，二、北洋军阀的军队。孙传芳的失败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为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决战准备了战场。孙传芳想延迟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的企图遭到失败，这迫使帝国主义采取最后手段——公开的武装干涉。因此，在占领上海的斗争中，国际帝国主义和国民革命军之间的直接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张作霖正在动员他所有的军队抵抗和击退国民革命军。在这个计划中，在这个反对中国人民的可耻罪行中，他依靠国际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

北伐的第一阶段已经到了最紧张的时刻。最后的胜利只能在

* 这是一篇呼吁书，是正当蒋介石准备背叛国民革命时发表的。国民党内部的斗争集中在人事纠纷上。中共中央当时仍在上海，对这个冲突没有明确立场。对国民党内危机的政治意义的最早估计是在这篇呼吁书中提出来的。这是国民党封建资产阶级右派的第一次进攻。呼吁书指出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并提出了反击它的政治纲领。当然，这是第一步，应该十分谨慎，纲领的制定应当十分小心。但是，事实上广州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共产党人指引下，已经起来进行反对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斗争。在这篇呼吁书付印之前，曾通过共产党的有关组织提交拟在上面签名的各个团体审议，经过讨论，获得通过。共产党广州市委不愿在斗争中采取主动，在作出印发这篇呼吁书的决定后，又压了一个星期。——罗易注

即将来临的残酷斗争中取得。在目前这个紧急关头，中国人民的一切民主和进步力量必须坚定地拥护国民革命军，帮助他们使北伐走向胜利的结局，并肃清盘踞在整个长江流域的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联合势力。

到目前为止，国民革命军正在光荣地完成人民所赋予的艰巨任务。让我们祝贺他们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下，为革命进行战斗并取得了辉煌胜利。为保证在即将到来的严酷的和决定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国民党应当对国民革命军实行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坚强的政治领导。所有军队的密切配合，是革命最后胜利的唯一保证。由于国内缺乏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国民革命军分散在广大的国土上，战线延伸数百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央政权才能保证行动的真正协调，以实现国民革命的各项原则。这个权力属于国民党。因此，无论在什么借口下，削弱党的最高权力，对革命都是非常危险的。不能也不应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呼吁一切群众组织要比以往更加一致和更加真诚地团结在国民党周围，以便使国民党在革命机构（即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具有真正的最高权威。

在目前革命高度发展的阶段中，革命领导要求统一党的一切力量，以便率领国民革命军去夺取胜利，并建立一个革命的民主的政府机构，以加强刚占领的省份里的人民政权。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加强党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刻，国民党不能没有汪精卫。我们希望他已充分恢复健康，能够立即回到工作岗位。我们呼吁一切群众组织和一切革命机构和我们一起，请汪精卫火速回国。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国民党的统一。不能容忍企图破坏或侵犯党的统一和最高权威的行为。这样的企图，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对革命都是十分危险的，必须坚决反对。我们认为北京

会议^①就是这样的一种企图。这是破坏党的权威和企图篡夺党的权力，党内仍然有人想要破坏党的统一。一切群众组织应当要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无条件地谴责党的这些敌人的行为，并对这种不能饶恕的侵犯党的统一和权威的行为给予纪律处分。

在战争方面，我们很希望同冯玉祥的国民军保持密切配合。长江流域的国民革命军和西北国民军的配合行动，将在战略上使北方反动派陷于穷途绝境。必须通过中央政权机构（即武汉中央国民政府），迅速实现所有革命力量之间的这种配合和协作。军队是掌握在革命政权手中的一种斗争工具，是人民权力的一种表现。

中国人民已经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国内反动派。在干涉中国革命中打头阵的只是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这一事实不应使我们忽视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意图。整个国际帝国主义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我们的斗争目标首先是反对这个敌人。我们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中对我们侵略最凶的一个或几个国家；但同时我们不应丝毫忘记，中国人民的解放最终要靠帝国主义（作为一种世界力量）的完全消灭。

法国政府宣告“中立”是一个无耻的谎言。法国政府除了供给云南反动政府武器和弹药外，还暗中支持英帝国主义的干涉政策。美国的自由主义是一种伪善的顽固行径，它正在推行和平渗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阴险政策，怂恿和扶植调和分子，瓦解民族解放运动。美帝提出的使上海中立化的建议，暴露了它的虚伪性。实际上，这个建议是为了让国际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使外国海陆军可以“合法地”阻止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日本的政策是尽人皆知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永远不会忘记它借助反革命的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企图，也永远不会忘记它多年来在反对民主和进步的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对张作霖的

^① 可能指西山会议。——译者注

不断支持。

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想同国民政府建立联系的各种企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瓦解我们的力量。因此，对这种企图的任何响应就是对革命的背叛，必须把它作为通敌罪行，予以揭发检举。

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分裂帝国主义的力量，这种策略是可行的，可以有利于瓦解我们的敌人，巩固我们的力量。但在实行这样的策略之前，必须对每一独特情况进行彻底调查，并经革命的中央机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批准。如果需要同外国政府谈判，必须在国民党同意和指导下由国民政府进行。决不允许军队或革命政权的任何其它机构擅自行动。

我们要求人民注意关于国民革命军指挥部和张作霖可能达成协议谣言。这些谣言毫无根据，必须断然否认。张作霖和他的代理人自称他们的作战目的与国民革命军相同，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我们绝不容许革命军队有这样的念头，即想同反动派头子张作霖在某一天达成某种协议。的确，张作霖可能建议举行各种谈判，因为他的军队有被国民革命军消灭的危险，毫无疑问，他为了挽救自己，是准备缔结任何协议的。对于他这种建议的唯一回答，只能而且必须予以轻蔑的拒绝。国民革命的根本原则之一，是使中国从反动军阀的灾祸中解放出来。不能设想革命军队会出于战略上的一些考虑而反对这个革命原则，不管这些考虑多么郑重其事。

群众组织坚决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他们这样做是要确保革命军队径直地向胜利的道路迈进。他们不能容许同日本帝国主义或北洋军阀有丝毫妥协。这样的妥协决不会结成一个反对中国人民最凶恶敌人的联盟。这种妥协意味着中国革命会成为国际帝国主义阴谋的牺牲品，意味着革命的投降。现在，革命正旗开得胜，群众组织将会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保护革命，反对这种投降的任何可能性。

为了使国民政府成为革命的主要执行机构，国民党必须把劳动群众团结在政府周围。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革命政府的专门机构实现国民革命的工农纲领。政府的进步的土地政策，将消除革命力量分裂的危险。后方人民群众的同情，对前线的胜利能起一半的保证作用。如果国民革命军给农民带来这样的消息：农民从难以容忍的重负（苛税、重租、强征勒索、盗匪活动等等）下获得了解放，农民群众就会热情地拥护国民革命军。如果国民革命军能保护他们免受民团和土豪劣绅的掠夺，并建立地方自治，使农村政权民主化，那么农民就会欢迎他们。

军队是革命最有力的武器。如果这支军队从上到下，从指挥部到士兵，对于他们的解放使命具有充分的自觉精神，它就会成为使敌人十分害怕的武器。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在国民党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巩固和加强军队的政治部门，必须对军队物质条件的改善给予最大的注意，定期给士兵们发津贴应成为军事预算中的主要内容。

人民的有组织的力量和意志能够保卫革命，抵制妥协和投降的危险。我们呼吁一切群众组织运用这种力量和意志，巩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打倒妥协投降政策！

一切权力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
全国总工会广州分会
广州工人代表会议
农民协会
铁路工会
海员工会

农工商教联合会

省港罢工委员会

省港总工会

1927年2月27日，广州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注意领导人*

(1927年3月9日)

罗 易

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采取妥协政策，有使革命遭到被出卖的危险，这一事实并不像我们的敌人所断言的那样，是出于共产党的假想。这个危险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越来越严重。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定领导者，必须敲起警钟，把人民的意志和精力引导到挽救革命的事业中来。

当人们不断听到关于同安国军政治讨论会会长梁士诒秘密谈判的消息时，心情怎能平静？在幕后上下其手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为达成南北协议而举行的这些谈判中，奉天杨宇霆起了重要作用，他与日本大使保持密切联系。据说蒋介石的代理人也参加了这些谈判。为革命英勇战斗并作出重大牺牲的人民群众，有权要求这些参与妥协活动的人作出交代。

帝国主义报纸报导，南北之间正在谈判联合统治上海，更有人说南方的“政治首脑”正在努力采取除武力以外的一切手段

* 这篇文章是为广州区委写的。区委借口这篇文章可能会引起广州独裁者李济深采取镇压共产党的行动，拒绝发表。——罗易注

“占领”上海。工人阶级要知道这些“政治首脑”是谁；当然，他们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只代表与帝国主义资本有密切联系的一小撮买办的利益。任何傻瓜都懂得，不可能以劝说的办法把帝国主义强盗赶出上海。如果劝说能起作用的话，当革命军接近上海时，国际帝国主义的海陆军就不会立即调集力量赶赴上海。如果南北合流，与张作霖和张宗昌联合“占领”上海，这无异于出卖国民政府在中国这个首屈一指的经济城市建立政权的权利。这样“占领”上海，意味着革命的投降。

正当上海无产阶级为帮助国民革命军占领这个城市而宣布总罢工时，是不是由于这些“政治首脑”的反革命意旨，拖延了国民革命军向上海的挺进呢？全中国工人阶级有权知道，当蒋介石军队已逼近上海时，本来可以给帝国主义力量以直接打击，而且驻守上海的孙传芳军队已被严重削弱，处于瓦解和混乱状态之中——这时，为什么蒋介石还允许帝国主义的爪牙对上海无产阶级领袖进行大屠杀呢？上海无产阶级奔赴战斗的最前线，他们为了确保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冒着帝国主义的炮火英勇战斗。无产阶级站在战斗最危险的地方，为了革命联合和兄弟情谊，向国民革命军伸出他们有力的手。但是国民革命军显然在某种罪恶企图的影响下，不接受他们伸出来的手，由于害怕反革命，他们拒绝走向通向胜利的道路，并背叛了他们勇敢的同伴。

据说，北洋军阀准备在下列三个条件下同国民革命军达成协议：（1）驱逐苏联顾问，换句话说，即断绝与苏联的革命联合关系；（2）长江以南地区除上海以外归国民革命军；（3）镇压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南方“政治首脑”同意与北洋军阀联合统治上海，以及当上海无产阶级罢工时拒绝采取决定性行动，显然是跟这三个条件中的两条相吻合的。上海工人阶级起义时，国民革命军拒绝前进。结果，它丧失了占领上海的权利，并破坏了同无产阶级

的联合。

面对这些严峻的事实，我们的警告并不是一个假警报。它已被形势的严重性所证明。在民族运动中存在着与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妥协并背叛革命的明显倾向，这个倾向是以国民党内一个有组织的派别为代表的。那些鼓吹与北洋军阀达成协议、谋求与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亲善关系以抵销与苏联的革命联盟的“政治首脑”，以及当上海无产阶级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干涉时采取按兵不动政策的那些“政治首脑”，就属于这个派别。在这些“政治首脑”（他们的反革命渴望已经得到帝国主义的青睐）中间，有像前北京吴佩孚内阁的总理黄郛这样的狂热的反革命分子。这个情况说明，有非常重要的理由迫使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发出警告：“注意你们的领导人，并制止他们的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是很清楚的。没有日本的支持，东北军阀早就不存在了。山东军阀张宗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日本军队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一起，曾被派来守住上海，不让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方“政治首脑”，**现在不顾这些事实，却正在与日本政府进行秘密谈判。**甚至还派戴季陶出使日本去“建立友好关系”。戴季陶出使日本，其目的如果是要在日本人民群众中间造成一种反对军事干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支持张作霖和张宗昌的气氛，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派他出去显然是向日本资产阶级及其帝国主义政府叩头的。他正在与内阁大臣们会谈。中国人民有权知道代表他们的戴季陶出使的真正目的，并有权在他的行动有损于革命时把他召回。他在和日本外相的一次谈话中，不厌其烦地说明中国国民党的要求决不过分，中国民族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显然是指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最后，他宣称中国希望与日本保持联系，并在国民革命事业中希望得到他

们的帮助。^①

作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非正式代表的戴季陶曾宣称，如果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他们，那么民族运动的右翼就准备限制国民革命的纲领，中断与苏联的联盟，镇压工农运动。因此，这个“纯粹孙文主义”的鼓吹者，厚颜无耻地背叛了孙中山在遗嘱中所确定的所有原则。

妥协和背叛革命的危險，不是出于想象。某些人为了实现同敌人妥协和背叛革命的目的，正在进行紧张的活动。工人阶级必须联合其他革命分子起来挽救革命。

1927年3月9日于广州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蒋介石发动 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和农民 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

（1927年4月14日）

工人们！劳动者们！受压迫的人们！

共产国际号召你们起来向帝国主义表示公开的和群众性的抗议，因为帝国主义要把世界拖入新的世界大战的灾难深渊之中。

从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到现在已经过去近13年了，至今人类还没有从这场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破坏中复苏过来。至今还有数十万残废人、数百万卑鄙大屠杀中的伤残者，流落在城市街头，

^① 戴季陶的这次讲话和北洋军阀将据以同南方达成协议的条件（据得到的消息）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相似之处。 罗易注

像露水一样洒遍欧亚大地的鲜血还没有干。至今世界依然在危机的痉挛中颤抖，而危机的根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现在，大炮炮口又开始冒烟了。还很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已经开始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杀人战争。有 170 多艘军舰停泊在中国港口。日本、英国、美国和其他“大”国的数万名步兵踏上了浸透着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大众血汗的土地。中国的各大城市实际上已经被“文明的”杀人匪帮所占领。长江上到处都是他们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一些港口也被资本强盗占领。中国被他们的海军封锁。满洲被日军占领。帝国主义军队同反动匪徒张作霖串通一气，进行着毁灭性的反对革命的战争。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尽管存在着分歧，但是现在它们不经宣战，不要冠冕堂皇的借口，**在齐心协力地进行着这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

同时，它们也已开始准备**反苏战争**。对苏联驻北京代表处进行前所未闻的袭击、抢砸、拘捕、殴打，沙俄白卫军分子和英国人、美国人包围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对苏联进行明目张胆的挑衅，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是根据帝国主义海盗的策划有步骤实行的一个完整计划。**

难怪**英帝国主义**企图束缚英国工人运动和取消无产阶级工会的一切权力，因为它想有一个“安定的”后方，以便去建立它的军事“功勋”。

难怪**法国金融寡头**在国内实行“战时法律”，要把全国变成军营，因为它在全力准备进行大屠杀，准备制造帝国主义政客所策划的新灾难，准备在分赃基础上挑起新的冲突，准备再次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武装干涉。

难怪现在一切资本力量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反对工人运动的堡垒——苏联，因为它们准备进行一场新的**世界性大屠杀**，要比 1914 年发动的那场大屠杀更为罪恶、更为血腥、更为残忍。

国际联盟这个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最虚伪的机构，在为这场大屠杀作掩饰。国际联盟就是帝国主义强盗扼杀各国的联盟。这个联盟一面谈论和平，一面进行战争，一面谈论保护弱小国家，一面消灭这些国家，一面谈论裁军，一面疯狂扩军。它一只手拿着橄榄枝，而一只手高举着利剑，而这把利剑沾满了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屠夫在叙利亚、埃及、印度、摩洛哥和中国所杀害的千百万人的鲜血。

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的领袖们也在为这场大屠杀作掩饰。他们空谈和平，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同和平的堡垒——苏联的斗争上。他们支持和传播国际帝国主义的下流无耻的和出卖灵魂的报刊所编造的谣言和诽谤。

在这场日益展开的大搏斗中，帝国主义在利用旧世界的一切残渣余孽：所谓的先进民主国家的英国和美国竟同墨索里尼的刽子手、张作霖之流反动强盗和被革命扫帚扫出原帝国疆界的白卫军分子串通一气了。它们在收买叛徒，雇用刽子手。因此劳动人民必须进行英勇的斗争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在中国，帝国主义者不仅封锁了整个这个国家，而且它们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的团结，收买了蒋介石。蒋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叛徒，成为全国反革命势力的核心。

蒋介石按照同外国人达成的协议，在上海发动了政变，解散了上海政府。他的军事将领解除了工人纠察队武装，并秉承外国强盗旨意，枪杀了几百名无产者和无产阶级的妇女和儿童。我们怀着极大义愤和对刽子手的满腔仇恨宣布：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是国民党革命派的敌人，是工人运动的敌人，也是共产国际的敌人。

各国工人阶级、各国被压迫人民都应当看清，中国资产阶级背叛了反帝斗争。它被强大的工农运动浪潮吓破了胆。这个运动囊括了如此众多的人类，如此广大的民众，以致于任何帝国主义

力量都不能扼杀伟大的中国革命。无论是派遣舰队，还是实行封锁，无论是进行收买还是散布谎言，帝国主义者都不能扼杀中国革命。

他们正在准备通过发动新的世界性大屠杀来扼杀这个革命。但是千百万无产者和农民群众必将奋起反对这场大屠杀，士兵们必将奋起反对这场大屠杀。各被压迫民族必将奋起反对这场大屠杀。印度已开始出现风潮，英军指挥部就要从中国召回旁遮普军队。在帝国主义军队中已经开始进行逮捕。欧洲工人阶级已经开始提出抗议。苏联有上百万工人群众上街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抗议扼杀中国，抗议新的大屠杀。

中国革命的巨大规模以及它对殖民地世界和欧洲无产阶级的影响表明，**资本主义危机大大加深了**。而危机的加深又使帝国主义者的力量联合起来，暂时迫使他们把酝酿着战争的分歧搁置一边。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他们对苏联的险恶挑衅计划，必将危及全世界的和平事业。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国际号召全体工农、全体劳动者、全体反战士人勇敢地投入抗议活动，勇敢地参加反战斗争。

不要听信资产阶级报刊的谎言！

要要求从中国撤军！

要采取各种措施制止调运武器和士兵！

打倒新的世界大战的挑动者和罪魁祸首！

打倒屠杀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刽子手！

打倒蒋介石和其他叛变者以及屠杀的策划者！

上海工人万岁！国民党革命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原载 1927 年 4 月 15 日《真理报》，路远选译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莫斯科 1986 年版》）

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

（1927年4月13日—15日）

罗 易

国民政府曾经通过一个关于继续北伐的决议，其理由如下：武汉有供自己调动的、进行北伐所必需的军事力量；在冯玉祥和阎锡山军队的帮助下，可以把张作霖赶回东北；国民政府将占领京津。据说，阎锡山已发表声明支持国民党并接受它的领导，这被看成是有利于北伐的一个新因素。据说，这个计划也得到军事专家们的赞同，他们指出，北伐不能停止，因为如果国民革命军不向北进军，张作霖就要向南进军；其次，他们指出，冯玉祥正在活动，因为陕西太穷，他不能再留在那里，如果冯玉祥是在推进，就要给予支援。因此，国民革命军必须向北进军。

对我的建议提出的新的反对意见可以归纳如下：我们不能巩固我们在南方的基地，因为一个革命民主政权只有以无情的恐怖和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建立起来。因此，留在汉口是不可能的。我的建议的基本精神是：在出发到任何地方去之前，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巩固的基地。鲍罗廷说，这是一种幻想，在中国不可能实现，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专政能达到这个目的，而无产阶级的专政是不可能建立的。

按我的意见，在目前危急关头，革命的任务是：

1. 扩大工农运动；
2. 政权机构的民主化、集中化和强固化；
3. 军队的改组和集中领导。

* 这大概是罗易对党的领导人的一次讲话。——原书编者注

反对立即北伐的理由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强调“立即”二字。总的说来，我不反对北伐，但我反对立即出兵。我反对国民党关于军队须在10天之内沿京汉路去占领京津的决定。谭平山同志的意见是，如果作了某些必要的准备，则赞成北伐。

我也是赞成北伐的，但事先必须作好一定的准备。

那些主张立即北伐的国民党人首先是从军事上考虑的。他们说迅速向北进军可使我们有机会打败奉军，不仅占领京津，同时可以把奉军赶出长城。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计划。据鲍罗廷同志说，所有的军事专家一致同意这个计划。我不想对军事力量进行评价，仅仅提出某些事实，证明人们不能总是相信军事专家的意见。

两星期前，他们曾说他们能在两三个月之内毫无困难地占领上海。但是昨天，鲍罗廷同志承认，他始终反对向东进军，因为那样会使我军被歼。因此，他本人证明了两星期前军事专家的意见是错误的。可见，人们不能如此轻信两个星期前完全错误的专家们的意见了。

但现在不顾两星期前的事实，却根据军事专家的意见来确定方针，计划去占领南京。这些专家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即汉口到南京之间的距离等于上海到南京的四倍。南京到上海之间有铁路运输，蒋介石到达南京的时间比武汉军队快四倍，他们忘了这一点。这些军事专家虽没有战略学的起码知识，却并不妨碍他们来决定我们的方针。应该说明，加仑同志是反对占领南京的计划的，所有的中国专家尤其是陈诚赞成这个计划。远征北京的计划也是由军官们制订的。

立即出兵北伐充满着严重的危险

如果我们真的要粉碎北洋军队，就必须认真对待。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军队集中于京汉路，这会使武汉处于毫无防卫的地位。

如果我们向北进军，就会给蒋介石或北洋军阀从南京方面进攻我们以可乘之机。昨天，北洋军队再次占领浦口、威胁南京的事件，使我们遭受进攻的危险更为加剧。北洋军队的这个胜利表明：第一，北洋军队遭受的失败并不如我们设想的那么严重；第二，蒋介石和北洋军队之间可能有了协议。

因此，在右翼我们受到十分强大的联合武装力量的威胁，我们的后方没有防守，我们没有基地，却还要向新区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北伐，只是军事冒险而已。

北伐的计划是以冯玉祥和阎锡山将和我们联合的假设为基础的。但即使他们会跟我们联合，也不能消除危险。当我们到达北京时，军队的力量仍将是不平衡的，我们的军队将是少数，而阎锡山其人会成为另一个唐生智或甚至另一个蒋介石。冯玉祥会采取什么态度也很难预测。我们曾在南昌遇到的情况将在北京再次出现，国民革命军中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分子会跟革命同志发生冲突，从而发生另一次分裂。以阎锡山或冯玉祥为首的反动军队将占领北京，我们则会被迫屈服或撤退，我们不得不放弃北京，而那时武汉大概早已在反动派统治之下。最后，我们将走投无路。

立即进行北伐意味着我们要离开这个地区，这里有我们控制下的国民党的强大组织，有共产党和工农的组织；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那里除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队外，没有有组织的力量，也不能保证这些军队会永远和我们友好。相反，有足够的理由推测，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危机，这些军队会采取行动反对我们，而我们将没有牢固的基地进行反对他们的斗争。

反对立即出兵北伐的根本理由（这是昨天由谭平山提出来的）是这次战争会加强军阀的地位，而对革命的基本力量即对工农群众是有害的。革命力量的均势将遭到破坏。革命将不再以有组织的群众的威力为基础，却以反动封建军官手里的不可靠的军队为基础。鲍罗廷同志承认，北伐的直接结果将建立一个由不同

成分组成的军事联合机构，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其中，反动分子很可能将起支配作用。

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必须首先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立即北伐意味着回避这些问题，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策。正因为革命的问题难以解决，无产阶级就不能一走了之。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运动发展中提出的问题，革命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

在革命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阶级分化的过程。到了一定阶段，资产阶级就要转而反对革命。革命的社会基础也就变成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必须由这些阶级的革命联盟来建立民主专政。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建立这些阶级的民主专政以保证中国革命前途的时刻已经到来。但人们不去进行这项工作，却提出继续北伐，这就是回避革命的根本问题。

我们正在退却，但是退到哪里去呢？我们正在跳出油锅而又跌入火坑。现在我们只应当去对付蒋介石，可是我们却避开他而到陌生的地方去，在那里，我们很可能还会遇到许多像他这样的人。

立即北伐不仅不能解决阶级分化问题，而且意味着同随时准备背叛革命的反动分子实行合作。如果历史确曾使我们吸取到一些教训，我们就会想到，在北京等着我们的是另一个南昌事件。为了避免南昌事件的重演，我们应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为什么我们会有南昌危机呢？因为在北伐之前，民主革命力量是很不巩固的，一旦跟资产阶级发生冲突，我们就不能战胜它。今后在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之前，必须保证我们不再处于那样无准备的状态。我们必须把民主革命力量动员起来。在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之前，必须巩固基地。

立即北伐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下将转身逃跑，抛弃群众。这等于背叛农民、背叛上海、广州和武汉的

无产阶级，背叛那些经受苦难、牺牲自己去获取胜利、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群众。在这种可耻的叛逃行为中，作为这些基本群众的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跟着小资产阶级走吗？对小资产阶级说来，叛逃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它的堂吉珂德式的特点，它总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冒险事业中跳来跳去，一旦失败，它就会跑到资产阶级那边去。它不会失掉什么。但工人阶级是不能这样做的。

现在我要讲第二点，也即我对于鲍罗廷的计划和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描述，提出批评意见。

我可以详细阐述这个问题，我想，对我们年轻的中国共产提出具体的批评意见，是会有很大好处的。但现在我先不谈这么多，只是谈谈鲍罗廷同志讲话中涉及我们迫切任务的那些论点。

从鲍罗廷讲话中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无非是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已经为资产阶级所篡夺，所以革命力量必须撤退到山区或蒙古沙漠的某个地方去。这就是说，那些曾经担任领导的同志承认，在他们领导下的革命已经失败，他们的政策是错误的，他们已经丧失了领导革命的权利。

鲍罗廷同志及其所代表的那些人建议，革命应从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而且有了政治经验的省份中撤出来，从革命任务已经部分完成的地区撤出来，到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去。他们建议，我们应离开那些革命已有社会基础、存在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运动以及强大的党组织的省份，到社会基础非常薄弱、反革命力量较强、其组织较为严密的一些落后的省份里去。

我要指出鲍罗廷同志的理论和计划中的一个矛盾。事实上，这样的矛盾很多，但是我只谈其中的一个。他说，如果北伐胜利了，奉军被粉碎了，河南在冯玉祥赞助下就会开展一个广泛的农民运动。那么，为什么他不在唐生智赞助下就在当地这样做呢？他自

称反对在湖南发展强大的农民运动的策略，他说：“如果我们试图在湖南开展土地革命，我们势必立即与很有影响的势力发生冲突。”如果在湖南是这样，那么有什么理由相信在河南或山东会不是这样呢？如果唐生智（按鲍罗廷的看法，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革命者）反对土地革命，那么人们怎能指望冯玉祥（或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会同意土地革命呢？这是一个矛盾，一种幻想。

小资产阶级左翼（鲍罗廷同志想在他们的马车上套上中国共产党这匹马）既没有胆量，也完全没有这种愿望要开展土地革命。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北伐仅仅是给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提供拖延解决土地问题的一个借口而已。

中国革命将通过开展土地革命而取得胜利，否则就不可能胜利。资产阶级反对土地革命；小资产阶级不敢发动这个革命；这个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完成，国民革命就不能胜利。小资产阶级正在背叛国民革命。如果中国共产党支持立即北伐的计划，无异于帮助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是应该追随小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反革命的政策呢，还是应该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现在我再谈鲍罗廷同志反对巩固东南地区革命民主力量的意见。这种反对意见是过低估计无产阶级和轻视群众力量所引起的。鲍罗廷同志认为革命的主要因素不是群众，而是我们对小资产阶级运用策略的能力，不仅是对小资产阶级而且是对各个军阀运用策略的能力。昨天，他告诉我们，军事推进的结果会是“军队的胜利，中国将成为一个无主之国，我们可以有机会在这些军队中施展策略”。对鲍罗廷同志来说，广州无产阶级是“粪土”，上海无产阶级是“棉花般的无产阶级”^①。

① 此处“棉花般的”（cotton-fibred），意即软弱的，与上句“粪土”（dust）相类似，都表示鲍罗廷看不起群众。——译者注

鲍罗廷认为，革命不能受“他们的约束”。不过，他没有提到武汉无产阶级，正是他们的革命行动使左翼分子掌握了政权。他也不愿意武汉农民走得太远，因为那样会使唐生智不高兴。如果人们如此轻视群众力量，那么革命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

鲍罗廷的理论认为，巩固东南几省的民主政权只有在无产阶级的专政和无情的恐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很遗憾，他没有为这个理论提供证据，也没有说明支持这个理论的理由。根据这个理论，在封建资产阶级^①反动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中间阶段。这与共产国际决议案中的观点是相矛盾的。我并不是说可以人为地使中国革命或任何其它革命符合于写在纸上的决议案，尽管这些决议案是很好的甚至是英明的。我是说如果鲍罗廷说的是正确的，那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因此也包括对世界革命）的概念就是错误的了。

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巩固革命的社会基础和革命的基地。资产阶级已转而反对革命，资产阶级左翼已迷失方向，又没有一定的见解。现在最重要的是组织、集中和巩固革命民主力量，否则，革命胜利就没有保证。而这是可以做到的，民主力量是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起来的。现在正是这样做的最好时机。因为小资产阶级左翼政权没有工人阶级支持就一天也不能存在。所以说，现在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真正实现领导权的最好时机。无产阶级领导权是能够实现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革命可以进一步发展。这不就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领导权的实质吗？一般意义的领导革命同在斗争中实现领导权的区别不就是在这里吗？无产阶级能完全胜任革命最高领导的时刻虽然尚未到来，但是由于它处于支配的地位，它是能够决定革命发展前途的。这些

① Feudal-bourgeois 也即地主资产阶级，因当时文件一般习惯于用“封建资产阶级”一词，故译为封建资产阶级。下同。译者注

同志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提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干脆降伏于惊慌失措的小资产阶级面前。但是，立即北伐是同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相容的，是违背他们利益的，尽管小资产阶级本身并不理解这一点。这就是作为最革命的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必须起来反对北伐的原因，如果共产党反对立即北伐，左翼分子就不敢坚持这个政策，因为左翼政权没有工人阶级支持就不能存在。我们必须建立民主专政，而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首先扩大民主力量。革命面临三项任务，这些任务只能依靠巩固我们在华中和东南各省的力量来实现，而不能靠立即北伐来实现。

这些任务是：

1. 通过土地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最低要求以动员民主力量；
2. 在农村由农民夺取政权；
3. 革命军队的改编和集中领导，换句话说，即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实现这些任务的机会是存在的，因为有两个最重要的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如果我们充分运用这两个部的权力，努力开展工作，在几个月内我们的地位不仅会稳固起来，而且会成为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到那时我们就要准备前进，发展革命的地域。

下面是巩固我们的力量的大致计划：

1. 必须保卫武汉。把军队集中在湖北北部边界。如果北洋军阀想进犯武汉，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队可以逐渐向京汉路进军，威胁他们的侧翼。
2. 在完全由武汉政府统治下的湖南、湖北开展土地革命。在两湖实行土地革命，将影响北方各省，并打开通向这些省份的道路。
3. 对江西和广东进行政治渗透，以必要的军事行动加强这种渗透。两湖的土地革命必将对邻省发生直接的影响。

4. 使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归属武汉政府，把武汉政府的影响扩大到西南各省。

5. 在上海和整个浙江省开展强有力的组织、宣传和鼓动工作。

6. 最大限度地运用劳工部、农业部和内务部的权力，武装工农。

7. 改善同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关系。

这些条件一旦实现，就应当举行北伐，占领北京，并包围上海，实行经济封锁，割断上海与内地的联系。

我不反对北伐，但我认为必须经过几个明确的阶段。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广东是革命的基地。现在我们处于第二阶段。在进入第三阶段之前，必须更大规模地发展、加强和集结革命力量。

北洋军阀不断地威胁着革命，要使革命胜利，就必须消灭张作霖。但现在还有另一个敌人，他离我们更近，其危险性并不亚于张作霖。借口打张作霖，立即进行北伐，会使革命在这个危险面前解除武装。我们不能忽视，在帝国主义帮助和唆使下，有可能形成一个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是南京政府，在这里革命将面临比张作霖更强大、更危险的敌人。非常清楚，帝国主义目前的政策就是要建立一个封建资产阶级集团，在民族主义幌子下成立所谓“反赤战线”。这就是革命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危险。

危险的威胁是来自这个方向，而不是来自南方、北方或西方的任何其它军事集团。这个危险的性质是政治性的，不是地区性的，而且在国内任何地方都可能出现。他们正企图组成一个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反动势力的联盟，这个危险对我们的基地是个威胁。我所说的我们的基地不仅指武汉，还包括在国民党控制下革命已取得初步胜利的所有地区。整个这些地区都存在这个危险。进攻我们的基地并不是将来的事情，而是由来已久，早已在

浙江、福建和江西开始。这些省已经不受国民政府管辖。李济深正在使广州成为反革命的中心。我们刚得到消息说，蒋介石已派代表去四川，进攻已经开始，反动势力正在包围我们。而当我们的老家被进攻时，当反动势力威胁我们的基地时，我们不但不保卫它，反而要到北方去开辟新的革命基地。

我们到北方去寻找什么呢？再去寻找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事支持吗？这些同盟者的可靠程度并不是很大的，这是普通常识。我们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抉择：其一，我们获得工农群众作为社会基础；其二，我们得到几千士兵，这些士兵随时可能掉转枪口反对我们，反对革命。

军事因素在中国革命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曾经反复指出过的。我并不低估军事因素，但我担心中国革命有成为单纯军事化的危险。不仅在国民党内，而且在共产党内也是把在军队之间施展策略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动员广大群众（他们代表真正的革命民主力量）放在首位。共产党必须面向工人阶级，它只有有了这个坚强的基础，才能利用军队并在军队中进行活动。但目前却不是这样，目前的主要倾向是把拉拢利用军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陈独秀同志说，革命不能在武汉等死。但是，没有人要让革命自取灭亡。当我说必须保卫基地时，我所指的不仅是武汉或湖北，而是包括东南各省。我说的基地就是这些地方。如果在半年或一年之内我们巩固了我们的地位，建立了真正的左翼政权，发展了民主力量，建立了国家机构和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那么革命不仅不会灭亡，而且会具有最强大的生命力，它将处于比立即北伐好得多的地位。

即便我们假定北伐会取得胜利，可能把张作霖赶回东北，占领京津等地，即使到那时，情况仍不一定对我们有利。我们还会面临许多困难。我们所经历过的、北伐第一阶段结局的那种复杂

情况将会重演，我们到达北京必须得到军官们的帮助，这些人很可能又变成新的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并不代表个人，他是那些支持革命到一定阶段，然后又转而反对革命的反动社会势力的代表。为了保卫自己，反对这些不可靠的同盟者，革命必须组织自己的基本力量。在第一次北伐中，民主的社会力量既不很强大，也没有很好组织起来，以扩大他们的影响。民族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妄图夺取最高权力，他们固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他们还是分裂了国民党。如果革命民主力量组织严密，蒋介石的政变本来是可以粉碎的。但是在第一次北伐前，不可能建立更完善更强大的革命组织。这件工作从广东才刚刚开始，革命力量正是在北伐过程中得以迅速发展。现在革命已经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把民主力量组织起来，使革命免受反动集团的袭击。

如果我们立即去北京，事实将证明，民主力量甚至比南昌危机时更缺乏组织和更为软弱。在北京，冯和阎将从我们手里夺权，我们将处于孤单无援的处境。如果我们在北方处于这样的危机之中，就完全不能保证革命的基地仍会掌握在我们手中。认为我们在向北进军的同时，可以巩固我们在南方的基地，那纯粹是幻想。巩固基地意味着要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反对那些正在革命后方组织起来的反革命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集中解决我们队伍中的一些根本问题。我们需要军事力量保卫和巩固基地。立即北伐会使我们与基地隔绝，并面临新的敌人。

然而今天，鲍罗廷同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使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今天他不再说要到北京、张家口、长城去，今天他说，这个计划只是要占领陇海路。我准备同意这样的计划。不越过陇海路的进军纯粹是一种防御措施，这可以纳入保卫我们基地的计划之内。它已不再像堂·吉珂德的冒险那样，想把革命扩张到西藏，把基地转移到蒙古。如果北伐是指他今天所说的内

容，那么我同意。这完全是一个防御性措施，而不是一个进攻性措施。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妥协。因为在我昨天的发言中，我就提出应把军队暂时派往河南边界，并应与冯达成协议，让他的军队逐渐向陇海路推进。当我昨天反对鲍罗廷的计划时，我就说为了防守起见，我们必须向陇海路进军。我是反对立即北伐的，但我不否认，必须抗击北洋军阀，保卫我们自己。

现在我要谈谈根本性的问题。向北京还是向陇海路前进，这不过是革命根本问题中具有实际意义的方面。今天早晨陈独秀同志说，目前的迫切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这就是我们观点中的真正分歧：是深入革命还是扩大革命。他们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在革命只有初步发展的那些省里，不可能巩固左翼政权，如果不扩大革命，我们就不能生存。

资产阶级已转而反对我们。小资产阶级正在动摇，正在设法回避革命发展提出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发展工农力量——这是确保革命前途的唯一措施。**立即进攻北方意味着逃避这项必要的工作。摆在武汉小资产阶级政府面前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执行一项真正革命的政策，完成土地革命。但是，在必须立即北伐的借口下，他们正在回避这项工作。鲍罗廷、陈独秀等人宣传他们同意立即进行北伐，以此来支持小资产阶级回避执行革命政策的行动。这不是发展革命的道路。这不仅是机会主义，也可以说是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背叛。由于这个理论，我们已在上海遭到了失败，由于这个理论，我们拒绝革命深入。不错，北伐会在那些新的地区里掀起农民运动，并开始群众运动的第一阶段。但是归根结蒂，广东、湖南和湖北的农民运动早已经历了第一阶段——扩大阶段，现在正准备进入第二阶段——深入阶段。不能把它们生硬地拉回第一阶段。它必然或者是向深入发展，或者趋向衰败和灭亡。客观情况有利于农民对反动派采取攻势消灭他们，如果农民不采取攻势，他们自己就会遭到攻击，就像广东、江西发生

的情况那样。如果唐生智成为湖南的统治者，那么湖南也将如此；如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上，同样的情况还会发生。

如果我们把农民暴动的旗帜插到河北或山东去，我们会失掉南方几省中已取得的地位。此外，北方各省（河北和山东）的客观情况对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并不比南方有利。在北方有更多的富裕农民，而南方则是贫农占绝大多数。富裕农民不像贫农那样迅速和那样无保留地参加革命。南方各省革命的社会基础比北方的好。

今天鲍罗廷同志阐明他的理论时，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专政和无情恐怖，才能在南方几省建立真正的左翼民主政权。

湖南、湖北和广东的农民运动正准备进入第二阶段，运动的发展提出了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鲍罗廷同志指出，为了巩固南方的革命基地，就必须支持农民进行彻底土地改革的要求。这样，共产党人就必然要转而反对国民政府，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武装起义，而那样是非常危险的。根据他的论点，按顺序反过来讲就是：武装起义是危险的；但反对政府会导致武装起义，而共产党人必将处于反对政府的地位。那么，人们是否应该拒绝支持农民运动呢？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共产党人不应该支持农民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这就是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给我们的劝告。

在目前形势下，这样的劝告是很危险的，共产党如果要发挥历史的作用，如果要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拒绝这个劝告。

如果我们回避加深革命的必要性，反帝和反军阀的斗争就得不到发展。相反，只有解决了加深革命这个当务之急，只有在与外面的敌人作战之前，先对我们地区内的反动势力的基础发动进攻，反帝和反军阀的斗争才能发展。当我们的基地尚未巩固，易于受到敌人进攻（这种进攻已经开始）时，过分伸展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愚蠢的。革命前途的唯一保证就是建立一个革命民主的基

础，而在中国，革命民主力量的核心就是农民。

认为在中国进行土地革命为时过早，不要土地革命，这种看法表明对中国革命缺乏了解——缺乏一个正确的观点。那些同意立即进行北伐的人不愿意实现土地革命纲领。所以，我今天早晨指出，陈独秀同志的观点与共产国际的提纲是矛盾的，而我则重申了提纲的内容。

动员革命民主力量——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保证。中国共产党能够采取这些步骤的时机已经到来。没有共产党的支持，没有劳动群众热情的、自觉的支持，武汉的左翼政权连一天也不能存在。共产党参加革命政权、不做国民党尾巴的时间已经到来。共产党必须懂得这一点。**立即向北进军将证明是不利于革命的发展的。**如果共产党宣布反对立即北伐，如果它清楚说明自己的观点，小资产阶级左翼就不敢进行这个冒险。中国共产党也不会让它脱离最迫切的革命任务。

这样无产阶级将实现在民族斗争中的领导权。目前革命的领导权虽然仍在各阶级联盟的手中，但无产阶级作为最革命、最有组织的阶级，将决定革命的政策。

我把我反对立即北伐的意见归纳起来，总结如下：

1. 军事方面，北伐的结局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没有一定取得胜利的保证。

2. 即使在军事上胜利了，结果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有充分理由说明，那样会加强军事力量而削弱民主群众的力量。

3. 向北进军，要求集中国民政府所有的军队，这会使南方革命基地招致反动派的进攻，反动势力在这里将得到加强，并推翻权力薄弱的民主力量。

4. 当资产阶级明确地转向反对革命的时候，发展和巩固民主力量（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唯一的保证。这个

任务不能同一次严重的北伐同时实现。立即北伐只是阻止民主力量发展的借口，因此对革命是有害的。

我提出下述几点具体意见：

1. 在北面、东面和西面布署军事力量，以保证革命的第二条战线——长江流域的安全。由军事专家负责制定计划。扼要地说：派军队到河南前线，与冯玉祥合作，他将逐渐向陇海路进军；第二军和第六军向安徽西部进军。

2. 在江西、广东和广西恢复国民政府的权力。

3. 在广东恢复统治，不需要南征，可以由地方力量完成，靠仍然忠于国民政府的军队的起义和工农的行动来实现。

4. 征服了广东，就不难征服广西。

关于财政困难问题我想再说几句。有的人可能已有这样的印象：认为我是一个空想家，制订宏伟的计划，却不考虑运动的实际问题。

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不会加深财政危机，相反，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大量没收的地产和寺院的土地可以作为发行钞票的保证金。德国地租银行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中国革命政府的财政困难。在德国，是以大地产作保证使新发行的马克的币值回升的。在那里，地主帮助国家，是以国家听从他们的摆布为条件的。在中国，革命政权可以用消灭封建反动势力的办法来摆脱其财政困难。我们主张土地革命，并不是要向小资产阶级宣战，并不是要加剧同他们的冲突，也并不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相反，我们正是在巩固左翼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政权的基础。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

(1927年4月16日通过，汉口)

为了扩大和深入中国革命，必须给奉军以决定性打击。这个任务必须完成，因为彻底消灭奉军，意味着给帝国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

在这同时，必须动员一切革命力量战胜企图分裂革命运动的蒋介石和资产阶级。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工具国内军阀和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斗争，国民政府必须有一个巩固的基地。

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采取北上扩大领域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部分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然而最需要的是保卫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否则，巩固革命基地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进行。为达此目的，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 这个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立即占领直到河南省南部的地区；

(2) 与冯玉祥建立紧密和有效的合作，使他的军队能逐渐向陇海路推进；

(3) 从浦口撤出的第二军和第六军，必须向北进军，占领安徽西部。

这些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最终将导致占领陇海路，成为保卫革命的第一线。长江是第二线，在第二线后面，发展工农的力量，

* 两天后，中共中央委员会撤销了这个决议，同意了国民党关于立即派军队到北方去的决定。——罗易注

以巩固革命的基地。

越过陇海路之前，巩固基地的工作拟根据罗易同志讲话中的建议进行。认为在国民政府直接占领新地区之前，南方和西南各省的革命力量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推测是错误的。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作出向北进军的决定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应予考虑。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 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

（1927年4月22日）

中国革命很快的发展，已使得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国际帝国主义利用间接的手段——即经过中国国内的军阀——不能阻碍革命的胜利进行，于是他们决定用公开的武装干涉。实际上不仅上海已被帝国主义占领，即许多内地的重要地方，特别是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业已在可怖的大队军舰恫吓之下。这是一种拦路抢劫，不过规模更大而已。帝国主义强盗们要中国人民降服在他们的枪炮之下。英、美、法、意、日送交国民政府的共同通牒上，罗列了许多不能接受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都得顺从，那末国民政府不啻宣称：中国的主人翁不是中国人民，而是外国帝国主义了。国民政府虽然已经给了那盛气凌人的哀的美顿书一个很合理的——实在是过于通融的——答复，但是这尚不足以填满帝国主义的欲壑，他们宁用暴力，而不愿采取如国民政府所提议的提交国际联盟的办法。国际联盟是掩饰帝国主义掠夺政策的遮蔽物。可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掠夺政策业已彰明较著，所

以他们连这样掩饰的遮蔽物，都是不要的了。

中国国民一定要以革命的联合战线，来对付帝国主义的这种进攻。在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对于革命势力的目的和指挥的统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但是，在国民党内部由蒋介石所领导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恰恰是在最需要国民革命势力统一的时候破坏了这种统一。蒋介石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这样做，表明他们已变成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工具。正是由于蒋介石背叛中央政权和实行分裂国民党的政策，才使帝国主义能采取这种侵略的态度。

蒋介石要在南京设立一个他自己的“国民政府”，这是他反革命行动的极限。他的这种行为较之他从前的下列许多暴行尤为不可宽恕：如3月20日事变攻击国民党的革命派，在江西九江之压迫工农运动，企图建立他个人的独裁制，以及最后屠杀上海工人。我们看到蒋介石及其代理人的暴行感到非常不安，但是还希望他不致于成为国民革命的公开的叛徒。在目前这种国民革命的严重时期，维持统一战线是很要紧的。凡是同我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其一切罪过都可暂时宽恕。但是封建资产阶级的自私利益，不仅是和工农的利益相反，并且是和整个人民的利益相冲突，因而是不能原谅的。蒋介石的罪行不限于屠杀江西和上海的工人，他现在是人民的政党和人民的政府的罪人和敌人。

蒋介石竭力欺骗人民，自称忠于国民党，而将分裂党的责任归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说这是一种无耻的谎言。当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冲突日渐厉害的时候，蒋介石曾请求第三国际派代表团到中国去见他。在我们动身到中国去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接到一个消息，说是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几位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开了一次会，宣称国民党武汉联席会议企图分裂党。我们立刻打电报给他，请他停止会议并履行他在上海和汪精卫同志所订的协议，即把一切有争论的问题提交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去解决，蒋介石本人也应当参加这个扩大全会。在这个电报中我们又告诉他，如果他接受我们的忠告，我们一定去见他，以便共同讨论在帝国主义进攻时期保持革命势力统一的方法。他没有答复我们的电报，并继续进行他破坏国民党的计划。

当我们痛斥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屠杀工农的凶手和民族的叛徒的时候，我们要请中国人民注意一件事实，就是这并不是蒋介石一个人叛党，而是一整个社会阶级离开了国民革命阵营，转入了敌人的阵营。我们不仅应当推翻蒋介石一个人及其周围的广西将军刽子手，并夺回被他们篡夺的政权，而且**应当消灭全国所有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应当反对产生了蒋介石的整个阶级。不必一定到南京或上海去反对蒋介石，在中国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城市中都可以同蒋介石及其同伙进行斗争，办法是扑灭封建主义势力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势力。铲除蒋介石主义的根株，应当是国民革命下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

如果我们能巩固国民党辖区内的革命民主势力的联合战线，我们就能纠正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的背叛和阴谋给国民革命运动造成的危害。

因封建资产阶级的背离和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而受到鼓舞的帝国主义列强，正力图威吓国民政府。但是，在城乡民主主义联合势力的支持下，即无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势力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就能击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并在广大群众中巩固国民政府的基础以发展国民革命。这样，国民革命就丝毫不用担心反动分子背叛的危险，而获得战胜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保证。

打倒蒋介石主义！

打倒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

打倒帝国主义！

国民政府万岁！

国民党万岁！

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团

1927年4月22日于汉口

(录自〔苏〕A. B. 巴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七、罗易与中共五大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27年4月29日)

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报告涉及的时期是两年零三个月。因为很忙，准备得不够，不能做详细报告，因此，首先请大家原谅。我只谈谈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报告共分十一部分：

一 革命的形势及其发展和党的策略

中国革命在这两年当中有很大进展。它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25年1月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到1925年5月上海事件和郭松龄倒戈；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到国民军第一军退出南口；第三个时期，是从北伐开始到革命军占领上海；第

* 这份报告译自20年代中期翻译的俄文稿，是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找到的。这次由俄文转译成中文时，曾参照另一份五次大会《中央政治报告》（可能是陈独秀报告的摘要稿）的俄文、英文和德文稿作了校订。但是，有些地方的语意仍不够准确、完整，或前后矛盾，或悖于历史事实，或前后文不相衔接和协调，等等。这些可能是当时译成外文时的误译或因不恰当的省略所致。对这类问题，除译者作了几个脚注和编者加了几条注释外，不再一一死注。——原编者

四个时期，是从占领上海后到蒋介石叛变。

1925年5月上海事件，使革命得到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开始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从第四次党代表大会起到上海事件爆发，是革命的胚胎时期。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是在曹锟失败和冯玉祥政变反对直系的时候召开的。当时反动力量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如下：一方面，孙中山到达北京，形成了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另一方面，上海发生了二月罢工，这就掀起了小资产阶级（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斗争）和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要求而斗争）运动的高潮。因此，这是运动的转折时刻。

1925年5月的上海事件有它的特点。第一，这个运动公开反对帝国主义。在此以前，虽然也发生过反帝斗争，但是并不具有这样的公开性质。第二，无产阶级的作用和力量已被全国人民所公认。以前，工人的反帝斗争只是被看作工人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上海事件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上海事件是由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引起的。我们知道，上海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所以，上海的每次罢工都不能不引起工人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上海的运动不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运动，必然要扩大到全中国。因为，首先，正如我们所说的，在上海五卅事件以前发生过总罢工和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而这一运动受到了北方军阀的镇压。人民群众懂得，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召集国民会议，于是更加有力地开展了反对军阀的斗争。因此，上海事件才能这样广泛地扩大到全国。五卅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很多阶级参加了这个运动，不仅有小资产阶级，不仅有资产阶级，而且还有落后的官吏和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这个运动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香港和广州等地的工人。然而，为时不久，各个阶级逐渐脱离联合战线，只剩下一个无产阶级。

此外，还应当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革命事件对军

队的影响。最早是冯玉祥政变反对曹锟，尽管这也是革命事实，但从主观上看他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五卅运动以后，国民军的官兵有了革命认识。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的行动，也是由于受到了革命的影响。旧军阀之一唐生智转向广州政府，并参加了北伐。然而，很难断定他们会变成忠实的革命者或是投机派。但是革命浪潮已开始影响军队，这是事实。因此，军阀的反动统一阵线已经瓦解。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困难就在于：被压迫民族没有武装，而压迫者却拥有大量的武装力量。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人拥有相当多的武装力量，尽管大部分武器掌握在军阀手里，可是我们能够夺取过来。我们能够使军队具有革命意识，并把军队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我们能够直接夺取军阀的武器，并用它来反对军阀。

从上海五卅运动开始到郭松龄倒戈，乃是革命发展时期，即革命高涨时期。在这个时期，帝国主义者既然不能用武力镇压中国革命，就只好做出让步。他们召开了关税会议和治外法权会议。这个时期，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分歧。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在威胁无产阶级，并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上海的资产阶级已经同帝国主义者和北方军阀实行妥协，其目的是镇压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戴季陶主义的思想 and 运动。戴季陶主义起初只是企图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而此刻却打算把这种力量完全消灭干净。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已公然向无产阶级进攻。以前，在革命高涨时期，即上海总罢工时期，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冯玉祥的军队转向革命方面。郭松龄倒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走狗张作霖。因此日本不能不进行公开干涉，以便压倒郭松龄。郭松龄失败后，革命浪潮低落下来。在革命浪潮低落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组成联合战线向革命进攻。国家主义派大力宣传反对赤色危险。国民党右派召集西山会议，将国民党分裂成两派，他们的活动至今仍在继续进

行着。

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到南口失陷，这是革命运动低落和反革命高涨时期。这个时期持续了七八个月之久。经过这次反赤运动，在帝国主义之间和军阀之间均发生了分裂和冲突，日英两国的冲突和奉直两系军阀的冲突就是例子。这些事实都发生在举行北伐之前。

第三个时期是从北伐开始到占领上海。这个时期的标志是革命运动的高涨。3月20日事件固然是反动时期的因素，但是由于资产阶级企图利用无产阶级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无产阶级也想与资产阶级合作，依靠他们的力量，所以这两个期望进行北伐的对立阶级实行了合作。在3月20日事件以后，尽管工人阶级的处境困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运动仍旧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这一运动发展到占领上海时，无产阶级的力量已得到加强，因此资产阶级不能再继续与无产阶级合作，而转到了反革命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以前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明显，是潜伏着的，现在这些矛盾已十分明显。

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事件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些事件与过去的事件不同，因为资产阶级已退出革命阵线。尽管革命队伍的数量减少了，但革命群众的质量却提高了。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得到极大的巩固。

从革命运动的发展前景来看，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要发生明显的阶级分化。应当使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进行加强军队中的左派运动的工作，以便更加提高军队的革命情绪。我们必须完成这两项任务，因为这会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

党在上述各时期的策略

在第一个时期，在五卅事件准备时期，我们举行了经济罢工。那时我们是孤立的，必须利用小资产阶级，让他们与工人一道参

加经济斗争，从而形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这是五卅事件前的策略。这一时期的策略的第二点是召集国民会议。孙中山北上时，党内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广州的同志和一部分俄国同志认为孙中山北上是有必要的，但是中央反对这一点。广州的同志认为随着孙中山的北上，革命运动可以扩展到广东范围以外。中央的意见是：孙中山留在广东可以巩固广东的革命成果，从而肃清反革命势力。这些观点的差别是，一部分人希望发展革命运动，另一部分人主张巩固革命运动。现在，回想起这些争论，我们觉得，当时中央的策略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孙中山北上，扩大了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这个成果很重要，因为如果孙中山留在广州，他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当时广州的军队都是反革命的，任何巩固革命力量的工作也不能进行。

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有两个有利的因素：（一）争取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已在全国展开；（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作已扩大到全国。当时党在策略上的错误，不是缺乏积极性，而是不了解孙中山北上的意义，没有看到他北上对全国革命发展的影响，只是看到孙中山与唐生智会见⁽¹⁾的危险性。

党在五卅运动时的策略，起初是吸收各阶级参加这一运动，可是当时党并不相信有进行全民革命的可能。事实上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左派参加这一运动，是想保全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右派也是为了自己才极力利用这一斗争，但并不积极参加斗争。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方而又受到无产阶级的威胁，必然脱离这一运动。小资产阶级则采取中间态度。结果，只有无产阶级孤军作战，而军阀则有可能镇压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是党的策略错误造成的，而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资产阶级不仅不愿受我们领导，甚至不愿与我们联合。五卅运动中有许多独特

(1) 原文如此，可能有误。孙中山北上是会见段祺瑞。——译者。

现象。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影响了军事工作。当时党已注意到对军队的领导，并决定对军队的先进部分进行工作。决不能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反革命的整体，应把整个军队分为两类，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队的革命部分应包括在革命队伍之内。我们的敌人说我们想用这种策略来掩盖我们和军阀的勾结，可是我们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这条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必要的策略。过去，由于实行这种策略，我们已获得很多有益的成果。这方面没有任何错误。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

中等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已经自觉地行动了。戴季陶在其小册子里就指出了这些事实。他的小册子不是偶然发表的，也不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他的小册子里写道，资产阶级已成为自觉的阶级。这本小册子必须读一读。

这种理论后来就形成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没有在革命战线里呆很久。因为帝国主义力量强大，资产阶级决定同帝国主义者妥协，所以，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很快就背叛了革命。我们当时已经非常坚决地反对了戴季陶的理论。早在1925年7月我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19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会上，我们确认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五卅事件证实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感觉到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加入了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队伍。戴季陶反对无产阶级的小册子，反映了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恐慌。在全会的决议里，我们指出，一方面，我们应当反对戴季陶的理论，另一方面，应当联合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同时，还应当进行独立的工作，一旦国民党离开我们，我们好有所准备。决议就是根据这个精神起草的。现在当我们考察这个决议时，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不正确的成分。发展和巩固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这点是正确的；而准备退出国民党，这种策略则是不正确的。毫无疑问，我们没有理由退出国民党，我们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做工作。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

代表的态度不明确，只有蔡和森同志非常坚决地反对。由于这个决议，使得我们的策略很不明确。关于准备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决议里没有谈得十分清楚。^①问题的这种提法，只是使我们产生思想混乱。这里所说的是为准备而准备的问题。

关于资产阶级走上妥协道路的问题，从上海五卅事件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中可以看出。不仅大资产阶级，就连小资产阶级也离开了联合战线。

① 上文说北京扩大会决议曾提出了“准备退出国民党”，这里又说关于这个问题“没有谈得十分清楚”。这些说法与扩大会的决议都是不相符的。十月扩大会决议既没有“准备退出国民党”，也不存在论述“不清楚”的问题。十月扩大会两个决议谈到了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

一、《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的第七节即最后一节“中国共产党之职任”（五）在分析指出了国民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的代表，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促成了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和提出了阶级妥协口号等等之后，明确写道：“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别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所以我们应当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束缚无产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的联盟，而且能扩大这一联盟。”

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分析了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的出现和国民党从1924年改组以来内部的分化，指出了戴季陶的小册子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思想政治理论上的形成等等之后说：“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又说：“具体说来，应该：

（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及组织之独立与扩大，尤其是在广东；

（二）工农群众之获得；

（三）非必要时，我们的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

（四）在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地方（尤其是广东），我们应竭诚与之合作，逼迫他们积极的用全力参加民族运动，不可有意的避开他们，让他们立在消极的旁观地方；但同时在一切实运动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与行动，我们对他们丝毫不能让步。”——原编者

我们在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已注意到农民问题。农民中的多数不是地主和一般农民，而是贫农和无地的农民。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联盟，就会发生小地主反对无产阶级的危险。小资产阶级甚至可能与小地主联合起来。我们懂得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懂得了进行农民运动的必要性。事实证明，没有农民，无产阶级就要失去活动能力。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以后，不仅在广州，而且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各省，我们都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尤其是在湖北省，我们的同志注意了农民工作和农民运动。湖南省的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有将近 1000 万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了^①。这个策略没有错误，我们必须继续实行。现在党内农民占 18%。中国人口大部分是农民，据我看来，将来党内农民的数量应与工人的数量相等。在不久的将来，农民在党内应占 30% 左右。我们不仅应继续实行我们对农民的政策，而且应继续把农民吸收到党内来。

在五卅运动中，还有一个香港罢工的问题。香港罢工（抵制），使香港受到破坏，至今尚未恢复。这次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肃清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分子方面，积极支持了国民党。罢工持续了一年多。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功绩。关于这一罢工问题，党内有两种意见：一些人主张尽快结束罢工；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者本身也不愿意结束罢工。从原则上说本来应当尽早结束罢工，克服这些困难。幸好，我们同志的工作和国民党左派政权的工作做得好，又有国际的经济援助。由于这三个条件才没有发生危险。如果没有这三个条件，罢工再拖延下去，必然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就会失掉工人对我们的信任。现在李济深破坏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这个责任不在我们。

① 此处的数字，如是指农民协会会员，则可能有误。因为截至 1927 年 6 月的统计，湖南农协会会员只有 450 多万人，全国合计才 915 万多人。

第二个时期，是从郭松龄失败开始到南口失陷，这是反动时期。

在郭松龄倒戈时，革命似乎仍处于高涨时期。但实际上这时帝国主义已开始进行干涉。当时北京的同志想组织“首都革命”。愿望倒是英勇的，然而却是错误的。第一，当时对国内政治形势没有作出明确的估计。第二，他们忘记了脱离武装力量的殖民地革命的危险性。他们没有同国民军合作，想独立进行斗争。现在可以看到，这种行动是幼稚的，虽然这也是英勇的，但英勇得太过分了。这个危险的政策，是北方同志没有经过党中央的同意而擅自决定的^①。

现在我们对整个五卅时期的政策做一个评价

在广州，一方面，战胜了陈炯明，另一方面，平定了刘震寰和杨希闵的叛乱。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为了反击封建地主而同资产阶级共同完成的。这些地主不仅仇视无产阶级，而且也仇视资

^① 上面一段关于“首都革命”的分析应当说是对的，但这句话却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出入。

1925年12月1日的党、团中央《为郭松龄倒戈告全国民众》书，一开始就说：“数月以来，本党继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总口号是：‘武装平民，打倒奉天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并号召“全国革命的民众及革命的国民党不犹豫的起来夺取政权”。强调指出并号召：“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在民国十四年军阀混战史上，现出一条政治变动之新的道路。全国革命的民众，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军人，其速起响应北京的暴动，推倒安福卖国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政权归诸人民。”

12月2日，党中央又发出六十六号通告，认为“目下各地民众的示威运动非常重要。北京的民众示威各地即须响应，吾校〔党〕各地分校接到本校〔党〕及少校（即青年团——编者）合发之告民众书（即《为郭松龄倒戈告民众书》——编者），应即翻印广布；同时即应努力召集群众大会，做打倒段政府的示威运动并即发散各项文电”。之后列举了（一）通电攻击亲日卖国的安福政府应即解散；（二）致电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质问其政治立场，促其推倒段政府；（三）致电郭松龄，促其站在人民方面，勿作日本之傀儡，勿拥护亲日卖国的段政府，……”——原编者

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因此，当时曾策划暗杀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和谭平山等人。然而，暗杀这些人的活动未能得逞，只杀了一个廖仲恺。这次暗杀阴谋是封建反动分子在他们军事失败之后干出来的。他们在社会上还保留了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攻的某些力量。这一点从暗杀名单上可以看得出来。廖仲恺被害的过程，暴露了胡汉民、许崇智、熊克武与陈炯明的关系。许崇智以前曾和我们一起进攻过陈炯明，而现在却同他勾结起来了。当时我们并不反对广州政府惩办这三个人，但我们的中央认为，广州政府当时没有公开阐明这一政治罪行，因此社会上对它认识不清楚。右派分子说，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压迫国民党，并把胡汉民遣送到苏联。对此，国民党没有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如果进行了，那至少别人就不会认为这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阴谋，而会认为这是党内的个人冲突。由于没有进行政治宣传工作，所以这件事便失掉了它的政治意义。

在反动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广州的3月20日事变。去年的3月20日事变是在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发生的。蒋介石就是武装起来的戴季陶，他的所做所为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戴季陶主义形成以后，在其基础上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学会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政党，是为镇压无产阶级而成立的。3月20日事变发生的原因虽然很多，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阶级矛盾。戴季陶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镇压无产阶级，甚至镇压无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在这个时期，党的策略并不是一致的。首先，我们党在广东工作的同志和鲍罗廷同志的意见是，我们当时应采取进攻的策略。他们说：“向国民党右派进攻，可以巩固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3月20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3月20日事变”。

然而，党的意见是，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

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这就是说，我们允许资产阶级力量留在联合战线里。我的意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也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我认为党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而在广东工作的中国工作人员和鲍罗廷却认为，如果我们不去镇压国民党右派，我们就不能巩固同左派的联盟，这个意见也是正确的。但在3月20日事变以前，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国同志都没有向中央谈过我们能够镇压蒋介石和援助左派。

鲍罗廷同志坚持认为，共产党员要退出黄埔军校，甚至今后也不要再在军队里进行工作。可他事先也没有就此向中央提出过任何建议。

这就是说，他事先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只是在3月20日事变以后才提出来的。镇压蒋介石，就可巩固同左派的联盟，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是不够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3月20日事变中的策略问题，而且是无产阶级与整个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应当如何退出同资产阶级的民族联合战线，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要资产阶级的援助而独立地进行革命，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公开进攻资产阶级等等的问题。现时，党就面临着所有这些问题。

国民军第一军在南口遭到失败以后，^①广州军队的北伐开始了，革命浪潮又重新高涨起来。从占领湖南省后直到占领上海期间，农民运动在某些省得到了发展。在收回汉口的英租界后，中国革命不仅席卷全国，而且还威胁到资本主义世界。

关于北伐问题

① 原文如此。——译者

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会议决定了关于北伐的问题，但直到5月，北伐军才开始北进。在召开北京会议时，吴佩孚已准备进攻广州。

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来到上海，给我们作了分析中国政治形势的报告。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北京会议的决定，但我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政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

当时我曾打电报给北京，电报中说：第一，必须解决北伐问题；第二，党中央应当留在北京。

共产国际代表去广州考察那里的形势，适逢3月20日事变。我拍电报给汪精卫和蒋介石说，必须开始北伐。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了解了广州的形势以后，也认为必须支持北伐，如果军队不北进，内部将要发生冲突。可是为了服从莫斯科的决定，他不得不反对北伐。

共产国际代表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如果蒋介石利用北伐镇压和剥削人民，那末首先遭受灾难的是广东和广西的人民。因此，党对北伐的策略如下：

- (一) 支持北伐；
- (二) 北伐应当具有防御性质；
- (三) 党的策略应当是反对一切企图利用北伐来剥削人民的人。

现在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策略和我们在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

(一) 尽管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

(二) 我们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质的，就是说，只看成是保护广东。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今后必须做到，如果原则上做出什么决定，就必须付诸实现，否则，决

定与实践之间将永远有矛盾。

对报告作以下的补充：

第一点，我谈的反动时期，中心事件是3月20日事变，即从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国民党5月15日决议案这段时间。

第二点，关于党的反帝策略。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中，我们主要注意了反对英国的斗争。在中国，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英、美、法、日四国，其中最有势力的是英国和日本。但在这两国之间也有很大的矛盾。在中国，日本在经济上几乎被英国所压倒，但另一方面，日本的军队可以迅速地调到中国的领土上来。因此，我们的反日斗争就具有较温和的性质。

二 关于资产阶级的作用

资产阶级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作用，在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资产阶级在斗争过程中随时随地都在叛变革命，我们在广州可以看出这一点，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辛亥革命中也都可以看出来。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江亢虎宣传过社会主义，尽管他本人并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可是这个运动在长江流域却把流氓无产阶级和贫农等广大群众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当然，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运动。

孙中山也宣传过自己的社会主义，因此，很多人反对他。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叛变革命，^①该阶级的代表宋遯初等反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当时的宋遯初就是现在的戴季陶。

虽然那时资产阶级还没有明显地叛变国民革命，但这种趋势

^① 这种关于辛亥革命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叛变革命”的说法和下面的论述，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也同下面所说的“那时资产阶级还没有明显地叛变国民革命”自相矛盾。——原编者

已经表现出来了。

中国的资产阶级最初参加了五卅运动，但后来又退出联合战线。

现在我们来弄清什么是买办，什么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可以说，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右翼和左翼。资产阶级左翼想从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回治外法权和海关，他们不满意军阀破坏交通。但如果帝国主义者稍作一些让步，这部分资产阶级就会向他们妥协。资产阶级不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甚至也不会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作出某些让步，资产阶级左派就会叛变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应该来领导。资产阶级左派想稍微参加一下革命，稍微表示一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不满，但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的。他们甚至还想稍微参加一下工农运动。例如，蒋介石也试图组织工会。因此，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很复杂的。

虽然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但我们要吸收他们参加民族运动，不仅要吸收小资产阶级，而且要吸收大资产阶级。在3月20日以后，我们已知道蒋介石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自己就说过，他可以走革命道路，或者走反革命道路。我们在3月20日以后已看出，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革命开始时，资产阶级参加了革命，但过了一些时候，它又转到了反革命方面。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动政变时，资产阶级很高兴。我们不能确切地肯定说，是否整个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4月12日以后，大部分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

三 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

在俄国，城市小资产阶级没有参加纯无产阶级的革命，可是在中国，他们不仅参加了革命，甚至还会参与民主专政。但他们毕竟是动摇分子，不能独立行动。他们或者受资产阶级领导，或

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让他们接受我们的领导。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城市里可以看到，在乡村里就难以看清楚。暴动时，小资产阶级参加了罢工，对我们很有帮助。在城市里，只有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同盟者。如果大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拉到他们那方面去，无产阶级就会陷于孤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小资产阶级转向大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失败。

在去年七月全会上，我们确定了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但执行得不够好。因为：第一，我们的同志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个策略；第二，我们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不够密切。在这次全会上，不但确定了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还决定参加马路商界的运动。由于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工作做的不够好，没有很好地把小资产阶级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此，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不多。今后，我们要通过国民党更好地向小资产阶级做工作。

四 土地问题

现在我们专门来谈谈土地问题，即通常所说的农民运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农民运动的主要问题是组织问题和减租运动。这就是从第四次代表大会到去年七月全会这个时期的农民运动问题。从去年下半年起，农民运动已由广东发展到湖南，由提出组织问题和减租运动进而到提出土地问题。目前，农民运动已经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时刻。现在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革命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毫无疑问，这一运动必然随着总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发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

由于提出土地问题，农村的阶级矛盾加深了。这从根本上粉碎了地主的设想。提出土地问题的农民运动，早在去年就以减租减息这种和平方式出现了。去年的斗争旨在反对大地主，口号是

“打倒劣绅”，用这个口号与地主作斗争。当时的斗争只是反对大地主的斗争。

湖南的斗争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当时已产生了平分土地的运动。这里的农民运动不只是反对大地主，还反对土地出租者，甚至反对富裕农民，这个运动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过去，我们党限制了农民运动，而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不过对于小地主的土地是不能动手没收的。在国民革命中，我们需要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

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应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可是目前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而，尽管我觉得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但是，目前就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毕竟也太激进了。在相当时期内，或许是在很短期间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然而在最近一两个月内，我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农村的阶级斗争正在发展，但这个斗争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对小地主还不能进行剥夺。我们目前是进攻大地主和中等地主呢，还是扩大农民运动和发展军事行动呢？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仍然存在，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只有扩大以后再加深，才能巩固基础。

五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革命运动中和政治生活中是有相当影响的。在实际斗争中，也在显示它的影响。因此，对这个问题不能抱悲观态度。广州罢工委员会几乎就是第二个政府。湖南的工农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上海，无产阶级常常独自行动。在北方，如果

工人不行动起来，其他阶级也不会行动起来。在五卅运动中，付出最大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各阶级都在其领导之下。可以说，凡是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方，就没有运动。因此，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

第一，无产阶级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第二，无产阶级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如果它没有这种力量，那就只好与资产阶级一起行动。

到目前为止，只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还没有武装。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是从资产阶级叛变开始的，这就证明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99%的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本身应当坚决争取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来进行革命。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上海。上海事件，这是一个与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海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还必须加强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作。无产阶级积极地进行了斗争，我们的敌人承认这一点，我们也承认这一点。可是在这一斗争中谁更强大呢，是小资产阶级还是大资产阶级？从数量上看，可以说，二者大体相等，但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大资产阶级却十分坚决。为什么上海的无产阶级不是仅仅与小资产阶级一起行动，而是吸收某些大资产阶级分子呢，这个问题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在我看来，上海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单独行动呢，还是必须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右派和总商会没有参加五卅运动，可是总商会的左派分子和马路商界联合会参加了这个运动。鲍罗廷所持的意见是：上海不能做为革命基地，必须在其他地方建立基地并从那里打击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如果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就得向他

们妥协。在他看来，上海只能争得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和进行争取结社和集会自由的斗争。他认为在上海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正确的，因为统治上海的不是孙传芳或李宝章，而是帝国主义。鲍罗廷的宿命论是机械宿命论。可是毕竟不能轻视这一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意见似乎和鲍罗廷一致。以前，我并不认为这个意见是不对的，所以没有提出来讨论。上海事件，这不仅是过去的问题，而且也是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尽管我现在并不认为鲍罗廷的意见完全不对，但对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地讨论。上海的资产阶级已脱离革命，蒋介石、银行家们和大工业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这里有三点需要讨论：第一，自由资产阶级没有完全脱离革命；第二，上海的失败是否由于资产阶级的参加；第三，鲍罗廷的意见或他的西北理论。

六 军事力量和革命的社会力量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在报告里无法做详细统计。目前，军事力量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队伍。现时我们没有群众的军事力量。现在我们谈的是旧的军事力量。士兵的来源，首先是诚实的农民（国民军里农民很多），其次是城市的失业者。士兵来自不同的阶级，因此，他们的战斗力也各不相同。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们想使军队革命化，那就应减少军队里流氓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地主分子的数量。假如说我们的军队发生动摇，那并不是由于军队里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好，而是由于阶级成分庞杂。军队不能为工农的利益作战。他们易于接受爱国主义等资产阶级的理论。目前军队的动摇是他们的社会成分的反映。因此，今后我们需要大大加强用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

七 革命基地和西北理论

这个理论是鲍罗廷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东南部是帝国主义的堡垒。他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论证了他的理论。

他说，太平天国运动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想占领上海。中国革命应向西北方向发展。因为：第一，那里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薄弱；第二，那里可以向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应当讨论这个问题。昨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位代表说，我们既不要坚持西北理论，也不要坚持东南理论，哪里存在着国民党政权，我们就可以留在哪里，并在那里加强我们的工作。这是不正确的。结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任何方针了。结果我们就似乎成了国民党的尾巴。他认为，革命是国民党的革命，而不是我们的革命。现在的中国革命是我们的革命。至少我们应当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工作。因此，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

八 国民党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应当提出几个要点。我们必须回答什么是国民党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弄不清什么是国民党，我们就不能解释我们所犯的许多错误。起初，我们加入国民党时，很多同志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如果加入国民党，就会背叛工人阶级；现在这些同志又说，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事实上，国民党是各阶级的党，党内既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又有地主和军阀。其中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它的理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许多国民党员都根据资产阶级的理论来解释孙中山的三项原则。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全部。实际上，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国民党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果国民党是纯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我们就不应该加入。照戴季陶的意见，我们应

当在国民党外与其合作。因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党，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所以我们应当作为这个联盟的成员之一加入国民党。正是根据这个理论，我们才加入了国民党。现在我们应当提出什么是国民党，国民党是不是各个阶级的革命联盟的问题。我们肯定地回答说，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尽管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如果这部分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我们就应该将其开除出党。既然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三个革命阶级的联盟，那么，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入国民党，这个联盟又怎么能够存在呢？以前我们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而现在则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公有的党。如果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呆在国民党的队伍里，这个联盟就不能是很巩固的。这个联盟将来会不会巩固，这要取决于以下几点：（一）国民党是否愿意让资产阶级呆在自己的队伍里；（二）国民党能否取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能够成为国民党的同盟者，而资产阶级则不可能；（三）如果国民党内没有农民参加，而是由小资产阶级组成，它也不可能巩固。因为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招牌下，剩下的只是一小群小商人，而大部分工农实际上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样的联盟是不可能巩固的。

九 改组军队问题

改组军队，这并不是改编军队，不是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而是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如果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军队就会实现革命化，军官也不会从地主阶级中选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是高喊“世界革命万岁”和“列宁主义万岁”等口号，只限于做政治工作，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成果。我

们想要使军队革命化，但又不去改变它的社会成分，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十 建立革命民主政权

很多同志会惊奇地说，现在我们有了革命军队和国民政府，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可惊奇的。我们现在距离革命民主政权还很遥远。不仅是我们这样说，如果问一问国民党左派，他们也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不能说，国民政府就是军阀政府。在国民政府的领域内必须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如果帝国主义者的干涉和军阀的包围有所减轻，我们就应该在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争取建立这样的政权。在军阀统治的领域内，我们要先进行革命，而后才能谈得上革命民主政权问题。现在我们只是开始走向建立这一政权的道路。假如国民政府的情况更好一些，我们是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的。

这就是我们的策略。这个策略能否在实际上贯彻实行，只有对国民政府的情况作出适当的估计，才能判定。国民政府最初受到总司令人员的变动的巨大影响。去年，政权由胡汉民之手转到蒋介石手里。刚刚不久以前，才改为实行集体管理。去年，蒋介石独揽了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和革命军的大权，甚至还想统治共产党。政府整整一年就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只有汪精卫回国以后，政府才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这个左派政府里有共产党员，如劳工部长和农政部长。但是我们不应当认为，这个政府就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如果这样认为，那是错误的。这个政府只是走向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途径。为什么不能把现在的政府叫做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呢，因为在政权中没有工农群众，只有几个工人领袖而已。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机构，以便今后建立起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并进而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道路。民主专政将是最有

威望的政权。这种政权，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大到足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能产生，只有在工农群众中也能实行内部民主的时候才会产生。这并不像几个领袖参加政府那么容易。

十一 财政经济政策

目前，尽管政府是新的，但财政经济政策仍是旧的，尤其是经济政策执行的还是军阀的那一套制度。现在革命时期，我们必须采用新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来代替封建军阀的制度。现在的经济制度仍旧是以前的，要改变这种制度，不仅要看国民政府有无决心，而且这也是我们党的任务。在我们党领导革命的整个时期，我们没有自己的财政计划和经济政策，国民党也是如此。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准备夺取政权。如果我们今后还这样下去，政权就会落到反革命手里，像辛亥革命后那样。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帮助了国民党，进行了群众运动工作，并在群众中进行了宣传工作，而没有把政权夺到我们手里来。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夺取政权。第四次代表大会已决定无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但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军事、财政和经济情况，不知道如何领导。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在野党，而是真正要领导革命了。现在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只对国民党的工作进行批评。国民政府正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扩大它的政权。这个政权既是我们的，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它工作得不好，这就不仅是国民党的过错，而且也是我们的过错。

帝国主义的干涉，现在比以前有所减轻，可是奉系军阀、蒋介石和四川都在向我们进攻。今后，可能还会遭到各国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经济政策问题，我们就会失掉一切革命中心。我们当前的任务，不仅是发展和扩大群众运动，而且特别是要巩固革命中心。否则，奉系军阀统一北方，蒋介石统

一南方，革命运动将会停滞5年至10年。因此在目前，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是巩固革命中心的问题。

关于党内情况的报告

从第四次代表大会起到现在，我们党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得到了发展，党的工作有了进展，党员人数也有所增加。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党员只有994人，现在已增加到57967人。党员的成分，根据3月份的统计，百分比如下：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4.2%。妇女在党内占10%。各地党组织的党员人数如下：湖南13000人，湖北13000人，江苏（包括上海）13000人，广东9027人，北方地区3109人，江西3000人，陕甘388人，山东1925人，福建168人，满洲（包括沈阳）380人，北满137人，安徽233人，四川200人，以上共计57967人。^①在各地，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共有八个：（一）湖南区委，其中包括衡阳；（二）湖北区委，其中包括襄阳；（三）江浙区委，其中包括安徽省铁路沿线部分；（四）广东区委，其中包括广西、云南、福建和南洋；（五）北方区委，这个区委包括以下几省：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六）江西区委；（七）河南区委；（八）陕甘区委。有六个地委：（一）山东；（二）福建；（三）南满；（四）北满；（五）安徽；（六）四川。有四位通讯员，他们分别驻在莫斯科、海参崴、巴黎和日本。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计有280万工会会员。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唐山和上海的少数铁路工人和矿工受我们领导。农民协会会员有972万人。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广东的20万有组织的农民受我们的领导。学生联合会将近420个。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共青团领导的

① 总人数与各省人数之和不符——译者。

学生联合会有 60 个。现有共青团员 35000 人，而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只有 2365 人。

现在谈谈各个地区的政治形势。（一）国民党左派统辖的地区有：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和甘肃等省。在这些地区，工农运动可以自由发展。（二）国民党右派统辖的地区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和四川等省。这些省份的群众运动已被扑灭，法西斯主义占统治地位。（三）奉系统辖的地区有北方、河南和山东等地区，以及南满和北满。这些地方的群众运动受到了镇压。我们的工作仍然在开展着，九个中央委员是不够的。中央工作更感到困难的是，甚至九个中央委员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工作。在中央一起工作的只有两三个委员，有时只有一个委员。这样一来，中央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独裁。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出席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同志批评了组织部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不久以前，中央指派周恩来做组织部的工作，可是上海事件爆发了，周同志又转做军事工作，因而组织工作又停顿下来了。职工委员会委员当中，李立三同志只是被算作职工委员会委员，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工作。农民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和其他委员划分了各自的所在地，起初没有做任何工作，而现在都聚集在武汉，开始了工作。他们已讨论了土地纲领。宣传工作虽然做得比较好，但事实上他们主要是做了出版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按期出版，并且翻译了十多种书籍。军事委员会只是做了技术工作。妇女委员会只是增加了通告的数量，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职工委员会和农民委员会连通告也没有发过。总之，党中央不很健全。我们党目前还不是一个有完善组织的党，而是各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地方组织比中央好些。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我们就只有各省的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指派更多的

同志到中央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面临危险。在组织工作方面，最重要的是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如果情况仍像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成为更强有力的机关，那下层组织的情况就会很糟糕。

如果只是由地委和区委领导一切工作，我们党的情况就会像朝鲜的党一样。现在，支部所起的作用不大。在工厂和学校里，支部并不是工作的中心，而只是召集会议和组织报告。因此，支部只是传达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命令的组织，而不是工作机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必须决定：应当加强中央，并把支部变为真正进行工作的组织。在党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提出这两个问题。宣传部这两年来工作，不能称作宣传工作，实际上它是做了出版工作。而我们党的机关报《向导》不管怎样是按期出版的，其份数也在逐渐增加。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时，只有7000份，而从北伐开始，已增加到5万份。

《新青年》杂志出版了五期。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这两年当中，我们翻译了以下16种书籍：（一）《共产主义ABC》；（二）《民族问题和共产主义》；（三）布哈林：《农民问题》；（四）波格丹诺夫：《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五）布哈林：《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六）斯大林：《论列宁和列宁主义》；（七）《共产国际纲领》；（八）布哈林：《唯物史观》；（九）《苏共的团结》（两册，已出版，尚未翻译）；（十）《中国共产党五年来的政治主张》；（十一）布哈林：《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十二）《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十三）《不平等条约》；（十四）《中国关税问题》；（十五）《戴季陶主义和国民革命》；（十六）《论北伐》。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宣传部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出版工作，而不是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部没有工作计划，不给地方发通告，也不向中央报告工作。宣传材料出版得很少，而鼓动材料却很多。例

如，在江苏、湖南、广东和浙江等省，我们出版了许多鼓动小册子，其数量由9万册增加到了40万册，可是这些出版物散发得很不好。例如，我们有10万份号召书，人们读到的却不到5万份。从数量上看，鼓动材料很多，但利用得很不好。上海有时出现这样的情况：书放在那里没有人读。材料和出版物的散发情况很不好，因此，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不好。党内教育跟不上党的发展。今后，宣传部应做到以下几点：（一）要使中央宣传部更加坚强有力；（二）要使地方宣传委员会与中央宣传部建立密切的联系；（三）扩大翻译工作；（四）改进书籍的散发工作；（五）关于党校问题。我们党目前需要成立党校。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中央想成立一个党校，二、各个地区也想成立党校。如果中央成立党校，讲师会更好一些，而如果各地成立党校，会更方便一些。据我看，前一种意见较好。中央有个计划，打算成立一个设立两个部并拥有500人的党校。总之，这项工作现在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在武汉坚守住，我们就在这里成立党校。我们必须出版一种党的日报，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就开始出版这种报纸。

现在谈谈中国的职工运动。虽然中央职工委员会并不强大，但某些地方对这项工作却很注意。成绩最好的是香港大罢工，其次，我们在上海、湖北和湖南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在湖南。缺点是中央职工委员会没有统一的领导，因此，全国的职工运动就没有统一计划和统一要求。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无论是在中央职工委员会里或在工会党团里，我们都应该有统一的领导。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我们有29万有组织的工人。到第二次大会时，有54万人。到去年五一节第三次大会时，有120万有组织的工人。现在各地有组织的工人人数如下：江浙有130万人，湖北有40万人，湖南有393791人，广州有52万人，北方地区有1万人，山东有5000人，江西有13万人，海员有8万

人。以上共计 2838791 人

今年，有组织的工人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职工运动也在逐渐开展和壮大起来。这是各地党组织加强工作的结果。现在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政策和工会工作计划。这是我们代表大会的首要任务。我们的同志早在党成立以前就做过职工运动的工作。我们的职工运动的历史已有 5 年了。

农民运动

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早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我们党向农民进行工作已有两年。根据现有的统计，有组织的农民的数量如下：湖南有 5204112 人，湖北有 1714000 人，江浙有 23 万人，广东有 120 万人，北方地区有 2 万人，江西有 30 万人，河南有 100 万人，陕甘有 116000 人，安徽有 8300 人，四川有 37000 人。以上共计 9829412 人。有组织的农民的总数比工人多。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

青年运动

在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共青团员比党员多，而现在党员却比共青团员多了。青年一代组织起来的比老一辈少。这是因为：第一，共青团中央不是很强大的；第二，我们抽调了很多共青团的工作人员做党的工作，从而使共青团的干部减少了。现在共青团里并不都是青年人。就是一部分少年先锋队队员也已超龄了。因此，共青团应该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共青团必须青年化，少年先锋队也应如此。假如共青团员都是青年人，党就不可能从他们当中抽调工作人员。但是，党过去确实是很少注意共青团。这是党的过错。党和共青团都怕对方从自己这里抽调工作人员。

(李 玲译)

(录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

(1927年4月30日)

罗 易

同志们!共产国际代表团很希望在讨论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时,首先由中国同志们发言。但是,主席团坚持要让共产国际代表先讲,我们遂同意首先发言。

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十一个基本问题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曾经在共产国际详细讨论过。因此,虽然共产国际代表团还未听到中国同志们的意见,还是可以就这些问题阐明我们的观点。

我不准备分别谈这十一个问题,我把它们归纳成三个问题加以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革命的前途**。这个问题包括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作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土地革命以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等问题。

为了正确确定革命的前途,必须从三个不同方面来考察形势:一、从革命发展的观点看;二、从参加运动的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看;三、从国际形势方面看。

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和反帝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革命群众斗争的阶段,是无产阶级为取得领导权而斗争的阶段。这一时期,以发生在上海、北京、华北和华南的事件(特别是省港罢工)最为突出。

无产阶级在上海的斗争中取得了领导权,但为时短暂。随着

* 这是罗易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原编者注

革命的蓬勃发展，资产阶级脱离了运动，小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结果无产阶级陷于孤立。无产阶级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领导权，但不能保持这个领导权。

在北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甚至还没有提出来，因为那里的运动不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它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得到自由资产阶级的支持，并在某些军人（他们反对那些更为反动的分子）中得到响应。

在南方（广州），革命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那里的无产阶级不仅夺取了领导权，而且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广东国民政府的政策主要取决于省港罢工的力量。甚至有人说罢工委员会实际上起了第二政府的作用。这意味着国民政府的政策主要由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机构——罢工委员会所决定。换句话说，几乎有一年的时间，无产阶级领导了南方的反帝斗争。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影响了资产阶级和所谓左翼军人的态度。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的尝试，引起了资产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组合也影响了封建军阀分子。

资产阶级的这种政治组合（这是对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回答）的过程，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这个发展的高峰是三二〇事件。这个过程以军阀的分化开始，有些军人左倾，冯玉祥、唐生智和夏斗寅倾向革命，是这个过程开始的具体表现。这是第一阶段。

戴季陶的臭名昭著小册子的出现、西山会议和上海会议可以算是第二阶段的基本特征。

这两个阶段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形式，同时，每个阶段又多少有点不同。

第一阶段在军阀中发生的分裂，其性质在客观上是革命的，因为它有助于削弱军阀势力。第二阶段则已含有反革命的萌芽。在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企图阻止民族解放运动向革命的方向发展，他们所采取的那种有意识的进攻方针，其势咄咄逼人。当无产阶级坚定地夺取领导权而斗争时，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运动显然将导致一场非资产阶级的革命。于是，资产阶级就调动它的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安排的这个发展前途，它企图阻止革命向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而要把它引向适合它自己阶级利益的狭隘道路上去。在这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中，存在着有机联系。这是各种势力结合起来企图阻止中国革命向非资产阶级方向发展的两个阶段。

这个过程的第三阶段是广州三二〇事件。这个事件不是地方性的，而是一次全国性的重要事件。这次事件是一切反对无产阶级的势力集合起来的表现。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革命力量，由来已久，早在三二〇事件以前的时期就开始了。蒋介石并不是在进入上海枪杀工人以后才成为反革命的，他所代表的势力，在上海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表演，曾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集结过程。

在这个时期，我们党由于过高估计资产阶级而犯了一些错误。这不是主观上想犯错误，党并不想与资产阶级打交道。错误是由于对反革命力量的结合过程缺乏清楚的了解。在这个反动时期（从三二〇事件到开始北伐），我们党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而忽视了它的根本任务是开展阶级斗争。当然，统一战线是很必要的。但是当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时，它不应忽略发挥工人阶级的能力，使之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很明显，资产阶级正在动员其力量反对无产阶级；而共产党在参加统一战线的同时，却没有为工人阶级组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进行必要的准备。

这就是造成这个根本错误的原因。到头来，共产党感到自己处于危机的顶峰。当蒋介石占领上海向无产阶级宣战时，党面临着打倒他还是投降他的严酷抉择。因为我们早些时候的政策，没

有事先为确定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途径(即既不立即打倒蒋介石,也不投降他)作充分的准备。这种情况在上海危机之前就已存在,从三二〇事件就开始了。与右派合作还是不合作的争论,不应理解为或者是最后决裂或者是投降的问题。我们只有以阶级斗争为基础,才能加入统一战线与资产阶级合作,在与资产阶级合作时,我必须同时准备即将来临的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

过高估计同资产阶级和左翼军人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使党过低地估计了小资产阶级的作用。在党同资产阶级和左翼军人建立统一战线时,它没有能够同时把同资产阶级和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结合的真正意图,向小资产阶级解释清楚,以便把它争取到自己这边来。结果,小资产阶级开始是动摇,后来害怕,最后,当资产阶级公开宣战时,就跑到他们那边去了。无产阶级陷入了孤立的地位。上海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不理解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在于我们没有能力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这不仅是我们上海事件中的错误,也是三二〇事件开始后整个时期的错误。低估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不是发生于上海的一个孤立的错误,而是党的历史性错误。

资产阶级力量组合的第四阶段,是第一次北伐,表现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巩固自己领导权的尝试再次进行反击。客观上,北伐是扩大革命力量、发挥群众革命性的一种手段。但主观上,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北伐扩张它在三二〇事件中已夺取到的权力。关于北伐,我将在发言的另一部分中详谈,这里我只指出一点,即北伐的结果造成了革命非常迅速的发展。资产阶级本想利用北伐作为扩张它自己权力的手段,但是它发现实际进程并没有按这个方向发展。由于革命没有按资产阶级的愿望发展,于是他们转而反对革命。

简单说来,这就是过去三年中革命发展的经过。阶级冲突是

这个过程的主要特点。革命形势已经提出了下一个时期是低落^①还是进一步发展的问題。非常清楚，革命的下一个时期将是发展时期，而不是低落时期。快要到来的时期将是一个衰退时期的理论，在共产党内没有市场。为什么？下面我将说明。

我们必须从两方面来分析未来的前途。首先，我们要考虑国内各阶级的力量。目前，大资产阶级和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已背离国民革命阵线。因此，革命队伍中的阶级矛盾已有相当程度的减少。现在，作为革命基础的社会力量不像前一阶段那样互相矛盾。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现阶段的革命基础。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正在剥削和压迫这三个阶级。这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将因此比前一时期的统一战线更为单纯。毫无疑问，内部矛盾的消除增强了革命的潜在力量。在现阶段，发挥群众的革命威力的可能性增加了。现在，在作为革命基础的阶级联盟中，农民占绝大多数；因此，现在的基本问题是要把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调动起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显示了进行彻底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显示了开展一场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这个问题不是出自主观愿望，而是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目前的革命运动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在前一阶段，因为地主阶级也参加了国民阵线，所以要实行彻底的土地纲领在策略方面存在很大困难。现在，情况已经改变。过去由于策略上的考虑不可能对那些反对土地革命的阶级宣战。现在他们已经脱离革命并转而反对革命（我们没有强迫他们出去，是他们自己离开的），因此就不再有策略的或其他的考虑可以妨碍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确实，阶级斗争的发展是革命前途的唯一保证。出现革命运动低落的唯一可能，是共产党及其革命同盟军没有足够的胆量去解决当前客观形势所提出的土地问题。客观上，革命形势在发展——没有理由说它在低落。但还

^① 陈独秀在报告中，说革命的下一个时期将是低落时期。——罗易注

存在一个主观因素问题，如果共产党和其他革命分子从主观上促进客观因素的发展，革命就会沿着它的社会基础所提出的深入发展的道路前进。没有理由担心加强农村的阶级斗争会导致统一战线的分裂。我们担心破裂的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分裂统一战线，他们已经站到反革命一边去了。我们必须从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行动起来。我们必须接受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挑战。

不能根据我们的愿望来确定我们的任务是加深革命还是扩大革命。唯一的根据是我们必须摧毁反动派在农村的基础。没有别的道路。这就是现阶段的客观需要。如果我们能以加深革命来摧毁反革命，那么我们就必须加深革命；如果我们能以扩大的方法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我们就扩大革命。如果两者都需要，那么我们两者都进行。小资产阶级在这革命危急关头已经害怕了。它不愿实行土地改革，也决不会领导土地革命。如果中国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必须得到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和认可，那么土地革命将永远不会开始，除非农民自己起来进行土地革命。实际上，他们早已把这项任务担当起来了。

革命正处于深入发展的时期，而不是低落时期。然而，小资产阶级队伍已被失败主义情绪所压倒。有的国民党领导人已在讨论中国的 1905 年，他们的意思是说中国革命已经遭受失败，革命必须开始退却。这样来谈论 1905 年，包藏着危险的目前。小资产阶级由于害怕革命，想跑到蒙古、西藏、新疆去。坦率地说，在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不容许有这种悲观失望和惊慌失措的情绪。如果说，小资产阶级已经证明不能领导中国革命，那末，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必须有勇气证明，他们愿意并且能够领导革命。五卅运动时，无产阶级开始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现在已经到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并在实际斗争中运用领导权的阶段了。

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是否必要？如果是必要的，那么我们不能回避随之而来的后果。现在的局势要求我们必须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丧失中国无产阶级英勇斗争取得的辉煌成果。共产党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无产阶级从“五卅”运动以来，开始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曾经暂时地或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掌握了革命领导权。现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和在国民革命中确立领导权。如果无产阶级接受历史赋予的使命，小资产阶级就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回到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营垒，或者与无产阶级一起沿着革命道路前进。国民政府如果没有一项革命的政策，就不能在这里坚持，也不能保持它的政权。如果国民政府不采纳革命的政策，它将被国内反革命和反动派的力量所推翻。

小资产阶级左翼不能跑到蒋介石那里去，如果附蒋，就是在政治上自取灭亡。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可能并不是特别敏锐的，但它懂得这一点。如果我们采取主动，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将站在我们一边，它将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现在革命是上升还是低落，不决定于客观情况。所有的客观情况都说明革命正在高涨。令人怀疑的是主观因素，而这个主观因素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如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行动符合于客观情况，革命的前途就不是低落，只会是继续发展。

谈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请允许我对上海事件说几句话。在上海，共产党有机会领导无产阶级为领导权而斗争。通过对上海事件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对共产党是否能在斗争中行使领导权和它是否懂得怎样领导无产阶级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作出评价。我必须首先指出，只是在第三次起义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才突出起来。第一次起义可以不提，因为它是一次无意义的自动冒险，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意义，没有必要详细谈论。而第二次起义，即

二月起义，已经是一次具有严重意义的事件了。对情况进行研究之后，使我们清楚了下列事实：这次起义是不成熟的，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起来的，而是自发地产生的。斗争一开始，党就知道起义不成熟。但是，党没有去制止群众，党没有作为群众的自觉领导者行动，而是落在群众后面。当没有政治指导的群众已经过早地出动以后，党还想迫使他们采取更不成熟的行动。我还记得要建立市民委员会的那个计划，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变相的苏维埃。

在这次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中，党没有引导小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或使上海的斗争和全国斗争结合起来。上海被认为是中国内部的一个小国，在这个小国中，不考虑全国其它地方的斗争形势，就想建立一个工人政权，这不是无产阶级领导下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这是一次不成熟的政权斗争，结果，自然是失败了。

我强调缺点和进行批评时，没有丝毫忽略这个时期的巨大成就。

第二次到第三次起义的这段时间里，仍存在着对蒋介石的幻想。党领导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方面进行了一次过早的尝试，却没有能向无产阶级说明资产阶级已转而反对革命。甚至在蒋介石已经跑到反革命那边去以后，党还没有彻底明白，因而也不能向群众说明情况。党没有向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群众说明，蒋介石要占领上海，不是为了把它变为革命的基地，而是要把它变为反革命的基地，是代表那些正在反对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的。如果工人阶级（国民革命的先锋）甚至还对蒋介石抱有幻想，那么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存在更大的幻想就不足为奇了。上海的革命民主力量，对于这场不可避免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没有准备，结果，上海的工人阶级在第三次起义中展开英勇斗争、充满革命自我牺牲精神向反革命宣战时，发现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党没有帮助小资产阶级认清蒋介石

的反革命本质。当蒋介石占领上海并公开推行反革命政策时，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害怕，最后退出了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因此，按原来计划地方政府应建成为一个变相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而后来却从属于大资产阶级，否则，它就不能行使职权。如果无产阶级在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不能实现领导权，那么，同大资产阶级在一起，它就更不能实现领导权了。不管怎样，这就是第三次起义的实际结果。当初的出路决不限于或者夺取或者不要政权；或者把持或者放弃领导。毕竟，在这两种前景之间是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的。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为了胜利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它必须赢得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同情。无产阶级在上海没有做到这点，因为它不知道怎样去争取小资产阶级到自己这边来。

让我们再从第三方面、从国际形势的观点来谈谈确定革命前途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关于共产国际提纲的报告中要详细论述，现在只略说几句。在国际形势方面，没有什么迹象预示在即将到来的时期里，中国革命会趋向低落。相反，形势有利于革命的高涨。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国际形势并不是有利于革命的发展，那末共产国际的决议就与实际情况不符了。如果那样，共产国际就不得不改变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是涉及与军队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军队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军队和革命的社会势力之间力量的悬殊。

我们不能同意孙中山先生的纲领性计划，即革命必须经过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这个纲领性计划可能是才华横溢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果。但无产阶级不能根据这样的纲领行动。

军阀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点，它在某种程度上同中国革命运动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必须确定这些军队可以为革命所利用的程度。因此，人们必须考察军阀主义的社会基础。军阀

主义^①在中国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在其它国家有这种军阀主义的独特形式呢？我们必须找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才能确定利用这种力量的可能性。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将详细谈这个问题，这里我仅涉及这个问题的总的方面。

军阀主义的基础在于中国农村人口的过剩。农村人口过剩的原因是什么？帝国主义统治阻碍中国经济正常发展，它阻碍中国的生产按正常比例发展。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被束缚在土地上。在目前这种落后状况下，农业不可能养活所有依赖土地的人口。因此，军阀的军队就直接用来保持农村经济的封建性质和农村政府的家长制统治。

军阀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的间接工具。总之，军阀主义是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表现。这个反革命力量的集团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革命的阶级可以利用这些冲突使革命得到发展。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军阀的军队可以成为革命的基础，那就错了。客观上，革命将摧毁军阀主义的根源，可是人们不能指望这些军队会加速其自身的灭亡。

那种认为我们可以争取军阀势力到我们这边并把他们转变为革命力量的理论是非常危险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这在理论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种或那一种理论的危险性，有时可以从它的来源作出判断。两个月前我在与李济深将军的讨论中，提出了同军阀主义的和解问题。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革命军队中有些队伍昨天还是军阀队伍的一部分，今天就参加了革命。这是个逐渐变化的问题。没有理由认为其他军阀将来不会加入我们的队伍。把张作霖的所有军队都争取到我们这边来难道不

^① 国家被各个军阀所瓜分，他们互相之间的持续混战摧残了国家的经济生活，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罗易注

可能吗？”^①

一、**冯玉祥** 就他对夺取北京的举动而论，在试图夺取北京的政权时，曾指望得到冯玉祥的帮助，但在最后时刻，他拒绝前进。国民党人只想依靠冯玉祥的军队取得政权，没有发动能影响局势的其它社会力量。结果，当冯玉祥一变卦，行动部署即归于失败。

二、**夏斗寅** 我们知道夏斗寅的失败，是由于他自己的一些军官被日本收买叛变的结果。这样的力量不能作为革命的可靠基础。

三、**拥护蒋介石的那些军官们** 国民革命如果由蒋介石领导，这些军官就参加；一旦蒋介石反对革命，他们也就跟着反对革命。

四、**最重要的事实是对唐生智的认识过程** 我们必须说明这个事实，因为这对认识唐生智很有关系。唐生智抱什么态度？自从他参加革命，他的军队增加了一倍。这些军队不是属于国民政府，而是属于唐生智个人。他利用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些军队，不是为了发展革命，而是为了加强他自己在两湖的势力。在过去三星期中，在进一步北上进军问题上，通过了若干决议。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中，唐生智总是宣称自己同意进军。但是当提出派哪支军队去时，他提出四军和十一军。最后，他同意派他的三个师去。当命令即将发出时，他又提出条件说，他的军队不能出湖北省界。四军和十一军派到河南去了，而唐的军队却留在湖北^②。我还可以告诉你们许多其它很有意思的事实，但这件事本身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总之，军阀（即使是他们中间那些最倾向于左派的人）决不

^① 与下段文字连接不上，原文似有脱漏。——译者注

^② 我们这个“左”派军事同盟者只想利用国民革命这面旗帜，以增强其自身的力量。——罗易注

能成为革命的可靠基础。如果革命不去发展能够抵制军阀主义的社会力量，那么军阀主义就将摧毁国民革命。

五、还有一个对革命前途来说是很重要的典型事例 因为许多推测都把它作为根据，所以很需要彻底了解它。这是关于山西阎锡山的事情。北伐中，当北伐军还没有到达南京和上海时，阎锡山和蒋介石保持密切联系，并提出如果国民革命军沿津浦路向北进军，他就向北京发动进攻。但是现在，由于国民阵线分裂，对北京发动强大的进攻实际上已不可能。阎锡山的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果有大量的军队从湖南派到京汉路，如果击退了奉军，占领了陇海路，只有在那时阎锡山才可能前进并占领北京。而阎锡山占领北京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国民政府。但是，如果奉军打败了国民革命军，而冯玉祥赶来支援时，阎锡山也可能从侧翼攻打冯玉祥，他在冯玉祥的左翼有大量的军队。

这些事实证明，所谓左翼军人是靠不住的。过去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国内阶级力量的组合，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也有所反映。

国民革命不能随着这些无原则的、靠不住的、不忠实的左翼军人东奔西跑，疲于奔命。国民革命必须有一个社会基础，它必须有一个社会基地，它必须有一个社会基础最雄厚的地区作为基地。

我们对军阀的态度应决定于：一，实质性的考虑。二，策略方面的考虑。从策略上考虑，我们必须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使之对我们有利。但我们的政策不能建立在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的基础上。认为军阀某一天会成为革命者，这是一种幻想。革命的任务是挫败和消灭他们，这是我们工作的目的。根据共产国际的提纲，这也是共产党人在军阀军队中进行工作的目标。我们必须消灭他们，而不是向他们宣讲国民革命的信条。军阀队伍中的分化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正在进行分化。军阀队伍中军官和士兵

的利益是不同的。那些士兵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无地的农民，因为无计谋生，被迫进入军阀的军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本质上是革命的。但有许多实际困难妨碍他们到革命方面来。此外，每逢军阀队伍的任何单位投到我们这边来时，国民革命军总是允许革命者和反动分子都进入自己的队伍，官兵都能进来，反动的军官们也就留在国民革命军的队伍里。他们对士兵仍有影响，军队还保留他们以前的编制。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把军阀队伍中的士兵真正争取到革命方面来，真正组成一支革命的军队，那就是实行土地革命。如果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运动不仅通过宣传，而且也在实际上为根除其贫困的真正原因进行斗争，士兵就会站在革命一边，为革命而斗争。但只有在实行土地革命以后才会如此，而不是在这之前。

这意味着我们所尊敬的孙中山先生的纲领性计划必须否定。共产党人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论：认为革命在第一阶段必须单纯依靠军事力量，[这种理论认为]他们要聚集起一支成分杂乱的军队，以革命精神对它进行再教育，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采取革命民主化的措施。国民革命必须组织自己的军队，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军队，而不是忽来忽去变化莫测的军队。如果国民政府给农民土地，如果它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武装他们，就能在短时间内建立一支自觉为革命而斗争、为保卫革命所给予他们的一切而斗争的军队。

当然，宣传是一件好事，政治工作是重要的。但它必须有一个经济基础。过去，我们的宣传不可能具有实际内容，现在，我们可以这样做了。国民政府可以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不需要再去推测那些所谓左翼军人。我们可以有我们自己的革命军队。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根本问题上来：即建立和发展一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而这项任务要靠我们实现土地革命纲领的能力来决定。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革命基地的问题。

首先，我想批判到西北去这种不切实际的方针。这也是从孙中山那里继承的一个传统，也是我们必须否定的。只有那些不相信群众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计划：认为必须远离可能遭到帝国主义进攻的地方，撤到西北的某些地区，并在联合各军阀队伍的基础上开展运动。显然，共产党不能接受这样的计划。至于帝国主义进攻的危险问题，经验已经证明，即使在蒙古，我们也不可能是完全安全的。冯玉祥的军队甚至在南口一线也遭到了失败，就是一个例子^①。

关于上海是否具有革命基地的重要性，这里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对我们来说，上海对国民革命无疑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上海，我们有一支有组织的、有丰富革命经验、在战斗中受到政治锻炼的无产阶级队伍。上海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捍卫者，仅仅上海无产阶级本身就抵得上全国所有的“左翼”军人。但上海也有不利方面，这里是革命力量的中心，但同时也是帝国主义的基地。因此，不能选择上海作为对帝国主义发动直接进攻的地点，这是一个策略问题。从策略上看，把上海转变为直接进攻帝国主义的基地是不利的。上海的重要性必须视整个国家的革命运动而定。实践已经证明，因为上海的无产阶级在国内是孤立的，所以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但是，认为谁去上海就是准备与帝国主义妥协，这种论断也是错误的^②。对资产阶级来说确是如此，而上海的无产阶级则是要打倒帝国主义的。这种说法只说明他不相信群众，不能理解无产阶级的作用。有人说，既然蒋介石到了上海立即同帝国主义妥协，那么无产阶级也将被迫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这种

① 指1926年3月，直奉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联合攻击冯玉祥，将国民军赶出北京，4月，国民军被迫退守南口，后又退入张家口、内蒙及西北一带。——译者注

② 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说：“谁去上海就是准备与帝国主义妥协。”——罗易注

说法表明他对社会的阶级性缺乏了解。蒋介石并不是到了上海才同帝国主义妥协的，他到上海去正是为了要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而上海的无产阶级却一直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与基地问题有关，必须谈谈北伐问题。我们不能根据我们必须转移他处（北上、东征或南下）这样的想法来决定问题。北伐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开展革命运动。本质的问题是要取得一块革命的基地。每件事情都应根据这个观点来考虑。如果北伐促使革命巩固，我们就进行北伐；如果它的目的是要把革命基地转移到蒙古某地，那么，我们反对这样的北伐。

第一次北伐开始前，我们党曾进行过一场大辩论。事实已经证明反对北伐的同志是错误的。但事实也证明了，共产党没有能利用北伐创造的有利形势去发展革命。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北伐的主观动力是资产阶级想要增强其自身的力量；但在客观上，北伐提供了发展革命力量的可能性。正是由于这种可能性，共产党带领无产阶级支持北伐。党支持了北伐，但它的行动是否符合客观需要呢？没有。共产党虽然支持了北伐，但它对工人阶级的利益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共产党人为北伐的发展冲昏了头脑，忽视了对北伐唤起的革命社会力量的组织、团结和巩固的工作。正是这种对于北伐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使蒋介石能够得逞，从国民阵线中拉走了相当一大批军事和社会力量。

如果共产党在支持北伐的同时，能清醒地看到资产阶级力量的结合及其根本目的，如果党在同时也促进革命力量的结合，那么蒋介石搞分裂时就会发现他自己是孤立的。还有一个问题要指出，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保留地支持北伐的后果之一是失去了广东。也就是说，广东之失，在于我们支持北伐时毫无计算。为了保持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为了支持左翼军人的联合，共产党没有加强阶级斗争，没有摧毁反动派的基础。革命军离开后，革命的传统基地广东就暴露在反动势力面前。在第二次

北伐中，我们必须防止再犯类似的错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不是北伐还是东征，而是要巩固基地的问题。我们只能从这个观点出发，确定应该是支持北伐、东征还是南伐。

这个问题甚至在五次大会以前，在中央委员会上多次讨论过，没有必要重复所有这些讨论，但仍有必要简要地谈一下这些论点。第二次北伐的特点是它的假设性。所以，共产党为了是否应该支持这个不存在的第二次北伐而大伤脑筋，是非常可笑的。既然北伐并不存在，既然支持北伐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否定这个计划，就没有必要再去评论它。然而，同志们，也许应该指出：国民党已经同意共产国际代表团提交党中央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反对攻取沈阳、北京、蒙古和西藏的那个计划的，它主张北伐应该仅仅是派军队北上去帮助冯玉祥占领陇海路，可能的话，再帮助阎锡山占领北京。共产国际向党中央提出这个计划时，中央委员会否定了它，而当国民党同意后^①，它又热烈地拥护这个形式上的北伐计划。

现在的计划包括向陇海路进军，使冯玉祥军队有可能离开陕西占领河南，然后，冯可能在阎锡山帮助下，继续向北京进军。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把武汉政府从唐生智军事专政下挽救出来。冯玉祥的军队一占领陇海路，国民革命军就立即回来占领江西、广东和福建，以巩固国民政府的基地。这才是所谓北伐的真正内容。这就是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计划，其目的是要代替那个以假设为根据的计划——即只有占领北京才能在长江流域保住国民政府，只有扩大革命地区后才能加强革命基础，直到奉军全部撤出

^① 当初提出的要占领京津并迫使张作霖撤回东北的计划，被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所否定，因为唐生智不愿他的军队远离他的两湖基地。虽然如此，“占领北京”的宣传鼓动工作仍继续进行。实际上，国民党并不愿意群众关心革命未来的军事胜利问题。——罗易注

长城，才能解决土地问题。中共中央为了支持小资产阶级提出的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欺骗群众的）占领北京的计划，而否定了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计划^①。

关于为什么我们最初不赞成立即北伐说几句话。我们曾经指出，从军事观点看这是不可能实行的。那时，北伐的支持者都说，要把奉军赶出长城是完全不可能的，国民政府在这个军事行动中只能派两个军（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到北方去。第二次北伐要占领北京只有靠国民革命军感动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队，换句话说，革命主要依靠“左”翼军人。

早些时候，我曾指出这是很危险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这个计划的原因。从策略上讲，迫使冯玉祥、阎锡山进军北京，把奉军赶出长城，是非常得计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会有利于革命的发展。我们不能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而牺牲真正的革命基地。只有建立和巩固了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中南各省的革命基地以后，我们才能同意这样的策略。

北伐不再存在，国民政府已经否定了它。那么为什么政府负责人还在谈论一个假设的并不存在的北伐呢？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逃避土地改革，因为他们反对革命力量的发展。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左翼军人身上。现在我们已经听到这样的说法，即当我们处于革命战争时期，就不应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②，不能进行土地改革。我们必须等到占领北京后，再进行土地改革^③。但北伐毕竟并不存在，北京也绝不会被占领。现在，关键并不是北伐，而是加强革命的社会基础，我们正应当以此来决定共产党的行动计划。我们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促使加强革命的一切措施，反对回避这

① 见关于继续北伐的决议。——罗易注

② 陈独秀在讨论北伐时的讲话。——罗易注

③ 汪精卫在几次公开会议中这样说过。——罗易注

个目的的任何政策。

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整个共产党呼吁,不要去追求幻想,在你们面前有一项巨大的任务:为了保证革命的前途,为了使革命烈火燃遍全中国,必须加强革命的基地。

现在我们谈谈同国民党的关系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曾进入对他们的政策分担部分责任的阶段。但我们没有权,因而就不能分担责任。共产党不能无保留地赞成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政策。我们对他们的支持,我们和左翼国民党的联盟,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决定什么我们就同意什么。如果我们准备支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我们必须支持他们),那么,我们就要求所有有关国民革命目前和将来的决议的通过,都要有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自觉参与其事。必须承认,过去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并不是像应有的那样,共产党经常是作为一个附属物而不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进行活动。在蒋介石事件^①上,国民党发生了一场争吵。它的整个政策不决定于一条政治路线,而为小资产阶级面子的得失所左右;共产党人又完全支持国民党方面这种没有政治路线的行为。左派忘了他们自己是左派,却跟着右派走,共产党人又去跟着左派走。当左派决定分裂时,共产党也照此办理。这不是一种独立的政策,这不是共产党的政策。

为了能够为未来制订正确的政策,我们必须检查过去的错误。过去的错误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只是由于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以便将来能够执行正确的政策。今后,我们的方针应该是这样,对于既成事实的国民党的决定,我们既不支持,也不必反对。对于发展革命的事情我们应当有自己的发言权。换句话说,共产党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这应该通过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组的工作来实现。共产党在中央委员会的政治领导下,必

^① 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注

须在国民党和政府各机构建立共产党党组，使国民政府的每项决议都必须经过工农同意和在他们影响之下通过。各种联合委员会已经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党组的工作就成为特别重要。共产党人参加这些委员会时，必须有自己事先制订的符合工农利益的政策。共产党人必须通过他们所属的许多不同机构，把这个政策向国民政府提出。

在国民政府中，共产党有两个部长职位。在革命的现阶段，这两个部长职位具有重要意义。但关键是国民党在让共产党员任职的同时，却不给他们任何权力。我们的同志在几个月之前就被正式任命为部长，但实际上却不能把他们的部组织起来。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即共产党人被委任为部长只是为了宣传，不需要他们从事实际工作。其他部长都得到了所需的一切：预算、办公室、工作人员。但共产党的部长却什么也没有，甚至连办公室都没有。如果我们不采取果断措施，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党将失去信誉，成为小资产阶级政策的替罪羊。如果工农中间有了动乱，国民党将会说：“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已经任命两个共产党员去当主管工农事务的部长。如果他们什么也没有做，这不是我们的过失，而是共产党部长的过失。”共产党必须要求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授予权力。共产党员部长必须真正能够有效地实行国民革命的土地政策和劳工政策。

财经问题和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也是有联系的。对目前的严重财政困难，小资产阶级发出了一片惊叫声，这种叫嚷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必须作出牺牲，帮助国民政府克服财政困难，其真正用意是群众必须准备牺牲，千万不能催促立即满足他们的要求。共产党必须采取革命的办法克服财政困难，要求工人阶级的所谓自我约束是不够的，这不解决根本问题。无产阶级在同意自我约束和减缓反帝斗争时，应坦率说明，财政问题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向富裕的资产阶级征税和实现土地革命即没收土

地来解决。这样可以增加政府岁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扩大贸易，从而缓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困难的情况。这才是真正解决财政困难的根本办法。

必须敲起警钟。在财政困难的借口下（也可能是不自觉的），工人的地位被大大地降低了，许多工人阶级组织为推行其所谓自我约束而印发的一些决议和通知，真是很不光彩。工人们为了要求提高工资被拉到革命法庭判处监禁，湖北省劳工联合会命令停止向资本主义作斗争。无产阶级接到通知，禁止任何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行为，以便“当我们的军队准备征服北京的时候，不致削弱我们的基础”。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小资产阶级害怕革命，所以他们制造惊慌，发出帝国主义要立即干涉的警报，其目的是要使工人阶级同意退却的政策。这意味着要把小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情绪强加在工人阶级身上。共产党必须把工人阶级从这个危险中解脱出来。革命的下一阶段是要建立一个革命民主政权，这个政权只能在保护工农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换句话说，革命民主政权只有靠加深革命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加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本身正日趋尖锐化，已经向工农宣战，要开展一场阶级斗争。只有两条道路可走：或者投入战斗取得胜利，或者被打败。具体地说，我们将努力在下述基础上建立一个革命民主政权，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进行土地革命；

第二，武装农民，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

第三，组织农村自治政府，摧毁农村封建地主的政权；

第四，建立国家机构，进而实现民主专政；

第五，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不采取把军阀军队变成革命军队的办法，而是在巩固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一支革命的军队。

革命由于它本身的发展而面临这些任务，而无产阶级一定要

完成这些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削弱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相反，我们要加强这个联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才会有力地参加革命斗争。如果我们不鼓励它，它会开始动摇，它会扑灭革命而跑到反动派那边去。

在现阶段，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再是抽象的理论，它已成为活生生的事实。现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不决定于客观力量，这些已经具备；中国革命的前途决定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主观能力。

1927年4月30日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1927年5月3日）

罗 易

讨论的情况说明我的报告中的某些论点被误解了，也可能是由于我说得不够清楚。因此，请允许我再谈谈党中央委员会报告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首先，我要消除由于张太雷同志对我的第一次讲话中的某些论点提出批评所引起的混乱。我无意于对张太雷同志进行个人攻击，但批评他所代表的观点则是完全必要的。他所引起的混乱必须消除。

他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因为共产国际指责我们有右的倾向，我们〔没有理由为什么〕必须立即投入另一极端。”他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路线同客观情况不符，太左了；党投入这样的极

* 这是罗易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第二次讲话。——原编者注

端是危险的。尤其是当我们说到小资产阶级或者参加革命或者转向蒋介石一边时，他说我们提出了一个完全机械的公式。让我们看看张太雷同志的批评是否正确。

在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联盟中，无产阶级是主要的力量。为了使这个联盟成为民主专政的机构，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必须行使领导权。因此，必须由无产阶级来确定政策，无产阶级处于确定这个联盟的政策中的地位。以什么方法来抵制小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呢？现在，当资产阶级转而反对革命时，小资产阶级前面有两条道路：或者参加革命，或者抛弃革命；或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解救自己，或者跟着资产阶级加入反革命阵营。这个观点丝毫也不机械。张太雷认为我们的政策太左，以致封闭了小资产阶级参加我们这边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小资产阶级从来就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它或者同资产阶级联合，或者同无产阶级联合。在革命的现阶段，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联合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它同无产阶级联合并将参加革命民主同盟，是由于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由于这个原因，它必须参加被剥削阶级的联盟。在某些情况下，资产阶级可能给小资产阶级一些好处、一些经济权利，于是小资产阶级就同资产阶级联合。但在中国，资产阶级本身是如此软弱，它不可能为了把小资产阶级拉向自己一边而给它什么好处。

帝国主义正在剥削和压迫小资产阶级。因此，在客观上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要比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更接近。由于这种客观上形成的阶级阵营，在无产阶级掌握决策、小资产阶级愿意和无产阶级一起走革命道路的条件下，可以建立起革命民主联盟。

在欧洲各国，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在中国则更没有这种可能。它不可能为自己提供一个独立的政治生存环境，它

一旦抛弃革命民主联盟，就不得不转向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边，这就是我讲过的意见。我愿意请教，这个看法有什么机械的地方。

张太雷同志批评我的观点，说它是机械的，这时，他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别的想法。他认为，我们提出的政策将破坏革命民主联盟。如果有这种看法，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

在我们的建议中，什么地方可以被认为是太左了呢？我们是根据社会力量的客观发展，提出一个纲领来指导运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即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分歧，是关于在革命的现阶段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张太雷的主要论点是说，我们提出的国民革命的土地纲领太左了，小资产阶级将不能接受，革命联盟将因此而瓦解。我们的土地纲领的基本要求是没收部分土地——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这个建议不是由我们首次提出的，事实上农民已在这样做了。国民革命已经发展为土地革命。在共产党面前有两条道路：或者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或者为了同小资产阶级保持良好关系而延迟土地革命的发展。我不相信我们党内有谁在作这样的抉择时会犹豫不决。每个党员根据已经发生的情况，都会认为共产党必须支持农民的斗争。无产阶级不能为了换取同小资产阶级联合而背叛农民。而且，土地革命不仅对农民有利，对小资产阶级同样也是有利的。无产阶级如果向小资产阶级说明它的真正利益，把它从封建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就能在革命民主斗争中赢得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是这项工作只能在真正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完成，必须通过行动来完成。小资产阶级必然会信服，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

当无产阶级想使小资产阶级确信解决土地问题是目前革命时期的客观需要时，并没有强加于人，只是唤起他们自己的阶级意识而已。对无产阶级来说，这样做意味着在革命民主联盟中行使领导权。作为这个联盟的动力，无产阶级必须提出客观上符合同

盟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要求（但不是他们出于政治落后而单独提出的要求），来加强革命斗争。这样的策略不仅不会危害革命联盟的团结，反而会巩固这个联盟。

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说明为什么彻底的土地改革对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有利。我只谈几点。彻底的土地改革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呢？妨碍国家经济发展的、封建军阀官僚体制的种种形式，将要被废除。由于相当大部分的地租是以实物缴付，农产品都集中在封建官僚分子手里，地主利用这种垄断抬高物价，一方面剥削从事生产的农民，另一方面剥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实行土地改革，采取了废除垄断农产品的措施，物价就会下降。这将有利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目前的封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掠夺了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而且，农民常常不能保证自己甚至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他们经常濒于饥饿的边缘。如果由于土地改革，改善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就会使国内贸易兴旺起来。农民将有更多的产品出卖和有更高的购买力，由此提高贸易额，城市商人就将从这里得到好处。

这就是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后，小资产阶级能得到的直接好处。但是，由于在封建条件下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目光短浅，以及他们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落后，他们一时还不能理解土地改革对他们是有利的。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无产阶级是应当真正成为领导者，去唤醒小资产阶级对其本阶级利益的觉悟，从而加强革命民主联盟呢，还是出于错误的考虑，拒绝行使领导权？这就是整个问题之所在。怀疑共产国际提出的政策的正确性，认为这个政策有“激进主义”的危险，就意味着怀疑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斗争中能够行使领导权。

我还要谈另一个问题。这里有人说（也是张太雷同志），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政策中有消极因素。这个批评是专门针对我关于所谓“左翼”军人的观点而言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在革命

发展的现阶段，不能主要依靠“左翼”军人的支持。认为这个观点中有消极因素的那些人，相信革命的最有效活动是调动所谓“左翼”军人。他们认为“左翼”军人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我在第一次讲话中曾经指出，过高估计“左翼”军人的重要性是危险的，并说明为什么革命必须摆脱腐朽的军阀雇佣军队的控制。

共产国际代表团决不为消极的政策辩护，相反，我们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加强行动的纲领。我们反对那种把革命的下一阶段估计为低落时期的观点，并确认革命的前途是革命能动性的不断加强。我们反对退却和防御的理论。我们谴责这种失败主义的理论。我们不认为政治活动纯粹在于策动“左翼”军人。

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只有通过革命的行动才能实现的纲领，不能叫做是消极的纲领。我们建议中国共产党依靠工会和农会（共团结了1000多万会员）的有组织的联系，同群众联合行动。人们应从批评我们的纲领是过左的同志那里，去寻找消极因素和失败主义。当客观情况需要勇往直前的时候，这些同志却提出退却。为了使小资产阶级满意，他们提出了一种所谓群众自我约束的理论。他们以一种不能容忍的失败主义情绪使运动陷于混乱。中国共产党并未受到激进主义的威胁，而右倾危险却确实存在，我们必须同这种倾向作斗争。

请允许我举例说明自我约束理论是如何表现的。几天前，所谓的革命法庭^①在国民政府要求下，因为一个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判处监禁三个月。湖北省劳工联合会发出告工人书，号召工人在北伐期间停止一切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还要求外资企业中的工人不要罢工，只须把控告送交外交部。在避免进一步恶化国民政府同帝国主义关系的名义下，这种投降主义策略正在继续推行。

^① 奉国民党之命，工会为了在工人中间贯彻“革命的自我约束”，成立了所谓革命法庭。· 原编者注

有一个共产党员，他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主编，在五一节社论中写道：工人必须准备作出牺牲，他们不仅应工作 16 小时，而且应工作 20 小时。

还有一个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例子，而且事关紧要。代表大会开始时，我在讲话中曾说：在目前，革命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而无产阶级将是这个联盟的领导力量。在同一个会议上，国民党的一个代表声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农民应由国民党来领导。很明显这是针对我的讲话说的，这是对共产党的一个挑战。国民党已向共产党宣战，国民党已经宣布它要同共产党人争夺对农民的领导权，它警告共产党不要把土地革命纲领贯彻到农民中去。

两天之后，谭平山同志显然是出于同国民党恢复友好关系为目的，在代表大会上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国民党可以在农民中间进行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鼓吹消极因素的，正是那些唯恐得罪小资产阶级同盟军的同志。把农民交给公开反对任何土地改革的国民党，还要同反动军官去协商——这就是批评共产国际代表团路线的人打算采取的行动。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在讨论革命基地问题时，许多同志说，仅仅湖南和湖北是不够的。这完全正确。但是我们在建议中，从来没有说我们必须停留在湖南、湖北。我们提出在国民革命已经部分完成的省份内加强革命的基地，我们并没有说要把自己封闭在两湖境内。巩固革命的基地必须从这两省开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里的农民运动最为发展，在这里我们有机会继续开展我们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在这两省内工作。如果我们在可以开展工作的地方不去进行工作，如果我们拒绝在任何一个地区都要加强革命，以争取国民政府统治整个国家的那一天的到来，那么我们就将失去湖南、湖北，正如我们曾失去广东一样。

我们没有丝毫忽视同军阀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的

必要性。必须消灭奉军，必须打垮张作霖。但口说是一回事，去打是另一回事。当我们还没有足够力量时，制定把奉军赶出长城这种虚张声势的计划又有什么用呢？

革命必须既在地域意义上也在社会意义上得到发展。革命既须扩大，又须深入。必须推翻张作霖，必须摧毁蒋介石及其新军阀主义。这些是革命的任务。我们要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准备必要的力量。资产阶级已经跑到反革命那边去了，小资产阶级正在动摇。因此，革命现阶段的正确策略是削弱反动势力的基础，发挥群众的战斗力。

最后，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绩，我说几句。

讨论曾经主要集中在党的错误和缺点上。然而这个讨论有很大价值，党将获得极大教益。批判右倾，谴责失败主义理论和警告投降主义倾向——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增强党的力量，以便在代表大会结束后，为迎接伟大斗争的到来作好准备。衡量党的成绩，使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前景，并使我们确信革命不是在低落，而是在上升。两年来，党员从900人增加到5万人，这种显著的增长是在革命斗争的情况下产生的。这说明5万党员是一支强大的革命军，它已在革命斗争中证实了它领导无产阶级的能力。党的巨大发展又一次证明我们对革命发展的看法是正确的。党的历史证明，近两年来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已经成为国民革命的原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年轻的党。没有足够的经验，自然会犯错误和暴露出弱点。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它是国内坚定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政治力量。它将抛弃它队伍中一切明显的孟什维克和调和倾向。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党，是没有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立足的余地的。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从真正的含义上说是一个（代表）群众的党，它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如果中国的劳动群众（工农）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从这次大会讨论的情况看来，党将更坚

强，更有经验，更为发展，它将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表现出它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能力。

1927年5月3日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

（1927年5月4日）

罗 易

共产国际代表团想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案中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作一扼要的报告。

由于共产国际是联系全世界革命运动的问题来分析中国共产党的过去及其发展道路的，因此就有可能确定中国革命的明确前途，并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有关今后革命发展的一些具体任务。

共产国际代表团提交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审查的决议案，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国际形势进行最细致分析的结果。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一系列世界性重要问题的决议：关于苏联的国际国内形势、关于英国的总罢工和矿工的被解雇以及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就其重要性来说，这次全会等于一次世界代表大会。

在全会上，许多问题的讨论都联系到世界革命的发展。其中，中国革命的性质、发展和前途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这些问题

* 罗易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决议案的报告。——原编者注

的探讨，取决于对资本主义世界稳定性这个基本问题的正确估计。世界经济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获得稳定吗？这个问题被提出来进行充分的、详细的考查。资本主义稳定问题对于当代一切世界政治问题，是最有决定性的一个问题。正确评价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不仅对确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策略是必要的，对于为中国革命的发展确定一个明确的前途，对于理解它的性质，也是必要的。

在过去几年中，关于资本主义的稳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明确的，甚至是混乱的。世界大战以后，开始了一个加强革命活动的时期。革命浪潮席卷全世界，在欧洲一系列国家，特别在战败国，革命已成为既成事实。另一方面，在殖民地国家发展着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个时期应该理解为是世界革命时期。而共产国际的策略是引导无产阶级向资本主义进攻，以便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

但这个时期是以革命遭到一系列的失败而结束的。这个时期的最后一个事件是1923年10月德国革命的彻底失败。几个大国的革命运动暂时失败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开始力求稳定。革命浪潮的低落，产生了认为资本主义的作用尚未最后结束、世界还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内发展的理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充当这种失败主义理论和宿命论的鼓吹者。社会民主党甚至提出这样的理论，即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还需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往后的发展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在德国革命失败后的这段反动时期中，这种理论甚至使共产党内某些党员陷于混乱。当资本主义成为完全反动的力量阻碍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时，为立即建立社会主义而斗争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资本主义还真是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和原理的应用对今后世界经济发展还是必要的，那么，无产

阶级的任务就不是采取进攻性的斗争了。在那种情况下，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正确策略不是直接进攻，而是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同盟军，准备在有利时机开始决定性斗争。社会民主党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理论要点，总起来就是：资本主义继续在发挥进步作用，资本主义对世界发展仍然是需要的。换句话说，世界仍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还没有进入以建立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

由于在世界形势方面存在着这种概念上的混乱，共产国际认为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便对资本主义状况提供一个正确的估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在对世界经济形势作了详细的科学分析之后，明确了目前只是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同时指出，那种认为资本主义仍有助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理论是经不起批评的。然而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已成功地击退了革命的力量，并由此产生了〔允许〕力求稳定资本主义的一些条件。资本主义只能以降低宗主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和镇压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换句话说，稳定资本主义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市场的破坏和引起殖民地战争，因而又缩小了国外市场。因此，很显然，这种稳定是不可能持久的，它不过是资产阶级暂时胜利的结果。

下列事实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

1. 货币流通的调整：一系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渡过了通货膨胀时期。货币曾实际上失去价值，整个信用系统被破坏。现在这种情况已有了改变，在一些国家内，货币已经稳定，纸币价值已经恢复。

2. 生产的发展：战后，工业立即陷于不景气，造成失业人数增加。现在这种情况也已经改变，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正在发展。

3. 贸易的扩大：工业增长相应地使贸易有所发展。去年，对

外贸易额出现了显著的增加。

所有这些因素说明资本主义的状况已有所改善。

另一方面，也有事实说明这种稳定的暂时性，即：

1. 工业和商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性。

2. 生产设置和实际生产量之间有很大差别，工业的增长与战时和战后生产设置的巨大发展不相适应。

3. 英帝国的衰败。

4. 法国资本主义的衰退。在萧条时期和战后危机中，法国相对地处于较好的情况。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遭受长期失业和贸易萧条的时候，法国却没有失业现象。由于凡尔赛条约削弱了德国，法国就成为第一流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目前，法国也进入了危机时期，其标志是失业现象的不断增加和通货膨胀。

5. 美国是唯一的资本主义繁荣的国家。但即使在那里，也可以见到萧条和危机的迹象。

6. 苏联经济的巨大发展。

7. 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威胁到帝国主义的生存。

尽管是处于暂时稳定时期，资本主义危机仍在继续。暂时稳定只是总的向下曲线上的一个片段而已。目前的危机性质是非常特殊的，它是一种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生产不足的危机。为了扩大贸易必须增加生产，否则，不可能求得稳定。但是无法使实际生产量达到工业设备生产能力的水平。所以，尽管生产有所发展，生产不足的危机仍不能基本解决。另一方面，即使是这种有限的生产发展，仍存在着生产过剩的危机。

战争和工业“合理化”〔“流线型”体系〕的结果，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大大降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降低了工资，造成了失业。资本主义稳定的实现是以破坏市场为代价的。稳定的方法之一是降低工人阶级的工资。这个方法降低了国内市场的购买力，于是产生了对于新市场的需要。我们正在回到曾经引起1914年世

界大战的那种形势。对市场的竞争是当代国际形势的特点。由于竞争日益激烈，世界面临着新战争的威胁，面临着甚至要比上次战争负担更重、破坏性更大的战争。

另一方面，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减少了建立国外市场的可能性。事实上，许多殖民地国家的市场已经缩小到相当程度。在某些国家，市场的缩小是由于长期的殖民地战争，在另一些国家，是由于当地工业的发展，还有一些国家（其典型例子是中国）则正在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发生严重的威胁。

在当前形势下，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需要具备下述条件：

1. 在宗主国内进一步降低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即进一步破坏国内市场。

2. 保持和进一步扩大殖民地市场。这就需要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起义。但是在某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有了如此深厚的基础，要扑灭它只有采取长期的军事行动。中国尤其是如此。但是，目的在于维护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统治的掠夺性战争，破坏了殖民地的商业，从而也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基础。

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稳定所必需的条件，只能以进一步破坏市场来达到，而这种市场又正是资本主义稳定所非常必需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巩固资本主义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对世界形势作了这样的估计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革命发展的前途就很清楚了。这个估计使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前途。

在目前客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革命将发展成为毁灭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这是打破资本主义稳定的最强大因素之一。

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决议案并不是对世界形势随意分析的结果。共产国际早在1920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就开始研究殖民地问题，并发展其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是列宁同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

出殖民地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时提出来的。在资本主义衰退时期发生的殖民地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支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是推翻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

首先，殖民地革命的领导权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殖民地革命的目的不仅是打倒帝国主义，它还有另一项任务，即废除本国的封建主义。殖民地革命是由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同时，在客观上它也起了反封建的作用。因此，它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殖民地革命被描述为资产阶级革命。但同时，列宁在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在提纲和列宁的讲话中，都没有说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不可避免地必须发展为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为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代表大会后殖民地革命的经历，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经历，已经表明在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甚至转而反对革命，革命不能总是处于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国家中，革命夭折了，反帝斗争软弱无力，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殖民地的革命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超出资产阶级的领导，革命的领导权要转到非资产阶级人物手中。当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直接反对封建主义时，它这样做是为了建立资本主义，因为封建主义妨碍了资本主义发展。但是，当消灭封建主义的任务不是由资产阶级分子而是由更加革命的阶级领导的殖民地革命所完成时，那么消灭封建主义的目的就不再是为了建立资本主义，革命就会超出这些狭隘的框框。就革命消灭封建主义意义上说，它客观上仍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是它的结果超出了建立资本主义。它开创了一个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

以上就是共产国际向中国革命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基本考虑。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事实已经证明共产国际的分

析是正确的。为什么能对前途得出这样正确的分析？由于对整个形势有了清楚和正确的理解，就容易得出这样正确的结论。

稳定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一是镇压殖民地革命，在实现这个任务时，帝国主义不能再指望它以前在殖民地中的同伙了。过去，帝国主义在殖民地一方面得到反动派和封建分子（在中国表现为军阀主义）的支持，另一方面，全国广大群众的消极态度也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第一种力量是积极支持帝国主义的，因为他们自己的存在要靠帝国主义统治作为后台，他们是帝国主义的积极的同盟者；第二种（全国广大群众的消极态度）是一种消极因素，因为他们不反抗帝国主义的剥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把这些群众卷入了广泛的革命斗争之中。只要帝国主义不受到群众暴动的威胁，封建分子的支持就足够维持局面了。但是近几年来，帝国主义要在排除了封建军阀分子的基地上维护它在中国的统治是越来越困难了。国民革命军轻而易举地在长江流域打败北洋军阀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帝国主义正在殖民地内设法扩大它的社会基础，这就出现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上层妥协的可能性。

革命的猛烈发展超出了资产阶级领导的狭隘范围，资产阶级意识到面临的危险，它害怕革命运动不限于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而会走得更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为了保证对殖民地继续剥削，愿意对民族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帝国主义的这种愿望向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指出，如果它同帝国主义合作，它仍可以发展它的经济，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它还能有所发展。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正在企图缩小革命目标，引导革命走向同帝国主义妥协。资产阶级正在通过这样的活动背叛国民革命，它正投到反革命一边去，要同帝国主义结成联合阵线，成为破坏革命的工具。在这个阶段，革命的领导权转到了受帝国主义剥削的那些阶级手里，他们没有理由同帝国主义妥协，他们的利益要求完全打倒帝国主义和实现国家的彻底民主化。

取消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把领导权转到更加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手里，使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国民革命将同帝国主义妥协而告结束，中国会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地，从而有利于稳定资本主义。但是现在，中国革命正朝着建立这样一个政权的方向前进，这个政权不仅不利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且会导致建立社会主义。

因此，中国革命正在成为世界革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严格说来，中国革命是当代世界革命斗争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参加者。它不仅间接地支援了世界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而且它已成为全世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直接工具。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危险正在成为现实。在革命民主联盟领导下，中国革命的发展对于稳定世界资本主义的企图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由于这个原因，帝国主义正集中全力要扼杀中国革命。但是根据我们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帝国主义的这些尝试是不会成功的。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确实存在，必须采取抵挡措施。但也应当知道，帝国主义的一次干涉是不可能扼杀中国革命的。互相竞争和争夺殖民地市场是当代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现在最需要的是市场，而武装干涉中国会使这个迫切需要落空。帝国主义以武装干涉扼杀中国革命的尝试，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地位将是十分不利的。粉碎中国革命的尝试只能加速资本主义宗主国的灭亡。帝国主义甚至也不能对中国实现长期的经济封锁，因为经济封锁将证明是一把双刃之剑，它对帝国主义利益的危害决不会小于对中国的危害。已经有事实说明（在俄国革命中），革命足以抵制封锁。但是，在现时期，资本主义的存在决定于他寻找新市场的能力——而中国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长期的封锁会使帝国主义失去利用中国市场的机会，这会给帝国主义造成巨大损失。

此外，武装干涉或长期的经济封锁，会加剧帝国主义各国之

间的竞争和内部矛盾。在中国已经有大量投资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就想保持他们在这个国家的绝对的政治统治，而其他国家则热衷于造成一种都有机会进一步发展贸易的局势。矛盾甚至还存在于每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一部分资产阶级如财政家和银行家，为了保护投资，赞成在中国发动战争；而工业资产阶级则反对战争，因为跟中国进行贸易需要和平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并不是迫在眉睫。帝国主义知道，它既不能负担与中国作战的费用，也不能实行长期的经济封锁，因此，它就采取恐吓政策。它知道，如果短期内能把国民政府吓倒并迫使它就范，它就将成为局势的主宰。但是，如果国民政府能坚持一些时候，帝国主义就须改变其政策。危险在于帝国主义以另一种方式来进行干涉，即采取瓦解国民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危险的。

帝国主义政策的根本原则是促使那些能引导革命与帝国主义妥协、并因此在中国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的阶级去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后来它知道不可能使整个国民革命运动都归资产阶级领导，于是就采取分裂政策，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得到帝国主义支持和鼓励的第二中心。帝国主义干涉的真正危险就在于此。这对革命的未来发展是个主要威胁。防止这种危险的唯一保证是使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得到发展和深入。在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领导下的革命，必须对封建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发动决定性的进攻。

现在让我们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虽然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际形势，但它的发展基本上是和本国社会现时的阶级关系相符合的。人们应当考虑，在目前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是否能领导反帝和反封建斗争。必须弄清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究竟是一个机械论的概念，还是从中国当前客观情况中总结出来的。

中国社会的结构大部分是封建的，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城市人口占少数。国民经济仍然普遍地受封建或半封建生产关系所支配。中国社会的落后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帝国主义破坏作用的结果。帝国主义已经使中国社会停留在一种落后状态之中。中国人民之所以参加反帝斗争，是因为只有在消灭产生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帝国主义之后，才有可能彻底改变现有的社会经济关系。在现时代，中国革命对内的任务是消灭封建主义，为充分发展经济力量创造条件。这个任务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由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有没有理由设想，在中国会有所不同呢？即革命将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去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进行分析。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和不成熟的。在经济方面比较发展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是买办和银行家集团，这部分人同帝国主义有很密切的联系，决不会参加反帝斗争。独立的工业资产阶级几乎不存在，又非常软弱，不能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

与欧洲相反，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产生自手工业，帝国主义干涉破坏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手工业方面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主要来自地主阶级，甚至直到现在还与各封建阶层有密切联系。即使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有密切联系。因此，不仅是资产阶级，还包括相当部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客观上没有能力、在主观上甚至反对实现中国革命的社会目标——消灭封建主义。

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反帝斗争是与反封建主义斗争同时进行的。因此，资产阶级不可能再继续参加反帝斗争。

革命的社会目标（推翻封建主义）同它的反帝性质是紧密相联的。中国人民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整个国民经济仍处于封建关系的束缚之下。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封建经济的关系是如此错综复杂，构成了中国社会封建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不能领导反帝的革命斗争，因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定性斗争必然会发展为反对封建主义及其政治形态的斗争。

只有削弱资产阶级的封建支柱，才能真正摧毁和完全打倒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一个导致他们自己灭亡的革命。事实已经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性。因为革命向帝国主义进攻的道路同时也就是封建主义灭亡的过程，所以资产阶级背离了革命阵线，并转而反对革命。这就是共产国际决议案中所清楚阐明的、现时期中国革命首先是土地革命的原因。资产阶级和相当一部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出身、社会联系和经济利益，他们反对土地革命，因此他们不可能领导这个革命，并且必然要反对它。这些人已经脱离革命，客观上已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帝国主义妄图改变中国革命的性质、扭转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些叛变的阶级身上。有出现第三党的可能性，即以虚假的民族主义旗帜为掩护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意味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前景。

中国革命面临两个前途：

一个是循着资产阶级民主道路发展的前途。这个前途意味着开始一个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也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国内和国际的客观情况不允许有这样的前途，但在主观上，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则赞成这个帝国主义干涉和中国革命失败的前途。

第二个前途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力量等情况都倾向于这个前途。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是实现这个前途的主观力量。

国民政府是革命民主阶级的政治军事机关，而共产党是工农利益的政治代言人。

像中国这样的革命发展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他地方的革命发展道路都不像中国这样。因为它是一种崭新的革命方式，将建立一种新型的革命政权。因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盟领导下进行的，在一定时期革命政权就不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它将是小资产阶级政权，确切地说，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权。在人类历史上迄今还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政权是革命的，但是在中国，由于它反帝，所以是革命的。共产党正参加国民革命政府，因为它是一个革命政权的政府，这不是改良主义的结合。共产党正参加这个政府，因为这是一个要革命政府。在革命的现阶段，斗争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参加这个国民革命政府是为了利用这个政权机构作为实现领导权的工具。

因为革命仍然从各阶级的联盟中得到支持，而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无产阶级不能成为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但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中最重要最有力的因素，它将决定这个联盟的政策。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但是还有别的阶级也参加了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斗争，因为他们不是无产阶级，所以不能参加无产阶级政党。这些阶级目前参加的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斗争，同样也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因此，无产阶级就参加进去，并指导这个斗争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这些考虑决定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革命现阶段的关系。革命的发展把国民党从一个资产阶级甚至是封建分子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软弱的阶级联盟，转变成为一个民主专政的组织。换句话说，就国民党目前的社会成份来说，它能够而且已经成为借以行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个工具。参加国民党的三个阶级都愿意中国革命朝着非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因为这三个阶级都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之间的实际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是自觉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而其他两个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虽然在客观上追求相同的目标，但在行动中却是不自觉的。

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同样是这两个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会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具。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发现自己处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他们已成了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力量。因此，革命所建立的以这三个阶级为基础政府，就不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具，而是三个阶级的专政机关，是民主专政的机关。这个政府是个专政机关，因为它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它是个专政机关，因为它是镇压反革命阶级的工具；它是个专政机关，因为它是进行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阶级的工具；它是个专政机关，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它是通过将大工业和公用事业收归国有的办法来消灭大资产阶级的工具。

如果不把土地、大工业、铁路、航道收归国有，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将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革命政府是个专政机关，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基础必须通过它去加以摧毁。

如果这个民主专政不去完成这些任务，它就是背叛了支持过它的这三个阶级的利益。

如果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个革命联盟不能实行专政，那么领导权将重新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帝国主义统治就会加强。如果这个政府不实行专政，而试图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末革命就会遭到失败。必须建立专政，它是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无产阶级是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是最赞成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阶级。这个专政尽管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民主专政，但其主要支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意识到这个专政的客观意义的，这个专政由无产阶级领导。虽然在现阶段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共同领导革命，但同时要确保这个专政不失其为专政的性质。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支柱和核心，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则是它的两翼。无产阶级是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阶级，这就是它自觉地和客观地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原因。而其它两个阶级则还有私有制的萌芽，也即未来

资本主义的萌芽，只有消灭了私有制的萌芽，这两个阶级才能全力以赴地参加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事业。专政的任务就是要消灭联盟内的这些萌芽。对联盟以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萌芽，必须以暴力和专政加以消灭，但联盟内的则必须采取别的方式。

今后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要说服它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同盟者，使他们相信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使他们自己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私有制偏见时，反对尚存在于同盟者中的私有财产权的思想意识时，不能使用暴力。它要以实践证明，如果不废除土地私有制，土地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还要证明，如果不废除私有制的一切生产和分配方法，就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将仍受奴役。因此，无产阶级在行使领导权时，要把革命民主政权转变为民主专政，而不是立即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国际决议案没有提到这个民主专政是否能领导国家直接走向社会主义，或者是否需要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缓议。

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清楚，中国革命客观上只有一个前途：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只有当革命的主观力量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时，才会失去这个前途。中国革命能否按非资本主义路线发展，关键在于共产党是否有能力明确地认识到这个前途，是否有能力坚定不移地把它变成现实。

同样清楚的事实是，革命的发展已建立了一个客观上具有民主专政性质的政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要负责切实运用这个革命政权机构，为加强非资本主义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

因此，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必须为中国革命确立这个前途，必须使斗争循着这个方向发展。在革命现阶段，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联盟，建立民主专

政，领导中国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把国民革命转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一场斗争。

1927年5月4日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

(1927年5月4日)

罗 易

听了汪精卫同志^①的讲话，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把意思表达得更清楚一些。

在现阶段，共产党将与国民党共同工作，但必须以有职有权为条件。所以，双方都清楚地表明其对于革命的看法，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国际没有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立即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但不是经过一个资本主义时期，而是经过一个建立在非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时期。在这个非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最近的行动纲领中，不包括完全消灭私有财产的问题。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主张消灭私有财产。因为现阶段的革命，是由几个阶级的联盟领导的(无产阶级准备联合其他阶级一起领导革命)，所以无产阶级不能提出立即消灭私有财产的纲领。无产阶级不希望也不要求农民和

* 这是罗易对汪精卫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回答。——原编者注

① 汪精卫不是出席代表大会开幕式的国民党代表。他曾表示愿意听取共产国际代表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的报告。他在仔细地听取报告后，发表了一个颇有特点的讲话，大会向他表示热烈欢迎，而我对他的讲话所作的答复，被领导同志们指责为是“对国民党左派的不明智的攻击”。——罗易注

小资产阶级只是按无产阶级规定的条件参加这个革命联盟。如果无产阶级想把立即废除一切私有制形式的纲领强加于它，这个联盟的大厦就将崩溃。共产党不打算引导无产阶级走这条路。弄清这一点，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十分明确了。实际上，国共之间的关系在革命的现阶段是很清楚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是国民党的也即是革命民主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调整两党关系的问题，而是通过一个国民革命纲领的问题，这个纲领要符合于参加这个革命联盟的三个阶级的利益。这三个阶级历来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同时因为一切客观条件都有利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这个纲领从本质上说也必然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国民党的利益不是对立的，无产阶级参加了国民党，不如此就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了解革命同盟者的利益、态度和愿望，他们就不能留在国民党内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国民党目前的社会成分是由革命造成的，它今后的发展将决定于在国民党内担当自觉的革命先锋的无产阶级。在近期内，无产阶级要以组成革命联盟的三个阶级的利益和中国的特殊情况为指导，参与确定国民革命的纲领，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必须适当考虑斗争的难点和特点。我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团向汪精卫同志并通过他向整个国民党保证，我们时刻不会忘记这一点。共产国际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总的前途，拟订了中国革命的一个纲领草案。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把这个纲领运用到具体情况中去，使革命经过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走向社会主义。业已参加革命民主联盟（也即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将根据客观情况的要求，实现这个革命纲领，并在斗争过程中力求巩固这个革命联盟。这里没有矛盾，不存在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因为国民党正在进行反帝斗争，所以它现在是一个革命组织，将来也是一个革命组织。正由于这个原因，无产阶级要同国民党合作，直到最后胜利。

1927年5月4日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 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

(1927年5月5日)

罗 易

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决议案包含两个基本原则：关于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和关于这个非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政府的性质问题。

我不准备分别回答各位同志对这两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而只是作总的说明。

先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谈起。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中有两个决定因素：一、国际形势——我在第一次讲话中已充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二、中国革命的阶级性质。

目前世界形势的基本特点是资本主义的衰退，资本主义在世界各个角落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反动力量。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革命运动在本质上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所有这些运动都是推翻资本主义的手段。这就是中国革命具有反对资本主义斗争性质的原因；这就是中国革命面临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原因。

决定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性质的第二个因素是革命的阶级基础。去年的一些事件已经证明中国革命的基础正在缩小，这一点在我们的讨论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在革命发展的现阶段，中

* 罗易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的结论性发言。——原编者注

国革命的基础是由不赞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阶级所组成。这些阶级在不同程度上都遭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因此，他们都希望资本主义灭亡。于是，产生了非资本主义发展将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

在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须经历一个资本主义时期的理论是个普通常识。那么，中国将采取什么方法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个中间阶段，从封建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呢？

这个时期的实质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开始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之前，社会必须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迄今为止，在所有国家中，这样的发展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发生的。于是产生了在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须有一个资本主义中间阶段的理论。实现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原则（为了利润）本身，对于为社会主义斗争创造成熟的条件，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中国革命的最近前途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清楚，在到达社会主义之前，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上升到一个适当的水平。

在中国，由于存在某些势力，不需要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原则去达到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在中国为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那种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方法来实现，但不需要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基础。什么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为利润而生产，生产基于剩余价值。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新生产力的出现，封建体系遭到破坏，建立了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在这个历史时期，社会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支配因素，是占有这些生产手段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时期产生的新生产方法（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是与剥削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致的。

但是，这是两件本质上不同的事情，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在资本主义时期产生的）不是一回事，它们不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从苏联的例子看到，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工业照样可以发展。

作为革命的结果，中国在非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将要经历的经济发展正是这种性质的。每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都将用来提高国民经济达到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水平。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和俄国民粹派纲领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中国革命的前途并不否认发展经济的必要性，这种经济发展应该差不多相当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其它国家的发展状况。在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达到一定的阶段，那时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一切生产方法都将被采用。

民粹派的纲领是反动的，他们宣称俄国不需要资本主义制度，说俄国与其它国家不同，因此他们否认发展经济的必要，这种经济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其它国家都正在发生。他们认为俄国应永远处于小生产的经济条件之下。这个纲领，这种观点，客观上反映了在俄国永远维持封建主义统治的愿望。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超越了封建主义，它已经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以便发展更高级的生产方法。如果否认这种需要，那么就没有必要消灭封建主义。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已经宣布这种理论是反动的，并指出在俄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作为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准备阶段。在证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必要时，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并不因此规定社会经济发展只能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原则（为了利润）基础上发生。他们是要说明，俄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走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

道路，即必须消灭封建主义，才能沿这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在这里，人们可能要提出问题：那么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 20 世纪初期为什么没有给俄国革命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呢？如果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对中国是可行的，那么为什么对俄国就不可行了呢？对俄国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现在决定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因素，当时在俄国并不存在。在那时，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还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的衰退还没有开始。其次，还缺乏那些能够在非资本主义基础上担负起发展经济任务的国内力量。

民粹派的纲领和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之间有很大区别，前者在性质上是反动的，后者是革命的。

现在我谈第二个问题：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将采取什么实际方式？共产国际决议案指出，这个时期是从运输、重工业和公共事业的国有化开始的。但是仅仅重工业的国有化还不能为非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足够的保证。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几个国家里，铁路和其它公共事业早已国有化。同样，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建筑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我们知道，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也曾提出工业的主要部门实行国有化的纲领。战时，几乎所有参战国的重工业都是由政府控制的。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为非资本主义发展或社会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因此，为了具备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国有化必须在不同的情况下进行。决定性的因素是实行大工业国有化的国家的性质。如果国有化是在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则不仅不能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反而会产生资本主义剥削的更高形式。

在中国，重工业、运输和公共事业的国有化，将标志着非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开始，因为它不是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而是由革命政府实行的。这个由国民革命建立的政府将得到三个被剥削阶级的拥护，这三个阶级都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无产阶级

是这三个阶级中最重要的和最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它同私有制完全没有联系。其次，这个政府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职能是反帝斗争，这种职能赋予它以革命的本质。如果这个政权不进行反帝斗争，如果它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就将有助于加强资本主义稳定，并使中国革命遭到暂时失败。这个政府的存在决定于它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所以，如果它从没收工业的主要部门、运输和公共事业着手，就将为国家在非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保证。

谈到这里，可能会引起对苏联新经济政策和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之间进行对比，我认为这样的对比只能使人误解，是错误的。新经济政策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之后实行的，是由无产阶级政府提出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不是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而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已废除了私有财产制。在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是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中间阶段。在这个非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并不立即完全废除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将在非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地废除。因此，把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和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相提并论，是错误的。所谓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与旧的经济政策比较而言，它只是现时期的经济政策的意思。

正如我前而已指出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是政府的革命性质。在非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呢？正如决议案中早已指出和在这里的讨论中非常明确地肯定的，政权的性质将是民主专政，它与无产阶级专政有区别。这里我们又遇到了一种介乎民主主义（也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政权形式。说它是一个民主政体，是指它的基础不仅是一个阶级，而是由三个阶级组成的联盟；说它是一种专政，是指这三个阶级在一个纲领的基础上组成为一个整体，去推翻和打倒

它们联盟以外的一切阶级。这个专政的民主性质保证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协作的可能性，但是因为这个民主主义同时也含有专政的性质，其决定性因素是无产阶级，它将防止民主主义变质的危险。

但是这里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这个政权能不能略去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在国民党内对这个问题有严重的怀疑和担心。但是，我们不能由于考虑到可能使国民党害怕而逃避回答。

同时，恰当地说，这个问题不需要立即解决。在目前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同理论上的关系较大，同政治上的关系较小。由于这个原因，在第一次讲话中我有意识地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但在讨论过程中提到了它，因此，应该就这个问题说几句。

要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就必需有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作为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来设想，那么，也许就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是孟什维克的观点。英国工党坚持这样的理论，他们说：在俄国，必须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但在英国，政府是民主的，在英国没有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就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我们吸收这样一种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与无产阶级一起参加了革命联盟）的幼稚思想的话，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成了孟什维克理论的俘虏。

形成这个政权（在这个政权中，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可能的）的社会基础的联盟，是一个由几个阶级组成的联盟。顺便要指出，其中包含与私有财产有密切联系的社会成分；因此，这个非资本主义结构包含私有财产的萌芽。国民革命的目前纲领并不包括完全废除私有财产。由于建立一个由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组成的联盟的必要性，立即废除私有财产的一切形式的纲领，将会证明其是不成熟的、不利于革命的。只要私有财产继续

存在，资产阶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就仍然存在。社会结构中仍有私有财产的成分。与无产阶级共同掌权的那些阶级，就会受到私有财产的原则和制度的牵制。

在非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有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力量的结合这两个因素的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不是和平地进行的；在这个时期，阶级斗争仍将继续。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保证，而且是一个真正的保证，就是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内、在这个革命政府内将掌握领导权。在我们前面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时期，但同时我们有使斗争取得胜利结局的保证。最近将来的革命纲领是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作好准备，为最后消灭封建主义的残余和为摧毁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力量作好准备。参加革命联盟的三个阶级都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这个联盟为了胜利地向这四个敌人作斗争，其所采取的那种经济和政治纲领，将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要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大工业、铁路、海运、银行）不收归国有，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就不能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

在中国，大资产阶级几乎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存在，它同帝国主义的财政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当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时，本国的大资产阶级也就会立即遭到毁灭。

这个联盟必须对帝国主义以及本国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进行决定性的斗争，以使资本主义实际上不可能在这个国家得到发展。

当这个国家处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统治下，并以对帝国主义作经济上的让步为基础，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的胜利。革命政府为了防止这样一种革命的后果，不得不开展斗争，这就增加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革命政府的土地纲领比资产阶级的更为彻底，这个推论不是出于主观意志，是革命政府不得不这样做的。如果它把自己限于

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内，它就会永久保留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留下毁灭自己的根源。革命民主政府在非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土地纲领，其目的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革命民主政府的土地改革将导致一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到底的土地革命。

此外，还有一些政治性的考虑。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个联盟就不能进行对敌（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斗争。所以，这个政府必须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把权力交给工农群众。由于革命战争，这个政府一定要武装工农。这个含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萌芽和成分的革命民主政府，将不得不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权力要归工农，工农要武装起来，要创造充分有利于直接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要摧毁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基础，要从政治上消灭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武装起来，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因此，非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有了很大进展之后，统治权将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小资产阶级则处于被削弱和被孤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阶级冲突未必会采取像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里那样激烈的形式。

总之，民主专政不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民主专政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是不必要的。但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引起的阶级冲突，将不会像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那样采取如此尖锐和激烈的形式。这样，我已从总的方面谈了决议案的两个基本论点。

最后，我愿意回答上海那位同志提出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很重要。但不需要逐一回答。实际上我已在我的讲话中作了总的回答。这些问题是：

1. 这两个党怎样实行专政？
2. 怎样使共产党从一个反对党转变为执政党？
3. 武汉政府真的能采取没收大工业、土地、铁路等办法走非

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吗？

回答是：

1. 在我的讲话中我已说明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革命联盟内怎样行动。在这个时期，民主专政不是由两党，而是由三个阶级的联盟来实行。这个专政不是由一个党实行的。

2. 共产党从反对派转变为掌权者这个问题的提法是错误的。共产党现在并不是一个反对党。无产阶级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共产党参加了这个政府的所有机构。

问题不是怎样去掌权，而是怎样走过这种只是部分掌权的时期。我已说明这个过程将怎样发生。无产阶级在实现领导权时，将逐渐达到专政。

3. 现在的武汉政府不会主动决定实行土地、铁路和工厂的国有化。但革命斗争的客观情况将迫使它这样做。这方面的主观因素还是无产阶级，它不仅真诚地拥护这个纲领，还必须把它付诸实现。武汉政府作为三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必须因此履行国有化纲领，无产阶级是实现这个纲领的保证。如果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的）现阶段能够实现领导权，那么，迫使武汉政府实行国有化纲领就有充分的保证。

最后，我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在这里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表示满意。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同意共产国际决议案，并由于以这个决议案为基础开始工作，中国革命史开始了新篇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年轻的党，但它有强大的基础，即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得到了丰富革命经验的工农群众。因此，共产国际确信中国支部能够领导国民革命经过各个阶段达到共产国际的决议案所提出的目标。

1927年5月5日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布尔什维克的党*

(1927年5月9日)

罗 易

同志们，我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团欢迎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它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大会面对着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问题，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在革命的下一阶段中，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要行使领导权。因此，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有明确的政治路线和坚强的有经验的领导。现在，我们成功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第五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的正确政策和选出了在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基本指导方针。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在实践中实现这些决议。

第五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正确评价这个决议案，并确定实现这个决议案的正确方法。对于决议案和大会上提出的其他许多问题的讨论，说明党已经理解了这个决议案的重要历史意义。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可以按通过的决议的精神领导全党。我们正处在革命历史的转折点，因此，党必须分析过去，认识错误，不仅是为了批评，也是为了从已有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这个任务，大会也已经胜利完成了。大会明确规定了党的迫切任务，也指明了过去的缺点和错误。党从积累起来的经验中得到了宝贵的教训，这些教训对全党都是很有好处的。今后，党必将克服这些缺点，不再重犯类似的错误。

* 罗易对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讲话。——原编者注

这次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大会，它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这正是今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所必需的。只有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中国革命的前途才有保证。而第五次代表大会也已说明这个主观条件是存在的，革命发展的一切客观条件都已具备。从这种客观形势中产生了主观因素——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党。大会的代表将奔赴全国各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动派的斗争。代表们回到他们的地区后将在很大程度上加强革命运动，他们将对革命的胜利发展给予必要的领导，并经过一系列的阶段，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在工人中间曾对一些问题存在疑问，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解决了这些疑问。第一，是关于目前的革命究竟是处在低落还是上升的时期。大会明确宣告：革命正在继续发展，没有下降的迹象。客观和主观因素都有利于革命进一步发展。

第二，是关于土地革命的方式和范围问题。土地问题是现阶段最重要的问题，第五次代表大会也已给党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大会否定了可能伤害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过分激进的政策，明确宣布在革命的现阶段必须实行部分没收土地的方针（亦即除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没收外，其它土地都没收）。共产党员将在这个基本原则指导下发展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在总的规模上的巨大发展将沉重打击农村的反动势力，并削弱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的作用问题。大家都同意在革命的现阶段，无产阶级应该行使领导权。但是，对于领导权的确切含义和如何实现领导权，则缺乏明确的概念。大会不仅以非常明确的语言宣布，无产阶级必须在革命的现阶段起支配作用，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这个支配作用也作了明确的指示。

第四，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志担心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会由于土地革命和其它方面的革命政策而受到损害。这

次大会解除了这个疑问，并说明革命的土地政策和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会削弱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相反，只有实行这样的政策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在革命的现阶段，国民党是这个联盟的政治组织形式。

为了准确判断已经出现的情况，为了正确估计革命的发展，为了对形势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就需要分析国民党的政策，考察它内部的各种不同倾向。但是这种批评性的分析决不是出自要中断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的愿望。第五次代表大会只是按照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条件之一行动的，也就是说，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并有行使自由批评的权利。大会不仅没有与国民党破裂的想法，而且是想通过对形势的批评性分析，确定一条道路，以便在革命的第二阶段把国民党转变为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机关。目前，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基本任务之一不是削弱而是巩固国民党，是要把国民党转变为被压迫阶级进行反帝、反军阀、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巩固的革命联盟。

第五次代表大会非常详细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作出了清楚而明确的回答。

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坚定而勇敢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将在共产国际决议案指示的路线下发展中国革命。第五次代表大会对于巩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作出了贡献。中国革命按共产国际决议案指示的路线发展，最直接地表明了世界革命的发展。因此，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世界革命史上是一次值得纪念的大会，它有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并在促进世界革命走向胜利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大会是在革命遭到一系列强大敌人从各方而施加威胁时结束

的。在这种情况下，大会为工人阶级和整个革命运动制定了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将帮助中国工农群众击退反革命集团，并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为中国革命提出下列口号：

第一个口号：“打倒帝国主义”。这不是一个鼓动的口号。它说明了当民族资产阶级企图与帝国主义妥协时，我们决心要唤起中国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定性斗争。

第二个口号：“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万岁！”由此产生另一个口号：“三个阶级的民主专政机关——国民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挑战。无产阶级将以这些口号夺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

同志们，我们希望你们在全中国即将开展的伟大斗争中取得全部胜利。你们的胜利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世界革命的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7年5月9日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7年5月12日罗易同志的报告）

最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当前的一件大事。

* 本文是（苏）A. B. 巴库林即《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一书的作者根据罗易的报告做的笔记，不是两位秘书做的速记记录。

召开代表大会的原因很多：首先，自从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党发展得很快，必须提出与过去不同的新任务；第二，党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发展；第三，必须进行内部改组和整顿；第四，党员人数增加了，但是党的领导力量没有相应增加，不能适应面临的政治和组织任务，党内产生了一些复杂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是极其必要的。代表大会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还因为它是在中国大革命的转折关头召开的。由于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党需要改变自己的政策。资产阶级的脱离，在国民党内引起了一片惊慌失措的情绪，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并且应当帮助国民党，为它指出新的方针政策。但是，共产党不能完全胜任这个新阶段的领导任务，不能改变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原有的老关系。这样，共产党就无法掌握整个运动而加以指导。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功绩还在于，它试图改变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将取决于这种新关系的性质。共产党能否胜任这些新任务？为了对此作出应有的估计，我们必须对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中国共产党的状况进行一次评价。

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到达汉口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共产党的中心——一个中心在上海（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第二个中心在汉口（以若干中央委员为代表）。汉口的中心那时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说是存在领导危机，说是非撤换领导不可，他们普遍对中央委员会表示不满。但是在会议讨论过程中，在同个别同志私下谈话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了解到：（一）两个中心之间不存在任何原则分歧或政治分歧；（二）关于存在领导危机的一切论断现在都是危险的，议论撤换领导就更危险了。

在陈独秀同志到达之后，情况急剧改变了。不久以前还迫切要求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中国同志的共同愿望是：不要使关系紧张起来，不要重新提出过去争论

的问题。

在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问题上,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原来中央委员会曾经通过一个决议,规定在4月25日召开代表大会,没有取代这个旧决议的新规定。当代表们已经开始向代表大会集中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不预先通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就开会(尽管这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团住所隔壁召开的)决定:代表大会延期召开,必须把所有已经向代表大会报到的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派到各地去。这个迹象说明,党的领导集团没有准备公开讨论全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个别代表提出的问题。

在陈独秀同志到来之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建议中央委员会到上海去讨论有关蒋介石的问题,以便随机应变对付蒋介石,并从蒋介石那里拉走一部分人。我提醒他们说,即使到上海去讨论,也不存在是否要避免同蒋介石分裂的问题,因为到上海只是为了随机应变。代表团认为分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我们认为,必须向群众和留在上海的左派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脱离蒋介石,以便为武汉建立一个较稳定的基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遭到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对。经过频繁的讨论,中共中央终于同意到上海去开会,但是已经晚了,因为那时已经收到蒋介石的复电,再去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陈独秀同志到来之后,就所谓继续北伐的问题展开了频繁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内部没有分歧,大家都认为必须继续北伐,占领京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Г.同志这时在上海)反对继续北伐。中共中央关于北伐的建议是:必须立即继续北伐,占领京津,打垮张作霖,把他赶到关外去,然后在关内可能产生的新的军事集团之间继续随机应变,开展运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反对这个建议的理由是:(一)从军事观点看,这些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二)即使北伐成功,社会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整个政权仍旧处于军事势力之下;(三)在北伐

过程中将忘掉深入革命，忘掉组织群众和土地改革等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改革问题是中共中央向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的最薄弱的环节。有些党员过去批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指责中共中央同资产阶级妥协，指责它没有断然解决土地问题等等。甚至这样的党员现在都完全赞成中共中央在北伐问题上的方针。我不想谈代表大会之前讨论的全部结论，只想说说其中几个最重要的结论：（一）现已查明，中共中央无法判明新的环境，党的领导和全体活动分子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二）现已查明，不存在渴望充当新领导的成熟的新核心，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和第五次代表大会面临的任务是加强原有的领导；（三）中国共产党仍旧处在国民党和国民党思想的强烈影响之下；（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下列突出事例可以说明目前的党内状况：关于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同国民党领袖商量之后做出的，因为国民党否决了北伐的决定而通过了东征的决定。在通过东征的决定的时候，国民党要求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优秀干部派到东部去。这就是中共中央决定延期召开代表大会而把干部派到东部去的原因。

在北伐问题上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提议不要进行北伐，而要南下或东征的时候，中共中央坚决反对采取这一步骤，而在第二天国民党通过了关于东征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马上改变主张，决定……支持国民党关于东征的决定。这一切都证明中共中央是摇摆不定的。

说了这些开场白之后，可以直接谈谈代表大会本身的工作。代表大会是在4月28日开幕的。代表大会开幕那天，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罗易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祝词，谈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袖和农民领袖的作用问题。

徐谦以国民党代表团的名义发言，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

显然是反驳罗易同志的讲话。徐谦发言的要点归结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应当领导无产阶级；国民党是农民的政党，所以应当领导农民，这就是结论；中国共产党必须离农民运动远一些。值得注意的是，对徐谦的这个发言，代表大会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没有作任何答复，只是在两天之后才委托谭平山对徐谦作了答复。必须指出，谭平山的答复绝非应该作的答复，因为谭几乎完全赞成徐谦的发言。谭说，中国共产党将从事工人运动，而把农民交给国民党。

这个例子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了解自己作为革命领袖的任务，同时也说明了代表大会开始时的党内状况。

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进行的讨论中，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一致表示不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任何辩论和争吵。中共中央只想召开一次形式上的代表大会，只想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提纲，而避免讨论关于过去的领导班子以及明确设想未来的领导班子这样一些敏感的问题。大家觉得，上层领导想避免引起争论，害怕提出党的新路线。这样的状况显然不应该存在，必须把代表大会的工作完全扭转到另一个方面去。因此，代表大会的工作拖了很长时间，从代表大会开幕式到举行第一次会议，就拖掉了两天时间。在这两天之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就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同中共中央进行了磋商，力求使代表大会不生长时间的争论，力求使代表大会就革命前途及党的领导等问题通过明确具体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磋商决定，中共中央的总结报告应当说明以下问题：（一）大资产阶级在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三）无产阶级的作用；（四）土地改革；（五）国民党；（六）军事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关系；（七）改编国民革命军，成立新军；（八）建立革命民主政权。

陈独秀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涉及了所有这些问题，但是报告

是平铺直叙的，对于所有上述基本问题仅仅一带而过。陈独秀主要是报告过去的工作，对于未来既不分析，也不指明前途。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就党的新路线提出的一些问题，陈独秀根本没有答复。陈独秀在报告结尾部分说这些问题还有待讨论，从而回避解决问题。整个说来，陈独秀的报告遗留下了许多疑问，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具体答复。这个报告在代表大会上造成极其紧张的气氛。但是，既然党的领袖们只是向代表大会提出这些问题，而找不到任何其他解决办法，与会者也就不敢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来答复这些问题了。

更重要的是，在陈独秀做完报告之后，代表大会主席团和中共中央立即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提纲发言。中共中央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为了阻止或延缓对陈独秀的报告进行争论。

如上所述，陈独秀同志在报告中特别详细谈了以下问题：（一）由于国民党内发生分裂，目前民众的革命情绪低落了；（二）党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估计不足，在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地区，帝国主义势力极其强大，必须另找不受帝国主义直接打击的基地；（三）党过高估计了上海这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基地。陈独秀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说，未来的革命基地应当设在陇海铁路和京汉铁路的交点上。

陈独秀同志特别注意的第二个方面是，土地改革问题。他没有对此作出具体回答，甚至声称难以回答现在是否需要没收土地的问题。

陈独秀还详细论述了“军事因素”问题。他回答说，军事因素仍旧是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对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

在谈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陈独秀不能解释什么是无产

阶级领导权，以及怎样才能实现这种领导权。

前三点表明，陈独秀破坏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进行的磋商。因为就陈独秀提出的问题所做的决议，是同联席会议的决定矛盾的。为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被迫围绕中共中央的报告发起辩论。罗易就联席会议预先讨论过的所有问题发了言，并且逐点进行适当的解释。在这以后，代表大会的气氛才缓和下来。

相当多的同志就会上提出的所有问题发了言。发言水平都相当高。争辩个人琐事的一切尝试均被排除，只讨论主要问题，而且讨论得很好。在讨论中再次证明，党内对领导上推行的旧政策普遍表示不满，但是这种普遍不满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政治路线。所以整个说来，反对立场比较微弱。

就中共中央的报告进行的讨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 党过去犯的错误：过高估计资产阶级，错误理解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政策，没有在土地问题上做出决定。

(二) 党的最近任务问题（就此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会上特别谈到了必须通过土地改革使革命深入下去的问题。就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发表的意见，反映了代表大会所讨论的问题。这些意见首先是批评党的错误，而且不单是为批评而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这些意见清楚说明，党不应该忘记面临的困难，必须巩固党并保持一定的警惕。关于革命情绪低落的论调，被认为是一种失败主义思潮而遭到了驳斥。共产国际代表团必须反对这种思潮。

党对军事因素不应估计不足，但是注意中心仍旧应当是社会因素，而且必须加强社会因素。关于革命基地的问题，在大会上没有人公开发言或争论，可是对于北伐这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却反应很多。在这个问题上的总的倾向是：（一）革命应当向北方发展；（二）帝国主义整个说来是很强大的，必须另找更安全的基地。

这种明显的失败主义情绪，在一些发言中留有深刻的烙印。罗易认为，这种失败主义倾向是极其危险的。现在必须保护党免受失败主义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内的失败主义，是国民党内革命情绪低落的一种反映。后来，政治局（在代表大会之后）就失败主义倾向问题进行了更为热烈的辩论。有些同志甚至要求取消这个议题。结果，按妥协方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必须在国民政府所辖各省内，即在已经进行了局部革命的地区内把革命深入进行下去。但是，把革命向北方发展的问題仍旧悬而未决。

代表大会的下一项工作议程是，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也没有明确的结果，因为大家把批评国民党理解为分裂国民党。共产国际提纲中关于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论点，关于这个联盟应当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等等的论点被接受了。但是罗易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懂得也不理解自己应当起左右局势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内只存在两个原则：或者是向小资产阶级投降，或者是同它分裂。他们不懂得还可以有第三个原则，即同小资产阶级合作并充当其领导者。

关于工农民主专政的问题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不懂得贯彻这个任务的原理。这个任务只是部分地被理解了，是否能正确贯彻下去还是一个疑问。

必须再着重指出，产生这些麻烦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没有实现这种领导权的能力。结果，同国民党的关系仍然照旧。中国共产党只看到两条道路：一条是完全同国民党妥协，另一条是同国民党彻底分裂。结果的情况是，国民党内存在的一切动摇现象也都影响到共产党内来了。现在共产党不是运动的领导者。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国际的提纲只不过是形式上被接受而已。罗易同志一开始就把事情看得极其

悲观。他担心，如果提纲只是形式上被接受，就不会被理解，当然也不会被贯彻。不料，在讨论中共中央《政治与组织的报告》之后，出现了一个较好理解共产国际提纲的基础。必须说，对共产国际提纲的辩论，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进行的：（一）关于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前途问题；（二）关于这次革命可能建立的国家的性质问题。

我们有必要谈谈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即汪精卫表示愿意到代表大会来讨论共产国际的新提纲。汪精卫在罗易之后发言说，虽然他一般也同意提纲中谈到的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未必能成为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者。汪精卫只同意中国共产党应该既领导农民又领导革命，从而把谭平山送给国民党的“礼品”又归还了中国共产党。

在汪精卫发言之后，罗易起来解释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作用问题。罗易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提纲也谈到了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没有认为自己的最近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和抹杀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作用。汪精卫对这个解释表示满意。他说，看来中国共产党是意识到了在中国这个地方搞革命的难处的。

汪精卫和所有国民党领袖都在高谈阔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他们都赞成建立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而不提资本主义。中共领袖们把国民党的这种言论看作是真心诚意合作的基础。他们如此沉湎于这种幻觉，以至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完全赞成国民党的政策。顺便说说，国民党认为，虽然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只能在占领北京之后实行。中共领袖完全同意这样做，因为在他们眼里老是晃动着国民党赞成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幻觉。对各种论点进行的讨论极清楚地表明，共产党内正在进行争取实行新路线，争取有一个更广阔的政治前景的斗争。这是一种极好的现象，是代表大会的成果之一。代表大会没有制定

新路线，但是表示希望制定这种新路线。

提纲中的论点虽然被接受了，但是党面临的一个艰巨的任务是让全党理解这些论点，并克服只是形式上接受论点的危险。党必须不断为制定新路线而斗争，为培养执行新路线的领袖而斗争。

土地问题没有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进行广泛的讨论，而主要是在代表大会的土地委员会上进行了极其深入的讨论。对于已经制定的土地纲领，会上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甚至反而表现得有些过左。左派提出的决议案激进得很不现实（有人认为必须全部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提纲，制定出一个国民革命时期的土地纲领。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令人感到，中国共产党总是害怕通过与国民党的决议距离太远的土地纲领，因为它想同国民党保持牢固的关系。中共最后通过的决议案也令人感到，中共恐怕自己目前时期在土地问题上比国民党走得更远。中共在决议案中要求进行局部没收（不是国民党所说的政治性没收，不是只没收反革命派和土豪劣绅等的土地）。中共通过的关于没收土地的条文，说的是局部经济性没收。决议案明确指出，为了维持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小地主应当得到保护。此外，决议案还列入两个重要条文：（一）关于建立地方农民政权；（二）关于组织农民武装。土地问题决议案中的这两个重要条文，是经过国民党同意才由代表大会通过的。但是必须指出，国民党对于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真心实意的。现在已经清楚，国民党甚至不想贯彻他们自己的不彻底的决议。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他们的决议只会停留在纸面上。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职工运动**决议案。代表大会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准备让无产阶级实现其领导权，什么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

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上提出来。但是，这个问题始终贯串着整个代表大会。代表大会

总是注视着国民党的动向，总是担心自己的决议走得太远。这当然妨碍了代表大会的工作。代表大会清楚表现出来的两个特点，很能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一）中国共产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因素，还在国民党的强大影响之下；（二）在无条件向国民党投降或者同国民党决裂之间，共产党还没有找到一条中间路线，共产党还不理解它应该领导国民党。

这次代表大会的具体成果如下：

（一）详细讨论了过去的错误和革命的发展前途，切实承认了这些错误，甚至上海方面的同志也承认了这些错误。

（二）目前阶段的革命的基本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但是已经明确地在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党现在已经知道了问题之所在。

（三）在党的面前已经展现出清晰的革命远景，虽然党还没有找到通向这个远景的明确道路。

（四）这次代表大会是建成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开端。向党提出的问题表明，共产党必须存在下去。革命能否继续下去并得到顺利发展，将取决于共产党。

（五）新的中央委员会集中了一切有能力的党的领袖人物。

党现在已经建立了强有力的统一的集体领导。党现在有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同志们当然知道，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直到最近，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一个中央委员会——只是由少数几个同志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现在扩大为45人，其中31个中央委员，14个候补中央委员。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既有各地的实际工作者（上海、广东、湖南、哈尔滨），又有相当多的工人（15—16人）。代表大会的具体结果就是这些。

代表大会对党的今后发展会起什么作用，现在还很难说。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现在全党须要做大量的工作，在党的上层出现的低落情绪并没有波及到全党。党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前获得大规模的发展就清楚证明了这一点。上一次代表大会只代表5000

个党员^①，而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代表 57000 个党员了。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党内存在的消极因素并没有影响到全党。

我的报告带有一些悲观成分，也许带有我个人的一些情绪，但是它反映了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切。整个来说，党代表大会理解了党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虽然代表大会没有指出怎样具体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终究可以期望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取得胜利。

（录自《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之意义*

（1927 年 5 月 13 日）

罗 易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是在二年又四个月以前举行的。那时党还是秘密的组织，党员数目只 950 人；现在的第五次大会所代表者竟达 5 万余人。但是党的政治势力的增进比较党员数目的增加更为迅速。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是建筑在全国工农群众上的；在政治舞台上，他是很重要的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在共产国际历史上是空前的伟观。因为他是在英勇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代表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并曾经举行数次武装暴动。再者中国共产党同时领导农民群众反抗封建的压迫和宗法反动的势力。在大会举行前两月，中国共产党被中国

① 原文如此。

* 罗易写的文章，载《国际新闻通讯》，第 17 卷第 41 期，1927 年 7 月 14 日，第 909—910 页。——原编者注

这个文件曾刊登于《向导》周报第 195 期，1927 年 5 月 8 日，此次未重译。——译者注

国民党邀请参加国民政府。这就是表示共产党地位的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为全国所承认。在过去，无产阶级只为革命而战斗而牺牲，现在参加政权，共同负担责任的时候已经到了。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决议案所指示，允许参加劳工部及农政部。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中，这两部都十分重要。所以共产党不仅变成一个公开的影响政治环境的广大的群众党，并且已经参加政府机关，以促进革命的进展了。

蒋介石等大资产阶级脱离革命后，国民党内部的冲突因之减少，国共两党的关系比从前更加密切，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遂因之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之一部也随着这个同盟向前进行。无产阶级就是推动这个同盟的骨干。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改善，联席会议的组织就是一个证明。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有几个基本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当大会召集的时候，革命的中国已处于帝国主义干涉恐吓之下，反革命的联合因帝国主义的鼓励和帮助，组织起来，准备阻碍革命的进展。结果，革命战线中，甚至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发生恐慌。全部革命正需要明晰的观察与坚决的指导，以防止悲观与失败主义的发生，并且要求一个前途的指示，使革命势力以英勇的精神渡过目前严重的困难。第五次大会的使命，就是指示革命的前途，供给一个观察明敏的，坚决勇敢的领袖组织，以领导在这严重时期中的革命运动。此次大会已经完成这个使命，并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骨干。因为现时的革命仍建筑在数个阶级的联合上，无产阶级不能单独指导革命，不过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势力，只有他可以并且能够保障革命的前进，使他不至于摇动，或走入歧途。所以无产阶级并非革命的唯一指导者 Leadership，不过他在革命斗争中执行领导权 Hegemony 罢了。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的重要职任是给现在的环境以正确的估计，根据此估计明确规定革命的前途，与以勇敢的指导。第五

次大会关于革命势力在此时期之升降问题，已经明白答复。以无产阶级的观点分析过去及现在政治形势，第五次大会绝对否认：“因大资产阶级脱离革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吓等原因，会使革命运动停止或降低”的理论。实际上，这种事实不但不能阻碍革命，反能促进革命，因为大资产阶级脱离后，革命的势力完全建筑在被剥削的各阶级身上；他们为保障自己经济政治的利益起见，决不能和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妥协。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必须坚决地反抗帝国主义和他的工具才有出路。在此斗争中，全部无产阶级的精力可以磨砺起来，使革命的基础深入，促进他的发展，保证他的胜利。

大会又指出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的干涉及大资产阶级等新构成的反革命势力，以保障革命。欲领导革命按照大会所规定的方针进行，我们必须坚决地信赖群众的势力。因为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都已反对革命，在此阶段之中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地决绝地攻击反革命的根基，特别在国民政府治下，更应当做这项工作。所以第五次大会郑重声明：此时的国民革命必变成土地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受军阀及其他反动派的帮助。军阀及其他反动势力的基础建筑在带封建的政治经济基础上面。大会决议以全力领导农民向封建势力斗争。我们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农民要有政治及军事的力量，以取得大地主所占据的田地。在执行此决议上，大会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农民从事土地革命，以保障反帝国主义的胜利，使全国的经济自由发展。

现时的阶段中，农民革命是革命运动中的特殊现象。国民革命军所在的地域，农民运动都有伟大的发展，有几省内，农民协会的组织变成最大的势力。农民正在解除反动派的武装，而武装自己。他们自己正在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他们确已实行反抗运动了。此种情形反映到大会，大会经过熟虑之后，决议领导农民从事斗争，并领导少有田地的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

大会的第三个重要决议，是关于革命政权的性质问题。大会看出在无产阶级领导权之下的革命，必须筑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现时革命的国民政府就包含着民权独裁制的原素。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以下各级机关，更能保证国民政府的民权独裁性。大会也不忽视小资产阶级之中有一部分犹豫怀疑的分子，并认为欲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同盟，必须努力去掉这些犹豫和怀疑。

大会开幕时国民党领袖亲自参加，并宣布他们巩固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当国际代表报告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时，汪精卫同志亦曾到会。他对国际代表的报告，表示完全同意，并认为小资产阶级必与无产阶级同向社会主义的方面前进。

第五次大会历史的意义，是在他能将革命要如何向破坏资本主义的方面进展，告诉给无产阶级和他的同盟军。中国革命如果让资产阶级指导，势必将中国局面造成适合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而消灭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证明以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中国革命，必能超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最终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在此处占优越势力）。所以第五次大会，不仅在中国，即在世界亦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敢说中国共产党之第五次大会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上的一个新标界。

1927年5月13日^①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① 罗易这篇文章发表在1927年5月8日出版的《向导》周报上，但文章后面所注日期为1927年5月13日，而英文本上所注日期则为1927年5月10日，日期上的这种矛盾，有待查证。——译者注

八、大革命紧急时期的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和 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

(1927年5月24日)

罗 易

每当我们谈论国共关系的时候，人们总是惊恐不安，似乎国共关系有破裂的危险，这是没有必要的。现在不存在破裂问题。因此，在我们的这次谈话中，对这个问题可以搁置不谈。如果人们总是为关系要破裂的思想所影响，就不可能毫无成见地讨论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目前，必须留在国民党内，这决定了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在最近撤出国民党的任何建议必须予以否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而这个革命的纲领现在尚未完成。在国民革命的现阶段，为了加强左派，为了帮助它，鼓励它同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作斗争，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

但是，共产党人在承认同国民党合作的必要性时，还应看到随着这些关系产生的困难，看到国民党内有人明显地反对共产党

* 可能是罗易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和建议。——原编者注

的事实。应该预见到这些困难。蒋介石的脱离不等于完全除掉了国民党内的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把整个武汉集团都看作左派是错误的。相反，共产党在蒋介石分裂后还留在国民党内的目的之一，是要加剧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之间的分化。共产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策略目标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现在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看来充满着如此难以克服的困难。

蒋介石分裂后，我们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评价是不正确的。所以，没有预料到目前产生的困难。有一种机械的看法认为，所有封建资产阶级分子都已脱离革命，国民党已成为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民主政党，因此，预料一切事情都会顺利进行。如果国民党的阶级成分果真是如此单纯，那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应该有开展更多的工作的机会。既然国民党内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代表都已完全排除，那么国民党内的阶级矛盾就应该已经解决。但是，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转向反对革命，但它们的代理人依然留在国民党内，并继续担任领导职务。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是由这些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所组成，他们对国民革命抱有公开敌对的态度。国民党的内部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它的党员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它的基础和活动领域是民主群众。但是国民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却主要由封建资产阶级领导人组成，因此，国民党的领导并不代表、也不能代表其广大党员和拥护它的群众。

目前共产党遇到的困难，不是来自同国民党本身的关系，而是同国民党领导的关系。在确定同国民党的关系时，如果能记住这一点，那么问题就可以更容易地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不应决定于同国民党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而应决定于利用整个国民党作为发展革命的工具的必要性。

我并不提议在国民党内实行政变，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使国民党摆脱现有的领导。但是要马上实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现在，提出“打倒国民党现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口号的时机尚未成熟。最后，国民党或者将摆脱它现有领导，或者不再成为国民革命斗争的机关。共产党应当帮助国民党除掉其反动的领导人，这项工作可以通过帮助和加强可靠的左派成员来完成。国民党现任中央委员会不只是共产党的敌人，它并不代表组成国民党左派的社会基础的那些阶级的利益，它正在准备背叛这些阶级，背叛国民革命。共产党必须唤起代表国民党的党员群众和一切拥护国民党的人制止这种危险。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担任政府职务和安排联席会议的事实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之间的有力合作也应该贯彻到地方组织的群众中去。当左派在党的地方组织中占据优势并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时，国民党的领导就会感到其压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必将遭到和革命群众有密切联系、并得到群众拥护的全党的反对。这时，要推翻伪装国民党左派、篡夺了党权的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代理人的现领导就容易了。总之，国民党应从基层而不是从上层得以重建，国民党必须民主化。在目前形势下，共产党的任务不是推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目前需要向群众揭露这些领导人的反革命倾向，需要帮助基层群众排除那些已经成为反革命阶级的代理人。

我们同国民党关系中的一切纠纷都出于同国民党领导人的关系，我们跟广大党员没有纠葛。最大的困难是从解决土地问题引起的。一个月来，我们就这个问题同国民党领导人不断磋商，力求制定一个共同纲领。最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竟然拒绝实行那些在过去决议中已经同意过的土地改革措施，这就导致了两党关系的危机。但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这种政策反映了全党的态度吗？不是。国民党湖北省农民委员会曾通过一个土地问题决议，这个决议得到了湖南和江西省农委的同意。国民党的地方组织提议将这个决议作为两党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在联席会议上提出的纲领要比这个决议更为激进。这证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

广大党员是团结的，也证明共产党和国民党现任中央委员会的冲突，是国民党领导和它的广大党员之间冲突的反映。产生这种不幸的原因，是国民党现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不代表现阶段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小资产阶级。如果中央执行委员会真正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没有理由产生摩擦，因为，封建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为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斗争中的合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形势。毫无疑问，小资产阶级要继续忠于国民革命，也必须准备战胜某些暂时的困难，克服若干传统的阶级偏见。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势必跑到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一边去，而那样做是同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背道而驰的。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唯一的小资产阶级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有的代表封建反动派，有的代表已经叛变了资产阶级。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这种组成状况，国民党内开始出现非常严重的征兆，就不足为怪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小资产阶级少数派受到了威胁，并开始向封建军阀资产阶级多数派的势力屈服。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动员国民党广大党员向反动的领导集团作斗争。形势已经改变，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方法也须随之改变。与国民党领导人保持团结只能造成背叛国民党广大党员的结果。目前的策略是同群众建立反对反动领导人的统一战线，这样的策略不会使我们与国民党破裂，相反，会巩固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联盟。国民党只有作为这个联盟的战斗组织，才能继续存在。

我们同国民党建立关系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目前我们同国民党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使小资产阶级更坚定地参加革命斗争，使他们脱离封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影响。如果我们同小资产阶级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就不能领导它们进行

革命斗争。小资产阶级群众就在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处于国民党影响之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产阶级要留在国民党内，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国民党作为革命民主联盟的组织机构。

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能否有一条独立的政治路线？如果它实行独立的政策，它能否仍然留在国民党内并吸引小资产阶级投入革命斗争？共产党是在保留政治独立权的条件下加入国民党的，但是由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观念，这个独立权没有实现，结果，党犯了严重错误。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重犯这样的错误，将使我们党和国民革命遭到覆灭的命运。

什么是政党？政党是某个阶级的有组织有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否则就不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尽一切努力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独立性，保护工人阶级利益是共产党政策的根本原则，如果共产党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妥协让步，它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同时，认为共产党只有在直接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时才能保持其独立性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是在不要求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共产党仍然可以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经过各个阶段，提出各种要求，投入斗争，争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在真正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国共合作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的一个阶段。因此，虽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工作，它仍然是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只有在共产党如果由于想减少同国民党的摩擦而不顾无产阶级利益时，它才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共产党能否依然留在国民党内而同时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如果已经不可能，那么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显然就必须改变。

保护无产阶级和全中国劳动群众利益应采取什么政策？应该采取发展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消灭国内反动派的政策。为了使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成为发展革命的工具，共产党人才继续留在国民

党内并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

国民党领导人反对共产党在一切情况下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权利，借以阻止革命的发展，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利益。他们号召工农忍受牺牲，以使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的利益不受侵犯；他们要农民屈服于正在猖狂反对国民革命的封建反动势力；他们要求工人阶级不仅不参加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甚至也不参加反帝斗争。他们命令外国企业中的产业工人不得罢工，只需把要求提交外交部，由外交部去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

工人和农民是否会听从国民党的这些要求，是另一个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在目前形势下发表了一个声明^①，宣布它在不断高涨的革命高潮面前有权充当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保护人。对国民党的这种立场，我们不能漠然置之，这样的立场必然影响同共产党的关系。

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推行的反对无产阶级、反对农民、反对共产党的政策的事实，我们不能再置之不顾。对于上述情况存在一种说法（有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应对此负责）。但是现在我们的任务不是为这种情况寻找解释，而是要认清目前形势，采取适当措施。

在目前情况下，回忆我们党在1926年“三·二〇”事件后所犯的错误是有益的。一年前蒋介石的叛变和目前夏斗寅叛变有许多共同之处。夏斗寅叛变虽已被击溃，但那种反革命倾向并没有消灭。在国民党的领导集团中就有这种倾向，并且日益明显。国

^① 5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公开反对工农谴责国民党分裂的运动。声明说，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运动削弱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工人不应参加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同时，还禁止在外国企业中的工人进行罢工。——罗易注

民党内夏斗寅式的人物正在促使国民党采取反对工农、反对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人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国民党除去夏斗寅式的危险。怎样做到这一点呢？不能采取向国民党领导人妥协的办法，他们之中大部分是拥护夏斗寅的主张的。我们只能更紧密地接近国民党广大党员，提醒他们要反对夏斗寅式的危险，帮助他们消灭这种危险，以完成上述任务。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如果不能把国民党转变成为工农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联盟的战斗组织，就将一事无成。国民党的领导不仅正在背叛工农的利益，他们所推行的政策甚至是反对国民党左派的社会基础小资产阶级的。如果我们迁就这些领导人的立场，那就是意味着我们承认他们的反对工农、反对共产党的政策。如果共产党人为了避免破裂，不去抵制国民党领导集团中反革命倾向的发展，那么，他们不仅不再能代表工人阶级，而且是在帮助那些破坏国民党使之不能成为国民革命机关的人。

在提出关于我们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草案之前，我想再谈一个问题。现在革命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国民党领导人所追求的把国民党转变为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组织，这样做必然会导致与已经离开国民党并反对国民革命的反动分子的重新合流。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将重新落到与帝国主义寻求妥协并依赖国内反动派的资产阶级手里。与帝国主义妥协就意味着革命的失败。这是一个前途。

另一个是为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前途。武汉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可以被认为是在这个方向中的一个步骤。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武汉政府不可能顺利地发展成为民主专政的机关，经验已经证明，在这条道路上存在着许多困难。应当认真考虑为建立民主专政要采取的第二步是什么？在这一点上，我只提出一个问题：怎样实现民主专政？直到现在，我们的策略主要是帮助小资产阶级左派取得政权，

这个政权也包括工农，从而建立三个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专政。经验已经证明，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条道路的正确性。难道我们还没有察觉我们现在正处在革命必须发展新的斗争方式和新的政权机关的时期中吗？民主专政的口号是1905年俄国革命时提出的，这个口号意味着夺取政权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其目的不是帮助农民取得政权，而是无产阶级必须（在农民帮助下）掌握政权，并以这两个阶级为基础建立国家。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目前应采取的策略。开始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而斗争，这就是我们为建立民主专政所必须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我们看到当工人阶级使小资产阶级有了权，如武汉国民党左派那样，小资产阶级并不与工农共同掌权，却把政权交到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军阀手里。我提出下面这个问题：要实现民主专政，通过现在有投降倾向的小资产阶级政权机关能完成吗？还是必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将其保留在三个阶级联盟的基础之上？事态的发展就是这样，在最近的将来这个问题必将得到回答。在与国民党继续合作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准备适应形势的和达到目标所必须的新的斗争方式和新的政权机关。应当继续与国民党合作，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有机会作必要的准备。如果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是出于任何其它目的，而对国民党领导人的社会声望和政治目的抱有任何幻想，就将使我们党趋于灭亡，使革命处于危险之中。

有的同志说，如果我们的要求超过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能同意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离开国民党。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在妥协和破裂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国民政府可能为工农作出一些改革的样子是一回事，共产党领导工农要实现的革命纲领完全是另一回事。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的要求不应也不能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规定范围的限制。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是以国民党领导人批准的要求为基础，他们就会使运动遭到失败。我们并不把我们的纲领强加于国民党，国民党也不应要求

我们不履行共产党人的职责以证明我们的忠诚。我们的关系必须决定于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是由党的代表大会确立的，现在的任务是把它运用到具体情况中来。第五次代表大会给党提出了三项基本任务：

1. 发展土地革命；
2. 加强工人运动；
3. 争取小资产阶级。

第五次代表大会还指出，在与封建反动势力作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同时，应中立小资产阶级。我建议共产党发表一个声明，说明如何实现这三项任务。宣言应说明怎样使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在不妨害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得到发展。

共产党并不要求国民政府发布没收土地的法令。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这样做，对国民党是个考验。国民党领导人说他们仍然忠于国民党的土地纲领，但由于所有封建地主阶级出身的军官的反对，他们不能立即实现这个纲领。

共产党人开展土地革命是不利于那些企图破坏国民党的封建地主和军阀的。如果国民党领导人真的忠于国民党的土地纲领，他们就不能反对农民自己起来实现这个纲领，否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是国民党的叛徒。

我们党将以这样的政策表明共产党并不违反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反，这表明我们力求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而与国民党的敌人和国民革命的敌人作斗争。

共产党的国民革命纲领确实是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如果我们明确提出我们的纲领并坚决予以实行，那么，小地主可以中立，与城市小商人冲突的根源可以消除。如果共产党能按照我即将提出的决议行动，就可以保证得到国民党广大党员的拥护，国民党的封建资产阶级领导人和小资产阶级党员之间的对立将更为

加深。最后，国民党将摆脱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代理人的统治，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联盟的战斗组织。共产党在执行这样的政策时，并不准备与国民党决裂，相反，国民党将从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控制下解放出来，它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强大，它将证明它能够领导国民革命。

我建议以我们党的名义发表一个关于我们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声明，下面是这个声明的草案：

1. 在革命的现阶段，国共合作仍是必要的。

2. 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以下述条件为准则：(1) 发展民主力量。(2) 对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目的在于首先孤立他们，然后迫使他们出党。(3) 由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左派掌握领导权。(4) 保护工农利益。

在土地问题领域内：

1. 区和乡立即建立民主政权，权力必须归代表会议。代表应由农会及其他人民组织选举。农会的代表应占代表会议代表的70%，这是高度民主的措施，因为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

下述人员取消选举和被选举权：(1) 土地应予没收的大地主；(2) 土豪劣绅；(3) 旧官吏。

2. 武装力量（正规军除外）的管辖权必须在内务部监督下交给区和乡的政权机关。

3. 为农民代表举办军事政治学校，训练新政府的行政人员和农村民兵干部。

4. 组织属于农村政权机关的土地委员会，由农会、地方政权机关、民兵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所组成。土地委员会的职责是：(1) 确定要没收的土地；(2) 强制没收属于大地主、寺庙、教堂、资本家公司等土地；(3) 分配没收的土地；(4) 确定土地税和地租额。

5. 小地主的不没收的土地，地租减半；国家对没收的土地所征之税也要降低。

6. 制定法规以抑制高利盘剥。取消农民的债务。

7. 废除各种名目的税收，只收单一的土地税（对没收的土地）和降低租额（对未没收的土地）。

8. 建立农业信用银行。所没收的公地和祠堂庙宇的土地，应当为信用贷款业务提供基础。

9. 组织生产和消费合作社。

10. 休闲地的规定。

关于工人运动，我们的最低纲领是：

1. 制定下述内容的劳工法：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额、劳动条件、保护女工童工、工厂检查、工人管理、保健和教育。

2. 帮助失业工人的实际措施。

3. 建立工厂委员会保护劳工，工厂委员会不管生产。

4. 工人有罢工权利，废除强迫仲裁。

5. 总工会要防止以任何（随心所欲的）理由停止工作。

6. 国民政府应占有和经营那些由于工厂主拒绝满足工人要求或拒绝向国家交纳税收而关闭的工厂。

7. 工会不得行使逮捕工厂主的权利，一切控诉提交劳动部^①所属仲裁法庭，他们有权逮捕和惩罚有过失的厂主。

8. 工会有权逮捕和惩罚工贼。

9. 工人武装纠察队将组成部分属于内务部^②的民兵，当地民兵队长与工会协同管理武装纠察队。

10. 童子团组织（工校学生）应处于总工会严格管理之下，并

① 劳动部长是共产党员，他能决定仲裁法庭的成员。——罗易注

② 这时的内务部长是共产党员，对警察部队有最高管辖权，并因其所担任职务，有权任命、使用或解除民兵队长的职务。——罗易注

制止他们干涉企业管理。

关于小资产阶级，共产党将按5月13日决议执行。

1927年5月24日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给中共中央的信（节录）

（1927年5月）

（一）

现在国民党对内政策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农村中的全部政权归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为口号，在各省尤其是在广东有系统地扩展土地革命。**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就在于此**^①。在中国建立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大军的基础就在于此。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否则就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

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必须在蒋介石的后方及其部队中加强瓦解工作，援助广东省起义的农民，那里的地主统治是特别难以忍受的。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着重号已改黑体字。——编者

(二)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①。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对谭平山的巡视产生顾虑是有某些根据的。不应该脱离工农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它，否则就会把事业断送。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5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着重号已改黑体字。——编者

(录自《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32页
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 策略：防御还是进攻？*

(1927年6月9日)

罗 易

陈独秀以乐观的语气向我们谈了形势，但我们不需要幻想。

唐生智决定把军队调回汉口，不是为了保卫国民政府防止反革命进攻，也不是为了跟湖南的反革命作战。我们知道，当夏斗寅背叛国民政府时，唐生智经常同他接触，吹捧他是“为人民事业战斗了八年的革命者”。他对于长沙叛变的动摇和暧昧态度也是众所周知的，他力图使湖南的反革命合法化，这对人们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他手下的军官都拥护蒋介石集团，他不敢反对他的军官们。同时，他知道长沙叛变是受南京指使的，他也知道他的大部分军官都同情蒋介石。所以，他不能完全同意那些间接削弱他的权势和地位的措施。当他在湖南的权力和地位的基础本身受到威胁时，他就不敢再向北进军了。当土地革命在湖南老家发展起来时，他的军官们也不愿继续同张作霖作战。

此外，唐生智从一开始就不愿向北进军。现在情况已很清楚，他要向北进军就必须听冯玉祥指挥。但他不愿这样作，他不愿为冯玉祥火中取栗。因此，他撤回军队，以便巩固他在两湖的地位。如果只派四军和十一军去，他就同意进攻北京的联合战役。但冯玉祥要求更多的军队，四军和十一军如此单薄，只靠他们是不足以实现冯玉祥征服北京的梦想。当四军和十一军为了立即进攻

* 大概是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发言。——原编者注

北京，按北伐前通过的决议而决定回防武汉时，唐生智就开始迅速行动。当他的部队还在北边时，他不能允许四军和十一军回到武汉。在那时，唐生智虽表现为“左派”，但这不应使我们产生错觉。他当时进退两难：一边是冯玉祥，另一边是蒋介石。唐生智不属于这两个集团。因此，他想通过扮演左派的角色，率领第三种军事联合力量，力求主宰局势。唐生智之所以拒绝参加联合进攻北京，是因为他如果参加，他就要承认冯玉祥的领导。而回到湖南，则能维护他独立的政治地位和扩大他在两湖的权力。他的军队的到来，不会帮助革命，相反只能增加反革命的危险。

因此，我不能同意陈独秀的乐观估计，即认为八军和三十六军的回防会造成力量的平衡和取消三十五军在两湖的垄断地位。我们不应被唐生智关于长沙政变的公开声明所欺骗。事实是当许克祥策划 1700 人叛变时，国民政府和唐生智都没有去阻止它。唐生智的左派言词不能掩盖这个事实，他只是以这些词句欺骗群众。共产党应注意不要使群众受虚伪欺骗的影响。必须揭露唐生智和夏斗寅叛变同许克祥叛变的关系，他对两湖反革命行动应负的责任不亚于他的军官们，必须向群众说清这一点。任何关于目前“局势平静”（陈独秀的估计）的乐观论调只能在共产党内滋长调和倾向，相信唐生智的“左派”言词就是背叛群众。

当唐生智军队中的军官在湖南湖北变得如此猖狂反动时，这支军队回到汉口并决定留在这里进行一个月的休整，是非常危险的迹象，我们不应无视这个事实。唐生智本人承认他不能替他的军官们担保。对目前形势应作如下估计：反动派不仅正在军队中，而且也在现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加紧活动，必须按这个观点决定共产党的策略。

把现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称作左派是个错误。现在国民党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向工农运动发动总攻，它正在准备公开反对共产党，它正在暗中支持直接反对工农运动、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

暴动。现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已把他们在湖南的政权完全交给了反革命军官，湖北省只有四分之三的地方还在武汉政府控制之下。

唐生智进攻蒋介石的意图完全是出自个人考虑。他的军官们不愿意打蒋介石，他们更多地赞同南京，而不赞同武汉，他们中的某些人事实上同南京集团有联系。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武汉的所谓左派集团同南京没有多少差别，现在他们都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利益。小资产阶级左翼害怕革命，并投降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反动分子。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决议和声明与南京的宣言同样反动。在这些情况下，客观上产生了一种妥协的倾向，如果不是同蒋介石个人妥协就是同南京妥协。为了保全面子，甚至也可能抛弃蒋介石。但是，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在向反革命方向发展，这一事实就是目前形势的根本意义所在。

武汉想要消除蒋介石所造成的分裂局面。但这只有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土地革命的更高阶段时，才有真正的政治意义。然而武汉集团是无意于推进土地革命的。因此，它必须或者解决它同南京的政治分歧，或者退出政治舞台。过去武汉国民党要人要在北京庆祝统一的恢复。在反对蒋介石方面他们过去叫嚷得太多了，如果没有一定的事先准备，是不可能同蒋介石集团重新联合的。这出戏必须演得不露破绽。但由于唐生智的阻挠，北京计划没有实现。现在，武汉国民党要人想到南京和上海去以便在那里实现统一的愿望。他们提出到南京去不是为了打蒋介石，而是为了把革命出卖给资产阶级。打南京的军事计划纯粹是个骗局，人人都知道所有武汉军队（除四军和十一军外）的军官都反对打蒋介石，这些军官事实上正在同蒋介石和南京集团进行协商，如果武汉政府不向反革命势力彻底投降，就把它推翻。

我们的“同盟者”把计划对我们保密，却透露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几天前，徐谦告诉日本联合通讯社说：占领北京后，

就没有理由阻止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和解。这不仅是同蒋介石和解的问题，也是个背叛革命的问题，即把政权拱手让给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达成交易。

武汉政府除非反对工农运动，断绝同共产党的关系，否则它就不能赢得上海资产阶级的欢心，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但目前，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本身还不能对工农运动发动公开进攻。他们正在设法瓦解工农运动，并破坏它的革命性，甚至企图使共产党陷于瓦解。当武汉国民党阴谋反对共产党，怂恿并参与反革命军官反对工农运动的时候，它还邀请共产党人投入它友谊的拥抱哩！如果共产党人识不破这一点并保持沉默，国民党就会允许他们担任部长、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但如果共产党人要求国民党保护工农利益，约束反革命军官的行动，并同背叛国民革命的行为作斗争，那么武汉国民党要人就会像蒋介石、李济深和其他军阀那样对待共产党人。对这一点不应存在幻想，情况确是如此，不能再拖延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政策呢？

在共产党面前有两条道路：防御或者进攻，退让或者反击。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能退让吗？能采取防御政策吗？防御政策意味着投降国民党，任其摆布，意味着我们不是共产党人，充其量不过是挂名而已。国民党要求的恰恰是从实际上取消共产党和工农运动。他们要求“纠正”过火行为，而我们愈“纠正”，他们就愈得寸进尺。让我举例说明共产党在纠正“过火”问题上已走得多么远。共产党为了同国民党（这个国民党已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完全支持军阀的血腥行为）保持友好关系，正在同意取消群众运动，我们党正在着手“纠正”过火行为，但却没有弄清事实上有没有过火行为发生。在目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当鼓励和发展这些“过火”行为，而不是“纠正”它们。国民党指责为“过火”的工农运动和陈独秀谴责为“幼稚的骚乱”的这些行动是什

么呢？事实上，这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难道我们为了赢得封建地主军阀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欢心，就应当限制这些行动、“纠正”这些所谓“混乱”吗？难道共产党应该在革命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背叛工农，而与已公开成为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保持联合吗？不！同志们，共产党不能这样做。共产党必须全力支持正在夺取土地、剥夺地主高利贷者和土豪劣绅财产的农民。党必须率领农民，建立恐怖政权，消灭农村中的反动势力。共产党应提出“农村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整个农村应燃起扎克雷起义^①的烈火。反动派已向工人阶级宣战，我们必须应战。必须以恐怖对付恐怖。必须消灭封建反动势力的基础及其军事表现形式军阀主义。无产阶级被国民党指责为“过火”的行动，其实在同反对国民革命的反革命阴谋作斗争时，是必不可少的。

国民党指责农会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他们诉说农会的领导人都是痞子^②，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农民。他们正在散布农会无法无天的可怕传说，并以“保卫”国民政府的名义要求共产党共同镇压这些行动。让我们看看事实：在湖北黄冈地区，针对所谓“过火”行为，发生了“一场大动乱”，结果，那里的农会被解散了。支持农会活动的国民党县委也因违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而被解散。省政府派一个代表（共产党员）到那里去执行

① 1358年法国农民反对贵族的起义，扎克雷是封建贵族对农民的贱称，起义由此得名。于是也成了—般农民起义的统称。——原书编者注

② “痞子”是对那些无地和经常失业的农村贫民的称呼，他们是农民中最受剥削的阶层，所以是农民运动中最积极的分子。国民党说：就是这些无地的“痞子”而不是农民在共产党煽动下要求没收土地。中共中央趋向于接受这种说法。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大多数农会会员是雇农，一般来说，农会的成分大致65%是佃农（小农和—般农民），15%是自耕农，15%是无地贫民和5%的其他成分（小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等）。——罗易注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改组国民党地方委员会和农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农民部也派了一个同志到该地去调查，昨天这个同志回来作了下述报告：

关于“过火”的整个传说是个谎言。没有一片烟叶遭受损害^①。农会会员大多数是佃农，没有几个“痞子”。没收土地的事情只有四十起，所有这些没收都是严格按国民党的决议进行的，革命军官和小地主的土地均未触动，只没收了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分子的土地。

我们农民部的这位代表弄清楚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以虚假的情报为基础的，就向省府代表（共产党员）建议，不要执行国民党的指示，并电告汉口说，整个报告与实情不符，必须改变决定。但省府代表拒不接受意见。因为不仅是武汉政府，还有陈独秀本人也命令他执行国民党的决定。

关于“过火”的一切传说都是欺骗捏造。如果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合作，去纠正这些并不存在的“过火”行为，就只能帮助反革命取消农民运动。这种取消倾向在工人运动方面也同样存在。国民党正在要求工会进行所谓自我约束，限制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活动。

有一种理论认为在目前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党没有能力抵抗和打倒反革命，党必须转入地下若干年，以准备将来为政权而斗争。这是一种有害的理论。只有在与反动派斗争的过程中，党才能进行为政权而斗争的准备。我们党很年轻，在组织上还很弱，它没有一个地下机构。如果党不进行一番战斗突然转入地下，就会在实际上被消灭。相反，反革命的坚决反抗将使我们的党在政治

^① 6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解散黄冈地区的国民党委员会和农会，因为农会会员破坏了一百个烟草种植场，因为国民党地方委员会违反中央委员会指示，批准农会没收革命军官和小地主的土地。——罗易注

上和组织上巩固起来。这种“准备”的理论并不新鲜，其它国家也有，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如果我们真的要为工人阶级的胜利进行准备，党就必须开始战斗。在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有些疏忽行为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不参加革命斗争就不能使工人阶级百分之百地作好准备。如果共产党现在成为退让理论的牺牲品，如果它采取防御策略，革命的领导权就会被资产阶级所篡夺。结果会造成同帝国主义的妥协和国民革命的暂时失败。国民革命的失败将成为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它将对苏联的地位产生影响。因此，共产党在这关键时刻的决策，具有国际意义。帝国主义国家正在准备进攻苏联，从洛迦诺开始的对苏联的敌意包围，已有计划地进行了两年之久。近来，反苏政策已采取了公然挑衅的方式，对苏联大使馆和领事馆接连进行袭击，英国正在断绝外交关系，一个苏联大使在波兰被杀。每件事都可能引起对苏联的战争。如果帝国主义成功地在中国重新树立其地位，则包围苏联的计划就将完成。

在这种危险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而临的任务是清楚的。没有两种选择。不能提出是退让还是前进的问题。只有一条道路：我们必须进攻，我们必须战斗和胜利。这不是冒险的策略，这个策略是客观形势决定的。由于中国已发生的情况及其与国际形势的关系，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进攻的策略。共产国际指示的意思，是中国工人阶级必须战斗和胜利，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工农进行革命斗争。如果我们在中国遭到失败，就可能在全世界被打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也将受到威胁。

是不是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强加了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呢？不。这个新指示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通过的那些决议的具体表现。目前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民主专政，没收土地以消灭封建主义，实现铁路和重工业国有化，借以摧毁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不进行斗争能实现这些任务

吗？中共第五次大会在通过共产国际提纲时已责成党进行这样的斗争。过去半年中情况的发展说明共产国际对形势作了正确的估计，为革命发展指出了正确的前途，并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目前情况下应进行的革命任务。

能不能说，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进攻，他们的胜利就有绝对保证？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没有一种革命斗争在其开始就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革命策略的确定，不能也不应以担心失败为转移。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并没有百分之百胜利的可能性，但胜利的可能性大于失败的可能性。工人阶级目前的处境是党过去的错误造成的。反对我们的力量是在与日俱增，原先顺利的情况越来越变得对我们不利。所以，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党应同传统的错误决裂，它应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并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使革命免遭失败。

第五次大会对过去党领导的政策提出了指责。以形势对我们并不百分之百有利为借口而采取退让政策，将使过去的机会主义仍留在党内，只是形式不同和更加危险而已。在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中所犯的根本错误，是关于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问题。如果不纠正这些错误，我们党就将灭亡。如果党不仅在决议上（如五大通过的）、而且也从实际上摆脱这些错误，就会提高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如果说由于过去的错误，使我们党在目前革命危机中处于并不完全有利的地位，那么也应看到目前同时存在着积极的一面。有力的客观因素正在对我们党发生有利的影响。只要斗争不开始得太晚，这些因素都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发展，并将促进最后的胜利。所有国民政府所属地区的群众都准备投入斗争。正是群众这种不断增长的、为革命而斗争的愿望和意志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危机。这种因素的继续发展，将把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领导人推入反革命阵营（他们本来就属于这个阵营），而一个真正革命的政权，即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民主专政将建立起来。群众要斗争，共产党应当领导他们。湖南农民已举起土地革命的大旗，湖北、广东、江西的农民群众也正在起来。反动派正在对农民施加压力。共产党面对应尽的责任还能有丝毫犹豫吗？不能！共产党必须站出来领导土地革命。在这种时刻，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问题已失去其政治意义。

如果国民党转面反对革命，共产党就不应怀疑同国民党破裂的必要性。破裂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工人阶级处于反革命的枪口之下，共产党能够为了同国民党保持联系而背叛工人吗？

但是，在湖南以及在整个战线上转变为进攻，不应理解为必须立即跟国民党破裂。在革命的现阶段，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因为它代表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而国民党现中央已不再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因此，同国民党现中央的友好关系，不再能作为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组织形式。相反，小资产阶级群众应摆脱那些为了帮助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而背叛他们利益的领导人。这个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来完成。驱逐这伙国民党头头的必要性与日俱增，这伙人是为反动封建资产阶级服务的，他们利用小资产阶级群众政治上的落后，篡夺了对他们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必须揭露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投降封建军阀反动派、听其摆布的事实，并取得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领导权。将来同他们的合作要在这些新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这就是说，国民党必须改组，共产党只能同改组后的国民党（真正代表小资产阶级群众）继续合作。共产国际向共产党指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

在当前形势下，共产党的迫切任务是什么？

一、在军事方面：冯玉祥提出的武汉军队参加联合（冯玉祥、蒋介石、唐生智）进攻北京的作战计划必须否定。共产党必须发

动对南京的斗争，必须采取紧急步骤收复广东。

二、建立一支由我们领导的真正的革命军队。所谓国民革命军既不是国民的也不是革命的。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工作方法应当改变。国民革命军已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因此，我们必须瓦解他们。这应当成为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活动的目的。应该在士兵中间进行革命宣传，提出土地革命口号，以激发他们起来反抗封建军官。要改变国民革命军的性质，就必须采取这样的策略。同时，还必须在同湖南和其它各省的反革命作斗争的过程中，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必须广泛地武装工农。

三、共产党要发动湖南农民暴动。必须推翻长沙的反革命军官集团，必须没收土地，必须摧毁土豪劣绅的权力，必须解除民团的武装，土地革命必须从湖南铺开到周围各省，尤其是湖北、广东和江西。

四、改组国民党。改组运动不能以要求推翻国民党现中央开始，我们必须从基层开始。应动员地方组织同中央委员会作斗争。这个任务并不困难，因为大部分国民党的地方委员会是在共产党控制之下。拥护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必须源源输进国民党的地方组织；这将为推翻国民党现中央、为从国民党中驱逐反革命的封建资产阶级军阀分子造成广泛的革命的社会基础。在组织准备没有完成之前，共产党不提推翻国民党中央的口号，但应公开批评它反对劳工阶级的政策。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大概需要三个月时间），则需要召开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将要解散反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并把国民党变成民主专政的有力机构。

五、立即征服广东。武汉反革命势力的影响已非常强大，最可靠的军队要从这里撤离。在我们控制下和在同情我们的革命军官控制下的军队，必须派往南方，回到广东。在武汉这种反革命气氛中，四军和十一军会变得反动，必须把他们派到南方。在征服广东的过程中，要发展一支自觉的革命军队，如果我们在武汉

失败了，广东将成为革命的基地。

以上就是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些任务，革命就可以挽救；否则，就将遭到失败。这不仅对中国是个灾难，对我们在全世界的地位也是不利的。

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导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严格执行。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讨论上。共产国际决定每个支部的行动不仅以各国的国内形势为依据，也是从世界形势的观点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成员，必须按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

共产国际发出指示不是没有理由的，不是如某些同志断言的是以错误的情报为基础^①，而是对中国和国际形势作了详尽研究的结果。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怀疑领导的正确性，共产国际在回答中甚至以更坚定的口吻重复了同一个指示：共产党必须领导土地革命向前发展，任何限制土地革命的企图，只会招致失败，使我们失去一切。

既然如此，对共产国际指示是否正确的任何进一步讨论都是多余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忠实的有纪律的成员，必须按指示行动，这是世界革命总参谋部的命令。中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执行总参谋部的命令。这就要求党实行军事化。当反革命势力向工人阶级猛烈进攻时，政治局不应停留在争论不休的讨论之中。政治局必须成为战场上的军事指挥部。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具体任务，我们已接到了命令，必须动员我们所有的力量执行这个命令，实现这个任务。

^① 政治局的某些委员不同意共产国际指示，说这些指示是以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中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为基础的；陈独秀代表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电报，才是对形势作了“正确的估计”。——原编者注

现在，我谈谈指导我们目前行动的具体计划。

共产党在给国民党一封公开信中提出了六点要求，这些要求是正当的，提供了在国民革命纲领基础上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一个星期过去了，国民党甚至不予回答^①。这种情况不能再容忍下去，我们必须立即开始动员群众支持这些要求。我们应向国民党表明，共产党不是几个人的小组，而是整个阶级的政治组织，这些要求是代表劳动者（工农）提出的。我们必须动员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来支持这些要求，并坚持实现这些要求。这个运动将使国民党调和的、反革命的、反劳动人民的政策暴露在群众面前。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将从不忠实的小资产阶级手里转到无产阶级手里。

公开信发出后，江西曾发生了几起事件。在我们的宣传鼓动中，也应包含同这些事件有关的要求。我具体建议：

一、星期一宣布总罢工。几天前我就提出了这个建议，这件事不能再拖延^②，“立即实现公开信中六项要求”的口号，应补充

① 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接到共产党的公开信后，决定完全置之不理。只有汪精卫认为信中提出了群众要求，国民党应满足这些要求。汪精卫的意见被接受了，委托谭平山（共产党员）和陈公博（以前是共产党员）起草回信。同时决定共产党的信和国民党的答复一起发表。但结果共产党的信在党的机关报上印发，而国民党的复信是6月15日接到和发表的，不能确定复信的作者是谁。——罗易注

② 在共产国际代表建议下，政治局决议宣布总罢工，支持致国民党信中所提出的要求，但这个决议没有执行。问题被提交政治局重新考虑。不仅是政治局委员，也包括出席会议的工会负责人一致反对总罢工。主要理由是在目前这种危急形势下，实行总罢工意味着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宣战。最后，中华全国总工会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同志提议发动群众游行欢迎政府领导人从前线回来，以这个游行来达到支持公开信中所提要求的目的。全体一致支持和通过这个建议，唯共产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即在政府领导人回来之前发动群众示威游行，而在他们到达的那一天宣布总罢工，此议同样被否决。欢迎国民政府领导人——“国民革命军的英雄”的群众集会组织了，但总罢工和兵工厂罢工均未举行。——罗易注

同江西有关的下述要求：1. 立即召回被驱逐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2. 开放工农运动；3. 免去朱培德职务。

二、星期一在汉口、武汉和汉阳召开群众大会，通过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立即满足上述要求的决议。

三、党必须给这些会议指派讲演人，并对他们的讲话要点给予详尽的指示。也必需有尽可能多的无党派的工农发言人。

四、如果不立即满足这些要求，就提出汉阳兵工厂举行罢工。兵工厂工人应公开宣告：当这些军队到处屠杀我们的工农弟兄时，我们为什么要生产军火供应他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要工人牺牲，但我们不愿为反革命牺牲自己。

五、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农会必须通过完全支持六条要求的强硬决议，并坚决要求立即付之实现。全国各地的工会和农会都应有类似的决议。

六、应立即派遣 50 名同志到江西去担任被驱逐的共产党人的职务，他们应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鼓励和组织农民暴动。他们不应害怕“过火”，这些“过火”行为不应“纠正”，而应鼓励。应对朱培德军队中的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

七、在湖南，共产党应站在农民暴动的前面。关于这一点曾通过许多决议，但实际上工作甚至尚未开始。通过的决议必须实行。

为了回答对我的建议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和异议，我再作下述附加说明：兵工厂工人必须参加为期一天的总罢工；同时，如果拒绝实现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他们应提出继续罢工。在目前情况下，由于有大量失业现象存在，罢工时间不能拖长。但兵工厂内的技术工人是不易取代的。在战争激烈的时候，政府不能允许兵工厂不进行生产，兵工厂罢工是最有力的威胁。

陈独秀说对待总罢工和兵工厂工人罢工问题要非常谨慎。他准备同意召开群众大会。在他看来，我们既不需退让，也不需前进。他认为可以找到一条中间道路，那就是重复过去的纵横捭阖

的外交政策。陈独秀害怕总罢工，尤其怕兵工厂的罢工会发展为公开战斗，工人会被杀害。但是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已经开始，农民群众正在被屠杀，工人正在被解除武装，他们同样正在被杀害。如果工人阶级不起来反抗反革命的进攻，如果他们不使这种反抗发展为反攻，他们就将被压得粉碎。我所建议的总罢工和兵工厂工人罢工，并不是抗议示威，罢工应成为对反革命公开斗争的开始。事已如此，共产党必须领导无产阶级起来反抗。

陈独秀认为，采取进攻策略不一定表示我们必须走极端，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进攻必须逐渐开展。首先，我们必须从发动工人阶级反抗反动派的进攻开始。但我们不能也不应在刚开始时就停下来，反抗必须发展为进攻。我们党通过的总政治路线将导致一场公开的斗争。我们坚持反对蒋介石的斗争。这个斗争意味着什么？是反对个人或一个集团的斗争吗？不！这个斗争意味着我们正要与蒋介石和南京集团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军阀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在革命的现阶段，无产阶级正在同反动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和军阀进行斗争，因此，同武汉国民党的斗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目前的方针是跟反革命阶级和解。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没有结束之前，我们不能同国民党妥协。同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斗争的客观需要，必然促使无产阶级与武汉国民党中已经夺取政权而且依然把持不放的这些反动势力的代理人发生冲突。因此，在退让和前进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共产党必须是：或者将通过的总政治路线坚持到底，达到其合理的结局，或者完全否定它。

李立三同志仍抱有许多幻想：一、他提出革命形势可以在商会帮助下形成，但国民党正在商会压力下打击雇员，解除纠察队武装，解散童子团。二、他认为可以采取说服的方法使国民党更

加左倾。三、他希望朱培德^①在群众压力下会成为革命者。革命形势不能由议论造成，它的出现只能是革命斗争发展的结果。确实，革命浪潮正在低落，原因是因为执行了错误的政策，由于希望能有机会与国民党进一步谈判而限制了群众运动。必须加强宣传鼓动；必须寻找我们自己的同盟军，并使某些社会成分保持中立，所有这些都是所需要做的，也是在我们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能够完成的。

李立三要求把总罢工延迟到国民党领导人从郑州回来时举行，并在他们到达的那天宣布总罢工，作为欢迎他们和支持公开信中提出的要求的一种表示，这纯粹是机会主义的建议。这个建议出自于群众行动必须得到国民党同意的想法。国民政府去郑州是酝酿反革命阴谋。军官们正在怂恿和准备屠杀工农。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群众示威游行去迎接国民政府领导人是一个大错误，这种做法会被理解为无产阶级正在支持国民政府的反动政策。

无产阶级决不乞求，但有权提出要求。我们已在一星期前公开提出了我们的要求，国民党置之不理，共产党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就将使自己信誉扫地。必须表明，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提出要求的，无产阶级应以游行示威来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它丝毫不希望这些军官及其国民政府中的同伙的到来。你们认为他们会

① 朱培德是江西省政府主席，他常常在南京和武汉之间持调解态度。早在3月，当国际工人代表经过江西时，朱培德的军官已在那里杀害工会和农会会员。后来，他充当南京和武汉最反动分子（徐谦、顾孟余、孙科、陈诚等人）之间的调解人，这些人在5月份就已赞成与国民党右派封建资产阶级和解和公开攻击共产党。同时，他参与了南京集团内部的斗争，他支持白崇禧的封建军阀派别（白以上海警备司令身分在上海枪杀工人）和广东独裁者李济深反对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买办资产阶级集团。武汉那些仍要与蒋介石作战的领导人（汪精卫、唐生智等）想通过朱培德的调解与白崇禧建立联盟。共产党领导人也赞成支持“第三种势力”的政策。由于赞成这种政策，当朱培德开始驱逐共产党员以及国民党右派出江西时，政治局还否决了要求撤销朱培德职务的建议。——罗易注

同意我们的要求吗？总罢工的目的是警告国民党，告诉它由于它的反动政策，它正在失去群众的信任。国民党必须在反动军官和革命群众之间作出抉择。人们不能同时既把军官们当成英雄来欢迎，又把国民党作为革命领导人来欢迎。

你们建议我们等待军官们回来，但他们却并不等待，他们每天都在组织屠杀工农。昨天，长沙整个共青团市委（七个同志其中包括两个女青年）被杀。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的任何拖延会不使作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共产党的信誉扫地吗？共产党已作了太大的让步，共产党愈让步，国民党愈得寸进尺。现在国民党是不折不扣地要消灭我们党。我们必须公开而明确地宣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

1927年6月9日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罗易给冯玉祥的公开信

（1927年6月10日）

共产国际授命我对您的辉煌胜利致以热烈祝贺，并表示相信您今后还将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中国国民军不仅正在为中国的自由、也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战斗。因此，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阶级的同情、支持和热忱都在他们一边。

国民革命的重要军事政治领导人在前线集会讨论未来的作战方针，经过详细周密地讨论政治形势后，将要作出重要的决定。对奉军的进攻一定会继续下去，直至占领北京，把张作霖赶回东北老巢。但是国民革命军又有了一个新的更危险的敌人，粉碎这个敌人对革命的发展和安全的必要。这个新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资产阶级支持的蒋介石新军阀。吴佩孚、孙传芳

和张宗昌的失败以及沈阳的即将崩溃，使帝国主义感到需要在中国寻找一个新的更可靠的同盟军。帝国主义必须有一个不同于腐朽的封建军阀的同盟者。帝国主义发现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南京集团可以成为适应目前新情况的工具。蒋介石一伙在国民革命假面具掩护下，迷惑了相当多的群众。因此，对革命来说，他们要比反动军阀张作霖更为危险，因为群众对后者并不存在什么幻想。

张作霖和蒋介石之间、奉系和南京集团之间没有多大差别。他们都残酷迫害共产党员，迫害继续忠于国民党革命原则和传统的国民党员，他们都是工农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的双手都沾满了劳动人民的鲜血。这两个集团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都代表最上层反动阶级的狭隘利益，并都想推翻武汉国民政府。

上海无产阶级为迎接国民革命军而举行的英勇起义，被北洋军阀按帝国主义的指令镇压下去，浸没在血泊之中。蒋介石不仅不驰援上海工人，却在三星期后，屠杀不久前为帮助国民革命军曾作出如此英勇牺牲的工人，作为他进入上海的“纪念”。蒋介石在上海建立的政权与张学良、张宗昌和孙传芳的血腥政权相比，毫不逊色，他在广东的代理人李济深的行动也恰如张作霖在北京的行动一样残忍和嗜血成性。

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假面具不能再欺骗任何人，他说他不反对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只要求他们清除共产党的影响。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否在共产党影响下，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提出与帝国主义相同的要求则是蒋介石的特点，帝国主义也正在扬言，他们准备与“真正的”不受共产党影响的国民政府和解。因为他们要求一个完全相同的东西，他们之间的联合是不可避免的。几天前，英国外交部长张伯伦在国会宣称，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的一个新因素，英帝国主义的政策应倾向这个新因素。国民革命的急剧发展摧毁了帝国主义以前的工具，现在，帝国主义想利用代表反动封建资产阶级军阀的南京集团，作为进一步统治中国的基础。

因此，国民革命军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扫除背叛的、自封的南京集团。蒋介石正在发动一场反对武汉的无情战争，他正在帮助和唆使武汉地区的反动分子进行公开的反革命暴动。他在与日本通讯社一个代表的讲话中，承认夏斗寅和长沙反革命军官是奉他的命令行动的。南京的反革命势力已取代了武汉政府在江西的权威。现在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官兵中散发通电，号召他们归顺南京，起来反对武汉政府，杀害共产党员。

国民革命队伍的分裂确实令人痛心，蒋介石及其一伙实负其咎，他们应作为革命的敌人受到惩罚。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南京集团及其政策，代表已背叛反帝斗争和转向反对革命的整个阶层的利益。

国民革命的目标不仅是使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且也从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封建主义及其军事表现形式军阀主义是帝国主义在华的社会基础。如果不摧毁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剥削使农民陷于贫穷，千百万被剥夺的贫穷农民成为军阀的炮灰。因此，国民革命如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能实现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军阀主义和农村民主化的纲领。国民革命实质上就是土地革命。

去年，农民运动发展非常迅速，威胁到那些直接间接依靠剥削农民而取得政权和特权的阶级的利益。中国是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农业是其主要的生产部门，农民是商品的主要生产者。帝国主义者、军阀、地主、买办、土豪劣绅和资产阶级全都热衷于剥削农民，全都反对现存所有制关系的任何改变，正是这种生产关系使农民实际上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帝国主义需要对中国劳动者进行无限的剥削。工人阶级为了改善生活状况，正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这个斗争加强了国民革命运动。但国内资产阶级也是靠剥削廉价劳动而生存，这与工人阶级要从目前可怜的生活条件下解放出来的愿望是相违

背的。于是，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就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对国民革命的联盟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一致而形成的。这个反革命联盟的中心在南京，而武汉则是另一个中心，武汉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大多数人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两个中心绝不会一致起来。南京集团的胜利将是反革命的胜利、帝国主义的胜利；武汉的胜利则是国民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军阀主义、消灭封建主义和实现国家民主化。

应以上述考虑确定军事行动的方向。

占领北京、把张作霖赶回东北的任务，不应妨碍更为重要更加迫切的革命任务，即消灭南京反革命中心。集中所有的国民革命军攻打北京，将使帝国主义能够在国内反动派协助下从背后组织进攻。革命策源地广东丢失了，曾在那里建立革命堡垒的工农现在正在李济深的血腥践踏下呻吟。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反革命在湖南得势，江西也落入反动派手中。如果不消灭南京反革命司令部，就不能保证武汉不成为反动势力的牺牲品。把整个国民革命军派到北京意味着使革命的南方处于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的摆布之中。如果不打击后方的反动势力，北方前线的胜利是毫无价值的，千百万英雄战士的牺牲行将虚掷。

消灭南京反革命中心、收复广东，在国民革命刚征服的地区根除反动势力，是国民革命军面临的迫切任务。我希望在 frontline 聚会的革命领导人妥筹办法，全面协调上述任务和攻占北京的任务，是所至盼。此致

革命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 罗 易

1927年6月10日，汉口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

(1927年6月15日)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没收反动分子、大地主和土豪劣绅土地的建议。共产国际提纲建议没收反动分子的土地。此后中国共产党比以往更有力地推行没收土地的政策。土地委员会曾经一再讨论这个问题。起初它提出没收一切土地。但最后决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汪精卫回国后，国民党开始讨论土地问题。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通过决议，没收除小地主以外的一切土地。这个决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常会批准。但是由于军方反对，决议未能公布。大多数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因而反对土地革命。但是，军队用来作为借口的，不是没收土地，而是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如：军官们家里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属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罚款；禁止运粮；强迫商人摊款；农民私分粮食，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乡的小额汇款被农民没收和瓜分。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

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①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对土豪劣绅和土匪的联合进攻（虽然得到小地主和一般地主的支持）应加制止，使我们有可能集中力量抗击反

^① 指1927年5月21日长沙“马日事变”。——译者注

动派。同时，在妥善规划的基础上和在充足的组织力量的支持下，作为没收土地的准备措施的农村自治和农民武装，就会加速建立起来。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国民党中总的情绪是既要与蒋介石作斗争，同时也要镇压共产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谭平山的就职演说是含糊的，那是在夏斗寅刚刚叛变后发表的。国民党决定延缓解决土地问题，而先去击溃夏斗寅。谭平山作为政府的一员，未能公开为一种与国民政府的意见相左的观点辩护。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纲。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没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没有废止，也没有禁止农民自己起来没收土地。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并揭露言过其实的反动宣传，以中止军官和国民党左派间引起的恐慌，从而克服农民运动道路上的障碍。失业、无地的农民是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动力。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分配一切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农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必须改变，贫农必须成为运动的中心。

（摘自《罗易赴华使命》）

中国（国共两党）国民革命纲领草案*

（1927年6月15日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

一、军事方面：

1. 反对南京封建资产阶级反革命中心的斗争：国民革命的敌人不是蒋介石个人而是以他为首的封建资产阶级军事集团，这个集团得到国民政府地区内所有反动势力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的赞助。南京集团正在再次企图使国民革命受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领导，这意味着革命的失败。因为在他们领导下，民族解放运动将以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而结束。因此，消灭南京反革命中心是国民革命的迫切的军事、政治任务。

2. 立即收复广东：广东的反革命政权是南京和西南各省反动军阀之间的纽带。这种联系正在形成一个对武汉的包围圈，如果不摧毁它，这个包围圈就会收紧而扼杀武汉。不能让为革命战斗四年之久的广东工农群众处于李济深的血腥践踏之下。收复广东还将缓和财经状况。

3. 支持冯玉祥进攻北京的战役。

二、政治方面：

1. 消灭湖南的反革命。

2. 阻止江西反革命的发展。

3. 增强国民党作为国民革命领导者的权威。

4. 军队和省行政机关完全归国民政府管辖。

5. 设立省代表会议，省政府要对代表会议负责。

6. 建立地方自治政府，取消土豪劣绅权力。

* 这个纲领按后面指出的地方修改后通过，但没有作出坚决要求国民党通过这个纲领的决议。共产国际代表提出没收土地问题交全党讨论的建议被否决。——罗易注

7. 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三、土地问题方面：

1. 按国民党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的规定没收土地。^①

2. 降低租税，设立农业银行，国家支援农业合作社，开展水利工作，组织农民重新安居，在国家帮助下开垦荒地。

3. 建立农民自卫军，归内务部管辖。^②

4. 农民运动完全自由。

四、劳工问题方面：

1. 有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有罢工权利。

2. 八小时工作日，确定最低工资，建立劳动法规。^③

3. 建立工人武装纠察队作为城市民兵，归内务部管辖。^④

五、对外关系方面：

1. 联合苏联。

2. 进行有策略的活动，分裂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抵制对帝国主义的让步，等等。

3. 与全世界被剥削阶级和革命人民建成统一战线。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① 由于共青团代表一人的反对，这一条被否决，决定代之以“把土地问题的解决提交两党联席会议”。——罗易注

② “归内务部管辖”字样被删除。——罗易注

③ 通过了下列附加字样：“只在产业工人中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其它部门工人的漫长工作时间未作具体规定。——罗易注

④ “归内务部管辖”字样被删除。——罗易注

国民革命纲领*

(1927年6月15日)

罗 易

在目前这个危急时期，很有必要制定一个标准来确定某个阶级、政党或个人是否是拥护国民革命的。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界限不清的地方。杀害工农的反动封建地主和军阀称他们自己是国民革命者，并宣称他们的残忍行为是为了要保护国民革命。国民政府正在寻求与帝国主义达成交易，使它自己完全听从反革命军官的支配，同意对劳动人民的屠杀。尽管如此，它还自称自己是革命的。国民党违背自己的纲领，公开反对土地改革；它趋向于与南京叛徒重新结合，它正在与反革命军人密谋反对工农运动，却还自称是国民革命的领导人。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必须搞清楚，也应使群众清楚，谁反对国民革命，谁支持国民革命。

我提出的国民革命纲领可以作为这样的—个标准。不赞成这个纲领的阶级、政党或个人，不以这个纲领为基础进行坚决斗争，就不能再承认他是国民革命的拥护者。很清楚，这个纲领不是共产党的纲领，而是革命民主主义的纲领，它包含工人阶级的基本要求。如果共产党不坚决要求国民党采纳这个纲领，它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政党，它就是背叛工人阶级，它将在政治上自取灭亡。

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本身不是目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与它合作是为了发展国民革命。如果国民党不再是国民革命的机构，

* 大概是罗易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他注明：“见《国民革命纲领草案》”——原编者注

那么我们对它的态度和策略就须根本改变。因此，我们应向国民党和群众提出一个明确的问题：国民党是否准备接受国民革命纲领？运动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国民革命的胜利有赖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必须知道，群众也必须彻底了解，国民党是否愿意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愿意，那么共产党就继续与它合作，予以支持。如果不愿意，那么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客观上就没有必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再把国民党当作革命斗争的同盟军，而应看作是敌人，是反革命的工具。如果这样，共产党的任务是使群众认清国民党向反革命的转化。

两党合作关系的继续不应以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而应以国民革命提出的那些条件为准。如果国民党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如果它寻求群众的支持，它至少必须接受国民革命的最低纲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留在国民党内并争取群众对它的拥护。在国民革命纲领中已阐明了最低纲领。我们必须询问国民党：它是否准备采纳这个纲领？我们必须向国民党宣布：如果准备采纳，我们就与他们继续合作；否则，我们就分道扬镳。

革命的发展使国民党内发生了阶级分化，这种分化现在已导致一场危机。不同的阶级利益使领导者脱离群众，我们应加速这种阶级分化的过程。现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肯定不会采纳我们提出的纲领，它过去几周的政策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它仍自称是革命的，并以此欺骗群众。我们必须撕去它的假面具，必须迫使这个反动集团出来公开反对国民革命的最低要求。当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在国民革命纲领基础上与我们合作时，共产党就越过国民党领导人，向其广大党员揭露和谴责这些领导人是国民党党纲和国民革命事业的背叛者。

国共两党关系的危机与国民党内部的危机（即其领导和广大党员之间关系的危机）是密切相联的。共产党是否能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国民党

现领导有权代表国民党和广大党员行动吗？我们知道他不能代表。国民党领导人把国民党推向反革命方向，群众必须认清这一点。如果国民党驱逐了反动领导人，实行民主化，如果它完全接受国民革命纲领，并为之战斗，那么共产党将留在国民党内。如果关于国共关系可能分裂的警告阻止了反对反动领导人的必要斗争，那么就失去了共产党参加国民党的真正意义。

现在我谈谈对我提出的纲领的批评意见。鲍罗廷和陈独秀都认为这个纲领提出了工人阶级的最高要求。在他们看来，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要求。而他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要弄清国民党的要求是什么，并设法与他们达成协议。鲍罗廷说国共两党关系的前途决定于我们对国民党提出的下述问题的答复，即（1）两党政治问题；（2）群众运动的控制问题；（3）工商业问题。鲍罗廷认为如果我们不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让步，与国民党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说，在目前国共破裂既不得人心，又是有害的，他认为我们与国民党破裂将使它投入反革命的怀抱。他显然认为国民党还是致力于革命的，他坚决认为把现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看成反革命是个错误。他对国民党领导和党员群众不加区别，他认为这样的区别“没有实际意义”。鲍罗廷从这些设想出发，建议为了改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共产党在这三个问题上都要让步。

这种关于“两党政治”的说教是什么意思呢？国民党正在对共产党肆意挑衅，要消灭共产党。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吗？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存在是以共产党不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因素为条件的。在我们党的政治独立问题上能有任何妥协吗？对鲍罗廷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他不相信在目前情况下共产党能保持政治独立性，他认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不能发挥完全的政治独立性。但共产党不能只有50%到80%的独立性，它或者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因素，或者就不是。这里不能妥协。因此，在“两党政治”问题上，与国民党反革命的中央委员会达成任何协议，只有在取消共

产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鲍罗廷所建议的内容。他的建议会产生什么后果，让他等着瞧吧！

第二个要求：即对群众运动的控制，这是一个实际上表明有关共产党存亡的要求。国民党要求共产党未经他批准不得组织群众游行，而且，要与国民党共同“领导”群众运动。这就是说要共产党否认他作为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者的作用，而成为国民党的宪兵。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也许还要与反革命军官和封建资产阶级反动理论家达成协议。鲍罗廷甚至在这样的问题上也寻求让步。他建议在经济斗争中，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应归共产党，但在政治领域，共产党应把群众让给国民党！在革命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不可能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划分界线，每次罢工都具有政治意义，并向起义的方向发展。鲍罗廷为了掩饰他的建议，说什么共产党要保留宣传和鼓动的权利，但这个辩解不能改变他的建议的孟什维克性质。在革命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把宣传鼓动与革命行动分开，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共产党正在宣传土地革命，鼓动没收土地。当群众接受了这种宣传鼓动而准备采取行动时，共产党却还须要求国民党批准这种行动。这就是鲍罗廷建议的实际含义。现实经验反驳了他的建议。政治上的依赖将同样在宣传鼓动方面束缚共产党的手脚。

国民党知道共产党是群众的领袖，它知道群众正准备进行革命斗争，它就向群众发动了进攻。但国民党也知道群众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它正企图使共产党丧失信誉而陷于混乱。共产党如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就是为反革命效劳。当初我们与国民党的结合，曾有利于革命的发展；但在目前形势下，如按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意见去做，则只能帮助反革命。

关于工商业问题，鲍罗廷已解释得很清楚，他说这是国民党与大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两星期前，党通知工会要工人进行“革命的自我约束”，以制止小资产阶级方面的抱怨。这样做的借

口是：国民党代表小资产阶级，如果我们不对小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就会破裂。现在他们则向工人阶级指出，让步是为了使国民党能回到大资产阶级营垒。随后，他们将要求对帝国主义让步，也许，这同样会被证明是出于保持我们与国民党关系的需要！国民党要与南京达成协议，它想赢得上海资产阶级的欢心，因此工人阶级就应支持国民党的这些反革命目的。为此，工人阶级应该做些什么呢？应该作出牺牲。工人不应要求提高工资，他们应同意更长的工作日，他们不应罢工，总之，他们应宣告国内和平。为了保持我们与已经倒向反革命一边的国民党的关系，必须实行这一切！

不，同志们！在反革命问题上同国民党达成协议，不是共产党所应做的。共产党的任务是驱逐背叛的领导人，向群众揭露他们是国民革命的敌人，由此把国民党转变为革命民主群众的政党，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真正的国民革命斗争。一旦我们迫使国民党领导人对现阶段的国民革命纲领明确表态，我们就将实现这个目标。

对我提出的纲领草案提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关于土地问题的修改是不能接受的。鲍罗廷建议整个没收土地的问题不要再提了，他指出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向国民党让步。但这个问题是目前一切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就意味着我们在整个战线放弃自己的阵地。此外，在中共五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制定之前，国民党曾采纳共产党所提出的国民革命土地纲领；现在，在已夺取政权的反动封建地主和军阀的压力下，国民党却妄图否定这个土地纲领。在没收土地问题上让步，并不像鲍罗廷认为的是“给国民党留有一定余地”。这样的让步会使农民遭受反革命封建军阀的残酷迫害。只有当国民党与反动势力斗争时，我们才应帮助它；我们不应帮助它满足反革命军官们的愿望。

陈独秀建议把土地问题提交两党联席会议，这是一种倒退。在

一次联席会议上已经达成部分没收土地的协议，国民党现在想废除联席会议的决议。把这个问题再次提交联席会议，意味着我们同意重新审查过去的决议。

鲍罗廷的“为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奋斗”的表达方式，把整个土地革命问题推向未来，而这正是目前最紧要的问题。农民已经在没收土地。共产党应当支持他们还是不支持他们？问题就是这样摆在面前。毫无疑问，共产党应该支持农民。我们还应设法获得国民党对农民的支持。如果国民党不支持，那么共产党在封建军阀控制下的国民党和革命农民之间，将毫不犹豫地作出抉择。

共产党居然会认为纲领中无产阶级提出的那些要求是过高的，这真是令人惊讶。这是目前无产阶级能提出的最基本要求。罢工权利问题引起了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此提出异议。但无产阶级毕竟应该保卫自己。国民党不能既反对其它一切要求，而同时又自称是革命民主政党。在所有“象样的”民主国家里，无产阶级都享有这些权利。如果国民党甚至对工人阶级的这些基本权利都反对，那么无产阶级能拥护它吗？共产党能和它合作吗？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工人。反动势力正在从各方面向革命进攻。在这危急时刻，小资产阶级正在犹豫。大部分军队处于封建主和反动势力控制之下。保卫革命的任务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因此，武装工人就成为迫切的需要。国民党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将证明它是想背叛革命。

陈独秀反对农政部掌管农民自卫军。为什么？他说国民党会把这看作是对它的权力的威胁。工人阶级为必然到来的革命斗争所作的任何有效准备，都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威胁，国民党总是这样解释问题的。那么工人阶级就应该永远放弃为斗争进行准备吗？这纯粹是投降。

共产党是由国民党邀请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接受邀请不是出于礼貌，他们参加国民政府是为了把它转变为民主专政机关。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留在政府内。组织和领导城乡民兵是农政部也即内务部的职责。为什么国民党要反对农政部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什么他们让一个共产党人负责这个部？〔因为〕这会使共产党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国民党请共产党参加政府，却不给他们任何权力，也不信任他们。非常明显，国民党是想利用共产党的部长当警察，利用他们管束工农运动，使共产党信誉扫地。我们准备上这个圈套吗？共产党必须向群众讲明，它参加政府是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发展革命；如果共产党留在政府内为反动派所利用，它就应毫不犹豫地退出政府，并向它宣战。

我们必须使国民党不能不作出正面回答。我们必须迫使它在群众面前明确宣布，它是准备领导国民革命前进还是背叛它。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决定于它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它不与封建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决裂，共产党就应与它决裂，不仅如此，共产党还应把它作为反革命的代理人与之展开斗争。

1927年6月15日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1927年6月20日）

罗 易

同志们，我代表共产国际向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通过大会向中国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表示祝贺。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不仅是中国总工会的、也是世界革命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上次全国劳动大会面临的是宣传、鼓

* 罗易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讲话。 原编者注

动和组织的任务，这次大会则必须解决目前决定性斗争中无产阶级大军的领导权问题。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中华全国总工会已团结了 250 万工人，这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你们现在的任务是领导这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队伍前进，使它能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帮助革命克服目前的危机。在过去四五年中，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在现时期，它在国民革命中应该起决定性的作用。

国民革命在经过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之后，现在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关键时刻，无产阶级的坚决行动可能克服这个危机，走向最后胜利。由于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离开了国民革命阵线并转而反对革命，它已加入了反革命阵营。

无产阶级为国民革命事业承受苦难，作出牺牲并舍己为入地进行战斗。在资产阶级现在掌权的地方，虽然还打着国民革命的虚伪旗号，工人阶级所遭到的迫害却与张作霖和其它军阀统治的地区同样残酷。

上海无产阶级发动两次英勇起义以帮助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但是现在却为国民革命军所占领，蒋介石已成为这个城市的统治者，几天之后，所谓国民革命军的领导人就对为革命如此英勇战斗的上海工人进行大屠杀。资产阶级已离开革命阵营，并正在与帝国主义妥协。帝国主义正在剥削和压迫小资产阶级群众。阻碍小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统治，另一方面是封建地主对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控制。但就是在小资产阶级队伍中（他们的利益与国民革命的胜利联结在一起）也有犹豫和动摇。光靠小资产阶级是不能使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利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动摇，正在企图把他们争取到反革命方面去，以建立一切反动势力反对工农的联合战线。

于是，国民革命未来发展的任务就落到无产阶级肩上。无产阶级必须站出来领导革命，它必须领导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帝斗争。

争取民族解放。另一方面，反动封建分子和他们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代表已在整个国民政府地区发动进攻，不仅是广东，就是湖南、江西甚至湖北的农民组织都遭到残酷迫害。工农组织的存在受到威胁。国民党小资产阶级左翼领导人正在动摇，他们对目前的事件感到绝望，不敢进一步发动对反动派的革命斗争。

发展土地革命，也即发展农民对地主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阶层的斗争，是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保证。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帮助和唆使下，正在企图动员一切反动势力和全国所有力量建立一个反对革命的统一战线。目前革命的任务是向反动势力进攻，摧毁他们生存的基础，彻底击败他们。不这样，革命胜利就没有保证。在目前，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面临的问题，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

因此，同志们，第四次大会面临的^一任务不仅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革命的利益。这次大会不仅应决定怎样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也应决定无产阶级如何领导革命。工会应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革命斗争的组织。

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革命就不能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土地革命。它应当要求国民政府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停止犹豫，参加对反动派的斗争。大会应要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认识到长沙叛变和江西事件的危险性。无产阶级处于土地革命领导者的地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坚决行动，粉碎湖南和江西的反革命。无产阶级只有采取这样的行动才能成为土地革命的真正领导。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对世界革命事业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中国革命的结局将决定世界革命的发展。第四次大会必须向整个工人阶级提出战斗纲领，它应向工人阶级表明，怎样领导民主联盟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都确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够

实现其历史任务，能够在目前的危急时刻领导国民革命运动。

1927年6月20日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书记处致上海区委的信

(1927年6月23日)

应当抗议帝国主义军队开往华北。上海必须在一个月內准备强大的反帝运动。工商学要宣布总罢工，示威游行要进入外国人的地区。这次运动必须比1925年的五卅运动更为广泛，更加深入。必要时应提出下列口号：“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收回租界”，“日本纱厂收归国有”等等。运动开始之前应作好充分准备。要在各阶级中进行反日宣传，应造成一种反对帝国主义军队登陆的声势，应使这种气氛日益高涨。浙江、南京、宁波、镇江、无锡等地也应进行同样的准备。宣传鼓动必须深入到军队中、深入到下级军官中去，应激发士兵和群众的反帝热情；宣传鼓动也应激起铁路沿线和大城市附近的农民的反帝热情。过去，士兵和农民没有参加五卅运动，这是五卅运动的缺点。这次应切实联合士兵和农民。实行这些措施后，将从根本上瓦解蒋介石军队的士气，应及时地在外国海员和城市警察中间开展地下工作。这个运动将迫使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和上海，帝国主义方面的这种行动定能再次在全国引起强大的反帝浪潮，从而摧毁蒋介石的基础和粉碎武汉政府中右派的威胁。

运动的目的是没收帝国主义的财产和大地主的土地，克服目前的革命危机，取消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这个运动必须正好在蒋介石进攻武汉或武汉进攻蒋介石时爆发。对此，你们务必全力以赴。还应鼓动小资产阶级抵制蒋介石发行2000万元内债的计

划。

为了使你们理解这个决定的意义，我们作如下说明：

一、五卅以后，尤其是北伐胜利以来，帝国主义戴上了仁慈的面具，目的在于勾引资产阶级和帮助国民党新右派。第一次北伐的胜利使蒋介石和大资产阶级有理由认为国民革命可以轻易完成，他们树起了反共旗帜。共产党使人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工农运动方面。蒋介石和大资产阶级以此为借口，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反帝情绪使他们转向反对工农运动和反对共产党。

二、蒋介石这种方针在武汉政府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小资产阶级和中层军官的动摇，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变，都是受蒋介石的口号影响的表现。

三、过去几个月中，反帝运动有所减弱。帝国主义干涉更加残酷，特别是在南京事件中。武汉政府在帝国主义干涉面前，被迫实行让步政策。无产阶级群众必须服从所谓“革命纪律”。于是武汉地区的反帝运动比其它地方更为冷冷清清。如果我们继续实行这种让步政策，保持停滞状态，形势就会非常危险。中国革命的特点在于其反帝性质。最近，这个任务似乎已被遗忘，一切努力都集中在与封建主义作斗争上。另一方面，蒋介石在上海，李济深在广东，都在打着国民革命旗号，反对阶级革命，采取种种狡猾手段，导演虚假的反帝运动以欺骗群众。

四、一方面，反帝运动正在消沉；而另一方面，从小资产阶级观点看，工农运动“太赤化”了。此外，“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非资本主义发展”等口号引起了小资产阶级的怀疑，使它认为共产党不久将煽起反对国民党的暴动，认为共产党要的是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夏斗寅叛变的恐怖形势下，小资产阶级很容易受蒋介石集团宣传的影响。他们

正在抛弃三大政策^①，投入蒋介石的怀抱。这种向右转趋势的客观原因是反帝运动的低落。

五、小资产阶级认为国民革命不需要没收土地。它认为只有共产党才关心这个问题，它认为共产党需要土地革命是为了实现十月革命和建立工农专政。因此，它现在不仅不提出这个任务，而且要取消工农运动，与共产党断绝关系。

如果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退让，如果它同意这些主张，结果将是我们的力量被消灭，无产阶级被迫放弃领导权而听任蒋介石的摆布。这将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没收土地和武装工农，结果将与国民党立即破裂，而与国民党立即破裂则意味着我们党立即被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行动不谨慎，结果将立即为资产阶级所击败。

(第六段缺——编者)

七、我们能暂时放弃武装工农和没收土地的政策吗？人们可以采取如我们现在解决湖南问题时的作法（即在反对许克祥的斗争中，由我们自己起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和武装农民）。这是一个独立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充满危险。如果我们独立行动，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就会破裂，我们就会灭亡——光荣的灭亡。这不是解决危机的办法。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方法，新政策不仅将使我们走出危机，还将扩大和深入革命，引导我们走向最后胜利。这个新途径是什么？就是上述决议中所指出的。这是第二次五卅运动。这不是主观的设想，而是出于客观需要和可能。

八、我们不应害怕帝国主义征服和干涉蒋介石的地区，帝国

①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联苏、联共、扶植工农。孙中山在他的政治遗嘱中确立了这三大政策作为指导国民党的政策的基础。应记住三大政策与孙中山早先制定的三民主义是不同的。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后来这一条通常被解释为社会主义）。——罗易注

主义全部占领上海、福州、南京等地比蒋介石或李济深占领更为有利。因为，如果是帝国主义占领，我们就可以发动一场新的反帝战争。这场战争将直接导致武装工农和没收土地的必要性。在这个高潮中，国内反动派不敢抬头，分裂^①的趋势可以避免。可以相信，这个高潮将消灭蒋介石的力量，取消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恢复和加强我们的领导权。所以，这是最正确和最必要的策略。

你们必须迅速而充分地准备这个运动，你们不应认为这个运动只与工人有关，应当吸收别的阶级参加。这个运动应该是人民群众愤怒的爆发，应具有普遍性和全国性。不要怕南京、上海、宁波等地被外国军队占领。你们必经^②在帝国主义面前扩大和加强运动，运动愈发展，就愈容易组织我们的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力量将消灭蒋介石的势力。

军事部门应以这个决议为基础，制定周密的计划，在各处贯彻执行（在蒋介石军队和外国军队中）。扩大目前的反日运动。在小商人和农民中进行宣传，抵制 2000 万元内债。加强工会的基础，为工人的各种组织准备强大的力量。努力吸收学生和国民党左派参加这个斗争。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我们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从国际观点看，我们应联日；从国内观点看，必须摧毁英日联盟；在蒋介石和张作霖的地区内，我们必须明确反对日本；在武汉，我们必须对日本持友好态度。牢记这些原则，选择最实际的策略和口号，但不必过于顾虑，以免妨碍运动发展。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① 指国共之间。——罗易注

^② 原文如此，似应为“须”。——编者注

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

(1927年6月28日)

罗 易

书记处提出的文件中非常危险。这个文件谈到要以组织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他们强调革命的民族解放的内容，而抹杀革命的阶级性质。反帝国主义斗争是非常重要的，它构成中国革命的基本特征。这个斗争目前正在遭到压制，不仅在上海，甚至在武汉，国民政府实际上是禁止反帝斗争的。对于共产党来说，开展、扩大和加强反帝斗争是一项重大的任务。

但是，在提交给我们的这个文件中，事情却是背道而驰。文件居然提议，要用反帝斗争取代阶级斗争，要使反帝斗争成为革命的基础。这个建议的想法是违反现实的。既然反帝斗争构成中国革命的基本特征，那末必须牢记，在目前阶段反帝斗争的动力是阶级斗争。不能以此代彼。在国民革命运动过程中，阶级斗争已经得到加强；要恢复国内平静，除非毁掉革命斗争的一切成果。在革命发展的现阶段，只有开展阶级斗争，才能有效地进行反帝斗争。

文件说，由于阶级斗争的加强，我们已经陷入了可怕的危机。因而，文件声称，我们必须寻找出路，办法是放弃阶级斗争，并把群众吸引到新的反帝运动中来。这是义和团运动时期清王朝的

* 本文可能是罗易在政治局的讲话——原编者注

† 这个文件（即本书前列《致上海区委的信》——编者注）原是中央委员会送给上海区委的一封信，当政治局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决定起草一个反帝斗争的决议来代替这封信时，书记处说，该信已送发上海。——罗易注

绝对主义的策略^①。在共产党队伍中居然能找到清朝绝对主义策略的辩护者，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建议的实质就是：共产党必须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燃眉之急的土地革命问题，转移到同封建军阀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理人建立国内和平的目标上来。

文件提出了下列两个论点：

1. “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非资本主义发展”等等这样一些口号，仅仅有助于把小资产阶级推向反革命营垒。

这些口号是从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中提出来的，而这个文件中所得出的结论则是完全错误的，投降主义的，取消主义的。这个结论认为必须抛弃上述这些口号，代之以“打倒帝国主义！”这个老的、过时的鼓动口号——这是一切反革命军官（包括张作霖本人）正在利用的口号。起草这个文件的同志不懂得，反帝斗争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采取更为具体的阶级斗争形式。他们的论点是同共产国际的论点相矛盾的，并且，否定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建议抛弃上述关于阶级斗争的口号，是认为这些口号不符合当前的形势。

2. 上述论点的第二个基本思想是：假若共产党采取一条独立的政治路线，就必然会与国民党分裂。从这个假设出发，就建议共产党不要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路线。这样，同国民党联合的思想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的神物，在它面前，必须牺牲一切。如果阶级斗争带来同国民党分裂的危险，共产党就必须停止阶级斗争——这就是书记处提出的建议！

其次，这个为发展新的反帝浪潮而拟订的计划，说得委婉一点，是十分危险的，本质上，这是挑衅。严格说来，这就是建议我们刺激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南京、广州和其它口岸！这真是闻

① 指某些清朝政府官员利用义和团的反帝斗争，而提出“扶清灭洋”口号这样一些事实。——译者注

所未闻！还有，这个文件坚持说，由于这种占领，民族统一战线将再一次在反帝斗争中形成。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南京、广州等地，怎么就能够推翻资产阶级并使无产阶级处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呢，真令人莫解。然而，这就是为那个建议提出辩护的论据之一。共产党必须取消阶级斗争并刺激帝国主义占领全国主要的经济中心，以便使无产阶级处于革命的领导地位！这是一个难于理解的、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策略。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策略。

这个文件建议上海区委在一个月內掀起一个新的反帝运动，口号是：“没收租界！”谁来参加这个运动呢？既不是大资产阶级，也不是小资产阶级。在目前革命低落时期，不经过必要的准备是不能把小资产阶级吸收到这样的革命运动中来，以促成反帝运动的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亲自出马，势必要把自己投向帝国主义的枪口。这是冒险。你们拒绝在很可能取得胜利的地域内领导无产阶级对反动派进行革命斗争；你们拒绝领导湖南农民暴动，反对行将灭亡的封建反动势力。但是，你们却计划把在三次起义中受到削弱并在白色恐怖下惨遭摧残的上海无产阶级，推到比国内敌人更为强大的帝国主义手下去送死！为了调和你们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封建军阀的分歧，你们要把已经蒙受重大牺牲的上海无产阶级送去当烈士。这不是领导无产阶级去争取胜利，而是去遭受屠杀。上海无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真是难能可贵，不能这样轻易地去牺牲。

发展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是绝对必要的。这可以阻止反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必须担负起这项任务。但是，不能像眼前这个文件提议的那样，要用反帝斗争去代替阶级斗争。不能为了反帝斗争这个对外问题，而把群众的注意和精力从内部的阶级斗争问题引开。二者必须同时发展。实际上，它们相辅相成，不能分割。

我提议否决这封信，并建议另外草拟一个反帝运动的计划。

1927年6月28日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摘录）

（1927年7月8日）

汉口：中共中央，抄送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班基尔^①和乌拉尔斯基^②。

一、尽管我们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国民政府^③实际上不仅不支持土地革命，而且还放开了敌人的手脚。解除工人武装、讨伐农民，进攻武汉工人组织、唐生智在长沙枪杀革命者，这些行动都是反革命的公开表演。武汉以唐生智为首的主要武装力量事实上已成为同蒋介石半结盟的、也可能是直接结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上层掩盖这一切，这样它们就转到工农的敌人的阵营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我们认为谭平山的离休声明是错误的，是怯懦的。表面上留在政府里，不解脱党的责任，这样一来，谭不仅不能揭露正在进攻的反革命势力，而且还掩护了它们。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并要发表声明，说明国民政府对待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的上述态度是采取这一步骤的原因，同时要为共产党人参加武汉政府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如工农运动绝对自由、严厉惩罚镇压工

① 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总政治顾问 M·M·鲍罗廷（1884—1951）。1919—1923年鲍曾在共产国际工作。

② 即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 B·K·布留赫尔（1890—1938）。

③ 指武汉国民政府

农组织的一切罪魁、支持土地革命、实现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武装工农，等等。退出国民政府并不意味着退出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国民党的各个组织中和在拥护国民党的群众中，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改组其领导机关进行坚决的斗争。声明中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必须要求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讨论国民政府的政策，等等。同时在会上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支持土地革命和支持工人的要求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改组国民党领导的问题。现在就必须着手在国民党的所有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中做相应的准备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中作出决议，抗议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行径，提出进行土地革命的要求和工人的要求，以及根据这些要求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口号。

二、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紧急代表会议（最好不公开），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为此，在武汉地区还需要组织党的秘密机构并使受威胁最大的工作人员转入秘密状态。你们要考虑到以下新情况：1. 在武汉，优势在反革命势力一边；2. 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上层追随军阀，掩护反革命势力；3. 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应该真正成为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中心。否则，党就会毁灭自己，而不再是革命的力量，它不仅会被消灭，而且会失去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

（录自《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
（第一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 当前形势的决议

(1927年7月14日)¹

中国工农的斗争是共产国际前沿阵地的斗争。中国的革命仍然是共产国际关注的中心。

考虑到：

(1) 中国事态的急剧发展在不断改变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

(2) 由于军事将领和雇佣军部队的叛变，由于反革命势力的集结，由于最近一个时期中国革命遭到一系列局部的失败，中国革命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

(3) 最后，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近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共产国际认为有必要向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同志、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发出以下决议，以便进一步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过去及时发出的各项指示：

1. 共产党人制订正确策略的重要而必备的前提，就是要对本时期革命形势的全部特点，作出极其严格而冷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就是要正确地确定革命正在经历的阶段。只有了解本时期的特点，才能正确地确定正在战斗中的共产党的特殊任务，提出符合实际的革命口号，制订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正确策略。必须十分清楚而具体地确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内容，而且为此还必须批判性地领会革命的全过程。

2.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2月）已为中

¹ 文件发表日期。

国革命的性质下了定义，认为中国革命在本发展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其全部锋芒所向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出，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第七次扩大全会明确了中国正在战斗中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地位和比重，同时还指出，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必然日益加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必然逐渐发生分裂，并且预言，首先大资产阶级必然离去。鉴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曾多次作出指示，让工农做好同资产阶级及其武装力量作斗争的准备。这是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前几个月的事情。后来的事态发展，到今年4月12日发生枪杀上海工人事件，达到了流血事件的顶峰，证实了共产国际的预言：一些阶级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投入敌人营垒。革命遭到局部失败，转入新的更高阶段。

3.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今年5月召开的最近一次全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详尽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全会考虑了资产阶级已脱离出去这个既成事实。全会明确了蒋介石叛变后出现的局势的具体特点，为中国共产党拟定了相应的行为方针。全会的主要指示是：**实行面向群众的方针，尽力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工人和贫苦农民，为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扫清道路，坚定地实行推进国民党民主化的方针。**全会明确地提出了独立的中国共产党可以同国民党左派在武汉政府里合作的必要条件。全会认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存在着三个阵营（即张作霖的封建势力阵营；还在同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作斗争的但已经屠杀工农的蒋介石阵营；最后是武汉的革命阵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认为，强调指出军事将领和部队的不可靠问题极为重要。因此，又认为“现在应十分尖锐地提出改编军队问题、建立绝对可靠的革命部队问题、军队与工农组织建立联系问题、保证军队骨干力量问题、将雇佣军改变为革命的正规军问题”，等等。

共产国际本着这些决议的精神，向中国同志发出了目前的指

示。

4. 最近几周，事态发展得特别快。共产国际认为，这些事态的主要特点是：

阶级矛盾进一步急速激化。中国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得到了广泛发展，群众性的农民土地运动也得到了广泛发展。对国内各政治集团毫无例外地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对土地革命的态度问题。军事将领和军官团公开转入反革命营垒，并宣布与农民为敌。长沙的哗变军官在镇压农民，而无论是武汉国民政府还是国民党上层都不给以反击。冯玉祥叛变，同蒋介石合作（徐州会谈），并要求武汉政府投降。统帅武汉军队的唐生智枪杀农民，处死共产党人，并把共产党人赶出军队。**反革命军事将领**，由蒋介石到唐生智**串通一气**。同时武汉政府当权派掩饰反革命军事将领的行径，帮助这些将军，他们解除工人武装，袭击无产阶级组织，阻止进行土地革命，反对共产党人。而国民党上层也忙于策划将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由此可见，**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

事态发展就是这样，目前中国斗争形势的主要特点就是这些。而出现的这种特殊情况要求中国同志在政权问题上，在对武汉政府的态度问题上，在合作问题上，以及在今后斗争方针问题上采取相应的策略方针。

5. 根据列宁的学说，共产国际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既然民族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还在同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斗争，所以在一定阶段，同这个阶级合作和结盟是合乎情理的、完全允许的和必要的。在革命过程中的一定阶段，支持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势力或其军阀买办进行军事讨伐是容许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对革命事业有利。

根据列宁的这个观点，应该放弃，而且已经放弃了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类比的做法。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抛弃了同反革命的自由主义所达成的一切协议，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同

资产阶级的派别的合作和对其军事力量的支持，只有在不妨碍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工作，而自由资产阶级还没有反对工农，资产阶级**还能**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的情况下才能是允许的。当北伐还能发动群众性革命运动的时候，支持北伐是完全正确的。当武汉政府还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时候，支持武汉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旦武汉政府向革命的敌人屈膝投降，这种合作的策略就是根本错误的了。在革命的前一阶段**适用**的东西，现在就完全不适用了。

当然，这一切对于党的领导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年轻而又没有经验的党的领导来说，会有一些的困难。而且这种困难还会因为出现以下情况而增大，这就是：事态的自发而无法抑制的迅猛发展**缩短各斗争阶段**的时间，致使斗争进程迅速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进而**缩短**所采取的某种还适用的策略方针的实行**期限**。在紧张的革命形势下，必须尽快抓住形势的特点，必须巧妙而及时地随机应变，必须迅速而及时地改变口号，必须及时调整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对变化了的形势积极作出反应，并**果断地**取消合作，因为这种合作已经逐渐由革命斗争的因素变成革命斗争的桎梏了。

6. 如果说，在一定的革命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支持武汉政府是需要的，那么现在，支持武汉政府的方针就会是对中国共产党有害的了，会使它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尽管共产国际一再提出忠告，国民党上层实际上不仅不支持土地革命，而且还放开敌人的手脚。他们批准解除工人武装和讨伐农民，怂恿唐生智之流的镇压行动。他们以各种借口拖延和抵制对南京的征讨。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已经终止，它在变成反革命势力。武汉的激进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人士还敢作出一些“激进的”、伪装革命的“英雄姿态”，如宣布讨伐南京（既然解除了工人武装，既然镇压土地革命，那么此举的革命意义也就无从谈起了）。但是，这种故作姿态

改变不了事情的社会实质和阶级实质。武汉政府成了反革命势力的帮凶。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和所有中国同志，都应当十分明确地考虑到的新的特殊情况。

7. 最近，中国共产党的现领导犯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性错误。中国共产党本应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发动和领导土地革命，公开批评和揭露武汉政府“激进”领导人和国民党中央的暧昧而怯懦的立场，告诫群众关于一些军事将领叛变的可能性，武装广大工人阶层，坚决推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沿着真正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没有执行这些指示。中央委员会不是去领导土地革命，而是在许多场合成了阻碍进行土地革命的因素。党的个别领导人还提出了明显的机会主义口号：“只有扩大革命才能深化革命（?!）”，或“先北京，后土地革命”。反映广大党员情绪的党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些口号，这是完全正确的。正当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众在社会基层、在工农和城市贫民中间奋不顾身地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的时候，中共领导却在实行**阻止群众行动**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拒绝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革命指示。事情甚至发展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同意”解除工人武装的地步！尽管武汉政府的头目干着明显的反革命勾当，谭平山却没有勇气公开宣布退出国民政府，而是递交一纸无原则的、怯懦的“休假申请”。共产国际在秘密指示中不止一次地十分尖锐地批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国际曾警告说，如果党中央不纠正自己的错误，共产国际就公开进行批评。

现在党中央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党员同中央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是自己的革命职责。

8. 共产国际认为，必须立即纠正中共领导的这些错误，并让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都了解这一情况。

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 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

(2) 退出武汉政府时发表原则性政治声明，说明采取这一步骤的理由是武汉政府仇视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并要求严惩镇压工农的一切罪犯，同时全面揭露武汉政府的政策。

(3) 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领导在开展将共产党人清除出国民党的运动，要留在国民党内。要同国民党基层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由基层作出决议，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的行为，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并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

(4) 全力加强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巩固工会，教育工人群众准备采取决定性行动，并领导无产阶级当前的斗争。

(5) 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平民”途径，即工农和城市贫民联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进攻，继续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斗争，并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

(6) 鉴于有遭镇压和屠杀的危险，要建立党的秘密战斗机关。

(7) 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党的总的政策问题和特别是党的领导的政策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号召全体党员争取党的队伍在共产国际的决议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共产国际执委会号召全体党员同党的领导的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共产国际执委会满意地肯定共青团的正确立场和党员群众的英勇斗争，同时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领导，拒绝承认那些违反共产国际的国际纪律的领袖。必须使工农组织的领袖，即内战时期成长起来的党员，在党中央也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样，他们与党员群众有紧密联系，就能帮助克服党的现领导的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进程激起了广大工

农群众去参与政治生活和政治行动，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们的运动镇压下去。只要有正确的领导，胜利就会属于中国工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原载 1927 年 7 月 14 日《真理报》，路远选译自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莫斯科 1986 年版）

党的机会主义史

（1927 年 9 月）

蔡和森

（一）党的产生时期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理由是：（1）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产生的；（2）开始以来便做出许多错误。

这种理论完全是不对的。

中国共产党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的产儿，他不是由几个大学教授产生的，而是从“五四”运动后中国幼稚的革命的工人运动产生的。他产生的时期在国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俄国无产阶级已取得政权；在国内是欧战期中，中国已相当的工业化，从香港、广州、上海以至北方工人纷纷开始初期的自动的罢工争斗与组织，开始趋向于要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中国共产党便是从这个客观情形之下产生的。所以他不仅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产物，乃是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初期劳动运动的产物。他的产生带有光荣的革命的历史背景是很明显的。现在机会主义派欲文饰其自己的罪恶，故不惜污蔑党的产生

的历史。

党的初期不是没有错误的；但都是些偶然的零碎的错误，而不是严重的系统的机会主义，现在列举这一时期的所谓有名的错误如下：

(1) 所谓只注重经济争斗忽略政治争斗。这便是说：“最初的党只知做劳动运动而不知做政治运动。”后来一些懂得政治的同志们攻击过去一切做劳动运动的活动分子都是“工团主义”，其实这类错误纵有，也是很稀少很偶然的；在党的初期劳动运动中，始终未形成一种所谓工团主义。党的初期注重工人经济争斗，借此发展阶级觉悟与组织，这完全是对的。另一方面，不要忘记“二七”是中国工人第一次严重的政治争斗。

(2) 与吴佩孚的关系。与吴佩孚接近的政策是当时国际代表主持的。彼时纵然有一、二同志对吴多少有些幻想，然始终未上大当。几个同志利用在交通部的职务，迅速地发展了几条铁路的工作，铲除了交通系工贼在各铁路的势力；同时在文字和口头的宣传上，亦从未散播幻想于群众之中。“二七”之役，工人代表及群众自动的决斗起来，便是对吴没有幻想的表征。这些情形与所谓“与冯合作”“与蒋合作”“与汪合作”对照一下，便知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当时利用吴佩孚的政策并未做出机会主义的错误。

(3) 所谓第三次大会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是当时张国焘、蔡和森两同志反对马林及独秀同志：“一切都到国民党内去做……”及对中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势力发生悲观倾向的一种反响。国焘、和森并不是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第三次大会前，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只有陈公博、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几人及部分广东与湖北的同志^①，张国焘、蔡和森和陈独秀一起反对这种

① 以上按《顺直通讯》刊印。以下至“（六）五次大会”以前，是从俄文本译成中文的。——原编者

倾向)，而只是反对这种倾向中的过火行为，认为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国民党），应采取一种“做生意态度”，不能过分相信，不能把工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工作都交给国民党。因此，这些同志坚决主张中共对于劳动运动应采取独立态度，不应到国民党内去做；同时，他们还认为必须保留产业工人群众不加入国民党组织。这个观点在第三次大会的决议里没有被采纳。只是在这次大会以后，共产国际派工作人员来召开中共中央第一次扩大会议时，才原则上通过保留产业工人的决议。

（4）公开猛烈地批评国民党领袖的缺点和错误。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在其创刊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对国民党及其领袖采取了公开批评的态度，几乎每期都刊登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在宣传上采取独立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在广东纸老虎^①叛乱和平定杨刘之乱当中，胡汉民和汪精卫的立场发生动摇，有几期《向导》发表了猛烈抨击这种动摇的文章，这种抨击给群众造成的印象非常好，可是，这些文章在对待国民党领袖方面，自然也有某些缺点。由此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出，这些错误不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5）在冯玉祥的自由派和一切右派反对共产党人的初期，孙中山、胡汉民和汪精卫利用右派的反对，想把中共组织和一切政治工作都置于国民党的管理和监督之下，从而解决“党内有党”的问题。很明显这是想消灭独立的共产党组织，限制其行动和批评自由。这时，鲍罗廷和广东的其他负责同志转而赞成这个观点，而蔡和森同志在中央竭力反对，并直接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否认似乎中共中央同意这个观点。

（6）反对孙中山北上。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蔡和森同志一方面不相信冯玉祥，另一方面也不相信孙中山，认为他北上的目的是想同军阀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因为这时他在广东已高唱

^① 广州商人的军事组织。——译者注

联日论调，此外，北上之前要到日本去一趟；同时，他与段祺瑞和张作霖没有断绝联系。后来，孙中山的北上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拥护国民会议的运动，并提高了反帝情绪。这是北上的成果，然而也只是唯一的成果。如果孙中山不死，则很难说他会做出什么其他事情，是否会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此外，这个北上的策略不是以人民群众力量的发展为基础，而是建筑在利用军阀分化过程上，建筑在政治变革上。离开广大工农革命群众已经奋起的广东北上，值得详细讨论。当时，蔡和森同志的反对立场只是有些过于强硬。

综上所述，可以说是共产党在其初期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现在可以从我党的新方针的观点加以讨论，从这个观点来看，至少可以承认，我们没有犯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因此，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其产生时起便是机会主义的党。

（二）五卅运动时期

五卅运动时期，共产党的策略是正确的。五卅以前，上海的党团员人数几乎没有超过200人，而在纺织工厂的工人当中，党员只有十多个人。罢工策略和经济斗争的扩大是民族斗争策略的真正核心，所以这个斗争能够变成群众反帝的伟大怒潮。这个时期党的策略的正确性可以由以下三点得到证实：

（1）一方面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另一方面对它进行揭露，在人民群众面前指出它的缺点——妥协和背叛革命的倾向。由于这样的作法，上海总工会才从总商会手中夺过对工人群众的领导权。

（2）政治斗争和民族运动统一战线没有限制和制止工人的经济要求；当时党坚持阶级斗争原则，并由此开展了民族斗争，坚决反对戴季陶的理论，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打算用民族斗争代替阶级斗争的一切企图。

(3) 当民族统一战线最稳固的时候，党虽然极力吸收小资产阶级参加斗争，但始终遵循目前的策略，指出无产阶级应当站在运动的前列，领导其他阶级，并引导他们走向胜利。党丢掉了已经同小资产阶级合作的恐惧，决定引导他们跟党走。

在五卅运动时期，由于党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策略，因而取得了下列非常重大的成绩：

(1) 在全国，尤其是在南方，大力发展了公开的工人组织网，提高了对政治知识的兴趣，普遍推广和实行了革命的和经济的斗争方法。

(2) 中国无产阶级从这时起开始获得反帝运动和民族革命的领导权。

(3) 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并给予世界资本主义的“堡垒”以猛烈的打击。

(4) 巩固了南方即广东的革命政权。

(5) 加速了北伐出征时机，同军阀斗争的思想得到社会的承认，加强了北方的革命运动。

(6) 随着党的发展，真正的工人群众组织代替了学生俱乐部和小组的时期。

中共如果协助上海总商会实现其领导，如果限制工人的经济斗争，或者同小资产阶级妥协，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在“五卅”运动时期，党的上级机关尚不存在机会主义。

(三) 三月二十日前后

现在产生一个问题，到底从什么时候起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出现了机会主义呢？在3月20日稍前一点，即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更确切地说，是出现在前任中央和当时的前任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主张同国民党右派合作，并同其首领孙科会

谈，邀请他回广州的时候。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的开始。这个政策是在1925年郭松龄失败后采取的。为了说明其正确性，曾提出一系列的论据，如英日派（吴佩孚和张作霖）联合已成既定事实，北方国民军的状况，在郭松龄失败后，非常动摇不定，面临着全国反动势力联合的威胁，中央不能不向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让步，以挽救南方的革命。

郭松龄失败后不久，国民军便退出天津和北京；完全被击溃的国民军第二军由河南逃到南口^①；而蒋介石则在广州开始准备3月20日事变。这时，让步妥协政策在中央已有发展，并巩固起来，可是遭到许多广东同志的激烈反对，他们不同意中央的观点。关于事变问题，中央说：“当退让而没有退让”，而广东的同志说：“当进攻而没有进攻”。

3月20日事变是五卅运动后加剧的阶级对抗和广东工农同资本家和地主激烈冲突的后果，而决不是蒋介石个人决定的结果。在这种场合下蒋介石反对工农和进攻其政党，只不过是充当资本家和地主联盟的代表，在他背后有香港政府、国民党右派的头子……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古应芬，英国帝国主义者答应给他们提供一笔几千万元的巨款。因此，绝不能把3月20日事变只看作是偶然的、对中共的错误的攻击。事变以后，蒋介石的军队同地主一起加紧迫害农民和农会；人所共知，蒋还决定在5月1日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后一个情况就是迫使中央让步和在去年4月以前一直让步的一个原因。而这时中央已在上海和广州恢复了自己的工作。

中央对于3月事变的态度，表现在“当退让而没有退让”这句话里，所以它不仅极恭恭敬敬地接受了关于修改党的决定的通令，而且在这方而还进了一步：中央自己倡议改变阶级斗争口号，

① 俄文是 Нанькоу。——译者

而代之以另一口号：“农村联合战线！”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广东农村中农民和地主的斗争已达到顶点；不断受地主压迫的农民，用一连串的暴动来反对蒋介石、地主和国民党。这样一来，中央提出的口号使广东的农民平静下来，并且号召他们同地主联合起来，好让帝国主义者放心。从此以后，农民运动便在调和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了。

此外，中央、魏金斯基和广东同志之间还在香港罢工委员会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中央和魏金斯基谴责广东同志说，继续香港罢工的企图定会遭到失败，正是这种拖延政策才是引起3月20日事变的一个原因。广东的同志激烈地反对这种批评。

中央和广东同志之间长期一贯的分歧，是党内在政治上的分裂的起因。在看到被压迫人民的愤怒和苦难的广东同志中间，开始了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运动。鲍罗廷同志是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后来他说：“民族革命完成了，今后中国只有阶级斗争，因此，无论如何不再需要国民党了”（摘自魏金斯基同志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为此，中央严厉痛斥广东同志，似乎他们受了鲍罗廷同志的影响，而事实上却与其想法相反；可是鲍罗廷同志在工农群众中的威信却遭到了破坏。

（四）北伐时期

192……年^①1月召开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李立三和蔡和森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非常注意中国问题，其中包括“五卅”后开始的阶级对抗。关于中国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中国革命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另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当时还指出，这两种趋向现在

^①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召开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译者

正为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革命的前途取决于那种趋向占上风；它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可能是非资产阶级的。扩大会议以后不久，发生了3月20日事件，证实共产国际的推测是正确的。

3月20日事变标志着革命领导权已转到资产阶级手里；但由于力量尚未足够成熟，它只得考虑发展革命和扩大其地盘；因此，在3月20日事件以后，蒋介石加紧宣传北伐。可是要进行北伐，资产阶级又无能为力，必须把大部分工农拉进来。蒋介石不止一次非常明确而粗暴地向我们示意，他想利用我们作为抬轿子的人，他需要工农群众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完全巩固，不能立即夺回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这就说明为什么农民运动没有越出广东的范围，为什么在地方上工人组织发展得这样差。因而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推进革命和增加工农干部；由于这个缘故，鼓励北伐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北伐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都是需要的，但其目的和意图却完全不同：对资产阶级说来，北伐只是争夺新地盘和巩固其领导地位的借口，以使革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无产阶级则想利用北伐来发展工农力量，夺回领导权，以使革命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由此可见，在北伐期间，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为了彼此互相反对，双方都要聚集自己的一切力量，并加以巩固。

因此，中国革命随着北伐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工农运动异常发展和高涨，这就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惧并退出革命队伍；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不仅要准备同军阀和帝国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而且要准备同资本家和地主进行殊死战斗。

我们的中央没有预见到新的革命时期的一切特点，仍然继续实行让步政策，这个政策是3月20日事变后采取的，一直持续到北伐胜利向前推进，革命运动在人民中间到处发展和扩大的时候。

应当承认，北伐越是向前推进，中央的政策就越是机会主义。

我不能详细地谈当时中央的情况，因为那时我不在中国了，可是从《中央政治通讯》、各种文件和转给我的东西里，可以指出中央以下几点机会主义的错误：

(1) 在农民运动中仍然实行调和主义路线。广东农民的状况，在北伐前和北伐时期，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由于因军事开支而加剧的税收压榨和压迫，变得更加困难。湖南、湖北和其他地方的农民运动一向是发展的，而在广东农民运动却受到镇压。在八、九月以后，湖南的农民运动发展特别快，可是省委遵照中央指示继续实行调和主义政策，并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打倒地方土匪！”的口号，这个口号被地主和土豪很好地利用来镇压农会会员。省委对于支持坚决进攻政策和在各种冲突中领导农民群众的农村积极分子，给予处罚并严加惩办，使他们弄到脱离党的地步。

(2) 3月20日事变，已中止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北伐取得初步胜利后，城市中的阶级斗争也削弱了。军队一出发，蒋介石便立即下令禁止工人罢工、集会、结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但不领导工人反对这种暴行，反而过分热心地说：“不要进行影响北伐进程的罢工！”类似的事情不仅发生在蒋介石统治的地区，而且发生在蒋介石统治区以外，例如，在中央所在地的上海。中央在武汉店员罢工中所采取的态度特别令人气愤，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党和资本家的观点是一致的。

(3) 接连不断向蒋介石让步。当蒋介石在湖南和湖北遭到失败，并失掉半数以上的黄埔军校学生时，难道还有什么必要继续实行让步政策吗？而中央却继续退让，对他卑躬屈膝，并派出代表声明：“中共不拥护汪精卫，而拥护蒋介石”，不但不反对他，反而更加尊敬他。还说“中共号召帮助蒋介石恢复黄埔军校，将它迁到武汉”。只剩下说，只要北伐取得胜利，中共愿牺牲一切，准备当最低级的苦力，以表示自己的忠诚。

(4) 对蒋介石、李济深、唐生智和程潜等人的态度。中共采取了有名的“保持睦邻关系”的政策，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忽然变成其阶级敌人的知心朋友。相反，蒋介石等人却秘密而广泛地展开了反对我们的运动，时常用谦恭的假面具把真面目掩盖起来。可是中央没有怀疑他们的敌意，还在上海努力工作，使蒋获得江苏、浙江和安徽等省，认为他只有江西一省太少，使程潜获得福建，为李济深巩固广东和广西，为唐生智巩固湖南和湖北。中央为自己本身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中央原来是一个热心的工作者——为别人当苦力，其实这完全是用不着的，它的全部念头都集中到一点——取得北伐的胜利。

(5) 中央和上海的书记罗亦农同志对江苏、浙江和安徽等省的自治运动的看法极为轻率，可是对浙江和江苏两省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却很关心。总之，中央和上海的全体负责工作人员都支持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方针；因此，在上海党的决定和决议里明显地看出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如“上海工人无论如何不要跑到资产阶级的前面，要帮助它夺取政权；工人只能向资产阶级成立的城市民主政府要求保留罢工自由”。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系统的机会主义。第三次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报告里直截了当地说：“在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商会实际上实现了对上海工会的领导权”。对无产阶级的实力抱极为悲观失望的看法和放弃领导权，已非一日；早已默认资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主人，它应当“坐轿子”（即占居统治地位），而无产阶级应当抬轿子。这就是说，中央把工农用鲜血换来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并协助其成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6) 中央害怕人民直接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1月3日人民群众夺回汉口英租界一事，中央非常不满，此外，还命令武汉同志解散工人纠察队，从汪精卫和陈独秀的一项宣言中可以看出，中共严禁在上海重演类似汉口、九江、镇江等事件，即严禁

人民收回外国租界。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上级党机关的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或暂时的现象，而是长期的一贯的政策。五大前不久上海发生的“四·一二”的惨败，完全是这个政策造成的。工人群众第三次夺取了上海，他们在当时成了上海市的真正主人；可是中央和负责党员罗亦农等人牺牲了人民夺取的地位和良机，劝人民等待蒋介石的到来，从而把工人很困难地取得的上海毕恭毕敬地奉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回答的是制造了“四·一二”的血腥屠杀。

上海不会不知道南昌和武汉的失败，以及湖南和湖北开始的广泛的反蒋社会运动；然而上海的上级党机关不顾这个强大的反蒋运动，却命令获得胜利的海上海工人欢迎蒋介石，并把工人暴动的成果交给他。中央出卖了自己的阶级，出卖了阶级利益，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

在上海的工人运动遭到失败的同时，广州和南京也遭到同样的失败。这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使资产阶级夺得了东南各省的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第一次重大的失败！

（五）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机会主义

1926年12月，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谭平山等出席了会议。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明中国革命面临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即资产阶级道路和非资产阶级道路，而且比较起来更容易走前一条道路；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职责是引导革命走上非资产阶级道路，其主要方法是农民自己实行土地革命。这个决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已到来，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同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后，必定会抛弃革命阵线，走向反革命方面，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要最终在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进行选择，选定后者作为自己的同盟军。

此外，决议还确定了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即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使中国政权具有特殊性，它将属于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具有反帝倾向的小资产阶级；简而言之，它将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专政”。

这个决议大约是在1927年1月到达上海中央的。讨论决议时，中央听取了彭述之的报告，报告的最后部分说：“共产国际的指示同中央的政策，一般说来区别不大！”他的报告在当时引起了中央委员和瞿秋白同志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活动根本不同。一部分同志表示强烈反对和不赞成机会主义的中央和某些负责工作人员（罗亦农等）。

把中央关于上海暴动的决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加以对照，就足以使人相信彭述之的话“小区别”与实际不符合到何等程度。共产国际教导我们在资产阶级和农民当中要选后者作为自己的同盟军，而中央和罗亦农同志却把□□□、钮永建、吴稚晖、□□□等人作为同盟者。共产国际说，我们应当实行土地革命，而这时候“农村联合战线”的口号还在我们这里起作用！在接到共产国际的决议时，湖南正在大批逮捕农会会员和反动派所谓的“土匪”，共产国际领导无产阶级走非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而相反，中央和上海区委却领导资产阶级走上撒满工人鲜血的道路，并帮助他们在东南建立政权，共产国际警告我们说，资产阶级在最近必然会转入反革命阵营，它同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以后，定会向工人阶级进攻，此外，蒋介石也处在叛变革命的前夕。中央和某些同志不愿意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注意到湖南、湖北和广东已公开反对蒋介石，相反地，中央却有意扑灭这个运动，在工人取得辉煌的胜利后，强迫他们欢迎蒋，把他们夺取的上海奉送给蒋。好一个“小区别”！

接到共产国际决议以后，中央开始发生纠纷；彭述之猛烈攻击瞿秋白，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只是找

机会逞“英雄”，等等。彭述之的话“小区别”很好地暴露了中央的机会主义倾向，尤为突出的是下面的说法：“……这对于你们来说绝不是新的警告”。

“绝不是新的”，说的对，因为关于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革命问题，共产国际从第二次全会起就不止一次地说明这些革命的性质和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必要性；在1926年2月扩大会议的决议里，又强调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趋向的对立和二者之间斗争的不可免。因此，共产国际最近的决议，对我们说来，不是新的，突然的，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继续了以前的领导路线，可是彭述之和罗亦农等同志想必不了解这一点，因为在武汉（五次大会的会址）讨论决议时，他们说：“以前共产国际教导我们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说，这意味着：

第一，共产国际领导之间过去和现在有所不同；

第二，以前共产国际建议我们同资产阶级合作，并命令我们帮助它进行北伐，由此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上“自然”产生了我们的一切错误；

第三，从共产国际过去的指示中，我们理解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相互衔接的阶段；首先应当实行民族革命，而后再谈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决定，民族革命的主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应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要帮助它建立政权；

第四，所犯一切错误的责任，不在于中共中央，而在于第三国际。

所有这一切纯粹是机会主义的论调。

绝不能把“非资本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权”分开，如果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自然只会引导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能否反过来设想，也就是说，夺取了领导权的无产阶级会为革命选择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道路？难道共产国际以前没有讲

过资本主义道路¹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难道共产国际没有指出过这两个概念不可分开，中共中央的职责是使中国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和节制资产阶级的欲望？难道“伟大的”理论家彭述之和罗亦农不知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要点？孟什维克确认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阶段，起初无产阶级应当帮助资本家夺取政权，只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管理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难道彭述之和罗亦农不知道这个孟什维克的政策是出卖社会主义革命的党的政策？最后，难道共产国际在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没有对中共中央采取的孟什维克政策作出根本修正？彭述之和罗亦农同志！你们只有对所有这些问题做出理由充足的回答，才能取消对你们的机会主义的指责！

上海“四·一二”血腥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武汉我们这里时，我们问彭述之同志：“你认为现在虞洽卿在做什么？”他回答什么呢，他说虞现在没有任何出路，他靠近我们，蒋介石不信任他，他不会同蒋介石合作，等等。后来怎样呢？虞洽卿原来是上海4月大屠杀的暗藏的祸首，他为此事给了蒋介石1500万元。此后不久，我们知道了蔡元培对于镇压工人抱什么样的态度，当时我们的负责工作人员非常惊慌失措，他们说：“谁能意料到□□□原来是反动派呢？他外表那样革命和忠实于武汉！”请看，上海负责人在评价资产阶级领袖的问题上表现得多么幼稚和轻信。

五次大会讨论上海问题时，最著名的中央委员们发言说：“有着强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是发展中国革命的主要地方；谁会相信，不求助于同资产阶级的合作，单是工人就能胜任这个任务呢？！”彭述之在8月北方之行以后还断言，一部分资产阶级仍然是革命的（见他在北京的报告和关于北方局势的谈话）。某些同志在分析12

1 此处应是非资本主义道路。——译者注

月 11 日广州暴动时说：“现在广州已变成李济深和黄绍竑等法西斯集团的天下，像汪精卫、张发奎和黄琪翔这样的改革派，在那里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因此，工农革命应更加深入到地方上去。”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仍有“左派”和“右派”之分，汪精卫和张发奎还没有最终成为反动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原来，彭述之认为，七月事变后在湖南、湖北和九江实行残酷镇压的汪精卫，以及发表通电话“广州枪决了五、六千反革命工人大众，尸体装满了所有大车”的张发奎和黄琪翔，都不是反动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以后，仍继续谈论资产阶级的革命好处！可耻！

最后产生一个问题，即上海暴动时期同北伐初期的阶级关系，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否改变了？这两个阶级在客观上是否已到了分裂的时刻，他们的力量是否已成熟到分裂的程度？

事实说明资产阶级的地盘已由广东一省扩大到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和福建，现在包括九省，人口占全国的三分之二。资产阶级的军事力量，已从不大的黄埔学生队伍扩大到 40 多个军。当然不能同 3 月 20 日事件时期相比，尽管那时资产阶级已力图同无产阶级决裂（蒋介石在这方面的表示很明显），可是客观情况尚不允许；现在，情况不同了，资产阶级已相当巩固，足以同无产阶级实行决裂。

在国际方面，东方殖民地国家的软弱的资产阶级不能独立存在；它主要不是依靠国际无产阶级，而是依靠国际资产阶级的援助。因此，当孙中山和蒋介石夺取了广东政权，广东成为对它恨之入骨的帝国主义者的眼中钉的时候，孙中山还一个劲地设法接近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例如，他在逝世前访问了日本，在那里发表的文章和演说中都宣传了联合广东政府的思想），可是他的意图没有成功；另一方面，虽然他也极力接近苏联，可是对这个国家表示动摇、疑惑、怀疑（见孙中山的《论国民党演讲集》第一

集)，最后，情况迫使他同苏联达成协议。现在角色变了，各国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地向蒋介石和国民党送秋波，唆使他们反对苏联和共产党；因此，难怪南昌拿下后蒋介石的第一件事便是派遣汪精卫和戴季陶到日本去进行谈判，也就在那个时候，在南昌会议上非常明显地形成同苏联、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决裂的趋向。

我们回过头来谈谈无产阶级的情况。北伐以前，只是上海、广东和湖南有组织得比较好的工人；当时全国有组织的工人不超过50万，而有组织的农民只是广东一省有100万人，群众性的农民运动也只限于广东。现在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湖南有组织的农民已达到500万人，再加上广东、湖北、江西等省，人数不少于1500万。上海有组织的积极的（参加第三次暴动）工人已增加到80万人；再加上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和安徽等省，共计有500万人。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说：“我们没有力量战胜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够”，“我们不能脱离资产阶级”，“若是没有资产阶级，我们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完成革命，尤其是在上海”，等等，等等！实际上完全不对，这不过是上级党机关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掩盖了新时期的真正阶级关系。

目前，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的趋势非常清楚，由著名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直接进入到土地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湖南无数的农民群众没收农村的一切土地，组织农会；湖南和湖北的工人没收帝国主义者的财产和反动资本家的工厂；城市成立所谓“第二个政府”——工会；店员和手工业工人群众以及苦力起来废除旧的劳资关系，坚决实现“奴隶要做主人”的口号；女工和农妇反对旧社会和旧礼教强加给她们的丑陋习俗的运动，已在各地开展起来，尤其是在湖南和湖北；几万工农儿童（儿童团）在红色旗帜下反对[旧]制度。难怪现在时常听到资本家和地主抱怨说：“快啦，世界快完啦！”，“工人和农民这样乱来，叫人怎么活下去呀！”。十分自然，在工农组织猛烈增加和革命迅

速发展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正在加速转入反革命阵营，转入无产阶级敌人的阵营。假如我们现在还不准备同资产阶级坚决决裂，而向它提议“永久联合”，那末我们将要遭受像“四·一二”那样的打击。^①

（六）五次大会

国际决议不是第三国际的指导者机械的搬运俄国革命的方式到中国来，更不是由他们的主观决定要中国实行土地革命，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本身发展到了这样实际阶段，即农民自行没收土地，工人自行趋向工会专政，苦力店员起来推翻劳资关系，妇孺起来反叛一切旧制度。所以国际决议既不是从天上落下的，也不是从脑袋想出的。认国际决议是“超乎中国实际情形”的新方针是不对的。

五次大会主要的任务便是接受国际决议，改正过去一切机会主义的政策，及根本的错误观念。所有五次大会一切决议案的精神都是根据国际决议的，所以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如不承认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便是不承认国际决议是正确。

后来罗亦农、彭述之要将五次大会后失败的责任归于五次大会的本身，这是一种可耻的企图。他们主要的理论点是：“五次大会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空气。”现在罗亦农、彭述之皆以曾在五次大会中反对过小资产阶级的空气自雄！彭述之并指和森为此空气之一人。其实这是很可笑的；当时实际情形本来是这样：

（一）五次大会后接受国际的指示，肯定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和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是正确的，注意取得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也是对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最广大的群众是稍有田产的自耕农、手工□、店员及小商人等。中国是这类小资产阶级群众占多

^① 以上为译稿，以下按中文《顺直通讯》刊印。——原编者

数的国家。这类小资产阶级下层的广大群众，在革命及革命后都是应相当注意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原则是无可非难的，问题只在领导的政策和态度。俄国也是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如多数派在俄国革命中及十月革命后对于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及态度，始终是正确的，无可非难的。所以五次大会于坚决地抛弃资产阶级之时，同时又决定有取得小资产阶级领导之必要，这是完全对的。

(二) 五次大会只决定必须取得小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原则，并未决定领导的具体政策。

(三) 上海机会主义的主要负责人，在五次大会中并未抛弃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根本观念。关于这点，独秀同志有正面的不文饰的表示；而亦农与述之则用声东击西的伎俩，从侧面来反对五次大会完全与资产阶级决裂的政策。所以他俩在会中夸张地说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危险。当时和森的答词大意是：“我们与小资产阶级合作不是没有危险的，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但是现在在五次大会中不应像述之同志把此危险夸张得太厉害了，因为现在当前的主要的危险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危险还是将来一点的事。如果现在把小资产阶级的危险夸张得过甚便是教我们仍然回复到与资产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呵！”述之及亦农同志要于无形中拉回五次大会继续走他们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旧路，和森同志公开地揭破了他们的假面具。

(四) 要判明和森同志是否是“小资产阶级空气”的罪人，最好去审查和森同志在五次大会中的演说（当时有印刷的演说稿）。在和森发表关于国际决议的演说中，有一段是关于小资产阶级的，其大意是，首先引证法国大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之不能领导，因为他一见革命潮发展到最高度时，便畏缩向后退，以致法国大革命失败；俄国亦然，二月革命本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少数派和革命社会党）领导的，但一见工农的高潮起来，即畏缩

而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妥协，以致二月革命破产；最后指明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之动摇，坚决地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而能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应采取坚决的领导态度而不应尾随他们的动摇、犹疑，做他们的尾巴，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现在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如若不然，我们的革命也将如法国及俄国二月革命一样的破产。这个演说的末段，特别指出一种“和平转变”的幻想，以为由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及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可以和平的转变到社会革命，可以不用无产阶级自己的争斗方法，可以到社会革命，和森坚决说明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指孙科、谭延闿等）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以举行3月20及4月12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便是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这个演说，现在还有五次大会的记录保存着。

由以上所引当时之实际情况看来，可见五次大会并无所谓“充满小资产阶级空气”，只有当两湖失败时跑来北方宣传党的政策“过左”“只顾工农利益，不顾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彭述之先生才真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空气！

然则五次大会没有缺点吗？有缺点：没有执行政治纪律，没有解决党的组织问题，没有征服机会主义首领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因此让机会主义继续其生命与发展。

（七）五次大会前后新机会主义的来源

上年4月中，我从莫斯科回到武汉，首先撞着一个问题便是第二期北伐的问题。新国际代表鲁易同志一到武汉即与鲍罗廷同志政见冲突。鲍主张立即实行第二期北伐，土地革命待打到北京后再实行。鲁易反对此主张，以为现在革命应深入，应立即实行

土地革命，巩固既得革命之根据地。于是有所谓深入广出之争。鲁易主张先深入然后广出，老鲍主张先广出然后深入。鲁易在五次大会对老鲍的主张取了一个总名称，叫“西北学说”。西北学说的要点大略如下：

(1) 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势力太大，谁到东南不是投降便是失败，远如太平天国，近如我们的 4 月 12 及蒋介石之投降。所以东南不是革命的根据地。

(2) 西北帝国主义的势力薄弱，且又接近苏俄，故可为革命根据地。

(3) 东南是中国资产阶级势力的中心，蒋介石与我们正式决裂之后，对于武汉经济封锁，商业停业，汇兑不通，食料燃料日见恐慌。如不迅速北伐跑西北，即使蒋介石不打来，不到几星期，武汉政府在经济上也要自溃自倒。

(4) 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迫在眉睫；河中三十几条兵舰已卸炮衣，水兵陆战队日有上岸之谣，外商尽行关门停止，牵着离开武汉……。若不迅速北伐，没有出路。

(5) 现在中国国际状况不如俄国 1918 时代：彼时大战初了，资本主义国家破坏不堪，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牵制并反对武装干涉。若不早为之，所行我们一切皆要失掉，所以巩固既得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只是句空话。

(6) 此时小资产阶级国民党领袖们对于经济封锁，武装干涉，社会普遍的不安与动摇正在忧惶万分，怎能再强迫其实行土地革命？如此只有使国民党离开我们，使左派与蒋介石妥协而与我们分裂。

(7) 唐生智靠不住了，非迅速北伐接出冯玉祥出来牵制他不可。同冯玉祥到西北去可以开一新局面。

(8) 所以现在革命只有广出，土地革命只有打到北京后实行。“北伐”可给忧惶无指的小资产阶级首领一个很好的希望与出路。

他们要乐意跟着我们走这条路；这样才算是我们领导他们。

由上看来，西北学说实际是一种“逃跑主义”。其中充满了对于自己势力的悲观和对于敌人势力的恐怖；归根结蒂还是一种利用军阀以制军阀的老政策。他对于世界革命是悲观的，过于估量资本主义稳定的势力，而完全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能援助中国革命。他对于中国革命是悲观的，过于估量东南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不相信东南无产阶级的势力，认东南无产阶级的势力也如太平天国或蒋介石一样不是失败便是投降，不是投降便是失败，更坚固了他的这一“定命论”。

西北学说到讨论第二期北伐时才显著，然在此之前，这种思想已影响了实际政策：这便是指对于北伐出发后的广东及东南的态度。北伐出发后，我们在广东的势力并不劣于李济深。老鲍于此时企图巩固广东于我们自己的势力之下，反而把广东巩固于李济深的势力之下，帮助李济深大大扩充省防军。本来是一个老虎还要为他添一对翅甲！说是要利用李济深在后方发展势力以牵制前方的蒋介石。为什么这样糊涂？因为他脑袋里有一种西北学说。认为广东不可为革命根据地。其次是对于蒋介石经营东南的态度完全是放任的，因为他初以为蒋介石到东南不是失败便是投降，横竖东南不可为革命根据地，让他去锐意经营罢。南京本不是蒋介石自己的军队打下的，乃是南京下后，武汉对于自己的军队半点也没有指导，二六军负责工作的同志跑回请方针，而同时二六军已被何应钦解决了。所以广东与南京的失败，西北学说实负了责任。（西北学说的根源，胚胎于越飞及马林在中国之时。彼时马林等认广东在香港炮口之下，不能为革命根据地，应拉孙中山到西北去才能与苏俄接近。故马林反对和森在《向导》周报第七期主张孙中山回粤恢复革命根据地的文章。东江之役，苏俄同志在粤者又有同样倾向；老鲍主张孙中山北上，与此倾向有直接关系。）

然此时所有在武汉的负责同志，对于此西北学说全未有知觉，

因为老鲍与鲁易激烈的辩论，站在国际代表团以外的我们最初是不知道的。实际老鲍早已将第二期北伐的政策提出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誓师期也分布了，现在只须中国共产党来追认与拥护此政策。因为鲁易同志激烈的攻击老鲍；老鲍也欲电国际辞职而去。

最初参加此讨论的是平山、秋白、国焘。平山、国焘主张南伐取广东，但偏重于军事财政方面；秋白主张先打南京，经由陇海路北伐。后来独秀到了，再开正式会议讨论；独秀、述之、太雷是完全赞成老鲍的；平山、国焘仍主南伐；秋白仍是经过南京北伐；和森提出四个条件的北伐政纲：（一）在两湖及其他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立即实行土地革命；（二）实行财政大改革，一切财政负担加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身上，免除一切工农和穷人的负担；（三）实行军队大改革，增加兵士月饷，取得兵士群众领导权，废除军需制，军需直属财政部管理以制反动将领之死命，军队指挥权完全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四）同时巩固后防，南取广东，并包括鲁易计划之各点。和森是主张深入与广出同时并行的，于进攻军阀之同时，给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当时国焘笑说：“照你这四条件，等于打消北伐，国民党怎能接受？还是赞成咱们南伐吧。”

后来决议由秋白起草，鲁易见之仍不满意。事实上，老鲍亦采用了折中的主张，不日国民党即迁都南京（即东征），但公布之翌日，南京失败消息到来，于是仍然回复到老鲍原来的主张，立即由京汉路出发北伐，什么条件，什么政纲也未向国民党提出。在财政上，老鲍反实行了一种有名的“现金集中”政策，此政策完全是使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感受痛苦。这是新西北学说实行的第一步。

当时上海同志集中火线于攻击上海机会主义；对于此新机会主义之突袭，全然不知不觉。这是有原因的：集中武汉的负责同

志们大都是从广东做过工作的。三二〇事变以来，老鲍无形中是左倾的领袖，北伐胜利后，他的信任更高，几乎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了。此时国际代表团中的分化是：旧的远东书记局魏琴斯克^①站在鲁易共同反对老鲍。独秀到武汉后与新国际代表的关系自然是不满的，所以老鲍与独秀之间异常接近。独秀在五次大会中的政治报告，其大纲是鲁易规定的，故有西北学说之一项。鲁易欲移转五次大会的火线向西北学说进攻，是很明显的。然大会从不知道西北学说是怎样一回事，所以当时广东代表团提出抗议，认此为莫须有之学说，要求老鲍出席说明。结果，老鲍向大会复了一个简单的信，否认自己有此学说。同时鲁易在大会中，特别表示反对张太雷同志（认为他是鲍罗廷派）而宽恕罗亦农同志，亦是因为要转移火线向西北学说之故。

五次大会开幕前二日，老鲍提出一向帝国主义让步的政策和决议草案。在他的说明中，第一段是说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机之紧迫；国际革命潮流之低落，不能牵制这种干涉来援助中国革命。第二段说明湖南民众运动之过火，不应直接收回海关、教堂及没收英美石油公司的财产。外交应由国民政府直接办理，民众不得自由行动以促武装干涉之速来。第三段，说明武汉码头工人及苦力不应该“敲外国人的竹杠”，不应该无限制苛索五倍以上或七倍以上的运费或车费，装卸时不应该私偷外国公司的货物，他坚决地指斥：“这不是真正工人应得的利益，只是流氓的利益，现在只有严厉取缔此种流氓的利益，才能保全工人阶级真正的利益；因为如果放任流氓工人横敲竹杠或偷窃货物，结果是催促外商之离开武汉，即催促武装干涉的速来；干涉一来，国民政府便□台，革命便失败，工人还有什么利益可占？所以现在损害流氓工人的利益不是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反而是顾全工人阶级和革命利

① 即维经斯基。——编者注

益。”第四段，援引列宁向帝国主义让步的教训，肯定此让步政策之必要，让步的方法，主要是向外国商人让步，在武汉政府领域之下，保护外商有经营之自由，禁止民众一切非法行动，挽回外裔离开武汉领域的决心，利用外商去反对其本国帝国主义之武装干涉。末后一段是列举一些取缔流氓工人和民众直接行动与所谓非法行动之具体禁条，流氓工人不服取缔由总工会逮捕处罚。……等等。这场会议有两湖活动分子参加，鲁易在座亦未发言；老鲍并交此议案与鲁易修改一下，即通过执行，这是西北学说实行的第二步。

这种“流氓工人”论，“利用外商去反对其本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论，及“外交官办，民众不得自由行动”论等等，这些新理论的发明，现在一见便知道是很臭的机会主义的邪说，但当时从老鲍口中说出来，句句都是香的了！

五次大会开会前几日，在国民党中央公开的讨论没收土地，以邓演达为领袖，集合国民党中各要人，唐系、谭系各将领，我们的农民部长谭平山及毛泽东、夏曦、易礼容诸同志及顾问苏俄同志二人皆参加。此公开讨论延长二星期以上。在此讨论中，军官们只是开玩笑，或则要求保护革命军人家属财产，或则反对公布《保护革命军人财产条例》，以为这是侮辱革命军人人格；谭延闿则公开反对没收土地，以为如此，则一切军队皆将反抗，汪精卫则滑头滑脑的要求规定大地主标准，曾一度主张没收50亩以上；邓演达最后不敢多言惹祸；我们的同志态度不一，湖南同志及俄同志主张没收一切土地，谭平山节节退让，提出一些不三不四的所谓地税方法及□买方法，最后不知怎样与老鲍及独秀商量，定出一有名的所谓“政治没收”，即没收反革命的财产，以避免军官们的反对及所谓大地主标准难定之难题。从现在看来，这个“政治没收”显然是回避土地革命的表词。这个政治没收，不仅军阀早已行之，即以前的一切朝代莫不行之，即犯罪之人，将其田地

充公入官是也。此时，发明这个政治没收，仿佛如获法宝一般。在未打到北京前竟能行此政治没收，在当时看来，已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似的。五次大会中，农民问题委员会正式开会讨论土地问题时，即采用了此种政治没收的办法。当时鲁易在座并未反对；同时他还发言表示不赞成俄顾问所□之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只赞成没收庙宇祠产及大地主的土地。显见此时，他对土地问题没有确定的具体的态度。这笔回避土地革命的公案，也是在五次大会之前及五次大会之中做出来的。

在五次大会之前，向帝国主义让步的政策既如彼，而回避土地革命的政策又如此，现在剩下的便是对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題。对小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是西北学说实行的第三步。

在五次大会前，旧中央局曾经开会讨论店员问题，因意见不一，没有结果，此次会议情形大致如下：独秀同志提出取缔店员要求的条例，并说店员问题非迅速解决不可。和森发问：“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注意取缔店员？据我所调查，店员要求并未过火，上几月增加的工资已被提高的物价超过了”；同时反对此条文中“店员增薪应视店东财力之大小为准”的原则，以为一切工薪应以物价为准则。独秀说：“汪精卫到此，首先着急的是向我们提出此问题，因为现在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非常动摇，怨恨国民政府，中心问题是店员要求过火。”当时国焘亦反对，所以此次会议没有结果。五次大会开幕之第几夜，新中央常委开会，有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二同志前来报告汉阳店员、童子团又有过火行为，封闭了两个小工厂和线店，国民党中央闻悉大怒，汪孙谭等顿足痛骂，情形异常严重等等。独秀闻此，亦大为惊怒，因此与国焘口角激烈，国焘愤而退席，几星期不参会议，外间因有张左陈右之谣。这都是“对小资产阶级诸问题”的决议案未出以前，讨论小资产阶级问题没有结果的经过。

实际上，对小资产阶级让步的问题，在老鲍报告对帝国主义

让步政策时已明示其端，不过彼时鲍、鲁之间意见并未成熟，故只先决定对帝国主义让步的策略。凡国民党首领有所表示，老鲍无不首先接触，故鲍、鲁之间在五次大会前后即辩论此问题。首先辩论的详情，我们不知，据鲁易说话的语气看来，知道他与老鲍间的意见不是实际让步不让步的问题，而是整个形式上和原则上的问题，如老鲍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要“共同决议，共同执行”，而鲁易则主张中国共产党于每一问题中表示独立的阶级的态度和主张，老鲍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形式上应承认国民党的革命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只要在事实上拿住群众，形式上常常拥护国民党的主张也不要紧；这点是鲁易激烈反对的。可是这些原则上的争点，我们开始并不看清楚，因为他们的辩论，我们不知道，讨论此问题的会议，老鲍本应出席而未出席。所以他们的意见，我们从好几场会议之后，才隐隐约约看出一些。

当时实际的情况是这样：（一）两湖资产阶级及地主尽量地把他们的声音送到唐系、谭系、桂系的军官政客及国民党中央，口口声声说现在乡村没有国民政府的权力，县知事等于虚设，只有农民协会是政府（这本是实际情形）。在城市之中，工会是第二政府或实际的政府。（二）帝国主义者一见国民党政府要人便讥笑他们没有权力，说工会是第二政府；（三）所有土豪劣绅皆宣传农民运动过火，所有城市工商业者皆痛心疾首于店员和工人之“过火”；（四）长江下游的资产阶级全体动员攻击两湖的赤祸，来影响武汉内的地主阶级成分，及推动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五）小资产阶级上层即所谓工商业者异常动摇与怨恨。所有这些情形与影响，在国民党内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首先反映着；在我们党内老鲍首先反映着。

此时国民党假左派首领们的理论是：（一）武汉政府完全孤立危险了，两湖工农过火，闹得天怒人怨，所有军队即将起来反对，所有工商业者皆起而响应或欢迎蒋介石，既有不可避免的帝国主

义干涉的厄运，又有下游封锁和蒋介石打来的危机，奉军在北，杨森窃观于西，这样下去，武汉政府一定要失败的；（二）所谓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现在是绝对没有希望的，所谓工农势力，广东百万农民经不起李济深之一击，上海80万工人经不起蒋介石之一击。纸老虎吓死人，坏事有余，成事不足；（三）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只是空招牌，完全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傀儡。乡村农民协会是政府；可以没收土地，逮捕及枪毙一切人，城市工会是第二政府；国民党下级党部目无中央，只是服从中国共产党命令。所谓国民党领导革命完全是空话，完全是中国共产党斗国民党的；（四）假若中国共产党能领导革命成功，我们做中国共产党傀儡还值得，现在中国共产党乃是领导我们到失败，我们做失败的傀儡太不值得了；（五）两湖的农民运动并不是真正的农民运动，乃是地痞运动，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并不能领导民众运动，因为民众运动“领导失人”所以弄得这样糟；（六）现在只有停止一切过火的民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将民众领导权和革命的领导权切实归还于国民党，让国民党来纠正他、裁制他、整理他。

现在我们试拿这种假左派的理论来与老鲍的西北学说比较；可见老鲍的态度是悲观而到退让，假左派的是由悲观而到进攻（向我们及民众运动）。老鲍由悲观，教我们让国民党以形式上的领导权，汪精卫等由悲观，硬向我们索实质上的领导权。至于趋向停止民众运动，把一切罪恶归于所谓工农运动的过火，这是老鲍与汪精卫等之间，没有不同的。

五次大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第一场正式会议，独秀做了一个政治报告，提出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问题，说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恶化，现在只有两条出路，或是决裂，或是让步。在独秀的报告中，许多材料是从自己与老鲍与汪精卫的接触中得来的，并引了一些老鲍的话。可是这场会议老鲍未出席。鲁易发言的第一句是：“五次大会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只决定原则，没有决

定具体政策，现在讨论出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具体政策是必要的”。当时鲁易提出三个问题：（一）对城市工商业者的问题：即限制店员要求的问题等；（二）对于乡村小资产阶级问题，即保护小地主等问题；（三）取缔民众直接逮捕与枪毙反革命等问题；在此问题中，鲁易略提出工会是否有“专政倾向”的问题，但他未多说。独秀见事有许多地方是敏锐的，当时他说：“单讨论此之问题还不够；应明白地讨论民众运动和其领导权的问题。现在汪精卫等开口也是领导权，闭口也是领导权，甚至公然说民众运动领导失人，中国共产党不能领导民众运动，民众不受国民党及政府的指挥……。质言之，其他问题，都是陪衬，主要的是他们要求一切民众运动受他们的制裁和指挥。现在我们应严重地讨论这个根本问题是否能向他们让步？”

独秀一针见血，提出这个根本问题来讨论，这是很对的，当时和森也赞成讨论此根本问题。可鲁易表示不愿意，他并不多说理由，只是说了一句气愤的话：“也许我们永远不愿意同他们讨论此问题。”在这情形中，显然可见鲁易与老鲍间一定有很深的辩论，而鲁易在会中不向我们做一详细的说明，一面令人莫明其妙，一面令人对于他这种态度感觉不满意。

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鲁易提出所拟“关于小资产阶级国民党诸问题决议”案，正式通过。至此西北学说的三大政策——回避土地革命的北伐，向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让步——遂在实际大功告成；而此两路总退让的大政方针，还完全支配了一直到武汉失败的两个半月（五次大会是5月初闭幕的）中最高指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这是中国革命第二次大失败的总因，也是五次大会前后新机会主义泉源。以后政治局一切的工作，一切的错误，一切的动摇与犹豫，却不过是演绎此两路总退让的大政方针之必然的现象与结果罢了！

然则当武装干涉的形势那样严重，当小资产阶级那样的动摇，

还绝对不应向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退让吗？当然不是的，在一定范围内（即在不妨害土地革命，不损害工农利益的范围内）某几种退让手段是必要的；但这种退让决不是我们政治上的主题，这种手段决不能妨害我们“土地革命”的目标。从五次大会起，我们政治上的主题是“进攻”而不是“退让”；我们的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而不是回避土地革命。在理，我们只有秉着五次大会“进攻”的总方向，土地革命的总目标，以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正确政策，打破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首领的犹豫与动摇，坚决地领导革命一直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跑，这样则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可是事实上完全相反，西北学说无形之中，引导我们转向总退却和回避土地革命的方面走，同时抛弃无产阶级坚决的正确的领导态度，而附合与发展了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的犹豫与动摇。这样一来，革命怎得不破产？

鲁易只有坚决地维持国际决议和五次大会的精神，指明我们现在政治上的主题是“进攻”，是进行土地革命，是要以无产阶级坚决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犹豫与动摇，而一切所谓“让步”的问题不过是一种副题，这样才能树立他在政治局的指导而制胜西北学说的指导。在这一点上说，鲁易在实际上自己也不知道已向西北学说投了降。纵然口头上他还维持一些争辩与原则，然实际上西北学说所演绎的退让方针，已成为中央政治局独一无二的总路线，鲁易也不过是此路线中左翼的合作者之一员。

鲁易在新中央政治局不能取得信任之次要原因，还有几事：（一）他与平山上年2月间到广东留住了一个多月，对于广东问题，无所建白，仍然维持“利用李济深中立”的老政策。平山甚至以“广东问题，广东自身不能决定，全靠前方的变化即南昌与武昌间关系的变化来决定”教训广东负责同志。鲁易与平山离粤不过三星期，李济深即开始屠杀；（二）鲁易等经过湖南时，在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公开表示不赞成反蒋；（三）鲁易初到武汉即欲魏琴斯克

同赴上海去见蒋介石，武汉负责同志严厉地反对，不到二日，4月12日的消息即传来。

由此，中央政治局中自然西北学说的指导要占绝对优势力！

（八）机会主义下的中央政治局

五次大会开幕约两星期，5月18日夏斗寅在湖北叛变，同时许克祥在长沙叛变消息亦非正式传来。和森与立三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若唐生智全部叛变，则直由粤汉路取湖南为根据地，再进攻湖北与广东；同时发动一切工农群众起来做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与武装，并开赴前敌助战；同时提议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当时鲁易与秋白同志以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关系弄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急务便在建立此中心。

当时实际情形是这样：夏斗寅叛变一起，进攻武昌，距武昌只40里（抵纸坊），所谓左派首领皆吓得面无人色，魂飞天外；民众间亦大起恐怖，纷纷逃亡，即工人纠察队亦有逃亡者。同时谭延闿、唐生智互相发出相反的宣传：唐谓此次两湖事变是由谭延闿勾结他的部下何键起来的，谭谓此次事变是由唐生智主使的，是唐的苦肉计，可见共产党一面在湖南胡闹，一面又相信唐生智之不智……。当时和森根据各方面所得材料（此时和森暂代秘书长），证明以上两种宣传都是故意蒙混耳目的，谭之参加此次阴谋自不待说，夏、许、何是唐的部下，两湖是唐地盘，哪有唐反置身事外之理？可是鲁易当此紧张之时不仅未把政治局的中心问题置在镇压反革命上，反而把它建立在所谓与左派的关系上，这是与老鲍全然相同的。

和森、立三的提议采用了一半，便是叶挺及中央军校的武力都开去迎击夏斗寅，工人纠察队要求国民党政府从汉阳兵工厂发

2000支枪，并几千元月票，汪精卫等在口头上答应了。中心问题既然还是“左派”问题，于是对于夏斗寅的叛变只当作是一件临时的事变去应付。中心，政治局的全副精神力量自然只集中于所谓左派关系问题。这便是我们在两湖失败的致命伤。两湖始终是由于放任夏斗寅、许克祥的暴动在肘腋之下长期发展失败的！假使中央政治局一开始便集中全力于剿灭反革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巩固两湖根据地，我们决不致遭受后来那样不荣誉不争斗之可耻可羞的大失败。假使当时认为中心问题是以全力扑灭夏、许及唐、谭一切反革命的阴谋，结果也许可使所谓“左派”由动摇而稳定，由离心而向心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改良与左派的关系。因为所谓左派完全是随势转移的；夏斗寅、许克祥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发展，他们一定要趋向于反革命；我们工农能以自己力量剿灭一切反革命，他们也许中断反革命的倾向。

当然以上所说，都属事后追论。当时和森、立三并未真知灼见到如上所说之深切。不过假使当时鲁易能因和森、立三那种本能的偶然的提议，把中央政治局的火线集中于发动自己的势力去扑灭一切反革命和阴谋，两湖是决不会失败的那样迅速和可耻。

在夏斗寅叛变时的紧急会议上，除了决定一些叶挺出军及发动民众势力，扩充纠察队等办法之外，又推鲁易起草一个关于夏斗寅叛变的宣言。在此宣言中，现在可指出两点错误：（1）承认农民运动的过火，但不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乃是农民自己做出来的，便是说中国共产党不负此过火的责任；（2）承认共产党不仅保卫工农利益，并要保护中等阶级工商业者之利益，号召这些中等阶级工商业者不要受夏斗寅的蛊惑欺骗。从这两点看来，可见鲁易也丧失了头脑和原则！

不久湖南许克祥的马日事变证实（但中央特派员李维汉同志及湖南省委始终无报告来），老鲍异常焦急，急欲与平山及国民党中央所决定的查办代表团（老鲍、平山、彭泽湘、陈公博及唐生

智代表二人)赴湘,一面查办许克祥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的过火。此事是老鲍决定的,鲁易是反对的。结果老鲍偕比查办团行至岳州,许克祥来一逮捕与就地枪决之电,六人皆逃回武汉!老鲍这种主张当然是很错误的:(1)查办农运过火是原则上的错误;(2)不想用势去对付反革命,而想用合法手段去查办反革命,根本是笑话;(3)“单刀赴会”的故事演不成,结果便丧失了所谓国民政府及老鲍的威信,反革命愈益张目。鲁易反对是对的;可是鲁易也只会消极的反对,并提不出积极的办法。

在有一场政治局会议上,鲁易与老鲍各自发表长篇的演说。老鲍的大意是:(1)现在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2)我们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假若现在我们与他们决裂,便是中国革命完全的失败,我们将什么也没有;(3)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便是指与他的现在的中央合作。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他的中央;或是推翻他的中央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现在党内有此危险的倾向,应攻击此倾向(暗指鲁易);(4)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我们的胜利,便是土地革命;(5)共产党中央会[现]在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鲁易的大意是:(1)现在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已经不是左派而是土劣、地主、军阀的代表。我们应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2)推翻国民党现在的中央,并不是根本决裂与政变;(3)我们现在应一直到工农民主独裁制(未多说理由);(4)共产党中央应发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近日所公布之一切反动法令,在这些法令中不仅反工农运动,并且保护封建制度。

鲁易之后,和森发表的大意是:“我们听了老鲍和鲁易的演说

之后，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在老鲍的演说中，有些动听的办法是可宝贵的，但试拿以与国际决议案相比较则完全与其原则相违背：如国际决议教我们实行土地革命，而老鲍则教我们只做到减租、减息便是顶好的土地革命！又如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农民运动过火，而现在代表土劣、地主、军阀的国民党中央一点不好的倾向也没有，反教我们去拥护他们咒骂民众运动，取消民众运动的法令；这样，还有什么原则？至于鲁易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空空洞洞地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已经不是左派，我们应当推翻他，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党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至于鲁易忽然提出工农民主独裁制，也与国际决议不相合，是否国际有所改变应请说明，以我看来，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鲁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

秋白同志接着说道：“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在他看来，仿佛鲁易与老鲍之间，一个懂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原则，一个不懂得‘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原则似的。其实老鲍与鲁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只是对于国民政府内资产阶级的成份是否完全排除的估量上有点不同，在鲁易及莫斯科的同志们以为中国农工小资产阶级联盟业已成功，国民政府内已经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成分，所以认土地革命可以尽量实行。老鲍则认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还未成功，因国民政府内还保留许多资产阶级成分，所以上地革命不能彻底实行。我（秋白自谓）也觉五次大会决议关于这一点没有指明，太把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说完成了一点，仿佛此联盟完全成功了，没有资产阶级成分在内了，这是一个缺点。”

在有一场政治局会议，独秀同志在报告中说道：“我昨日与老鲍谈话，老鲍指出湖南农运不是我们的领导，而是地痞与哥老会

的领导。这样怎得不糟!”这个新发明在不接近群众的中央政治局看来，真是动听。由此农运的“地痞论”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国是：每一个农民运动的通告除了抄写一些国民党咒骂农运训令之外，一定在组织方面要禁止地痞做农协委员，一切农协委员皆应由在业农民未离开土地的农民来担任。这个也成为天经地义了！

湖南马日（5月21日）事变，不是许克祥的功劳；乃是湖南省委负责人及中央特派员指挥自溃的结果。从5月18日以来，省委即知道许克祥将响应夏斗寅，中央特派员及省委负责人，先日分析政治，谓将是唐生智整个的叛变，武汉一定已没有了，以为没有办法抵抗，只有逃赴江西边境去。明日知道河南郑州已下，武汉无恙，则又分析政治，以为许克祥不会暴动了；最后知道许克祥确要暴动，省委乃自行解散，重要人每人发200元，次要100元，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后来五人临时委员会决定号召长沙附近各县30万农民于5月30日进攻长沙，□□□同志见此命令大发雷霆，斥为小孩子的把戏。他的理论是：“即使我们能取得长沙，唐生智便要与我们武汉政府翻脸，是我们有了长沙而没有了武汉。现在武汉政府既然存在，便只有请求国民政府用法律手续来解决！”

郑州下，摇动不堪的逆迹显著的假左派首领都赴郑州开会。此时中央政治局开了三次重要的会议。一次是讨论郑州下后的北伐问题；此时冯玉祥反共态度已较明，独秀同志已悟前此北伐政策之错误；他现在所忧虑的是冯玉祥所唱的“共同北伐”（号召武汉南京共同北伐），他知道共同北伐成功之日，便是共同解决共产党之日，所以此时独秀同志及老鲍都认“东征”是唯一出路。在此次讨论中，独秀、立三、秋白是主张东征的；鲁易、平山则仍主张南伐取广东；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当时和森这样说：“现在我有个奇怪的不同意见：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

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这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问题应首先解决。许克祥的反革命，任他在湖南延长的发展，我们所在地的湖北，自夏斗寅叛变后，已有43县的农民和农协处在土劣军阀的白色恐怖之下，死的农民已达3000以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不解决，而高唱东征、南伐，只是一句空话！”当时和森提出所拟之湖南、湖北的决议案（已在常委通过）要求政治局讨论追认。关于湖南决议案的大要是：（1）坚决地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势力来解决许克祥，向长沙取围攻封锁之势；（2）绝对地不要相信和倚赖国民政府合法的解决，他是故意纵容许克祥的，即使有所谓合法解决之日，他不过是用法律手段来代替许克祥暴烈手段，即合法地来取消农民运动；（3）自动地没收土地，农民势力到那处即将那处的敌人杀尽，土地没收，并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4）在此反许争斗中，应发展农军至5万以上；（5）在最短期间应发展国民党群众至30万以上，准备推翻现在代表土劣的国民党中央。关于湖北是：（1）积极号召全省农民群众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劣、军阀猛烈反攻；（2）积极利用省政权（当时在我们之手）、县政权，扩大省防军及工农武力，尽量肃清各县一切敌人；（3）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及同志的武装；（4）自动没收土地；（5）迅速准备广大群众势力推翻国民党土劣的中央机关，并改组之。此日恰好国际来了一个电报，责斥中央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责斥平山就职演说之回避土地革命，警告中央改变态度，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同时指令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农民自动没收土地，否则中国革命将一败涂地。鲁易看完两湖决议案之后，表示完全同意，认为与国际来电相合。翌日鲁易提议要求国民政府讨伐朱培德，同时我们派50名军事同志赴江西，准备暴动推翻朱培德，和森根据此意用常委名义发一准备暴动推翻朱培

德的训令于江西省委。后来平山表示反对。

此时中央政治局有点“进攻”的新空气。同时湖北省委根据上述之湖北决议精神开了一全省代表会。在湖北之各省地做国民党工作的同志，经过中央常委的指示，开始宣传反对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同时派去大批军事同志赴湘发展农民暴动，推翻许克祥。这些军事同志去时，中央常委出席说明是要准备对付整个的唐生智的反动之到来，于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组织一湖南特别委员会，专为指挥湖南暴动。后来此会开会数次，外国同志将暴动计划改了又改，同时所决定之款项迁延不发，而我们已派去大批军事同志前去，须要计划与款项异常之急：最后外国同志听了一个不关重要的报告，认为我们自己在湖南的势力已完全瓦解，暴动为不可能，对于前次所决定之款完全翻腔，于是军部周恩来同志与鲁易大闹一场，取消此委员会。

郑州下后，中央政治局另一场会议，独秀同志作了一个乐观的政治报告，大意是：张发奎军队已自动地撤回武汉，唐生智军队亦继续撤回武汉，是共同北伐的计划已被打破，共同解决共产党的危机业已延缓。鲁易接着指明现在情形并不容许乐观，反革命继续在湖南发展，屠杀工农和我们的同志（其时长沙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委整个被杀），冯玉祥在河南反动，朱培德在江西反动，驱逐一切共产党分子和政治工作人员出境。他指明现在我们只有向敌人进攻才有出路。当时和森赞成这个进攻论：“我们中央政治局从今日起，必须具一种明确的意识：再也不要说甚么让步，什么取缔工农过火这类的话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再也不要退让而只是进攻。我们应首先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央下总攻击，我们要向民众动员起来攻击他，我们要在机关报上动员攻击他，同时我们准备一进攻的政纲，待汪精卫等由郑州回来与他们正式公开谈判，揭破他们的假面具。”当时任弼时同志提议发宣言，于是宣言、政纲皆推鲁易起草。同时鲁易提出两个“惊人”的建议：（1）武汉全

体工人总罢工，反抗国民党政府纵容许克祥，汉阳兵工厂工人应特别罢工，表示不解决许克祥不再造枪炮杀自己的人；（2）发一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的宣传大纲，并提出要求免朱培德职及讨伐朱培德的口号。此两提议虽经多数长久之犹疑与争辩，卒得勉强通过。

可是通过此案的消息传出去之后，真是闻所未闻的骇人听闻！老鲍闻之，气得要死；彭述之闻之，到处宣传中央与湖北省委“荒唐”，“竟喊出打倒朱培德，讨伐朱培德的口号呵！”谭平山闻之，臭骂鲁易左派幼稚病，不懂中国情形……。于是群相告语，若大祸之将至：“这不是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么？我们有甚么准备，能这样开玩笑！”“兵工厂罢工来一个屠杀怎样办？”“国民党政府唐生智、朱培德、冯玉祥……一律表示反对，我们有何力量抵得他们一个打击？”“荒唐！”“幼稚！”“发狂！”……如此等等，俨然大祸将至一般。为甚么这样惊慌，这样骇怪呢？因为退让已成习惯，对于国民党和新军阀已养成一种驯顺的心理，现在忽然有违反此心理与习惯的决定，所以莫不大惊大怪起来。这是证明机会主义入人之深，已使一切上层同志没有阶级的仇恨情绪与感觉；天天坐视许克祥在湖南，夏斗寅在湖北，朱培德在江西，冯玉祥在河南屠杀、放逐，压迫我们的同志及工农群众，此处无抵抗，那处也无抵抗，久而久之，遂把一切上层负指导责任的同志的阶级感觉与仇恨都麻木了。反之，对于久相往来的大人物领袖之驯顺恭谨的感觉却异常灵敏，所以此时下层群众所感觉奇怪的正是“共产党何以此时不反抗许、朱、冯等的屠杀、压迫，及国民政府的纵容？”而上层同志所感觉奇怪的完全相反，乃是“为甚么此时我们可反抗国民政府，及汪、谭、朱、冯、唐……等？”

于是下一场会议要求取消原案（由多数的反对）。此时和森虽还一度坚持，然鲁易自己表示：“现在既然一些职工运动的重要同志都不赞成罢工反抗国民政府，自然可以容纳大家的意见修改原

案。”秋白亦说：“我们进攻是应有准备的，全无准备而贸然进攻是无益的。”于是立三提议改反抗的示威罢工为欢迎北伐军凯旋的罢工。同时关于朱培德的口号，亦大加修改。

由以上的记录看来，从夏斗寅、许克祥叛变之时起，我们便应以“进攻”、“暴动”、“政变”为中心问题；因为从这个时候起，地主、上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及国民党左派已公开地向我们进攻，向我们暴动，向我们政变。只有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才能制胜一切敌人。在夏斗寅叛变之时，鲁易还认左派关系为我们中心问题，这是与老鲍同样错误。后来否认此左派而主张推翻其中央，这是鲁易的进步；可惜他不能贯彻此主张，公然不讳地承认有“决裂”和“政变”之必要；老鲍反用决裂和政变来反唇相讥，鲁易辄不敢自申其说。郑州下后，鲁易指明时局之严重，第一次明白地提出“进攻”的标语，这是非常之对的！假使鲁易能坚持，不因一时之反对而自缩，结果一定可在中央政治局树立一种进攻的指导去替代那退让的指导。可是鲁易自己不能坚持，一经反对便自己让步。从此中央政治局遂永远不能超出退让政策的厄运：“进攻”的空气刚一抬头即为西北学说的无形势力所打落。

当鲁易提出罢工原案时，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他说：“现在有一种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企图反对进攻，便是说我们没有准备不能进攻。”他这句话是指老鲍的。其实湖南500万农民的组织，虽受打击，并未冷却火气，两湖工农势力纵不雄大，也不致一个反抗的罢工都不能做。在此情况之下，还以无准备为借口去阻止进攻的方针之提出，当然是一种西北学说的机会主义。

当郑州未下之前，唐生智的危机并不减于我们。因为他的主要部队都开赴河南，湖南异常空虚，留驻湖南之兵，连湖南、湘西计算，不及四团；而我们湖南农军的枪枝早已超过3000以上，叶挺军队借迎击夏斗寅已扼粤汉路而留驻湘鄂交境，同时湖南有

20 县以上（最著者有长沙、浏阳、湘潭、湘乡、益阳、茶陵、攸县、湘阴、衡阳、宁乡、衡山、郴县、祁阳、耒阳、安化、新化、安源、萍乡、醴陵、汝城……）的广大农民群众，不顾省委之溃走及中央特派员取消暴动之命令，他们英勇地坚决地自发自动地暴动起来，唐生智是完全可以推倒的。并且在我们的政变胜利之下即可用民众的势力来改组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而成功我们领导之下的真正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这个可能在当时确是有的。唐生智很懂得这种可能的危险，所以他在当时极力向我们卑词下礼，常常从前方直接打电报于我们的中央表示他的忠实，常常在前方故意公开讲演拥护三大政策，反对许克祥，否认湖南农民运动过火，总括一句，他的言论，比汪精卫、谭延闿任何一个都左得多。他为什么要这样表示呢？便是他怕我们在两湖起暴动，又知道我们有取得两湖之可能，乃故意卑词下礼来缓和我们，使我们相信他不是夏、许叛变之主谋，使我们相信他有自己回湖南解决许克祥之诚心。果然不错，我们就中了他这种鬼计！

第二期北伐有一点好处，便是将唐生智在两湖的主力军调出三分之二于河南。假若我们有先见之明，乘此时机准备两湖暴动，用自己的势力来巩固两湖根据地，来实行土地革命，来改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老鲍根本无巩固革命根据地和实行土地革命之志愿，不必责备他；鲁易徒有此志愿而完全不知利用北伐出发后之形势，消极方面只知反对北伐，积极方面只知要取广东。老鲍无异抛弃两湖想西北，鲁易无异抛充两湖想广东！广东与西北虽不同，其忽视两湖是一样。

当夏、许叛变时，我们曾说：“这是唐生智的三月二十”。话虽如此说，可是全不知利用“三月二十事变”的经验与教训来对付唐生智。三二〇事变的经验是甚么？蒋介石原先本拟与我们完全决裂，后来检查他自己的势力完全使他失望，因为三月二十以后，黄埔军官学校学生整个左倾，反对蒋介石，不服从蒋之命令

或调遣，同时其他各军如谭延闿、程潜之湘军，朱培德之滇军，在三月二十都是反蒋的。所以三月二十事变是我们的危机，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危机，蒋于此危机之下只有高唱北伐，找他自己的出路。三二〇事变的教训是什么？是一味退让而不知反攻。假使三月二十以后，我们能发动愤不可遏的工农势力及左派军事势力来对付蒋，蒋是无可如何的。现在拿上面所述的情形来对照唐生智的三月二十，情形是很相像的，性质与程度却更严重了；因为此时两湖发展的工农势力比较广东三月二十时要大十倍以上，同时湖南 500 万组织的农民已实行用自己的势力在那里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因此所有一切国民革命旗帜下面的新军阀都倾向反革命，这些都是性质上程度上更严重的地方。因此唐生智经营他自己的三月二十（实际是五月十八）到四月十二（实际是七月十五），与蒋介石便有些不同，蒋介石积极经营北伐，唐生智对于第二期北伐的态度是不积极的，他开始很不愿意调出他的主要兵力于河南，他知道这个时候对于他两湖的地盘太危险，蒋介石知道两湖、江西拿不住，故拚命经营东南做他的根据地，唐生智则始终知道要巩固两湖做他的根据地，后来之高唱东征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用。在理我们应当怎样去制胜唐生智的三月二十到四月十二呢？我们只有百倍地利用三二〇事变的教训，乘唐生智兵出河南之后，在两湖举行我们自己的三月二十和四月十二。纵不然，在夏、许叛变之后，我们以暴动对付暴动，以自己的势力巩固两湖，做我们土地革命的根据地，这样做去未有不胜利的。夏斗寅叛变时中央政治局中有此萌芽之提议，已属迟了一点，郑州下前的两湖决议案更迟了一点，郑州下后的鲁易提议已属太迟了。然即此一些偶然的萌芽的迟缓的类似“进攻”之微波，在西北学说的海中是起不了甚么影响和作用的！

（九）政治局的后一阶段

政治局的后一期，完全表现是一种指导破产的阶段。老鲍于武汉军撤回之后，又极力拉拢唐生智经营东征，以为唐生智野心勃勃，未得东南之时还不致与我们决裂，他再三申言“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联对武汉政府之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跑掉。”由此引起政治局对于撤回武汉的唐生智之最后的幻想，以为夏、许叛变，唐不是主谋，相信他回湖南或者有几分诚意解除许克祥亦未可知。

“进攻”的微波被打消之后，鲁易亦丧失了方针，仍然复回到所谓左派中心问题，想极力拉拢汪精卫来挽回一般的危局。由此引起政治局对于汪精卫最后之幻想，以为汪精卫还是左派唯一的首领，唐生智既还需要国民党这块招牌，便不能不屈就汪精卫一些主张，所以拉住汪精卫还是一切政治问题的中心。于是“东征”与“汪精卫”遂成为后一阶段的送命汤！过去所通过的两湖决议案实行了么？一点也没有实行，现在的两湖似乎更不关重要了，横竖唐生智“还想要吃草”，一时不会和我们翻脸，他既回来，两湖即听他去处理。而且汪精卫还是左派唯一的首领，汪、唐近来关系很好，两湖问题就更可听他两个去处理。

过去所拟左派群众工作实行了么？刚开始团结湘鄂赣及江浙闽左派分子做反汪、反谭、反冯、唐及朱培德之宣传，谭延闿等知道了（因为毛泽东同志等公开宣传），大骂共产党有推翻国民党阴谋，此消息经独秀闻之，大发雷霆，以为这一手来不得。其实此反国民党中央之宣传是经过中央常委秘书厅指示的。

过去一度拟议之发动群众去攻击国民党中央的反动，这工作做到了甚么程度呢？说来也可笑，便是只在“欢迎铁军凯旋”的停工之下，湖北总工会违反修改罢工案的精神，发了一些反抗国民党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宣言，和打倒许克祥及朱培德的标语。这

些激烈一点的表示是总工会负责同志刘少奇等经过中央秘书厅的同意做出来的。可是这又做错了，得罪了汪精卫！汪精卫见着总工会的宣言，知道这一日实际是罢工反抗他们的；他一见老鲍和独秀流泪切齿地说：“吴稚晖曾警告我，‘你日后上共产党的当时，记取吴某的话’，我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他们（即指总工会）何必联络武人来倒我！”所以到7月1日中央在武昌开扩大会议时，独秀的政治报告中犹指此次罢工的“激烈”表示，是开罪国民党左派的主要原因。老鲍尤其深恶痛恨这一日的罢工表示。

前此一度拟议提出“进攻的政纲”与国民党公开谈判的事怎样进行呢？说来更可笑，不仅没有进攻的政纲，即鲁易所拟之最低限度的政纲，也难通过。老鲍坚决地主张在此政纲中：（1）不要提土地革命；（2）不要提武装工人及工人纠察队；（3）此政纲专为适于东征之用，应特别提出一些有利于“工商业者”资产阶级的条文；（4）把过去一切取缔店员，取缔工人，取缔农民，取缔童子团及取缔一切民众运动的条文都综合上去。

此时不提土地革命的理论是：“现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冯玉祥一齐叛变，左派与我们的关系千钧一发，还同他谈甚么土地革命，谈更无益。现在只有东征才能跳出此危机。故一切较高的政纲都待打到南京后再说。”从前北伐是唯一出路，现在东征是唯一出路；从前主张打到北京后再实行土地革命，现在主张打到南京后再提出其他问题。前后照应，一气相承，这是西北学说的精神！

此时的实际情况是：（1）国民党中央公开的袒护许克祥与朱培德，说许是代表全社会反农民〔运〕动过火的，说朱驱逐共产党及左派的办法完全是对的；（2）冯玉祥仿行朱培德办法，驱逐共产党及政治工作人员出境；（3）朱、冯之举皆先得汪、谭、孙科、徐谦、顾孟馀等之主使与同意；（4）汪精卫等对各处被逐来鄂之左派分子表示，共产党问题待7月15之中央会议正式解决；

(5) 汪精卫、孙科极力勾结唐生智经营东南，欲完全取消三大政策，和一切民众运动以博东南资产阶级之同情；(6) 唐生智部下将领以何键为领袖，公开宣言不分共不能东征，不愿意为共产党东征；国民政府升许克祥为师长，马日政变之湘省政府主席张翼鹏为参谋长，中央军委直接发电拉拢夏斗寅；唐生智回武汉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完全成为唐生智的机关，汪精卫是他的“新欢”小老婆。

在此情况下，我们只有两条出路：或准备暴动，提出一进攻的政纲与所谓左派公开谈判，谈判不遂，即公开宣布左派叛逆革命的罪恶，将其政府与中央推翻而改组之。或者完全投降，赞成修改或抛弃三大政策，停止工农运动也可以，分共也可以，只要你在南京未打下以前，不驱逐或屠杀共产党，在此条件之下，还可合作东征，还可给草与国民政府及唐生智吃。前一出路，在鲁易初提出进攻及罢工示威之时有此倾向，但不到三日即被打消。在此情况之下，自然只有由鲍罗廷同志领导我们走后一条路。所以此时显然不需要一个进攻的政纲，只需要一个投降的政纲，即不提土地革命，不提工农武装；而只加重取缔工农运动之过火，把武汉政府一切赤色的标帜皆涂墨，由此去博得东南“工商业者”之同情。我们暂时受此委屈与他们合作东征，待东征成功渡过现在的难关，然后再与他们谈别的事情。老鲍的意见完全是这样的。所以此时他所亟待经营的只是想拉住汪精卫、唐生智来吃他的草，交换条件只是要他们答应在东征时期暂不实行分共，此案暂时保留到打倒蒋介石后再说；希望他们在各将领间去疏通疏通。可是唐生智直接间接的答复是怎样呢？“对呵！我也是如此想，分共案最好保留到南京打下再讨论。无奈这些赳赳武夫不听我的话，只听何键的话，所以最好还是共产党顾全大局，自动地解决这个难题！共产党须知现在也非常危险，我也拿不住我们部下！”这是甚么意思呢？这是要共产党自动地退出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免得武

人动手，因为“我也拿不住我的部下”。这个意思开始还是暗示，后来汪精卫、唐生智公开地明说，汪精卫把谭平山请去，要他与苏兆征同志立即上辞呈退出国民政府；唐生智则提出优待的办法，送谭部长、苏部长出洋考察。老鲍对于后一办法表示可以采纳！

于是最后的买卖是很明白的，老鲍与共产党所要的是在东征时期还不要分共；汪精卫与唐生智所要的是东征时间还要吃草，还要请苏俄的借款快些汇来。“请你保留分共案到南京取下后再谈呵！”“请你电催苏联借款迅速全数汇来呵！”这是最后的交易。

老奸巨滑的左派政客与新军阀还要讨些便宜，是很显明的。在我们“东征时间不要实行分共”的语气中，也可看出“实行”是不愿意的，但“议决”分共或许是可接受的；横竖这是个实际问题，他们的议决不过是句空话，他们哪有势力来管理党部和民众团体，在东征时间，他们尤其无此力量，而且他们互相间的冲突还多呢，即使他们现在决议分共，待打到南京，情形变换，难道不能再作道理？这种空气从老鲍起，在政治局中是可感觉的。假使后来国际训令不来，也许引领我们这样去投降，即一切草料给他们吃，让他们议决分共，待打到南京后情形变易再作道理。

鲁易在他所拟的最低限度的国民革命政纲中仍然提出土地革命、工农武装、惩罚反革命及讨伐广东。这些都是他与老鲍不同的。至于对左派关系及综合过去所决定之限制工农店员要求等具体条件，都没有不同的意见。鲁易自从上次受一打击后，再也不提进攻和准备决裂了。他此时的精神，似乎趋向于经常的合法的政治路线：（1）想极力拉住汪精卫为左派中心；（2）想扩大左派武力，以邓演达、张发奎为中心；（3）想在白纸黑字上维持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的原则；（4）湖南反革命问题要求国民政府惩办；（5）对于东征未表示反对，但仍提出南取广东。事后追论鲁易始终不失为一个书生，原则是在纸上维持着，实际问题一个也未见到。此时的实际问题是“决裂”、是“暴动”，是以群众的势力没

收土地，武装工农，是以群众的势力推翻假左派而建立群众真正的左派和政府，维持原则的政纲之作用不过在用以公开谈判，揭破假左派首领汪精卫等之假面目和借以与之做正式决裂的口实与号召罢了。此等政纲只有是坚决的准备与汪精卫等决裂才有作用。鲁易既始终要拉住汪为中心，又始终要提出汪所不能接受的政纲，这是老鲍始终有力制胜鲁易之点。鲁易的主张始终是矛盾的，老鲍却是始终一贯的，因为他的主张始终是顺从汪等的心理与需要的。始终要拉住汪是老鲍与鲁易相同的；但鲁易始终要做汪等的头，老鲍始终愿做汪等的尾。结果鲁易是“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老鲍是“既善顺随，又会揣摩”。

现在再叙述些别的事情：

鲁易所拟扩大左派武力的计划实行了么？没有实行。此计划原本不始于鲁易，在前一期的常务会秘书厅即有此决定，但未实行。邓演达随从第二期北伐出发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之权落于谭延闿、程潜、孙科之手，他们大大缩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之经费，并拟遣散教导团或归并于各军，这完全是向邓演达进攻的。我们曾几度计议打破此阴谋，故在郑州将下时即派国焘同志前去河南，与邓商议此事，并谋左派之新团结。然邓演达自讨论土地问题时受谭、唐、程、孙等大众之排斥，不得不离开武汉，随军出发，故他异常消极，且受托罗斯基派俄顾问的影响，倾向于第三党之说，即取消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合并组织第三党。其实也是空话，他只是消极悲观。现在鲁易是想扩大张发奎的势力，此事老鲍坚决反对，因此共产党中央军部负责同志及中央政治局多数亦坚决的反对，以为这个意思一露出，唐生智等马上就要和我们翻脸，何键马上即会暴动政变。但是鲁易终不死心，卒把此意完全告知汪精卫。

现在再说工农武装。自上海失败之后，“纸老虎”的工人纠察队说迅速发展。虽然五次大会决定军事工作的新方针是破坏一切

旧军队和武装工农，然此新方针从未在五次大会后的中央军委部执行。在五次大会时有改称“国民党工农义勇军”说。五次大会后，则以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改编入正式军队之论极占优势。夏斗寅叛变时，湖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有逃走怯懦之现象，遂益愈确定了这种“改编入正式军队”的方针，此方针亦成为政治局中的国是，虽然没有正式决议，如此写明，然精神和工作上完全朝着这个方向走。这种军事工作的新方针，在现在看来显然是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并且是违反五次大会决议的。夏斗寅之变，我本决定乘机扩大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发枪及月费，汪精卫等也曾口头应允发枪 2000 支及月费若干；但后来他们又故意推延不发，我们也不去积极要求。政治局中常有人替汪等如此原谅：“也难怪他们，武器不是好玩的，现在工农在他们看来如此过火，他们自然怕工农拿着枪便要转来打他们自己呵！”两湖议决案通过之后，湖北省委对于扩大工农武装及省防军之事曾有一度计议，但不久“进攻”空气消沉，这种计议亦随之消沉。

情形是向严重方向迅速发展。“进攻”的微波打落之后，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振，大家都沉闷得很，又像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此时可举和森来做例：和森深感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两让政策没有出路，又见全国反帝高潮已停止半年，尤其是武汉。有一夜与独秀、立三纵谈这种感想，因主张提高反帝运动，甚至不惜掀起武装干涉，在抵抗武装干涉的反帝高潮之下来猛烈地实行土地革命。当时独秀、立三皆以此主张为然，翌日在常委即决定发一提高反帝运动的通告，并特别寄一信与上海，内中参加些独秀和立三的意见。此通告及信的说明中，显然表示一种没有出路的冒险主义、拚命主义的精神，及借民族争斗来遮掩阶级争斗之理论上的根本错误（这次常委会有独秀、立三、国焘、和森等四人参加）。此通告及信发出之后，和森自己感觉不正确，因于翌日及第三日连续召集二次扩大的常

委会，请政治局全体来参加此问题之讨论及决定，但二次都只有独秀、和森二人出席。独秀说反帝运动是我们的经常工作，何必再三讨论。和森说此通告及信与对帝国主义的让步政策根本相反，而且其中的说明我不敢自信是正确的，必须提出于政治局正式讨论。是日下午，秋白来常委，和森对秋白说：此信及通告请你仔细看一下，若不是完全对，便是完全不对的。如若不对，便是一种蒲兰克主义呵（蒲兰克是法国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家，蒲兰克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来便是一种另一形式的机会主义）！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此问题时，鲁易指明提高反帝运动是对的，但其说明在理论上完全错误，并且指明不惜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之冒险政策亦是错误的。当时和森自己提议国焘另起一通告说明前一通告及致上海信之错误，这是当时混乱的表演之一例。

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既然如此混乱，鲍罗廷主义之一贯的领导愈益促进了混乱、动摇和犹疑。有一日老鲍出席于政治局会议，发表他关于中国共产党之目前任务的主张，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不要以为只有土地革命是革命的工作，例如现在中国有这样广大的失业群众，假若能把这些失业群众组织起来也便是一件顶革命的工作。又如小资产阶级看不见他们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经济封锁，我们能领导工农向他们让步，工农让步之后，他们的痛苦，依然如故，彼时他们便能觉悟到自己的痛苦是由帝国主义及经济封锁来的。我们能使小资产阶级不怨恨工农也便是一件顶革命的工作。总之现在中国共产党应从各方面多做些有效的东西，令人看着佩服……”。这些教训只有使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和动摇。这些教训在现在看来完全是一种回避土地革命的改良主义。

老鲍在另一政治局会议发表他对于土地革命的意见：他公然说明“土地革命不即是没收土地”。照他的解释，土地革命的意义和内容是：（1）减租减息；（2）乡村自治；（3）保护佃农；（4）武

装自卫；(5) 办农运讲习所，从新养成不幼稚、不过火的农运人材。当时独秀说：“老鲍这种办法好是好，但是修改了国际土地革命的意义。”秋白说：“这不是修改国际土地革命意义，按照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实只能如此做。”照老鲍的意思看来，武汉国民政府已算是顶土地革命的了，因为上列五项事情几乎皆已办到，而且在未出发北伐前的广东国民政府即已办到了。老鲍一直到底灌输这种改良主义于政治局，怎得不使我们迷离失所！此时大约国际有电报来调鲁易回去，鲁易已不管事了，老鲍每次都能出席于政治局的会议。

鲁易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便是中了“汪毒”。他还想拉住这个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卫）来做左派的“中心”，来扩大左派的武力，他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国际来电的要点：(1) 农民自动地没收土地；(2) 武装共产党5万人；(3) 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4) 组织革命法庭，严惩一切反革命。这个电报怎能告知这个逆迹昭著的叛徒！汪精卫知道这个电报之后，谢谢鲁易，跑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地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共产党即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在这个严重的错误之下，中央政治局全体反对鲁易，大约老鲍也有电致国际，所以国际调他回去。

假左派叛逆的计划是早已确定了的，所犹疑的只是用甚么口实来“分共”，公然抛弃三大政策么？这个太傻。为民众运动的过火么？更揭破了自己的假面具。这对于虚伪的叛徒确是一个难题，使他们不得不犹豫。汪精卫曾拟行一苦肉计，于7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前赴九江，名为与朱培德会商东征，实际让何键发难开刀，自己避免分共和破坏三大政策之恶名。现在好了，谢谢鲁易先生，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使他们于苦肉计外寻得一更好东西，便是所谓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消灭国民党的阴谋。

现在严重的情形到了最后一阶段：(1) 冯玉祥来电驱鲍，分

共；(2) 何键露布讨共檄文，并发讨共通电子全国；(3) 叶琪、周烂（唐部下）名为回湘查办许克祥，实际举办十路清乡，积极向农民进攻；(4) 唐生智回乡之日公开反共，将马日事变责任完全推于共产党身上，公开枪决我们二同志；(5) 何键等公开要求共产党分子立即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要求解散一切工农会、纠察队、童子团及妇女团体；(6) 何键之三十五军移驻汉口，其势汹汹，企图开刀，这是6月底的情形。

有一日下午（大约6月27）和森从武昌的病假中（五次大会后决定独秀、国焘、维汉三人组织常委，恩来为秘书长，未到前由和森暂代。后因维汉留湘，不知下落，恩来改任军部书记，国焘因事与独秀口角后消极不管事，后又赴河南。因此始终不能成立确定的秘书厅及常委，而独秀又多外面往来之事，立三忙于全总及劳工部；平山忙于农民部；后补秋白为常委又因病常不能到；而且五次大会后，好几位重要首领牢骚满腹，善使性气，秘书厅工作是最难做的。和森新从外国回来，事情又不熟悉，且终日常驻不能他走，故工作异常不周。因此大家皆露骨表示不愿和森再在秘书厅及常委。大约是6月24经政治局正式决定邓中夏同志为秘书长，在邓因劳动大会未到前由国焘同志以常委资格兼代秘书长工作。和森因病，于翌日告假到毛泽东同志家——在武昌——休息几日。）回到中央秘书厅之住屋。是夜我们中央军部来一紧急报告，说何键有今夜举事之说，各机关皆须戒备。翌晨独秀召集在西门子鲍宅开紧急会议，立三、兆征因劳动大会未出席，秋白亦未到。恩来、太雷（鄂省委书记）皆报告何键起事之消息甚盛，同时放散总工会纠察队将缴三十五军枪械之谣言与马日事变同一把戏；平山报告邓演达已出走，临行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之来到。据他（邓）所知，何键一定开刀无疑云，同时太雷提出纠察队、童子团问题今日一定要解决，恩来报告中央军部与省委军部业已决定于今日下午将总工会纠察队调过武昌入张发奎

军，并已与张交涉好，但为避免耳目计，过河时不着纠察队衣服，也不携枪。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宣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大家遂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军。同时国焘提议中央机关立即移于武昌，他说：“事到如今，我们与国民党要人还有甚么接头之余地（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撞着他们反难为情；我们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现在不如集中我们势力于武昌，整军经武，准备后事；汉口在何键暴动的威胁之下，唐部重兵皆集于此，武昌却是张发奎、贺龙、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左派军力所在地。”平山、和森皆赞成此提议。前三日和森在毛泽东家知道唐生智回湘后之公开反动（因每日都有逃亡的同志及农民到毛家来），曾写信致中央常委说：唐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察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当讨论此问题时，独秀表示犹疑，说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太不方便。讨论结果，决定中央机关立移武昌，同时省委机关亦移武昌。当即指和森立即往武昌布置机关，独秀、国焘料理常委及秘书厅事务，恩来、太雷料理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等事。和森当即过河布置机关去了。

不意省委及总工会处理纠察队之事，手忙脚乱，未向负责同志说明，以致一时大形混乱，纠察军及办事人弃枪弃职，逃走一空。同时中央秘书厅未发迁移通告，并未将是日决议告知未列席之中央委员及活动分子，以致大家也莫名其妙。

和森在武昌布置机关妥当后，翌日黄昏独秀、国焘过来，不久秋白亦偕一驼背毛子来。是夜开会于武昌之新机关：（1）国焘提议整军经武，注意军事工作；（2）共青团中央来一决议，批评党的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3）秋白有甚长之书面提议，大约系说明湖南农民问题所促进之阶级分化的革命危机，主张土地革命暂以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保护佃农等

为条件，待有武力再实行没收土地，中心问题，仍在贯彻对国民党左派让步政策；（4）驼背毛子出一答复国际之电稿，内有“凡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中央之指导权”之语句。

国焘之提议未注意讨论，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于7月1日召集一活动分子会，或中央扩大会。

翌日仍回汉口开会于鲍宅，是日才知道这两日中因解散纠察队和中央秘书厅未迅速发迁移通告问题，同志间精神大形混乱，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理由是：“我们是领导左派的，左派首领尚在汉口支持革命的局面而向前进行，而我们反离开他们藏到武昌去，成甚么话……”。独秀也以为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等接头，于是又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正式决定7月1日开中央扩大会议。

翌日又开会于鲍宅，老鲍出席做了一个很长的演说。大意是：（1）现在国际方面有一种空气，认我们中国党有改良主义，其实此改良主义并不存在，我的每一政策至少要比鲁易十倍以上的革命；（2）中国现状在客观上是很有利于我们的，在客观上无产阶级本有取得领导权之可能，例如蒋介石一直到现在并未真正取得群众的领导权，他不过是侥幸成功，机械地用炮火把我们的势力打落下去，可是我们主观的力量没有成熟，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农民（是地痞领导的），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人，我们不能组织广大的失业军，所以我们不能取得领导权；（3）斯大林（俄党首领）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斯大林他所接受于季诺维也夫（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前的委员长，反对派首领）的遗产太坏了。以前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大约指魏琴斯克）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实行。老鲍做这演说时是很精神的。

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24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驼背毛子与少年国际代表则提出一反对老鲍演说的决议，指明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方针前后是一致的。以前季诺维也夫的政策是经过俄国共产党中央批准的，不是季诺维也夫个人决定的。老鲍巧得很，反指他们是帮助季诺维也夫说话，是帮助反对派。

老鲍上面这个演说全是文饰自己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也是他的起身炮，留下一个中国反对派的理论基础；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也就是说中国党没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国际以前的政策才是改良主义、机会主义。老鲍不说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不懂中国情形”，不说斯大林领导的俄国党中央“政策太左”，而把一切罪过归于季诺维也夫，实际便是把中国机会主义的责任归于第三国际，而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

“我们主观力量没成熟”这句话在西北学说的字典上来解释工农运动过火，我们不能真正领导工农，一言包括，便是我们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太不成熟。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典来解释，便是我们指导机关社会民主党化，迷信民族资产阶级，回避土地革命，以致不能取得领导权，一言包括，便是3月20以来的机会主义太成熟了。

最后的破产到了。7月1日武昌的中央扩大会是五次大会后机会主义的总结，但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秋白主持的决议和说明中，不过是两月以来（五次大会后）动摇、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

（十）五人政治局至“八七”会议

不知道是7月初几（和森于7月2日大发旧病，3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迅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提议

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不日秋白、立三赴九江，老鲍亦赴九江。常委又大掉换两湖工作同志，以为大反动到来，一切过去知名之人皆不应留在原地工作，如向忠发、项德隆等同志决定去俄，毛泽东等决定派赴四川等。因此许多活动分子认为是“散伙政策”。同时常委决定，中央机关立迁九江而转上海，亦更增加同志之惶惑。

大约国际责斥机会主义调回老鲍及改组中央之训令已来了许久，老鲍秘不发表。中央移武昌时，驼背毛子所携致国际电稿内有“……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之语，我们莫名其妙。此后老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为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原先我们莫名其妙。

此处老鲍又犯了最后的严重的政治错误：（1）假若老鲍早将国际训令发表，何致7月1日武昌中央扩大会犹在那里贯彻那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的破产政策；（2）假使老鲍在中央扩大会议时将国际训令发表，我们能于7月1日决定一与假左派决裂的方针，彼时唐生智、汪精卫与我们决裂的阴谋尚未成熟，势力还未完全集中，我们在豫鄂交界的张兆丰同志（属方振武）之一师二旅劲军还未被解决，张发奎（此时与唐生智甚冲突）、贺龙、叶挺及军事政治学校之军力皆集中武昌，工农民众冤屈愤慨，正是积久待发；假若此时决定与假左派决裂，便是决定我们在两湖以至江西之暴动，何致待至8月1号才在南昌发作呢？！（3）老鲍临行犹给一种“逃跑主义”，“散伙主义”于五人政治局，以为“大反动临头了，中国的1905到了”，以致使此临时政治局开始即全无斗志，怀疑国际训令。所以老鲍不发表国际来电，敷衍国际

之罪小，而延误我们的新方针之接受和新政策之执行其罪大！及至7月13日的前几日，老鲍才提出国际来电以共产党中央名义发表一批评式的退出国民政府的宣言（国际来电是要我们示威的退出），此宣言之末尾还有“希望”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的幻想。然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伟大的，当时王荷波同志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然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

7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召开，我们的平山同志等不敢出席，我们的临时政治局也未准备任何群众示威的表示。只有何键的军队上街示威，并至国民党中央会议处欲捕我们吴玉章同志等。

此时临时中央机关又由汉口复移于武昌。和森在汉口出医院后（大约是16日以后）曾写七次信于中央常委，提议之事有：（1）提议中央开一正式全体会议定新方针；（2）提议武汉三镇举行一大示威运动，反抗“分共经过”之国民党宣言；（3）提议重新号召土地革命，一切政策及号召以此为中心，揭破国民党减租之假面具（国民党中央于17日发表一减租命令）；（4）认我们现在的失败不是1905，认唐、汪政权并未稳定，工农势力并未冷火气，因此主张中央仍应留两湖奋斗，反对迁去九江或上海之逃跑主义；（5）反对类似“散伙政策”，并自请仍留两湖工作，不愿去海参崴办党校；（6）主张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并公开作反汪派之鼓动。此时国际代表已到汉口，且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独秀、平山、维汉，又骂国焘等不赞成土地革命，不配当中央领导人，又向国焘、太雷、维汉（常委）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同时果派去一个毛子直接赴湖南宣布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和立即改组中央。因此常委及一部分上层同志对于和森大起误会，以为和森是“投国际的机”，“想组织左派”，“国际训令来后称好汉”，“摆脱过去共同参加的错误说漂亮话”，“每日一封信唱高调”……。其实上面那

些情形是“八七”会之前几日，太雷同志报告出来（在常委），和森才知道的。

事后追论：当时常委诸同志只见到党的上层的危机（上而国际责罚，下而同志非难），而未见到革命挫败时群众异常惶惑和恐慌的大危机。此危机只有斩钉截铁宣布与执行国际新方针才得挽回。此时常委是站在一种伦理观点上去护党，而不是站在政治观点上去护党，常委只知道接受国际训令，处罚中央及首领，将于党有危机，而不知不接受国际训令，不宣布新方针，于党及革命的危机更为重大。此时上层首领的利益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是难两全的。和森违背指导团体的共同，独自急进的主张承认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改组中央，接受国际训令，这在通常的道德和伦理上讲是可鄙的；常委顾全指导团体的共同，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愿接受国际新方针，这在非阶级的道德和伦理上讲是可钦佩的，然若在我们的政治上讲，则是非黑白的位置又是不同的。五次大会前，有人咒骂秋白是国际决议到后称好汉，自然现在这种咒骂又移到了和森。然而事实不是如此的：第一，因为和森“每日一信唱高调”都是向中央常委唱的，而未向下层群众鼓动或宣传过；第二，和森个人的思想，因为在武昌毛泽东家获与由湘逃来之同志及农民谈话（他们甚不满意于中央及湖南指导人，说不是许克祥杀他们，乃是某某杀他们……），因而思想上起了变化，又因病在医院，有时间想这些问题；第三，和森与国际代表之关系是在“八七”会及翌日之新中央会议见过二次；第四，和森于“八七”之前请求派赴湖南参加秋收暴动工作，并得常委之许可，绝无仍留中央“称好汉”之企图；第五，和森始终不主张旧指导人多留于改组之中央，其理由在“八七”之前的常委会及“八七”会议中皆正式发表过，因为如此，才能使党内外群众耳目一新，因为如此，对于新方针之执行才有充分保障。“八七”会议，和森之所以反对国际代表提出之名单（是与常委决定的），是因为除加一苏

兆征同志及罗亦农同志外，一切皆是旧人，即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同志，初皆未列，许久以来代表湖南农民革命之激烈倾向的毛泽东、彭公达同志（彭是马日事变后提议号召30万农民进攻长沙的）亦未在列，而如和森反在名单内有地位；第六，和森主张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泽东应加入，太雷应出外工作而不应留秘书厅，维汉可留中央组织部或秘书厅工作而不必兼常委名义，这些都是斟酌当时实际情形而主张的；第七，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甚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时又主张他在中央；第八，和森请求回湘工作，绝不是企图与毛泽东等组织甚么左派，只因两湖暴动和森是提议之一人，又彼时湖南工作实须要加人。“八七”之明夜，和森正欲与公达上船回湘，而新中央来一命令停止和森前去，翌日开会正式决定来北方工作，和森于讨论决定之后，即遵照决定北来，一直到现在没有甚么左派的宣传和组织便是明证；第九，在“八七”前后反对那种盛行的“党在组织方面无出路”的悲观空气，是正确的，并不是和森想造左派故如此之乐观。

“八七”紧急会议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纵然在严重情形之下，不能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组中央，发展讨论；纵然中央及全党的组织问题，还无很满意的解决，然无论如何总是公然地正式地承认了自己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是国际不懂中国情形，政策过左，以致中国革命失败；也不是我们有错误，国际也有错误），公然地正式地接受了国际的新方针。由此会议救出中国共产党于机会主义的破产之中。挽回了全国工农群众惶惑恐慌的大危机，树立了工农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新大旗。

自然“八七”会议不过开始承认与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不是这一次便完全肃清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遗毒在党内还是

很深的。然仅仅是这一开始承认与改正便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八七”会议未郑重讨论南昌暴动问题是一缺点。会议之末，和森曾提议讨论此问题，以为未宣布没收土地，掀起江西本省的农民暴动，未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而即出走为失策。然当日已没有时间容许讨论此问题。第二日新中央开会，和森又提议前敌主要负责同志有怀疑新政策之弱点，应注意指导人问题，然是日亦不容许讨论此问题。

南昌暴动之失败不是偶然的，主要的是因为前敌主要负责人之主观没有根本改变，平山同志不必论，国焘同志自从主持五人政治局及常委以来，开始表现他政治上弱点，尤其怀疑土地革命，不甚相信群众势力而对于张发奎发生幻想。国焘同志在五次大会前，素来的倾向大体都是很好的，在五次大会后的七人政治局中，除开始月余消极一点外，也还没有严重的错误，即有也是旅进旅退的。国焘同志严重的错误，是开始主持常委之时，所以他赴南昌去时对于暴动是没有决心的。

虽有广东、两湖之失败，然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继续不断地发展工农革命的高潮，一直向苏维埃政权走。

国际训令初到时，党的上层之间发生一种悲观的空气，以为国际训令这样一来，一切旧指导机关和指导人的信任打得粉碎，因此以为党在组织方面没有出路。亦农同志甚至说：“即使在政治方面有出路，组织方面是无出路的。”又以为党没有家长了，一定要各不相下，四分五裂。因为有这些顾虑，以致对于接受新方针非常犹疑，非常害怕。现在“八七”以后的事实可以答复这种顾虑和悲观。

“八七”以后，只有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四分五裂，不成东西。我们的党适得其反，我们在新方针之下不仅重新团结了党员群众，而且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上来，这是值得我们自夸的。

(十一) 问题与结论

我们的党虽然犯了以上种种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然我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而不可磨灭的。

“五四”以前，中国虽然有工人，但还没有形成为一阶级。广东、香港虽然有工会，但还没有阶级的自觉。自有中国共产党产生，才有阶级觉悟的工会之组织，才有阶级觉悟罢工之发展，中国工人才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

“五四”以前，中国工人及苦力虽然也曾多次被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政党利用来参加过革命的争斗，然完全没有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要求，屡次都是徒被利用，一无所得。自从第三国际命令我们加入国民党以来，我们在广东获得广大的工农组织势力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一年以后，即有“五卅”的革命高潮。“五卅”之后，不及一年，又有北伐的革命高潮之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做了中国革命之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领导者，同时跑上了世界革命的最前线。民国 13 年以来，中国革命之旗帜，名义上是国民党孙中山，而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这几年中，名义上虽是做民族革命工作，而实际上发展了最深刻最广大的阶级争斗。工人阶级组织势力发展到 500 万以上，农民到千几百万以上。百战不停的经济和政治争斗的经验，已经使广东几十万工农群众于革命三次挫败之后，还能奋起建立广东及东江琼崖各县的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的年龄不过 8 岁，而其领导工人由组织工会，参加民族革命，以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超过西欧两世纪以上的历史。以这样幼稚的党领导这样伟大的迅速的

争斗，错误是必然难免的。

从3月20以至贺叶失败的机会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是事实；同时从民国13年加入国民党以至16年7月与国民党决裂，在此三年中，积聚和发展了广大的工农革命势力与经验也是事实。宽恕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后所发生的机会主义错误固属不对，同时因为武汉的叛逆和决裂而认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本错误则更属不对。

托罗斯基及国际反对派借口中国革命的失败，攻击第三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中央，他们欲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于俄国共产党中央，他们以为3月20即应与国民党决裂，不应帮助北伐和武汉政府……。这些都是反对派借口攻击的政治作用，事实不是如此的。3[月]20事变像我们中央所采取之退让态度，甚至停止阶级争斗，这是错误的，但若说这个时候我们便可与资产阶级完全决裂也是错误，因为彼时我们的力量还未成熟。我们从3[月]20事变以至北伐以后的错误，不在不立即与资产阶级决裂，而在不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实现，这便是机会主义的错误。这错误不在国际而在于中国党中央。就事实说，北伐对于工农势力的发展是异常伟大的。假若我们能运用这种伟大的力量去对付将要叛逆的资产阶级（蒋介石为其代表），结果我们是可由三大政策一直领导革命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失掉的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而获得的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所以北伐政策根本是对的。

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权独裁制根本亦是对的，在此原则之下去帮助与改造武汉政府也是对的。假若我们能坚决地在两湖实行土地革命，坚决地实行国际及五次大会的决议，坚决地制胜夏斗寅、许克祥、唐生智的反革命及阴谋，武汉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完全可在我们的势力之下去改组，所以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制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后来两湖的失败绝对不是这个原则的责任，而

是回避土地革命的西北学说和阿附小资产阶级的退让政策之责任。

有人以为“八七”以后的暴动政策是国际对付反对派的作用，这种观点是根本不对的。“八七”以后的暴动，是马日事变后湖南工农的需要，是夏斗寅及7月15事变后湖北工农的需要，4月事变后，江苏、广东工农亦有此需要。

说到组织问题：党内群众的政治讨论，素来是没有的，指导机关内工农成分也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有最革命的工农阶级，和最精华的工农党员群众，他们的趋向和意见从未在党内起作用。质言之，他们在中国革命上起了很伟大的作用，而在领导革命的自己的党内反没有起丝毫作用。这便是过去机会主义之组织方面的来源。所以组织问题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下至上的民主。最近三年以来，党的组织像暴发户一样地发展：1925年以前是不满500人的知识分子小团体，1925年以后，却发展至5万人以上的大群众。

1925年以前，党的指导机关没有工人分子参加，是必然难免的；1925年以后，党即开始成为群众的，而指导机关仍然没有群众化，且渐渐养成一种轻视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众的习惯；加以民族革命的高潮发展，从上至下的指导机关，无形中逐渐小资产阶级化或民族资产阶级化。这些便是机会主义的来源。

从1925年以至北伐的革命高潮中，已经锻炼出广大的工农群众的革命势力，同时更锻炼出无数工农群众的领袖；然而我党的组织全未反映这种伟大的进步，指导机关始终未相当吸收这些群众的斗争的领袖进去。另一方面，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甚至上级党部不准下级党部自发口号，自发宣言，自定当地斗争之政策，务使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员完全是听从号令的兵士。这样的组织状况，形

式上是很整齐严肃的，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面的危机是很大的。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始终不能自发自动发展其创发能力，始终只是命令一下动作一下的士兵，而不是很自觉很自动的作战单位和战斗员。因此养成的习惯是：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和是非。下级党部及群众对于上级机关如果发生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时，上级机关便要认为大逆不道，采取高压。由此养成“怕群众”的习惯，党内事情怕群众知道，以为如此，将发生异见，动摇指导机关的威信；因此，指导机关自然也愈怕群众的代表来参加。指导机关与群众的关系不仅不良，不仅隔断，甚至背道而驰，群众完全离开党，党的指导机关完全抛弃群众，在天高皇帝远的深宫之中，做那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的首长时代的工作。愈做愈没有党，愈没有群众，愈没有工作！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刑具，而上级指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 and 铁的纪律之一切自由，最后这一现象，在直隶是特别明显的，这便形成了组织上的系统的机会主义。彭述之同志不能不算是这一机会主义的代表。

这一机会主义是完全违反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铁的组织 and 铁的纪律对于无产阶级共产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样的组织和纪律，不能成功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组织方面之显明的区别，亦即是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之区别。可是述之及亦农同志在东方大学所发明之组织教育系统，是全与列宁主义相反，表面上是穿凿附会列宁的口号，实际上是首长的宗法的知识阶级的把戏。

我们要铲除政治方面机会主义的系统，同时也要铲除组织方面机会主义的系统。我们现在应改造真正成为列宁主义的铁的组织铁的纪律，真正成为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这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不是削弱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的自觉自动与创发精神的，乃是增进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的自动自觉与创发精

神的，不是弛缓党的纪律组织，乃是强固党的组织和纪律；铲除那种旧军队式的组织毛病，而改造为自觉自动的群众党的组织，铲除那种机械的宗法的纪律，而代之以真正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同时由下而上的党内讨论尽可能的发展，由下而上的选举制度，应尽可能的采用，工农同志应尽可能的参加指导机关，党内事情应尽可能的使党员群众知道，这些都是改造组织的重要任务。但这些施行到什么程度什么界限呢？以不妨害集中制和革命行动的需要为界限。超越此界限的极端民主的要求，也是不能容许的。

现在党的改造是整个的全盘的改造，而不是什么派别的改造。我们要在国际新方针之下，重新团结党的队伍，强调党的凝结性和统一性。我们所有工农党员群众及好的知识分子党员群众是完全团结于此新方针之下，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因为全中国的工农群众莫有不欢迎新方针的，他们的先进分子更不待说。国际新方针初到时，有人以为将有引起党的分裂之危险，其实这危险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就是在主观上我们也要注意防止这危险：第一，最少几个为群众所不信任的系统的机会主义者，必须在相当时间停止其指导工作；第二，一切指导机关，尽可能由群众选其相信之人负责；第三，过去一切错误和是非，尽可能交与群众讨论判断，尽可能发展党内讨论；第四，严防机会主义者企图团结一部分党员阻碍党的改组；第五，严厉反对第三党之企图动摇或分裂党的队伍，更应严厉反对“让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腐化分子到第三党去”之说；第六，绝对相信群众来改造党，不应只相信上级机关或已经为群众所不满的中坚分子来改造党；第七，在此改造时期，上级机关绝对不应袒护群众所不满的少数分子而忽视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群众之意见；第八，在此改造时期，不应让少数一二系统的机会主义者有凭借党的机关，压抑群众及其意见之可能，即使群众意见是错误的，也应其发表之后，再予纠正，万不能采取国民党中央“停止”这个“停止”那个之办法；第九，应

努力于全党之改造，而不应组织什么“左”派；第十，反对述之一类人利用“制造派别”、“分工学界限”的罪名来阻挠党的改造；第十一，反对抛弃或开除所谓大批“腐化”的下层群众，即使一部分群众有腐化或消极之表现，亦应去找出所以使之腐化或消极的来源；第十二，除最少几个为群众所不满的系统的机会主义者之外，一切活动分子皆应尽可能的分配工作，万不应站在一种非政治的考虑之上，排斥或送出大批活动分子于工作或国境之外。

所以在此改造时期，党的机关所要注意的是：不要怕群众，不要怕讨论或批评。党员群众要注意的是：不要笼统地反对知识分子，不要笼统地反对一切过去的负责工作同志。并不是一切知识分子都是机会主义者，凡属一切压抑群众意见，不妨害党的改造之分子，都应尽可能的利用到工作上来。

党不是要改造成为个狭隘的小团体，乃是要改造成为一个伟大的健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政党。我们并不是要把一切犯过错误的人都送上断头台，我们亦不是要把一切机会主义的分子都送上断头台。我们只要指导机关打开门户，由群众选举，由群众监督，相当的能受群众正确的影响，而不一味违反群众的意见与趋向。

另一方面，党的改造不是换几个上级机关便了事，更不是由知识分子换成工人，由旧的分子换成新的分子便算了事。根本是要从小组、支部起，实行改造过来；根本是要肃清一切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遗毒，要改变过去机会主义时期之畸形的党内生活、教育、训练以及一切不正确的工作方法。我们要由此次的改组，获得八年来中国革命之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成功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来完成中国工农革命的任务！

我们的党，现在是开始到了这样改造的伟大时期；我们全体党员同志应共同起来完成这伟大的历史使命!!!

上面这个报告，是上年9月在直隶省委改组会及其他各处的活动分子会报告出来的，现在才整理付印，身边无任何文件或材料，全是靠着脑中的记忆，小的错误之处自属难免，大体则自信极其客观，极其忠实。惟自1925年10月至1927年4月之一年半的时间，和森未在国内参加工作，故语焉不详。全部报告如有错误之处，望有关系同志予以纠正或辩驳，用供发展党内讨论之一助。

和森附识

(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附：

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及其 代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资料*

(1963年)

(美) 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

(一)

八次全会期间，从中国传来了反对长沙军事政变的自发的农民暴动的消息。共产国际应当如何对待呢？全力支持农民的时候到来了吗？问题提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小组委员会讨论，此时，布哈林告诉他的两位同事意大利的艾尔科利（陶里亚蒂）和法国的特兰，中国农民正在夺取土地。多年以后，特兰引用布哈林的话说：“农民夺取土地吓坏了武汉政府。如果我们不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失去我们的左派同盟者，并且将不可能争取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如果限制土地革命，我们将扩大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而当我们变得更为强大时，或可不顾我们现在的同盟者。”

* 标题为编者所加

特兰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问题不在于是否牺牲无产阶级的所有同盟者，而是要确定牺牲哪个同盟者——是起义的农民还是资产阶级。共产国际以国民党的合法决议为武器来指挥中国革命，它今后的地位不会比眼前更有利。

当辩论进行时，布哈林建议请示斯大林。布哈林出去打电话，艾尔科利和特兰继续讨论。

斯大林在参加中国小组委员会时，支持布哈林提出的论点。他坚持认为，除非共产党人制止农民暴动，否则资产阶级左翼要转到敌对方面，而这就意味着内战。他说，“大多数武装的中国人是雇佣兵，我们不能筹办大量足够的资财，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方面来。”

特兰争辩说，“然而这些雇佣兵大量的是破产的农民，只要提出土地纲领，他们就会开小差的（跑向共产党）。”^①

在讨论过程中，斯大林出示鲍罗廷的电报，电报说，国民党左派决定反对土地革命，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同共产国际的破裂。斯大林坚持说，资产阶级左翼的力量仍很强大，“它的军队不会在一瞬间散掉，在暴动的农民能够同工人起义协同行动以前，我们就将被打败。”斯大林认为，目前的问题是战斗还是使用策略。

特兰宣称：“我们必须战斗。”

斯大林反驳道：“战斗意味着必然失败。”他说，共产党人应当使用策略，而不会遭到任何损失。“土地革命使国民党害怕，仅仅是由于它直接损害到了国民党党员和军官们的利益。我想给鲍罗廷送发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党员和国民军军官的土地。……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群众接受我们的决定。”^②

① ② 这篇对话（有删节，但未更动）摘引自《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中国小组委员会会议纪要》，见《新斗争》，1936年2月8日，第3页。伊罗生在《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44页的注释中说，这篇报导是《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中国小组委员会会议纪要》（原件为法文）的英译文，该文系特兰应伊罗生之请，由1927年所做记录写出的。

斯大林采取的立场表明，至少有一位他在中国的代表已经告知他，为什么在这紧急时刻以不推进土地革命为好的理由。罗易在这个问题上突然投降，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艾尔科利表示赞同斯大林。他写的《关于中国委员会的报告》^①中，他认为，特兰坚持说斯大林主义者未能正确地估计小资产阶级的本性是错误的；同时，他过早地预示同武汉政府的破裂，也是错了。按照艾尔科利的看法，小资产阶级不是一个同一性质的、团结一致的阶级，同大资产阶级也不是同一范畴，“因此，我们甚至不能想象同小资产阶级的某种成分来一个决裂”^②。

艾尔科利感到，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土地革命，对正在发展的农民暴动掌握领导权，“采取一切可能的形式”开展和组织土地革命，包括没收土地和土地国有化。但是同时，重要的是“要使农民阶级留在国民党内”，“要保证小资产阶级靠自己工作得到的财产不受侵犯”，并且“要支持他们反对高利贷资本的斗争”^③。

艾尔科利认识到，土地革命会“吓跑许多中间分子”，并因而引起“局部失败”。为了防止这种失败，共产党人自己必须在国民党之外通过农民委员会和农民协会来推动土地革命，但是务必在国民党机构之内保持控制权。他认为，由于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而是“某种‘典型’的苏维埃类型的组织”^④，上述意见是完全行得通的。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必须加紧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为达到这个目的，重要的是要在革命的基础上重新组织整个军队，清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的中国问题》，1927年5月，第145-151页。

② 同上，第150页。

③ 同上，第146页。

④ 同上，第147页。

除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并补充共产党员和“可靠的国民党左派分子。”^①

自然，只有斯大林主义派别有权坚持其论点。特兰让步说：“你们是多数，你们决定吧。”

布哈林说：“少数必须服从纪律。”

这话触怒了特兰。他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世上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提出自己的保留意见，并公之于众。难道你们要对我使用武力吗？”^②

斯大林反驳说：“不要过甚其词了。”

根据特兰在《新斗士》上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中国小组内发生的情况的叙述，再来看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很有意思的。关于委员会的大多数认为需要限制土地革命的意见，决议说：

“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使千百万农民从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站在前线，指导这个运动，在目前最为重要。同时，共产党必须在政府内努力，使政府促进土地革命之爆发扩大。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在目前发展的阶段中成为实际上工农革命的组织政治中心，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机关。另一方面，只有在这种从上面和下面协同实现土地革命的政治之原则上，才能在巩固的革命的基础上，造成真正可靠的武力，改编一切旧有的军队。”^③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上的中国问题》，1927年5月，第148—149页。

② 《新斗士》，1936年2月8日，第3页。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文献汇编》，第722页。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通过，1927年5月18—30日；又见《国际新闻通讯》，第7卷第35期，1927年6月16日，第737—741页。

那末，这项任务如何实现呢？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保持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①。同时，中共必须“保有自己工人阶级先锋的政治面目，和那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面目划分清楚才行”。

“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共产党不许融解于个别政治组织之内，它必须成为独立的力量。……因此，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政见时，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群众时，不能为外力所阻，对于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动摇不定，尤不能放弃批评的权利。恰恰相反，须知只有这种批评，才能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向左，才可以在革命斗争中，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②

但是，决议说，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解释为党脱离非无产阶级阶层的群众，仅仅是指要保证无产阶级在国民党**内部**的领导作用：

“国民党是中国固有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在目前的情形下，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③

所以，中共的任务是“把国民党转变成包括城乡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组织”。中共一定要使国民党发展成为“真正广大的、党员有选举权的、群众性的、革命民主组织”。中共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必须对国民党的工作不断施加影响”。因而，中共“必须在武汉临时革命政府工作中，发挥最大的干劲”。共产党必须大力参加“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机关的工作，“同时，批评最接近的同盟者暴露出来的不坚定性，保证政府政策不偏离正确路

①②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文献汇编》，第722页，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通过，1927年5月18-30日，又见《国际新闻通讯》，第7卷第35期，1927年6月16日，第723页。

线”；此外，主要通过国民党，促成革命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

“不实现此项任务，不扩大群众运动，没有农民革命，不坚决改善工人阶级地位，不变国民党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的伟大的组织，不继续加强职工会，扩大共产党，不造成武汉政府与群众间之最密切的联络，则胜利地完成革命是不可能的。”^①

还有一个涉及到中国的问题写进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的决议，这就是重新组织军队的问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以为，改编军队的问题，编制绝对委身革命的队伍，军队与工农组织间之联络，建立军队中干部，改编雇佣兵为革命之常备军，在目前特别需要。”^②

斯大林在第八次全会开幕前几天给中山大学学生讲话时，以同样的态度谈及将来中国的军队问题^③。

同时，在中国，唐生智曾向北京方面发动了他的新的北上攻势。据布兰特叙述，到5月中旬，“唐发动的战役已进展到这样的程度，在斯大林看来似乎胜利已成定局，因而他能够确有把握地欢呼这一胜利。他的确欢呼了，并振振有词地进行论证，（表面上看来）恰似鲍罗廷在汉口党的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一样。像鲍罗廷说过的那样，他指出，现在是同逗留在武汉北面的冯玉祥将军携手合作的时机了。”^④

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汉举行会议，进一步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之间保持正常关系问题展开了辩论。蔡和森说：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文献汇编》，第724—726页。

② 同上，第722页。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通过，1927年5月18—30日；又见《国际新闻通讯》，第7卷第35期，1927年6月16日，第727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9—240页。

④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21—122页。

“鲍罗廷〔后来在政治局〕说，‘第五次大会仅仅在原则上解决了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但未能提出任何具体的策略方案，现在我们有责任来着手做这项工作。’接着，他提出下列建议：‘（1）降低店员和其他人员的要求，以满足工商业小资产阶级；（2）保护小地主，以照顾乡村小资产阶级；（3）采取措施，制止民众直接逮捕和枪决反革命分子。’他还顺便提到‘工会的专政’问题，但没有详细加以论述。”^①

在政治局的辩论中，陈独秀是追随鲍罗廷的。陈独秀“指出，讨论上述三点是不够的，需要阐明整个群众运动及其领导问题。目前，汪精卫开口闭口不离‘领导权’，他一再声称，由老百姓行使领导权就要失败，共产党没有能力领导民众，如此等等。陈独秀讲话的基本点，就是要求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权拱手交给国民党。需要（我们）回答的基本问题是：‘让步，还是不让步’”^②。

稍后，提到陈独秀的上述讲话时，蔡和森回忆说：

“陈独秀要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那时，我亦赞成他的提议。但是罗易想法不同，虽然他没有明确解释他的立场，只是说些无意义的话，‘好吧，我们再也不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了’。显然，罗易同鲍罗廷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罗易并未和我们通气，因而一些会议的参加者亦同他闹得不愉快。”^③

政治局在第二次会议上，讨论和接受了罗易为调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关系而起草的决议〔文件二十三〕。根据这个文件，共产党人必须继续实行合作，以便加强左派，帮助左派“领导国民革命”，但是不能丧失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利益。规定武汉政府的劳动部设立解决劳资纠纷的法庭。与此有关的，是规定限制

^①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4-35页。

^{②③} 同上，第35页。

“店员的过分要求”，并且“不准阻碍同帝国主义的商业活动”。

蔡和森指出：通过这个决议的这一段话，“鲍罗廷的西北理论的基本策略要点被接受了：要进行北伐，就要推迟土地革命，同意对帝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让步。两个半月以后（五次大会于5月初结束），作为这些让步的后果，接踵而来的是武汉上层领导的政治灭亡和中国革命的第二次严重失败。（五次大会后的时期），政治局的目标、它的错误、它的活动以及它的意见；都直接来自让步政策！”^①

根据蔡和森的回忆，罗易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一贯给予热情的支持。他坚决地主张，基本的政治口号是“进攻”，即土地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根本领导权。但是，“谈到‘让步’，罗易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第二位的，暂时的。然而，就是由于这种态度，他无意中使政治局同意和接受了西北理论。因此，罗易显然投降了这种理论而并未意识到这一点。”^②

3月间，武汉政府曾同意任命两名共产党员谭平山、苏兆征分别为农政部长和劳动部长。谭平山在5月20日就职时说，农政部的政策就是执行国民党的农业政策，激励农民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实现农民同“革命军队”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并且加强武汉政府领域内的农民组织。汪精卫正式欢迎谭平山就职，并称他为“非常善于处理农民问题”的领袖^③。

5月18日，就在谭平山就职前夕，原属武汉政府的一个将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了。夏斗寅带领驻扎在武汉和长沙之间铁路沿线的一个团，向国民党左派政府所在地进攻，图谋推翻它。多年之后，罗易写道：

①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5页。

② 同上，第36页。

③ 《人民论坛》，1927年5月21日，第1、5页。

“国民政府的态度引起人们怀疑它与叛方订有默契。夏斗寅带着少得可怜的、不到 2000 人的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到武昌郊外。武汉政府借口一切可动用的军队已调遣北上，没有力量抵抗叛乱分子，就绝望地等待着它的崩溃。局势的发展暴露了仓促向北京进军的动机——武汉应被解除武装，以便于反革命的进攻。”^①

罗易认为，汉口国民党的警卫部队有足够的力量抵抗进攻，但是，至少有一些军官明显地同情叛乱。在那紧急时刻，“很明显，国民党为了革命的利益，应当脱离那些妥协退让的盟友，在群众支持下独立行动。当发生反对国民政府的暴乱的时候，当曾经对国民政府输诚的军队同叛乱分子串通一气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把愿为革命效忠的群众武装起来。”^②

根据罗易为党的《宣言》（[文件二十一]，此件系政治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叛乱问题时委托罗易起草的）所加的注脚，认为从策略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加强”左派小资产阶级同将军们之间的“冲突”。“为了使小资产阶级脱离公开的反革命军官，应当对小资产阶级作某种让步。”然而相反，在中央委员会内普遍地“倾向唐生智”，根据罗易的意见，这种倾向是鲍罗廷鼓动起来的。^③

蔡和森的叙述提供了某种不同的看法：

“我们（蔡和森和李立三）提议加紧训练武装力量，以我之暴动对付敌之暴动。但是，罗易和瞿秋白以为现在的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只有这些关系调整好了，

^①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 513 页。

^② 同上，第 514 页。

^③ 同上，第 518—519 页。

我们才能将注意力集中于建立军事基地问题，并倾全力达此目的。”^①

根据蔡和森的看法，罗易起草的《宣言》犯了两个严重错误：

“1. 承认农民运动过火，说这些过火行动是农民自己做出来的，中共并未参与。换言之，中共对农民运动的加剧不负任何责任。

2. 承认中共不仅保护工农利益，并要保护中等阶级工商业者之利益，希望后一种说法能阻止工商业者倒向夏斗寅。然而，从以上论点，足见罗易完全没有头脑并丧失了革命的基本原则！”^②

无论如何，《宣言》是在这种形势下发表的，其目的（按照罗易所说）是为了“赢得小资产阶级的信任并鼓动它反对反革命的军官们”。还发表了一篇对叛乱士兵的“呼吁”，敦促他们脱离他们的指挥官〔文件二十二〕。可是，在“国民党最高机关”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未能迫使武汉政府正式谴责夏斗寅。根据罗易对文件所加的注脚，谴责夏斗寅本来可以成为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附近的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们“夜以继日地劳动”，以保证（武汉）国民军的供应。若干年后，罗易说，“如果工人们得到他们制造的一部分武器，他们能够很容易地解除反革命警卫部队的武装。如果国民党能发表一个公开的宣言，说明军官们之所以反叛国民政府是因为国民政府要给农民土地，这就可以把士兵争取过来，因为他们都是无地的农民。”可是，几年以后罗易清楚地觉察到（这是他在1927年5月中旬只能模糊地察觉到的），“国民党既不要武装工人，也不愿给农民土地。因而，它不能保卫革命，并参与了

1.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7页。

2. 同上，第39页。

反对革命的阴谋。”^① 根据罗易的回忆，更大的“悲剧”是，许多共产党领袖也具有武汉政府的这种倾向。

粉碎夏斗寅叛变的，是共产党将领叶挺。

蔡和森写道：“李立三和我提议，叶挺部队连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立即占领粤汉路，扑灭夏斗寅之叛变。如唐生智谋反，则我军直取湖南为根据地，并进攻湖北和广东。叶挺部取如此进展势态，将协助工农纠察队之发展，而工农纠察队对我军据有之阵地亦必能提供相当之援助。”^②

几年以后，罗易回忆说：“武昌城由二百名士兵守卫，而警卫部队的司令恰巧是一名共产党员。当叛军一下子出现在城郊时，共产党司令已经不能再等待长江对岸国民政府总司令部的指示。由于没有可能从汉口得到任何增援，警卫司令叶挺自己采取了主动行动。他集合了大约一千五百人的非正规部队，包括当地军校的几百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全是国民党员，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战斗，击退了叛军。”^③

蔡和森指责罗易未能提醒政治局对付反革命，却集中注意于建立同国民党左派的正常关系问题。此外，蔡和森和李立三的建议只是部分地被接受。“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都开去迎击夏斗寅。工人纠察队要求国民政府从汉阳兵工厂发2000支枪，和几千元月饷，汪精卫等在口头上答应了。同时，既然党认为中心问题是国民党左派问题，于是把夏斗寅的叛变解释为一件临时的事变。”^④

按照蔡和森的叙述，这时鲍罗廷和谭平山正到处喧嚷，这不

①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14页。

②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7页。

③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14—515页。

④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8页。

是同国民政府的决裂吗？鲍罗廷争辩说，共产党人确实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实行决裂，并且，如果兵工厂的工人继续罢工，结果将是自取灭亡。怎么办？国民党领袖全都在反对共产党，他们说：“目前计划要做的事情全属荒唐！幼稚！发狂！”^①

蔡和森说，群众对时局开始有所认识，并且不明白共产党对“正在施行的恐怖”为什么采取这样消极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为什么共产党不反对”剥削者和国民政府。至于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则仍旧未能了解唐生智、汪精卫、冯玉祥等这样一些人物的特性和动机^②。

5月21日，国民党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全民革命》宣言。宣言指出，工人和农民需要“正确的指导”，批评他们向雇主提出了“过分的要求”。宣言说，“革命的同盟者，工厂主和商人”也需要“适当的保护”。“我们的政策是把他们都团结在一条战线上，使他们都从革命得到同样的利益。”^③

第二天，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议上发言指出：“帝国主义不会用军事力量干涉中国。它们将通过三种方法推行其经济侵略：第一，利用中国一切具有封建观念的反革命分子；第二，利用中国资本家作为他们的扩张工具；第三，威胁中国的小资本家并破坏中国革命群众的团结。

“所以，真正的国民党员必须同小资本家合作来完成革命。”^④

5月24日，罗易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个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和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决议〔文件二十三〕。根据罗易后来的注释，这个决议“既未通过，也未否定”。决议重申共产党人支持

①②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46页。

③ 《人民论坛》，1927年5月21日，第1—2页。

④ 同上，1927年5月22日，第1页。

国民党左派的必要性，但是，对武汉政府中许多人对共产党抱有根本的敌意，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基本的事实是，国民党左派的广大群众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而其领导则包括“封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确，汪精卫是试图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唯一的主要领导人。罗易认为：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策略不应决定于同领导人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而应决定于使整个国民党成为发展革命的工具的必要性。

“我不主张在国民党内实行政变。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使国民党摆脱现领导；但是要马上实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文件二十三〕

简言之，这项任务就是“从下而重建国民党”，动员革命的国民党群众反对其反动的领导，动员农民并在区乡建立武装的“民主政权”。〔文件二十三〕

夏斗寅的叛变刚刚被扑灭，许克祥及其他驻长沙部队的国民党军官在5月21日晚又发动了政变，推翻湖南省政府，监禁政府委员，解散国民党左派的地方委员会，对共产党地方组织采取镇压手段。多年以后，罗易回忆说：“叛军是（武汉）国民军总司令唐生智的直接部属。他在前线同他们有电报联络。”^① 那时候，正在撤退的农民遭到野蛮的屠杀^②。

据蔡和森说，共产党人仍然主要是关心他们同武汉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央政治局的全付精力集中在调整与‘左派’的关系上。我们在两湖失败的根由即在于此。假使中央政治局一开始便集中注意力于镇压反革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巩固两湖根据地，我们决

①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17页。

② 同上，第552页。

不致遭受这种严重的、可耻的失败。假使当时认定我们的任务是扑灭许克祥、夏斗寅之叛变和镇压唐生智、谭延闿之反革命，‘左派动摇者’或许会终止动摇，以致改善我们同他们的关系。”^①

在这种情况下，蔡和森深信，罗易实负有相当责任。“当时，我和李立三对局势的洞察，虽然没有人们现在所见的这样清楚，但是，假使当时罗易能接受我们的提议，把中央政治局的注意力集中于发动自己的势力去镇压反革命和其他阴谋，两湖是决不会失败的。”^②

在长沙，共产党员同国民党左派地方组织的成员一起，着手组织对叛乱分子的武装进攻。他们的计划是重新夺回城市，以此“拯救革命”。罗易在回忆中写道：

“有两万多农民从四面八方扑向长沙，差不多到了城门附近，他们却接到要撤退和解散武装队伍（军事编队）的命令。指示来自武汉共产党首脑机关。同时，武汉国民军总司令唐生智宣称，他将亲赴长沙，建立秩序。那里的反革命叛乱分子就是他的部属。共产党领导人竟容忍极其明显的卑鄙的政治花招愚弄自己；由于唐生智亲自插手事件，他们便决定放弃武装起义。突然的毫无保证的撤退，对于一支正规军队来说都是最挫伤士气的，对于一支临时组成的队伍来说更是如此。动员起来的农民在混乱中撤退，反革命叛乱分子利用这个机会，攻击撤退的农民，残酷地屠杀他们。”^③

根据罗易的叙述，在汉口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相信传到武汉来的关于农民“过火”的流言，普遍一致认为，同反革命斗

①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8页。

② 同上，第38—39页。

③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61—562页。

争最有效的办法是限制农民。^①

全国农民协会的主席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他曾在最近提出了关于湖南农民的报告，而现在，他为党的纪律所约束，必须谴责他刚刚辩护过的农村中同类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遏制农民。罗易回忆说，“共产党的农民部长谭平山抱着这个目的准备去湖南，但是，事情立即发生变化。”^②在湖南，农民和当地共产党领导人处在被消灭的危险中。

根据一个国民党左派的叙述，汪精卫要求鲍罗廷说明，他根据什么来证明在武汉没收土地的政策是正当的：

“鲍罗廷否认他对运动应负责任，但指出他的同事罗易，一位印度共产党员，是一切乱子的鼓动者，鲍罗廷说，罗易得到斯大林的完全信任，甚至超过他自己。”^③

罗易认为，在由农民自愿军组成的革命军队成立之前，征集一支对长沙发动短暂攻击的几千人的非正规部队，是可能的。但是，为了保证临时组成的部队的服役开销，需要给军队预付一个月的饷金，而鲍罗廷掌管着钱财。罗易说，起初鲍罗廷答应供给所需经费，但是当一切安排停当（“不顾中共领导人的可耻的不合作态度”）时候，当农民协会能够围攻长沙的时候，他却自食其言。

蔡和森写道：

“鲍罗廷异常焦急，急欲与谭平山和国民党中央组织之查办团（由鲍罗廷、谭平山、陈公博和两名唐生智的代表组成）赴湘，一

①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50-551页。又见布兰特等编：《中国共产主义史料汇编》，第109—114页。

② 同上，第551页。谭平山任职一个月后，由于他未能把农民领“上正轨”，而请准离职。《人民论坛》，1927年6月30日，第1页。

③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273页。

面查办许克祥（英译本误写做夏斗寅——译者注）的叛变，一面查办农运的过火。此事由鲍罗廷决定，而罗易是反对的。”^①

5月26日，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打电报给省农会和工会，说武汉政府“已委派一个五人委员会今晨离此前去解决长沙事件”，指示全省工农同志“耐心等待政府官员，以避免更大磨擦”^②。

罗易后来写道：在那个关键时刻，“我竭力反对共产党人为了安抚反动军官，而阻止农民的革命行动。我指出，以军队在前方作战、不许扰乱后方为借口，限制土地革命发展的自杀政策，已经使反动势力转向进攻。继续限制必将挫伤农民运动，并鼓励反革命在乡村抬头。但是，我的反对意见被置若罔闻”^③。

于是，罗易建议谭平山应带着下列指示去长沙，“他的使命不是限制农民运动的‘过火’，而是建立乡村自治政府，授于农民协会以必要的政治权力。”罗易相信，这样做实际上（如果说不是名义上）将建立苏维埃。罗易认为，农民协会是乡村被压迫、被剥削群众团结的阵地。谭平山以其农政部长的地位掌管地方自治政府和警察。所以，罗易坚持以为，他所提议采取的行动是在谭平山的职权范围以内，“正确地、大胆地指导”农民协会，可以很容易使农民协会“成为革命政府的基层单位，解除地主雇佣的地痞流氓的武装，并创建民兵，作为真正革命军队的核心”^④。

在这方面，蔡和森的观点跟罗易的观点没有太大区别：

“那时，鲍罗廷犯了几个错误：第一，查办农民运动‘过火’，其本身在原则上就是错误的；第二，不用武力而打算用合法手段

①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9页。

② 《人民论坛》1927年5月28日，第5页。

③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51页。

④ 同上。

去对付反革命，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第三，预计的查办没有搞成，国民政府和鲍罗廷的威信扫地，反而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①

谭平山及其“五人查办团”行至湖南边境，据说，在那里他们被增援许克祥的军阀何键的部队赶了回来^②。另外，根据蔡和森的叙述：“当鲍罗廷及其查办团抵达岳州，许克祥发出就地逮捕与处决之电报”。于是，该团人员皆急忙赶回武汉^③。

现在很清楚，谁要到长沙，就必须有一支军队作后盾。

蔡和森说，罗易从一开始就反对冒险，“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缺点在于未能采取反对措施”^④。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和罗易在争论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上，各自作了发言。根据蔡和森的叙述，鲍罗廷主要指出下列五点：

“1. 现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中共来说）。他们没有表现出什么缺点和异端倾向。过去的错误皆由于工农运动过火。实际上，领导运动的不是农民，而是地痞和哥老会。[哥老会是秘密的农民组织，在北方各省特别强大，它指导农民的斗争，反对军阀和政府当局的搜刮。]

“2. 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让步，以便能够继续与他们合作；假若我们跟国民党闹翻，中国革命将遭受失败。

“3. 同国民党合作，就是指同它的中央合作，现在国民党中央还是好的。离开国民党中央，或推翻它，这不是决裂便是政变。在我们某些党员中显然有主张决裂的倾向（例如国际代表罗易）。

“4. 减租减息，废除高利贷，乡村自治——这些措施就是土地革命。

“5. 中共中央和工农组织应联合发表对群众的呼吁，号召他

①③④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39页。

②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31页。

们拥护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关于制止工农运动过火的命令，以及拥护最近公布之一切法令。”^①

另一方面，罗易争辩说：

“1. 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经不再代表左派，相反，他们维护土豪劣绅、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我们应当领导人民起来推翻他们。

“2. 推翻国民党现在的中央，不能说是政变。

“3. 现在我们的目标应是工农民主专政（罗易在这一点上未进一步阐明）

“4. 中共中央应立即发表对民众的宣言，指明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公布之一切法令的反动性质。这些法令旨在压迫工农运动和保护封建制度。”^②

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表纪念“五卅”运动（英国巡警在上海向示威学生开枪）的《宣言》，强调民族资产阶级“背叛”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充当革命动力的责任〔文件二十四〕。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是集合广大的农民群众（包括士兵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军阀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宣言》没有提到长沙屠杀。

在湖南，中国共产党五人省委发动 30 万武装农民的暴动，于 5 月 30 日进攻长沙。蔡和森说：

“李维汉（政治局委员）见此决定大发雷霆，斥为小孩子的把戏。他的解释是：‘即使我们能取得长沙，唐生智将进攻武汉并推翻国民政府。这样，是我们占领了长沙而失去了武汉。只要武汉政府还存在，我们便应请求它用法律手续来制止许克祥的叛乱。’”^③

^{①②}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 1 期，第 40 页。

^③ 同上，第 42 页。

同时，根据罗易后来的叙述：“在绝望中我试图越过糟糕的共产政治局而采取行动。我要求召开有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中央全会，我的要求遭到反对，借口是，在那紧急的日子里，党的重要人物不能离开他们各自的岗位。上层领导人反对召开中央全会，是因为地方工作人员急切等待决定性的行动，并一定会赞成我的计划。”^①

罗易感到，共产党的领导人物简直看不见采取革命行动的可能性。他说，“他们大多来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同国民党政客有密切联系。”^②

于是，罗易直接请示莫斯科。6月1日，接到斯大林的电报：“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对谭平山的巡视产生顾虑是有某些根据的。不应该脱离工农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它。否则就会把事业断送。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①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52页。

② 同上，第550页。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①。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5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么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②

很明显，即使是这个指示也不足以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鲍罗廷认为这个指示“荒唐可笑”。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暂缓执行”^③。于是，给莫斯科发去一个外交式的答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④作为最后的一着，罗易寻求同“个别同志”（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合作。罗易说：

“加仑 [V·K·布吕切尔]（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完全同我一致。那时，还有许多俄国同志也附和我的意见。但是一切权力集中在鲍罗廷手上。莫斯科在政治上支持我反对他的机会主义。然而在其他方面，他仍处在统治地位，因而俨然是共产党的太上皇。中共上层领导人大多是他的门生，思想上接近他的路子，所以都

① 公开出版的书中，这句话的英译文是：“必须终止对（不）可靠（原文作“可靠”，恐有误。——译者注）的将军们的依赖。”另外，陈独秀关于这句话（是叙述，不是引用）的说法是：“必须根除不可靠的将军们。”（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6页。此信的俄文译文载《反对派通讯》，第15—16期，第22页。）——原编者注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32页。

③ 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135页。

④ 休斯顿：《孙中山、国民党和中俄政治经济联盟》，第187页。

拥护他，常常无视国际的指示，并当场反对国际代表。”^①

罗易仍然竭力保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6月1日，他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论文〔文件二十五〕，这篇文章指出，夏斗寅叛变和长沙政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外国帝国主义”。因之，反动分子的基本任务不仅是“消灭共产主义和准共产党”（如他们所说），而且要摧毁全国的反帝革命。当反革命分子说到“准共产党”时，他们究竟指谁呢？乃是指非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所以，把这些革命阶级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的武汉政府，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象征。那些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组织叛乱以消灭“共产主义”和“准共产党”的家伙，就是国民革命的敌人，国民党的叛徒，反对国民政府的蠢贼。

罗易为了努力推动国民党左派更积极地行动，“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建议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左派领袖写一封公开信〔文件二十六〕，提出国民革命纲领”^②。

这个文件坚决主张解散长沙叛乱委员会，任命合法的临时政府，发动对叛乱的讨伐，并且武装农民群众。这个文件给人一个印象，即罗易上了唐生智的当。可不是吗，《公开信》说要授权唐生智“派遣必要的部队到武汉去镇压反革命”哩！^③总之，中共政治局认定唐生智是“左派将领”，解决长沙问题非他莫属^④。

多年以后，罗易写道，不幸的是，给国民党左派的公开信的

①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52—558页。

② 同上，第481页。

③ 请将《公开信》的这一段文字与《中国的十字路口》（《共产国际》第11期社论，1927年7月30日，第212页）相比较。

④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48页。大约在那时，唐生智从河南发出命令给湖南省政府，禁止“部队自由活动”。他还命令维持和平并退还“工农纠察队”的全部武器。《人民论坛》，1927年5月29日，第1、4页。

提出，“并未得到中共领导人和其他决策人物的欢迎。纲领有序言，提出了如前段中所引述的一些论点。然而这个纲领的起草和发表，并未取得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批准^①。

现在，罗易已经丢掉他对唐生智和国民党左派中央所有的任何残留的幻想。6月9日，他提出建议——《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防御还是进攻》[文件二十八]，明确地号召采取行动，然而已经太迟，无可挽回了。罗易指责说，为了保持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共产党竟同意取消整个群众运动。“被国民党诬蔑为工农运动‘过火’的和被陈独秀斥之为‘幼稚越轨’的种种表现，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它们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他认为，同武汉政府的分裂越来越不可避免。共产党能够为了保持这种关系而背叛工人阶级吗？不能。共产党人必须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发动农民暴动，摧毁绅权；必须“自下”改组国民党；必须立即计划攻占广东，收复该省，保护革命。采取上述行动刻不容缓。

其实，这一切已经太晚了。蔡和森后来指出：“假使罗易能坚持，更果断，中央政治局或许让步，并采纳他的计划。可惜，罗易未能有力地捍卫他的主张，而最终投降了。”^②

(二)

1927年6月，鉴于蒋介石、李济深和夏斗寅的叛变，共产党人感到要依靠唐生智（此人对共产国际目标的“忠诚”越来越使人怀疑）的军队，和冯玉祥及其经过俄国训练和装备的国民军。

^①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181页注。

^②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47页。

同时，潘朵拉的盒子^①里的种种灾难从斯大林的来电、从与国民党左派关系的恶化、从农村革命的兴起，以及从各种军人真相毕露的趋势中迅速地扩散开来。蔡和森说，在这最后阶段，中央政治局暴露出完全没有能力指导党的事务。^②

在这个时候，罗易察觉到汪精卫这个人处在“进退两难”之中，他是“站在正在下沉的民族民主革命船上一个绝望的悲剧人物”。在罗易看来，共产党人的“愚蠢策略”（鲍罗廷关于在唐生智领导下实行军事联合的政策）正在把汪精卫赶“向反革命集团的怀抱”^③。罗易有理由相信，或者说，他认为他有理由相信，汪精卫正在等待营救。蔡和森说：

“罗易和鲍罗廷都想拉住汪精卫，但罗易愿意驾驭汪并为其首，而鲍罗廷却甘做汪的尾。结果，罗易‘既不能令，又不能受命’；鲍罗廷则‘既善顺随，又会揣摩’。”^④

的确，整个政治局“再一次恢复了”对汪精卫的幻想，把他当做革命的国民党左派的领袖。政治局还以为唐生智仍然迫切寻求同汪建立有效的联盟。正如蔡和森所指出：“这样，汪精卫就成为我们全部政策的中心。”^⑤

汪精卫从欧洲回国的途中，曾经路过莫斯科。根据罗易的记述，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答应给他全力支持。罗易在给莫斯科打电报请求支持他的计划时，他认为他的建议（诸如没收土地、摧毁“不可靠的将军们”的权力、建立革命法庭和武装工农）是给汪精卫以“再度保证”。罗易后来回忆说：“他（汪

① 潘朵拉的盒子(Pandora's box)：根据希腊神话，主神宙斯命令潘朵拉带着一个盒子下凡，她私自打开盒子，于是里面的疾病、罪恶、疯狂等各种灾害，全跑出来，散布到世上。——译者注

②⑥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50页。

③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18-519页。

④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55页。

精卫)同意此项计划,只要必需的援助能及时到来。”^①

“必需的再度保证毕竟来得太迟了。同时,汪精卫相信共产党人背弃了他(原文如此),就同右派进行谈判,这些人叫喊要用共产党人的血来抚慰蒋介石。在那个紧急关头,我想必须做最后的努力,重新赢得汪精卫的信任,于是,就把莫斯科来电送交给他……,此外,工作计划他已经知道,他曾表示赞同。如果我能肯定保证必要的援助即将到来,他愿意遵守协议。”^②

汤良礼从武汉政府的观点出发写道:当汪精卫从“六一”电报得知斯大林对国民党的“新态度”的实质时,他“非常吃惊”,并且,他告诉罗易武汉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电报的条件。两人争论了一会儿,但无结果。分手的时候,汪精卫问是否可以给他一份译文。

“罗易犹豫片刻,然后说:‘好,我明天送你一份,因为文字上有一两处需要改动。’第二天,汪精卫接到许诺的副本,并立即出示孙夫人和陈友仁(原文如此)。陈友仁得知其内容,面如土色,他说,‘这意味着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③

第二天,罗易又去见汪精卫,根据汤良礼的叙述,罗易说:“我很高兴我已给你看了电报,它可算是最后通牒。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④

汪精卫回答说,1923年越飞和鲍罗廷制定的第三国际同国民党合作的条件,“完全不同于你们最后通牒中提出的条件。不是我们拒绝你们的条件,而是你们破坏了协议”^⑤。

汤良礼说,罗易接着做了一个说明,大意是他不同意鲍罗廷的条件和政策。汪精卫答称,他对新条件不感兴趣,“我们只尊重

①②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20页。

③④⑤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281页。

我们原先同意的条件”^①。

根据罗易后来的叙述，汪精卫曾将电报给他的同事们看，“有名的反革命分子孙科、陈友仁、谭延闿，他们为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所信任，视为左派”，“这些人早已与南京有来往”，并且“已经同蒋介石达成秘密谅解”^②。

汤良礼说，罗易“遭到鲍罗廷的严厉训斥”，鲍罗廷立即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他撤回罗易”^③。蔡和森的叙述与此相似：

“罗易将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在他来说是严重的失策。对此，政治局全体大为不满。于是鲍罗廷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罗易〔不久〕就被召回。”^④

汤良礼的看法是：“罗易认为国民党左派只有同共产党人合作才能生存，否则他们就要被右派消灭。所以，需要把斯大林的电报告诉他们。可是，鲍罗廷懂得国民党左派比罗易想象的强大得多，并且他知道，假如他们看到这个决议，他们会立即断绝同共产党人的关系。所以，他曾扣压这个决议。而当他得知罗易鲁莽从事，将决议泄露给汪精卫时，自然很恼火。大部分共产党人支持鲍罗廷，他们也认为公开行动的时机尚未到来，于是他们把罗易赶回俄国。”^⑤

根据当时的情况，鲍罗廷要中国共产党人限制土地革命，并依靠汪精卫和唐生智的军事力量。这就是纯粹“自上”的策略。相反，罗易仍然希望促使汪精卫有更好的革命的精神状态，并希望发动土地革命。罗易不信任唐生智，他与鲍罗廷不同的地方还在

①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281页。

② 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520页注。

③⑤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282页。

④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59页。据吉斯勒说，鲍罗廷或者是他的一个属员，给莫斯科做了不利于罗易的报告。只有加仑站在罗易一边。至于斯大林，他总是倾向于一个军事傀儡政府。《吉斯勒访问记》，1958年6月19—22日。

于他提议依靠冯玉祥的军事力量，而不依靠唐——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冯也不可信。因而，罗易要求“自下革命”。但是，除了通过汪精卫和武汉政府的力量外，找不到发动革命的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鲍罗廷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如蔡和森所见：

“一方面，罗易支持同汪精卫合作，另一方而又‘提出’汪所不能接受的政纲。罗易的理论与实践大相悬殊，这就是鲍罗廷常常占上风的原因。罗易的主张经常矛盾；而鲍罗廷的建议一以贯之，因为他总是顺从汪精卫等人的心理。”^①

罗易的弱点，在20世纪的革命历史中是常见的。几个月后，蔡和森说：“事后追论，罗易不失为一介书生：他总是在纸上坚持原则，而在实践上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②

（录自《罗易赴华使命》，文中注释均为原书所有）

^{①②} 蔡和森：《中国问题》，第1期，第55页。

九、附 录

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

[俄] И. Н. 索特尼科娃著 马贵凡编译

译者按：近几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副博士 И. Н. 索特尼科娃，专门查阅共产国际档案，考察了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的演变，并先后在 1993 年至 1995 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举行的“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现实和前景”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标题为《关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成立经过》、《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远东局（1922-1923）》、《研究中国问题的共产国际机构的改组（1926）》等学术报告，较详细地介绍了她的考察结果。长时期以来，无论俄罗斯史学界还是中国史学界，对于共产国际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机构的演变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搞清这个问题无疑对于我们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现将上述三篇学术报告的主要内容编译如下，供参考。文中大小标题均为编译者所加。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近年来，研究人员已有可能利用档案文件来说明共产国际历

史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方面，如多数东方学家都不很清楚的共产国际机构的组织结构，特别是与远东工作有关的那部分共产国际机构的组织结构。原来，在大家所熟悉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立（1921年）以前，就存在一个从事东方工作的完整组织网。在共产国际本部设有研究东方问题的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局。在远东共和国领土上有从事类似问题研究的其他一些部门的组织机构。如红色工会国际在东方国家成立许多码头工人联合会，外交人民委员部在远东设立了自己的代表机构——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东方局，而俄国共产党在远东设立的代表机构是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地区局和俄共（布）远东局。这些机构都是按照共产国际二大（1920）的指示精神开展工作的。共产国际二大为东方工作提出了基本目标，这就是支持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些国家建立革命政党和广泛的宣传鼓动小组网，把“最先进的学说”翻译成“当地”语言。

但是这些分支机构一个很大的不足，是不能协调行动。这势必导致各部门之间出现摩擦和白白浪费人力、物力。此外，设在远东共和国领土上的各部门机构都要服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地区局的领导，毫无疑问，这会把东方工作局限在地方工作的框框之内，有碍于开展国外工作。因此，东方的一些组织机构曾试图巧妙地摆脱俄共（布）的保护，派代表去莫斯科同共产国际有关机构讨论是否有必要把东方工作进一步集中的问题。

整顿远东工作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920年7月成立以原西伯利亚委员会东方局领导人加蓬为首的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局东方民族处（设在伊尔库茨克）。该处下设地区科（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和蒙藏科）、总务科、宣传出版科、联络科和情报科。工作重心直接转移到远东国家，在远东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如在中国，设立了由4至5人组成的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局。当时

东方民族处是管理远东工作的主要机构。

为便于开展工作和不受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干预，1920年秋，东方民族处直接请求共产国际接收它为其下属机构。1920年9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在远东成立共产国际书记处的重要决定。1921年1月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和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上述决定，在伊尔库茨克以书记处形式成立了共产国际代表机构。东方民族处遂被取消，其原经上级任命的干部转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担任领导职务，远东书记处被宣布为从事国外工作的最高机构。

远东书记处的组建工作从1921年1月持续到3月，人员配备持续到这一年年终。远东书记处也同东方民族处一样下设地区科，并且还成立了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其主要领导成员有：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B·舒米雅茨基、副代表Я·明斯克、责任书记Г·Н·维经斯基和A·鲍得里茨基、办公室主任布卡特、情报科长С·И·斯列帕克、中国科俄方书记И·马马耶夫、共产国际青年工作全权代表С·А·达林等。

1921年3月间，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舒米雅茨基要求赋予他外交人民委员部、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全权，因此新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尽管从组织结构和任务上看同东方民族处相似，但它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强有力的组织。它领导东方工作到1922年春。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

在东方民族处基础上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存在一年，1922年2月即在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即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译者）结束之后，它作为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东方国家（包括1921年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和筹备、召开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任务的“辅助机构”被

取消。共产国际代表B·扎哈罗夫(即舒米雅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1921年3月至1922年3月的工作成果报告时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一个辅助机构,通过这个机构共产国际在远东国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如在中国成立了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工会组织,为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物色了参加者,“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为辅助机构已不复存在”^①。

从1922年1月起,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人处于待分配状态。只有舒米雅茨基、维经斯基、斯列帕克、达林几个人奉召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他们后来的命运是:舒米雅茨基于1922年2月被派回赤塔工作,维经斯基后来被任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部长(该部取代了被改组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斯列帕克为维经斯基当副手,达林被派到中国工作。

原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人员,由于群龙无首和缺少经费不得不中止工作。据明斯克说,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结束后,B. J. 利金(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译者)来到上海,取代了B. 尼柯尔斯基(瓦西里)^②,接管了他的一切联系,但到1922年6月也不得不中止工作。

重新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在改组期间的东方部文件和信函中,可以看到它有部、局、书记处等不同名称)由3人组成,部长维经斯基、副部长斯列帕克和中国问题顾问Л·Г·考

^① 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35,第13-19页。

^② B. A. 尼柯尔斯基(瓦西里),1920至1921年间在共产国际驻华行政管理部门工作,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见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36,第58页。

夫曼^①。该部的一个主要工作方面是编辑远东通讯，按名单寄给各国党最高领导人。另一个重要工作方面是成立外文图书出版社，建立编辑室，出版科教刊物，开办“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图书室”。

据马林和利金发自中国的报告判断，那个时期在东方国家的工作，包括在中国的工作，有很多不足之处，如一些联络站没有双重隶属关系，联络站的工作有局限性，没有固定经费保证，没有国外工作经费等。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得到的印象是，深入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尝试并未取得多大成绩，因为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局主要是由以陈独秀为首的知识分子组成，它们脱离劳动群众，没有俄国的物质支持就无法生存^②。

除了客观上的困难外，1922年下半年远东部工作出现某种停顿也与共产国际机关再次进行缩编有关。第一阶段是在1922年夏天从重新审订共产国际执委会整个东方部编制开始的，最后的压缩改组阶段的到来是在1922年12月。

东方工作的领导中心从伊尔库茨克转到莫斯科后，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秋）以前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1922年12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四大决定成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讨论了包括维经斯基在内的东方部三位领导人提出的书面报告，他们建议把当时的东方部分成三个独立的部，即近东部、中东部和远东部^③。东方部负责人的建议经由B·克拉罗夫、И·А·皮亚特尼茨基、O·B·库西宁、С·Л·布里克和Г·Н·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委员会讨论修改后，于1923年1月2日

^① 见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31，第4页。

^② 同上，卷宗136，第81-85、87、98页。

^③ 同上，卷宗131，第3页。

获得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局的批准。

作为书面报告的补充,维经斯基起草了远东部1923年工作计划,指出了对远东国家工作的某些特殊方面。他认为,由于远东国家共产主义运动还很年轻,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需要有共产国际的指导、指示和监督。为正确指导各国党的活动,远东部需要系统地研究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坚持观察那里发生的各种变化和社会力量的改组,密切注视正在变化的政治局势,以便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具体场合给各国党作出正确的具体指示。

此外,维经斯基还认为,远东部必须就近了解它所指导的党的人员组成,同这些党的领导机构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并在日常工作中和在政治运动或政治发动时期研究这些机构。

为领导这方面的工作,莫斯科远东部的编制后来增加到5人,一名部长、三名政治顾问和一名打字员,并且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1923年1月在远东成立了远东部海参崴局。为了把远东各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联合起来,为了协调各地共产党、工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工作,维经斯基建议让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海参崴局的工作,进而在远东建立一个有威望有工作能力的共产主义工作机构,并计划设立一个三人委员会来领导该局工作(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各出一名代表),而全盘工作要由共产国际的代表来领导。除维经斯基之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任命马林和片山潜为该局成员^①,但实际上无论片山潜还是马林都从未在该局工作过。

远东部及其海参崴局的最重要工作方面是中国。

远东部在中国的工作是根据共产国际四大的建议进行的。共产国际四大制定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基本工作任务,这就是:1、

^① 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495,目录154,卷宗209,第1、23、25页。

开展广泛的书面和口头宣传活动，向广大群众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目标和策略，扩大出版共产主义报刊（提出出版问题）；2. 加强在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中的影响，同它们建立更密切的联系；3. 直接参加和领导工人群众的罢工行动，以及争取立即改善工人的物质状况和实现部分口号的罢工斗争；4. 利用高涨的罢工浪潮在全国工人当中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运动；5. 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在议会内外反对督军制度和旧中国的封建残余；6. 同中国一切民主力量结成反帝战线，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争取国家的真正民主化；7. 制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并提交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①。

维经斯基把这些任务具体化了，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共产国际的指导，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从这一年起才开始以真正的政治组织而不是宗派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姿态出现在国家政治生活舞台上。维经斯基认为，远东部的主要任务是使人数不多的中国共产党（300人）接近工人群众，建立全国一切民主力量的反帝统一战线^②。

从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1923年第一季度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报告作者萨发罗夫和布里克曾建议由海参崴局监督远东的全部工作。

海参崴局虽被寄予厚望，但它并没有生命力。在其存在的四个月间，据东方部副部长维经斯基证实，它还是取得了一些工作成绩，如成立了可以提供有关日本、朝鲜和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较详细材料的情报机构，与这些国家的党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创办了印刷中、日、朝文资料的印刷厂等。但是它的主要任务是同

^① 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195，目录154，卷宗194，第1-6页。

^② 同上，第7-9页。

各国党及其领导人建立日常联系，这项任务未能完成。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海参崴局的职责减为完成东方部同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任务，以及同朝鲜局一起领导在远东的朝鲜共产党人的工作。维经斯基认为，把组织和领导北满中国工人的工作任务留给海参崴局也是适当的，因为中共的影响没有渗透到那里，有可能从海参崴来进行领导。海参崴局的编制减为四人：三名各国信息员、一名打字员。1923年7月，海参崴局被取消，仅保留一个收集情报和进行联络的共产国际代表机构。

远东部作为东方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存在两年，到1926年春改组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新一轮机构改革始于1925年底1926年初，这次改革触及到共产国际的所有环节。1926年1月6日，东方部领导人彼得罗夫（即Ф.Ф.拉斯科尔尼科夫）提请书记处审议他的东方部改组建议以及编制、预算方案。

1926年2、3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未采纳彼得罗夫的建议，因为当时打算对整个共产国际作更彻底的改组。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26年3月24日作出决定，成立11个地区书记处，每个书记处主管一组国家，其中包括为远东和近东国家设立的一个书记处，书记是彼得罗夫，维经斯基被指定负责这个书记处中的远东国家。实际上这个地区书记处分支享有独立书记处的权力，在文件中称为远东书记处。以前的东方部从1926年4月1日起不再存在。4月9日远东书记处举行第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了维经斯基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书记处的领导成员有：维经斯基、别达赫特、谢马温、蔡和森、杨诺夫斯基、基姆、得洪、卡斯帕罗娃和福京。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为加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影响，根据远东书记处1926年4月27日决定，紧急成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设在上海），其组成人员过一天后，即4月29日，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为了开展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工作，维经斯基（局长）、拉菲斯、格列尔和福京前往中国。此外，还计划让中、朝、日共产党代表参加远东局工作。

1926年夏，共产国际代表抵达上海，远东局的工作随即开始。在远东局的成立会议上，讨论了远东局的工作性质，通过了它的基本工作准则，即吸收各国党的代表参加讨论党的问题，对于中国，“仅限于根据中共中央报告进行一般的指导，而不去取代中央，不去破坏党的正常发展。”

在远东局的头几月工作报告中指出，若是远东局早来到的话，那么“就能避免许多错误”，虽然说到7月前夕远东局成员已大大统一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它的工作人员都使用了化名：谢尔盖（谢尔金）是维经斯基，教授是格列尔，马克思是拉菲斯，年轻人是福京，切尔尼亚克是曼达良，老头是陈独秀，文学家是瞿秋白。远东局下设地区科，除同各国党进行联系外，还从事党建工作和帮助解决工会和青年问题。中国科的工作外加确定国共关系范围、收集和整理中共中央资料、帮助解决各种问题等任务。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核心是它的俄国代表团。该代表团从6月中旬起，即还在远东局成立之前，就已开始在中国工作。在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收集到的代表团会议记录表明，代表团的工作同远东局的活动是同时并行的。代表团成员不仅参加远东局的“组建”、其利益范围的划定、秘书科的设立等工作，而且参与制定远东局的所有重要举措。在远东局同中共中

央举行的吸收党的地方代表和工会首领参加的联席会议上，俄国代表团成员讨论了党的所有政策问题，听取了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和通报，对重要文件作出了修改，并为中共的会议起草了决议。代表团成员还在全国进行了考察，访问了广州、汉口、长沙等地的党组织。

在俄国代表团中作了如下分工：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参加中共中央的工作，拉菲斯担任党的中央出版机构的编委，格列尔研究工会问题，而福京从事情报、宣传和青年工作。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及其俄国代表团的最高领导机构，通常不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是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委员会，自然还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1926年秋，远东局领导人正是向这些机构反映各种问题，包括他们发生意见分歧时出现的问题，1926年11至12月间，即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时，来自中国的函电源源不断。

实际上在1926年10月至11月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就认为远东局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1926年10月，莫斯科就不同意远东局关于召回鲍罗廷的建议，相反，在加拉罕于1926年10月离开中国之后，还曾建议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工作人员同鲍罗廷协商一切重大政策的问题。

1927年初，远东局在中国的活动被中止，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决定向中国再派一名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罗易。而后鲍罗廷、维经斯基和罗易这“三头政治”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在中国的最高代表机构，一直活动到1927年6、7月间，而鲍罗廷在其中拥有决定权。

（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注释为原文所有。）

大革命时期来华工作的苏联人员*

（一）1925—1927年革命时期在华的部分苏联军事和军政顾问

阿基莫夫（Акимов, В. М.）[别嘉·西林（Петя·Силин）]生于1902年。1925—1926年任张家口组军事顾问，1926—1927年任广州组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毕业于塔什干东方学专修班。他以顾问身份从事教官工作：在华北，任步兵军官训练班教官，在华南，任黄埔军校教官。曾任第一军第二步兵师顾问。参加过攻打武昌的战役。1932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37—1938年间，在中国（兰州市）负责参加抗日的中国军队的供给工作。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担任过师长和军长。荣获一枚红旗勋章。

阿尔根托夫（Аргентов, А. А.）[马利诺（Марино）]广州组炮兵顾问。曾主持中国炮兵军官从掩蔽阵地进行射击的短期训练，讲课可以不用翻译。

巴泽纳乌（Базенау, О.）广州组空军顾问。航空机械师出身。战时担任观察员、炮手和射击手。攻打武昌时骁勇善战。

巴尔科（Балк）张家口组铁甲列车顾问。曾随卡利诺夫斯基铁甲列车队参加国民军第一军的天津战役。1926年初死于血中毒，葬于北京。

别夏斯特诺夫（Бессчастнов, Г. А.）1893年生。1925—1926年任广州组炮兵首席顾问，曾参加过广东的很多战役以及筹建兵工厂的工作，在黄埔军校讲过炮兵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 标题为编者所加

俄国国内战争，曾任过加仑当时指挥的第五十一步兵师炮兵队长。从中国回国后，任第一炮兵旅旅长，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他担任的最后职务是炮兵指挥员高级进修学校校长，1947年逝世。

勃拉戈达托夫 (Благодатов, А. В.) [罗兰 (Роллан)] 1893年生。1925年4月来华。1925年在武官处工作，1926年任河南组参谋长，1927年任广州组参谋长和副总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在中国期间，参加过华北的天津战役、华中的兖州战役、驻马店战役和洛阳之战，在华南，参加过北伐（南京战役和河南战役）。曾在河南的军校教授过炮兵知识课。在返苏途中被蒋介石分子劫下轮船，关进监狱。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军长、集团军副司令、乌克兰第三方面军驻保加利亚第一集团军代表、维也纳城防司令。战后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系主任。

勃柳赫尔 (Блюхер, В. К.) [加仑 (Галин)] 生于1892年。1924—1927年任华南军事总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俄国国内战争中，因功绩卓著荣获一级红旗勋章。曾任远东红旗特种部队司令，在中东路事件（1929年）和反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在哈桑湖）时，曾指挥过该部队的一系列行动。被授予苏联元帅称号。

鲍罗沃伊 (Боровой, П. Ю.) 生于1902年，在哈尔滨就学。1922年以前在远东做党的工作。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毕业。在华期间，曾在武官处做外交工作。伟大的卫国战争初期牺牲。

鲍罗廷 (Бородин, Т. С.) 生于1891年。河南组炮兵顾问，1926年7月起调到广州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国内战争期间任第四十鲍古恰尔师炮兵营长（该师师长为М·В·桑古尔斯基，师炮兵队长为А·В·勃拉戈达托夫）。参加过北伐。曾写过一篇介绍自己在中国工作情况的文章《一个炮兵顾问的回忆》，该文载于《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书（莫斯科1974年版）。参

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

瓦辛（Васин, В.）河南组工程兵顾问。曾在河南军校讲过战地工事学课。

维赫列夫（Вихлев, А.）生于1902年。张家口组铁甲列车顾问。曾参加过天津战役，1926年在甘肃省阵亡。

维什尼娅科娃（Вишнякова, В. В.）生于1905年，毕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1925—1927年在几个军事顾问组参谋部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总顾问М·М·鲍罗廷的机关里担任翻译。

沃罗宁（Воронин, Н. М.）[普季增（Птицин）]驻北京武官。医生出身。在土耳其斯坦参加过国内战争，任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荣获两枚红旗勋章。

格克尔（Геккер, А. И.）生于1888年，苏联首任驻华武官（1922—1925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荣获三枚红旗勋章。在华（在河南）参加过几次战役。

格尔曼（Герман, Я. Г.）广州组军事顾问（1923年来华的“第一个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初级班和东方系）。在中国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组建工作和广东的多次战役。

基列夫（Гилев, Г. И.）广州组军事顾问，1924年10月来华，曾在黄埔军校任过教，作为炮兵顾问参加过广东的战役。

格米拉（Гмира, М. Я.）生于1900年。1924年10月来华，在广州组任加仑的书记副官。

戈列夫（Горев, В. Е.）生于1900年。1925—1926年任张家口组军事顾问。1926—1927年任广州组军事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初级班和东方系）。在华南曾任过张发奎将军的第四军（铁军）顾问，参加过北伐。返回苏联后，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军事领导人。曾发表过一篇论述

中国军队的文章，笔名维索戈列茨（Высогорец）。

格列伊（Грей，А. И.）生于1898年，广州组海军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在中国期间，主管武器航运等事宜。

德拉特文（Дратвин，М. И.）生于1893年，广州组通讯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1925年起在黄埔军校讲授通讯课程。返回苏联后，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37年再度来华，任武官和军事总顾问。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

叶戈罗夫（Егоров，А. И.）生于1883年，1905年毕业于军事学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1925年10月起任驻华武官。1926年3月奉召回国。在苏联担任过几个军区的司令员，1931—1937年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长，1937年起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叶戈罗夫为苏联元帅。

叶弗列莫夫（Ефремов，М. Г.）〔阿勃诺利德（Абнольд）〕生于1890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广州组军事顾问，1926年起在广东任总参谋长李济深将军的首席顾问。曾主持黄埔军校的顾问工作。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先后任第二十一集团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员。1942年4月19日在斯摩棱斯克省牺牲。

泽涅克（Зенек，И. Я.）〔泽姆勃罗夫斯基（Зембровский）〕生于1898年，广州组军事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1925年在黄埔军校工作，参加过广东的战役和北伐，曾任第二军谭延闿将军的顾问。

齐利别尔特（Зильберт，П. Н.）生于1898年，广州组军事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初级班和东方系）。1924年10月至1927年在中国工作，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参加过广东的战役和北伐。

齐明（Зимин）生于1896年，1925年6月起任河南组军事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速成班毕业，参加过天津前线的一些战役。

后因病离华。

佐托夫（Зотов, И.）生于1900年，广州组参谋长，1926年10月来华，参加过北伐。1927年8月在汉口的一次宴会上中毒身亡（据料，那个投放毒药的酒杯是为加仑预备的）。

久克（Зюк, П.）生于1896年，张家口组骑兵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随B·M·普利马科夫指挥的第八骑兵师参加了国内战争，任骑兵营营长。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在中国曾任骑兵军军长孙连仲的顾问。国民军第一军的中国骑兵在华北战场上屡战皆败，溃不成军。П·久克返回苏联后，任列宁格勒军区第四步兵师师长。

伊万诺夫-利诺夫（Иванов-Ринов）张家口组军事顾问，原系沙皇军队将军。他与前沙皇军队其他两名将军顿基赫、舍拉文一起，加入赴华苏联志愿军组。参加过华北的一些战役，双脚负伤。

伊利亚申科（Ильяшенко）驻北京武官处军事顾问，1927年4月6日奉军袭击苏联大使馆时，与使馆其他苏联工作人员一道被捕，被囚禁一年半。

卡利诺夫斯基（Калиновский, К. Б.）〔科尔杰（Корце）〕生于1897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由于在国内战争中功绩卓著，被授予二枚红旗勋章。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张家口组铁甲列车顾问，1925—1926年在华工作。他与工程师、军事顾问切金一道，制造了五辆铁甲列车，对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帮助很大。这些铁甲车在直隶省坚持了五个月，抗击占优势的奉军。返回苏联后，任工农红军摩托化机械化管理局副局长，1932年因飞机失事牺牲。

卡拉蒂金（Каратыгин, П. П.）〔拉冈（Рого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旧军队的总参军事学院毕业。1925—1926年在华工作。曾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M·B·伏龙芝（Фрунзе）的特派军官，视察过军事顾问的工作。

科利莫夫 (Климов, А. Я.) 生于1898年, 军事政治顾问, 1924—1925年在河南组、1925—1926年在张家口组工作。参加过远东的革命运动和国内战争。191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 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4年), 1927年返回莫斯科, 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

科比亚科夫 (Кобяков) 广州组军事飞行员 (随航机械师), 在广东战役和北伐期间参加过多次空战。在江西战役中, 与飞行员列米久克一起, 被迫在敌占区着陆, 被俘。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昌后从监狱获释。

康奇茨 (Конциц, Н. П.) 生于1894年, 广州组军事顾问,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1925年在华北任第六军军长程潜将军的顾问。北伐期间参加过粉碎孙传芳的南昌战役。他在中国的工作情况较为详细地记载于他的《在华日记》一书中。他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因表现勇敢, 指挥作战有方, 多次荣获勋章和奖章。

科列伊沃 (Корейво, П.) [诺加 (Нога)] 生于1885年, 张家口组军事顾问, 塔什干东方学专修班毕业。为了建立冯玉祥军队与国民革命军之间的联系, 曾在敌占区出色地辗转两个月 (从陕西省到汉口)。

科尔涅耶夫 (Корнеев, И.) [安杰尔斯 (Андерс)] 生于1890年, 张家口组军事顾问, 曾任该组参谋长。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1926年任方振武将军的国民军第五军总顾问, 并随该军同冯玉祥指挥的部队一道参加了华北的一些战役。

科尔涅耶夫 (Корнеев, Н. С.) [康 (Кон)] 广州组军事顾问, 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 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1925年起在华任国民革命军通讯主任的顾问; 参加过北伐。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 曾任苏军驻布罗兹·铁托元帅处的代表。

柯拉夫佐夫 (Кравцов, А. М.) 生于1897年, 广州组空军顾问兼飞行队长。曾在耶戈里耶夫斯基航校和卡恰航校受过军事训练。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1925—1927年在华工作, 参加过广东的一些战役和北伐, 特别是武昌的空战。从中国回国后, 指挥远东各种航空部队和堪察加空军。参加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防空战。曾多次荣获军功勋章。

库兹米切夫 (Кузьмичев, Б. И.) [温 (Вен)] 生于1900年。张家口组骑兵顾问。曾任过副总顾问普利马科夫的副官。

古比雪夫 (Куйбышев, Н. В.) [季山嘉 (Кисанька)] 在加仑回国疗养期间 (1925—1926年3月) 任广州组军事总顾问。后曾任工农红军干部部长。

库满宁 (Куманин, М. Ф.) [齐冈 (Зигон)] 生于1897年, 广州组军事顾问,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1926年10月起在中国任第七军 (桂军) 军事顾问。参加过北伐。在河南战役中任贺龙将军的顾问。1927年秋, 贺龙部队反对国民党叛变的起义失败, 库满宁被俘, 一年以后才获释回国。详见 М·Ф·库满宁写的南昌起义回忆录, 载《苏联志愿者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书 (莫斯科, 1961年)。

拉平 (Лашин, А. Я.) [薛福林 (Сейфуллин)] 生于1899年, 张家口组军事顾问, 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5—1927年在中国张家口组工作, 尔后任河南组组长, 1926年4月代理武官, 尔后任冯玉祥的西北军副总军事顾问。返回苏联后, 进航校学习, 毕业后转入空军。因在国内战争和在华工作期间功绩卓著, 荣获四枚红旗勋章。

列别捷夫 (Лебедев, П. В.) [鲁别 (Лубе)] 生于1892年, 河南组军事顾问,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 曾在河南军校讲过课和指导学员野外演习。

隆格瓦 (Лонгва, Р. В.) 生于1890年, 1926—1927年间任驻

北京武官，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191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因战功卓著，荣获一枚红旗勋章。从中国回国后，在总参谋部工作，任工农红军通讯部长。

洛班诺夫（Лобанов, Н. В.）张家口组军事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

利沃夫（Львов, В. И.）生于1891年，张家口组军事顾问，国民军第三军孙岳将军首席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曾任集团军司令，在克里米亚英勇牺牲。

马迈耶夫（Мамасв, Н. К.）生于1896年，广州组军事顾问，哈尔滨商学院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后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1924年10月—1926年在中国工作，曾任黄埔军校教官，作为第七军（桂军）的军事顾问参加了广东的一些战役和北伐，并参加了攻打武昌。返回苏联后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工作。

马采伊利克（Мацейлик, Ф. Г.）生于1895年，广州组军事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1924年10月来华，在黄埔军校任过教，曾作为第三军（云南军）顾问参加了广东的一些战役和北伐，返回苏联后任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对外联络处处长。

莫尔察诺夫（Молчанов, Н. С.）生于1896年，张家口组军医顾问，天津战役开始后，他在北京利用当地的条件，主动开设了一所医院。

穆拉维约夫（Муравьев, В. Л.）生于1900年，驻北京武官处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1925—1927年在中国工作，曾参加了河南的一些战役。他的主要职业是建筑师，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

纳乌莫夫（Паумов, С. П.）[卡拉切夫（Калачев）]生于1890

年，军政顾问，1925年5月至1927年先后在张家口、河南和广州组工作，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在广州顾问组期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总顾问。北伐开始后，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返回苏联后，从事科学和教育工作，曾任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总编辑。见《苏联志愿者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书中他写的文章《黄埔军校》（莫斯科，1961年）。

巴甫洛夫（Павлов, П. А.）生于1892年，首任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我们顾问组织工作的奠基人，通晓五种外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荣获二枚红旗勋章和一枚布哈拉金星勋章，1924年在石龙不幸牺牲。

帕纽科夫（Панюков, В. Н.）〔科米（Коми）〕生于1899年，广州组军事顾问，塔什干东方学专修班毕业，1924年10月来华，在黄埔军校先后任翻译和教官。曾作为顾问参加了广东的一些战役，北伐开始时被加仑任命为第二十六军军长白崇禧将军的顾问。

佩特凯维奇（Петкевич, Н. Ю.）〔久弗连（Дюфрей）〕生于1895年，张家口组炮兵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荣获二枚红旗勋章。1925年4月来华，曾在平地泉炮兵训练班向中国炮兵军官传授过新的射击法。返回苏联后，任莫斯科军区炮兵司令。

波洛（Полло, Я.）生于1896年，广州组军事顾问，速成班毕业，1924年10月来华，任黄埔军校战术教官，曾作为师的顾问参加了广东的一些战役，尔后参加了北伐。

波利雅克（Поляк, В. Е.）生于1890年，广州顾问组军事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初级班和东方系），1918年入党，1923年6月作为“第一个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来华。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并任该校第一任首席顾问，参加过广东的一些战役。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曾任 М·В·伏龙芝军事学院教研室主任。1947年逝

世。

普利马科夫 (Примаков, В. М.) [林 (Лин)] 生于1897年, 张家口组副总顾问, 积极创建国民军第一军的骑兵。俄国国内战争期间, 历任著名的第八骑兵师师长和红色哥萨克第一骑兵军军长, 荣获三枚红旗勋章。返回苏联后, 任北高加索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副司令。

普罗塔索夫 (Протасов, С.) 生于1897年, 武官处地形测绘员, 在北京和南昌为张家口组和广州组绘制了很多战术地图。

普特纳 (Путна, В. К.) 生于1894年, 张家口组军事总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 由于屡建战功, 荣获三枚红旗勋章, 晚年出任驻英武官。

拉兹贡 (Разгон, П. Я.) [奥利金 (Ольгин)] 军事总顾问季山嘉的政治助手。来华之前曾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主管政治工作的副院长。在广州期间, 曾参与制定黄埔军校的大纲和条例。

列米久克 (Ремизюк) [维利 (Верн)] 广州组军事飞行员兼顾问, 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的广东战役和北伐。在江西省被迫着陆时与机械师科比雅科夫一道被俘, 关押于南昌监狱。国民革命军攻下南昌后获释。

罗加乔夫 (Рогачев, В. П.) 生于1892年, 广州组军事顾问,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 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 1924年10月来华, 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

罗戈夫 (Рогов, Н. П.) [洛德金斯基 (Лодзинский)] 生于1894年, 广州组后方军事顾问, 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 军事经济学院毕业。

桑古尔斯基 (Сангурский, М. В.) [乌斯曼诺夫 (Усманов)] 生于1895年,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 高级指挥干部进修班毕业, 曾任第一步兵军军长和列宁格勒警备司令。1926年年中来华, 任冯玉祥元帅的国民军西北军 (前张家口军) 军事

总顾问，离华回国后，任远东红旗特种部队副司令。

萨赫诺美斯卡娅（Сахновская, М.）[丘芭列娃（Чубарева）] 生于1899年，广州组军事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荣获一枚红旗勋章，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曾任广州组参谋长，在黄埔军校任过教官。

萨赫诺夫斯基（Сахновский）生于1895年，广州组军事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曾参加过广东的一些战役，并在黄埔军校任过教。

谢苗诺夫（Семёнов, П. А.）[维克托罗夫（Викторов）] 生于1891年，广州组军事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在华担任黄埔军校教官。返回苏联后，先后在列宁格勒军区司令部和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工作。

谢尔盖耶夫（Сергеев, В. Е.）生于1893年，广州组和国民革命军空军负责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曾在俄国和法国攻读航空专业，参加过广东和北伐中的很多战役。

西林（Силин）生于1894年，河南组军事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曾作为第三步兵师顾问参加了河南的一些战役。

斯卡洛夫（Скалов, Г. Б.）[西纳尼（Синанин）] 生于1889年，河南组军事总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曾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因参加了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被授予一枚红旗勋章，后来曾任莫斯科东方学院院长。

斯莫连采夫（Смоленцев, П. П.）生于1891年，广州组军事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初级班和东方系），1923年作为“第一个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来华。曾参加了创建黄埔军校和广东的一些战役。

斯涅戈夫（Снегов, М. Г.）[斯维托夫（Светов）] 生于1893年，广州组参谋部军事顾问（作战部部长和副参谋长）。参加过俄

国国内战争，返回苏联后，任国防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军长，因参加了佩烈梅什利的保卫战，荣获一枚红旗勋章。

索洛维约夫 (Солсвьев, Н. В.) [奥尔洛夫 (Орлов)] 生于1892年，广州组和国民革命军军医顾问。

斯捷潘诺夫 (Степанов, В. А.) 生于1890年，广州组军事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1924年10月来华，在黄埔军校工作，参加过广东的一些战役。

斯特鲁姆比斯 (Струмбис) 广州组军事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1926年来华，在顾问组参谋部情报处工作。

苏霍鲁科夫 (Сухоруков, В. Т.) 生于1892年，1924年起任驻华武官处军事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有关他在中国的活动情况，详见《蒋介石分子对苏联总领事馆的袭击》一文（汉口，1927年）。

塔利别尔克·琼 (Тальберг, Джон) 生于1893年，广州组空军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参加过广东的一些战役和北伐。

捷列沙托夫 (Телешатов, П. П.) 生于1893年，广州组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1923年作为“第一个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来华，积极参与将中国武装部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积极参加创建黄埔军校的工作和广东的一些战争。

铁罗尼 (Теруни) [铁尔·塔伊罗夫 (Тер. Таиров)] 生于1886年，广州组军事政治顾问，参加过国内战争，历任过一系列军政要职。1924年来华，任总顾问加仑的政治助手，积极参与创建黄埔军校，积极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广东的一些战役和北伐，参加过攻打武昌的战斗。

捷斯连科 (Тесленко, Е. В.) [捷列辛科 (Терещенко)] 生于

1895年，广州组军事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1925年来华，在广州组参谋部工作，尔后任叶挺将军的军部顾问，参加过北伐。关于E·B·捷斯连科在中国的活动，见《苏联志愿者谈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莫斯科，1961年）一书中《从广州到汉口》一文和《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书中的《回忆叶挺》一文（莫斯科，1974年）。

顿基赫（Тонких, И. В.）驻北京武官处军事顾问，前沙皇军队将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出身于外贝加尔哥萨克，曾在参谋部中整理参谋部的资料；在张作霖的士兵4月6日袭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时被捕并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备受虐待达一年多。

乌格尔（Угер, Д.）[列米（Реми）]生于1895年，广州组空军顾问，广州组和国民革命军空军飞行大队长，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参加过广东的一些战役。

费利波夫斯基（Филиповский, М.）生于1895年，广州组军事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1926年来华，任第三十六军军事顾问，参加过北伐。离华回国后，在总参军事学院任教，参加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哈西斯（Хасис, А. И.）生于1894年，自1925年2月起在华做外交工作；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在东南和土耳其斯坦方面军），1924年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曾任过驻广州、汉口和上海的副领事，在蒋介石分子镇压广州公社时惨遭杀害。

切金（Ческин, С. С.）[谢尔盖耶夫（Сергеев）]生于1894年，张家口组工程兵顾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1925年来华，与卡利诺夫斯基一起为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建造了五辆铁甲列车，这些铁甲列车在抗击奉军、保卫北京地区时发挥了很大作用。切金离华返回苏联后被任命为B·B·古比雪夫军事

工程学院副院长。

切列潘诺夫 (Черепанов, А. И.) 生于1896年, 广州组军事顾问, 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 (初级班和东方系),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 参加过纳尔瓦和普斯科夫战役, 这次战役开始那一天——1918年2月23日——即成了苏联建军节。1923年随第一批顾问来华, 参加了创建黄埔军校, 参加过广东的一些战役和北伐。切列潘诺夫在其《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莫斯科1976年版) 一书的第一、二部分中, 描写了他1923年至1926年的活动情况, 在第三部分中描写了1938年担任中国军队军事总顾问的情况。离华回国后, 他在总参军事学院中工作, 卫国战争期间, 曾指挥过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一个集团军。

切尔尼科夫 (Черников, А. И.) [萨特拉普 (Сатрап)] 生于1891年, 张家口组军事顾问, 1926年起任广州组军事顾问, 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 在华北时, 曾在张家口军官机枪射击训练班中任过教, 参加过天津战役; 在华南, 曾作为程潜将军的第六军顾问参加了北伐。

沙尔费耶夫 (Шалфеев, С.) [沃罗比约夫 (Воробьев)] 生于1901年, 骑兵, 加仑的私人副官, 后随苏联军事代表舍科驻蒙古, 被授予蒙军将军衔。

舍拉文 (Шелавин) [鲁特涅夫 (Руднев)] 1925—1926年任河南组军事顾问, 在河南军校讲授过炮兵知识, 1926年底至1927年在广州组参谋部工作。舍拉文原系沙皇军队的将军。

舍瓦尔金 (Шевалдин, П. А.) [普利贝列夫 (Прибылев)] 生于1892年, 广州组军事顾问, 速成班毕业, 1924年10月来华, 参加了组建黄埔军校并在军校中工作, 参加过广东的一些战役, 后来作为师的顾问参加了北伐, 参加过攻打武昌和南京的战斗。

舒瓦诺夫 (Шуванов, П. Г.) 生于1894年, 广州组军事顾问, 1926年来华, 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部李济深将军领导的作战部顾问。

И·Г·舒瓦诺夫曾在《在中国的土地上》（莫斯科，1974年）一书中的《在华南》一文中，描写了自己在该参谋部的活动。

雅科夫列夫（Яковлев, В. А.）生于1880年，广州组工程兵顾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毕业于军事工程学院（与Л·В·卡尔比舍夫同届），系永久性工事工程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1924年10月来华，积极参加黄埔军校的教学组织工作以及广东的一些战役。1926年回国后任В·В·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

雅诺夫斯基（Яновский）生于1900年，广州组顾问，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毕业，1926年来华，任过师和军的顾问。

附注：这里列举参加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军事顾问和军政顾问的名单是非常不全的。由于各种原因，作者无法更详细地介绍顾问们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参加了哪个派，他们的战斗和军事理论修养以及称号等等）。但是，由于我本人对这些人的活动情况很了解，因而使我能看到他们所固有的共同特点。

他们大多数人都是苏共党员。他们前往中国是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帮助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几乎所有当时在中国工作的顾问都是25—40岁的中、青年人；大多数人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国内战争的经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大约占50%），都是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第四、五期毕业生。

这些苏联人在中国都忘我地工作，尽管条件非常困难，以及很多人都缺乏在中国当顾问的专门训练（例如，不懂该国的风俗习惯、语言、地理特点，不了解中国使用的武器等，其原因在于没有中国地图，缺少该国的地理和历史方面的科学书籍）。

（二）参加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苏联 军事翻译和汉学家

阿勃拉姆松（Абрамсон, Э. М.）〔马祖林（Мазурин）〕生于1898

年，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随军事顾问从事翻译和汉学工作。1925—1926年在河南组担任顾问组长Г·Б·斯卡洛夫的翻译，1926年9月至1927年在广州组加仑总部工作。在河南时，曾参加兖州和驻马店战役，在广州组工作期间，参加了北伐。

鲍卡年科 (Боканенко, Ф. Т.) [科尔弗 (Корф)] 张家口组军事翻译，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大学毕业，随К·Б·卡利诺夫斯基指挥的铁甲列车参加了国民军第一军的很多次战役。

瓦西里耶夫 (Васильев, В. А.) 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主要担任武官А·П·格克尔、Н·М·沃罗宁、А·П·叶戈罗夫的翻译。

卡扎宁 (Казанин, М. П.) [洛托夫 (Лотов)] 1926—1927年任广州组军事翻译、汉学家。勃拉戈达托夫任加仑的副手时，充任勃拉戈达托夫的翻译。М·П·卡扎宁曾写了《在加仑的司令部里》一书，介绍了他担任翻译的活动情况。他曾在很多中国问题科研机关工作过，著有《一个代表团秘书的札记》一书以及几部文学作品。

科萨切夫 (Косачев) 顾问伊万诺夫-利诺夫的军事翻译，在包头战役中阵亡。

蒙泽列尔 (Монзелер, Г. О.) 广州组参谋长А·В·勃拉戈达托夫的军事翻译。列宁格勒大学汉语教员。1927年来华做学术考察，参加过北伐。

佩弗兹涅尔 (Певзнер) [柯拉弗特 (Крафт)] 张家口组军事翻译，汉学家，曾随该组顾问参加过一些战役。

奥沙宁 (Ошанин, П. М.) 生于1900年，军事翻译，汉学家。1926—1927年在中国，先在北京，后在河南组工作。随河南组顾问参加了徐州前线的一些战役，曾在拉扎列夫学院和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攻读中文和汉学。1928—1938年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文科博士、教授，现在苏联科学院东方事务研究所工作。

附注：我没能找到介绍没有参加过战役，但与军事顾问们一道工作过

或在顾问组参谋部里工作过的那些翻译人员生平更为详细的材料。

莫斯科、列宁格勒、符拉迪沃斯托克等苏联主要汉学中心的代表都去过中国。这些都是年青人，大多数都是20—30岁的年青学生，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工作，为有幸参加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斗争而感到自豪。

回忆录《在起义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的作者В·В·维什尼娅科娃-阿基莫娃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自己任张家口顾问组顾问的军事翻译，尔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总顾问М·М·鲍罗廷机关军事翻译的活动情况。В·В·维什尼娅科娃在其著作中除了介绍我国一些军事顾问和军政顾问的很有价值的材料外，还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同行——汉学家的活动情况。这使我只能列一下他们的名单和明确一下我与他们会见的地点。

第一批离莫斯科到中国去的汉学家有В·Л·加姆别尔克（Гамберг）、А·П·罗加乔夫（Рогачев）、В·И·麦利尼科夫（Мельников）和И·М·奥沙宁（Ошанин）。И·М·奥沙宁最初在全权代表Л·М·加拉罕机关中工作，尔后到河南组。接着从远东国立大学来了一大批人——З·С·杜芭索娃（Дубасова）留在了北京，Ф·Т·鲍卡年科（Боканенко）同В·В·维什尼娅科娃去了张家口顾问组，В·沃伊洛什尼科夫（Войлошников）、Т·И·弗拉基米罗娃（Владиминова）及其丈夫Е·С·约克（Юкком）都在广州。在开封担任翻译的是列宁格勒来的瓦西里耶夫、С·М·奥科涅什尼科娃（Окопешникова），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的Г·Ф·斯科沃尔佐夫（Скворцов）和С·А·弗鲁别尔（Врубель）。В·С·佩尔林（Перлин）一直在北京工作。

（录自〔苏〕А·В·勃拉戈达托夫著、李辉译《中国革命纪事》
（1925—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1

作者 =

页数 = 610

SS号 = 10273190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一、鲍罗廷与国民党二大

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 汪精卫

鲍罗廷在华工作经过

在国民政府欢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宴会上的演说词 &

鲍罗廷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欢宴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席上之演说词 & 鲍罗廷

鲍顾问与白崇禧之谈话

二、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和国民军

一个志愿兵的札记（摘录）& 里根·阿连

关于骑兵的报告

与普里马科夫同志座谈的速记记录

附：《冯玉祥与国民军》前言 & 米罗维茨科

冯玉祥莫斯科之行日记

刘伯坚同志自库伦报告

冯玉祥回国宣言

蔡和森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

冯玉祥给仲甫同志信

冯玉祥回国之后国民军

三、布勃诺夫使团与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李之龙事件经过详情 & 蒋中正

关于“三二”事件的报告 & 斯切潘诺夫

关于“三二”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 & 斯切潘诺夫

蒋介石关于“整军肃党、准期北伐”向国民党中央的建议

蒋介石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整理党务案

附 1：切列潘诺夫关于布勃诺夫使团的回忆

附 2：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关于中山舰事变的论述

附 3：张国焘关于整理党务案的回忆

附 4：关于国民革命的分歧 - - 中山舰事件和布勃诺夫使团（日）&

毛里和子

四、加伦与北伐战争

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 1926 年国民党军事规划 & 加伦

加伦对蒋介石计划的意见

北伐前夕 - - 康奇茨日记（节录）

加伦关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三期作战部署简述

附 1：布勃诺夫听取关于北伐问题的汇报 & 切列潘诺夫

附 2：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节录）& 切列潘诺夫

附 3：炮兵顾问的回忆 & 鲍罗金

五、北伐期间的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共青团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致中国共青团的信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

-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武装干涉中国的声明
 - 在中国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 六、罗易来华与“四一二”政变
 - 中国革命的意义 & 罗易
 - 一个警告
 - 注意领导人 & 罗易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和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
 - 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 & 罗易
 -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
 - 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
 - 七、罗易与中共五大
 -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 & 罗易
 - 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 罗易
 - 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 & 罗易
 - 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 & 罗易
 - 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 & 罗易
 - 布尔什维克的党 & 罗易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之意义 & 罗易
 - 八、大革命紧急时期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 & 罗易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
 - 反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策略：防御还是进攻？
 - 罗易给冯玉祥的公开信
 -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
 - 中国（国共两党）国民革命纲领草案
 - 国民革命纲领 & 罗易
 - 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 罗易
 - 书记处致上海区委的信
 - 反帝斗争和阶级斗争 & 罗易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摘录）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
 - 党的机会主义史 & 蔡和森
 - 附：马日事变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资料
 - 九、附录
 - 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
 - 大革命时期来华工作的苏联人员
- 附录页